

东北抗日联军史

(送审稿)

上册

《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东北抗日联军史

(送审稿)

上册

《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杨靖宇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周保中 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第五军军长



赵尚志 北满抗联总司令、第三军军长



李兆麟(张寿箴) 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六军政委



魏拯民 抗联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第二军政委



冯仲云 抗联第三路军政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



王德泰 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第二军军长



许亨植 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第三军军长



李延禄 抗联第四军军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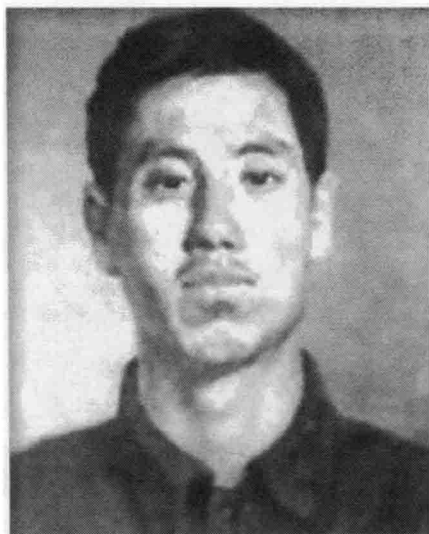
柴世荣 抗联第五军军长



李延平 抗联第四军军长



夏云杰 抗联第六军军长



陈荣久 抗联第七军军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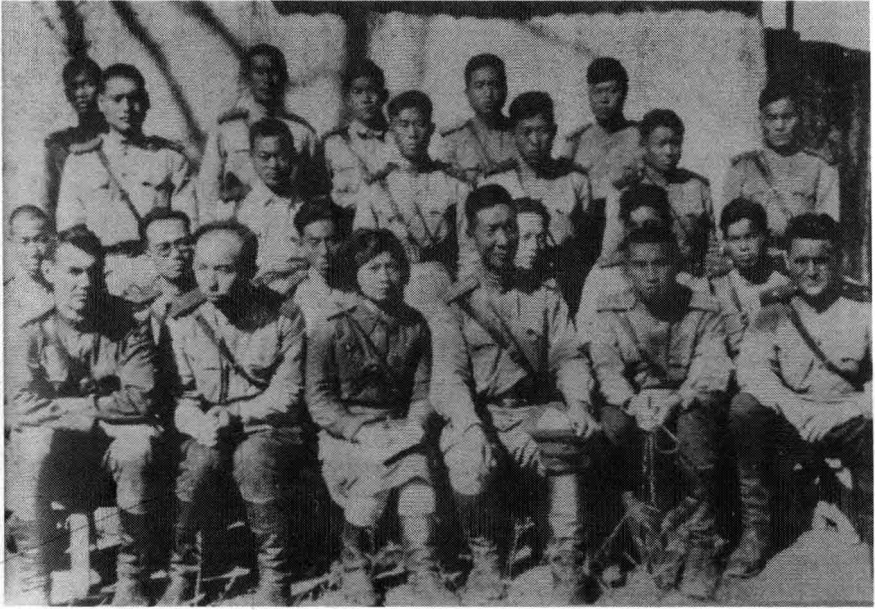
李学福 抗联第七军军长



汪雅臣 抗联第十军军长



祁致中 抗联第十一军军长



抗联教导旅部分领导人合影



抗联第一路军部分指战员



抗联第二军部分指战员



抗联第三军五师一部



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司令部部分人员



抗联战士的露营生活

大中華民國廿六年八月二十日
 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部 佈
 號
 受保觀勝遺上侮結察惡竟
 白政領胞大上海動故睡
 抗府聯在歡各務我日七
 挑藩合全日戰軍領無無
 撥州應總錦先後領領領領
 河國中點錦大五後領領領領
 至日勇獵軍日取領領領領
 相為大之下左到因除已民
 擊立承凡屬我你煩族無
 有自勤係組始安發要
 失由起中圖破給軍全行
 宜福打兵日冠勇將士以
 此中上應日死放游謀不
 佈道本我傷放游謀不
 建黨國去東步果憤滿自
 知關主德北步果憤滿自
 切善義北步果憤滿自
 勿勿性仇全敵論物公無
 此絲翻均性仇全敵論物公無
 佈嘉德怨同慘北敵論物公無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布告



人民革命军画报第 67 期(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一、二军于那尔轰
 会师。)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部
抗日联军第三军通告

为通告事查本军自民国二十三年春奉命成立即在
 东北各地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各部将士共同努力
 各不臂助奔走有子嗣在来不独排抗敌之抗日斗争
 区域征伐更多同胞信仰尤甚联合联军抗日斗争
 自起之个体组织团结领导不致有作散状使联军
 领袖首尾自顾不暇此固本军足以自慰者也惟抗
 联之整编前密前密之意因此本军决定八月一日
 起在全疆指战员自动提解下除原来北人及革命军第
 三军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收编各部队给各单
 位地消滅此建彼界志树一旗爾東我西台作同志以
 揭抗光天我抗日之旗以团结抗联同志及各地抗日
 同志行助在即整頓常期向希我弟兄等共各地抗日
 同志全副同心大展神威不云云救救国家幸甚我革命幸甚

大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 趙一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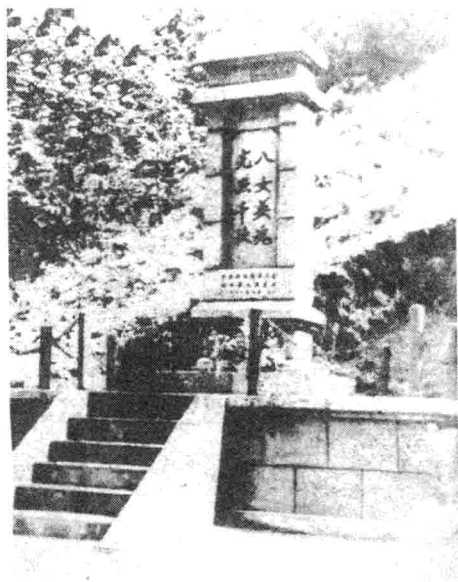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通告



赵一曼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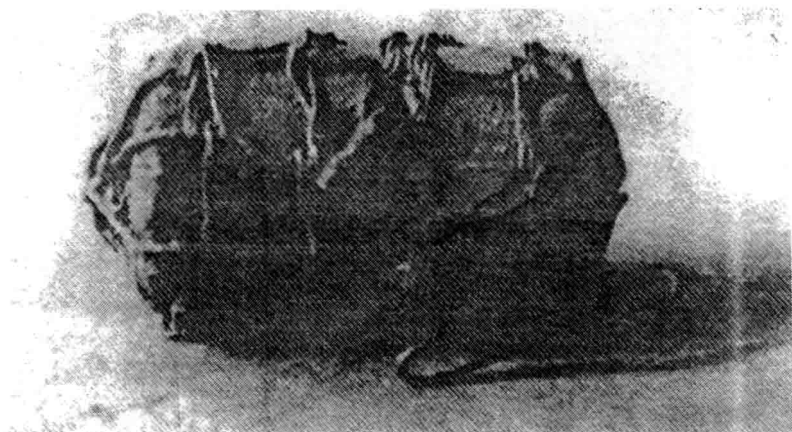
冷云 抗联第五军妇女团
指导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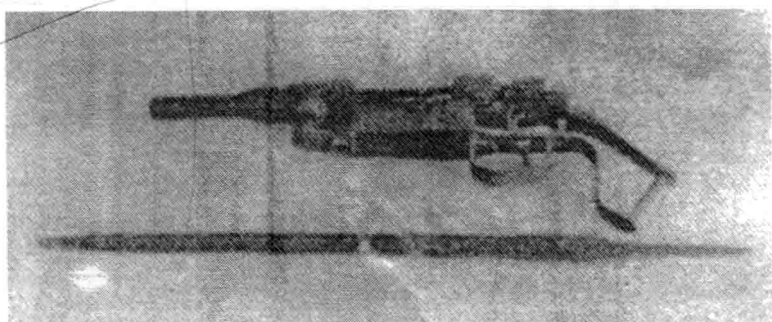
座落在黑龙江省林口县乌斯
浑河东岸的“八女投江”纪念碑



东北抗联密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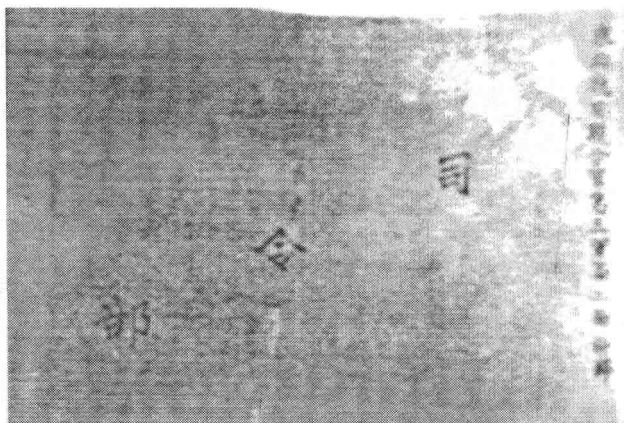
延吉游击队使用的炸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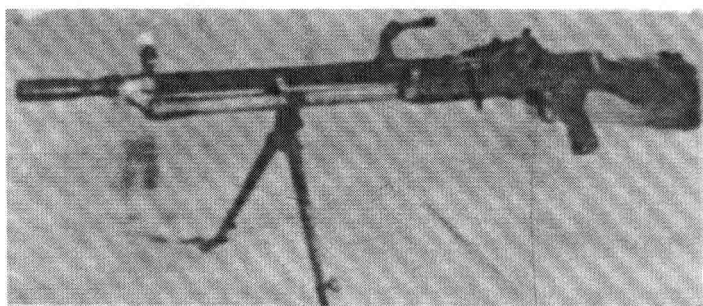
东满游击队使用的扎枪和用长枪改制的手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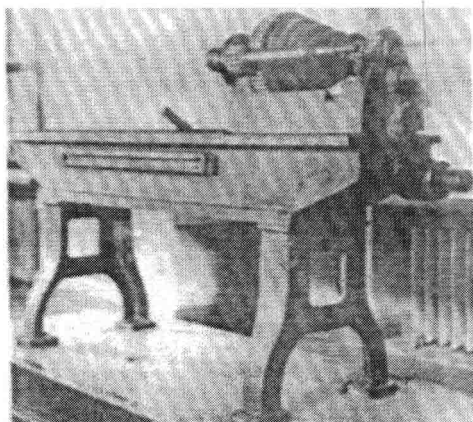
抗日群众给抗联第一军送油的用具



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司令部旗帜



抗联第七军用过的机枪



抗联第十一军七星砬子兵工厂的机床

总 目 录

第一编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人民反日斗争兴起 (1931年9月——1933年5月)

| | |
|-------------------------------------|-----|
|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 | 3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政局 | 3 |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 34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城乡人民的反日斗争浪潮 | 69 |
| 第二章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84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支持,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 | 84 |
| 第二节 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100 |
| 第三节 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的抗日斗争 | 125 |
| 第四节 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143 |

| | |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建立及其抗日斗争····· | 159 |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 159 |
| 第二节 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167 |
| 第三节 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190 |
| 第四节 吉东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209 |
| 第五节 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224 |

第二编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斗争的新形势

(1933年5月——1937年7月)

| | |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 | 241 |
|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 241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策略方针的转变····· | 258 |
| 第三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反“讨伐”战争新形势····· | 351 |
| 第五章 创建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城镇人民反日斗争的开展··· | 423 |
| 第一节 东北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与扩大··· | 423 |
| 第二节 东北城镇人民的反日斗争····· | 464 |

| | |
|---|-----|
| 第六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 486 |
| 第一节 《八一宣言》的发表,日伪对东北抗日运动的残酷镇压 | 486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对东北的新指示,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改组 | 500 |
| 第三节 东北抗联各军的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游击战争广泛开展 | 529 |

第三编

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

坚持开展艰苦游击战争

(1937年7月——1940年1月)

| | |
|-------------------------------------|-----|
| 第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牵制日军入关 | 643 |
| 第一节 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新高潮 | 643 |
| 第二节 抗联第一路军向日伪军发起新攻势 | 653 |
| 第三节 抗联第二路军所属各军的英勇斗争 | 662 |
| 第四节 北满抗联各部分兵转战 | 676 |
| 第八章 打破敌人“围歼”,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坚持艰苦游击战争 | 686 |
|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强化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 | 686 |

| | | |
|-----|------------------------------|-----|
| 第二节 | 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抗联各部的西征 | 700 |
| 第三节 | 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抗联留守部队的斗争 | 728 |
| 第四节 | 抗联第一路军各部分区作战 | 750 |
| 第九章 | 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在反“讨伐”斗争中殊死抗敌 | 785 |
| 第一节 | 抗联第一路军在东南满坚持艰苦奋斗 | 785 |
| 第二节 | 抗联第二路军在吉东地区坚持艰苦游击战争 | 807 |
| 第三节 | 抗联第三路军在黑嫩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 | 839 |

第四编

东北抗日联军实行战略转移， 为抗战最后胜利而斗争 (1940年1月—1945年9月)

| | | |
|------|--------------------------------------|-----|
| 第十章 | 东北抗日联军部队逐渐收缩,保存实力,坚持开展 游击活动 | 881 |
| 第一节 | 伯力会议和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的关注 | 881 |
| 第二节 | 抗联第二路军所属部队的艰苦奋斗 | 894 |
| 第三节 | 抗联第三路军所属部队坚持苦斗 | 909 |
| 第四节 | 抗联第一路军的艰苦转战 | 935 |
| 第十一章 | 东北抗日联军野营整训,开展小部队活动 | 942 |
| 第一节 | 满洲全党代表会议的召开,抗联部队陆续入苏 | 942 |

目 录

| | | |
|------|---------------------------------|------|
| 第二节 | 成立抗联教导旅,加强政治军事训练 | 961 |
| 第三节 | 抗联积极开展小部队活动 | 977 |
| 第四节 | 抗联留守部队坚持东北游击活动 | 1002 |
| 第十二章 | 东北抗日联军部队配合苏军和八路军、新四军 | |
| | 反攻东北 | 1022 |
| | 第一节 抗联部队的反攻准备,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 | 1022 |
| | 第二节 抗联部队占据东北战略要地 | 1038 |
| | 结束语 | 1059 |
| | 东北抗日联军大事年表 | 1069 |
| | 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表 | 1119 |
| | 后记 | 1123 |
| | 附图 | 1126 |

上 册

目 录

第一编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人民反日斗争兴起 (1931年9月——1933年5月)

| | |
|------------------------------------|----|
|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 | 3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政局 | 3 |
| 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形成 | 3 |
| 二、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步伐 | 7 |
| 三、日本对奉系军阀的控制及皇姑屯事件 | 18 |
| 四、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及其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23 |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 34 |

| | |
|---|-----------|
| 一、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的部署 | 34 |
|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 | 41 |
| 三、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 49 |
| 四、伪满洲国的成立 | 55 |
| 五、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 | 58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城乡人民的反日斗争 浪潮 | 69 |
| 一、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抗日号召 | 69 |
| 二、全国人民掀起反日浪潮 | 74 |
| 三、东三省人民的反日斗争 | 77 |
| 第二章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84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支持,马占山领导 的江桥抗战 | 84 |
| 一、中国共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的方针 | 84 |
| 二、马占山率部进行江桥抗战 | 90 |
| 第二节 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100 |
| 一、辽西、辽北义勇军的兴起与抗日活动 | 100 |
| 二、辽东三角地带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110 |
| 三、辽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116 |
| 四、东边道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120 |
| 第三节 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的抗日斗争 | 125 |
| 一、吉林自卫军的组成,哈尔滨保卫战 | 125 |
| 二、吉林自卫军在下江的抗日斗争 | 129 |

| | |
|-------------------------------------|-----|
| 三、吉林国民救国军的抗日斗争 | 133 |
| 四、吉林境内其他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 139 |
| 第四节 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 143 |
| 一、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的兴起 | 143 |
| 二、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海满地区抗战 | 147 |
| 三、黑龙江其他各部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 151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建立及其抗日斗争..... | 159 |
|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 159 |
| 一、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创建反日游击队 的方针 | 159 |
| 二、中共满洲省委创建反日游击队的组织工作 | 161 |
| 三、“北方会议”对创建抗日武装工作的影响 | 164 |
| 第二节 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167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南满地区的反日斗争 | 167 |
| 二、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174 |
| 第三节 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190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东满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190 |
| 二、东满各县反日游击队的创建 | 197 |
| 三、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反“讨伐”斗争 | 205 |
| 第四节 吉东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209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吉东地区反日斗争形势 | 209 |
| 二、吉东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创建 | 210 |
| 第五节 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 224 |

| | |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北满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224 |
| 二、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创建 | 226 |

第二编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斗争的新形势

(1933年5月——1937年7月)

| | |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 | 241 |
|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 241 |
| 一、操纵伪满政权,设置殖民统治机构 | 241 |
| 二、实行经济统制,垄断经济命脉 | 248 |
| 三、摧残中国文化,推行奴化教育 | 254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策略方针的转变 | 258 |
| 一、《一·二六指示信》的传达贯彻 | 258 |
|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建立,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 | 269 |
|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建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组建 | 286 |
| 四、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建立,密山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 300 |
| 五、绥宁地区抗日武装联合抗日,绥宁反日同盟军 | |

| | |
|--|-----|
| 建立 | 305 |
| 六、饶河游击队的发展,开展饶河、虎林地区游击战 .. | 313 |
| 七、珠河游击队诞生,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建立,哈东 支队编成 | 318 |
| 八、汤原游击队重建,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再燃松花江 下游游击战火 | 332 |
| 九、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与民众救国军的建立 | 339 |
| 十、《二月指示信》及其影响 | 345 |
| 第三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反“讨伐”战争新形势 | 351 |
| 一、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反 “讨伐”斗争的指示 | 351 |
|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南满游击战的广泛 开展 | 357 |
|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东满游击战的 开展 | 367 |
| 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建立,哈东游击战争进一 步开展 | 378 |
| 五、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建立,向勃利、方正伸展 游击 | 393 |
| 六、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绥宁地区游击战的 扩展 | 402 |
| 七、汤原、萝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东北人民革命军 第六军成立 | 413 |

| | |
|--|-----|
| 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建立,饶河、虎林 游击战的开展 | 418 |
| 第五章 创建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城镇人民反日斗争的开展 ... | 423 |
| 第一节 东北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形成 与扩大 | 423 |
| 一、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 的指示 | 423 |
| 二、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扩大 | 429 |
| 三、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变动 | 436 |
| 四、哈东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 443 |
| 五、绥宁抗日游击根据地重心转移 | 448 |
| 六、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 453 |
| 七、密、勃、依、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与变迁 | 457 |
| 八、饶河、虎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 461 |
| 第二节 东北城镇人民的反日斗争 | 464 |
| 一、城镇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反日活动 | 464 |
| 二、各地工人的反日斗争 | 467 |
| 三、教育界的反日斗争 | 472 |
| 四、文艺界的反日斗争 | 478 |
| 第六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 486 |
| 第一节 《八一宣言》的发表,日伪对东北抗日运动的 残酷镇压 | 486 |
| 一、华北事变,《八一宣言》的发表 | 486 |

| | |
|--|-----|
| 二、日本关东军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出笼,对东北抗日运动的残酷镇压 | 491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对东北的新指示,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改组 | 500 |
| 一、《王康指示信》在东北的传达贯彻 | 500 |
| 二、《吉特补充信》、《中代信》、《新政治路线》信及其影响 | 505 |
| 三、中共满洲省委的撤销与哈尔滨特委的建立 | 513 |
| 四、中共南满、北满、吉东省委的建立 | 519 |
| 〔五、北满、吉东党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 | 523 |
| 第三节 东北抗联各军的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游击战争广泛开展 | 529 |
| 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 | 529 |
| 二、抗联第一、第二军成立,抗联第一路军编成,反“东边道北部大讨伐”的斗争 | 533 |
| 三、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组成,抗联第三、第六军建立,松花江两岸游击战广泛开展 | 565 |
| 四、抗联第四、第五、第七军编成,吉东地区游击战的开展 | 584 |
| 五、抗联第八、第九、第十军和独立师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 621 |

第一编

九一八事变爆发，
东北人民反日斗争兴起

(1931年9月——1933年5月)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人民群众的反日浪潮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政局

一、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形成

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处中国东北部,通称东三省。三省幅员辽阔,总面积 13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 3000 万^①。境内群山绵亘,森林茂密,矿藏丰富,江河交错。辽阔、肥沃的松辽平原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小麦、水稻和各种经济作物。长达 2000 余公里的海岸线,不仅盛产鱼、盐,而且有一些天然良港广通舟楫之利。东北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用勤劳的双手和聪睿的智慧营造着自己可爱的家园。

东三省因地处北疆,历来是我国的边陲重地和战略要冲,因此,很早就为外国侵略者所觊觎。17 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军队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首先侵入黑龙江流域,以后不断强迫清政府陆续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霸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 15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① 东三省总面积和总人口系按九一八事变前统计。

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侵略者纷至沓来,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使中国逐步跌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和宰割的加剧,日本和沙俄对我国东北的争夺也更为激烈。

中国和日本是亚洲土地上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但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废除了封建割据,建立了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联合专政,在政权上则是一个奉行军国主义的绝对专制的天皇制政体。所谓军国主义是以军备和对外扩张为国家的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服从于这一目的的政治主张。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不彻底,一系列矛盾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仍有许多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首先是未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旧有的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农民继续受封建地主高额地租的盘剥,农民起义和反对地税改革的起义不断爆发;其次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相勾结,通过其代理人控制着政府和军队,形成了军阀官僚统治集团,对日本广大工农群众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其国内阶级矛盾加剧。

由于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广大日本人民非常贫困;且日本国土狭窄,物产不丰,原料极端缺乏,原始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国内市场十分狭小,所以,日本统治阶级便奉行向外侵略扩张政策,积极寻找市场和殖民地,同时也力图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来缓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形成的同时,日本就确定了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日本大陆政策是以征服朝鲜、占领中国东北及蒙古东部,进而侵略全中国,再称霸亚洲为目标的。日本军国主义为实行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实际步骤,将第一个军

事行动目标指向中国南部海域的台湾。1874年5月,日本以报复琉球漂流民在台湾遇难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10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北京条约》,承认琉球人为日本人,并赔款50万两白银。

日本在第一次侵略台湾中得到了好处,立即将注意力转向清王朝的属国——朝鲜。日本企图从干涉朝鲜内政入手,使其脱离与中国的宗属关系,然后吞并朝鲜,使朝鲜成为侵占中国东北、向大陆扩展的跳板。日本对朝鲜的图谋从制造江华岛事件开始。1875年9月20日,日本海军驶入汉城西南江华岛海域,轰毁岛上炮台,攻陷永宗城,大肆屠杀朝鲜军民,并迫使清政府承认朝鲜为“自主国家”。最后于1876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日韩修好条约》(即《江华条约》),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允许日本在朝鲜京城建立使馆和自由贸易。这个条约标志朝鲜开始沦为日本附属国。之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得寸进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便主张速取朝鲜以与中国决战。

1893年,朝鲜农业歉收。1894年春,朝鲜南部全罗道古阜郡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4月间,忠清道等地农民纷纷蜂起,义军遍及全国。东学党提出“逐灭夷倭”、“驱兵入京,尽灭权贵”等口号,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于4月攻克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惊慌失措,遂请求中国政府出兵勘乱。当中国军队到朝鲜时,事态已经平息。中国军队没有直接参与镇压朝鲜农民起义军的行动,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①

但日本为寻求侵略中国的借口,其内阁于1894年6月2日决定出兵朝鲜。此时朝鲜农民起义已经平定,且中国军队也已退至牙山湾待命回国。6月17日,日本政府却向中国政府提出日中两国共同

^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8页。

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中国政府拒绝日本要求并提议尽快共同撤兵。日本非但拒绝撤兵,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竟突然不宣而战,击沉中国运兵船,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日两国开战之后,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之军事指挥失当,战事一开始中国军队即节节败退。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展开大海战,中国北洋舰队受到重创。11月,日军占领旅顺、大连。1895年1月,日军攻下威海卫,北洋舰队投降,海上战事结束。陆上战事,自1894年9月中旬至1895年3月,日军攻占朝鲜平壤,次第攻下我国安东(今丹东)、九连城、凤凰城、岫岩、营口。3月9日,日军攻陷田庄台,陆上战事结束。

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定了《马关条约》,中国确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中国向日本支付2亿两白银(相当于3亿日元)的巨额赔款,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通商口岸。《马关条约》的签订,由于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与沙俄在远东的利益发生矛盾,沙俄联合法、德两国采取一致行动,对日本施加压力,使其放弃了辽东半岛,中国另向日本交出赎银3000万两。《马关条约》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严重危机和灾难。

甲午战争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军国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侵略欲望也进一步膨胀。日本从中国掠夺的2.3亿两白银,折合3.5亿日元的赔款,相当于日本3年的预算支出。其中2.2亿日元用于扩充军备。1896年,日本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案,把陆军从6个师团扩充到10个师团,海军舰队从8万吨扩大为27万吨^①。在国内修建了许

^①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6页。

多军事基地和军需工厂,军费开支比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增加了一倍,占国家总支出 50%,用以保证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所谓产业革命的进行。不仅如此,日本还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作为殖民地据为己有,对朝鲜进行半殖民地式的压榨和掠夺,在世界上同欧美列强开始竞争并同英国和美国相勾结,欺凌弱小国家。甲午战争之后的日本国已带有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征,因此,这一军国主义国家又变成了帝国主义国家^①。此后的 50 年间,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对中国最凶恶的侵略者和最贪婪的掠夺者。

二、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步伐

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从而阻遏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势头。但帝俄以有功于中国,对清政府进行拉拢和利用,谋求其在华,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利益。1896 年 6 月 3 日,中俄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通称之为《中俄密约》)。9 月 2 日,中俄双方又签订《东省中俄合办铁路公司章程》。根据此条约,东清铁路(后改称为中东铁路)于 1897 年 8 月正式动工修筑。1898 年,中俄又先后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旅大租地续约》。根据上述条约,俄国获得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和旅顺、大连的租借权。

俄国的野心引起了日、英、美等国的激烈反对,英美决意扶植日本对抗俄国,以削弱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在英、美和法、德等国的煽动下,1904 年 2 月爆发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这次战争历时一年零七个月,日俄两国交战,而主战场则是在中国土地上。处在陆上战区的东北大地,特别是辽宁地区的广大民众再一次受到战

^① [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 页。

火的无情摧残,饱尝了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日俄战争以俄国战败而告终。但是,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调停下,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却是在中国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使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成为日本的独占势力范围。日本夺得了沙俄在旅顺、大连的租界及中东铁路支线自长春起至大连段南满铁路的路权。这次日俄战争,正如后来有人评述的:“日本无形中扩张其权力颇巨,战败的俄国,所失者不过在中国已得的权利,而中立的中国,受无辜之累。损失较战败国更巨,天下事之不平,宁有过于此乎?”^①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在东北巩固和扩张其殖民统治,为其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创造条件。日本占据旅大租借地之后,将其改称“关东州”,又说“所谓关东者系指山海关以东的全满洲而言。”^②由此可见,日本将旅大改称“关东州”的用意在于攫取全东北。旅大租借地,沙俄与中国订约时租期为25年;而日本从俄国手中取得租借地后硬将租期延长为99年。日本政府为加强对租借地及整个满蒙的统治,从1906年开始,先后建立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等三个侵略满蒙的大本营。

“关东厅”是日本在租借地建立的行政机构。它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先是1905年日本侵略军以天皇第156号敕令在大连设立“关东州民政署”,受理日军占领区的民政,维持治安。同年9月,日军在辽阳设立了“关东总督府”。1906年5月,将总督府改为“关东都督府”,并迁至旅顺。“关东都督”分别由日本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参谋总长监督统理一切政务、军务。“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陆军两部,

^①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印行,第92页。

^②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印行,第92页。

对租借地区行政、军事、司法、经济、文化等实行全面统治。1919年,为调和“关东都督府”与外务省一些部门的矛盾,日本天皇敕令废止“关东都督府”,另创“关东厅制”,主张军政分开。“关东都督府”和“关东厅”的性质都是在中国领土上建立的殖民地统治机构,是对东北和中国进行扩大侵略的基地。

“关东军司令部”是日本租借地的军事机构,驻地旅顺。1919年,陆军部单独成立关东军司令部,由现役陆军大将或中将担任司令官,直属天皇。关东军司令部的职责是统率驻南满的陆军部队守护关东州及铁路。关东军司令部下属的军事机构有驻扎师团和独立守备队。日军在铁路沿线驻一个师团。师团司令部驻辽阳,旅团及步兵联队分驻铁路沿线各城镇。独立守备队,辖6个大队,分驻长春、公主岭、开原、奉天、大石桥、连山关等车站,守备队司令部驻公主岭。关东军司令部还下设关东宪兵队、旅顺要塞司令部、旅顺重炮大队等军事机构,在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下的军警“星罗棋布,总数2万人以上,一旦有事皆可作战,号令一下,最短时间,日军即可集中于全满洲。”^①关东军依恃其武装力量在南满地区横行无忌,不断制造各种血案,关东军和它的特务机关还密谋策划了一系列事件,阴谋挑起事端,以达到武装侵略全东北的目的,直至九一八事变,关东军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满铁”是日本在租借地经营、管理铁路的组织机构。“满铁”于1906年11月26日在东京成立,1927年4月迁至大连。“满铁”名义上是一个经营铁路的商业机构,但它和普通的商业公司不同,因为它是代表国家使命的特殊机构。它创立的动机完全是在谋取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日本也承认南满铁道会社是日本对满洲外交、经济、国防

^①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印行,第98页。

等各方面发展动力的中心机构。所以“满铁”经营方针所体现的,即是日本国策的反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初对满洲,其次对中国继而对列强制定有效策略与行使权力的据点。正因为“满铁”具有与一般商业公司所不同的特殊职能,日本政府也以最大的力量和资本支持它的经营活动。“满铁”以其雄厚资金从事广泛性的经营,除直接经营铁路修建、运输业外,还经营矿业、水运、电气、土木建筑、仓库、伐木等。“满铁”直接经营的铁路主线达1100余公里,还修建了一批港湾和码头设施,几乎垄断了南满地区的铁路、海港运输和进出口贸易。

为适应广泛性经营和从事政治、经济、军事性活动,“满铁”下设一个调查部,这是“满铁”中的一个特殊机构。这个机构最初称为调查课,“满铁”内部一直称它为调查部。如果说“满铁本身不单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它还具有类似日本政府职能”的话,“而调查部就是这个机构中的一个细胞”。“满铁”调查部的业务是“经营满铁需要的旧的习惯调查及关东军需要的军事地志”以及“地势、水质、道路、资源、人口等项的调查。”^①但调查部实际调查的范围已远远超出“满铁”的经营范围,凡是有关东北及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等无不包括在内,特别是注重军事方面的调查。“满铁”调查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情报课”)是业务对口单位,有时调查部就是根据军方命令进行工作的。调查部的工作范围不仅局限于东北及中国内地,有时还要去别国进行收集情报工作。可以说从日俄战争之后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次重大行动,几乎全与“满铁”调查部有关。

除上述三个机构外,日本还在东北各地设置总领事馆和领事馆。

^①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这种领事馆同样负有日本侵略谋占东北的使命,所以它与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并列为“四头政治”。^①

日本政府既已获得旅大租借及南满铁路权益,就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行其扩张政策,不断提出各种无理要求。1909年2月,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综合中日间所谓未决问题悬案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主要有:日本干涉阻挠美国与东三省合作修建新(民)法(库)铁路问题;修筑南满铁路大石桥到营口的支线问题;要求京奉线铁路延展到沈阳城根,以与南满路合设一站问题;要求获得抚顺、烟台煤矿权益问题;要求获得安奉路沿线矿务开办权问题;要求获得间岛^②主权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损害中国政治、经济利益及中国主权,日本的目的在于全面控制东北南满地区。但日本并不以在东北南满地区获得的利益为满足,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整个中国进行扩张。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1919年,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日本又乘机攫取了在山东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巴黎和约,也不参加国际联盟活动,国际间许多战后问题没有解决。为了解决国际间的海军军备和远东太平洋问题,美国于1921年11月12日召开了华盛顿会议,有美、英、法、意、日、葡、比、荷、中等9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于1922年2月6日结束,签订了《九国公约》。在公约第一条里指出:除中国外,条约各国协定,尊重中国之主权及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施

^① 国难资料编辑社编:《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生活书店1937年出版,第44页。

^② 所谓间岛,原指我国东北图们江北光霁谷前的一段滩地。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朝鲜咸镜北道农民因饥谨违反中国禁令私自迁入上述滩地开垦耕种,并挖通一沟使图们江水环滩而过,使滩地介于二水之间,故朝农称其为“垦岛”,又称“间岛”。日本统治朝鲜后,提出由朝鲜人居住的延边地区为间岛,并称其所属未定,后经中国坚持,在1909年7月中日订立的间岛协约中,日方虽承认此地系中国领土,但坚持设立领事馆和警察署。

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行机会均等之原则；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九国公约》是美国主张的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机会均等政策的具体体现，它的目的在于造成各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阻止日本独占中国的计划的实行。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新篇章，促进了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由于上述历史背景，在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外交上曾一度陷于孤立，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扩张的步伐在形式上不得不稍稍放缓。1924年，日本宪政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护宪三派”的联合内阁，起用驻美大使币原重喜郎为外相。币原作为日本全权代表曾在华盛顿会议中主持中日直接谈判，受《九国公约》条文的限制，加之在日本大隈内阁提出“二十一条”，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日情绪，所以币原就任外相后，修改调整对华政策，提出所谓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人民之合理要求，以诚意与同情接受之；日本在中国之权益，以合理方法保护之的“币原三原则”。日本国内军方及急进派则称其为“国际协调主义”，“软弱外交”。1926年，加藤首相死去，由同属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继任首相，币原仍留任外相。

1924年1月，中国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促进了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各帝国主义甚为不安。他们害怕中国革命的发展，深恐中国的统一会危及其在华利益，因此千方百计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当北伐军北上途中，1927年1月，日、英、美、法四国即确定集结5000兵力到上海的计划，以维护帝国主

义权益。日本已作好出动 1500 名陆战队的安排。但在 1927 年 3 月 24 日、4 月 3 日,北伐军分别在南京、武汉与日人发生两次流血冲突之后,日本国内急进分子斥责币原外交软弱,认为政府侈谈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万无一失,一味袖手旁观,因循敷衍,并把南京、武汉事件说成是共产势力所造成的。日本陆相宇垣在一份意见书里说:中国的赤化有迟早要从直隶威胁到满蒙的危险性,断言今后继续靠“隐忍持重”政策不能阻挡大势,并建议各国协调,用实力来阻止“共产势力”。正当北伐军收复南京、上海时,日本国内因金融危机,若槻内阁于 4 月 17 日总辞职,由政友会总裁、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继起组阁,任首相兼外相。

田中一上台,便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亲自主持“东方会议”,制订日本侵华,特别是侵略东北的新政策。1927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东方会议”在东京召开。参加人员有: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务次官森恪及外务省有关官员,驻华使馆、驻奉天、汉口、上海总领馆馆员;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朝鲜总督府官员;陆军省、海军省、大藏省官员。此外,还有陆军、铁道、内务、大藏、文部、农林大臣等内阁成员作为列席观察员随时参加会议。参加“东方会议”总人数约 30 余人,差不多集中了日本政府各部门的实权人物。

“东方会议”讨论最为集中的议题是关于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问题。会议最后一天,即 7 月 7 日,由田中首相发表《对华政策纲领》,并对纲领作了说明。纲领共分 8 条,前 5 条为属于中国全局的问题,后 3 条是属于满蒙地区的。纲领及说明,对满蒙提出了明确的方针与对策。主要是:(1)关于满蒙与日本的关系问题。纲领第六条指出:“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对该地区和平之维持与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的邻邦,尤须具有责任

感”。纲领提出,把满蒙作为特殊地区,进行特殊考虑,而且要负有特殊的责任,实际是日本已经把满蒙视为其主权的一部分,为随时吞并这一地区制造舆论。(2)关于对东三省地方政权的支持问题,纲领第七条指出:“东三省政局之稳定”,“有待于东三省本身之努力”,“东三省有力人士,如能尊重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则帝国政府应予适当的支持”。田中在解释中说:“如果东三省的统治者只要有与吾人相通之理法,谋求经济之发展,维持秩序,以期政情之稳定”者,不管是何人统治东三省,是张作霖也好,或者“其他人物治理东三省而符我方之主义方针”,日本就加以支持。田中进一步说:这一条“既非援助张作霖之意,亦非排斥张作霖之意”,日本的主旨是“坚持独自立场而行动”。这些话已经暗示,一旦张作霖有不尊重日本在东北权益的行为时,日本将不再支持他,伏下了日后对张作霖的杀机。因为这一条直接涉及日本政府对东北当权的奉系军阀的态度问题,所以田中发表对华政策纲领时指示第七条不许公布。(3)关于保卫日本在满蒙的权益问题。纲领第八条指出:“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分割我在该地特殊地位、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发展,及时采取措施”。田中在解释这一条时说:“侵害、压迫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可能来自中国本部,亦可能来自俄国或北满方面,再者亦可因东三省内部崩溃而引起,抑或亦可能由于中国以外的国家某种行动而发生,不问其原因如何……为维护我方之权益不能不讲究防护之手段”。通过《对华政策纲领》,“可以看出田中对中国东北的方针是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并打算将满洲问题与满洲实权人物张作霖之间解决之。”^①

^①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田中在东方会议发表的《对华政策纲领》是一种应当公开的外交性质的文件,故在行文中不能不用些外交辞令加以粉饰。尽管如此,仍难以掩饰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和急于吞并满蒙的贪婪欲望。在东方会议期间,还分发了涉及历届内阁对华政策意见,关于中俄、中美、中英关系以及日本在华投资和对华经济发展方面文件,供与会者阅读。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综合东方会议上议定的各种政策,形成一个“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上奏文件,即后来通常所称的“田中奏折”。奏折以田中署名,铁道、大藏大臣副署,并请宫内大臣一木喜德代奏上达天皇。

奏折共15大项27个标题,除直接阐述日本对满蒙的“积极政策”外,还涉及一系列具体经济开发方面的策划^①。奏文中的主要内容和观点有:(1)提出对满蒙实行“积极政策”,这是奏折的核心。所谓“积极政策”,就是加紧对满蒙地区的侵略和经营,使其成为日本国家“永久隆盛”,完成大陆政策的基地。奏文说:“满蒙之地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亦无其匹敌”,故日本“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奏文认为:日本如果把满蒙权利真正拿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进而取全支那之利源”,是“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之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奏文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2)提出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在奏文的第二项中说:“兹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

^① 《田中奏折》以1937年10月出版的《大陆政策真面目》一书所载中译文为准。

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又说：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宣战布告曾承认满蒙为中国领土；日本出于外交上的原因也不得不承认华盛顿九国公约中关于满蒙为中国主权的提法。上述两次承认满蒙为中国领土是日本的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为了达到使满蒙与中国分离的目的，日本今后的方针是：“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且内外蒙既沿王公旧制，则可与蒙古王公为对手缔结条约，以增强日本在内外蒙的势力”。对南北满，“则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迈进”。另外附加在东北的权益 14 项如延长商租期限；获得日本在东部内外蒙古的自由居住权；获得在奉天、吉林等地的铁矿及煤矿开采权、森林采伐权等等。（3）提出对朝鲜移民的奖励与保护政策。奏文中说：今日东三省朝鲜移民已达百万以上，这批移民为日本开拓满蒙处女地，为“帝国对满蒙的国防上、经济上添加无数势力”。奏文还提出：以“满铁”会社或东拓会社资助和利用一部分有中国籍的朝鲜人大量收买满蒙水田，“可作为我食料之增产以救国危，也是新殖民地开拓之机会”。奏文还把在东北境内的朝鲜人分为属中国国籍的归化朝鲜人和属于日本国民的朝鲜人两大类。同时又指出，已经属于中国籍的朝鲜人也是“因一时之便宜而归化为支那民”，“不久仍然归复我国民”。奏文说，如果在满蒙的朝鲜人“扩张至 250 万以上”时，一旦有事件发生，不论是属于中国籍的朝鲜人，还是属于日本国民的朝鲜人发生动乱，日本都可以利用此机会对其支持。（4）提出新大陆开拓与满蒙铁道修筑计划。奏文说：过去日本的铁路主要在南满，“既成之线，多以经济为目的”，“如徒赖南满铁路，必不能足。依我进出之将来及现状计，南北满铁路非全收归我手不可。殊如大富源之北满及蒙古方面，可为我发展之余地颇多有利……故不得不急进北满地盘，以计国家百年之隆盛”。今后必须加紧北满方面铁路建筑，同时“必须以军事为目的建设满蒙大循环线，这样既可以

包围满蒙中心地、制止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发展”,“亦可防赤俄势力之侵入,这是新大陆开拓之关键”。奏文中提出了日本急欲在满蒙修建通辽至热河、洮南至索伦、长春至洮南、珲春至海林及吉林至朝鲜会宁等铁路的具体计划。特别是对建成吉会路的意义作了详尽的说明,提出了以吉会路线及日本海为中心的国策。奏文强调说,明治大帝曾有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灭亡满蒙进而征服中国全土的遗策。而吉会路的修建完成,日本掌握这条大动脉就是最后完成明治大帝遗策,也是“昭和新政之成功,新大陆政策之成功,征服亚细亚全洲之成功”。(5)奏文还涉及对满蒙贸易、变更南满铁道公司的经营及其附带事业的经济开发的具体问题,但都是围绕吞并满蒙完成大陆政策这样一个中心加以叙述的。

日本召开的“东方会议”及其形成的“田中奏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田中奏折”确定的内容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满蒙、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东方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所走过的罪恶道路是完全按照“田中奏折”拟定的侵略路线发展的。“东方会议”及其确定的对满蒙的“积极政策”,是日本对华政策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从此,日本开始了推行田中的“强硬外交”路线,加紧侵略中国步伐的时期。

1928年4月,国民党军队继续进行“北伐”,夺取奉系军阀所占据的地盘。但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南京政府的“北伐”所持态度并不相同,英美国家为了抑制日本在东北、华北和山东半岛无限扩张的权利,表示支持“北伐”的意向。而南京政府进行“北伐”统一全国的行动和日本政府欲使中国长期分裂混乱,以便从中渔利的政策相悖;日本同时又恐动乱波及满蒙,使日本权益受损,因此反对蒋介石进行北伐。4月17日,当北伐军攻占泰安,威逼济南时,在济南的张宗昌部队已失去战斗力,甚至不打自溃。日本政府已看清奉鲁联军无法阻

止国民党军队北进,便当即决定以保护胶济路沿线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为由第二次出兵山东。从4月21日到5月25日,日本政府先后调华北驻屯军三个中队,日军第六师团,关东军第三师团等部共1.5万余兵力到达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此期间,日军在5月3日向济南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中,不分军民,大肆屠杀,一时间死伤枕籍,尸体满街。是日夜,日军闯入山东外交特派交涉员公署院内,将南京政府战地政委会外交处长兼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6人杀害。这就是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造成的“五三”惨案。日军在济南还炸毁火药库,占领兵工厂,抢劫商号,奸污妇女,无所不为。日军制造的济南惨案,使中国军民死伤总数达9400余人,其中死亡36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3000万元^①。

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是一次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动,暴露了其侵略野心。在整个事件中,国民党蒋介石一再采取妥协忍让政策,并提请国联主持公道,制止日军暴行,这无疑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的办法。它既不能制止日军侵略,而且还使日本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本质,敢于策划、实施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

三、日本对奉系军阀的控制及皇姑屯事件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维护在东北取得的权益,日本政府必须选择一个地方实力派做其代理人。这个代理人就是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②。张作霖自掌握东

^① 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印行,第193—225页。

^② 张作霖,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出身绿林。1902年被清廷招抚,先后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奉天省驻洮南前路巡防统带。民国建立后,任奉天陆军第27师师长,并授予中将军衔。1920年直皖战争中,联直反皖,战后与直系共同控制北洋政府,任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侵略使。1927年6月,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称海陆军大元帅。

北军政大权以后,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后台予以支持,这个后台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张作霖通过各种途径与日本政府的有关人员进行接触、联络,表示愿与日本合作,对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又表示在中国南北冲突中,力避投入政治漩涡,一意和日本提携,维持东三省和东蒙的安定秩序,以专心致力于开发。而日本政府也认识到张作霖在满洲有特殊势力与地位,认为他倾向日本对日本有益,反对日本对日本无利。日本如果利用张作霖在东北的特殊地位,便可在满洲为所欲为^①。

张作霖表明他投靠日本的决心,日本政府也确立了支持张作霖的政策,从而形成了日本与张作霖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日本对奉系军阀的支持,主要是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提供贷款等。奉系军阀所需的军火,除了向西方国家购买一部分外,主要由日本供应。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决定扩大满蒙权利的方针,支持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确立在东三省的牢固地位。”^②基于这种政策,日本除继续扩大对张作霖的军火供应外,并提供大部分设备,派遣专家和顾问帮助建一批军工企业。这批军工厂有的发展到很大规模。

关于派遣日本顾问,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13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18人,其中军事顾问1人,私人顾问3人,普通顾问及警察顾问各1人。”^③这些日本顾问名义上是对奉张政权在治理政策、军事、财政、警务方面进行襄理和协助,并

① [日]后藤新平:《中日冲突之真相》,转引自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55—56页。

② [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1980年版,第473页。

③ 陶尚铭、关根勤:《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载《文史资料》第51辑,第185页。

12
8

承担对日本朝野的疏通和联络工作,但日本顾问大都是经过日本参谋部遴选的,并接受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指示,收集各种情报,进行特务活动。有些日本顾问如本庄繁、土肥原贤二等对东北军政当局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九一八事变时成为侵略中国的首恶分子。日本在经济上对张作霖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以支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这种贷款准确数字很难统计,据记载,从1916年到1927年,张作霖从日本得到的借款当有二十多项,一亿元以上^①,而且日本提供的借款均带有明显的经济侵略性质,因为对日本借款一般都以东部的不动产,如矿山、企业、铁路等作为担保抵押条件。

张作霖奉系军阀不断出卖国家权益,依靠日本的支持,与各派系军阀争雄,其统治范围扩展到全东北的过程,就是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在东北不断扩张的过程。张作霖在主政东北十多年间,许多出卖民族利益、卑躬屈节的言行,为日本在东北扩大势力范围,阴谋制造“满蒙独立”提供了便利条件。

为实现称霸东北,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加强对东北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奉系军阀设立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搜刮民财,用“清丈土地”的办法,大量兼并土地,聚敛财富,谋取巨额利润。由于政治黑暗,捐税奇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张作霖奉系军阀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对其压迫、剥削不满者,进行残酷镇压,对革命党人更是格杀勿论。

张作霖在执政东北时期,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过程中,也存在着矛盾,而且日益突出。张作霖与日本勾结,希冀得到日本的支持,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一些条约,出卖一部分民族利益。但由于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以及英美

^① 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2页。

等国的反对,同时也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在民众舆论面前保持一点自尊,又不能不拒绝日本贪得无厌的苛刻无理要求。在其从北京退回关外之前,不顾日本的逼迫、恫吓,拒签满蒙新五路密约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张作霖的这种举动,在日本帝国主义看来是“仆人已变得固执任性和很不恭顺”,于是下了“我生了你,也可以杀你”的决心^①。日本关东军在国内参谋本部的一些决策人的支持和默许之下,制定了在张作霖由北京返奉时进行暗杀的计划。根据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的意图,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拟定了有日本独立守备队驻沈阳的第二大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具体执行的爆破计划。爆炸实施点选在位于沈阳皇姑屯东方1000米的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进行。

1928年5月中下旬,国民党北伐军北进顺利,在京汉线、津浦线连败奉军。奉军内部及沈阳各界团体吁请张作霖退守东北,促使张作霖最后下了决心,决定退回奉天。6月3日1时15分,张作霖率随员乘专列离京。3日下午,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由沈阳抵山海关专程迎接张作霖并同车返奉。但京奉路列车进入沈阳时必须经过日本把持的南满铁路皇姑屯三洞桥通过。6月4日清晨5点30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到达皇姑屯三洞桥交叉点时,发生了大爆炸,轰然一声巨响,列车第七、八、九三节车厢被炸毁。张作霖乘坐的第八节车厢盖被炸飞,同车的吴俊升当即被炸死,张作霖受重伤。之后,中国宪兵用汽车把张拉回大帅府,经救治无效,于6月4日上午死亡。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是中日两国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一方面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扶植的代理人能利用时就支持,不能利用时就杀掉的

^① [苏]阿瓦林:《帝国主义在满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0—271页。

丑恶嘴脸；一方面也标志着妄图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统治的奉系军阀梦想的覆灭。张作霖被炸身亡，使东北的政局顿形紧张。原来日本估计在张作霖被炸死后，沈阳必然出现大乱，日军便可乘机予以占领。故在列车被炸后，在沈阳商埠地一带陈兵，安设电网，不时向中国军队挑衅。但是张学良和东北军政当局采取忍辱负重、稳住政局的方针，对张作霖死讯严守秘密，措置得当，使日本无隙可乘。在张作霖死后，东北的文武官员，一致推举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务、军务。1928年7月4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军政当局的举措，稳住了政局，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制造东北内乱，进而控制东北的阴谋。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采取了许多措施，进一步巩固和稳定了东北局势。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一再干扰和威吓，发表东三省易帜通电称：“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①。这一天，东三省及热河省各机关、学校降下原来悬挂的五色旗，一律升起青天白日旗，史称此举为“东北易帜”。这是张学良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国家统一而采取的重大行动。

自东北易帜后，东北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对日关系方面，张学良采取了有限度的抵制日本扩张势力的方针。对日本逼迫东北当局答应修筑吉会、长大铁路问题，采取各种手段予以拖延，使日本的要求落空；限制日本人在军政界内部搞特务活动，清理辞退一批日本顾问，还发布一系列训令，禁止盗卖国土，禁止将土地房屋出卖给日本人；禁止中日合办各项事业，没收日本非法经营的矿区和提高对运输、买卖日货者税收，大力提倡使用国货，鼓励和扶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密令不发给日本人在东北内地旅行护照。为了

^① 《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4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9页。

摆脱日本的经济控制,张学良在西方资本的援助下,于1930年7月开始修筑葫芦岛港,并计划铺设东西两大干线铁路,以与日本把持的大连港、南满铁路相抗衡。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侵略扩张。

四、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及其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国东北三省的广大民众,一方面在奉系军阀统治下遭受压迫和剥削,一方面又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生活极为困苦。东北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最为深重的地区之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

东北地区铁路交通和工业相对内地较为发达。20世纪20年代初,即拥有30万以上产业工人:属于日本产业的有22万人;属于苏俄产业的有3万人;属于中国官僚资本产业的有5万人^①。工人阶级比较集中,极易接受先进的理论和革命运动的影响。

东北的产业工人分布地区也较为集中,长春以南,南满铁路沿线的沈阳、抚顺、鞍山、大连等地多为日本企业里的工人;以中东路沿线为中心,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多为苏俄企业里的工人。在中东路沿线各站和设在哈尔滨的中东路铁路总工厂均有大批中国职员和工人。在中东路沿线各站,十月革命前就有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带到东北,特别是哈尔滨地区,使这里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较早地接受了革命信息和影响。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接管了沙俄政府的中东路权,按照社会主义管理原则对待工人。中东路有工会、工人俱乐部,创办《工人之路》等

^① 陈为人:《关于中共满洲省临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06页。

报刊,组织和吸引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各种活动。此外还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根据有关协定以派遣劳工到协约国后方出劳役的方式参战,大批华工流入欧洲,仅去俄国的就达十几万人。十月革命后,大批华工经中东路回到中国,其中不少人留在哈尔滨谋生。这些归国工人向国内工人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使中国工人了解了这一全新的革命运动。伴随着国内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新的革命思潮——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开来。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东北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发表文章,研读马克思主义书刊,成立进步社团,介绍十月革命,宣传新思想。

中共中央及中共北京区委非常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从1921年起,先后派罗章龙、马骏、陈为人、李震瀛、邓中夏、吴丽石等人到东北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中共唐山地委派欧阳强到北宁路关外段锦州、沟帮子开展革命活动。

1923年7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成立。10月,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成立。1924年6月,青年团大连特支建立。1925年,哈尔滨、奉天和沟帮子车站也相继建立了党支部,隶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经各地党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有了很大发展。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方也严厉镇压革命活动,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大钊,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此后,东北地区党的工作由大连(南满)地委和北满地委领导。由于奉系军阀的严厉镇压和国民党右派的背叛,东北地区党的组织也遭到破坏,许多党组织停止了活动,东北地区革命运动处于危机之中。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东北地区的党组织建设,认为虽然奉系军阀统治的东北形势很严峻,但与南方国民党蒋介石的“清党”有所不同,可以利用东北地区奉系军阀、苏俄、日本之间以及他们与蒋介石的利害关系与矛盾,党的组织可以在蒋介石势力尚未达到的地方继续开展秘密活动。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邓洁)出席了大会,并汇报了南满地区党团活动和工人运动情况。中共五大后,中央专门召开“东北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满洲省委,统一领导东北地区党的工作,责成邓鹤皋返回东北后负责筹建工作。但邓鹤皋返回大连后于7月末被捕,筹建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中断。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工作和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决定着手整顿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地党组织,决定继续筹建满洲省委,并决定由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陈为人任中共满洲省筹备委员会书记。

1927年10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道里区十三道街四十八号阮节庵家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吉林等地党的活动分子14人,代表东北地区200多名党员。会上,陈为人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主持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纲领性文件,选出了中共满洲省委第一届临时委员会,陈为人被选为省临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奉天。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共满洲省临委正式改称中共满洲省委。

中共满洲省委的成立,统一了东北的党务管理,集中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力量,从而把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进了一步。

自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之日起,在领导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贯彻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中,始终把领导民众反日斗争做为省委的主要工作任务,并确定了“在满洲的反日工作,要占革命的大部分”,明确提出无论在工人运动还是农民运动当中,反日斗争都应占有很大的比重。此外,在士兵运动、学生运动和市民群众运动中,也都把反日工作作为重要内容。要求全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的宣传发动,使全东北的反日运动不断高涨。中共满洲省委之所以如此重视反日斗争,是正确地分析了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得出的结论。省委书记陈为人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道:整个满洲的政治,完全是日本统治,“不但新闻的统治是日本,金融的统治是日本,产业的统治是日本,即军事的统治也是日本。日本的军警在南满与在奉天省城可以自由行动,在北满也可以自由行动,即在奉军中的最高级与下级也是日本的军事顾问与参谋所指挥。无论任何人一入满洲境内,只是看见日人论调的新闻纸,充满市面的金票,意态洋洋的日本军警,与侵略中国的一切野蛮行为。”^①

中共满洲省委要求党员深入到学校、工厂、商店、机关进行反日宣传,明确提出不买日货,不运日货,不看日本报,不用日本钱,不当日本差,不进日本学校,不卖粮给日本人,经济绝交等口号。对在日本企业做工的工人,则鼓动他们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要求。中共满洲省委还通过“救国十人团”、外交后援会、同乡会等组织的名义,团结和组织民众进行反日斗争。

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东北各地开展了经常性的反日活动。自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济南,制造“济南惨案”后,中共满洲省

^① 陈为人:《关于中共满洲省临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2月2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03—204页。

委通过学生党员联络各校的积极分子,发动学生罢课,上街宣传反日及检查日货并由学生代表与商会联系,号召商家抵制日货,同时组织募捐,抚恤死难者家属。各校学生反日情绪高涨。省委组织奉天党团积极分子,上街散发传单开展广泛的反日宣传,在民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在关东州,大连党团积极分子连续散发反日传单,引起日本殖民当局的恐慌。营口党组织也有计划地组织学生上街贴标语、撒传单。5月30日,在党团积极分子的组织带动下,大连、营口等地上街游行的学生高举反日大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学生们的反日爱国热情,感染了工人、农民及广大民众,从而掀起了一个反日浪潮。延边党组织通过开展演戏、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等活动,在群众中扩大反日宣传的影响。南满铁路沿线的反日宣传更是搞得有声有色。

中共省委重点在南满地区工人中开展反日斗争。省委分析认为:整个满洲的工运,可以说是完全针对日本殖民当局的运动。因此,省委应重点领导大连党组织开展日本租借区工人的反日斗争。19世纪20年代末,旅大地区已有产业工人十余万人,大多是在日本企业里劳动。在日本资本家统治之下的中国工人,经常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制裁。因此,在一般的工人中普遍有较强的反日思想。

在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前,大连党组织曾多次领导中国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1926年4月27日,在大连的日本企业“满洲福岛纺织株式会社”的中国工人为改善待遇,争取人权而举行历时101天的大罢工。此次罢工规模大,时间长,不仅福纺本厂工人参加,而且全市工人都声援福纺工人罢工斗争,并最后取得了胜利。在福纺工人大罢工的影响推动下,1927年12月28日,爆发了大连市南关岭火车站中国装卸工人的反日抗暴斗争。1927年年关将近,几名饥寒交迫的中国装卸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到贮煤场拉煤,准

备换钱度日,其中三人被日本警察抓住,遭到残暴殴打和污辱。日本警察的暴行激起了中国装卸工人的民族仇恨。12月28日夜,300多名愤怒工人冲进车站转运室、站长室,砸毁电话,痛打了欺压中国工人的日本监视员汤山、佐藤、储水等人。一时间,南关岭火车站一片混乱。12月29日凌晨,大连日本警察署司法主任中原带领警察逮捕和监禁了大批工人。敌人施用灌凉水、压杠子等酷刑,中国工人宁死不屈,缄口不答。最后警署当局将其中的166人以强盗、伤害、扰乱及妨碍通讯等罪名关押起来。

对南关岭火车站装卸工人的反日抗暴行动,日本“满铁”当局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不单纯是盗窃煤炭的行为,事态已暴动化了。这次暴动虽然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但其影响是很大的。

1928年初,大连油篓工人发动了罢工斗争。罢工工人提出增加月工资和假日照发工资的要求,经斗争,业主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日本占领大连后,在大连建立了一系列大型榨油厂,成为东北油坊工业的中心。日本资本家极力压制和排斥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挤垮和吞并了一批中国人办的工厂,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独自掌握了大连所有大的油坊。

1931年4月初,大连又爆发了三泰油坊的中国工人罢工斗争。三泰油坊是日本人在大连经营的最大的榨油工厂之一,在东北各地设有300多个支店,在大连油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泰油坊厂主日本人广濑,因殴打中国工人,激起工人强烈不满。油坊党支部领导发动了罢工斗争。当时正是榨油旺季,厂主怕受经济损失,答应工人的月薪从9.5元增加到13.5元。这个厂400余名工人罢工的胜利,给市内其它油坊工人以极大的鼓舞。在油坊党支部和油坊工会的领导下,三菱、同泰、同积厚、福聚恒、天兴福、成德盛、万义长等大小油坊的中国工人相继联合采取行动,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都

取得了胜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菱油坊的工人罢工。

三菱油坊是仅次于三泰油坊的日本财阀开办的榨油工厂,设南北两个分厂。1931年4月上旬,南厂打榨工人受到三泰油坊工人罢工的影响,向资方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在党支部领导下,经过连续三天的罢工,最终迫使日本资本家答应把打榨工人工资提高到每月13.5元。

日清油坊的日本厂主见三泰、三菱油坊工人罢工获得胜利,害怕波及本厂工人,也自动宣布给工人增加工资。

大连油坊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资本家,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使大连地区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转机。

1928年10月,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各界群众开展了规模巨大的反日护路斗争。攫取东北铁路路权是日本侵略满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27年6月“东方会议”之后,日本田中内阁乘张作霖还在掌握北京政权的机会,10月,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到北京与张作霖密商《满蒙新五路协约》草案,日方要求由其贷款并承筑敦(化)图(们)、长(春)大(赉)、吉(林)五(常)、洮(南)索(伦)、延(吉)海(林)五条铁路。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将其势力伸进吉林腹地,全面控制东北的一个重要步骤。修筑这五条铁路,将为日本对东北的经济侵略和军事进攻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旦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只需一天时间就可将兵员、装备运抵长春等地,在极短的时间便可以控制全东北。为此,日本千方百计促办此事。

《满蒙新五路协约》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霸占全东北的一个阴谋。因此,不仅遭致中国人民的反对,在国际上也遭到美英政府的干涉和反对,因而张作霖未敢在协约上履行正式手续。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日本又催逼张学良同意解决“满蒙新五路”问题,继而又乘机与吉林省会议酝酿签订《中日民商合筑五路条约》。

消息传出,引起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慨。为反对日本侵略,维护路权,中共满洲省临委立即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告同胞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号召东北人民行动起来,“取消日本对中国的平等条约”,“反对日本在满洲延边修筑铁路”^①。并先后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组织动员民众开展大规模的反日斗争。

1928年10月15日,延边各界群众数千人连日开会,抗议日本的侵略。中共延边区委积极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反日斗争,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各界组成农、工、商、学“抗路联合会”,通电奉天当局反对修筑吉会铁路,并派代表分赴吉林和奉天等地进行请愿活动。

10月24日,当延边抗路联合会代表到达吉林市后,省城农、工、商、学等10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路权自主会,联名致电张学良、张作相及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反对日本修筑吉会和长大铁路,并推选代表会同延边代表一行14人赴奉天请愿,面见张学良,要求拒日修路。

10月27日至29日,东三省路权保持会在奉天召开会议,三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代表和奉天各中学校长、各报社社长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坚决反对日本攫取长大和敦图铁路权,支持当局拒绝签约;如果日本强行施工就采取一切办法阻止施工,保路运动的最后手段是抵制日货,并与南京政府联合,抵制日本侵略,要求南京政府援助;与张学良、交通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便于采取保路行动,并利用报纸揭露日本的阴谋,从而使斗争烈火迅速燃烧起来。

为进一步领导反日护路斗争,中共满洲省委和满洲团省委组成了反日行动委员会,并于1928年11月5日发表了反对日本强夺路权的《中共满洲省委临字通告第33号》和《对时局宣言》,揭露日本强夺路权的种种罪行,号召东北民众进行维护路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

等条约、驱逐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宣言明确指出,维护路权的反日斗争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满洲省委提出的反日宣传口号是:“(1)力争路权。(2)收回旅大及一切路权附属地、矿山、工厂。(3)取消对日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4)驱逐日本军警出境。(5)对日本经济绝交。(6)取消日本在满洲境内的各机关。”^①省委对每个支部和每个党员在维护路权反日斗争中的行动都提出了要求

11月5日,在哈尔滨学生维持路权联合会的组织下,东省特区各校2000余名学生举行反日护路示威。学生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护路权”等口号,并散发了反日传单。

11月8日,以东北大学学生会为中心,成立了奉天省学生联合会,并向全国各地派出代表,向各地民众团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攫取东北路权的阴谋,呼吁各地人民支持东北人民的保护路权斗争。在北平的东三省学生组成了“路权保持后援会”,积极开展支持东三省人民的保护路权斗争。

11月9日上午,哈尔滨市各大学、中学及部分小学生5000余人,不顾当局“严禁学潮”的禁令,再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至道外正阳街(今靖宇街)口时,遭到军警开枪镇压,学生重伤8人,轻伤140余人,酿成了震惊全省的“一一·九”流血惨案。同日,齐齐哈尔、昂昂溪、双城、宁安、安达等地学生也纷纷上街游行,投入反日护路斗争。

东北各界人民反日护路的爱国斗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东北的阴谋,打击了日本当局的反动气焰,客观上也有力地促进和支持了张学良的对日交涉。在东北人民和东北军政当局的强烈反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临字通告第35号》(1928年11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69页。

对下,关于满蒙新五路的交涉被迫中止,日本帝国主义谋取东北路权的阴谋遭到失败。

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维护路权的反日斗争,参加者几乎包括了东北各阶层的民众,有工农大众,青年学生,绅商各界,以至东北军政当局的官吏和军人。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承担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根据东北实际情况,以工农大众、青年学生和一切革命者为主体,团结和发动各阶层民众共同进行反日护路斗争,把反对奉系军阀的阶级斗争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维护民族利益的斗争统一了起来。

1929年7月,东北军阀当局,用武力强行接管中苏合营的中东铁路。拘押和驱逐中东铁路苏方人员,制造了“中东路事件”。东北出现了复杂的局势。为了加强党对东北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到达东北后,很快深入到中东路问题的中心地——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针对战争恐怖及事件给工人经济上生活上造成的损失,领导工人把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与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斗争结合起来,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团结了广大工人,建立了工人组织。在事件后期,铁路当局大批解雇中国工人时,领导解雇工人进行了复工斗争,并得到广大在岗工人和市内其他各工厂工人的支持,吸收铁路系统4000多名工人参加斗争,取得斗争胜利,成立了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工人委员会,把哈尔滨市的工人运动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20世纪30年代东北地区朝鲜族有100多万人,主要是农民。日本吞并朝鲜后,很多朝鲜爱国志士和朝共党员在朝鲜族群众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包括抗日武装斗争。朝共组织发展到相当规模。1930年,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的原则,在东北的朝共党组织解散,其党员经审查考验个别履行手续,加入中共党组织。由

于朝共党员加入中共党组织,东北地区党员数量¹³⁰剧增,党组织也发展到广大农村。据1930年3月30日统计,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支部有30个,党员有206人¹,到1930年9月9日统计,党组织有2个市委、1个特委、4个县委、8个特支、180个党支部,党员有1000多人,团员1000多人²。新发展的县以下党组织大多建立在东满、南满、北满的农村地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运动蓬勃兴起,这为后来党在农村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1929年末,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实现了全国统一。但这种表面的、暂时的统一,并未解决国内的一系列矛盾,很快又为新的军阀混战所代替。1930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互相争夺,爆发了中原大战,刚刚易帜和拥兵东北的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巧电”,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率10万强兵进驻平津。由于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支持了南京政府,经历了7个月的新军阀混战,以阎冯失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得以调集数十万军队,又向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¹⁰⁶进行新的“围剿”,¹⁰⁶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一直坚持的反共反人民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造成了可乘之机。

1930年10月,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统司令。1931年4月,张学良在北平组织了副总统司令行营并坐镇北平。1931年6月,讨伐石友三之役,又调东北军4万余人进关。这样,就使总数在~~26~~至28万之间的东北军,有14万余的精锐部队留驻关内;而在东北的军队只有~~15~~至13万之间,主要分驻吉、黑两省,辽宁驻军

¹ 《中共满洲省委政治状况表》(1930年3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377页。

²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297页。

只有3万多人,使东北三省特别是辽宁省的防务力量大大削弱;并且留在东北的军队也基本上处于无戒备状态,没有紧急应变的军事部署,这也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造成可乘之机。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的部署

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也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困境,日本帝国主义在加强对国内工农劳苦大众剥削的同时,在中国于日本人经营的企业里不顾工人死活,极尽盘剥压榨之能事;在铁路沿线和城市近郊强占民田;日本军警也不断制造枪杀、殴打中国民众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激起民众的反抗。从1929年到1931年,仅在南满地区的抚顺、沈阳、辽阳一带就出现20多次民众抗议和工人罢工。广大民众反日斗争形势日益高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安,感到其满蒙的利益受到了威胁。东北张学良政权易帜后采取的抵制日本的措施和工农大众的反抗斗争和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引起的阶级矛盾,使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的步伐。

首先是大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1929年7月5日,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作战部主任石原莞尔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其中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第一条就是:“一旦完成对美作战的准备,就立即冒开战之险,坚决将满蒙收归我有。依靠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景气自然就能恢复。”^①1930年12月,日本拓务省大臣松田,满铁总

^①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3页。

裁仙石及外务省、陆军部的一些人开会,对于东北易帜后外交归属南京,修筑以葫芦岛为中心的铁路网联运计划甚为恐慌。制订出日本吞并满蒙的秘密计划。这个计划提出采取“以华治华”、“恩中威”、“亲中恶”等手段,“一面假陆军当局之强硬为后援,一面由满蒙当局用怀柔的术策以诱之,等待天赐良机,以解决满蒙一切问题。”^①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陆军步兵大佐板垣征四郎在陆军步兵学校作《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演。他说:解决满蒙问题是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的理想。“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由于帝国掌握着满蒙战略关键的据点,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满蒙的资源是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他还极力鼓吹“如果单用外交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②这些演说和计划,表现了一大批军国主义分子煽动侵略战争的狂热性。

根据日本政府的侵略方针和关东军提出的方案,以及日本拓务省的计划,日本军部又进一步策划了占领中国东北的方案。1931年4月,参谋本部制定了《1931年形势判断》,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三个步骤:(1)“在满洲建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2)“使这一政权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3)“占领满蒙”。从这个判断可以看出,日本陆军占领中国东北的目标、步骤已经确定。6月19日,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拟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大纲》。其主要内容是:(1)倘若满洲的排日活动再发展下去,也许要采

① 国难资料编辑社编:《日本大陆政策真面目》,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64、75页。

② [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7),1964年发行,第139页。

取军事行动；(2)让日本国民和世界各国了解满洲的排日活动，以便在采取军事行动之际，能得到国内外舆论的谅解；(3)采取军事行动时所需要的兵力，在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拟定上报；(4)为谋取国内外谅解而采取的措施，约以一年为期，即到明年春(1932年春)为止。这一《大纲》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东北的纲领性文件。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行动基本是按这个纲领进行的，只是时间稍稍提前而已。

在陆军省紧张制定侵占中国东北方案的同时，关东军也积极制定相应的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关东军的计划，与陆军省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在步骤、时间上更为急进。1931年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认为当时已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第三阶段，即军事占领阶段。故主张“阴谋制造关东军行使武力的机会”，“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决心擅自打倒张学良政权，占领满蒙。”^①在军部的支持下，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

关于制造事端的地点，在1930年冬，经板垣和石原密谋策划，拟定了在沈阳北大营连接地带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线上实行爆破的方案。1931年春，又组织一个爆破小组并拟定举事的具体时间。后来，关东军又精心组织了多次在东北各地的战地考察，为发动侵略东北的战争做好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既已决定武装侵占东北，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便开始制造种种挑衅事件，为发动武装进攻寻找借口，制造反华舆论，煽动战争狂潮。其中最主要的有“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位于长春市北北约33公里，长春县境内(今属吉林省德惠市万宝乡)，其西南两面10余公里处有伊通河绕流而

^① [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11)，1964年发行，第286—288页。

过,适宜种植水稻。1931年4月,“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①以违法手段租得长春西北约25公里,长春县三区境内万宝山地方住户萧翰林等人生熟荒地500垧,租期10年。4月间,郝永德又将所租地转租给朝鲜人李升薰等耕种,上述两项租地契约均未经长春县当局批准。5月间,李升薰等在日本人指使下,率180余名朝鲜人挖渠引伊通河水入地,渠道所经之处占用中国农户良田甚多,当地受害农民请求长春县政府予以制止。县政府派警察出面对朝鲜人进行劝阻,但日本驻长春领事也同时派日本警察以“保护朝民”为名,支持朝鲜人继续挖渠,中国农民愤恨不平,出动400余人填平渠道。7月2日,双方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日本警察向中国农民开枪,并抓走10余人。翌日,日本领事馆派警察到现场,附近强行干预。在日警的保护下,7月11日水渠大坝终于筑成。当地中国农民遭受巨大损害。此即“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在朝鲜报刊上大肆捏造很多朝鲜农民被害的消息,蓄意挑拨中朝民族关系,制造反华浊浪,致使在朝鲜汉城、平壤等地发生袭击华侨的暴行,使华侨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分子则大肆鼓吹“满蒙生命线受到威胁”,寻求用武力“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

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尚未平息,日本帝国主义又借大尉中村失踪事件煽动战争狂热。1931年6月上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情报员、大尉中村震太郎偕骑兵曹长(上士)井杉延太郎等,化装成中国人,从海拉尔出发,到大兴安岭、索伦一带进行军事侦察。此地属东北军屯垦区。6月25日,中村等途经位于王爷府以北20公里、洮索

^① 郝永德,万宝山事件的中方首恶分子。1947年春,以出卖国土招致外患和汉奸罪,经国民政府长春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宣判前两天病死狱中)。

铁路线上的余公府四方台时,被东北军兴安屯垦军三团一营驻军发现并扣留审查。经审查,从自称农学家的中村身上搜出大量军用地图、自绘的洮索铁路桥渠涵洞草图,兴安屯垦兵力分布图及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等资料。中国驻军团长关玉衡判断中村身份并非农学家,而是从事情报搜集的军事间谍。审讯中,军曹井杉供认中村是日军大尉。此前,东北当局曾照会日本驻东北各领事馆,不准外国人进入兴安垦区。审讯之后,全团官兵决定将中村等人处决。

七八月间,日本获知中村等被杀的消息后,一面提出强硬要求,一面在国内制造舆论,朝野上下大肆叫嚣“此事解决应用武力。”日本军部主张“不管中国方面态度如何,都要立即以最大决心采取行动”^①,叫嚷“中村事件是直接对日本皇军的进攻”,“满洲问题除行使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途。”^②在交涉和处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了。

在制造舆论、煽动战争狂潮的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加紧了军事部署。

早在1928年10月,在日本陆军大学任教官的中佐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作战部主任,任职后便着手制定攻占奉天的计划。1929年4月,日本陆军大佐板垣征四郎由天津驻屯军调任关东军第十六师团二十三联队长,旋即调关东军任高级参谋。石原与板垣成为关东军中煽动战争最活跃、最狂热的人物。1929年5月,板垣主持召开关东军情报会,决定组织关东军“参谋旅行”。从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板垣和石原等在东北各地连续组织4次“参谋旅行”。这些关东军参谋旅行,西北起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中经哈尔滨、郑

^① 王也平译:《“九一八”事变——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

^②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5页。

家屯、洮南、长春、沈阳、新民,西南至锦州、山海关等地。他们一面进行军事侦察,考察地形,组织模拟军事对抗;一面进行占领满蒙方案和战术研究。这些有关调查和研究为发动事变,占领东北提供了情报资料。其中石原提出的《战争史大观》、《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等一整套侵略理论,代表了一批日本右翼法西斯军人的思想。这些理论和主张,实际上成为发动九一八事变理论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1931年4月,日本军部以换防为名,将驻辽阳的第十六师团调回日本,另由中将多门二郎率领驻仙台的第二师团接防。第二师团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之一,士兵多生长在日本北部的寒冷地区,有耐寒能力,很适于在中国东北地区作战。1931年7月,日本军部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中心也积极策划武力侵占东北的方案,拟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同时,日本军部批准将两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由神户秘密运至大连,再由大连运到沈阳。然后,隐蔽地安装在沈阳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并对准了中国驻军的大营。

关东军司令官易人,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上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1931年8月1日,任命陆军中将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接替前任司令官菱刈隆。本庄繁曾担任过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对中国和东北的情形非常熟悉。本庄繁赴任前于8月3日上书陆相南次郎,他认为:在世界经济危机之中,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及中国未达统一之前,占领满蒙,成立满蒙独立国,并与朝鲜及日本内地打成一片,日本才能充实世界“一等国”的地位,使日本的国基“巩固于现今世界。”他狂妄叫嚣首先占领满蒙,进而使“支那四百州在我掌握,全亚统一,欧洲征服,均能实现。”他强调在俄、中两国尚

^① 参见稻叶正夫:《史录:满洲事变》,日本严南堂书店昭和7年发行,第1—3页。

在复兴、力量微弱之际，“以强大之陆军临之，直如摧枯拉朽之势”就可以取得占领满蒙战争的胜利。8月20日，本庄繁到达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后，即向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高级参谋板垣部署了“满洲时局对策的根本方针”，并审查了石原莞尔等制定的“作战计划”。从9月7日开始，本庄繁对南满路和安奉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连山关、辽阳、大石桥、公主岭、长春、沈阳等地的日军进行巡视检阅，检查关东军“应变准备工作”。本庄繁巡视部队期间组织多次军事演习，鸣枪放炮、攻城、巷战，甚至公然把东北军兵营作为攻击目标，其嚣张气焰达到极点。正在本庄繁在南满路沿线检阅部队之际，关东军发动事变的消息在日本国内泄露。日本外相币原向陆相提出质问，陆相南次郎派参谋本部少将建川到东北传达军部意见，“以防患于未然”^①。关东军于9月14日收到建川发来的电报，15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行动，将原定的9月28日，改为18日，同时加速组织迷惑视线的军事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在沈阳北大营一带连续组织演习，并在沈阳街头张贴布告，声称：“大日本奉天驻屯军，近日以来举行秋操，“满铁”附近居民突闻枪声勿得惊慌。”^②日本帝国主义以军事演习为掩护，秘密进行突然发动战争的准备，并以此麻痹东北人民。此时，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团体和机构都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日本在乡军人奉陆军省密令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集中应付突然事变。集中到沈阳的在乡军人于9月17日聚集在南站，臂缠黑纱，狂呼为保障满蒙之既得权利而洒军人之鲜血。“满铁”公司职员也组织装运货物的演练，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9月18日上午，本庄繁在辽阳检阅了师团长多门所率第二师团部队。他训示时说：“现

^① 《本庄繁日志》，第348页。

^② 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载《文史资料选集》第76辑，第91页。

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事端发生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①他的这一训话就是发动战争前的动员。本庄繁在辽阳巡视后于当晚10时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这时,关东军武装占领东北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沈阳上空战云密布,事变犹如在弦之箭,一触即发。

二、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初七),时届中秋,天高气爽。白山黑水间,松辽平原上的农作物已经成熟,正待开镰收割。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这次事变,不仅使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东北的阴谋计划得以实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而且也“成了后来持续1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②

根据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发动事变的方案,9月18日夜,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工兵中尉河本末守率领6名士兵,携带炸药,以巡视铁路为名来到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线上预先选定的爆炸点。柳条湖位于沈阳市街以北,介于南满铁路文官屯站和沈阳站之间,北距文官屯车站3公里左右,南距沈阳站7.5公里。晚10时半左右,河本一行7人,在此地用炸药将南满铁路东侧单面路轨炸毁一段,炸毁缺口为1.5米左右。事后,河本用电话向守备队第二大队队部及坐镇在沈阳特务机关指挥此次行动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报告,诬称北大营中国士兵炸毁铁路,正在激战中。板垣收到河本报告

^① [日]稻叶正夫:《史录:满洲事变》,日本严南堂书店昭和7年发行,第74—75页。

^② [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著:《太平洋战争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4页。

后,立即以关东军代理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发布了攻击北大营和沈阳城的命令:一、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攻击北大营;二、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攻击沈阳城;三、驻铁岭守备队第五大队赶赴沈阳,从北大营北面攻击,并受第二大队长统一指挥;四、第二师团主力前往沈阳增援。

板垣下达上述命令后,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连续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情况。决定迅速集中关东军于沈阳附近,控制东北三省的中枢。9月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本庄繁分别给各部队下达命令,首先批准追认了板垣代发的命令,还称赞了板垣的主动、独断精神。给各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一、命令第二师团主力集中于沈阳,驻旅顺的第十五旅团步兵第三十联队及旅顺炮兵大队迅速向沈阳出动,驻长春的第三旅团及其所属步兵第四联队、骑兵第二联队担任长春的警备任务,同时秘密攻击该地的中国军队;二、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一、第五大队集中于沈阳,驻大石桥的第三大队占领营口,驻连山关的第四大队占领安东、凤城,驻鞍山的第六大队集中于沈阳接受第二师团指挥;三、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将电告中日冲突情况,请迅速派兵增援。关东军发布的这些命令,也就是日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最初几天的作战部署,日军对南满路、安奉路沿线中国城镇的占领也是照此行事的。这些命令充分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有计划、有充分准备、详细部署的。

在河本实施柳条湖南满铁路爆炸后,事先即埋伏在柳条湖以北文官屯的日本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大尉川岛便率105名日军直扑北大营,夜11时已到达北大营西北角。川岛中队兵分两路向北大营发起攻击。

北大营是东北军最大的兵营,位于沈阳市街北约三四公里处。整个营区坐北朝南,东西南北各边长2000米。北大营营房区防御体

系坚固,四周均有2米高的土围墙,宽可行2人,围墙外有1米深、3米宽堑壕并有铁丝网。东西南北各边中间有卡子门,两个岗亭相对而立,设岗哨,南门为北大营正门,卫兵室经常有一个排的兵力值班。营区内驻军为东北军的精锐之师步兵独立第七旅,中将旅长王以哲,下辖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3个团,全旅约8000人。营区北面,面南一排营房,旅司令部居中,旅直属迫击炮、通信、特务、骑兵等连在左,六二〇团在右。旅部后面是修械所、仓库、马厩等附属设备。营区东面围墙外是六一九团和步兵研究班,营区西面是六二一团,营区中间是一个大操场。全旅除六二〇团第一营驻皇姑屯,六二一团3个直属连驻东山嘴子东大营外,其余部队全驻北大营,事变当夜北大营内驻约7000人。北大营西侧距南满路最近,整个西营距南满路上行线二、三百米不等,距爆炸地点也最近。所以日军守备队第三中队冲下南满路同河本等人会合后,于11时便直扑大营西北角,中队长川岛冲上土围墙后,见营内无防备迹象,便集中火力向紧靠西围墙的六二一团各营进攻。同时,日本人在沈阳火车站鸣响汽笛,设在日军独立守备队营内的两门榴弹炮开始轰击北大营。约夜11时50分,日军守备队第二大队长、中佐长岛率第一、第四中队从沈阳站乘火车到达柳条湖附近,配合第三中队从北、西、南面向北大营内攻击,炮火异常猛烈。第四中队集中主力攻击居于北大营北侧的六二〇团;第一中队从正门卫兵室突破,向旅部和直属连队实行攻击。驻守在抚顺的守备队第二中队在中队长、大尉川上率领下于18日夜11时收到大队部命令后即向沈阳进发,19日清晨到沈阳站,然后向柳条湖前进。独立守备队驻铁岭的第五大队分两批共500余人于19日4时41分、6时40分先后到达文官屯车站,先到的第一批从北大营北面进攻。19日7时30分,驻鞍山的守备队第六大队300余人也到达北大营。不过此时日军已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主力向北大营进攻时也遇到一定的抵抗。9月18日夜,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由参谋长赵镇藩署理军务。当日军向北大营攻击时,他用电话向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请示应对办法。荣臻转达上峰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①据此指示,旅部命令不准士兵开枪还击,回到宿舍去。对于不准开枪的命令,官兵们“非常愤慨,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欺负我们呢?’“全队官兵的惊讶、……怀疑、……忿怒是可想而知的。”^②9月19日凌晨,日本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从抚顺,第五大队从铁岭先后到北大营附近,会同正在这里攻击的第二大队主力,冲破铁丝网进入营区。六二一团士兵被围在营房内撤不出来,伤亡颇重。第七旅官兵忍无可忍,违反不抵抗命令被迫还击。9月19日3时许,参谋长赵镇藩命令第七旅开始突围,因六一九团在围墙外,开始时未遭到日军攻击,命该团掩护全旅突围,“机枪步枪,吐出愤怒的火舌,向着逼近的日军猛烈还击,而日军方面的枪声,很明显地稀疏下来,他们的攻击遭到了压制。”^③第七旅各部队陆续撤出北大营,按预定计划撤向东山嘴子东大营。9月19日晨5时许,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北大营一夜战斗,东北军第七旅战死官兵149人,受伤官兵186人,总计伤亡335人^④。日本守备队第二大队在攻击北大营时死2人、伤22人^⑤。

① 虎口余生:《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印刷,第14页。

② 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载《文史资料选集》第6辑,第5页。

③ 李树桂:《九一八事变我在北大营》,载《辽宁文史资料》第31辑,第76页。

④ 荣臻报告:《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载李云汉主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249页。另据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记载,北大营遗尸320具。

⑤ [日]冈林菅鹿:《满洲事变第一战》,日本军用图书株式会社1932年版,第1页。

当日本守备队第二大营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日军驻沈阳的第二师团第二十九联队也向沈阳城内发起攻击。日军分路向商埠地南市场、北市场、大小西边门进攻,直侵砖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及东三省官银钱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单位悉被占领。城内各警察署、宪兵司令部、公安分驻所的武装均被解除,一部分人员被监禁。日军在攻击公安第一、二分局时,警察进行了还击,互有死伤。据事后统计,第一、二分局死五六名,皇姑屯分局死10余名,工业区六分局死10余名^①。六分局被日军包围时,局内警察仅30余名,与众多日军相对抗,子弹打光,与敌肉搏,坚持近3小时。日军攻入分局后,竟残忍地将中国警察“碎首折骨,挖胸剖腹,血渍殷红,润遍沙土,暴尸于局门内外。”^②9月19日晨5时,日军步兵第十五旅团第十六联队攻占了航空处、飞机场、兵工厂等地。晨6时30分,第二十九联队一部已由大小西门相继入城,电话、电讯设施均为日军控制,致使沈阳内外消息断绝。晨7时左右,沈阳城完全被日军占领。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除留一部分兵力控制沈阳城外,调集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一部主力,开始向东大营攻击。

东大营位于沈阳东天柱山脚下的东山嘴子,距沈阳城约10公里,其规模稍小于北大营。日军在向东大营进攻时,中国军队已于上午8时撤离东大营。11时至12时30分,日军未遇东大营任何抵抗占领营内,东大营被占领,标志着沈阳完全陷落。

九一八事变,一夜之间沈阳全城陷于敌手。9月19日清晨,沈阳街头高悬日本旗,日军荷枪实弹,四处搜查,骑兵跃马扬刀,横冲直撞,城内交通断绝,偶有行人,遭日军严行盘查,其认为可疑者不遭枪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报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2页。

^② 《日本强占东三省记》,汉口奋斗报社1931年版,第38页。

杀亦遭监禁，“稍有抗辩者日兵即以刺刀相向。”^①“男学生被残杀，女学生被奸污者不可指数。”^②沈阳城完全处于血雨腥风之中，人民在遭受着日军铁蹄的践踏。9月19日上午，首先由日本宪兵队在市内街头巷口张贴布告：“本省城近来失秩序之事甚多，兹军占领城内，临时维持治安之事，对各善良人民，一视同仁，绝对保障生命财产之安全……若有故意传播谣言，违反治安者之时，当处严罚”。嗣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布告诬称：“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炸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贸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是彼开始敌对行动，甘为祸首。”布告颠倒黑白，诬蔑东北边防军方面对其南满铁路权益“频繁簇起侵害行为，境内到处发生侮日行动；”“因为拥护其既得之利权，确保帝国之威信，兹方执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倘有对我军行动欲加妨害者，本官必出断然处置。”^③

日军在进攻沈阳的同时，驻长春日军也奉命做攻占长春的准备。长春旧名宽城子，是南满铁路北端的终点，也是吉长路终点。北与中东路支线相接可达哈尔滨，实为吉林之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按关东军既定计划，驻长春日军的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和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于9月18日午前即进行了军事部署。19日凌晨1时左右，驻长春日军得知日军正在向北大营进攻的消息后，第三旅团司令官长谷部于3时55分下达总攻击命令。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宽城子及南岭中国兵营。4时30分，第四联队长大岛陆太郎率400余人开始攻击宽城子二道沟中国驻军，中国警察署也被包围缴械。当时，二道沟营房内驻中东路护路军第六六三团第二营傅冠军部约

① 虎口余生：《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第26页。

② 虎口余生：《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第26页。

③ 转引《辽吉备战纪实》，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

650人。在日军进攻时,营长傅冠军勇敢迎战,不幸战死。第二营士兵在营长已牺牲,士兵亦有伤亡的情况下,群情激昂异常,誓不缴械投降,拼死抵抗。但终因日军炮火猛烈,中国军队死伤惨重,只好于11时开始突围,向乌拉街撤退。宽城子中国驻军仅以一营兵力在营长战死的情况下,拒绝上级的不抵抗命令,与敌拼战半日,虽力战不支,但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淫威和锐气,表现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宽城子战斗,中日双方均有较大伤亡,中国军队死41人,伤67人^①;日军死24人,伤33人^②。

日军在攻击宽城子的同时,也开始对南岭中国兵营进行攻击。南岭兵营位于长春以南6公里处,西距南满铁路约4公里。当时营内驻有东北边防军步兵第二十五旅第六七一团、东北边防军炮兵第十九团及辎重兵一营共3600人。日军进攻后,炮团团长穆纯昌、步兵团长程玉山致电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熙洽命令撤退,不准抵抗。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中国驻军被迫还击,且战且退。由于武器库已被日军控制,许多中国士兵没拿到武器,徒手撤退,伤亡惨重。南岭战斗,中国驻军在长官下达不抵抗命令之后,仍坚守兵营数小时,给日军以重创。据日方记载,战死将校和准士官以下42名,负伤56名^③;中国军队在南岭战斗中死亡官兵218名,负伤者99名^④。9月19日下午5时30分,日军占领南岭兵营,长春完全陷于敌手。

9月18日夜至19日上午,驻南满路、安奉路沿线的日军全面出动,先后占领了复县、海城、盖县(今盖州市)、大石桥、营口、辽阳、鞍

① 虎口余生:《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第65页。

② [日]佐藤庸也:《活机战》(第一部),日本军用图书株式会社1943年印刷,第25页。

③ [日]佐藤庸也:《活机战》(第一部),日本军用图书株式会社1943年印刷,第34页。

④ 虎口余生:《日军侵据东北记》,民众书局1931年版,第65页。

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公主岭和安东(今丹东)、凤城等地。日军占领沈阳之后,为控制北宁路,陈兵巨流河车站,把守59号、88号铁路桥,以待西进。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之后,关东军命令除留第二师团的第十五旅团步兵第十六、二十九联队,临时野战重炮大队第二中队留驻沈阳;第二师团其余部队、野炮大队和守备第五、第六大队向长春集结,以图进攻吉林。9月20日晚,日军各部队到达长春。9月21日上午6时,日军占领吉长铁路局。九一八事变时,正值东北军驻吉副司令、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回锦县为父奔丧,由参谋长熙洽代署军政要务。沈阳陷落后,熙洽即坚决抱不抵抗主义,首先命驻省城的二十五旅张作舟、卫队团冯占海两部撤退到外县,尔后通过日本领事与日军谈判,达成向日军投降的协议。由于熙洽的出卖,9月22日下午6时30分,日军第2师团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省城,控制了吉长路。9月23日,日军又先后占领了吉敦路的蛟河、敦化。这期间吉林东部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也被日军侵占。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旬日之内,日军迅速占领辽、吉两省近40座城镇,其投入的总兵力尚不足2万人。而当时在辽、吉、黑三省的东北军还有近20万人,在辽宁全省的东北军正规部队也有3万人。东北军几倍于敌不战自退,有土不守,实乃我中华民族抗御外侮史上的奇耻大辱。

继沈阳、长春、吉林等地沦陷之后,日军于1931年11月突破中国黑龙江省驻军嫩江桥防线,11月19日占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然后又集中优势兵力在辽西北宁路沿线发动进攻,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控制了北宁路关外段。1月末,日军迅速调兵北上,2月5日,日军多门所率第二师团占领北满最大城市哈尔滨。至此,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2月5日,4个月零18天的时间,整个东北三省130余

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三、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霄烽火失地千里,旬日之间辽吉名城尽陷敌手,造成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的奇耻大辱,究其根源乃是南京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的恶果。

不抵抗政策,或称不抵抗主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历史的产物。由于统治阶级的无能,中国自1840年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当权的统治阶级,从腐败的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权,直至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无不在外敌入侵面前放弃自卫和抗争,采取消极退让的态度向敌人妥协,并且强调通过所谓外交途径解决。其结果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与中国隔海相邻的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统一,不断制造各种惨案。蒋介石主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论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兴师动众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蒋介石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而集中力量进行反共战争和军阀内部的争斗。当1928年4月国民党军组织第二次北伐,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制造济南惨案时,蒋介石就实行不抵抗主义,“对日军的武力屠杀不实行武装自卫,而是单纯诉诸国联。”^①所以当时有人说:“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济南之役,蒋以不抵抗制福田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联之承认。”^②

① 王芸生:《这两年》,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37期。

② 梁敬敏:《九一八事变史述》,台湾1965年版。第116页。

20世纪30年代初,是中日关系史上多事之秋,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各种机会,滋生事端,制造侵略战争的借口。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几乎都是一味的约束地方和部下,避免和日本冲突,希望在不抵抗的姿势上可以闪过日本人寻衅的锋芒^①。果然,在1931年7月发生了吉林万宝山事件,东北军政当局在与日本交涉过程中,南京国民党中央通令全国各级党部在反日运动中切切不可有加害日本人的行动,并训令上海当局,要尽力以提倡国货运动替代排斥日货行动,用以缓和弥漫全国的反日风潮。到了7月6日,张学良秉承国民党中央旨意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不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②7月11日,《盛京时报》公开报道这条消息时说:“张副司令对万宝山事件及华鲜人冲突事件颇为重视,日昨致电此间最高当局略谓:“凡我东北官民对于朝鲜冲突事件咸宜一体自重,切勿轻举妄动,其各注意云云。”

为了稳住一触即发的东北局势,蒋介石于7月11日在“剿共”前线给张学良电训:“日本狡猾阴险,但现在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7月13日,国民党中常委、监察院院长于佑任在接见赴南京请训的东北交通委员长高纪毅时说:“目前以平定军阀内乱为要务,希望东北同志此时切勿轻率行动。”^③

针对上述两电,《盛京时报》于7月15日又披露了这一消息,内称:“蒋介石于13日在江西抚州剿共前线,向南京政府及张学良发出通电,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

①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 [美] 长青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57 页。

② 梁敬敏:《九一八事变史述》, 台湾 1965 年版。第 116 页。

③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 [美] 长青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158 页。

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张学良也复电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

万宝山事件余波未平,又发生了中村大尉案件,日本借此事件横生枝节,步步紧逼,张学良深感形势严峻,中日之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电文说:“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执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在另一电文里张学良说:“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这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苏俄,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①。

张学良这两通电文,认为广东力薄,共产党剿灭期近,因此不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强邻日本对满蒙的侵略在即才是大问题。张学良的主张和认识与蒋介石不同,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快。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强调“剿共必要”,“解决广东必要”^②。而对日本在东北的野心和举动未作任何说明。由于中日风云日紧,蒋介石对东北军政当局仍然不放心,于是在1931年8月16日又致张学良“铣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对于一切外交方面的方针、政策无不听命于中央。尽管与蒋介石的主张有不同,但在行动上仍然遵循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信条,尽力维护蒋介石的主张。所以9月6日张学良按蒋上述电告精神,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发

① 转引自《张学良评传》,[美]长青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159页。

②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美]长青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159页。

③ 转引自《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236页。

出“鱼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重。对于日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①蒋介石致张学良电，张学良致臧、荣之电距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很近，这些非常明确的命令，基本点是此后无论日人如何寻事都不能抵抗，力避冲突，万分容忍。有了蒋介石多次不抵抗的电告，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并命东北军执行，所以当日军攻击北大营之初，北大营驻军电话中向荣臻请示，荣臻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任其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强调虽是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日军在9月18日夜开始攻击后，夜11时左右，荣臻通过电话向北平张学良请示如何应对日军行动，张学良回答“仍按9月6日的训令，不与反抗免滋事端。”^②荣臻向张学良请示刚过，日军又攻击迫击炮厂、兵工厂，情形紧张。荣再次向北平请示，张学良再次命令取不抵抗主义。夜12时左右，由于日军大举进攻，荣臻发觉日军此次行动，不似寻常之事，又想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但此时电话线已被切断。荣臻用帅府小型无线电发报，电报到达北平时已是19日黎明时分。张学良接荣臻电后，在北平召集了军政要员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说：“日人图谋东北已久，这次挑衅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战争。我们军人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拚，但现在我们既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旨示。”^③张学良随即将荣臻、臧式毅电转呈国民政府。此时已是9月19日上午5时，故称此电为“皓电”。电文谓：“日兵晚10时开始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皓电”于19日中午到达南京，晚6时许“皓电”到外交

①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美]长青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②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美]长青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③ 洪飏：《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第6集，第24页。

部,外交部长王正廷与中常委于佑任、丁惟芬、戴季陶等商定,开一临时紧急中常会,会后复张学良一电,内有“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

张学良向南京发出“皓电”后,于19日上午接见《大公报》记者,张学良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武器,存于库房。”9月20日晚,张学良接见各外国记者时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②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在9月17日赴江西湖口主持“剿共”。“皓电”到南京时蒋正在江西。9月19日中常会决定电召蒋介石回南京。蒋于9月20日由湖口返回南京,9月21日召外长面询一切。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服从统一指挥,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主张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同一天,在国民党中央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国民政府告国民书》里,也强调“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听统一指挥,严守整个纪律”,“希望全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③

9月24日,张学良汇集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周的情况,向从江西“剿共”前线返回南京的蒋介石致电报告日军入侵东北的经过,电报中说:“日军向我兵营进攻时,先是我以为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起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

① 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264页。

② 《辽吉被占纪实》,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

③ 《辽吉被占纪实》,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

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事,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这里说的向官方请示,即指发往南京的“皓电”,所谓前项命令,也是指蒋介石8月16日发的“铣电”,即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抵抗,力避冲突。

以上系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初的关于不抵抗的一系列电报往来情况。如果说,由于九一八事变之初尚有一个观察、判断过程,对于日本的侵略本质尚认识不清,但在事变后的第4个月,蒋介石在奉化发表辞职讲演时还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②

以上所有事实足以证明,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不抵抗政策,作为主政东北的张学良也执行了蒋介石的这一误国政策。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有其历史的、阶级的根源,他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立场,不可能认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也不可能树立依靠全民族的力量战胜敌人的信心。只能产生恐日心理和抗日必亡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同时,由于国民党把一党之利益置于全民族利益之上,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集中全力于“剿共”,和军阀内战有密切关系。张学良作为东北地方最高长官的封疆大吏,虽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东北对日关系上的

^① 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264页。

^②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美]长青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页。

举措有意见,在认识上也与其有所不同,但最终还是执行了不抵抗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不抵抗政策使敌人不付多大代价顺利占领东北要地,帮了日本法西斯军人的大忙,损害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压抑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民族情感,损伤了民族自尊心,限制了几十万东北军的手脚,致使东三省很快沦于敌手。

四、伪满洲国的成立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首脑便多次密谋策划如何在东北建立殖民统治。事变之初,关东军先后提出的《建立满蒙新政权的三原则》、《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案》、《满蒙自由国建设方案大纲》等,其基本主张都是强调建立一个脱离中国本土,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日本手中,包括东北4省及东蒙地区的新满洲国家。

为了尽快实现建立一个傀儡政府的计划,日本关东军首先在辽宁、吉林、黑龙江拼凑地方伪政权。

从1931年9月26日到1932年1月,先后成立了以汉奸熙洽为首的“吉林省长官公署”;由汉奸赵欣伯、臧式毅、袁金铠、于冲汉等组织“奉天地方维持会”,改辽宁省为奉天省,臧式毅任伪奉天省省长;以汉奸张景惠为首组织的伪黑龙江省政府,张景惠为伪黑龙江省长。辽、吉、黑三省伪政权的建立,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第一步。在东北三省伪政权成立的同时,日本关东军也加紧了“新国家”的所谓建国活动。关于“新国家”的人选,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策划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提出的各种统治中国东北方案中即已拟定了要以清废帝溥仪为“新国家”的元首。并于1931年11月10日,由关东军派人将溥仪从天津挟持到大连。

1932年2月16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了伪满洲国“建国会

议”。参加会议的主要人物有：伪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熙洽、伪黑龙江省省长张景惠和日本极力拉拢的马占山。故有人称此会议是“四巨头会议”。2月17日，在关东军司令部导演下，组成一个过渡性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同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其中提出：东北四省与一特区并蒙古各王公“由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①随后，以政委会名义，发表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策划的《新国家建国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新国家”国名为“满洲国”；国体为民本政治；元首称号执政；第一任执政为溥仪；年号大同；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首都在长春，改称“新京”；3月1日举行开国典礼。1932年3月1日，以“满洲国”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正式成立。3月6日，溥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护下，由清末遗老郑孝胥陪同，从旅顺到汤岗子，张景惠等前往“恭迎”，3月8日到达长春。3月9日举行伪满洲国执政就职典礼，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汉奸郑孝胥充任伪“国务总理”。溥仪就任“执政”的第二天，公布了由关东军拟定的伪满洲国政府成员名单，~~和~~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签署~~一份~~^伪密约。这个密约的主要内容有：（一）“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委托日本负责，所需经费则由“满洲国”方面承担；（二）日本军队为了国防上的必要，“满洲国”可以将已修之铁路、港湾、水路、航空、邮电及新路之修筑，均委托日本或日本指定的机构管理；（三）日本军队认为必要的各种军事设施之经费，由满洲国予以竭力援助；（四）“满洲国”参议府任用一批贤达有名望的日本人为参议或中央及地方官吏，这些人的推荐和解职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五）将来两国正式缔结条约时，即以上述各

^① 陈觉：《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项之宗旨为立约之根据^①。密约规定的内容彻底表现了“满洲国”政权的傀儡性质。这个密约出笼后,日本国内加紧活动,为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作准备。

1932年3月至7月间,日本内阁、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分别制定了《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等文件,进一步阐述对“满洲国”的各种统治方针、政策。八九月间,关东军司令官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根据溥仪与本庄繁签订密约的原则又先后签订了《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管理和铁路的敷设、管理的协定》等一系列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日本获得了从经济到军事上的所有权力。

1932年9月15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议定书声称:日本已确认“满洲国是一个根据民意而自由成立的独立国家”,“为永远巩固两国的睦邻关系,”满洲国在日满两国未另行签订条款前,日本在“满洲国领域内”,“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予以尊重”;“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②在签订议定书的当天,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说:“武藤全权大使,于15日与满洲政府当局间,缔结议定书,以资对该国正式承认”^③,这样,日本政府便完成了对伪满洲国承认的“法律程序”。

为强化国家机器,推行反动统治,伪满洲国一成立,就公布了《政府组织法》,实行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四权分立,在执政之下分设国务院、立法院、检察院三院,民政、军政、财政、外交、实业、司法、交通等7部。在军事组织上,则根据《日满密约》的有关规定成立伪军政部,组建伪满军队。伪军政部内设立有日本关东军军官组成的军事

① [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7),1964年发行,第408—409页。

② [日]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现代史资料》(7),1964年发行,第494—506页。

③ 《国闻周报》第9卷,第38期,第2页。

顾问团,操纵伪军政部的一切军务、政令和指挥、调动大权。1932年4月公布了伪满“陆海军条例”和划分警备区的文件,在奉天、吉林、黑龙江、洮辽等地成立4个警备区司令部,另设护路军总司令部和江防舰队司令部。伪满初期的伪军来源大部分由投降日本的东北军组成,如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延吉镇守使吉兴等均系投日的东北军旧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根据日本关东军的旨意,由日本浪人藤井在辽宁沈阳一带招募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组成一支“靖安军”,因其身穿灰色军装,以红布包袖头,所以俗称“红袖头”。这些军队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军,是配合日本侵略军镇压东北抗日活动的反动武装力量。

伪满洲国的建立清楚表明,它完全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产物,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支持下,唆使一小撮汉奸、走狗拼凑而成的,是一个卖国的、傀儡的、殖民地化的伪政权。“满洲国”一成立就遭到东北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和唾弃。这种状况连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不得不承认说:“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成,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满洲国”在名义上是独立国,实质上则完全是日军占领下的殖民地。伪满洲国的建立,使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其预谋多年吞并东北的计划。日本虽悍然以武力妄图割裂中国,但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也是不容分割的。日本帝国主义自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到伪满洲国建立,以至此后长达14年的统治中,中国人民,特别是东北的广大民众,从未停止过反抗,始终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坚强斗争。

五、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也引起巨大震动。

国际社会,特别是苏、美、英、法等国家都作出反应;并且根据各国政府的当时政策和在华利益,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各自政府的态度。

苏联采取道义上的同情和外交上的中立政策。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又与中国东北隔江相望,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苏联国内引起很大震动。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动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和自身利害都有直接关系,苏联政府对此事件采取了在精神、道义上同情中国,但又严守不干涉主义的中立态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消息立刻传到苏联。9月19日晚,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表示对事变的严重不安,要求日本做出解释。苏联有关部门请示斯大林如何在报刊上报道日本侵占东北。9月23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发来电报,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分析:“日本的武装干涉很可能是其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美国不可能为了保护张学良而掀起一阵反对日本的值得认真对待的喧嚣。”“日本的进攻很有可能是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的军阀集团的同意而进行的。”关于苏联应采取的步骤,斯大林指出: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预,外交干预现在也不合适,因为那样只能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让他们为满洲的事情争吵起来,对我们才有利。对事变的进展,苏联要询问日本人,但同时也要询问中国人。在对外宣传上,要使人不怀疑我们是全心全意的反对武装干涉,要让《真理报》大骂日本占领者,骂国联是战争的工具而不是和平的工具。《消息报》也应采取同样的方针,但要使用温和和极其谨慎的语调,这是绝对必要的^①。在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报刊对事变的报道评论基本上是按斯大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13集,第36页。

林所定的调子进行的。也就是说,苏联政府、舆论界及广大民众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表示关切和同情,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了国联的软弱和无能以及帝国主义之间对日本实行包庇纵容的错误政策。

苏联对九一八事变,除了在精神、道义上同情中国的一面以外,还采取了不干涉主义的中立政策。事变之初,苏联就宣布:“决不采取任何办法或步骤,使现在情形更演成较困难之状况。”^①1931年10月马占山指挥江桥抗战时,苏联各报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扩大侵略,日本便怀疑苏联援助马占山。10月28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交一“觉书”^②与加拉罕。10月29日,加拉罕发表声明,力称“对于满洲冲突采取不干涉主义”,又说“其所以坚持不干涉主义,乃纯因尊重其与中国签订之国际条约,乃纯因尊重他国之主权与独立,乃纯因坚信武力占领之政策与苏联之和平政策及世界和平不相融洽。”11月14日,加拉罕又致“觉书”于日大使广田,说苏联之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乃起自不可更改历来之和平政策,乃尊重对华条约与他国独立之信念^③。1932年2月,日军占领哈尔滨,直接威胁中东路,违背了日本不妨碍中东路交通和损及其利益的许诺,但苏联为执行不干涉主义,也尽量予以容忍,尽量避免苏日之间的冲突。

美国采取不承认主义。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有较快的增长,因此,它对日本的不断扩张表示明显的不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日本武装侵略开始并未同美国发生严重利害冲突,同时美国还“预料日本将同苏联发生冲突”^④，“希望日

① 《〈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选编》第2辑,第406页。

② “觉书”,当时类似照会的一种外交文书。

③ 《列强对满洲态度解剖》,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第9页。

④ 列·库达科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39页。

本以东北为跳板,北上攻苏”^①,欲借日之力量遏制苏联。因此,美国开始采取了所谓冷静观察的方针。事变之后中国政府在向国联申诉日本侵略时,也向非国联成员国的美国提出请求,希望美国对日本施加影响。可是美国则认为:“此事尚不能视作违犯了凯洛格非战公约”,美国“并无警告日本在非战公约下所负义务之必要”^②故对中国的请求不屑作答。直到9月24日,在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致中日两国照会中才表示:“美政府与人民观察满洲已往数日间情势,认为遗憾、且极堪忧虑。”美国政府“以为国际关系应以和平原则与方法为依归,并鉴于国际订有条约数宗,其规定条款,意在设法调解各国间争端而不致使用武力。美国亦为其中数条约订约国之一,故感觉应向中日两国政府表示,希望其命令军队,避免再有战争,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令符合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并避免足以妨碍用和平方法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③美国的这个照会,不是谴责日本军队的侵略行为,而是笼统地希望中日双方以和平原则,按国际条约解决争端,避免战争,实际是迁就日本的侵略欲望。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1月7日,美国政府分别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最近锦州方面之军事行动将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满最后存留之行政权威破坏无遗。美国政府仍深信国联行政院近日所派之中立调查团必能使中日两国间现时困难终得解决。但美国政府鉴于目前情势及其自身之权利与义务,认为有对于中日两国政府作下列通知之义务:即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为合法。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订立之任何条

① 颜声毅等:《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页。

② 《辽吉被占纪实,各国态度》,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第19页。

③ 《东北日祸反响录、美政府态度之正式表示》,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第7页。

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条约上之权利及中国之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违反国际上关于中国之政策,即通常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者,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又,凡以违反 1928 年 8 月 27 日,中日美三国均为缔约国之巴黎公约之方法而造成之情势或缔结之条约或协定,美国政府亦无意承认。”^①美国政府的这个不承认主义照会,反映出对日本继续扩大侵略的行为的不满情绪的一面,也反映了美国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的一面。史汀生在 1 月 8 日发表一项补充说明称:“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的权利,美国不拟过问日本任何事件,惟此事件不得破坏美国的权利。”^②这就更充分表明了美国“不承认主义”的实质。

英国采取偏袒、姑息的消极立场。在九一八事变之初,英国就注意到日本的行动。但是,英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不如在关内那样强大,而日本最初只是东北一隅的军事行动;同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幻想日军北上进攻苏联,故对日本采取袒护、纵容和妥协的政策。9 月 24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个正式声明书,内中极尽颠倒黑白,掩盖侵略之能事,竟称:“无决定使事态更行扩大之方针”,“帝国政府于满洲无任何领土的欲望。”^③声明书发表后,英国驻东京大使对日本外务省的官员说:“英国政府将不作任何建议,也不参加任何意见。”^④

当中国在国联会议上对日本的侵略提出照会时,英国代表则在国联呼吁中日两国“运用一切可能的和平手段去阻止可能很快变成

① 韦罗贝:《中日纠纷与国联》,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83 页。

② 《中美关系史料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5 页。

③ 陈觉:《国难痛史》(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81—1082 页。

④ 赛沃恩奇雅诺夫:《美国在确定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中的积极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2 页。

战争行动的敌对行动”的同时,又对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施加压力,阻止中国要求制裁日本,要求中国“放弃一切使用武力的打算,纯靠诉诸理性来解决问题。”英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和蛮横态度不仅不予谴责,反而给予同情和辩解。竟称:“当前的危机是由于中国人故意采取破坏这些权益和尽其所能地用一切办法鼓励反日情绪政策造成的”,甚至提出,英国应当让中国人明白他们不应当继续存在“国联将扮演警察的角色并为了中国人的利益把日本驱出满洲”的错觉。英国对日本却十分真诚地表示,应当让日本人了解英国“同日本的传统友谊和对日本的钦佩仍然是我们远东政策的主要动力之一,日本应当了解,从日本的灾难中,英国不能获得任何利益,而日本的繁荣却是英国政策的目标之一。”^①11月11日,英国内阁会议再次讨论中日冲突,内阁一面认为“应当维护国联”,但同时又担心刺激日本,所以又确定只“应当是调解,避免暗示威胁”的政策,并将这一方针作为新任外交大臣西蒙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的行动方针^②。由于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国,英国则实际上处于盟主的地位,英国在国联的主张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和影响了国联。英国的主张,一面企图用国联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日本;一面又怕刺激和得罪日本。英国的这种两面政策本质上是对日本侵略的偏袒、迁就、姑息和纵容。

英国舆论界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反映不一,有的倾向同情中国。《孟澈斯导报》于1931年10月发表消息指出:“日军侵占满洲乃是一种经过了细心计划的行动。日代表谓‘地方事件’真是荒谬之谈。”这家报纸又连续发表文章指出:“日本暴行已为清议所不容,”“锦州如果失守,其情形尤为重大,盖以东省将全归日本掌握。”保守党的机关

①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②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报《泰晤士报》由于受英国政府态度的影响,在事变之初即为日本侵略行为进行辩护。9月20日,该报发表评论认为:日军所以发动武力进攻是因“日人忍受迭次攻击,极为忍耐,中国国民党政治家与宣传人士,不承认日本在满洲之重要利益,以及中日合作有重大利益促成一种不安现象”所引起的。《泰晤士报》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辩护,仇视中国人民的言论,在当时世界各国舆论中也是不多见的。

法国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采取观望乃至纵容的态度。法国是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在中国获得的“权益”,主要在华南地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与其在华利益影响不大,所以“法国舆论有意为日本张目”^①，“法国的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报纸竟吹捧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②一家报纸发表诬蔑中国的文章说：“中国加入国联乃根本错误,因中国未有切实勘察的手段之边界,切不能实行其国家之义务。”^③法国不想因同情中国而影响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同时,法国在反对苏联的立场上与英美等国家是一致的。他们都期望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进攻苏联,因而是采取观望纵容的态度。法国是国联的主要成员,是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外长白里安是非战公约的发起人,曾一度在国联担任行政院主席,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有决定性的影响。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张,日本的行动可能危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时,法国对日本纵容、妥协的消极态度才稍有改变。

法国民众和法国一些报刊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活动也有评论,表现一定程度的客观、公正立场。法国《人道报》于9月20日撰文指出：“日本的军国主

① 《列强对满洲事变态度解剖》,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第1页。

② 转引自方连庆:《现代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③ 《东北事件之国际舆论》,载《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20页。

义巧于利用中村大尉事件而出此行动,其实日本乃欲在满洲确立其势力以挫俄国的势力。这就是法国反共产党新闻的大多数偏向日本的原因。”^①《巴黎晨报》于1931年11月间两次发表文章批评国联在处理中日事件时软弱无能。法国民众和一些社会团体有的召集会议,反对日本侵略行为,有的致电国联敦请主持公道。法国总工会、教职员联合会、保障人权会、工人生活联合会、妇女选举运动会等10余社会团体于11月23日在巴黎召开联席会议,“要求国联对于中日纠纷主张公道,至不得已时应用国联公约第15条以惩罚日本。换言之,即用经济绝交、武力制裁亦所不惜。”^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世界各国反应虽各不相同,但各国大部分民众都能主张公道。德国《柏林日报》、《前进报》、《福锡志报》及意大利的《台勃兰》报等都撰文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批评国联袒日的软弱无能。还有一些中小国家如危地马拉、秘鲁、巴拿马、波兰等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愤慨,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目睹国联偏袒日本和软弱无能,深感此种以强凌弱的强暴行为如不予制止,必有害世界安全。

国联调查团的活动。1931年9月19日下午,国联举行第65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时,中国代表施肇基已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9月21日,施肇基遂正式向国联秘书长照会,提出对日本侵略东北的控诉,要求:“国联殊有依据盟约第11条之规定采取相当行动之必要。故本代表奉本国政府训令,请行政院根据第11条所赋予之权利,立即采取步骤,阻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以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数额。”

^① 《东北事件之国际舆论》,载《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9页。

^② 《国联处理中日纠纷经过》,载《国联周报》第9卷,第17期附录,第5页。此处原文有误,按国际联盟公约规定,用于惩罚手段,如经济制裁等原则,应是第16条。

自中国政府向国联申诉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事件后,到1931年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先后召开20次公开会议和无数次秘密会议,并形成9月30日、10月24日、12月10日等3个决议案,敦促日本撤兵或限期撤兵,避免冲突,扩大事态。但是由于国联内几个主要成员国对日本侵略者袒护包庇,姑息纵容,加之国联的软弱无力,因而未能采取积极的措施,其形成的决议案,对日本没有任何约束力。

1931年底,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挥师南进,攻击锦州,直接威胁西方各国的在华利益,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决定组织调查团。参加调查团的有美、英、法、德、意5国的成员:英国李顿伯爵,美国佛兰克洛麦考易少将,法国亨利克劳德中将,德国恩利克希尼博士,意大利马克提伯爵。李顿为团长,故又称此调查团为李顿调查团。根据决议,中国派顾维钧,日本派吉田为调查团委员襄助调查团工作。国联秘书长派秘书厅股长哈斯充调查团秘书长,同时还派一批工作人员及译员。调查团还聘请美、法、加拿大等国专家多人协助工作。

国联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法国出发开始调查活动,先后到达日本、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会晤各界人士,收集资料,听取意见。调查团于4月20日到达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的东北,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旅顺、抚顺、锦州等地调查,并与伪满洲国执政溥仪,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及伪满洲国政府中官员会晤。调查团还接见了由日伪当局拼凑起来的“人民代表”。而东北各界的爱国志士、知识分子,在调查团活动期间则处处受到日本宪兵的“保护”、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给调查团呈交代表东北民意的信件、请愿书。

调查团在东北活动46天,于6月9日返回北平,分析研究调查所得资料。7月20日,在北京开始起草报告书的工作。1932年9月初,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全部整理完成,并将报告书正本送国联行政院。

报告书摘要于9月末分送中国与日本,并规定在10月2日于日内瓦、南京和东京同时发表。报告书有绪言,第1—10章,前8章为历史事实的概括与叙述,第9、10两章为调查团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原则及条件和向国联行政院之建议。

调查报告书如同国联受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案件一样,其基本倾向是牺牲中国主权,姑息日本的侵略行为,但也有明显的两重性。

一方面,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以殖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在承认并维护西方列强在华既得利益、维护门户开放原则,承认和维护日本在华,特别是在东北的特殊地位、特殊权益的前提下进行调查整理的。在如何解决由于日本侵略东北挑起的中日冲突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损于中国主权的荒谬主张。报告书称赞日本开发东北的“功绩”,几乎全部肯定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东三省取得的特权和特殊地位,对于日本为维护其特殊权益与中国发生纠纷表示同情和谅解。报告书提出了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建立满洲自治政府实际是国际共管的荒谬主张。报告书提出:首先组成一个由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和当地人民代表组成的顾问会议,并由中立观察员协助;中国政府发表宣言同意在东北实行高度自治,组成特别制度的满洲自治政府。中国政府宣言,要照会国联及九国条约签字国,使之有国际协定之约束性质。报告书提出在东三省武装驻兵权是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其他中日两国武装应退出东三省。报告书还提出满洲自治政府要给予日本更多的利益,满洲自治政府的顾问中,日本人应占一定比重。按照报告书的条款,东三省的自治政府实际上成了在国际共管制约下,保护日本既得权益的半殖民地政权。

另一方面,调查报告书也适当地保护中国主权,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和与日本辩解的言论有所揭露,在一些问题上,作了公正和符合实际

的结论。主要是,批驳了日本在国联会上诬蔑中国并非是一个主权国家和日本关于“满蒙非支那领土特殊地域”的谬论。对日军南满铁路守备队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和揭露。原来在1905年俄国把南满路转让于日本时,中国对日俄和约中继续保留两国护路军队不予承认。1924年中俄协定中,俄国放弃了设置守备队;而日本则以中国无力保护外人为由,仍坚持设守备队。报告书认为:因“日本铁路守备队各项之争执,引起很大困难”,并“足以表现两国政府之根本冲突”。因日本守备队而引起的纠纷,不仅限于铁路区以内之驻扎与活动,还时常在铁路毗连地带行使警察之职权,而且不经中国当局许可,在铁路区以外实行操演,毁坏中国农作物。此种行为,中国官民一致痛恨,认为不独于法律不当,且易惹起不幸事件。报告书否定了日本关于九一八事变系出于自卫手段之说。报告书指出:“以日本内部各种经济政治因素,致使日本人民对于满洲要求重采‘积极政策’者由来已久”,加以工商业不景气,形势日趋紧张,日本主张“在满洲采取直接行动”,并于事变前“确有充分计划应付中日间发生之战事”。“这种计划在9月18日至9月19日夜见诸实行”。结论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夜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报告书否定了伪满洲国政权。报告书指出,日军占领一切重要城市之后进行民事行政机关改造,脱离中国统治,进行独立运动。调查团“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满洲国成立,一为日本军队在场,一为日本官吏之活动”,“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结论是:“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成,此所谓满洲国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一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调查报告明确认定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是合法自卫手段和否定满洲国这两个条款,直接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阴谋。然而,日本竟在1932年11月国联行政会议决定将报告书提交国联大会表决投票时,

不参加投票。1932年12月,国联组成的19国委员会,依据调查团报告书形成一份提交国联大会的报告书,在报告书第三部分《争议之主要特性》一节指出,九一八事变争议之地属于中国主权,九一八之夜日军行动不能认为自卫手段,满洲国的成立,不能认为自动与真实之独立,中国人不拥护这种政府。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1票通过了十九国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对日本的劝告书。日本在国联大会遭到孤立和谴责。为了摆脱国联的束缚,日本遂于1933年3月27日发出通告,退出国联。国联竟无能为力。

从这一过程中,可以看出,国联的任何行动,不仅未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反而使其变本加厉。这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依赖国联主持“公理”、“正义”的不抵抗政策的惩罚和教训。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回答这个报告书。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靠自己武装起来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才是唯一出路。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 城乡人民的反日斗争浪潮

一、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抗日号召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采取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提出收复失地,坚决抗日的正确主张。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同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发表《满洲

事变宣言》；9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于9月25日、30日和10月12日连续对满洲事变发表宣言和告全国民众书。这些宣言、决议、告民众书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和武装占领满洲的目的和本质。中共中央指出：九一八“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①“其鲜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②他们所以迫不及待地发动这场战争，一是想“增加他在满蒙、华北统治，来解决国内经济危机”；二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功，”“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也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他们感到需要靠“公开军事武装干涉”来抵消社会主义力量在远东的“增强与巩固”，挽救他们在中国的统治；三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内部纷争给他们以可乘之机。中共中央认为，要维护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统一，就不能存有幻想和侥幸心理，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反抗日本侵略者。

第二，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命令自己军队无条件的缴械与投降，将千百万的劳动群众给日本帝国主义者蹂躏、虐杀、奸淫与剥削，而事变时亦只有空口的抗议，‘镇静’的外交，向强盗机关（国联）乞求，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或者在纪念周上大哭一次，而实际上更加紧对于群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16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96页。

众的民族自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残酷镇压。”决议指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给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当了“开头先锋。”^①只有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自己与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一致联合起来,才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与消灭他们的一切侵略。

第三,提出了武装抗日的号召和对日斗争的策略,指明了中国人民大众的抗日斗争前途。中共中央的决议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上来。”“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士兵的切身具体要求,发动他们的斗争,”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要由广大民众自己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中共中央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②“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们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③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前途问题,中共中央指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18页、419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98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23页。

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毫无疑问地激起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这个民族觉醒能够很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急剧高涨中的反帝运动的高潮,将以更大的力量向前开展。”^①在东三省被日本占据之后,“像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的以至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的民族自由与独立而斗争。”^②这就指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不仅不能使中国人民大众屈服,而是会很快地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斗争高潮。

地处反日斗争最前线的东北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即注视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早在1931年春,中共中央派罗登贤^③、李实^④(魏抱一)等先后到东北巡视工作,他们和中共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在实际斗争中已经察觉到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动一场事变,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共满洲省委于4月给中央的报告里指出: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深,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满洲,“他还要直接占领满洲”。报告还详细提供了日本在东北各地的驻军、武器装备、修建兵营、工事,组织军事演习及不断增兵等情况^⑤。这说明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20页。

②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5页。

③ 罗登贤(1905—1933)化名达平,广东顺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六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0年以中央驻满洲代表身份来东北协助满洲省委工作。1931年12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12月调回上海工作,1933年8月英勇牺牲。

④ 李实(1903—1983),原名魏抱一,又名魏维凡,湖北襄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石地委宣传部长、农委书记。1932年7月后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书记等职。新中国建立后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司司长等职。1983年病逝。

⑤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1年4月2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6、7页。

中共满洲省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变是有所察觉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即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告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书》。9月21日,省委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9月22日,省委就日军占领东北后的各种情形及今后工作布置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9月23日,省委又作出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中共满洲省委在上述文件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揭露了国民党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强调要向广大群众指出这一事件的意义,加紧揭露国民党欺骗作用,用尽一切办法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扩大宣传,特别要加强中国、韩国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与组织,加紧在日本人的一切企业开展斗争,号召广大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决议强调:“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及东北地方党组织,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批判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指出了中国人民大众反日斗争的大方向,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1年9月1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49页。

二、全国人民掀起反日浪潮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撼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目睹大片国土沦丧,人民惨遭杀戮,国民政府忍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抗日浪潮。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各种反日团体相继建立,各界民众团体、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从9月19日起,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纷纷举行各界抗日救国大会,游行请愿,要求政府抗日。中共北平市委作出了“迅速团结革命势力,发动群众领导和参加各种反日团体,开展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的决定。”^①根据这个决定精神,北平不少学校将学生会改为“抗日救国会”或“反日会”,并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日。9月20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华北中学等校学生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速息内战,武装民众。”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也相继召开了教职学员大会,发宣言、通电向全国呼吁抗日。北京大学学生在通电中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焚杀劫掠的罪行后,指出:“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华北中学一学生在讲坛上演说,悲壮感人,啮指血书“中华民族精神不死”、“中华民族万岁”等字。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出《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告民众书中批评南京政府“只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向民众宣布无抵抗主义”,要求民众“力持镇静,不可有激烈反日行动”等软弱无能、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

^①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党史研究小组编:《中共北京地下党斗争史》,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呼吁全国工农学兵商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动员整个民族、全体群众只有“作反日帝国主义的有力的战斗才能自救,才能抵抗国内日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卖国汉奸的压迫、阻挠与捣乱。”^①与此同时,上海市从9月24日开始,有10万大、中、小学生掀起了反蒋抗日浪潮,举行罢课、示威游行;上海码头工人3500余人举行反日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10余万各界群众举行反日大会,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太原、济南、长沙、芜湖、杭州、南昌、徐州、重庆、桂林、厦门、汕头等城市的工人、学生、商人、市民也都纷纷集会请愿、集资捐款、抵制日货,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

9月下旬,日军在东北继续扩大军事占领,国民党南京政府仍持所谓严肃镇静态度,任凭日本侵略者横行肆虐。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迅速出兵抗战,以武力收复失地。9月20日,南京各大中小学2万余人先后到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9月25日,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请愿团56人,代表上海26所大中学赴南京请愿。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学校学生5000余人到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完成和平统一;对日下最后通牒,积极备战;撤换不力外交当局;恢复民众运动;切实施行军事训练;厉行革命外交”等要求,愤怒的学生到外交部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迫使蒋介石几次出面接见学生,答复质问。

11月,日军继续侵占辽、吉之后,又向黑龙江进犯,全国抗日浪潮更加高涨。11月5日,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由东北流亡来北平的各大学学生及旅平东北民众各团体组成,公推冯庸、王化一、卢广绩、苗可秀、高建国等为代表团负责人。代表团经津浦路南

^① 陈觉:《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908—910页。

下,于11月7日到达南京,发表了请愿书和宣言。在宣言里对南京政府慨切陈词:“诚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难当前,不容再事内争,自取覆亡,”呼吁国民党当局要“努力奋斗,团结对外,共挽劫运,雪我国耻。”宣言书对南京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幻想依赖国联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错误主张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在此国家存亡关头,喧嚣月余不闻有对外办法,实力准备,徒依赖国联决议”,认为这种“自不努力团结,空望人助”的做法,是“自取覆亡之道。”宣言书还质问国民党:“东北民众,何负于领袖诸公”“何诸公坐视敌人凶残如是,竟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同时提出:完成统一,收复东北失地,对日宣战,缉拿汉奸等八项要求。代表团负责人之一高建国,在蒋介石接见请愿团时仗义执言,说:我们“向蒋主席请示一下,政府是否还要东北三省?”,对东北民众被日本屠杀或流为乞丐的惨状,“党国领袖诸公,曾发过恻隐之心?”蒋介石被问得无言以对,恼羞成怒,指责代表团说话“未免过火”。

11月末,南京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企图以承认日本占领东北来谋求对日妥协。学生闻讯更加愤怒,又一次掀起前往南京示威的高潮。11月末和12月初,北平各校学生又组织了赴京请愿团。12月4日,北京9所大学要求南下请愿,受到国民党当局破坏与阻拦。中共北平市委积极领导了这一斗争,在请愿学生中成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建立了行动委员会。在全市人民和铁路工人的帮助下,代表团数千学生于12月7日经天津、济南南下,山东学生也积极参加示威请愿活动,队伍增至7000多人。在请愿学生中,由于国民党当局暗中插手,一部分受国民党控制的学生组成的“请愿团”极力阻挠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学生“示威团”的活动。12月10日,请愿学生到达南京后,示威团与南京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与南京各界群众一起,联络各地到南京请愿学生于12月17日举行了

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南京政府后,蒋介石不仅不接见学生,反而调军警镇压。在学生与军警冲突中,学生死1人,伤数十人,并有三四十名学生被捕。这次示威活动虽然遭到蒋介石集团的血腥镇压,但却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真面目,大大振奋了工农大众的抗日情绪。

在学生和工人抗日救亡的推动下,全国各界群众和社会名流,都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通电和宣言中,批评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要求应当机立断,“处变勿用徘徊”,“勿再迟疑,致蹈亡国灭种之祸。”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对日宣战,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一时间,抗日救亡浪潮遍及神州大地,停止内战,收复失地,抗日救国的呼声已经成为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和一致要求。

三、东三省人民的反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迅速投入到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之中。

9月19日,沈阳正处于日本侵略者的硝烟烽火之中,中共满洲省委冒着极大危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和发动群众进行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会议决定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和党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及抗日主张写成简明的传单标语迅速发到全东北各地。省委要求各级党团组织“积极的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做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立刻紧急动员党内全体同志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随即在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城市的街头出现了“我们之所以遭到帝国主义的屠杀,是因为国民党军阀采取投降政策的结果,同胞们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等内容的标语传单。

沈阳被日军占领后,群众性的公开反抗活动虽然非常困难,但是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还是出现了自动停工、停市和停课斗争,以示抗议,有的工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反抗斗争。由于市内工厂倒闭,商店关门,工人失业,市民们忍饥挨饿,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日本侵略者却把城内各粮店仅有的粮食掠走,供其扩大侵略战争之用。奉天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永盛在省委的领导下,组织兵工厂工人开展抢粮斗争。他们以兵工厂厂主无故扣发两个月工资并携款出逃为由发动工人,于9月21日上午将兵工厂粮栈存粮抢劫一空。随后,奉天火柴厂的工人们也组织起来,砸了厂内的粮仓,抢光了粮食,并有上千名工人闯入沈阳南站,抢夺了日本从大连运来的军粮。抢粮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重重一击。

继兵工厂抢粮斗争之后,又发生了皇姑屯铁路工人包围厂长办公楼事件。皇姑屯铁路工厂工人在党支部的发动和领导下,由共产党员李春华等人指挥,于9月27日上午10时齐集厂办公楼前,高呼“要工资”、“要饭吃”等口号,要求厂方答应工人提出的工人上班要发工资,时局紧张时要把家属送回关内,不准延长工作时间等项要求。最后,厂方终于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加紧镇压旅大人民的反抗,禁止中国人集会,对原有的各商会、同乡会、同窗会等团体也严加盘查,一经发现反日活动即予以残酷镇压。在此危急的情势下,中共大连特支于9月30日发出《敬告大连工友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以军队占领沈阳,南满和大连已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全市人民必须与日本殖民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支持抗日运动”。在党的号召下,抗日烈火很快燃烧起来。

安东地区是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地区,当地群众富有爱国反日的光荣传统。九一八事变更加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慨。9

月末,安东缫丝厂厂主依仗日本势力降低工人工资,把曾领导过罢工斗争的工人代表驱逐出厂,并诬其为共产党嫌疑,将其引渡给日本警察,致使6人被捕。全厂工人愤怒已极,不顾日本侵略者的残酷镇压,400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其它一些厂也相继举行罢工。罢工斗争虽遭镇压失败,但却表现了工人阶级反抗日本侵略的大无畏精神。

1932年“五一”劳动节,中共奉天特委向全市基层支部散发了《告奉天工农劳苦群众书》5月23日,辽阳小堡“农民大同盟”以“穷人会”名义散发传单标语,提出:穷人要分粮,工人要工钱,士兵要军饷,打倒满洲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各地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广泛发动各族群众,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长春市委提出“没收敌人武装,拿起刀斧梭标单枪,动员和组织群众,起来抗日”的口号,并在公园举行飞行集会,决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他们还到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激发民众的反日爱国热情。中共西安(今辽源)特支发动煤矿工人罢工,组织抗日救国会,动员工人参加抗日武装。

9月28日,中共东满特委召开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委紧急会议,制定了《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紧急决议案》、《东满农民斗争纲领》、《士兵运动决议》、《反帝决议案》、《反对日本占领满洲东满特委告群众书》等文件。由于各县的积极行动,东满人民的反日斗争迅速开展起来,同时有数万农民展开了秋收斗争。在和龙县日本总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侵略罪行。

中共磐石、海龙中心县委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方面要求各基层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在县城贴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本滚出满洲去”等标语;一方面召开各县会议,掀起了以向地主要粮的秋收斗争。他们发动群众集会游行,揭露

日本侵略的罪行,并向各族劳苦群众发出团结抗日的号召。这些群众性的反日斗争为后来创建抗日武装打下了思想基础。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鼓舞了黑龙江省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共北满特委和哈尔滨市委组织发动工人和学生进行反日斗争。1931年9月20日晚,愤怒的工人和市民砸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和日人经营的《日日新闻》报社及朝鲜银行。9月26日,哈尔滨市知识分子、工人、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其它各校也纷纷成立了联合会、读书会,全市成立了反日总会。一些工厂、大中专学校组建了“工人赤卫队”、“学生军”、“抗日救国义勇军学生大队”等抗日组织,并开展军训准备杀敌。9月28日,哈尔滨市街上贴出中共北满特委和哈尔滨反日总会的传单,号召全市人民一致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哈尔滨反日总会还出版了油印小报《民众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齐齐哈尔军械厂的工人,加班加点,赶制武器,准备杀敌。佳木斯市桦川中学爱国师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游行示威;松花江岸各码头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略,拒绝为运往日本的大豆、煤炭装船。1932年2月,哈尔滨电业、邮电工人,鹤岗煤矿工人,通河、珠河农民相继举行反日示威。呼(兰)海(伦)铁路千余名工人展开索要欠薪的斗争。3月,哈尔滨反日自救会、反帝大同盟等民众团体纷纷集会,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反对伪政权成立,拒绝参加伪“满洲国”成立的庆祝大会。不久,中共哈尔滨市委发动中东路铁路总工厂、电车厂等工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召开反对成立伪满洲国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

北满和哈尔滨的反日斗争,虽然遭到汉奸张景惠派来的军警镇压,但人民群众并未被敌人吓倒,仍以各种方式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

9月22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辽宁省外交协会会长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省工商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等人,先后离开沈阳到北平。他们与九一八事变前在北平的王化一酝酿组织东北抗日救亡团体事宜。此意得到张学良将军首肯,并对东北军部分将领参加群众抗日团体表示默许。经分头串联,得到东北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这样由“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和“救国会”三个抗日团体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9月27日,东北各界人士400余人,聚集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院内召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大会选出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黄显声、彭小秋、霍维周、熊飞、车向忱、杜重远、陈先舟、王卓然、张希尧等31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通过的救国会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①规定了入会条件,决定建立相应的机构。大会一致通过了《告东北民众书》为救国会成立宣言。宣言控诉了日本侵略者践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掠我财物、烧我房屋的罪行,呼吁中国当局:“善机发动,放弃私利,捐除成见,以国难为前提,集中全国人材实现统一的国家,对日宣战,收复邦家。”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由爱国人士和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的民众抗日团体。中国共产党对救国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极大地影响了救国会,救国会的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是完全一致的;组织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以及党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在救国会中起着骨干作用。各项具体工作多由他们承担,而中国共产党正是

^① 《王化一日记》1931年9月29日,存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研究所。

通过他们的工作,对救国会给予指导和帮助。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较深,大多在思想上同情中国共产党,后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或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甚至也有一部分青年党人通过在救国会的一段经历,逐渐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救国会在抵制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动员和组织民众进行反日斗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做了大量工作。其一,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危害,广泛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唤起民众觉醒。他们组织请愿团赴上海、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向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创办《救国旬刊》、《复巢月刊》、《东北通讯》、《东方快报》等刊物,及时准确地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消息,揭露日军暴行,并大力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还组织宣传队,沿平津、平汉铁路沿线,深入城镇和乡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其二,大力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该会派出一批爱国人士秘密出关,联络和策动原东北军官兵举旗抗日。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集资金,购买武器和军用物资,支援义勇军作战。他们还整编义勇军队伍,指导义勇军的斗争。其三,培养抗日骨干。1932年7月举办了西山干部训练班,从东北学院和东北大学抽调进步学生,在北平西山卧佛寺秘密进行军事政治训练。训练班共有东北籍青年100余人。10月,训练班结束,大部分学员被派往东北。通过训练,使学员认清了国民党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本质,确定了跟着共产党走,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任务而斗争的方向。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建立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

当时,正在上海办理长江水灾赈济工作的爱国人士朱庆澜(朱霁青)同吉鸿昌、查良钊、凌勉之等人酝酿成立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

援会,以推动东北的抗日救亡工作。

1932年春,朱庆澜到北平会见张学良,提出本着抗日救亡的大义,要在北平设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以推动东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之请求,当即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和支持。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迫于全国的抗日浪潮及各方面的压力,勉强以政府的名义拨送卡车若干辆赞助后援会的活动。自此,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在北平成立,朱庆澜任会长。抗日后援会成立后,朱庆澜利用个人在国内外的影响,曾两次通电全国,呼吁全民抗日救亡,为抗日部队捐款捐物。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人华侨积极响应和支持,有的慷慨解囊,踊跃捐献,有的办理募捐事宜^①。后援会曾多次组织人员到前线慰劳抗日作战部队。朱庆澜等曾同张学良、张作相等到热河省承德慰问抗日军队。后援会不顾南京政府的阻挠,派人到黑龙江、吉林给予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丁超、李杜、王德林、李春华等部以财力、物资和精神上的支援,并将战斗消息及时向后援会汇报。

由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协定》,日本侵略势力已伸向华北,北平已成为日本军警特务公开活动的地区,当局对抗日救亡活动采取高压政策,后援会的活动很困难。同时,因张学良下野,朱庆澜去上海治病,后援会失去主持人,遂于1934年结束活动。

^① 朱德君:《回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的片断》,载《齐齐哈尔文史资料》(1986年),第3—4期。

第二章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支持，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

一、中国共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东北，坚决进行抗日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东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与拥护。日本侵略东北，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民族危机尖锐化，使惨遭屠杀、受侮的东三省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冲破不抵抗政策的禁锢，组成反日军、自卫军、救国军、工农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武装，揭竿而起，奋起抗日。这些抗日武装由民众自发组织而成，是实行民族自卫对日作战的义举，统称其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是最早奋起从事武装抗日斗争的先驱。抗日义勇军的兴起、组建和在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领导与协助。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在抗日义勇军兴起、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通过斗争实践，逐步形成了党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斗争的方针，其主要内

容有:

第一,预见到武装抗日斗争形势会很快出现,提出了党对义勇军的领导责任。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预见到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不仅东北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而且有一部分东北军官兵,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极为愤恨,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极为不满,这对于发动东北广大军民进行武装反日斗争十分有利。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派干部到南满、北满、中东路、吉长路沿线以及台安、辽阳、皇姑屯西北一带的东北军中进行工作,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发动他们反对日军缴械和反对国民党长官不抵抗命令的斗争。在有党组织的东北军部队中和已经发动斗争的部队里,要把上述斗争和当地工农群众的斗争结合起来,反抗日军的进攻,或把队伍拉到农村去,共同抗日。

1931年10月中下旬,当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刚刚兴起之际,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以伍豪笔名在1931年10月《红旗周报》第20期上发表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的文章。该文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工人及农民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1931年末、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多次分析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人民武装反日斗争的形势时指出“目前满洲各地农民群众,在反日的愤怒中,自动武装起来,实行驱逐日本出占领地,有些地方已完全被义勇军占领,并开始实行游击策略,给日本帝国主义空前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调动大批军队消灭义勇军,农民反日义勇军一方面走向挫折失败;另一方面则是党能够打入义勇军中去树立党的领导,开始游击战争。因此,目前满洲党的

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努力发展反日斗争，尤其是要设法打入与领导农民义勇军反日的革命战争”^①。同时强调在义勇军中加强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批评了一些地方党组织放弃对义勇军领导的错误倾向，指出，“满洲士兵与农民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中央给以正确的估计，中央指出这个战争是反对侵略的，因此，我们党的任务是加入这一战争，夺取这一战争的领导。”^②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强调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对武装抗日斗争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二，中共满洲省委实行工作重点转移，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义勇军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党组织工作重点在城市，不断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形式的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城镇逐步为日军占领，城市党组织活动十分困难，而农村这个广大区域则尚未被日军完全占领或虽已占领但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农村原有的乡团、保甲武装遍及各地，加上一些被日军击败的东北军溃散到农村，有的与保甲武装联合，有的和当地一些绿林武装结合，组成许多小股抗日武装，急需派人加强引导和协助。鉴于这种形势，以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审时度势，把省委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广大农村，把奉山、南满、安奉、中东、吉海、吉敦、吉长等铁路沿线的农村、山林地带及松花江、牡丹江流域沿岸农村以及辽西等地作为重点地区，以部分东北军小股部队和农村民众及民团保甲武装为主要对象，进行抗日义勇军的组建工作。

为了更好地开展义勇军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从1931年10月起，先后派遣5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还

^① 《满洲工作近况》（1932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183—190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1932年3月3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52页。

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选派骨干到义勇军中从事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也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选派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展活动。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领导或协助的几种具体方式:一是由党组织派出党团员直接组织和创建工农义勇军队伍;二是派出党团员协助一些义勇军部队进行组建工作,参与对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领导;三是党组织派到义勇军部队中工作的党团员发挥模范骨干作用;四是动员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参加义勇军,动员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募捐、支援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也经常到各地巡视,督促检查各地党组织对义勇军的工作,并进行具体指导和帮助。中共满洲省委在普遍进行义勇军工作的同时,还选派训练得力干部到几个中心部队,如西北线马占山、苏炳文的队伍,东线李杜、丁超、王德林的队伍,以及李海青、宫长海、冯占海、唐聚五的队伍进行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实现党的领导与培养领导骨干。

第三,提出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纲领。为了进一步发动民众起来抗日,中共满洲省委提出了满洲民众义勇军及一切劳苦群众反日战争的纲领,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义勇军的进攻与屠杀群众;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号召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工农义勇军,创造红军,武装保卫中国,保卫满洲劳苦群众;号召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与义勇军联合反对长官妥协、投降、归顺;号召农民自动武装起来,革命的学生自动武装起来,与民众团结一致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号召中韩满蒙被压迫民族一致联合起来,共同抗日^①。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以自己的坚决性与敏捷性来动员无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全满洲劳苦群众的斗争纲领》(1932年4月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73-80页。

产阶级与一切劳苦群众加入与扩大反日斗争。动员党的干部打入一切救国军中,加紧在士兵中的鼓动宣传,组织士兵委员会与党的支部。对于真正能在党的领导之下的乡团及其他队伍,应加强对其进行政治军事领导,建立反日的民众联合。

第四,指示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义勇军的斗争,批评忽视义勇军工作的倾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指示给各地党组织,指出,满洲各地,从黑龙江、辽西、安奉路沿线,南满、东满、北满,中东路东西线、哈长线民族义勇军、革命的士兵与一切劳苦群众英勇的、光荣的拼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独立政府”,与其展开拼死血战,进行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一切有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地打击。但是,一些地方党部,“并未能清楚的认识到义勇军工作的重要,还未能清楚的认识到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与党的领导的重要。”“有些同志,一方面认为义勇军是胡子土匪而消极不理,或企图以上层的勾结利用来代替真正的艰苦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则空喊‘变义勇军运动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却拒绝广大群众要求武装斗争的领导与放弃利用一切可能打入义勇军中去树立我们的革命工作。”^①省委严肃地指出:“如果忽视了义勇军的工作而不去加紧进行义勇军的群众工作,那简直是罪恶!必须对义勇军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转变。”省委号召各地党组织要组织好各类义勇军,如工人义勇军,农民义勇军,学生义勇军,要建立党独立领导的工农义勇军,特别是工人的模范义勇军,以加强工人阶级在义勇军的核心;在反动领袖所操纵的义勇军、反日军、救国军等组织,各级党部要利用一切可能去进行工作;对红枪会、大刀会、黄枪会这些原始的群众的反日武装组织,要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110页。

我们在里面进行极其艰苦的工作;要在义勇军、反日的武装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积极开展援助义勇军的工作^①。在义勇军活动范围的区域内,坚决的进行公开的工作,组织慰劳队、开群众大会、军民联欢会等,出刊拥护义勇军运动的小报,宣传义勇军。

第五、号召广大民众支援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义勇军起于民间,无粮无款,同强大的日军作战,没有民众的支持和援助是不可能坚持的。为推动广大民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1933年3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了援助义勇军运动周活动,提出拥护义勇军运动周的口号。主要有:义勇军是民众抗日反帝的武装队伍,拥护义勇军!义勇军是民族革命战争的民众武装组织,援助义勇军!义勇军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战,工农劳苦民众们,拥护义勇军!开展义勇军运动,扩大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募集捐款、物品、药品及一切军用必需品赠送义勇军,一个人捐一个铜子给义勇军!组织义勇军后援会,扩大拥护义勇军运动!一切劳苦民众自动供给义勇军的给养——粮食、衣物、住所。工农学生和劳动妇女们,组织看护队、洗衣队,帮助义勇军!组织慰劳队到前线去慰劳义勇军。工友、农民、学生们,一切劳苦民众们,到义勇军中去,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工友、农民、学生们,一切劳苦民众们,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进行革命的反日战争!工友们开展罢工斗争,反对进攻义勇军与援助义勇军作战!工农学生及一切劳动民众们,组织交通队、输送队、侦察队实际帮助义勇军弟兄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②。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第113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义勇军运动周的口号》(1933年3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第39页。

这些口号深得各界群众的拥护。他们纷纷起来,采取各种形式支援义勇军的斗争,鼓舞着广大义勇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斗志。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处于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因而,党对义勇军的方针政策也必然受到“左”的影响。主要是,忽视或看不到东北军部分将领抗日斗争的主流,一味片面强调或夸大东北军抗日将领的所谓反共和妥协投降一面,对义勇军上层领导人实行打击排斥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党对义勇军的领导和在义勇军中所开展的工作。

二、马占山率部进行江桥抗战

日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后,沿四(平)、洮(南)路向北进犯,急于侵占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931年9月22日,日军驻长春独立守备队经四平街沿四洮路侵占郑家屯(郑家屯)。由于中国驻军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率部投降,把部队全部撤到城外,日军兵不血刃,于9月25日占领洮南,并以委任张海鹏为黑龙江省长、接济军火、扩充其实力为诱饵,策动张部进犯齐齐哈尔,侵占四洮、洮昂铁路。日本企图驱使伪军占领龙江,征服北满。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在黑龙江省驻军除第二十九旅、第三十旅两个国防旅在事变前已调往关内讨伐石友三以外,尚有黑龙江省防军陆军第一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第二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第三旅马占山部驻黑河;黑龙江省防军骑兵第一旅驻拜泉。此外,还有介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之间的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的3个团、东北边防军独立骑兵第二旅驻海拉尔,总兵力共3.5万人。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黑龙江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在北平,军队驻地比较分散,不能及时调整防务。为了防止日军北进,9月下旬,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主持会议,商讨对张海鹏进犯黑龙

江省的对策,布置防卫。军署曾致电海拉尔、黑河等地驻军积极备战待命,并急调中东路驻蒿子站的骑兵第二旅朱凤阳团进驻泰来,对洮南方面警戒,派工兵一连驻守嫩江桥并构筑北岸阵地的据点工事。

嫩江桥是洮昂铁路中段的一座铁路桥,位于泰来县北部、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以南 65 公里处,北隔嫩江与大兴安岭相望。此江桥是通往齐齐哈尔的咽喉。日军欲侵占黑龙江省会,必先占据此桥,方可运兵北上进攻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1 年 10 月初,黑龙江省副司令公署又调驻拜泉的吴松林旅长所率的骑兵第一旅到齐齐哈尔附近待命。10 月 15 日夜,派卫队团、工兵营 2 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统归卫队团团长徐宝珍指挥,开赴嫩江桥北岸构筑工事。并令军务、军医两处迅速筹设运输、救护机构,将库存的 99 挺机枪发给卫队团使用。为维持市面秩序,派炮兵团长朴炳珊为龙江警备司令,将炮兵 2 个营开进省城备用。派公安局督察长刘允升为代理局长,令教导队学生维持地方治安。同时由军署电令马占山、苏炳文旅各抽调步兵一个团开到昂昂溪,令驻满洲里的骑兵第二旅准备补充待命。另电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将护路部队重新部署,保护交通安全。

10 月 13 日,张海鹏命第一支队长徐景隆率 3 个团为前锋,向黑龙江省进犯。10 月 15 日,张海鹏率伪司令部、第二支队及骑兵独立团并有 20 余名日军随行,到达泰来时,有日军两架飞机在龙江上空侦察、示威。谢珂令驻泰来的朱凤阳团撤到泰康以西,掩护江桥守军左翼安全。10 月 16 日拂晓,徐景隆指挥第一支队向嫩江桥守军发起攻击。江桥守军在徐宝珍团长指挥下沉着应战开炮还击。伪支队长徐景隆误触地雷,当场毙命,敌阵大乱,江桥守军乘势奋勇出击,将敌人 3 个团击溃。为防止日伪军再次进犯,守桥工兵将江桥炸毁三孔。伪军张海鹏进攻龙江大败,日方认为靠张海鹏军占领齐齐哈尔无望,必

须增派日军进攻,方可成功。

为稳定人心,统一全省的指挥,张学良于10月10日驰电任命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①为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任命谢珂为军事副指挥兼参谋长。马占山接到张学良的电令后,对黑河的军事防务稍事料理,遂率步兵李青山团由黑河起身,同时电促逃到哈尔滨的黑龙省政府官员速回省城视事。马占山于10月19日下午抵哈尔滨,当晚乘火车到达省会齐齐哈尔。10月21日上午,马占山正式就任代理黑龙江省主席职务。他在就职演说中说:“目前重要的问题,即为维持地方治安,望各位群策群力,共相赞助,各司其事。倘有侵犯我之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心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在就职会上,他还向各省市、各党部、各报馆发出就职通电,表示抗日卫国的决心。

日军见马占山就职抗日,张海鹏伪军进攻失利,于是一面向马占山提出立即修复江桥,马占山立即下野等无理要求;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马占山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无理要求均严辞拒绝,并于10月22日发表了对日抵抗宣言:“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净土,而张海鹏,年逾衰老,不知自爱,乘满洲事变,乃借外人势力,兴兵北犯,窥视龙江,伪造旗帜服装,以施恫吓手段,幸我军上下一心,将士用命,遂最后决心,誓以拼死,敌军未克如愿……尔后凡侵入我境者,誓必决以死战。”^②接着马占山任命了省城警备司令、公安局长以维持社会秩序,安定民心。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部

^① 马占山(1885—1950),辽宁省怀德人。绿林出身,后被官府收编,先后任东北陆军第十七师第五旅旅长、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1950年11月29日病逝于北京。

^② 温永禄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1页。

署:为加强江桥一带的防御,调一个步兵旅,7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连同此前配置在江桥的兵力共1.6万人开赴江桥以北,布防在大兴、三间房、昂昂溪、富拉尔基一线。

马占山将江桥防线分为三道,并指定每道防线的指挥官。第一道防线是江桥防线,由卫队团团团长徐宝珍任指挥;第二道防线是大兴防线,由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任指挥;第三道防线是三间房防线,由暂编步兵第一旅旅长苑崇谷任指挥。

日本侵略军利用张海鹏侵占黑龙江省的阴谋失败后,加紧了进攻江桥的准备。

10月24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致书马占山,要求马占山让出省城,由张海鹏代之。10月26日,日军第二十九联队借口匪患,进占四洮路全线,此举是日军以军队援助张海鹏侵犯黑龙江的第一步。10月27日,日军步兵少佐、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黑省政府于11月3日以前将洮昂路嫩江桥修竣,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10月29日,又由日本驻黑龙江领事清水八十一根据外相币原的训令向省政府送致代修江桥的通牒,提出,洮昂路系满铁借款铁路,且于交通运输经济上有重大关系,因此满铁将派人修理,并提出:“(一)满铁修桥时,要求马占山予以保护;(二)如果马占山不同意保护,则直接在日军的保护下修桥;(三)即使马占山同意保护,日本方面为了监督起见,军队也派遣必要的兵力。”^①日方的蛮横态度充分说明他们是要以修桥为借口,尽快占领黑龙江。对此,马占山以强硬措辞驳斥日方无理要求,指出日方要求修桥,意在日军进攻便利,而江桥系中国主权,如日军对我存敌意或入侵我军阵地,则采取正当防御,即以武力抵抗。

^① [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92页。

10月30日,马占山率团长徐宝珍、徐景德、吴松林赴江桥阵地视察防务观察地形后,马占山对随行的3位团长说:敌众我寡,当利用地形,以奇取胜。现值江水初退,江岸及铁路两旁多泥沼,须诱敌深入,突起攻击,见敌势挫,或退败时,要拼死猛追,追至桥梁时即坚守。但我子弹缺乏,枪械不良,非等敌进至百米射程以内,绝对不准开始射击。马占山鼓励他们说,战斗开始时,我必亲自来火线,与弟兄同生死^①。

关东军为了进攻嫩江桥,派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到前线指挥,从10月26日开始便向泰来一带集结兵力,调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司令部和第二十九联队从长春到郑家屯待命,随后又以满铁修理江桥为由组成第十五旅团第十六联队长滨本喜三郎为支队长的嫩江支队。嫩江支队主力为日军步兵第十六联队、野炮第二联队第一大队、骑兵中队、空军第八中队、工兵一中队及无线电班等4000余人,在嫩江支队长滨本喜三郎率领下从吉林、长春出发,11月2日到达泰来,3日抢占了嫩江桥南岸有利地势,并构筑工事。

在嫩江支队开抵泰来之日,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奉关东军司令部之命,向黑龙江省府提出满铁准备修复江桥通告,内容如下:(一)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使用;(二)到11月3日正午止,南北两军各由桥梁撤至10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侵入其地域以内;(三)不承当上述要求或妨碍修桥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用兵力^②。3日,马占山、谢珂等召集会议讨论对策。谢珂等认为:“江桥阵地非常坚固,如后撤无异于让防,尔后更难于抵御。我阵地距江桥桥头正面四五里左右,是很好的桥头堡,日军对此阵地感觉头痛,妄

^① 尹秀峰:《江桥抗战日记》,载《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② 谢珂:《江桥抗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载《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想欺骗我们舍去这个良好阵地。对修桥的事暂采取放任的态度。”^①但乡绅赵仲仁、李维周等则以兵力不足等理由要求马占山顾全地方,和平应付。在双方意见不一,且又有北平避免向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的情况下,马占山拍案而起,大声说:“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寸地,让于敌人。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了,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去领罪。”马占山激昂慷慨的陈词,深深感染了与会者,会议决定“如果日军侵入我阵地,即行抵抗。”^②

11月3日上午11时,日军两列铁甲车开到江桥,满铁工人百余人,在30名士兵、5架飞机掩护下,以武力强行修桥。黑龙江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即将少数防守江桥的部队撤退到本方阵地。日军飞机向我阵地投掷炸弹,伤我士兵9人。天黑时,百余名日军渡过江桥,对我阵地猛烈射击,并有飞机投弹伤我士兵7人。至夜,因我方力避冲突,日军始行退去。

11月4日拂晓,大雾弥漫。日军嫩江支队主力从泰来出发,5时到达江桥站,准备向大兴站进攻。马占山命令卫队团长徐宝珍等“务要保持镇静,诱敌前进,俟敌到百米有效射程内,给以严重之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如无我之命令擅自退却,致失一寸土者,即以军法从事。”上午9时,日军嫩江支队主力3个大队和南满铁道守备队一部共六七百人,从江桥站出发,正午时分接近江桥北大兴站我守军阵地。当敌军进至百米射程之内,我军一齐开火,敌军伤亡甚重,纷纷退回南岸。中日军队直接交战,江桥抗战爆发。

① 守土。

② 袖风:《马占山将军抗战史料》,1941年版,第49页。

江桥抗战从1931年11月4日开始至11月19日止,历时16天,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4日到11月6日为江桥阻击战。11月4日中午,日军嫩江支队在大佐滨田指挥下,率主力3000余人,以张海鹏伪军当先,在5架飞机、数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江桥我守军左翼阵地发起猛烈攻击。黑龙江守军奋起还击,展开白刃战,日军攻势受挫后便后退。下午6时,日军再以炮火掩护步兵一大队渡江,在飞机、铁甲车的配合下,向江桥正面大兴一线主阵地猛攻,以便突破黑龙江守军中间防线。我守军正面是徐宝珍卫队团阵地,官兵皆义愤填膺,待敌进入有效射程后,一齐开火,敌死伤甚多;随后,我守军跃出战壕,与敌展开白刃战,敌难以招架,其突破中间防线意图一直未能得逞。日军在败退时,遭到我军在芦苇丛中伏兵的堵截,有的陷入泥沼,有的跳入江中。敌又派兵增援,亦遭守军左翼的骑兵部队夹击,狼狈逃回南岸。5日拂晓4时左右,日伪军在大炮、飞机的掩护下,又发起猛烈进攻。日军从中路,张海鹏伪军从左右两翼强渡嫩江。当敌军船到江心时,我军突然发起射击。日军死伤落水者甚多。江岸守军也有相当伤亡,遂撤至两翼阵地。近午,日军占领江桥阵地。步兵第二旅吴松林团、骑兵第一旅一个团赶来增援。吴团向日军发起进攻,退到左右两翼的卫队团也趁机反攻。正在前方战事紧张时,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在我守军顽强反击下,日伪军再次被击退。是役我守军阵亡262人,伤143人;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张海鹏伪军死伤700余人。日军进攻不利,关东军司令官于11月5日下令调第二师团第三旅团,混成第三十八、三十九旅团各一个大队,野炮第二联队、重炮大队、工兵中队等所属各部先后赶到大兴阵地增援,投入战斗。

11月6日拂晓,日军4000余人,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

列,向黑龙江守军全线猛攻。我守军拼命冲杀,马占山又亲临前线督师,士气更为大振,激战至近午,黑龙江守军多次打退敌人进攻,阵地几次失而复得。战至中午,我守军阵地几乎全被炮火摧毁。官兵跃出阵地与日军肉搏,终将敌击退至江桥南端。日军又增加飞机4架,铁甲车一列,再次发动反攻。我守军乘势反击,混战6小时,肉搏数次,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6时,其战事之剧烈为之罕见。是役日军伤亡惨重,滨本步兵联队几被完全歼灭,高波骑兵队亦死伤殆尽。这是日军入侵东北以来遭到空前损失的一次。但三天以来日军陆空交施,昼夜不停地攻击江桥防线,我守军援军无望,弹药得不到补充,士兵疲惫已极,部队伤亡很大,且江桥、大兴一带地处平原,防御工事尽被敌炮火摧毁,实难继续支撑。6日12时以后,日军增加大量兵力实施强攻。鉴于这种情况,马占山于6日晚下令将守军主力撤至距江桥25公里外的三间房车站一带阻击敌人。

从11月7日开始,江桥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即三间房阻击战。三间房位于江桥以北,北距齐齐哈尔35公里,是洮昂铁路的一个车站,是保卫黑龙江省会的重要防线,三间房阵地不保,齐齐哈尔门户洞开,省城必失。中国守军退至三间房之后,马占山立即整军布防,派6个团担任正面防线的阻击,两个骑兵旅配置左右两翼防线。总兵力为5000余人。7日上午7时,日军发动向三间房、蘑菇溪、红旗营子我防区进攻。由于张殿久、苏炳文旅组成一个混成团赶到,日军于午后被击退。11月7日以后,日军为补充兵力暂时停止进攻。之后,日军一面加紧外交攻势,一面调兵遣将,做总攻击准备。

日军重新调整兵力后,于11月12日午后1时,以骑兵五六百名向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附近)等地吴松林团防地进攻,激战40分钟敌始退却。午后3时,敌开始大规模进攻,日军第三旅团司令部及步兵第十六联队、第二十九联队、骑兵第二中队、铁道守备队一部及

伪军共约1万多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轮番向三间房我守军阵地进攻,经苑崇谷旅竭力抵抗,日军遭受很大损失,未能突破我守军阵地。13日拂晓,日军进攻新立屯阵地,飞机数架投弹助战,几次进攻,经我军顽强抵抗,均未得逞。14日拂晓,日军骑兵扰我汤池、蘑菇溪间骑兵防线,并用重炮向我军轰击。大兴方面战斗亦十分激烈,日军派数辆坦克助战。程志远骑兵第二旅涂全胜团、萨力布骑兵团,蘑菇溪方面卫队团两个营陆续开来增援,还有三间房阵地派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两营增援,我全线阵地与敌激战一日,敌攻占计划均未得逞。

鉴于嫩江桥战事吃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于11月13日又下达了增援命令。第二师团所有主力分别从吉林、长春、郑家屯于15日早7时到达大兴,并由第二师团长中将多门一并指挥嫩江支队。16日上午11时,日军以步、骑、炮、空、坦克兵约4000余人展开全线猛攻,我军奋勇抵抗,战斗极为猛烈。我军因装备太差,死伤甚重。午后3时许,日军攻势渐缓。17日中午,师团长多门下达命令于午后1时正式实施总攻击。以步兵天野第十五旅团为右翼;长谷部第三旅团为左翼,骑兵队居中,向三间房黑龙江守军阵地进攻。在总攻击中动用飞机12架,大炮百余门。这次进攻调动了日军第二师团及混成旅团全部兵力,计步兵10个大队、骑兵2个中队、野炮兵中队、重炮兵2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飞机3个中队,总兵力约7000人左右。当时,参战的张海鹏伪军,除被毙伤亡者外,多数潜逃,战场上主要由日军作战。日军在师团长多门亲自指挥下,于18日拂晓发起全面进攻。敌炮火猛烈,将三间房守军阵地摧毁殆尽。三间房一带黑龙江守军,由于连日苦战,兵力仅剩4000余人,且弹药不能及时补充,“我军武器既劣,复无阵地凭藉,伤亡枕藉。”“但士卒俱必死之心,将校无偷生之念,故

虽血肉相搏,终不稍退。”^①是役是整个江桥战役中最为惨烈的一仗。广大官兵同仇敌忾,奋勇异常,喊杀之声,惊天动地,同优势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骑兵第一旅炮团迫击炮手庞振海,连续发射炮弹 80 余发,忽然炮筒震断,他便徒手冲入敌群与敌搏斗,壮烈殉国。守军官兵自接战以来,竟日水米未进,疲劳不堪,仍然枵腹迎敌,击退日军十余次进攻。后来日军又以坦克开路,突破三间房防线,守军官兵不能立足战壕,遂出壕与敌肉搏。至 18 日上午,我守军阵地官兵不足 2000 人,难以继续支持战斗,被迫撤退。中午,马占山率手枪队亲自督战反攻,战斗异常激烈,士气振奋,将敌击溃。午后 2 时重新夺回三间房。但附近之新立屯、达官屯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并对三间房形成包围之势。鉴于这种形势,马占山于 18 日晚下令守军各部队向齐齐哈尔撤退。当夜电告北平,并向各方发出撤兵通电。11 月 18 日夜,日军一部已抵省城齐齐哈尔南端。于是马占山又命省政府同军队沿齐克(山)路撤至克山、拜泉,省政府迁至海伦。11 月 19 日上午 9 时,日军进占齐齐哈尔。至此,历时 16 天的江桥抗战即告结束。

江桥抗战,是东北军爱国官兵违反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举。东北爱国官兵不畏强暴,为民族、国家的尊严,为正义而战的精神,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援助。江桥抗战的枪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潮,给东北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各地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声援电报和信件,犹如雪片飞来。捐赠的钱款和物品不断送到前线。守军将士群情振奋,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英国《每日邮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记者访问马占山,对其英勇抗日之举称赞不已。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援和

^① 《马占山关于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20 页。

赞助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江桥抗战之初,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曾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和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以“抗日援马代表团”的名义,到战地进行慰问和宣传鼓动,派志愿兵参加战斗。

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但对于它的重要历史作用、意义还是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江桥抗战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所遇到的中国爱国官兵一次大规模的抵抗。江桥抗战中,日军伤亡约1500人,冻伤近千人。1931年11月22日的《国际协报》著文评论说:“此次日军侵我东北,辽吉当局于不抵抗主义之下,未及一旬,将两省重镇完全放弃,仅一黑龙江省,赖军事当局数人之力,得以不堕。嗣马占山将军奉命守土,坚决御敌,迄至今日,幸得海伦一部……故马占山及黑省一般将领,将来纵因力不能敌,终归失败,其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亦终有不能磨灭湮没者也。”江桥抗战,东北守军苦战半月,开我国抗日战争之先声,振全国抗日救国之精神,虽败尤荣。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爱国热忱,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组建和武装抗日斗争。

第二节 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一、辽西、辽北义勇军的兴起与抗日活动

以北宁路、大通路(大虎山至通辽)、营沟(营口至沟帮子)路为中心的辽西、辽北地区是义勇军较早活动的地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于9月23日迁至锦州,设立临时辽宁省政府行署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任命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省主席。10月2日,两署在锦州正

式办公。两署成立后,对军事防御迅速进行部署:将原驻通辽的骑兵第三旅,驻洮南步兵第二十旅,驻盘山的步兵第十九旅调至锦州附近,与驻锦州的步兵第十二旅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警戒日军继续西侵和维持辽西一带的治安。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飞(熊正平)根据两署的指示,整顿由沈阳撤退出来的警察和公安总队,密令各地潜散在家的警队队员到锦州归队。黄显声亲自主持召开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盘山、台安等县公安局长会议,抽调各县干警补充公安总队,重新编成3个公安骑兵总队,驻防锦州北10公里的三屯一带进行整训,准备抗击日军西进。

辽宁省政府在锦州恢复办公,标志着东北的军事中心和辽宁省政权的存在,对辽宁,特别是辽西、辽北地区的抗日形势将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辽西以3个正规旅陈兵锦凌一线,更为日军所不容。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向各地陆军特务机关发出命令中指出:“满蒙绝不容许锦州政权以及旧政权的任何人存在,对其军队一定要讨伐。”^①10月2日,关东军司令部会议即确定了覆灭在锦州的辽宁省政府的方针。7日,关东军司令部下达了轰炸锦州的命令。8日午后1时50分,日军12架飞机,轰炸锦州,无辜民众被炸死伤57人,省署、车站被毁。同时,日军还不断派兵向北宁路沿线新民一带进犯,但遭到辽宁省政府公安总队和当地民团的阻击,从而拉开了辽宁地区各阶层民众武装反日斗争的序幕。

日军为了夺取辽西,在直接出兵之前,组织了两支汉奸队伍以图袭扰锦州。10月初,关东军指使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在沈阳成立所谓“东北民众自卫军”,凌为总司令,司令部驻盘山沙岭镇。日本

^①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页。

浪人仓岗繁等为凌的顾问,所有枪械弹药均由日方提供。凌逆伪军活动于盘山、台安、辽中、海城等地。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派熊飞带两个骑兵总队,去消灭这股逆军。熊飞通过关系说服了具有民族意识的逆军师长项青山(项忠义)和民团首领张海天(老北风)等部,于11月4日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仓冈繁擒获,消灭了这支伪军。11月初,关东军又任张学成成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因张学成是张学良之堂弟,经请求张学良同意派员进剿。第二骑兵总队长庄景福带两个骑兵总队一战即将张学成和日本顾问击毙,并俘获伪旅长以下多人,此股伪军被全歼。

在消灭两股伪军之后,黄显声委任在讨逆作战中有功的项青山、张海天、盖凌香等人分别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第二、第三路司令。主要活动在营沟路沿线的大洼、盘山、田庄台等地。自此,东北抗日义勇军各路建制开始形成。与此同时,在北宁路沿线的义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先后有东北军中下级军官耿继周、潘士贤、于百恩、马子丹、张海涛等人及绿林首领高鹏振(老梯子)组建的10余支抗日武装,每支队伍少者二三百人,多则三五千人。在大通线则有高文斌、赵大中等人创立的义勇军,活动于通辽、郑家屯、开鲁、康平、法库、大虎山、黑山、彰武等地。

1931年11月,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已无北顾之忧,即准备进攻锦州,袭取辽西地区。11月26日,土肥原在天津策动日军向中国军队寻衅,制造第二次天津事件。关东军司令部以此为借口,立即决定迅速击败锦州附近的东北军,之后进入山海关一带。此时,东北军的作战部队和公安骑兵总队的防线还远在锦州及大凌河岸一线,大凌河以东没有正规军守卫。在这种形势下,黄显声只能以少量东北军并调集各地义勇军和民团阻击日军。27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第二师团之三十九旅团、独立守备大队第二大队等部,先后从沈阳出

发,向辽西推进。另一路日军从营口出发,准备西渡辽河,向锦州进攻。27日上午9时,日军先头部队的装甲列车与东北军中山号装甲列车相遇,激烈交战。项青山、耿继周等部义勇军也英勇御敌,给日军以重创。28日,日军退回到巨流河以东地区,中止了对辽西的进攻。从营口出发的日军在辽河东岸遭到项青山部义勇军的抵抗,日军伤数十人,撤回营口。

日军西进受挫退守巨流河以东之后,锦州军政两署及锦凌防线的东北军官兵备受鼓舞,黄显声给张学良的电报说:“日军西进后,显声所派民团已占领皇姑屯,破坏绕阳桥,令其进退维谷,攻锦之计划第一步失败,扰乱工作异常收效”,同时建议救国会,“速派员潜往龙江、吉林以及辽宁东边各县,致力鼓吹警甲民团,联合起来,一致扰乱,到处袭击,则日人疲于奔命,前后受敌,国家危亡,或能因之稍求于万一。”^①

义勇军打退日军第一次西侵的胜利,不仅极大地振奋了辽宁各地义勇军和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增强了他们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同时也使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领导备受鼓舞。1931年12月初,救国会即派出一批精干人员潜赴东北各地。被派出的人员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同盟会员和各界爱国人士,到各义勇军部队工作、参战。为便于对义勇军的指挥和领导,救国会将辽宁地区义勇军的组织进行整顿,统一了番号,各种抗日队伍统一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并按活动区域和成立先后分别加以委任。至1931年12月,辽宁义勇军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的已有24路,1932年3月增至54路(后又增至58路),以及27个独立支队,6路骑

^① 王化一:《我所记忆的黄显声将军》,《革命史资料》第1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70页。

兵。此外,还有特种编制的义勇军,如辽西第二军、辽南义勇军、辽东义勇军、本溪义勇军、锦州国民义勇军等。至此,活跃在北宁、营沟、大通3条铁路上的几十支抗日义勇军武装,形成了锦州外围的防御力量,有力地阻止了日军继续西进和对锦州的进攻。

日军在第一次西侵失败后,即向其陆军省请求增加兵力。关东军司令部也加紧调动在东北的部队,为继续攻占锦州做准备。此时,辽西地区的敌我态势是:1931年11月末日军进攻锦州受挫,但其兵力已控制了北宁路沈阳至新民一段,前沿阵地已到新民以西之白旗堡。营沟线日军前沿阵地已到盘山县田庄台以北的大洼附近。12月初,日本陆军省经天皇批准,增加了进攻锦州的兵力,关东军司令部再次制定进攻锦州的军事部署,共调集日军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混成第八、第三十八、第三十九旅团,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三、第五大队共约3万余人。当时,驻锦州附近的东北军各部队在大凌河右岸修筑了防御工事,并调一部分主力配置在白旗堡、大洼、彰武等前沿阵地。抗日义勇军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二、第二十路等各部约3万余人,也参加御敌作战。

1931年12月21日,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三、第五大队,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分别从沈阳以北的开原、铁岭出发,以法库、彰武为攻击目标,沿大通线向锦州靠近。第十二路义勇军于百恩部在亮中桥、苏路台、石佛寺一带阻击日军。日军以飞机轰炸、扫射开路,向义勇军阵地进攻。激战两昼夜,日军攻占法库。同时,第八路义勇军蒋连瑞部在大通线钱家店附近与日军激战,义勇军虽伤亡很大,但仍顽强抗击日军。战事最为激烈的地区是营沟线的盘山、大洼及北宁路的大虎山、新民等地。24日,日军多门第二师团由营口渡河西进,在田庄台附近,遭到义勇军第一路第一支队苑九占部和第二路项青山部的迎头痛击。日军骑兵2000多人从铁路左侧向项青山部攻击,以援

助其正面进攻部队。项部恐被敌包围退回田庄台火车站。这时日军又由马坨子河渡河北进,到达田庄台附近,用炮火猛轰田庄台,义勇军奋勇还击,因弹药缺乏,遂撤出田庄台。27日,日军骑兵1000余人攻陷田庄台北部的的大洼。当夜,义勇军反攻田庄台,迫使日军放弃大洼回师田庄台解围。30日,日军骑兵千余名,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第一路王显廷部第一支队扼守的大洼。日军将第一支队包围,为掩护部队突围,梁支队长率敢死队120人与敌肉搏,击毙敌兵80余名。激战6小时,终因弹尽援绝,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31日,日军第二师团占领沟帮子,夺取了营沟线。至此,锦州已完全暴露于日军面前。

1931年12月24日,日军3000余人,沿大通线向大虎山进攻,在黑山遭义勇军阻击。赵大中率第二十五路义勇军在黑山以北之秦屯与日军发生激战。30日,日军骑兵2000人进攻大虎山。第一路义勇军王显廷部在大虎山与敌激战两昼夜。1932年1月2日夜,第一路义勇军与孙玉率领的千余士兵相配合,攻入大虎山,与敌激战3小时,毙敌大尉中山一郎以下30余人,义勇军亦有伤亡。1931年12月30日,日军混成第三十九旅团在飞机、铁甲车掩护下分别由沈阳、新民出发向锦州进攻,行至白旗堡车站时遭到耿继周所率第四路义勇军的猛烈攻击。战斗中,耿继周派出的另一支骑兵队伍绕至敌后方,将柳河铁路桥炸毁,切断了敌军的退路。敌在死伤10余人后,只好固守待援。31日夜,耿继周又派精兵200人,偷袭白旗堡车站。日军守备队一面死守,一面向绕阳河方面呼救。待敌援军赶到时,义勇军已获得大批战利品安全转移。

12月29日,正当各路义勇军拼死御敌,英勇奋战之际,锦州前线的东北军却接到向关内撤退的命令。锦州前线部分爱国官兵发表联合宣言,愤怒谴责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卖国行径。抗日义

勇军将士眼见东北军西去,辽西大好河山即将沦于敌手,也于31日在沟帮子发出通电,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表明抗日义勇军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电文略称:“辽西之半壁山河,势将沦陷,国事之危,燃眉不足以喻其急矣!”“我三千万民众,决以此满腔热血,溅于白山黑水之间,以灌溉中华民族自由之花。敌氛未靖,誓不生存。”^①

日军得到东北军撤退的消息后,乘机发动强大攻势,企图一举占据山海关以东的北宁路沿线。各路义勇军奋勇出击,在沟帮子至大凌河间与日军血战3昼夜,击退日军多次进攻,予敌以重创,义勇军也伤亡甚重。1932年1月1日下午6时,关东军司令官下达命令,第二十师团占领锦州,第二师团集结沟帮子一带,准备增援。日军经丰东镇冲入大凌河侧背,使大凌河两岸各路义勇军断绝联络,无法协同作战。1月3日,日军第二十师团未受任何抵抗即占领锦州,锦州以西的锦西兴城、绥中亦先后沦于敌手,防守平津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锦州失守后,辽西、辽北义勇军陷于孤军奋战,但斗志并未消沉,反而更积极寻机打击敌人。城市失守,他们转到铁路线两侧,在纵深千余里的土地上,以山地、苇塘和广大农村为依托,乘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到处进攻敌占城镇,破袭敌运输线,袭击军火列车,毁敌辎重,打得日军疲惫不堪,惊魂不定。1月4日晚,义勇军第四路司令耿继周率领义勇军500人袭击新民县城,冲破敌人火力封锁,杀进城内,猛攻日本宪兵队。县城附近一些小股抗日武装也冲进城内,配合耿部作战。县城内部分公安队同情义勇军,也掉转枪口向日军射击。至晚9时,义勇军增至2000人,他们进攻日本领事馆、电话局、广济医院、日人住宅区。由于日军凭借工事,拼命抵抗,战斗到次日晨,义勇

^① 陈觉:《国难痛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7页,。

军相继退出城外。

继耿继周部夜袭新民县城之后,义勇军第三十四路刘纯启(亮三)部进行了歼灭日军古贺联队的战斗。1月6日,日军第十九师团混成第三十八旅团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队长古贺传太郎奉命率88人,由锦州到达锦西县城江家屯,7日又到日军70人。原锦西县长张国栋投敌附逆,将古贺迎入城内。9日上午,古贺决定率部去县城以西一带“进剿”义勇军。汉奸县长婉言劝阻说:“城外义勇军太多,出城危险。”古贺狂妄声称:“几十万东北军都望风披靡,几个老百姓算得了什么,是不堪一击的。”出发前,古贺派松尾少尉率粮秣队回锦州领取给养,又留村上中尉一个小队守护县城。然后古贺率80多名步骑兵,出锦西县城西门,向城西龙王庙地区进行“扫荡”。古贺刚一出动,刘纯启就得到了日军“扫荡”的情报,遂派一部分队伍及民团千余人在上坡子村附近埋伏待敌。他自己亲率500人在锦西县城西门外西园子村埋伏,以断敌回城之路。当古贺率队到达上坡子村时,突然遭义勇军的攻击。这时正向龙王庙前进的石野小队,遭到埋伏在刘家屯、安家屯附近的300名义勇军袭击,石野小队长等一些日军当场毙命。中午,正当日军与义勇军在上坡子、龙王庙进行战斗时,另一部义勇军趁城内空虚,攻进了锦西县城,使中尉村上和他的小队惊慌不已,武川美直军曹当场被击毙。古贺联队长正被义勇军打得惊魂不定时,忽然接到锦西县城遭袭击的报告,于是慌忙率部往县城回窜。当古贺率部到达西园子村时,遭到埋伏于此地的刘纯启部伏击,日军纷纷倒在马下。古贺带领一部日军夺路而逃,到村东口,预先埋伏在公路旁炮楼内的12名战士突然开火,古贺当即被击毙。松尾率领的粮秣队,在去锦州途中至钱搭屯,被民团千余人包围,经两小时激战,松尾以下25名日军全部被击毙,并缴获了车辆马匹、枪械、弹药等大批军需物资。痛击古贺联队战斗共击毙敌50余人,伤敌30余

人,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被日军誉为“大和武士精华”的古贺联队被消灭,使日本侵略者发出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①不久,日军撤出江家屯,将锦西县署迁至连山关。

1932年4月以后,辽西义勇军为牵制占领锦州的日军西进,以大通路、北宁路为中心,伺机袭击日军。活动在绥中、兴城一带的义勇军第四十八路郑桂林等部,频频袭击前卫、绥中、兴城等车站,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日军多次出兵“讨伐”均告失败。5月初,郑桂林率1500余人由临榆县花户庄在向绥中进军途中与日伪军200余人在鲍庄子遭遇。郑桂林亲自指挥炸弹队、大刀队与敌激战,将敌击溃,毙敌70余人,义勇军损失甚微。1932年春,一天拂晓,200余名日军从绥中的前卫出发,向四方台方向扑来。郑桂林得知消息后,立即派旅长刘杰山带300余人,在赵孤家子、石柱子西沟的岭上将日军包围,压缩在西四方台庄里。经过激战,打死打伤日军100余人。天黑后,义勇军撤走。此战义勇军亦伤亡几十人。从1932年6月至10月,活动在北宁路大凌河以西地区及朝锦路(朝阳至锦州)沿线的马子丹、于百恩、朱霁青、宋九令等部义勇军,利用青纱帐起之际多次攻击锦州、锦西、义县等地,日军不断遭到打击和伤亡。7月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嘱托联络员石本权四郎在朝锦列车上被义勇军李海峰部俘获。之后,日军派人游说,要求义勇军释放石本,遭义勇军拒绝。李海峰经请示北京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石本处死。

日军自占领锦州之后,不仅企图直接占领山海关,控制关内外通道,而且不断派兵沿朝锦路北上,拟侵占朝阳,图谋攻占热河。同时以通辽为根据地,联络一部分蒙古王公,扩充军备,觊觎开鲁,进一步再行南取热河、察绥等地。为牵制日军增兵侵占朝阳、热河,高文斌、

^①《昭和》杂志第二期(1932年)。

高鹏振、刘翔阁等部义勇军,在大通路的彰武、北宁路的北镇及辽北地区的昌图、法库、康平等地积极行动,先后袭击了通辽、双辽、昌图、北镇等县城。北镇县伪警务局长单长柏被义勇军打死。

在辽北蒙边一带,自1931年10月,蒙奸甘珠尔扎布组织的“蒙古自治军”,由日军松井清助大佐为顾问,不断向辽北各部义勇军进攻。松井是煽动满蒙独立的重要人物。日军侵占通辽县城之后,多次袭击义勇军。1932年3月间,松井亲率日军50余人和甘珠尔扎布伪蒙军500余人进犯开鲁。义勇军高文斌部定边骑兵第二路司令刘振玉得到情报,会同热河驻军崔旅长共600多人,埋伏在开鲁之东抬头营子附近,待日军接近时,义勇军即发动突然袭击,同时另以百名骑兵,由侧面猛冲。甘部伪军遭义勇军猛烈冲杀作鸟兽散。松井被俘虏,同时击毙日军10余人,义勇军无伤亡。之后,刘振玉又率部在开鲁县王家油坊阻击进犯开鲁的500余名日军,由拂晓战至黑夜,予敌以重创,但因我军弹药不足,只留一连掩护,部队大部撤走。80余名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冲入村内,义勇军战士与其英勇拼杀,子弹打光拼刺刀或以砖头、石块打击敌人。日军只逃生6人,余皆被歼,我70余名义勇军战士生还者只有5人。日军遭此打击,即退回通辽。1932年6月,高文斌指挥刘振玉、解国忱第四、第五梯队共5个团分两路进攻通辽。高率800人先攻西门,刘、解带千余人攻东门,战斗从拂晓开始,战至下午3时,日军向城内退却,义勇军也攻入城内。一伙日军退在一个高墙大院内固守,义勇军难以攻入。解国忱率大刀队200余人,搭梯跃入院内,奋不顾身,砍杀日军60余人。战斗持续到晚9时,因弹药不足,且又无重火器和炸药,无法炸毁敌炮楼,义勇军只好撤回开鲁。

自1932年春至1932年秋,辽西、辽北形成一个广阔的义勇军活动区域,从而使这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发展到高潮阶段。

1932年末,日军正在为攻占山海关及热河进行准备,为确保辽西通道安全无阻,日军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向兴城、绥中一带大举进攻。义勇军第一军团彭振国、耿继周、郑桂林各部在跳石沟、九门口一带被日军包围,激战数日,义勇军伤亡惨重,分散突围后退往热河。只有郑桂林部,利用地理熟悉的条件,不断捕捉战机,坚持斗争,直到1933年秋才进入河北省境。

日军在向辽西各部义勇军攻击的同时,也调动大批兵力向北宁路沿线的新民、北镇、锦西、义县及辽北台安、法库、康平、铁岭、昌图各地义勇军展开大规模“围剿”,致使许多队伍溃散。但原第二十五路、第十二路、第二十三路、第四十八路各部义勇军仍能在北宁路沿线及北镇、朝阳、建昌一带坚持斗争,不时出击,搅扰敌人。有的义勇军一直坚持到1935年才最后终止斗争。

二、辽东三角地带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在辽宁东南部安奉路与南满路间,东南至黄海岸,形成一个狭长三角形,史称辽东三角地带,包括今丹东、东沟、庄河、凤城、岫岩等县。从1931年10月起,这里先后组建了第十九路、第二十八路、第三十五路义勇军,其中以邓铁梅创建的第二十八路义勇军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这一地区,依山傍水,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南下碧流河可以进入日本经营多年的关东州,北出千山山脉震慑本溪、辽阳、鞍山,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地区之一。

1931年10月中旬,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和正义感的原任凤城县公安局长邓铁梅,于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揭竿抗日,创建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东北民众自卫军”,邓铁梅任司令。这支队伍发展很快,到12月已达1500余人,武装齐备,活动于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地。12月26日,邓铁梅率东北民众自卫军对安奉路上重

镇凤城发动进攻。凤城驻有日军守备队、伪自卫团员 200 余人,还有伪警察 200 余人。在进攻前一天,邓铁梅派一批队员扮作进城办事的农民充作内应;还派两支小分队在凤城南张家堡子、城北四台子车站埋伏,阻击南从高丽门、北从鸡冠山方向前来增援之敌。接着兵分两路向凤城进攻。一路进攻火车站,将日警署、宪兵分遣队和 50 名日本自卫团员包围在火车站地下室。另一路由邓铁梅亲自指挥,以大刀队为前导,分别由南山下桥洞子和城南角华营两个方向攻城,直奔南大街,攻击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队。日本守备队被自卫军压缩在高墙大院内,伪警察稍作抵抗便落荒而逃。自卫军捣毁了县署、公安局和进行特务活动的日本人经营的平井药房,砸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日伪当局逮捕的爱国者。战斗持续到翌日凌晨 4 时,敌人增援部队乘铁甲车到来,自卫军撤出县城。凤城一役共打死、打伤日伪军警 50 余人,缴获步枪 300 余支、轻机枪 3 挺,迫击炮 2 门和大批子弹。日军遭此痛击,大为震动。《盛京时报》载文惊呼:“安奉线警匪频仍,凤凰城被焚,通讯断绝,形势严重。”^①凤城站日人站长遭到义勇军攻击之后,哀叹“万事休矣,现在只有待毙别无他路,”事后还心有余悸地说:“从那以后,大约一周左右根本不能入睡。”当时指挥日本守备队作战的西河小队长也承认,“那次战斗虽然不是大仗,也却是一次艰巨的战争”^②。

夜袭凤城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辽东地区抗日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第一次重大打击。这一仗打出了东北人民的志气,坚定了民族自救、抗日到底的决心。经过这次战斗,民众自卫军军威大振,声誉传遍了辽东,从而点燃了辽东三角地区抗日斗争的烈火。

^① 《盛京时报》,1931 年 12 月 27 日。

^② 《安奉路线遭难记》,载《协和》杂志,1932 年 1 月。

自卫军袭击凤城之后,自卫军司令部于1932年2月移师尖山窑(今属凤城县大营子乡)。这时自卫军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部队编制由大队扩编为9个团,司令部下设参谋、秘书、副官、军需、军械、军医、军法等7处和一个政治部。

邓铁梅部攻打凤城,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也得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极大重视。1932年3月间,救国会派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到邓部任总参议兼军官学校教育长,成为邓铁梅的得力助手。不久,救国会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司令。同年夏,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的邹大鹏到邓部任政务处长。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建议设立政治部,建立教育工作制度;建议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并亲自起草了农民协会章程。这些建议均被邓采纳,并作了一些尝试。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起自民众,扎根于民众之中,与广大群众有血肉般的联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任。邓铁梅提出了“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他常对部下说:“我们抗日救国也是救民,抗日离开老百姓不行。”自卫军十分注意维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自卫军无粮无饷,无有救济,队伍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除了打仗缴获一些粮饷外,主要靠群众供给。自卫军到群众家吃饭,不挑吃喝,不讲排场,粗粮素菜皆可充饥,残汤剩饭亦可果腹,群众称赞他们为“冷饭队”。部队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如提出:不投敌,不妥协,抗日到底;不贪财,不扰民,不调戏妇女;保民众,爱民众,不动群众秋毫。这些纪律虽未成文公布,但当时自卫军官兵和抗日区群众尽人皆知,广为传颂,共同信守。

民众自卫军为了立足发展,建立了一些较固定的游击据点。从1932年开始,先后在尖山窑、三清观、沙里察、龙王庙、黄土坎等地建立了游击据点。在这些据点里设置了战地医院、印刷厂、被服厂、饷捐局、制币厂等机构;制定了税收、财政、粮食政策和对伪军的政策。

有些政策虽然还不完善,实行时间也较短,但对于自卫军坚持斗争还是发挥了很大作用。

自1932年春以来,辽东一带又有大批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抗日武装兴起。在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中也吸收了各县农村的大刀会和红枪会参加。大刀会虽然提倡吃符、念咒,宣传刀枪不入,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他们抗日坚决,作战勇敢,继承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优良传统。当时组织规模较大、战斗力较强的大刀会是鞠抗捷领导的庄河大刀会。同年夏,庄河县6个区办起大刀会,人数达6000人。大刀会成立后,成为当地震慑敌人的重要力量,日伪不敢在有大刀会的区、村建立伪政权。

1932年夏,邓铁梅部自卫军与伪军展开了频繁的战斗。5月的一天,凤城县伪警察大队下乡“讨伐”自卫军,宿于卡巴岭三义庙内,被自卫军独立营侦知。夜11时左右,营长李庆盛率部队奔袭到三义庙,将伪警包围,经一阵猛烈攻击、喊话,并以佯作调动部队进攻,吓得敌人一枪未放便被缴械,并缴获部分马匹。夜袭卡巴岭,日伪当局十分恐慌,将在安东驻防的伪军李寿山部调往庄河境内的大孤山、龙王庙一带,“讨伐”自卫军。

龙王庙是一个有近千户人家的大镇,镇内有字号的商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岫岩东部、庄河北部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的集散地。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带铁丝网的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为打击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经过周密侦察,邓铁梅于6月29日夜,率民众自卫军700余人,向龙王庙日伪军发起攻击。自卫军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战士们分头占领各处隘口,炸毁几个碉堡,攻进街巷。此时,日伪军正在熟睡,当发觉自卫军已到眼前时,有的来不及穿衣,赤身逃窜,有的在渡河逃跑时溺水而死。在北门的伪军一个连,全部被自卫军击毙。伪军司令李寿山、副司令张宗援狼狈逃往大

孤山。这次战斗打死日伪军 100 多名,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不久,邓铁梅将自卫军司令部移至龙王庙。8 月,原辽宁省岫岩县县长刘景文举旗抗日之后,更壮大了辽东三角地区的抗日力量,使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县方圆几百里的广大农村都成了抗日义勇军的天下。日伪当局惊呼:“三角地带现为匪军占领。”^①

1932 年 10 月,伪凤城县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警务指导官白井成明等一行 6 人前往邓铁梅防地进行劝降活动,被邓铁梅下令处决。日伪当局震怒,令伪军李寿山部前去“进剿”。邓部顽强阻敌,决定攻打敌人刚刚占据的黄土坎,委派苗可秀前往督师。10 月 20 日晚,自卫军突然发起攻击,击毙伪军营长李怀臣等 10 余人,李寿山逃回大孤山。

为打击日伪军的气焰,1932 年 10 月 26 日,邓铁梅联合义勇军第五十六路刘景文部,第三十五路李春光部共 2500 余人围攻大孤山。大孤山镇设有 10 多公里长的城壕,壕内水深没人,壕外有铁丝网。李寿山部伪军 3 个团共 1500 余人驻守镇内,防御工事坚固,义勇军多次强攻均未能攻下,但镇内敌人也无法冲出镇外。在抗日军炮火的轰击下,伪军每日都有伤亡,前后 20 余天敌人弹尽粮绝。11 月 17 日,伪军营长赵书怡带领 40 多人的“敢死队”从南二道沟大板桥突围,在义勇军强大火力阻击下,赵书怡被击毙,“敢死队”大部被打死,少数逃回镇内。22 日,日军天野旅团一部约 500 人,从岫岩赶来增援,义勇军才撤出战斗。围攻大孤山之役共 28 天,打死伪军 200 余人,此后李寿山龟缩在大孤山镇内,轻易不敢出动。

日伪军在连续遭到义勇军的打击之后,对三角地区的形势极为

^① 邓卓然:《邓铁梅抗日事迹的回忆》,载辽宁省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第 94 页。

重视,尤其担心三角抗日区的义勇军打出庄河、岫岩进入盖平县境,到达南满路沿线,进而威胁其关东州地区的统治。1932年12月中旬,敌人调集重兵对三角地区实行规模空前的“讨伐”。从12月13日开始,日军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各一部,独立守备队第三大队(驻大石桥)、第四大队(驻连山关)及伪靖安军共1万余人,从盖平、海城、岫岩、本溪、凤城、安东、大连等地多路出兵,向以尖山窑、龙王庙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由于敌兵力过于强大而集中,加之义勇军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经验,一开始即采取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战法,结果分散了兵力,所以在敌人“讨伐”的最初几天里,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不得不暂避敌锋退到山林地带分散进行游击活动。12月16日晚,日军少将森秀树率领伪靖安军“讨伐队”到庄河县土城子宿营。庄河大刀会侦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集合500余人,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于夜半时分到达土城子,立即向靖安军发起攻击,日伪军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大刀会友组成一道道人墙冲杀向前,势不可挡,将伪靖安军杀得四处逃散。住在深墙大院内的日军少将森秀树听到枪声后,立即冲出大门,挥舞战刀指挥战斗,但伪靖安军顶不住大刀会冲杀,纷纷退进院内。森秀树见势不妙,也想撤回院内,刚跑到门口,被大刀会友薛永禄几步窜到他的身后,手起刀落,将他当场劈死。

日军第二师团天野旅团于1932年12月13日从海城出发,向岫岩进攻。与此同时,驻辽阳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第二中队长长冈宽率领日军100余人和伪辽阳县县长杨显青、日本参事官成泽直亮率领的伪军700余人前往岫岩“讨伐”。12月17日,当日伪军到达岫岩城北黄花甸子、关门山一带,突然遭到义勇军刘景文、李纯华等部的猛烈攻击。此战,击毙日军50余人,伪军100余人,伪参事官成泽直亮以下日军数名被俘,400余名伪军被缴械。伪县长杨显青带40

余人逃回辽阳。

12月下旬,日伪军继续“讨伐”三角地区的义勇军。这批日伪军主要集中在哨子河以北文家街、红花岭和尖山窑一带。邓铁梅、苗可秀侦知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后,于12月28日黄昏率队到达文家街西南山头,占领了制高点。随后,便以猛烈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庄河的大刀会和邓铁梅的大刀队,手持大刀长矛,很快攻入文家街内。义勇军多次发起冲锋,把敌人围逼到红花岭上。黎明之后,敌人逃向何家堡子、尖山窑一带。邓铁梅、苗可秀决定乘势收复被敌人占领的尖山窑据点。12月30日,义勇军向尖山窑发起攻击,邓铁梅亲自督战,翌日拂晓即攻入尖山窑镇内,敌人逃到白旗堡。几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日伪军对三角抗日区的第一次“大讨伐”,巩固了义勇军的活动区域。

从1933年春开始,日伪军又连续对三角地带义勇军进行“大讨伐”,到1934年春又进行了第4次“大讨伐”。这次“大讨伐”,敌人实行“归屯并户”政策,妄图断绝民众与义勇军的联系。结果,致使义勇军陷于困境,义勇军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在义勇军分散活动中,邓铁梅司令在一农家养病时,被敌人侦知被捕,1934年9月被日伪杀害于沈阳陆军监狱。邓铁梅牺牲后,苗可秀将邓部民众自卫军改称“中国少年铁血军”,继续转战在辽东三角地带。1935年,苗可秀作战负伤被俘,遭日军杀害。之后,队伍大部分瓦解,但个别余部一直战斗到1939年才最后终止。

三、辽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1932年春,抗日义勇军在南满路中段沈阳至盖平间数百里的铁路两侧,开辟了辽阳、鞍山、海城、营口、盖平、台安等地的辽南活动区域。

1932年二三月间,中共北平市委派共产党员冯基平^①、共青团员林郁青、反帝大同盟成员李烈生(张寿箴,李兆麟)^②等人到辽阳小堡一带组织义勇军。他们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组织“长江”、“三省”、“燕子”等小股武装和当地民团联合抗日。3月中旬在辽阳三家子组成第二十四路抗日义勇军。为便于团结小股武装,公推烟台区区长、民团首领苏景阳为司令,李烈生为联络员,实际上是代行指挥的职责。1932年6月,党又派共产党员魏拯民^③和共青团员夏尚志^④等到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工作。9月间,中共河北省委派共产党员侯薪、孙乙泰到达辽阳并与中共奉天特委接上关系,然后到第二十四路义勇军统辖的第一支队沈宝林部工作。第二十四路义勇军系中共派员~~直接~~组建,其部队和附近农村还建立了共青团组织和反帝大同盟、反日会、农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成立了义勇军、小堡、荣官屯3个团支部。7月间由夏尚志主持成立了共青团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冯基平、夏尚志、林郁青等领导。1932年初,在沈阳南郊还建立

① 冯基平(1911—1983),又名冯乃革,辽宁法库人。1931年奉中共北平市委派遣到辽西义勇军耿继周部任秘书长,1932年春又到辽阳组建第24路军义勇军。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

② 李烈生(1910—1946),又名张寿箴、李兆麟,辽宁辽阳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辽阳参与组建第二十四路抗日义勇军;同年末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为军委负责人。1933年10月参与组建珠河反日游击队工作。之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政委、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东北抗联教导旅政治副旅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滨江省副省长。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③ 魏拯民(1909—1941年),原名关有维,山西屯留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党派到东北工作,历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1936年后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委、中共南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41年在桦甸县病逝。

④ 夏尚志(1908—1990),又名张福增,吉林镇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巴彦游击队,历任双城县委书记、奉天特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等职。1990年病逝。

了第二十一路义勇军,活动于苏家屯以南地区。这是距沈阳市最近的一支义勇军。

在辽南组建的另一支义勇军是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于1932年2月末在海城县韭菜台联合张海天、吴三胜等部义勇军组建的辽南救国军。李纯华为总指挥。同年5月又有辽阳王全一、营口顾冠军等部加入,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6月间,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委任,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还派原东北大学学生高鹏、纪亭榭等人到辽南义勇军中工作。

在辽南活动的第二军区各部义勇军控制着广大农村,频繁袭击铁路沿线敌人控制的城镇,给敌人造成极大威胁。营口、海城一带的项青山、张海天、顾冠军各部义勇军冲破敌人“讨伐”,逐步向北发展。他们争取了驻辽中的伪军一个连官兵起义,于5月27日占领了辽中县城,5月29日又攻占了台安。6月,日伪军多次重占台安,不久又被义勇军攻陷。这几进几出,日伪疲于奔命,损失严重,惊呼“遍地皆匪”,“剿不胜剿”。

为破坏敌人的铁路运输,义勇军各部不断袭击敌人的车站及日伪军巡逻队,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据满铁“匪情统计”,仅7月中、下旬的20天内,满铁沿线被义勇军袭击、破坏事件就达1063起^①,平均每天达50余起,使敌人的铁路运输几乎陷于瘫痪。

1932年8月初,第二军区向营口、海城、辽阳等城市发起了新的攻势。8月1、2日,顾冠军部两次夜袭营口市,与敌激战,包围了新市街。日伪兵力不足,从海上调来舰船六七只,并运来海上陆战队增加防御能力。8月上旬,李纯华部义勇军4次袭击了海城车站及附近日军设施。8月7日晚,辽阳纺纱厂工人尚吉元为迎接义勇军吴宝丰

^① 《盛京时报》,1932年8月23日。

部攻打辽阳,将纺纱厂车间点燃起火,顿时厂房内烈焰腾空。城外的义勇军因日军的阻击未能攻入城内。厂内日本警察前往弹压,尚吉元毫不畏惧,用事先准备好的菜刀砍伤了两个日警,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尚吉元的一把烈火,烧毁棉花万余斤和不少机械设备,使敌人经济上受到损失;他勇于牺牲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抗日救国的热情。

8月下旬,第二十一路、第二十四路义勇军经过认真准备,3次袭击日伪统治中心沈阳城。8月28日晚,第二十一路、第二十四路义勇军3000余人从东、南、北三面向沈阳城发起攻击。北路行至北大营附近与敌人发生激战,击伤了日本顾问和伪警察分局长等多人,后因敌人火力强大而被阻。南路义勇军占领了药王庙、勒石胡同等处,将伪军30人缴械,击伤了前来督战的伪警察局长齐恩铭,并与日军在大南门附近对峙。东路义勇军在反正的伪靖安军王营长的配合下,烧毁了敌大东航空处汽油库和飞机库,库内20余架飞机和汽油均被烧毁;而后又攻打了兵工厂,破坏了无线电台。战斗结束后,王营长率起义的1个排伪军加入了义勇军。8月29日、9月1日义勇军再次攻打沈阳,虽未能攻入城内,但在广大群众中却造成了良好的政治影响。1932年9月,根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关于按照辽宁全省义勇军的整体分区编列的安排,将第二军区改称为东北义勇军第一军团,军团总指挥由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兼任,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李纯华,下辖九路4个支队,转战沈阳南部、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台安、辽中等地。

1932年冬,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资助辽南、辽东抗日义勇军一批军火,内有弹药20余吨和迫击炮、轻重机枪等武器。11月底,辽宁义勇军第二军团代总指挥李纯华等率人从海上押运军火,在黄海岸枣儿沟(现属辽宁省东港市)登陆。枣儿沟一带是邓铁梅所部义勇军防

地,军火上岸后,邓铁梅和苗可秀派武装护送到凤城与岫岩交界处。此时第二军团王全一部也到达岫岩关门山一带准备接运军火。利用这个机会,苗可秀以救国会联络员名义邀请邓铁梅、李纯华、王全一、刘景文、李子荣等各部义勇军领导人到岫岩县境哨子河聚会,研究军火分配和商讨抗日之大计。这次聚会对各部义勇军团结抗日,协同作战,一致对敌起了重要作用。转战于辽南地区的义勇军第二军区所属各部,由于辽南地区日伪统治严密,兵力强大,难以坚持在当地活动。1933年初,第二军区各部2000余人退出辽南地区,转往热河,时值热河战起,便参加了热河保卫战。

四、东边道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在辽宁东部地区,以通化、桓仁为中心的东边道地区于1932年春创建了“辽宁民众自卫军”。1931年10月,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公开投敌,驻防在桓仁县的辽宁省防军步兵第一团中校团副唐聚五和该县警察大队联络,秘密商讨抗日大计,东边道各县公安局长和警察大队长也愿意联合起来抗日。在唐聚五、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王凤阁等相互联系,经救国会代表黄宇宙等奔走联络下,各县抗日代表30余人于1932年3月21日在桓仁开会,商定组成辽宁民众救国会,推举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务委员,会内分设政治、军事委员会,王育文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唐聚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内设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唐聚五任总司令,下辖18路义勇军。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县师范学校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宣布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大会发表了辽宁民众自卫军抗日暨唐聚五就职通电,内称:“聚五等份属国民,兴亡有责;职为军人,尤须杀敌。今而不举,更待何时?”唐聚五还写下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8个大字。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基本成员是原辽宁

省防军步兵第一团的两个营和通化、桓仁、临江等县的公安警察大队共 5000 多人;此外还收编当地民团、绿林队伍,共编成 18 路,总兵力约 3 万人。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司令包景华,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任国民党奉天党务特派员、辽宁省党务指导员,因参加国民党改组派被免职,返回家乡柳河县三源浦任小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2 年初,在共产党员王仁斋的帮助下,建成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第九路义勇军允许共产党派人到其部队活动,允许共产党员任职,还允许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中共柳河中心县委按省委指示派共产党员王仁斋、刘三春等到第九路义勇军中工作,王仁斋曾任上校政治教官。此外还有一批进步青年、互济会员、反日会员也到该部从事反日宣传活动。

1932 年 5 月以后,桓仁、通化、新宾等县相继被义勇军攻袭,辽宁民众自卫军开始向日伪控制的地区进军。日军闻讯,立即调动 200 余日本武装警察进攻通化,并命于芷山率伪军威胁新宾。5 月初,汉奸于芷山率所部第三团团团长田德胜、大队长邵本良两部约 3000 余人,并有日本军官数人随军督战,进逼新宾。驻守新宾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李春润部在新开岭、老城等处阻击敌人,击毙伪军少校参谋刘芷藩以下官兵数十人,日顾问大冢农昔也被击毙。于芷山见部下伤亡过甚,即命部队向山城子、清原一带退去。

1932 年 5 月 7 日,于芷山率伪军进入新宾县城。5 月 14 日,民众自卫军李春润、郭景珊部收复了新宾县城。于芷山不甘心失败,5 月 27 日又纠集两个团共 2000 余人,再次进犯新宾。6 月 1 日,李润春部再向伪军发起进攻,攻克了新宾县城,于芷山险些当了俘虏,邵本良带伤逃跑。于芷山向东撤退时,途经东昌台、三棵榆树一带时,又遭到王彤轩大刀队、马锦波卫队营的伏击,民众自卫军缴获了伪军很多

枪支弹药,取得了很大胜利。五六月间,义勇军王凤阁部攻占了柳河县,收复了金川、辉南县城,重创伪军王殿中部,伪军田德胜团一个营被全部缴械。6月上旬,辽宁民众自卫军总部由桓仁迁到通化。这时,日军分别从朝鲜的惠山、中江、满浦、楚山、昌城等处越过鸭绿江,侵入长白、临江、辑安(今集安)等县,并继续向西进犯,妄图攻占通化。辽宁民众自卫军各部奋力御敌,日军被阻不得前进。8月间,李春润、王凤阁、包景华各路部队在沈海铁路沿线活动,扒毁铁路,中断运输,先后攻占南杂木、营盘车站。海龙县城曾被围困50余日,城内伪军几乎弹尽粮绝。9月15日晚,第十一路梁锡福部袭击抚顺市郊平顶山、杨佰堡等地,打死打伤日本杨佰堡采炭所长渡边等多人,烧毁了老虎台矿的汽油库、无线电台、安全灯房等设施,使全矿停产。义勇军撤走后,日军不敢出城追击,竟把兽性发作在老百姓身上。9月16日中午,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及伪警察等大批兵力开到平顶山村,以该村通匪为由,将全村群众集中起来进行血腥屠杀。日军架起机枪先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扫射,然后用刺刀、步枪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居民进行残酷的杀戮。这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使3000多名中国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刀枪之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大惨案。

1932年夏秋之际,唐聚五部辽宁民众自卫军得到很大发展,对日伪在辽东的各个据点连续发动进攻。在这些战斗中,自卫军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战斗意志一直很旺盛,牵制了大批日伪军兵力。

1932年10月以后,日军调动3个旅团以及从朝鲜越境的日军及东边道伪军共约3万人向唐聚五部发动攻势,东边道地区通化、新宾、桓仁等县相继失守为日军占领。唐部向抚松一带集结,想利用该地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的条件坚持斗争,但在转移途中不断遭到日伪军追击,队伍受重大损失。在这种情势下,唐聚五把部队交与第七路司令郭景珊指挥,只身化装潜往北平。同年冬,部队难以坚持,郭景珊

率部突围退往热河。但也有一小部分队伍到东丰猴石一带坚持抗日,1935年还一度攻占东丰县城。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九路军王凤阁部在1932年秋冬之际,转移到通化、集安交界的大罗圈沟一带活动。这里山高地险,易守难攻。王凤阁在这里修建了小型兵工厂、被服厂、粮食加工厂等,以保证生活需要。1937年春,在日军重兵围剿中,队伍防线被突破,王凤阁及夫人、幼子被俘,后在通化玉皇山下被害。

流亡到东北

与唐聚五部辽宁民众自卫军联合抗日的有一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抗日队伍。这部分队伍原是1929年在辽宁兴京(今新宾)旺清门成立的朝鲜革命军。这支部队于1931年12月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发动东边道地区朝鲜族人民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不料行动被日本军警侦知,导致该军主要领导人被捕,70余人被日军杀害。在危急时刻,朝鲜革命军第三中队长梁瑞凤挺身而出,重整革命军,并任总司令,部队共有400余人^①。梁瑞凤还在通化县江甸子创办速成军校,先后培训学员700余名,内中有少数汉族青年。1932年3月,梁瑞凤曾联合王彤轩所部农民自卫团组成辽宁农民自卫团,并一度占领兴京县的永陵街。后来唐聚五所部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成立后,梁瑞凤所部参加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与唐部共同进行了多次战斗。在唐部瓦解后,梁瑞凤所率部队仍称“朝鲜革命军”,继续坚持抗日斗争。1934年9月,梁瑞凤被叛变投敌的山林队首领“压东洋”杀害于桓仁县小荒沟。梁瑞凤牺牲后,队伍改组,其~~中~~有的参加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军继续抗日。

1932年3月21日

BJP120, 4月21日

原部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司令李春润部在唐部大部分瓦解后,率部分队伍转移到辽东三角地带继续抗日。1933年8月,李春润为保

① 《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56页。

护军火,在大李家堡子与日伪军作战负伤牺牲。

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包景华部在义勇军溃散后,由共产党员王仁斋、刘三春收编残部,在中共海龙县委领导下,组成海龙游击队,以后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在辽宁省境内,还有原为国民党改组派、国民政府委员的朱庆澜于1932年夏,在辽西、热河一带组建的“辽吉黑国民救国军”。朱自任救国军总监,收编10余支抗日队伍,转战于锦西、义县、北票、朝阳等地,配合辽西、辽北各路义勇军对日本侵略军作战。

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斗争,在1932年夏秋之际发展到高潮阶段。抗日义勇军队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辽宁各地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58路,27个支队,人数达15万人。大刀会、红枪会等农民抗日武装也在各地相继出现,从而使武装力量急剧发展。日军第八师团开进辽西后,加紧对义勇军进行“讨伐”,而各路义勇军各自为战,很难形成统一集中的军事力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鉴于这种情况,遂于1932年6月将辽宁各地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辽西第一军区,总指挥彭小秋;辽南第二军区,总指挥王化一(由李纯华代理);辽东第三军区,总指挥唐聚五;辽北第四军区,总指挥熊飞;辽北蒙边第五军区,总指挥高文斌。各军区分别指挥所在地区各路抗日义勇军。1932年9月,以朱庆澜为首的“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合作,又将5个军区分别改为第一、二、三、四、五军团,同时增编了冯占海的第六军团和冯庸的第七军团。这一期间,义勇军人数有了很大发展,参加义勇军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部分城镇工人和地方上的警甲、乡团;一些开明地主、士绅乃至县长、公安局长及商会、教育会会长等上层人物也投身到义勇军的战斗行列,初步形成了一个全民奋起联合抗日的形势。1932年一年内,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各地同日伪军作战数以千计,毙伤日军千余

人,伪军数千人;许多城镇被义勇军袭击,铁路被破坏。虽然辽宁各地义勇军在1932年末到1933年呈现失利、瓦解之势,但却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绝不当日本侵略者的奴隶,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第三节 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的抗日斗争

一、吉林自卫军的组成,哈尔滨保卫战

吉林省的抗日义勇军,主要是以驻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组建而成,在组建过程中也容纳了一部分绿林武装,其活动区域是松花江下游原吉林省东部(简称“吉东”)地区。九一八事变时,在原吉林省境内东北军驻军有陆军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第二十八旅、骑兵第七旅、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公署卫队团,总兵力9个旅、一个卫队团,约6.5万人。部队分驻省城吉林和长春、依兰、延吉、哈尔滨等地。日军进占吉林后,在熙洽诱惑拉拢下,先后有4个旅附逆投敌,有几个旅拒绝利诱,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

1931年9月24日,吉林省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①,向其部队及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驻哈尔滨的邢占清第二十六旅和驻双城的赵毅第二十二旅也宣布抗日。9月

^① 李杜(1880—1956)原名荫培,字植初,辽宁义县人。1901年投身军旅。1928年任吉林省依兰镇守使兼第九旅中将旅长。九一八事变后奋起抗日,1932年1月成立“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任总司令。自卫军抗敌失败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2月,被推举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1945年,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1956年8月病逝。

25日,原驻吉林省城的张作舟第二十五旅,除一部分投敌外,全旅大部分官兵撤至榆树县城,宣布抗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团长冯占海部约3000余人,在吉林未被日军占领前即撤至永吉县官马山一带;9月末,在桦甸县境内老营盘宣布抗日。誓师大会后,冯占海率部队向吉林东部地区挺进。10月下旬,冯占海率部队渡过松花江,向舒兰、五常方向进发。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援,许多有识之士和爱国青年纷纷加入抗日军,在吉林东部一带活动的小股绿林首领宫长海、姚秉乾等部也加入冯部抗日,抗日军声势大振。

1931年10月间,张学良、张作相指示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在宾县重组吉林省政府,以示不承认熙洽的汉奸政权。诚允为吉林省政府代主席、李振声代吉林边防军副司令、丁超代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吉林警备司令兼新编第一旅旅长。新加入抗日军的绿林首领宫长海、姚秉乾也被委为骑兵旅长,受冯占海统一指挥。会上还宣布抗日各部队官兵均归重新组建的吉林省政府统辖,吉东并松花江下游地区29县宣布服从临时省政府领导,这样就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条件。

1931年10月末,汉奸熙洽的伪吉林省政府起用了早在事变前就被张作相撤职的骑兵第十六师师长于琛澂为吉林省剿匪军司令,马锡麟为副司令,以投降日军的原吉林军部队为骨干,重新编成5旅伪军,一个铁道守备队司令部,每旅有日军一小队。吉林省城原有库藏枪支弹药尽数取出装备伪军。伪军组成后开赴榆树、五常、舒兰等县对抗日军展开进攻。12月末,于琛澂部伪军以优势兵力进攻驻榆树县城的张作舟第二十五旅,张部奋力抵抗,终因兵力单薄,部队伤亡过半,旅长张作舟被俘,榆树失守。冯占海部转战舒兰、五常之间,并向哈尔滨方向移动,以保卫哈尔滨市和设在宾县的吉林省政府。

1932年1月下旬,伪军于琛澂部开始进犯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前,吉黑两省以松花江为界。由于中东路局及其中东路机构均设在哈尔滨,为国际交通中枢,故以哈尔滨道里、南岗一带由东省特别区管辖,道外设滨江道,属吉林省管辖。东省特别区长官原系土匪出身的张景惠,事变后虽未公开投降,但早已和日人勾结,进行卖国活动。1931年12月份以来,哈尔滨市形势日趋紧张,人心浮动。这时在哈尔滨及其附近的抗日部队有自舒兰、五常来的冯占海部,李杜的第二十四旅,邢占清的第二十六旅,丁超的第二十八旅,赵毅的第二十二旅,共约5万余人。驻宾县的吉林省政府通过李杜、冯占海联络滨江镇守使、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抗日。1932年1月25日、26日,李杜、冯占海率部队开抵哈尔滨市进行布防。

1月27日、28日,于琛澂伪军主力从五常向哈尔滨进犯,另一股伪军配合日军从哈长线逼近哈尔滨。伪军分别向上号(香坊)、南岗、三棵树发起攻击,李杜、冯占海所部官兵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在抗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伪军大败,纷纷逃向阿城。抗日军的哈尔滨保卫战首战取得胜利。在1月27日作战中,日军4架飞机飞抵战场上空助战,其中一架被丁超部战士用步枪击中,飞机受创后着陆,在机内的日军炮兵大尉清水下机抵抗,被抗日军击毙,飞机被焚毁。抗日军击退于琛澂伪军之后,哈尔滨市各界民众和社会团体纷纷前往慰劳,赞誉抗日军将士挺身国难、杀敌保国的壮举,并捐献现款2万余元。民众的爱国热忱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官兵。为加强对各抗日部队的统一指挥,原吉林军各抗日将领李杜、丁超、冯占海、邢占清、赵毅以及吉林省警务处长王之佑等,于1932年1月3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各抗日部队联合组成吉林省自卫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

敌总指挥。1月31日,吉林自卫军发表宣言,要求自卫军各部“一致团结,共赴国难”,“卫国卫民。”

粉碎于琛激伪军对哈尔滨的第一次进攻之后,吉林自卫军在军事上加强了对哈尔滨的防守,各部队分驻城内外,备战待敌。于琛激伪军进犯哈尔滨失败后,日军迅速从辽西锦州调兵北上,准备再次进攻哈尔滨。1932年1月30日,日军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开抵双城堡车站,与驻守双城堡车站的自卫军赵毅所部第二十二旅发生激战。从30日晚到次日晨,日军以优势兵力出击,出动装甲车、坦克和20多架飞机参战,赵毅旅伤亡惨重,于1月31日下午退至哈尔滨。双城阻击战失利,通往哈尔滨的门户洞开。

日军攻占了双城堡,控制中东路哈长线,运兵的速度大大加快。2月2日,日军增调第二师团司令部、第十五旅团及铁道独立守备大队等大批兵力逼近哈尔滨南郊地区,在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同时采取了日军为左路,伪军为右路的分进合击战术,向哈尔滨市内发起猛烈进攻。赵毅部从双城堡撤退至上号一带,未及休整又投入战斗。自卫军司令李杜亲临前线督战,由于日军进攻猛烈,加之哈尔滨市未能修筑防御工事,防区被迫一再收缩,渐次不支。2月4日拂晓,日军发起总攻,先后突破顾乡屯、南岗防线,自卫军接连失利。2月5日晨,日军又发动攻势,并于同日下午攻占哈尔滨火车站,突入道里区,迫使自卫军无力据守,自卫军将士虽死命杀敌,但终无法阻止日军进攻。2月5日晚,自卫军全线撤退。北满重镇哈尔滨遂告陷落。哈尔滨失陷后,自卫军总部撤至依兰,其余各部则在巴彦、通河、方正、延寿、珠河、密山等地驻防,坚持开展反日斗争。

吉林自卫军的抗日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肯定,在

①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评述》,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1期,第2页。

1932年1月30日日军大举进攻哈尔滨时,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哈尔滨告士兵群众书》,号召“士兵兄弟们要将军队枪械库的武器拿出来武装哈尔滨民众,与哈尔滨工农民众一致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①。后来省委又在一份向中央的报告里指出:“从今年一月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哈尔滨时,丁超、邢占清、冯占海等部下的士兵积极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且获得了许多胜利,二十六旅的士兵英勇的向日军进攻……”^②吉林自卫军的组建及其初期抗日战斗,不仅在军事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也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二、吉林自卫军在下江的抗日斗争

1932年初,中东路呼海路沿线及松花江下游(简称“下江”)地区广大农村也兴起了义勇军的反日斗争。尤其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大刀会、红枪会也相继出现。吉林自卫军各部吸收了这些民众抗日武装参加抗日,使这支纯由吉林军组成的抗日队伍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扩大了反日武装和活动区域,使松花江下游和吉林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有所发展。中共满洲省委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新工具‘独立政府’的进攻,也遇到了二十六旅、二十八旅士兵与各地民众义勇军的武装反抗,更在十九路军士兵的反日战争与全国反日斗争更形高涨之下,满洲的反日斗争更剧烈的发展起来。”^③这时北满党组织派在兵委工作的一名工人党员带几个同志到冯占海

^① 《中共满洲省委告士兵群众书》(1932年1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203页。

^② 成湘:《关于满洲目前政治经济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向中央报告》(1932年7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179页。

^③ 《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1932年3月3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48页。

部队去,在军队中散发了许多宣传品,在士兵中影响很大。

1932年3月中旬,日军又调集第二师团所属第三、第十五旅团及两旅伪军分三路向自卫军各驻地发起进攻。日伪军3万多人在飞机掩护下,在珠河县黑龙江宫、延寿县夹信子,方正县的会发恒、高丽帽子、桶子沟等地从三面向自卫军围攻,其中尤以桶子沟一役最为激烈,冯占海率第三旅士兵与日军厮杀。战斗最激烈时,第二师团长多门亲到前线督战。经一夜混战,敌军丢弃10余门大炮及大批枪械退回高丽帽子,日伪军死伤逾千,伪军投诚反正2700余人,但自卫军的伤亡也很大。

自卫军撤退时,在方正南天门等地与日伪军进行多次重大战斗。但是从战役的整体看,日军武器装备精良,特别是重武器威力甚大。自卫军虽在局部取得胜利,却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进攻。自卫军连日作战伤亡很大,弹药消耗殆尽,遂于4月4日放弃方正,退到依兰。

1932年4月下旬,部队经休整后,战斗力得到恢复。广大官兵收复失地要求甚高,纷纷要求反攻哈尔滨。下江地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群众抗日武装也要求自卫军打回去。为此,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在依兰召开军事会议。大家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天气渐暖,江河解冻,便于部队活动;加之黑龙江省的马占山抗日义勇军牵制了大批日军,敌在哈尔滨的防御必然空虚,正是自卫军反攻的大好时机,且此时正值国联调查团即将到东北之际,进攻哈尔滨无论成功与否,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

具体军事部署是:左路总指挥马宪章率第一旅及苇河一带的红枪会由马桥河攻铁岭河、海林、一面坡之敌,然后逼近哈尔滨,并联络救国军王德林部牵制延吉之敌。中路总指挥杨耀钧率第二十六旅由依兰出发,经大小罗勒密、方正、延寿、珠河,沿途收编红枪会、大刀会向哈尔滨推进。右路总指挥冯占海率所部及宫长海等部,由依兰出

发向西哈尔滨挺进。李杜、丁超坐镇依兰指挥。

进攻开始时,左中右三路大军进展顺利。4月24日,右路冯占海部从依兰出发后,4月25日,先头骑兵部队一举攻克了方正县城。冯部只留少数部队驻守方正县城,主力继续前进,经过几次与敌战斗,5月2日进逼宾州城下。冯部兵临宾州城下,配合当地红枪会,在5月3日经3小时激战攻入宾县城内,伪军团长辛青山以下百余人被俘,余部溃逃。5月4日,冯部攻克距哈东40公里的蜚克图,前锋则逼近市郊老山头、荒山嘴子一带。但冯部孤军深入,无力攻城,只能等待左、中两路大军。

杨耀钧、邢占清率中路大军,沿途收编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于4月29日包围珠河县城。城内守敌有伪军1个团,车站驻日本铁道守备队1个大队,配有铁甲车。攻城开始后,经半日激战,自卫军攻入城内,伪军被歼大半。但车站日军火力甚猛,自卫军强攻不下,形成了对峙态势。这时左路军也先后攻占了亚不力、横道河子等车站,包围了一面坡之敌,使珠河日军被困。中路军经几日激战,于5月7日攻克珠河车站,歼敌数百人。自卫军及大刀会、红枪会均有重大伤亡。

正当吉林自卫军向哈尔滨挺进时,关东军司令部也在加紧调整军事部署。4月初,调第十师团到哈尔滨接替第二师团防务。第十师团到哈尔滨后,即于4月19日组成第八旅团村井支队,从陆路向一面坡、海林一线攻击。20日,又组成第三十三旅团中村支队,乘舰船沿松花江顺流而下向方正一带攻击。29日,中村支队在方正南天门登陆,与自卫军右路冯占海留驻的部队发生激战,5月7日,日军再次占领方正县城。为支援中村支队作战,日军第十师团又相继组织了第二、三、四船队沿江而下,到达南天门码头与中村支队汇合。5月初,第十师团司令部又把派到一面坡、海林一线个村井支队调回哈尔滨。一面坡、海林一线的防务则有刚从上海调到哈尔滨的第十四师团先

行部队第二十八旅团接防。村井支队与第十师团司令部一起组成村井第五船队从哈尔滨出发沿江行进,5月12日,到达通河;15日中村、村井两支队及支援部队登陆,在师团长广濑亲自指挥下对依兰实行包围。中村支队到达距依兰20公里的二道河子。强敌逼近,依兰形势危在旦夕。自卫军领导人李杜原以为依兰北面、西面有松花江、牡丹江作屏障,南面有崇山峻岭,无被攻之虞。因此部队尽皆派往前方作战,致使依兰城防守空虚,当敌人突然攻来,自卫军总部及后方人员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撤离,日军很快攻入城内。自卫军长期储备的大批粮食服装、武器均落敌手,李杜率总部人员撤往穆棱县的梨树镇。日军又很快占领了汤原、佳木斯、富锦等松花江沿岸各县、市。依兰失守后,自卫军司令部与前方各部队一度中断了联系。更因前方部队粮秣弹药和服装无以补充,伤员无法治疗,士气大受影响。

在延寿、珠河地区的自卫军中路邢占清、杨耀钧等部因给养断绝,战斗力大减。少数部队突出日军包围退至勃利、八面通一带休整。

自卫军左路因总指挥马宪章与刘万奎发生矛盾而互相仇杀,致使部队溃散。

冯占海部在宾县等待自卫军各部队反攻哈尔滨无望,又与李杜失去联系,遂于1932年5月下旬,整顿队伍,改称吉林救国军,公推冯占海为总指挥,李文光为参谋长。6月1日,冯军一部攻占哈尔滨市东面重镇阿城后,又挥师南下。7月2日,冯占海部3个旅向榆树县境内进发,进入榆树县境泗河城一带。当地群众得知抗日义勇军到来打日军,纷纷前来报告敌情和带路。经靠山屯、双榆树两次战斗,击毙日军指挥官大川、何部、草野等3人,伪军21人,俘敌500人,缴获步枪数百支、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7挺以及大批军用物资,日伪败退至榆树县城。冯占海部挥师直扑县城,伪军刘宝麟旅不敢应战,弃

城而逃,冯占海部遂占领榆树县城。之后,稍事休整撤出,继续前进,连续攻克五常、舒兰县城。冯占海部攻破舒兰县城后,退据水曲柳岗休整。这时在舒兰南部活动的田霖领导的义勇军 500 余人参加冯占海部救国军。8 月上旬,冯占海部从舒兰向吉林挺进。8 月 27 日,在珠琦川召开了团以上军事领导人会议,研究攻取吉林的计划。以宫长海部组成的攻城主力部队,从 9 月 10 日至 13 日,虽连续强攻,终因守敌顽抗,无法攻入市区,激战数小时后,即改变攻击计划,停止对吉林省城的围攻,部队转向舒兰、五常、榆树一带活动。

吉林自卫军李杜各部,从 1932 年 5 月依兰失守撤至梨树镇以后,招兵屯粮以备再起。各部队开展小规模游击活动,尚能坚持。但到了 1932 年 11 月,形势发生变化。这时,日军已将黑龙江的马占山、苏炳文部击溃,转而集中兵力向哈绥路沿线和松花江下游地区展开围剿。1932 年 11 月下旬,日军以 3 个师团的兵力向松花江下游进犯。在日军强大攻势面前,丁超、王之佑先后投敌,所属部队尽被缴械。日军乘势进攻,占据八面通,直指梨树镇。丁超已降,李杜势孤难支,遂率部北移。北移途中又屡遭敌人攻击,部队伤亡很大,队伍基本溃散。12 月下旬,李杜、邢占清、杨耀均率残部沿穆棱河北岸向虎林撤退,1933 年 1 月 9 日进入苏联境内,吉林自卫军抗日活动终止。

三、吉林国民救国军的抗日斗争

吉林省境内另一支较大的抗日部队是原东北军下级军官王德林^①创建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二十七旅旅长吉兴投降日军,王德林就下决心走抗日的道路,但由于吉兴的

^① 王德林(1875—1938),原系绿林出身,后被东北军收编。九一八事变前任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驻防安图瓮声砬子(今安图明月沟)一带。九一八事变后举旗抗日,成立吉林国民救国军,任总指挥。1933 年经苏联回关内。1938 年病逝。

牵制,一时间难以举事。1931年11月间,日本急于修筑吉(林)会(朝鲜会宁)路,使其早日全线通车,从敦化派测量队到瓮声砬子进行筑路测量。吉会路修筑权是1909年日本帝国主义同清政府签订《中日间岛条约》时攫取的特权。该路从朝鲜会宁到中国吉林。但是由于遭到延边地区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一直未能全线通车。到九一八事变时只修筑了图们至天宝山之间,敦化至吉林之间两端线路。当时日本测量队在一队日军保护下进入第三营防区进行测量,并占领了第三营在砬子上的哨所,王德林命令值日班长向日军开火,当场击毙日军2名。效忠日本的吉兴怕日军怪罪,急令王德林率第三营离开吉会路线,命其到五常、舒兰参加于琛澂的剿匪军。为了麻痹敌人,王德林佯作服从,一面率队向五常方面移动,一面积极准备公开起事抗日。

中共东满特委在得知王德林的抗日义举后,便派与王德林有旧关系的李延禄^①以及胡泽民、王毓民等10多名党团员参加王部的起义活动。国民党吉林省蛟河地方党部也派盖文华前往王部帮助组织抗日。1932年2月8日,在延吉县小城子,王德林率全营官兵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大会宣布队伍名为“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吉林救国军。王德林为救国军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总指挥,吴义成为前方司令,不久,又委任李延禄为救国军参谋长。救国军以王德林的第三营500余名官兵为基础,吸收了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各县警察、保安队及各县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总人数达1200余人。救国军成立后,中共东满特委又派遣李光组织了党员、团员、革命青年为基干的救国

^① 李延禄(1895—1985),吉林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官盐催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月被延吉县委派到救国军王德林部工作。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新中国建立后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等职。1985年病逝。

军别动队,后来成为救国军中战斗力很强,声望很高的队伍。

救国军成立后,为显示抗日决心,决定攻打敦化县城。敦化县城是日军修筑吉会路的据点,如能攻占该城,既破坏了日军筑路计划,又斩断朝鲜到吉林的交通,战略意义十分重大。1932年2月13日,王德林下达战斗动员令,同时派出一批人员到吉敦路附近区村发动群众破坏铁路桥梁和通讯设施,以使其与吉林的联系中断。敦化县城外有伪军曲团驻沙河沿,全团约1500人。其中不少下级军官及士兵对抗日军有同情感。城内驻日本警备队长谷大尉以下200余人,分守4门炮台;城内还有商团及保安队近300人。2月15日早6时救国军发起攻击,经过激烈争夺,救国军各部先后冲破东、南、北门,于7时许进攻市街,占领县署。击毙长谷大尉以下18人,俘日军21人,其余伪军从西门逃出城去。2月17日,由长春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副清水正雄少佐率领的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以猛烈炮火向敦化城内轰击,炮台被炸毁,上空有3架飞机轰炸,城内民房被炸。为了不使城内居民受炮火之灾,指挥部决定救国军于2月22日撤出敦化城向宁安、穆棱一带转移。此次救国军突袭敦化,对日军构成很大威胁,日军不得不加派大批兵力对吉敦路和敦化县城的防守。敦化战斗之后,救国军队伍扩大到5000余人。救国军在撤退转移途中,于2月下旬曾攻下敦化以北重镇额穆城(今蛟河)和宁安县沙兰镇。不久,救国军指挥部先后移驻宁安五虎林和穆棱兴源镇等地,大部队则集中于镜泊湖附近。1932年3月间,救国军发展迅速,编成7个旅、2个骑兵团,总兵力达2万余人,分驻宁安、东宁、穆棱、安图、珲春、汪清等10余县。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又在宁安镜泊湖南湖头对部队进行整训,王德林再次强调“杀敌寇、除汉奸,收复失地、安百姓”的救国军宗旨,并派出一些人员到乡村城镇宣传抗日救国,动员民众参加抗日队伍。救国军经过整顿,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救国军的迅速发展,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恐慌。从1932年3月起先后抽调汪清、延吉日军1个大队和独立守备队第六大队,以上田中佐为队长组成上田支队进攻敦化、宁安一带的救国军。3月中旬,日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共2000余人,自吉林敦化出发,向镜泊湖方面开来,以寻找救国军主力决战。救国军总部侦知敌意图,遂派补充团李延禄部设伏于镜泊湖南湖头墙缝一带阻击敌人。3月18日拂晓,一大批日伪军将行至墙缝附近,被日军逼迫带路的猎人陈文起,不顾个人安危,把日军领进我军的埋伏圈中。救国军发起猛烈攻击,伪军1个营投降,日军小川松本大尉以下120余名被击毙;救国军也有很大伤亡,猎人陈文起也被日军杀害。3月19日晚,敌宿营于小嘉吉河上沟。救国军得此情报后,即在镜泊湖西岸再设伏兵,并派兵诱敌深入,日军被包围在一个狭长地带。双方激烈厮杀,日军上田支队130余人被歼,被围日军在敌机的掩护下才得以逃出。第二天,救国军又先后在松乙沟、关家小铺设伏重创日军,日军连遭打击,于3月21日更加疯狂地向南湖头猛攻。救国军难以抵御,退至鹦歌岭。日军用密集炮火轰击,还用燃烧弹引燃山林,用山火围攻救国军。抗日军官兵虽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连长朴重根等71人壮烈牺牲。后经前方司令吴义成率部队赶来救援方得解围。

中共满洲省委对吉东地区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曾先后派人去作发动群众工作。1932年春,满洲省委派省委委员、军委书记周保中^①到宁安一带,设法打入吉林自卫军或吉林救国军工作,争取参

^① 周保中(1902—1964),白族,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人。1922年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曾任少将副师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赴苏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云南省政协主席等职。1964年病逝。

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5月间,周保中在宁安活动时被吉林自卫军发现,以“日本侦探”之嫌将其绑至左路军总指挥部审问。周保中借机申明本人身份和经历,阐释抗日救国主张和救国方略,左路军将领吴义成确信他是一位有胆有识、有来历的爱国者,欣然留他在左路军总指挥部宣传部工作。同年8月,吉林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聘周保中为救国军总参议。不久,王德林又委任周保中为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与吴义成一起工作。周保中到前方总指挥部后,即和胡泽民等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并在士兵中发展了一批党、团员,成为部队骨干。此后,周保中指挥救国军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先后攻克东京城、安图县城。9月间联合安图、桦甸义勇军再攻敦化县城,而后又一举攻克敌据点额穆。

救国军的抗日活动严重威胁着日伪在东满地区的统治,日军靠第二师团第三旅团的兵力已无法维持这一地区的“治安”。于是,日本政府从4月初开始先后派遣由驻朝鲜第十九师团一部组成以池田大佐为队长的间岛派遣队,下辖两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另派驻朝鲜日军国境守备队两个中队,分别到达延吉、珲春、敦化等地。同时又增派第十九师团第七十五联队第二大队开赴天(宝山)图(们)路担任警备。关东军第二师团所属第三旅团长长谷部照也率部向敦化进攻。这样,日军以近两个旅团和大批伪军围攻王德林所部救国军。为应对这一严峻形势,4月3日,救国军与吉林自卫军在穆稜下城子召开联席会议,议定成立吉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公推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原有各部建制、名义一律保留。经过协商,规定吉林自卫军担负中东路沿线的防务,救国军负责吉敦路沿线和东满地区的防守任务。此后,救国军各部与日伪军继续战斗。在6月以后,由于青纱帐起,山林繁茂,便于活动,救国军各部再次攻打敦化城,并破坏吉敦路桥2座。8月间,破袭吉敦铁路18次,迫使日军不得不加强吉敦

路的守备力量。以后该部继续在吉敦路沿线活动,曾克复安图。10月末,救国军各部联合反攻宁安,几度攻入城内,曾与日伪军巷战3昼夜,予敌人以很大杀伤。反攻宁安战役,前后持续10天,后因日军从哈尔滨、一面坡等地派第十四师团一部和混成第三十八旅团增援,救国军才撤出宁安城。到1932年秋,救国军各部发展、扩编步兵十七旅,4个补充旅,3个骑兵旅,1个卫队旅,作战部队约有6万人。到1932年冬,日军又加派兵力向救国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11月,天气骤变,风雪交加,救国军尚无棉衣御寒,冻饿难挨,处境异常困难。

日军于12月中旬开始,分别从延吉、汪清、牡丹江、哈尔滨等地出发,向宁安一带前进。1933年1月1日,日军广濑第十师团第八旅团园部少将组成支队,攻击磨刀石。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率补充团等3个团近千人的部队在磨刀石迎敌。日军发起攻击后,救国军部队在铁路南山岗,居高临下,沉着应战,敌人被阻不得前进。午后,敌人装甲车开到并以重炮轰击,磨刀石防守顿呈紧张状态。李延禄率队突围,向五虎林退去,磨刀石失守,整个中东路东线完全被日军控制。此后,日军集中兵力进逼东宁救国军总指挥部。

1933年1月5日,日伪军共集中6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之下,由五站分兵两路进攻东宁。救国军虽力守阵地,但均被日军攻下,东宁外围防线相继失守。1月6日,日军又增兵攻打东宁,救国军被包围,且又弹药告罄,经各旅长商议,王德林、孔宪荣于1月9日先行避入苏境,由吴义成兼代救国军司令。1月14日,东宁失守。1月下旬,救国军残部经李延禄改编,成立了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救国游击军,继续在宁安一带坚持抗日活动。

由吴义成兼代救国军司令所率的部队,经敌人围剿后尚未完全溃散,在汪清、安图一带活动。1933年末,吴义成所率部队只剩百余人,后转移到东宁老黑山一带。吴义成去东宁时,周保中在安图以救

国军总参谋长名义组织救国军辽吉边区留守处,周保中任主任。周保中率所部并联合其他义勇军在汪清、安图、宁安一带坚持斗争。

四、吉林境内其他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桦甸、敦化

在吉林境内由于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两大抗日部队的英勇战斗,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各地民众的抗日斗争,促进了各地小股抗日武装队伍的建立和发展。

1932年春夏以来,在吉林省境内先后又组成了数十支抗日义勇军队伍,其中实力较大者有:

罗明星率领的“三江好”义勇军。1932年初,吉林省九台火石岭组织起一支以矿工和农民为主体的抗日武装,第一任领导人宋海山牺牲后,工人出身的罗明星组成抗日义勇救国军,对外报号“三江好”。这支队伍活动于吉林的九台、德惠、双阳、永吉、舒兰、桦甸、磐石、敦化等广大地区,从最初几十人发展到七八百人,最多时达4000多人。队伍一组成,即投入战斗。1932年3月间,罗明星队6人趁夜深摸入九台敌人驻地,击毙伪连长1人,缴获长短枪70余支,伪军20多人反正参加抗日队伍。同年7月,罗明星队700余人包围驻在九台沐石河永衡发当铺里的敌人,缴获70余支枪。8月,袭击德惠县张家湾车站,缴获长短枪80余支,炮弹13箱,子弹1万余发。几试锋芒,声威大振。10月间,两破九台,捣毁伪县政府,吓跑伪县长。1933年初,罗明星队与“殿臣”队联合进攻永吉县岔路河镇,与日军守备队激战,罗明星腿部中弹,撤出战斗。此后,队伍不断出现在长春、吉林之间,活跃于京(“新京”)图(图门)线两侧,对日伪政权造成极大威胁。同年6月,罗明星又带4000余人的兵力打进九台,夺取部分枪支弹药,敌人惊恐,不得不将九台县政府搬至吉林城办公。1933年8月间,日伪当局集中日伪军3000之众,追击罗明星队,企图一举歼灭。

罗明星队侦知日军企图,经过周密安排,几经周旋,转到外围。待敌人困马乏之际,“三江好”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杀过来,用大刀砍死日军9名,然后撤走。“三江好”队一直坚持到1935年。后因处境极其困难,罗明星将“三江好”部队化整为零,待机再举。罗明星本人潜赴黑龙江省泰安县,因叛徒告密而被捕,1939年被杀害。

宋国荣率领的抗日救国义勇军第八路。宋国荣原系驻磐石的吉林省防军第八旅三十三团一营长,所率部队被称之为“宋营”。九一八事变后,三十三团团团长投敌,宋国荣拒绝收编,撤至黑石镇。1932年7月间,宋国荣先后收编了磐石、桦甸、双阳、伊通、海龙、辉南一带的地方武装和小股山林队,共组成4个团,接受东北抗日救国军委任的义勇军第四战区第八路军,宋国荣任司令。第八路义勇军成立后,宋国荣、傅殿臣两部人马,又调动小股山林队等共2000余人,于8月25日包围双阳县城,并在双阳外围与伪公安局300余人激战。9月9日,又联合磐石、双阳、永吉一带的山林队及傅殿臣等部,攻打磐石县城,占领4天,选出新县长,惩处一些汉奸,夺得一批给养,对日伪政权震动很大。9月21日,宋国荣部与傅殿臣部占领双阳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宋国荣登台讲话说:军人天职就是保土卫民,为国家人民,一定血战到底,头可断,血可流,决不甘心当亡国奴。宋国荣慷慨激昂的讲话,激励了群众抗日斗志,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纷纷加入义勇军。在双阳的共产党员肖丹峰带领部分青年加入宋部,担任宣传部长,开展党的工作。宋国荣、傅殿臣部占领双阳两个多月时间,发动抗日救国斗争,打击土豪劣绅,救济穷人。宋国荣占领双阳县城,引起日伪政权极大不安,11月间,日军驻公主岭守备队一大队和大批伪军对驻双阳的抗日军进行“围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义勇军主动撤离双阳,向磐石、桦甸、辉南山区转移,并跟随在那里活动的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继续进行武装抗日斗争。

活动在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一带的“朝阳队”。“朝阳队”的创建人孙兴周,辽宁朝阳县人,又称孙朝阳。原系马占山部龙江骑兵二旅一个营长。1932年秋,率部并联合一些绿林武装宣布抗日,成立“仁义军”,亦称“朝阳队”。“朝阳队”成立后,部队发展到近千人,活动于宾县、珠河、延寿一带。“朝阳队”成分复杂,不仅有破产农民、工人、学生,而且有一部分土匪武装,又缺乏懂军事人才,总是处于被动地位。1933年春,原巴彦游击队参谋长赵尚志打入“朝阳队”,并为“朝阳队”出谋划策。一次,“朝阳队”受到日伪军包围,赵尚志提出进攻宾县县城,转移敌人兵力,以解敌围的建议,得到孙朝阳的赞同。先由赵尚志率部分精锐部队智取宾县县城,日伪军忙于增援县城,解除了对“朝阳队”的包围,使“朝阳队”乘机冲出敌人包围圈。之后,孙朝阳任赵尚志为参谋长。1933年7月,“朝阳队”在哈尔滨附近又遭日军攻击,部队仅剩百余人。在赵尚志的劝说下,“朝阳队”联合其他数支反日队伍,于8月10日再次攻打宾县城,占领县公署,烧毁公安局,逮捕数名日军和汉奸走狗,缴获许多武器和军需品。由于二打宾县的胜利,“朝阳队”士气大振,许多反日军又纷纷来投,“朝阳队”恢复到七八百人,活动于宾县、珠河、方正、阿城及哈尔滨郊区,成为哈东地区的一支重要反日部队。但是,1933年秋,“朝阳队”发生变化,孙朝阳受敌人诱骗,不辨真伪,欲离队赴北平参加所谓义勇军首领会议,经赵尚志等人苦劝无效。孙朝阳赴北平途中,在哈尔滨被日特逮捕,后被杀害。之后,“朝阳队”士气涣散,士兵逃跑,全队只剩下80余人,不久便溃散。

田霖创建的吉林人民自卫军。田霖原是东北军吉林陆军第二旅一个营长,1932年2月,率部在吉敦铁路新站镇宣布抗日,成立“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田霖为司令,后有蛟河一带的红枪会以及绿林武装加入,部队共编成2个团。哈尔滨保卫战失利后,驻守马家船口的

吉林抗日自卫军苏剑飞部在五常县牯牛河与田霖部队相遇,加入田部。吉林人民自卫军经常活动在吉敦铁路沿线地区。1933年春,田霖接张学良密令率队向热河靠近,4月抵达热河边界。此时,热河已失守,长城各口相继陷落,田霖遂决定重返辽吉东部山区,继续坚持斗争。返回途中,在清原拦路沟与日伪军发生战斗,田霖不幸中弹牺牲,部队大部被打散。后来,苏剑飞部突出重围,并将田霖旧部200余人吸收,重新编为抗日义勇军游击队,共700余人,苏剑飞任大队长,继续活动清原一带。

王辅臣领导的德惠县抗日义勇军。1932年2月,设在宾县的吉林省临时政府主席诚允委任原德惠县政府公职人员王辅臣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司令,编为三个团。王辅臣联络各乡大排队,收编了几个山林队,人数最多时达2000多人,活动于岔路口、朝阳、上河湾、沐石河以东、松花江以西地区。战士身着便装,佩红袖标。1932年9月,王辅臣与幕僚李郁华、王佐臣等研究攻打德惠县城所在地大房身。9月5日,攻城战斗打响,义勇军冲到县公署大院门前,伪县长庞仙芝躲藏起来。伪县政府、警察局、财政局被捣毁。义勇军准备打开监狱,放出犯人,但由于保安总部和保安队驻在附近,凭借高墙大院严密防守,义勇军攻打不下,王辅臣决定撤出县城,到德惠、榆树、舒兰边境地区活动。此时,正值冯占海部攻入榆树县城,王辅臣驰赴冯占海部协商,王部被编入冯占海部吉林抗日义勇军,委王辅臣为二十五旅旅长。由于日军大批兵力追击,王辅臣部在松花江东一带很难活动。在危机中很多人动摇逃跑,队伍解散,王辅臣经亲友帮助隐蔽潜逃。1933年夏,王辅臣经人介绍认识了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董振国。王辅臣向董报告了德惠义勇军建立发展和失败经过。之后,到三肇地区进行抗日活动。1933年秋,王辅臣在郭尔罗斯后旗被捕,经营救出狱。1934年,王辅臣到松花江下游汤原一带组织抗日队伍,战

斗中负重伤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活动在吉林地区的义勇军还有一支是韩国独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韩国独立军。1931年11月2日,韩国独立军在五常县大石河子成立,总司令李青天。韩国独立军成立后,曾派参谋长申肃到哈尔滨会见滨江镇守使兼中东路长绥护路军司令丁超,达成协议,两军共同抗日,决定在中东路东线打击日伪军^①。1932年春,李青天部曾与冯占海部联合参加收复宾县的战斗。嗣后,独立军在五常、阿城、双城、珠河、穆棱、东宁、绥芬河一带,与自卫军、救国军联合作战,打击侵略者。1933年10月,由于活动困难,李青天率20余名干部进入关内。其余部后来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五军。

中国之革命与东北反日斗争

第四节 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一、黑龙江抗日救国军的兴起

1931年11月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拜泉、海伦等地,收容、整顿部队,吸收民团武装和民众抗日队伍,准备再战。但是1932年初,由于马占山在抗日道路上一度动摇,被日本利用,使黑龙江的抗日武装斗争出现了困难的局面。从1931年12月中旬开始,日本特务机关曾两次派人~~对马占山~~游说。~~由于马占山对当时复杂的形势缺乏冷静、正确的认识~~,1932年2月16日到沈阳,与汉奸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参加了所谓“四巨头会议”。会议名义为讨论联省自治,实际是为筹建伪满洲国。马占山很快识破了日本的阴谋,感到自己上当,因此未在日方草拟的“建国宣言”上签字。但接受了伪黑龙

^① 《中国朝鲜族革命斗争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

江省省长职务。

马占山参加“四巨头会议”后,全国各地纷纷来电谴责其变节之举,其旧部不少有识之士也坚决反对,有的愤然离他而去,有的部队也不听其调动。当然也有一部分将领乘机投敌,甘当汉奸,甚至各地抗日义勇军中的不坚定分子,也有受其影响而为敌效力的。

1932年3月9日,马占山在长春参加了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被任命为伪军政部总长。马占山唯恐调赴长春上任之后,会失去黑龙江省地盘和军权,因而未在长春就职便返回齐齐哈尔。他就任伪黑龙江省长之后,面对日人的种种要挟和刁难,全国界的舆论谴责,使他深受触动,感到必须速作决断改变目前既不为日人容纳,又为国人所唾骂的窘境,决计出走,重举抗日义旗。4月2日,马占山以亲往海伦一带处理部队不稳为由,乘汽车离开齐齐哈尔,4月3日,在拜泉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问题。4月7日返抵黑河,再组黑龙江省政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表示“一息尚存,誓本以身许国之初衷,决不负其许之主意”,同时发表对绅商、工农市民的文告,号召各界人民积极援助爱国抗日事业。在4月12日发出的《宣布日伪内幕决心继续抗日通电》中,马占山表示了他再次抗日的决心:“虽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然救国情殷,义无反顾。济河焚舟,早具决心。……一息尚存,誓与倭奴周旋到底,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马占山把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抗日武装编成11支义勇军,原有的抗日部队整编为9个旅,共同组成了黑龙江抗日救国军,马占山自任总司令,这不仅壮大了抗日队伍,而且使黑龙江省反日武装斗争具有更广泛的民众基础。为表达黑龙江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心情,马占山电嘱骑兵旅长吴松林和团长邓文等部迅速进攻哈尔滨。4月27日,团长才洪猷、李天德部攻打松浦镇。夜10时,将敌逼至松浦镇呼海铁路局院内和车站内。因敌顽强防守,抗日

军久攻不下,遂即放火烧毁机车房等处,火光冲天,照耀数十里。同日,邓文率部配合松浦作战,攻击与哈尔滨对岸的马家船口,俘敌15名,残敌逃往哈尔滨。邓部正欲渡江歼敌,突有日军炮舰从江南猛轰抗日军,邓文恐腹背受敌,遂率部退回原防地,并留一团兵力驻守对青山、庙台子一带监视敌人。攻打松浦和马家船口之战,虽未能攻进哈尔滨,但它是马占山重举义旗之后的第一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也初步改变了人们对马占山的看法。各地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援抗战。海伦电厂工人帮助制造手榴弹,修复废弃的迫击炮,哈尔滨中东铁路局爱国人士暗中提供敌人活动的情报,绥化县群众自动筹集军粮,秘密派人购买弹药等等,有力地支援了义勇军作战。

1932年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举行出征誓师大会,时值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他电令黑龙江义勇军主力再攻哈尔滨。5月15日,骑兵一部300余人攻击松浦镇日军,激战两小时,双方各有伤亡。5月17日,1500名义勇军包围了松浦镇日军,因敌防守甚严,并有日军一个大队前来增援,义勇军主动撤兵。5月20日,义勇军主力在呼兰以南与日军激战一天,敌人乘船逃走。

松浦战斗后,义勇军士气高涨,积极收复江北各镇,并准备进攻哈尔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对黑龙江省义勇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命令在吉林地区作战的第十师团主力和刚派到中东路东线的第十四师团立刻回到哈尔滨集结,并于5月23日亲赴哈尔滨指挥日伪军进攻马占山抗日救国军作战。

5月24日,日军第十师团向呼兰一带义勇军发起了猛烈攻击,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步兵骑兵轮番进攻。义勇军吴松林、邓文、才洪猷、李云集、李天德部及大刀会、红枪会等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武器弹药不足,于5月26日夜向绥化以北撤退。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和

混成第三十八旅团向呼兰、绥化方向进犯。日军第十四师团第二十八平贺旅团和第十师团第三十三中村旅团在5月26日占领呼兰,并沿呼海路向北进攻。第十师团另一部和伪军从齐齐哈尔出发,向抗日军进攻,占领安达。到6月中旬,绥化、海伦、克山、拜泉等县相继失守。

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放弃了呼海、齐克铁路及沿线城镇后,撤往农村,改变了作战策略,要求各部队灵活作战,不死守,不攻坚,避实击虚,掌握作战主动权,或进行袭击,或加以扰乱;或施以破坏,断其联络;或截其辎重,以充军需,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根据这种游击战术的要求,各部队可以因时因地独立决定部队的作战行动。这样就提高了各部队的应变能力,调动了部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月17日,邓文指挥一部兵力在海北镇天主教堂南的赵家店附近袭击敌人,两天歼敌150余人。在青冈、克山、绥棱、甘南、拜泉、海伦等地的义勇军也不断袭击敌人。

1932年6月间,马占山将所部重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曾先后攻克和袭击了克山、克东、通北、东兴、通河等县城,破坏中东、洮昂等铁路,袭击敌人修筑齐克路(齐齐哈尔至克山)的筑路队,使工程一拖再拖。此时,马占山驻军绥棱。6月中旬,马占山决定前往松花江南与吉林救国军领导人李杜再度协商吉黑两省军事合作联防问题。但这一消息被日军侦知。6月2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飞抵绥化,部署捕捉和消灭马占山的方案。日军除调动第十师团、第十四师团外,又急调骑兵第一旅团和关东军野战汽车队增援。日军集中兵力于绥棱、庆城地区向马占山抗日军进攻。战斗持续半个多月,敌人未能找到马占山的司令部。7月7日,本庄繁再次飞抵绥化,部署消灭马占山的计划。7月下旬,马占山偕少将参议韩述彭、军长郗斌山、参谋处长容聿肃、副官杜海山,率手枪队和骑兵团

约2000人欲取道海伦,经庆城、铁骊(即今铁力)南行。不料此行动计划又被日方侦知,于是日军第十四师团派遣平贺旅团在海北镇天主堂附近设伏。7月27日马占山率骑兵队过海伦河后,沿通往安固镇的大路前进,不料陷入日军布下的包围圈,遭敌突然袭击,伤亡惨重,战死者达三四百人。最后马占山在混战中仅率四五十骑兵突出重围。此战后,日军在战场发现马占山遗留物品,判断马占山已战死,并大肆宣传“黑龙江的暗云扫清”,“全省治安得以恢复”云云,因此放松了对马占山部的继续追剿。马占山率少数部下脱险后,于9月间到达龙门。之后,与苏炳文联合作战,进行海满地区抗战。

二、东北民众救国军的海满地区抗战

海满地区是指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以西的海拉尔和满洲里地区。

九一八事变前苏炳文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海满路护路军司令、省防军步兵第二旅旅长。1931年11月马占山江桥抗战时,苏炳文派一个团前往支援。事变后该区驻军两个步兵旅均由苏炳文统领指挥,因此苏炳文是海满地区握有军政大权的人物。1932年9月间,苏炳文正积极准备举旗抗日。

日军在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之后,因忙于攻打哈尔滨和对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王德林等部义勇军进行“围剿”,所以并未急于出兵海拉尔和满洲里。此间,日伪当局极力对苏炳文等海满地区的实权人物进行诱降活动。在很长时间里,苏炳文虚与日伪周旋,既未公开表示举旗抗日,又和日伪政权保持一定距离。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对苏炳文许以“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满洲国军政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等要职相利诱,但均被其拒绝。到1932年9月间,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浪潮推动下,经过深思熟虑,苏炳文决定奋起

抗日。

9月23日,苏炳文在海拉尔召集主要军官集会,会上决定组成“东北民众救国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司令,谢珂为参谋长,编制了总部各处及下属各部队和地方部队。9月26日,苏炳文在海拉尔秘密部署举义行动。9月27日晨,驻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各站护路军,按照总司令部命令在同一时间,一律佩带“救国军”臂章,以迅速动作解除了伪国境警察大队的武装,逮捕了日本驻满洲里领事山崎诚一、特务机关长小原重孝、国境警察队队长宇野和日特及走狗,并切断了与富拉尔基以东地区的联系。1932年10月1日,海拉尔各界人士及爱国官兵4000余人举行救国军成立和誓师大会,苏炳文、张殿九宣誓就职,同时委任谢珂为总参谋长,金奎璧为副参谋长,张玉挺为前敌总指挥,王尔瞻为呼伦贝尔警备司令。中东路苏联驻海拉尔站站长、职员等亦到会祝贺。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表明海满军民“消灭伪国,铲除汉奸,揭发暴寇鬼蜮之伎俩,恢复中国固有之土地。”^①至此,在黑龙江西北地区又燃起了一股抗日斗争之火。

东北民众救国军誓师通电后,计划以主力渡嫩江袭击日伪军防地。不料日军侦知海满地区有变,已于10月1日在嫩江东岸布防并破坏了富拉尔基江桥。10月3日,日军兵力部署就绪后,步骑兵2000余人,在炮火的配合下,由齐齐哈尔以北强行渡江,进攻救国军江岸阵地,张玉挺部一个营驰援,将敌击退,日军抛下12具尸体缩回东岸。10月6日拂晓,日军六七百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乘橡皮舟强行渡江。在紧急关头,救国军急调驻碾子山步兵第二旅第一团的两个营来援,救国军士气大振,英勇冲杀,敌伤亡惨重。10月7日,关东军司

^① 印继廉、管举生:《东北血痕》,1933年南京版。

令部急调第十四师团所属步兵第二联队、骑兵第十八联队、野炮兵第二十联队第一中队等组成由大佐中山健为支队长的中山支队,以全力“讨伐”苏炳文的东北民众救国军。

10月7日,日军中山支队千余人从齐齐哈尔西侧的桦木港偷渡嫩江,并于次日迂回攻击富拉尔基,妄图掩护其主力渡江西侵。救国军闻讯,用一团兵力阻敌于朱家坎东部长川地房子村。日军在飞机配合下,向救国军发起猛烈攻击,双方死伤惨重,各自向后撤退。这样,经过反复争夺,日军终以优势兵力攻占了富拉尔基。

10月10日,救国军总司令部在朱家坎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商定,救国军将加速联系朴炳珊、李海青、邓文及马占山旧部,以商讨联合作战问题;同时决定,为阻止日军铁甲车来犯,炸毁前方阵地以东的富拉尔基铁路桥和昂昂溪至富拉尔基的木桥。

10月21日,苏炳文组织救国军进攻富拉尔基之敌,各部勇猛出击,势不可挡,于10月22日攻克富拉尔基。10月23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又急调洮南步兵、炮兵、骑兵各一部增援,再侵富拉尔基,与救国军展开激战。救国军前线指挥部鉴于敌军来势凶猛,而救国军已经连续血战未得休整,遂命部队主动退出城外30里的土尔池哈阵地布防。10月底,救国军前方总司令张殿九指挥所部1500余人再次收复富拉尔基,并兵临齐齐哈尔郊外。

海满地区抗战,牵制了大批日伪军,使马占山得以重新组织兵力,对日军发起新的攻势。马占山于9月中旬脱险到达龙门时,正是苏炳文准备起义期间。苏派人与马占山部建立了联系,共同商定联合作战,夺回齐齐哈尔。为此,马占山重整兵力,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军外,又编制了第四、五、六军,并于10月20日亲率第四军徐海亭部进抵省城以北拉哈附近,并破坏了敌人的铁路运输。次日开始围攻拉哈站日军。由于敌人火力甚强,坚守车站楼房和地窖,义勇军围

攻8昼夜未克。10月31日,义勇军用“木炮”轰垮了车站楼房,又点火焚烧地窖,正欲全歼守敌时,日军4000余人、伪军一个旅来援,义勇军遂于11月10日撤离拉哈。此役歼敌600余人。

1932年10月中旬,驻拜泉的原马占山旧部朴炳珊经苏炳文联络,再次举兵抗日,并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东路总指挥,后兼救国军副司令。该部10月下旬连克泰安(今依安)、克山等县城,切断了齐克路,予敌以沉重打击。

10月下旬,邓文部义勇军沿中东路进攻安达县城。经两昼夜激战,毙敌百余人,占领了县城。这时,日军及伪军檀自新等部来攻打安达。檀自新原为邓文部下,邓文闻讯,即派参谋长去策反,檀当即表示愿举义旗,率部起义。该部与邓文部联合攻打安达站。经5昼夜激战,毙敌500余人,收复了安达站,之后沿中东路直逼齐齐哈尔。

才洪猷与焦景斌、陈大凡、刘斌等部同时在绥滨、通河等县活动,伺机截击敌人,曾与日军沼田旅团一部激战3昼夜,两度攻克通河。

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长李海青率部在8月下旬3次袭击安达,不仅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也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10月下旬,李海青部2000人进攻昂昂溪,因弹药不济,且有大批敌援军赶到,义勇军只得退走。11月初,李海青部1000余人再次进攻昂昂溪,以扫除各部义勇军攻打省垣的屏障。义勇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向前,残敌很快不支,李海青部攻克昂昂溪,对齐齐哈尔日军构成威胁。11月中旬,正当各路义勇军不断发展,并准备联合攻打齐齐哈尔时,关东军司令部从南满、吉东抽调大批兵力,统归第十四师团长指挥,向黑龙江义勇军展开空前的攻势。李海青部在昂昂溪附近阻击日伪军进犯,激战两昼夜,毙伤日军多人,终因寡不敌众,被包围在车站内。后经组织反击,奋力冲出重围,伤亡四五百人。随后,日军即扑向富拉尔基的苏炳文、张殿九部。苏、张指挥东北民众救国军

奋勇迎敌,阻敌3昼夜,部队伤亡严重,不得不退守二线朱家房防地。此时朴炳珊部在泰安作战失利,退往讷河,邓文部亦被迫回防拜泉一带,因此,围攻省城齐齐哈尔之战遂告失败。

围攻齐齐哈尔失利后,马占山所部也相继撤离海满地区,部队由邓文率领撤回拜泉。日军第十四师团等各部分路从齐齐哈尔、泰安、克山、克东、哈尔滨等处向拜泉袭来。1932年11月20日,日军发起猛攻。义勇军各部在拜泉外围奋力御敌。但因日军兵力强大,义勇军虽付出惨重代价,也阻止不住日军的攻击。28日晚,各路义勇军全部撤回拜泉城内。但这时部队严重减员,弹药无以补充,形势十分险恶。邓文召集各部领导人商讨对策,决心破釜沉舟一战。29日凌晨,日军以空中飞机轰炸,并配以地面炮火向拜泉发动总攻击。义勇军各部与敌血战两日,弹药用尽,无力支持。30日晚,拜泉失守。马占山在满洲里收到报告后,悲痛欲绝。12月3日,苏炳文由海拉尔抵达满洲里,经马、苏二人商定率一部分官兵乘车进入苏联。行前,马占山命所属各部转进热河继续抗日。根据马占山的命令,郇斌山、邓文两部共5000余人且战且走,于1932年12月下旬到达开鲁并同赴沽原,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收编,改为骑兵第十师,驻沽原。

马占山部另有程德峻、卢明谦、张云阁等部4000余人拟往热河,转移中受阻,在德都、讷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一些胜利。1933年末,张云阁作战牺牲,队伍逐渐星散。

三、黑龙江其他各部抗日义勇军的活动

黑龙江省松花江下游中东路东段地区,由于日军入侵稍晚,在吉林自卫军撤退到下江以后,开始出现一批义勇军。

李海青创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李海青,幼年随父母由山东逃荒到东北,落脚于肇源一带为地主牧马。后投入绿林,报号“海青”。

1926年,为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改编,委为营长。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为发动民众抗日武装,扩大队伍,将李海青委为旅长。李海青率部参加江桥战役等多次战斗,作战指挥有方,表现极为忠勇。1932年春,李海青得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曾派人到哈尔滨寻找中共满洲省委,要求派人来领导他的队伍,但满洲省委一直未能与这支队伍取得联系。3月上旬,李海青组建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绿林团伙、工农群众、青年学生纷纷来投,队伍骤增至万余人。1932年3月中旬,曾一度攻克扶余县城,声势大振。3月下旬,发兵渡过松花江,占领哈拉海子,进至农安城下,并直逼伪国都“新京”。日伪军闻讯,集结大批兵力驰赴农安,重兵围追之下,李海青率部撤出农安北上。5月中旬,李海青在肇东城下连战8天,终于攻克肇东,击毙伪军旅长等大批伪军。1932年六七月间,李海青部再度与马占山部联合作战,活跃于中东、齐克路沿线,曾突袭昂昂溪,攻克安达县城。1932年末,马占山、苏炳文部相继入苏后,李海青与邓文部联合,攻打大赉、占领安广之后,撤入热河继续抗日。

1931年11月,桦川县县长张锡侯组建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该部队曾发展到1000多人。救国军吸收了一批当地工人和知识分子。1932年8月,救国军攻打富锦县城,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后撤到饶河县境休整,继续与日军对峙。

1932年夏,桦川大刀会400余人、红枪会1000余人曾先后攻打佳木斯和悦来镇,其中,悦来镇一役,红枪会消灭伪军近百人,缴获山炮两门和其他武器装备。同年秋,在佳木斯一带的红枪会、黄枪会及当地民团联合围攻佳木斯,因遭日伪军顽强反击,红枪会等死伤千余人。

在宝清地区,1932年秋,以青龙山、太平沟、小城子沟、梨树沟的红枪会为基础,联合组成“东北民众救国军武术旅”,司令张志超,共

600 多人。后吸收农民、工人等入伍,队伍不断壮大。

1932 年,集贤县爱国志士汝有才、纪振刚等在集贤镇、太平镇、兴安等地组织红枪会。1932 年春,红枪会攻打集贤镇。1932 年夏,红枪会在太平镇消灭日军数十人,队伍迅速发展。

1932 年 3 月,日军占领海林地区后,在这一地带独占山头的一些绿林武装“岐山队”、“双山队”、“占林队”、“飞人龙队”、“西胜队”、“长江龙队”、“四季好队”、“金龙队”联合成立“八大队”,共 400 余人。不久,“八大队”一部在敖东西沟浦家坟一带与日军作战,打死打伤许多日军。以后,“八大队”时而分开,时而联合,与日伪军展开战斗,后分别被日军击溃。

1932 年春,在延寿、珠河山区,以从山东来开荒的农民为主,在二洪山、腰岭子、开道、秋皮囤等地组织起红枪会、大刀队。5 月,攻进延寿县城,后又与珠河红枪会联合,攻打珠河火车站和县城。以后,队伍逐渐向南活动。7 月,红枪会 100 多人到达榆树县城和向阳、土桥子、青山、黑林子等地。所到之处,又有许多农民加入,队伍扩大到 500 多人,并一度攻入榆树县城,将降日的刘宝霖旅逼出城外。后来,由于作战失利,队伍溃散,一部分人返回延寿。

拜泉红枪会。拜泉县万宝山红枪会是由当地农民陈久思创建的。1932 年夏,这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 100 多人的抗日武装打出了“替天行道,扶正压邪”、“吞日立国,另安天下”的旗号,手持长枪、大刀,攻进了海伦县城内一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死守卫日军 4 名,然后冲到广信公司楼下,把正在睡觉的 20 余日军全部刺死。海伦县日军发觉,凭借楼顶和庭院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向红枪会扫射。红枪会只凭手中大刀、长枪,无法与日军强大火力硬拼。冲杀中死伤 60 余人,会首陈久思与其儿子双双战死。陈久思死后,群龙无首,遂自动解散。这支红枪会虽存在时间很短,但杀敌精神令人赞叹。

曾经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侵略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据统计,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全盛时期,总数达30万以上。东北义勇军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约5万人,负伤约8万人;退入热河约3万人;退入苏联境内约3万人(后大部由苏方遣返至我国新疆);自动溃散者7万余人^①。1933年后,尚有一部分队伍保持原来的系统,或者分散活动,有的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继续坚持武装反日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在经过二年多的斗争后,大部分~~失利、瓦解~~走向失败~~,但是它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确实是很大的~~。

第一,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代表~~中国人民近代反抗日本侵略情绪的~~总爆发~~,民族救亡图存意识的新觉醒。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行程中,培养了富于反抗外敌入侵,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民族特性。每当外敌入侵,破坏和平自由之时,广大民众便起而自卫,大兴义勇之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广大民众产生了极大的愤懑情绪。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痛恨已极;一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端不满。受创过巨,民众起而自卫,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迅速兴起的总根源,自东北抗日义勇军掀起大规模武装抗日斗争之后,在东北,在全国抗日烽火一直在燃烧,并最终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武装反日斗争打响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是九一八事变后最早奋起从事抗日战争的先驱。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消灭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和辽吉黑各地义勇军即展开

^① 此数字系参照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各种资料综合而成。

了民族自卫的武装斗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①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开始,首先揭起民族武装抗日旗帜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协助和影响下的,以东北各阶层民众和一部分爱国官兵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抗日义勇军。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义勇军是东北反日战场的主要武装力量,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牵制和打击了日军,延缓了日军对全东北的占领。据记载,1932年3月到12月,义勇军袭击的大中城市有30余次,焚烧了沈阳、哈尔滨两地的飞机场,破坏了日本在抚顺的南满发电所^②。1932年3月份,南满路、安奉路沿线的城镇和重要车站被袭击事件达631次。1933年,仅辽宁义勇军战斗4625次,参战46.7万人次^③。另据日方非正式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34年,义勇军攻毁日本列车的总数不下2000次^④。1933年10月3日《盛京时报》报道:日方关于中日事件中的陆军死伤者人数,关东军战死将校99名;准士官以下1750名,共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34页。

② ~~《活跃着的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08页。~~

③ 《黑白半月报》,第2卷第3期,第54页。

④ 《东北义勇军》,《文摘》,第1卷第3期,1936年版,第107页。

计战死 1849 名。关东军负伤将校 243 名,准士官以下 4819 名,共计 5062 名,两大项合计共死伤 6911 人。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大大缩小的。日本侵略军一些头目自己曾供认,“日本皇军鲜血洒遍了全满洲”,可见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第三,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日武装斗争,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提出~~建立武装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提供了依据。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迅速兴起,来势猛,发动快,地域覆盖面宽,参加的社会各阶层极为广泛,真正形成了全民武装抗日之形势。义勇军的成份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根据 30 年代资料记载,义勇军队伍中农村各阶层群众,包括青年、中年农民及民团武装等共占 50% 至 60%;原东北军及警察部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约占 20%;绿林武装占 10% 至 15%^①。从义勇军领导人的出身看,有军官、警察、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和农民;其中以军官、警官和绿林首领为多数。他们在共同抗日旗帜下,自发地组织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东北军民联合一体,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出现了东北民众武装斗争的好形势,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民族武装反日统一战线~~提供了依据~~。

第四,东北抗日义勇军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培养锻炼了一批军事领导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抗日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吸取了前一时期抗日运动失败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在东北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为总的策略方针,进而提出建立统一战线军队,抗日人民革命军,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反日会。”^②历史的道路正是这样走过来的。1933 年以后,许多抗日义勇军部队或接受共

① 达观:《东北义勇军抗日状况》,载《申报月刊》,第 1 卷第 2 号,第 175 页。

② 黄振良:《东北义勇军血的教训》,《时事特刊》1937 年第 6 期。

共产党的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的改编或协同作战,或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武装反日斗争推向一个更高阶段。由于东北地区较早地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总的策略方针,为全国抗战爆发前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也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1931年10月东北抗日义勇军先后在东北各地兴起之后,曾以其巨大规模和波澜壮阔之势予敌以重创,但到1933年春初即出现失利受挫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得不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援,只能坚持孤军奋战。抗日义勇军是东北地区的民众和部分东北军官兵违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组织的民众抗日武装,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支援。国民党政府为实行不抵抗政策,采取将部队调往关内,把将领召回等釜底抽薪的办法对义勇军进行限制和破坏。无论是起于民间的义勇军还是原东北军部分队伍改编组成的义勇军,全是无粮无饷,无军服、无装备。义勇军大部分队伍都没有精良的武器弹药,甚至使用大刀、长矛。这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相比差距太大。这样的基本条件使义勇军受挫失利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东北抗日义勇军没有统一领导指挥系统,组织上松散是造成受挫失利的重要原因。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创建过程中的领导系统,辽、吉、黑三省各不相同。辽宁省的义勇军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另一个是以原国民党改组派、国民政府委员朱霁青为首的“辽吉国民救国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东北流亡关内的各界人士发起组织的,它是一个民间抗日团体,不是军事领导机关。救国会在名义上把辽宁义勇军划分军区、军团,实际上没有统一领导的权威。因而,各部义勇军不相统属,甚至有互相摩擦,损耗内力现象。吉林、黑龙江两省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虽与张学良

将军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有一定联系,但由于被敌军隔绝,联系不便,也无法加强统一领导和指挥,不仅吉黑两省的抗日武装不能连成一体,统一行动,就是一省的抗日队伍也都是各自为战,不能很好地配合,互相支援。松散而又缺乏坚强统一领导的义勇军抗日武装,尽管人数众多,但很难经得起强大敌人的进攻和各个击破,因而遭受失利挫折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东北抗日义勇军没有明确的抗日救国纲领,难以凝聚各种抗日力量坚持长期抗战。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自发组织起来的爱国武装力量。参加义勇军的领导人和广大官兵,具有一定的抵御外侮的民族意识,因此一开始,表现了相当强的战斗力。但是,由于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有些将领对抗日前途缺乏信心,他们虽然有强烈的收复失地的要求,但缺乏政治远见,要求也各不相同,不能提出明确的抗日救国纲领,不能从抗日大局出发,很好地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正确处理军民关系和各部队之间的关系,有时甚至相互掣肘,有的还损害群众利益。这样就不能凝聚军心、民心,难以坚持长期抗战,最后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 游击队的建立及其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一、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创建反日游击队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打击。但是,由于义勇军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仅靠义勇军坚持持久抗日显然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形势,创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成为当务之急。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要“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的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①，“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②10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派出巡视员,“帮助地方党部,……深入贫民中间去,发展他们的分粮吃大户、围官衙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2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23页。

行动,加紧贫民自卫队的组织,一直走向夺取地主武装……建立游击队。”在组织游击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游击队本身政治上、军事上的巩固,在开始发动游击战争的时候,要找出群众斗争比较活跃,(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游击队作武装斗争的前锋,群众作游击队的基础,把游击队与群众斗争配合起来,才能开辟游击区域与加强和扩大游击队。”^①与此同时,10月22日《红旗周报》发表了题为《反日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中满洲中共党部的中心任务》的署名文章。文章明确指出:满洲党的中心任务“决不是仅仅笼统地提出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更切实的更抓住中心的提出满洲群众自动武装起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权。”^②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在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抗日斗争的同时,提出了关于创建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方针。

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所作《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中指出:“党应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发动他们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缴械,反抗国民党长官之一切命令,以至叛变。”“叛变到农村去(最好到有工作的地方),帮助与发动农民的斗争”,“进行游击战争,扩大与改编原来队伍。”^③1932年2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共东满特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发动游击战争,是东满目前的主要任务”,要求东满党组织“坚决地去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反对日本

^① 《中共中央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1931年10月12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存。

^② 苏广:《反日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中满洲中共党部的中心任务》,《红旗周报》1931年第23期。

^③ 中共满洲省委:《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1931年9月2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72页。

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去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发动和领导游击战争。”1932年3月间,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召集省委主要领导人赵毅敏、周保中、杨林、冯仲云等开会,根据周恩来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文章精神,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要以党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它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同年4月2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发动满洲游击战争,领导反日的民族战争,开辟满洲新的游击区域与苏维埃区域是满洲党目前最中心最迫切最实际的战斗任务。”^①

上述一系列文件表明,中共满洲省委虽然还不能完全摆脱当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但罗登贤等省委领导人从东北党组织当时面临的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把开展和领导反日民族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并提出了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方针。这一方针的中心内容就是:到农村去,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同时加强对分散各地的义勇军的工作,争取他们接受我党的抗日主张,坚持抗日斗争,并逐步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二、中共满洲省委创建反日游击队的组织工作

东北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虽然1923年就已经在哈尔滨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但由于长期处于奉系军阀的严酷统

^① 《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第221页。

治之下,党的活动经常遭到破坏,所以,党组织一直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缓慢发展。据1930年3月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06名^①。东北地区党组织及党员主要分布在沈阳、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和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沿线的一些城镇。同年5月后,由于大批在东北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指示,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有了很大增加。到1931年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所属党员有2132人^②。多数朝鲜族党员活动在东满各县和磐石、珠河、汤原、宁安、饶河等朝鲜族居住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居住的广大农村,党的力量还很薄弱。但是,中共满洲省委克服重重困难,发挥每个党员的积极作用,不断加紧在各地开展创建抗日武装的组织工作。

1931年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关于发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研究了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并根据东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做出了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器、创办刊物指导创建游击队工作、派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决定。鉴于当时沈阳已被日军占领,省委活动环境险恶,而且经济上也十分困难,会后,省委除派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③去群众反日斗争基础较好的东满地区组织与领导抗日斗争之外,还无法进行其他工作。11月底,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等被

^① 《中共满洲省组织状况表》(1930年3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206页。

^② 《满洲工作近况》(1932年1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9,第191页。

^③ 童长荣(1907—1934),又名张长荣,安徽湖东(今枞阳县)人。1921年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回国后,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931年11月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1934年3月在汪清战斗中牺牲。

捕,创建游击队的工作也暂时受到影响。

1931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往哈尔滨。中央对满洲省委进行了改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满洲代表罗登贤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何成湘任宣传部长,杨林^①任军委书记,金伯阳任职工部长,徐宝铎任团省委书记。

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后,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罗登贤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形势,指出,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领导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会议确定了创建反日游击队的措施,制定了省委工作计划。之后,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确定的措施,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为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首先健全和加强了各地的党组织,以适应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在南满,中共吉林县委所属基层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已经不能承担组织抗日斗争的任务,满洲省委决定撤销吉林县委,所属农村党组织划归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1932年11月,满洲省委又先后改组了中共磐石、海龙中心县委。在东满,满洲省委于1931年11月派童长荣任东满特委书记,加强了领导;在健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个县委的同时,又建立了中共安图特支。1932年2月,东满特委又派人到敦化,建立了中共敦化特支。在吉东,满洲省委将宁安中心县委改组为绥宁中心县委,扩大了工作范围;又先后建立了中共宁安、饶河中心县委。在北满,1931年末建立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1932年6月,又将中共珠河特支改建为中共珠河中心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① 杨林(1901—1936),原名金勋,曾用名杨宁、毕士第,朝鲜平安北道人。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迁到中国东北通化居住。1930年春任东满特委军委书记。1931年冬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秋调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曾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1936年2月,在红军东渡黄河战斗中英勇牺牲。

县委。这些措施,为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其次,派干部到义勇军中和各地方,协助当地党组织直接领导创建游击队的工作。省委历任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吉密等都先后到磐石、宁安、巴彦、珠河、汤原等地从事创建抗日武装工作;又有党的得力干部冯仲云、童长荣、张寿箴、李延禄和金日成、崔石泉、金策、李红光等深入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紧紧依靠当地党组织,与当地党的领导人一道深入农村或打入义勇军中,发动反日斗争,在斗争中训练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骨干,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创建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

第三,磐石、汤原、饶河等许多地方党组织举办了多期军事训练班,培养军事骨干,作为建立游击队的核心力量。此外,中共满洲省委还创办了《红旗》等刊物,随时报道各地建立游击队的情况,指导创建游击队的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东北党组织先后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等地创建了党领导的十几支抗日游击队。

三、“北方会议”对创建抗日武装工作的影响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直、鲁、豫、陕、满北方五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简称“北方会议”)。会议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对北方各省党组织提出总的要求是:要求满洲在内的北方各省党组织,要反对右倾,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进行罢工、罢市、罢课,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

“北方会议”要求东北党组织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这对东北地区党的工作是有指导意义的,但要求已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也毫不例

外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把反日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则是不符合东北实际的。

出席会议的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何成湘^①阐述了东北地区与南方省份不同的情况:东北与关内隔绝,已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东北的工业基本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日本即将在东北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中共在东北的组织还很薄弱,群众基础也不广泛;东北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低,加之日本人在东北的统治时间长,殖民统治严厉。由于这些有别于关内其他省份的特殊性,因此党在东北的方针也要与其他地方有所区别。

何成湘的发言反映了东北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但会议主持者无视东北所处的特殊环境,斥责其是“满洲特殊论”、“北方落后论”。会议通过了《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和《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等3个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东北党组织的任务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劳苦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在对待东北义勇军的问题上,“北方会议”要求:“必须用一切力量使义勇军的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毫不迟疑地依靠在义勇军的武装力量之上,没收地主豪绅、军阀、资本家的土地……使义勇军转变为工农红军,创造苏维埃政权。”会后,中共中央派李实到东北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

以罗登贤为书记的满洲省委曾根据东北已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把反日斗争摆在党的中心工作的位置,积极创建

^① 何成湘(1900—1967),四川珙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35年在上海任中央局组织部长。新中国建立后任甘肃省政府副省长兼秘书长等职。1967年病逝。

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武装。但罗登贤的符合东北实际的正确作法却遭到临时中央的批判，罗登贤随之被撤销满洲省委书记职务，由李实任满洲省委书记。

同年7月，新一届满洲省委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新省委完全接受了“北方会议”精神，会议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关于接受中央北方会议的决议》、《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告同志书——关于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及创建满洲的苏维埃政权问题》等文件。会后，省委的同志分别到各地基层组织传达贯彻中央“北方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并要求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无条件执行。

在东北开展反日斗争的同时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左”倾政策给党的工作造成很大损失，这使刚刚开展起来的反日斗争也遭受挫折。一是在城市和工人运动中，省委一再号召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搞飞行集会，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在各种纪念日进行各种形式的公开斗争。结果，暴露了党的组织力量，使敌人更加疯狂地对我地下党组织进行镇压和破坏。例如呼海铁路沿线车站和列车上是中共地下党力量比较活跃的地方，但由于执行“北方会议”精神，经常散发传单、搞罢工等活动，不仅使党组织不断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使日伪军加强了对铁路列车的警戒和严查，造成群众不敢乘坐这条线路的列车，党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二是由于在农村中开展抗租、抗债、抗捐、吃大户，以及没收地主土地等斗争，使一些有民族意识的地主乡绅恐慌起来，甚至与共产党产生对立；在农村中建立苏维埃政权也不具备起码的条件，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很薄弱，而敌人的力量却很强大，所以绝大部分地区并未实施这一计划。即使个别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也很快被敌人扑灭，有的则自己跨掉了。三是将我党已经建立起来的反日游击队一律改称工农红军和赤

色游击队,并强迫执行进行土地革命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结果原先对游击队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一些地主不仅不供给游击队粮食,反过来还对游击队进行攻击。四是对各种名目的反日义勇军以“左”的态度对待他们,认为他们是旧军阀和地主阶级手里的工具,要求共产党员向他们宣传反帝纲领与土地革命,把反帝战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结果使义勇军对我党疏远起来,有的陷入孤立境地。

总之,“北方会议”“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给东北地区刚刚兴起的抗日斗争形势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但是在抗日斗争第一线指挥战斗的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延禄等领导人和许多党团员干部都采取不同形式抵制“北方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他们为了服从上级,虽然把游击队名称改为红军,但并不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始终把抗日武装斗争做为中心任务,团结其他武装共同进行抗日斗争。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李实后来回忆说,“北方会议”这些过“左”的政策,使在基层从事具体工作并深知广大民众呼声的党员干部十分反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无论是省委和市(区)委找一个支部同志谈话都很困难。召开支部会议更是困难,因为基层党员不敢接近省委同志,使省委的工作很难开展。①

这一错误的方针政策直到1933年5月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才得以纠正。

第二节 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南满地区的反日斗争

南满地区是指长春以南,南满铁路两侧的广大地区,大体上为今辽宁省的东南部和吉林省的南部地区。包括磐石、海龙、通化、兴京

(今新宾)、桓仁、宽甸、濛江(今靖宇)、抚松、清原、柳河、临江、伊通、金川、辑安(今集安)、西安(今辽源)、本溪、安东(今丹东)等县。该地区群山连绵,地势险峻,由于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贯通该地区南部,又与日本直接统治的朝鲜接壤,所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九一八事变前后,党组织即在该地区积极开展反日斗争活动,其中磐石是党领导的反日斗争的重要活动中心。

磐石是吉林省中部的一个县,全县出岭起伏,河流密布,属于山地和丘陵之间的过渡地带。该县开发较晚,直至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垦殖。1902年始设县治。居民绝大多数是从晋、冀、鲁、豫等省迁徙过来的贫民。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是近百年,特别是日本吞并朝鲜后从朝鲜半岛逃亡过来的难民及革命者。据1930年统计,全县人口约有21万人,朝鲜族约有5000人。

磐石开垦的历史虽然较短,但土地集中却相当严重。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全县耕地大多为少数地主所占有,广大农民则很少有或者没有土地。由于封建地主和军阀的无情盘剥和压榨,农村经济处于凋蔽状态,广大农民生活十分困苦。

193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磐石只有个别党员活动,还没有建立组织。1930年初,党组织派朴奉(朴根秀)、王耿(文碧涛)、全光(吴成仑)等来磐石,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同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派秘书长廖如愿等人组成民族工作组到磐石进行建党工作和组建中共磐石县执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到磐石后,针对此地朝鲜族群众基础较好的特点,便“以朝鲜民族的身份”,“分散住在几个地方”^①开展工作。不久,中共磐石县临时委员会成立。临时县委直属

^① 廖如愿:《关于我在磐石组建“县委”的一点情况》,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

省委领导,下辖磐东、磐北两个区委和6个支部,党员近40人。1930年8月,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陈德森的主持下,中共磐石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研究了党的组织、宣传、农民工作和共青团的工作,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农民斗争纲领》和《雇农斗争纲领》。这次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磐石县委员会。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和军事部。朴奉当选为县委书记、李承雨任组织部部长、安光勋任宣传部部长、金光道任军事部部长。县委机关设在玻璃河套。县委下辖磐东和磐北两个区委,伊通和双阳两个特支,以及7个基层支部。

中共磐石县委成立后,为了积极地动员和组织各界群众开展反日活动,又先后成立了磐石县反日会、反日妇女会和童子团。同时,为保卫县委机关,还成立了特务队。特务队执行双重任务,一是保卫县委机关,二是同汉奸走狗作斗争。因而人们又将其称为“打狗队”。

1931年8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中共磐石县委改组为磐石中心县委。全光任中心县委书记,朴奉任组织部部长、安光勋任宣传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磐石地方的阶级对立已相当严重。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渗透,民族矛盾也突出地显现出来。磐石人民在军阀地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欺压和盘剥下,生活更加艰难。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磐石县委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不屈的斗争。1931年2月,党组织~~领导汉族和朝鲜族~~民众集会,号召向一些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奴役百姓的日本走狗展开斗争。同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反日斗争,更多群众加入到斗争的行列中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磐石县的“经济破产和政治混乱”,使广大农民、城市市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广大的劳苦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暴压政策,引起群众的愤怒和反抗。在中共

满洲省委和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反日风暴此起彼伏,相继爆发了“二·九”、“四·三”、“五·七”等较大规模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1932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东北培养亲日势力,充当他们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打手和帮凶,日本外务省和朝鲜总督府共同策划,在东北各地成立亲日组织“朝鲜人民会”,亦称“保民会”^①。该组织依仗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并强拉朝鲜族农民参加。2月,又在磐石设立了日本警察分署,加强了对当地反日群众的镇压。这些措施进一步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反日情绪,反日斗争日趋猛烈。2月7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组织汉族和朝鲜族反日群众,在磐东郭家店联合召开反日大会,揭露亲日组织“保民会”的反动本质和日本侵略者挑拨汉族、朝鲜族群众的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行径,并处决了一批日本走狗。反动当局极度恐慌,遂派出军警对与会群众进行镇压。9日,磐石“保民会”会长朴春圃等人引领60多名伪军来到郭家店,逮捕了包括中共磐东区委书记朴东焕及反日群众23人。为了营救被捕人员,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召集了汉族、朝鲜族群众700余人。他们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紧急追赶到伪军驻地。入夜,愤怒的群众把敌人驻地团团包围起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杀走狗”、“无条件释放被捕群众”等口号。反日群众一直将敌人驻地围困了三天三夜。最后,慑于民众的压力,敌人不得不将被捕人员全部释放,斗争取得了胜利。

继“二·九”反日斗争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又领导了“四·三”三道岗围敌斗争和蚂蟆河子反日暴动。

^① “保民会”建有武装,俗称“会兵”;“保民会”的办事场所俗称“会房”。

1932年4月2日,日本驻吉林总领事馆磐石警察署得到磐东东北岔特务密报,称当地有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在活动。于是伪警察署巡查部长松尾等,由“保民会”副会长金汉钟等带路,带领伪军骑兵到东北岔进行逐家盘查,逮捕党团员和反日群众9人。之后,将其押往郭家店。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展开夺回被捕同志的斗争。4月3日,县委派出巡视员李东光^①带领赤卫队绕道堵截敌人。同时,磐东区委组织委员赵杰迅速发动反日妇女会员和儿童团员共150余人跑步追赶。在呼兰河堤追上敌人。但敌人并没有停止前进。他们一边威胁群众,一边驱赶围拢上来的人群。当走到小孤山时,疾速赶来的赤卫队员横立马前,抓住马僵绳,拦住了敌人的去路。这时,反日群众逐渐聚拢过来,将敌人马队团团围住,并不断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爱国无罪”、“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释放被捕人员”等口号。这时一些妇女反日会员一面将沙子洒向马头,一面用剪子剪断捆在被捕人员身上的绳索。看到愤怒的群众要抢走被捕人员,松尾等人下令伪军开枪,但伪军并未将枪口对准群众,而只是朝天上开了几枪。见此情景,松尾等人只得扔下大车,骑马仓皇奔逃。为了严惩日本侵略者,反日群众继续追赶松尾马队。天黑时,松尾等人钻进三道岗林家烧锅大院。300多名反日群众在李东光的指挥下,将林家烧锅团团围住。他们齐声高喊“快把日本鬼子交出来!”“把日本走狗交出来!”“中国人不当汉奸!”。松尾慌忙派兵据守炮台,并向磐石伪警察分署呼救。入夜,反日群众在附近点起篝火,准备彻夜与日伪军进行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当大批增援伪军赶来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这场斗

^① 李东光(1904—1937),原名李相俊,朝鲜族。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后,历任中共磐石区委书记、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37年,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争的目的已基本达到,坚持下去恐于我不利,于是,指挥群众全部撤离。

日本侵略者侵占磐石后,当地民众的抗日斗争声浪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32年3月,沈海路的铁路工人在日本侵略军向磐石进攻时,便“与农民协会的会员一起起来把铁路破坏了一大段,使日军不能前进”^①。5月,为了配合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在蛤蟆河子、七间房等处召开一系列纪念大会,并举行反日游行示威活动。5月7日,此次活动达到高潮。

当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蛤蟆河子举行了有500余~~汉族和朝鲜族~~族农民参加的反日大会。会上,中心县委负责人张振国和共产党员孟洁民^②、李红光^③代表县委向民众发表了讲话。会后,孟洁民、李红光与反日群众组成民众法庭,对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走狗当庭审判并就地处决。然后,与会群众在吉海铁路工人的配合下,扒毁铁路数里,并将枕木烧毁,铁轨扔进~~山林~~林,致使敌人的铁路运输中断了十余日。当闻讯赶来的伪军要审问群众时,孟洁民只身来到伪军连部,慷慨激昂地向伪军连长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伪军连长被他的爱国精神所打动,对士兵发出了撤退的命令。

与此同时,磐东民众在磐石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的领导下,也举

^① 《满洲巡视员报告》(1932年8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6,第121页。

^② 孟洁民(1912—1932),原名孟庆春,吉林磐石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长。不久,被反动地主杀害。

^③ 李红光(1910—1935),又名李红奎,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磐石赤色游击队队长。1933年9月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参谋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1935年5月,在战斗中牺牲。

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

5月7日,当中共磐东区委组织委员赵杰组织数百名反日群众处决民怨极大的汉奸申在均、朱钟兴和何根昌时,甘当日本走狗的亲日分子南仁奎却在积极筹划成立呼兰镇“保民会”。针对这种情况,磐东区委决定:5月8日全区总动员,捉拿亲日分子南仁奎。翌日,四五百反日群众在赵杰的带领下,高举写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保民会’”的标语,浩浩荡荡直奔呼兰镇。但由于有大批伪军的保护,没有抓到南仁奎。于是,反日群众决定南进,捕捉其他“保民会”分子。5月10日,赵杰与民众在肖家渡口召开群众大会,将抓获的“保民会”分子当场处决。

海龙同样是反日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海龙县位于吉林省的西部,属于长白山脉向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沈海路和吉海路贯通其间。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满、朝鲜族。从1927年起,中国共产党就在此地活动过,1930年12月,中共海龙县委成立,统辖海龙、西安(今辽源)、清原、东丰、西丰、柳河、通化等地党的工作。

1931年7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海龙县委和清原县委联合决定,于8月1日两县联合举行暴动。斗争的主要目标是驻山城镇的日本领事馆和驻扎此地的军阀于芷山。当日清晨,1500多名农民手持镰刀、斧头和棍棒,浩浩荡荡向山城镇进发。他们边走边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沿途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暴动队伍的行列中。敌人发现后,十分恐慌,调集200多官兵将已到达镇东和西集场子的群众包围起来。并不断地放枪,妄图驱散暴动队伍。但民众毫不畏惧,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口号声此起彼伏。为了避免群众受到伤害,暴动委员会决定停止游行,分散活动。他们一面组织群众在街头散发传单,一面掩护群众撤退。这次暴动虽未取得完全胜利,但充

分显示了党领导群众斗争的力量,鼓舞了人民群众与敌人抗争的斗志。

九一八事变后,该地的党组织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形式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斗争。1931年12月,中共海龙中心县委为纪念“广州暴动”四周年,在清原三间房、倒木沟,海龙四八石,东丰北大沟、横道河子、四平街等地召开纪念大会,计有500余人参加。会后,有的地方还举行了示威游行,沿途还散发和张贴了大量反日传单和标语。此外他们还组织宣传队向铁路工人、农民做宣传工作;地方党组织在斗争中还发展了5名党员。这些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爱国群众的抗日斗志,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磐石、海龙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一系列反日锄奸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亲日走狗汉奸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广大爱国群众的抗日斗志,为建立党领导的反日武装打下了坚实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一)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建立

早在1930年8月,中共磐石县委建立了一支7人的武装组织——特务队,队长陈玉振。特务队归县委直接领导。其主要任务是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党员李红光奉命在磐石、双阳和伊通三县的交界地带成立了有20余人的劳农赤卫队。这支武装组成后,积极进行镇压地主恶霸、保护农民利益的活动,因而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反日斗争,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将劳农赤卫队与特务队合并,组成磐石赤色游击队,由李

红光任队长。

为加强对群众抗日斗争和创建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于1932年2月,将省委驻吉林特派员张振国^①和中共北满特委兵运工作负责人杨君武^②派往磐石,协助中心县委开展抗日工作,为建立反日游击队做准备。同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来到磐石,具体领导创建磐石反日武装的工作。在磐石,他们紧紧地依靠磐石中心县委,与当地的党员干部密切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向民众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和方针,从而为工农抗日武装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还通过开办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政治和军事能力的干部,如孟洁民、李红光、初向辰^③、王兆兰^④、朴翰宗^⑤、韩浩、李松波、李明海、崔山好等。这些年轻有为的爱国青年,在后来的艰苦抗日斗争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骨干作用。此外,为了壮大抗日力量,解决武器来源,他们还派出党团员到伪军中去策反工作。如先后派孟洁民、王耿、朴亨燮等人打入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吉

① 张振国(1901—1935),原名张玉珩,又名张敬山。河南信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东北工作。1930年任吉林县委书记,1932年任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在战斗中牺牲。

② 杨君武(1911—1970),又名杨佐青。黑龙江阿城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北满特委兵运负责人。1932年冬回哈尔滨做国际情报工作,1934年去苏联。新中国成立后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哈尔滨市政府秘书长。1970年病故。

③ 初向辰(1910—1933),原名初向臣,吉林磐石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参加抗日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总队政治委员。1933年1月在战斗中牺牲。

④ 王兆兰(1910—1933),又名王学文,吉林磐石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副总队长。1933年1月在战斗中牺牲。

⑤ 朴翰宗(1910—1935),原名柳清河,又名朴焕宗,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后,历任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分队参谋、南满游击队第一大队参谋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一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等职。1935年在战斗中牺牲。

林警备军第五旅第十四团第二营第七连当兵。伪七连原是东北军步兵七连。1932年5月的蛤蟆河子大暴动,对该连具有民族意识的官兵触动很大。为了进一步了解党的抗日主张,该连王连长通过关系与中共磐石县委取得了联系。县委经研究认为,这是策动东北军参加抗日的有利时机,于是增派干部前往七连,以等待机会组织伪军哗变。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细致的工作,伪七连于1932年5月16日晚10时宣布起义。但由于新调任的伪连长张静轩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极力阻挠部队起义,于是发生了枪战。情况紧急,哗变士兵边打边撤。最后,只有30余名来到玻璃河套中共磐石县委的驻地。这些反正士兵受到中共磐石县委的热情欢迎。他们携带出来的30支步枪,成为随后成立的磐石反日游击队的主要装备。另外,派出的朴翰宗等人在伪军中开展的策反工作也取得了成效。

1932年6月4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杨林的主持下,以磐石赤色游击队为基础组织起来的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在磐东小孤山正式建立。随后,在三道岗小金厂举行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庆祝大会。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下设3个分队,共30余人。张振国任总队长,杨君武任政治委员。队员的成分主要是雇农、贫农、学生、士兵。朝鲜族队员占多数。6月10日,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⁵⁰发布公告,宣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建立,给磐石群众以极大地鼓舞,全体队员更是群情振奋。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协助群众进行了多次分粮斗争。仅从7月10日到8月8日所领导的分粮斗争,就达16

次,所参加的群众计 800 名^①。在分粮斗争中,打垮了百家长组织的 300 名地主会兵的“围剿”,缴获了一批洋炮、抬枪等武器,充分显示了这支人民反日武装的威力。磐石工农义勇军开展的一系列斗争,受到广大群众的热忱拥护和支持,政治影响也不断扩大。到 8 月底,队伍已发展到 50 余人,有长短枪 50 支,扩编成 4 个分队。在队内还建立起党支部,各分队建立了党小组。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很快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敌人一面调集伪军对工农义勇军进行“讨伐”,一面派出奸细打入队内伺机破坏。1932 年 6 月 14 日,敌人设计将义勇军第一分队骗到郭家店东沟,里应外合,将该分队 3 名队员打死,政委兼第一分队长杨君武和另一名队员负伤,并损失步枪 9 支,手枪一支及子弹 180 发。当第二、三分队闻讯赶来时,敌人已逃走。磐石工农义勇军遭到了建立以来第一次重创。

在此期间,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南满党组织搞“打土豪分田地”,不加区分地到处斗地主、富农,没收其财产,引起有反日思想的中小地主的反对,一些汉奸地主借机大造谣言,说义勇军都是“高丽胡子”,以此挑拨汉族与朝鲜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因此,磐石工农义勇军在与日伪军作战的同时,还经常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不仅如此,他们对一些反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不注意团结和联合,并经常发生摩擦,8 月 9 日和 16 日,义勇军在郭家店、蛤蟆河子两次遭到地主会兵和山林队的联合进攻。磐石工农义勇军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不得不退出蛤蟆河子根据地。尽管如此,由于工农义勇军作战勇敢,抗日坚决,因而得到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拥

^①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1932 年 7 月 30 日),载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6,第 48 页。

护,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及时向满洲省委汇报磐石党组织和磐石工农义勇军面临的严峻形势,8月下旬,磐石中心县委派总队长张振国赴省委请求指示。总队长一职暂由第二分队长孟杰民代理。为避免与其他抗日部队冲突,便于开展抗日活动,尽快打开局面,县委决定工农义勇军与抗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常占队”本是活动在磐石一带的一支绿林武装,该队首领“常占”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在日本侵占东北后,便拉起队伍进行抗日活动。工农义勇军与其联合后,对外取消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队号,统称“常占队”。常占任总队长、张振国任政委、王耿为政治部主任,全光任参谋长,总队下设3个大队,大队长都由共产党员担任。

1932年9月初,宋国荣率东北抗日救国军第八路,决定联合在附近活动的义勇军、大刀会和红枪会等反日武装4000余人攻打磐石县城,合并后的“常占队”也参加了这次攻城战斗。9月9日,东北抗日救国军及“常占队”等联合部队由黑石镇向磐石县城挺进。并按事前的部署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包围了磐石县城。以磐石工农义勇军为主力的“常占队”担任了攻打东城门和西城门的任务。9月10日凌晨5时30分,联合部队发起进攻。东门首先被攻破,不久,其他城门也相继被联合部队攻下。之后,战士们手持长枪、挥舞大刀、长矛,如潮水般涌入城内。伪军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吓得纷纷四处逃窜。驻守磐石县城的日军守备队也龟缩在工事里不敢出来。冲进城内的联合部队很快打开仓库,将粮食、衣物及其他物资悉数运出城外;他们还冲进伪县公署和监狱,焚毁了敌伪文件档案,释放了在押的抗日群众。但由于日军始终据守城内的坚固工事,联合部队几次进攻均没有攻下。战斗持续到9月14日,敌人出动了4架飞机前来增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部队为了减少损失,于15日夜,撤离磐石县城。

攻打磐石县城之战,共毙伤日军9人,打死伪军、汉奸20余人。虽未获全胜,但却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磐石工农义勇军在这次联合行动中也得到了锻炼,同时,也使磐石县委深刻体会到联合作战的威力,为以后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和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磐石县城战斗后,“常占队”转移到伊通县的三道通。经侦察,他们决定攻打反动会兵据点何家大院。这个反动地主大院戒备森严,以前也曾数次被抗日军攻打过,但均没有攻下。经周密准备,“常占队”仅用2天时间,便打下何家大院,并获长短枪30余支和许多粮食、棉布及一些马匹。

1932年10月2日,张振国回到磐石,带回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的指示信。此时正是满洲省委贯彻执行“北方会议”决议精神时期,省委指示磐石党组织把开展土地革命,创建磐石红色游击区和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心任务,并提议将磐石工农义勇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北游击队”。磐石中心县委接受了这一指示。并于10月9日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做出了从“常占队”脱离出来独立活动的决定。10月21日,磐石工农义勇军脱离“常占队”,由郭家店转移到桦甸县常山屯和蜜蜂顶子一带,并将准备向日军投降的山林队“于司令”所部20余人缴械。

10月23日,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在桦甸蜜蜂顶子召开了各分队党小组代表会议,决定对游击队进行改编。改编后,全队分4个大队。总队长孟杰民、副队长钟仿服、政委张振国、政治部主任王耿、参谋长满汉生。第一大队长初向臣、第二大队长李万和、第三大队长刘克文、第四大队长李某。每大队30人,游击队的队员中汉族占多数。全队有长短枪140余支。为了避免引起日伪的注意和与其他山林队产生对立,改编后,游击队对外报号“五洋”,而不打出红军游击队的

旗号。10月24日,游击队即把截得的600斤食盐,全部分给穷苦百姓。为此,当地群众都非常高兴,他们称赞:“五洋队真好,中国军队都象他们这样,亡不了国。”^①

1932年10月29日,针对队员中存在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游击队在柳树河子召开了党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会议批判了队内由于受土匪影响而存在的各种不良行为,作出了加强队内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并改选了党的支部和小组。

11月4日,游击队又召开了党支部干事会。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游击队的行动方向问题。因为一段时间以来,队内在对回师磐石还是向东满进军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也没有达成一致认识。最后,会议决定,在与县委取得联系之前,暂不回磐石;而在上级组织做出决定之前,也不能擅自去东满。部队暂以桦甸为临时根据地进行整训和开展游击活动,并向省委请求派干部来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由满汉生任政委。

中共满洲省委对磐石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工作十分重视。早在磐石工农义勇军成立之初,省委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几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磐石的问题,并多次发出指示信,同时还派出巡视员到磐石检查指导工作。但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这些同志到磐石后,未能解决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存在的问题。1932年7月,磐石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紧急报告中,认为“目前磐石义勇军的游击工作,关系于整个工作的转变非常重大,省委应速派去有经验的军事工作同志,去组织强有力的军委,领导义勇军的游击战争”,“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省委应速派巡视员前去,召集磐石县代表会

^①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简史》,政协吉林省文史委员会:《吉林文史资料》第21集,第5页。

改组县委,彻底解决磐石工作问题。”^①同年8月,满洲省委接到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的报告后,经过研究作出决定,派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②到南满巡视,指导该地区的抗日斗争。

杨靖宇得到省委的通知后,于11月初动身从哈尔滨经吉林到达磐石。杨靖宇来南满前,尚不知道游击队已脱离“常占队”的情况。他化装成商人,辗转找到“常占队”。因此前曾发生过游击队处决“常占队”队员之事,所以,为了报复,他们便把杨靖宇捆绑起来,企图加害于他。当杨靖宇弄清事情的原委后,就对“常占”等人说,他们那样对待你们是不对的。我这次来就是纠正这个问题。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以民族的大义为重,要捐弃前嫌,共同抗日。经过杨靖宇~~和~~耐心的说服,“常占”遂将其放行。于是,杨靖宇又返回吉林,后经过党的地下交通关系,与游击队接上头。十几天后,纪儒林、~~金光~~等人将杨靖宇接到游击队的驻地——桦甸县~~蜜蜂~~顶子。

此时,游击队内部思想相当混乱,关于部队的行动方向还是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且士气也很低落。面对这种情况,为尽快摆脱困境,打开局面,杨靖宇首先同党团员谈心,并广泛征求战士的意见。之后,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召开了党支部扩大会议。他说:“我们是磐石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我们若离开磐石,就象鱼儿离开了水,就象没有油的灯芯一样,会枯死和灭掉。我们没有根据地,就象

^①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1932年7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54、55页。

^② 杨靖宇(1905—1940),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确山农民运动。1929年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工作,化名张贯一,任抚顺特支书记。1931年后任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1933年后历任南满反日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等职。1937年12月,为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1940年2月23日,在与敌人战斗中牺牲。

人没有家,我们一定要回磐石去依靠家乡父老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经过杨靖宇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刻的分析,大家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会议决定,游击队取消“五洋”的山头报号。同时,根据省委的提议,将队伍名称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由孟杰民任总队长、王兆兰任副总队长、初向臣任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总队下辖3个大队。第一大队长孟杰民兼、第二大队长李万和、第三大队长刘克文。各大队设政治委员,分队设政治指导员。游击队重返群众基础较好的磐石一带活动,以进一步发展队伍,巩固和扩大玻璃河套抗日游击根据地。

整顿后的游击队斗志昂扬地向磐石进发。途中,他们每到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宣传游击队的宗旨。在桦甸北头道沟,游击队把大地主陈连万的粮食分给了当地穷苦百姓。不久,他们进入磐石县境。在磐东郭家店,游击队获知当地的保卫团头子于宪庚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并想趁游击队到来之时收缴游击队的枪支。杨靖宇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指挥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郭家店,抓住于宪庚,之后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将其处决。会后遣散了保卫团,缴获29支新式步枪。于宪庚被处决,游击队为当地群众除了一害,红军游击队的声威大震,队员的战斗情绪随之振奋起来。当游击队来到磐石石虎沟时,杨靖宇为进一步巩固队伍,清洗了混入队内的少数流氓分子和惯匪。在纯洁队伍的基础上,杨靖宇帮助和指导召开了中共磐石县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组了中心县委,并在游击队内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之后,杨靖宇离开磐石去海龙巡视工作。游击队回到玻璃河套根据地。

杨靖宇离开不久,游击队即遭到两次严重损失。1932年11月19日,游击队遵照磐石中心县委的要求,前往西集场子(今吉昌镇)长胳膊屯解除威胁伊通区委工作的反动恶霸地主张辅卿的武装,由于总

队长孟杰民经验不足,加之缺乏应有的警惕,结果被张杀害。游击队闻讯立即向张的土围子发动进攻,但敌人的火力太强,且有援兵赶到,游击队被迫撤出战斗。

孟杰民牺牲后,由王兆兰继任总队长。1933年1月11日,游击队在磐东大泉眼宿营时,由于部队没有布置严密的警戒,总队部遭到汉奸高锡甲的伪自卫团和驻东集场子(今呼兰镇)的伪军的偷袭。游击队仓促应战,经30多分钟的战斗,才冲出敌围,但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不幸中弹牺牲。一些队员也因队伍被打散而离队。游击队由160余人减至不足百人。为了稳定队伍,磐石中心县委决定,由原游击队第一大队长袁得胜任总队长,纪儒林任代理政治委员。

游击队遭受这两次重大挫折,“不但是游击队的重大损失,而且是全县工作上的重大危机”^①,游击队的士气也因此出现低落。在此紧急关头,恰值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到,经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才得以稳定。

此时,在海龙巡视工作的杨靖宇闻讯后,立即结束对海龙的巡视,赶回磐石。1933年1月中旬,杨靖宇在西玻璃河套召开了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党的特支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遭受挫折的经验教训,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的悲观情绪。他号召大家振作精神,坚定信念,重整队伍。然后,杨靖宇又召开了有游击队和当地群众参加的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号召大家向英勇牺牲的烈士学习,前赴后继,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奋斗不息。

南满游击队在短时间内相继失去了多名负责人,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为使部队领导健全起来,扭转游击活动的被动局面,中共满洲

^①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省委的报告》(1933年1月1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61页。

省委决定,调杨靖宇到南满游击队任政委,袁得胜仍任总队队长。新设教导队,队长李明海、政委李红光。第一大队队长朴翰宗、政委严弼顺;第二大队队长韩浩、政委朴四平;第三大队队长王某、政委王绍文。南满游击队以玻璃河套为根据地,并将游击区域扩大到桦甸、伊通、双阳等地。

南满游击队经过整顿后,杨靖宇率队展开了积极的游击战。在拐子炕,出其不易地袭击了由投降日军的土匪改编的伪军,毙敌20多人,而游击队则无一伤亡,队伍军心大振。很快,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站稳了脚跟,并稳步发展起来。

日伪政权对南满游击队的发展极为恐惧。为消灭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自1933年1月至4月,敌人调集日军守备队和大批伪军对游击队和玻璃河套抗日游击根据地连续发动了4次“围剿”。

1933年1月30日上午10时,投降日军的土匪队“东江好”六七百人突然向游击队在三棚砬子附近的驻地发动袭击。游击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势,一边用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一边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队员们边打边喊话“士兵不打士兵”,以瓦解敌人的斗志。敌渐不支,向三棚砬子退去。正在这时,另一支伪军“毛团”及其所部“四季好”从南面向游击队包抄上来。游击队又迅速集中兵力出击,“毛团”被击退。随后,“毛团”所属的另一股土匪“白莲”对游击队的进攻也被打退。三棚砬子战斗共毙伤敌18人。

之后,游击队一鼓作气,又相继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在吉海路,游击队70余人袭击了日军守备队铁甲车,毙伤日军30余人。在庙岭,游击队100人与伪军500人作战,毙伤敌人20名。此后,游击队由砖庙子转移到浅草沟驻扎。2月28日,不甘心失败的“东江好”和“毛团”在日军军官的率领下,以六七百人的兵力直扑砖庙子向游击队展开第二次“围剿”。结果扑空。转而又向浅草沟发起进攻。游击

队得悉敌人来袭,迅速把主力布置在附近的山上,然后将一支小部队派出诱敌。当敌人进入伏击阵地后,游击队突然以猛烈的火力射向敌群。这次战斗共持续3个小时。敌人虽组织了多次反扑,但都被我军打退,最后,只得丢下20多具尸体,狼狈败退。

“东江好”对南满游击队的两次“围剿”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日本侵略者极为震怒。于是,日军解除了“东江好”的武装。“毛团”见此情景,惟恐殃及自己,只得拉出队伍,哗变抗日。

同年3月底,日军守备队配以大炮、迫击炮、重机枪,气势汹汹地向磐北杨宝顶子对南满游击队展开第三次“围剿”。杨靖宇和李红光指挥部队从玻璃河套到杨宝顶子10多里的战线上布下阵势,待敌人接近阵地时,游击队员奋起反击。日军虽动用了大炮等重型武器,但游击队士气高昂,激战数小时后,敌人死伤20余名,其中包括日军守备队队长。游击队无一伤亡。这次战斗取得胜利,游击队员精神更加振奋,“当地广大群众也非常高兴,更清楚地知道: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才是真正彻底反日民族革命的武装,并且也只有红军游击队才有这样的战斗力”^①。

4月底,日本守备队又纠集当地反动武装奔向萝卜地,向游击队发起第四次“围剿”。敌人携带3门迫击炮,七八挺机关枪,从小城子出发,直扑萝卜地,企图包围游击队的驻地。但游击队此时早已移至大泉眼,所以,当敌人路经大泉眼时,已经得到消息准备应战的队员们,出其不意,给气势汹汹的敌人以猛烈打击,毙伤日伪军多人。在游击队员正面迎击敌人的同时,另有两支小部队分别在敌后和山口出路埋伏下来,准备在敌人逃窜时给以堵击。这时,敌人见正面冲锋

^① 《满洲红旗》(1933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22页。

不能得逞,又受游击队侧面包围,便急速集合,夺路逃窜。敌人集合时,又受山中埋伏的另一部队猛击,于是急向磐石县城落荒而逃,但又遇我埋伏部队的迎头痛击,死伤很多。此战毙伤敌30余人,其中有6名日军。至此,日本侵略者精心策划的4次“围剿”均以失败而告终^①。

随着抗日游击运动的不断高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争取和影响伪军反正哗变的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5月28日,驻烟筒山伪吉林警备第五旅步兵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在打入其内部的共产党员曹国安^②、宋铁岩^③以及张瑞麟(起义前两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and 策动下,击毙伪军连长,举行起义。60余名士兵携带一门迫击炮和40多支步枪及数千发子弹离开烟筒山,向南满游击队驻地玻璃河套进发。在玻璃河套,起义部队受到了抗日群众和游击队指战员的热烈欢迎。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冯仲云和磐石中心县委书记李东光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走上反日道路给予充分肯定。之后,哗变队伍被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委,张瑞麟任第一中队队长。迫击炮连的哗变,不仅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而且使游击队具有了自己的迫击炮,增强了游击队的战斗力。

烟筒山伪迫击炮连起义后,该团军心大为动摇。不久,该团机枪

^① 《满洲通讯》(1933年6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22、23页。

^② 曹国安(1900—1936),原名于德俊。吉林永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满游击队迫击炮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政委等职。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

^③ 宋铁岩(1910—1937),原名孙肃先。吉林永吉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抗日斗争。曾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等。1937年在战斗中牺牲。

连的一个班携带1挺机枪、6支步枪和2000发子弹哗变。之后,又有该团的30名士兵携带30支步枪和3000发子弹投奔了游击队。

当时,在磐石地区活动的抗日队伍除了党领导的南满游击队外,还有很多从事抗日活动的山林队、红枪会、大刀会等。但是这些反日武装人员少,且内部不团结,各自为战。由于游击队作战勇敢,战斗力强,在这些队伍中有很高的威望。然而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政策,致使这些队伍不愿向游击队靠拢。这种局面,对磐石抗日斗争的发展十分不利。为此,杨靖宇和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经研究,认为游击队要想发展壮大,抗日游击运动要想向纵深发展,就必须联合周围的抗日力量,共同对敌。于是,游击队利用一切机会,派人向这些反日武装宣传自己的抗日主张,消除他们的对立情绪,传达共同抗日的意愿。

当时活动在磐石实力较大的反日山林队有两支。一支是赵宝林为首的赵旅,另一支是以马立三为首的马团。这两支队伍抗日较为坚决,但与游击队关系不好。为了争取他们一道抗日,杨靖宇寻找机会与之接近。一次,赵旅和马团在距玻璃河套不远的板凳沟被日伪军“讨伐”队包围,战斗非常激烈,形势对其十分不利。他们几次试图突围,但均没有成功。当杨靖宇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部队,并联合地方农民武装前去驰援。游击队从敌人背后发动攻击。见此,赵、马两部开始反攻,日伪军难以招架,败退而逃。赵、马二人对游击队不计前嫌,冒死救援的行动,十分感激。当即表示今后决不再与游击队为敌。杨靖宇借此机会向他们宣传日寇入侵,国破家亡,只有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道理。从此,这两支山林队与游击队建立了联合作战、共同抗日的良好关系。并以此为转机,游击队加大了对其他反日队伍的争取和联合工作,磐石地区的反日斗争和南满游击队的活动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

南满游击队在杨靖宇的领导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紧密地依靠当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越战越勇,越战越强。对此,中共满洲省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33年7月,省委在给磐石县委和南满游击队的一封指示信中说:“半年来,党所领导下的赤色游击队六十余次的英勇斗争,击退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六次大的进攻,解决了不少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一些民族的叛徒地主豪绅,夺取了一些武器,武装了你们自己与一部分农民群众,帮助与领导了一些群众的抢粮分粮斗争,保卫了玻璃河套一带农民的春耕。在赤色游击队英勇的战斗中,影响了一些反日武装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党与游击队在南满的政治影响。赤色游击队与武装发展了三倍,在南满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我们的赤色游击队成为主要力量之一,初步地开始形成领导的力量”,同时还“创造了吉海铁路的产业支部,组织了游击区域农民协会,建立了一部分农民赤卫队,这都是你们这个时期从斗争中所获得不可抹杀的一些成绩。”^①游击队队员的思想觉悟也得到很大提高,一般队员都希望参加共产党和共产青年团。所有这些表明,南满游击队已成为磐石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二)海龙工农义勇军的建立

1932年春,在中共柳河县委的领导下,中共党员蔺秀义在柳河县大清沟组建了一支反日武装——柳河游击连。有队员20余人。因缺少武器,蔺秀义变卖了自家的大车,为游击队购买了5支步枪和一些弹药。同时,他们又先后在烟筒砬子、大牛沟和五道沟从伪警察和地主手里缴获了一些枪支和弹药。游击连在艰难中逐步得到发展。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任务等问题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1933年7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26页。

1932年6月,中共党员王仁斋^①、刘三春^②在柳河县五道沟成立了海柳工农义勇军。不久,王仁斋和刘三春等率队参加了柳河爱国人士包景华组织的抗日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军。王仁斋等到队后,以上校政治教官身份,利用教课的机会向队员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据海龙中心县委1932年9月的报告称,第九路军的党团员已有30余人。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第九路军由原先的300余人发展到1000余人。由于这支部队的政治素质较高,所以,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2年10月,日伪当局从吉林和黑龙江调集独立守备队和第二师团一部,分四路对第九路军发动猖狂进攻。由于寡不敌众,加之缺少支援,第九路军不得不退至柳河县大牛沟。此时,这支队伍的人员已所剩无几,包景华解散了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王仁斋、刘三春、蔺秀义等人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带领原海柳工农义勇军成员和部分党团骨干共30余人转移到大清沟。在这里,重新举起海龙工农义勇军的旗帜,很快由30人发展到80余人。但由于领导不力,队伍再次遭到挫折。

1933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到海龙巡视工作。杨靖宇在对当地情况了解和分析后,对海龙工农义勇军进行了整顿,于1月13日正式将其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队长王仁斋,政委刘三春,活动在清原、海龙、山城镇一带。

① 王仁斋(1906—1937),原名王人增。山东文登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来到东北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32年创建海龙游击队。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三师师长。1937年在战斗中牺牲。

② 刘三春(1911—1933),山东章丘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到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2年春组织海柳工农义勇军,1933年1月任海龙游击队政委。1933年在战斗中牺牲。

中共满洲省委于1933年2月给海龙县委发出指示信,指出:摆在海龙党组织面前的中心战斗任务,是“坚决地领导群众的斗争,积极地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对游击队的工作则强调“要坚决地领导群众斗争与一切反日反帝的斗争,抓紧群众春荒中迫切要求”,“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动群众的反帝斗争,采取游击战术开展游击运动”,“要改善游击队员的成分,如那些惯匪与那些抽大烟的,必须坚决的洗刷出去。游击队的领导者,也必须实行改造。扩大党的组织,建立党在游击队的领导的骨干。”^①

根据省委的指示,王仁斋率领游击队员在大泉眼袭击了日军汽车,缴获伪币8000元,另有许多物资。战斗结束后,队伍转移到野猪沟活动。在这里,不幸遭到伪军的偷袭,战斗中,部队被打散。此后,党组织又派人来加强队伍的建设,海龙游击队又有了较大的发展。1933年8月,刘三春率领的海龙游击队与原义勇军田霖部下苏剑飞部汇合。经协商,两支队伍合并,并根据海龙县委的指示,一同北上,与南满游击队会合。

第三节 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东满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东满大体相当今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包括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敦化、额穆等县。东满地区东临俄罗斯,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望。长白山脉贯穿全境。居民除汉族外,大多为从朝鲜迁徙过

^① 《中共满洲省委给海龙中心县委的指示信》(1933年2月1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第161、165页。

来的朝鲜族居民。早在18世纪初,一些贫苦的朝鲜边民因不堪忍受国内的封建统治,越境进入中国的延吉一带垦殖谋生。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和恐怖高压政策下,不愿当亡国奴的朝鲜人民,为免遭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而逃离自己的故国家园,陆续渡过图们江流亡中国,并定居在东满地区。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后,一大批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到中国东北,东满地区的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县成为朝鲜民众从事爱国独立运动和革命活动的中心。东满地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势力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强大,其经济政治均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由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影响,社会主义在该地民众中的影响较大。东满地区各族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革命要求十分强烈。因此,东满成为中共党组织最早建立的地方之一。

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对东满地区民众革命斗争的领导,早在1928年1月派周东郊到延边进行建党工作。同年3月,北平香山慈幼院40多名毕业生到延边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有20多名党团员。8月,成立中共延边区委。从此,中共满洲省委对东满的朝鲜族工作更加重视。1928年4月,省委发表了《告满洲朝鲜农民书》。1930年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廖如愿在延吉县主持召开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筹备会议,为党在东满建立区域性组织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1930年8月13日,在和龙县平岗药水洞召开了东满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延(吉)和(龙)中心县委员会。王耿任书记、韩别任宣传部长、朴允瑞任军事部长。中共延和中心县委隶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县委机关设在龙井村。延和中心县委成立后,积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先后派出党员干部到所属各县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到同年8月末,县委下设10个区委,61个支部,有党员470多名。

如前所述,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吞朝鲜后,便把东北视为实现其大陆政策的下一个目标。东满地区是中国东北连接朝鲜的重要通道,因而成为日本侵略者要霸占的首选之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在东满设有总领事馆、5个领事分馆、19个警察署和警察分署,驻有军警600余名;此外还有从事农、工等各业的“在乡军人”千人左右。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些殖民统治机构,进行特务活动,挑拨中朝民族关系,欺压东满各族人民,破坏共产党组织,镇压反日活动,搜捕和杀害反日群众。

1930年9月,鉴于东满工作的重要性,中共满洲总行委^①决定以延和中心县委为基础,成立中共东满特别委员会,以加强和推动延边及周边地区的反日斗争。为此,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发出指示信,强调指出:“东满各县——特别是延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的根据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筑吉会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是东满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划定延吉、珲春、和龙、汪清、敦化、安图、抚松、桦甸、额穆、长白十县,组织东满特委,直接指挥布置各县的工作。”^②

1930年10月,在中共满洲总行委代表廖如愿和杨林的主持下,中共延和中心县委召开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省委关于建立中共东满特委的决定和省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精神。根据省委的意见,中共东满特委正式成立,特委委员7人,书记廖如愿、军委书记杨林、组织部长王耿、宣传部长朱健、交通部长李镛、青年部长李用国、妇女部长李仁活。东满特委隶属于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分别设在朝阳川和局子街(今延吉)北山。在东满特委成立的同时,还组成了东满特

^① 1930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改为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

^② 《中共满洲总行委给东满特委的指示信》(1930年9月2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225页、第226页。

委军事委员会。

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军委书记杨林与军委的干部一道积极开展武装工农群众的工作,在各县委都设立了军事部,整顿和组建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加强了党对游击队的领导。1931年2月,在杨林的主持下,制定了具有指导意义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对游击队的性质、任务、党对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的建设和指挥系统及其战术等方面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大纲》虽然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制定的,其任务也主要是为了执行土地革命方针,但是,后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建立反日武装、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和开辟游击根据地还是发挥了作用。

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派出优秀干部深入各地,进行组建和改组各县委的工作。自1930年10月至1931年2月,东满特委下属有6个县委,19个区委。到1931年4月,已有党员600余名,占全东北党员总数的54.1%。

同时,农民协会、反帝同盟、青年同盟、妇女同盟等群众爱国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参加群众团体的人数也由1930年4月的2000人增至10月的5000余人;在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影响下的群众达5万余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当地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日浪潮。其中较大的有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

东满地区的汉族、朝鲜族贫苦农民长期以来深受封建地主的盘剥和压迫。当地各族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在群众强大的斗争压力下,1931年3月,吉林省政府为了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便公布了“四六”、“三七”减租令。但地主势力不但拒绝执行,而且还勾结封建军阀和日本殖民者对群众进行镇压。

为了反抗敌人的镇压,中共东满特委做出了发动群众,向一切压

迫和侵略者进行斗争的决定。为此,特委提出了“打倒日本走狗”、“按照吉林省政府公布的‘三七’、‘四六’的方法,实行‘三七’、‘四六’的租地法令”、“反对交纳日本金融部的高利贷的残酷的利息”、“中韩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挑拨中韩民族感情”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同时,指示东满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秋收”斗争。

1931年9月,中共延吉县老头沟区委发动官道口、大箕洞等地800多农民举行示威游行。示威农民把地主的大院团团包围起来,打开粮仓,分粮济贫。10月,延吉区、依兰区、海兰区的农民协会联合成立了由13人组成的“秋收斗争委员会”,他们在中共延吉区委的领导下,动员2000余名群众包围了苇子沟大地主陈奎和海兰区大地主孟胡雨的庄院。在农民要求实行“三七”减租再一次被拒绝后,愤怒的群众不顾地主的阻拦,蜂拥而上,打开了粮仓,进行分粮。11月,中共八道沟区委也动员2000多名农民与顽固反动的地主进行斗争。他们把当地的副区长和地主张折兰拉出来进行斗争。斗争中,“地主逃跑,群众自动把粮食分配后,又到救济会农场(日寇剥削农民的经济机关)把所有粮食都分配了。”^①同时,局子街附近的2000多群众在农民协会的组织 and 领导下,在小营子召开誓师大会,迫使地主在“三七”减租书上签字。之后,群众举行了游行示威,并将局子街伪警察局包围起来,抗议反动军警镇压农民群众的罪行,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群众。在广大民众的愤怒呼声中,当局被迫将被捕群众释放,斗争取得了胜利。

与此同时,和龙县的大砬子、开山屯、平岗、三道沟的农民在和龙

^① 《东满(延吉)革命斗争略史材料》,中共吉林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吉林历史资料丛书·东满抗日斗争烽火》,第150页。

县农协会长具成泰的领导下,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在开山屯,近千名农民涌进地主的大院。他们打开粮仓,分了粮食。日本驻龙井领事馆出动军警对群众进行镇压,还调集江对岸驻朝日军过江配合领事馆的警察镇压群众斗争。群众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结果,军警将共产党员、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姜基范押解到领事馆。在对其审讯中,姜基范被拷打致死。悲愤的群众抬尸游行,示威群众到龙井领事馆,要求人死还人,并砸了领事馆的大门。

在汪清县,百草沟、大小汪清等地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向地主要求减租的斗争,逮捕了仗势欺人的日本走狗,并召开公审大会将其处决。此外,珲春县的烟筒砬子、大荒沟等地的广大农民也都积极地投入到减租、抗债及清算日本走狗的斗争之中。10月末,大荒沟等地近千名农民带着镰刀和麻袋,浩浩荡荡地聚集到清水洞,然后列队向珲春县城进发。一路上,他们高喊着:“实行减租减息,还我们口粮”等口号。途中,日本军警和伪军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并将机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群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夜晚。

在珲春县大荒沟、三安里、烟筒砬子等地,有1000余农民参加秋收斗争。1931年11月,珲春敬信区委领导农民协会和赤卫队,夜袭了圈河的反动地主高千田的大院。在解除地主武装后,没收了高家大院的粮食和财产,并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高千田。

这场规模浩大的秋收斗争持续了4个多月。在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的有力配合下,广大农民群众被充分地动员起来。他们不顾反动当局的镇压,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走狗的斗争中。据统计,全东满共有1.5万多人参加了这场斗争,并部分地实现了斗争目标。虽然由于日伪军警的破坏和阻挠,斗争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但是它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不怕牺牲、敢于斗

争的勇气。

继秋收斗争后,1932年春,东满地区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春荒斗争。

当年春天,东满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粮荒,为了帮助农民度过困难,并将反日斗争引向深入。中共东满特委根据群众的要求,带领农民群众开展了抗捐抗债,借粮度荒,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春荒斗争。这场斗争首先从延吉县依兰沟等地农民向地主借粮夺粮开始。中共延吉县委^①为此提出了“向地主借粮度荒”,“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东北”,“清算走狗”,“夺取敌人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等口号。2月初,依兰区委组织4000多名群众从地主家夺回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孤山支部的党员带领数千群众前往九龙坪日本警察分署,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5名共产党员。但在警察驻地,遭到保卫团和日警联合起来的压制,群众列队顽强抵抗,结果敌人向群众开枪射击,“春荒”斗争积极分子、赤卫队长被击伤,愤怒的群众为要报仇展开武装斗争。3月,老头沟区委发动700多名农民,与日本走狗进行斗争,并将其中3名处决。

1932年3月,和龙县开山屯的四对社、四光社、晴霞社、同新社等地的群众,也都起来斗争反动地主,夺取粮食分配给农民。斗争中,愤怒的群众将日本走狗崔亨根处死。

在农民群众积极开展秋收和春荒斗争的同时,当地的工人和学生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延吉县老头沟、八道沟的矿工和吉敦、敦图等铁路工人便投入到抗日斗争中。老头沟的矿工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就举行了反对日本资本家积欠

^① 1931年8月,中共延和县委撤消,同时,分别成立了中共延吉县委和中共和龙县委。

工人工资的罢工。他们不仅停工,而且冲破矿警的围拦,阻止天图线火车往外运输煤炭。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成立后,许多矿工纷纷投奔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八道沟金矿的矿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起工会组织,积极为抗日部队筹集物资。吉敦、敦图线的铁路工人也组织了工会,他们拆毁道轨,烧毁桥梁,以破坏日本侵略者的物资运输和军事进攻。此外,一些被侵略军强抓和骗招的筑路工人也起来进行反抗,他们或逃跑,或夺取枪支,投入到抗日部队中去。此外,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民族工商业者和开明地主也积极为抗日做工作。

从1931年9月开始的秋收斗争到1932年的春荒斗争和各界群众的反抗斗争,使日本侵略者在延边地区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在这些斗争中,中共东满特委及所属党组织,根据党的反日斗争方针,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反日会、农民协会组织。延吉县的海兰区、依兰区、八道沟区、老头沟区、瓮声砬子区;和龙县的开山区、大砬子区、安图区、平岗区;汪清县的蛤蟆塘、大小汪清、腰营子、罗子沟等地;珲春县的荒区、烟区等广大农村都被农民委员会所控制。在这些地方,还普遍建立了赤卫队、突击队、别动队等武装组织,有力地保卫了党的组织和农民群众。由于各级党组织紧紧地抓住有利的斗争形势,不失时机地组织和领导各族、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反日斗争方针和政策在群众中得到及时和有利的宣传,为党创建反日游击队打下了坚实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东满各县反日游击队的创建

九一八事变前,东满地区各县党组织贯彻当时党中央制定的土地革命方针,曾经在群众反日斗争的高潮中建立了几支小型的武装,

用以保卫党的机关和革命群众。但是九一八事变后,这种小型武装已不能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1931年10月,东满特委先后派人到汪清、珲春、延吉、和龙各县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反日游击队。为加强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于11月调童长荣来到东满。童长荣到东满后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改组了东满特委,并担任了东满特委书记。新特委恢复了汪清、和龙、珲春等县的党组织,加强了延吉县委的领导,还将原属和龙县委的安图区委撤销,建立了安图特支。同年12月,童长荣在延吉县瓮声砬子(明月沟)主持召开了东满各县负责人和党团积极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满洲省委关于加强党对创建反日游击队工作领导的指示精神,并就如何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运动、武装农民群众、建立反日游击队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会议决定,在当前形势下,要在东满各地巩固和发展已有的反日会、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少先队、赤卫队等群众反日团体;组织兵变,打击和清算日本走狗,夺取武器,建立游击队,开展反日武装斗争。之后,在党组织领导的秋收和春荒斗争中,恢复建立了10余支赤卫队、别动队和突击队等武装。

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特委发出指示信,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是东满目前主要的任务”,要求东满特委“在游击战争中和群众斗争中去建立与发展真正的游击队组织”^①。与此同时,东满特委还派人到敦化,发展了50名党员,建立了敦化特支。同年4月,东满特委向所属各县提出组建反日游击队的要求。之后,延吉、和龙、珲春、汪清等县委分别召开会议,布置创建反日游击队的工作。从1933年春,延、和、珲、汪四县分别组建了各有百余人的党直接领导

^① 《满洲省委对东满特委的工作指示》(1932年2月20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所存《中共东北地下党和东北抗日联军文件汇集》,第14集,第5页。

的抗日武装。

(一) 延吉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1932年初,延吉县的党团员和爱国青年以少量土枪为基础,开展夺取敌人武器、创建反日游击队的斗争。他们先后从伪警察署、亲日地主的手里夺枪数十支。在此基础上,于1932年夏,建立了依兰沟区游击队、老头沟区游击队和花莲里游击队。依兰沟区游击队有队员30名,老头沟区游击队有队员20余名。这几支小型游击队建立后,立即开展游击活动,袭击了依兰沟伪军营房,阻击小百草沟日军“讨伐”队,袭击桦尖子伪警察分署,袭击八道沟与铜佛寺,伏击瓮声砬子伪自卫团,在春兴街袭击日军汽车,攻打九龙坪等。这一系列战斗,既缴获了一批武器,又锻炼了队伍。除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外,延吉县赤卫总队还于1932年夏在石人沟建立了一所地下兵器修造厂。他们克服重重困难,打制出一些刀、矛等武器,修理了部分手枪和步枪,并制造出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较大的土炸弹即“延吉炸弹”。游击队员就是用这些土洋结合的武器,与敌人进行战斗,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起来。

但游击队的创建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32年9月,有30余名游击队员在花莲里的柳亭村突遭日军守备队的围攻,20余名队员牺牲,30名群众伤亡。此外,他们在夺取武器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损失和伤亡。但游击队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不气馁,不妥协,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坚持战斗。不久,被党组织派到三道湾“长江好”山林队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德泰^①带出20余名队员来到了依兰沟。

^① 王德泰(1908—1936),原籍山东,后随家迁入吉林省延吉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吉县反帝同盟会组织部部长。1934年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指挥等职。1936年11月在战斗中牺牲。

随后,延吉县新成立的反日游击队、赤卫队都陆续来到依兰沟。1933年1月,以这些队伍为基础,正式成立了延吉县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朴东根、政委朴吉。有队员130余名,其中党团员占游击队员总数80%以上。游击队下设3个中队,有长短枪80余支。游击队分别活动于烟集岗、八道沟、依兰沟、三道湾等地。

延吉县游击队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力量不断增强。他们与当地党组织和爱国群众一道一边与日伪军作战,一边创建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从1932年冬到1933年初,在延吉县建立了依兰沟区的王隅沟、八道沟区的石人沟、老头沟区的苇子沟、瓮声砬子的三道湾四块游击根据地。

(二)和龙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在中共和龙县委的领导下,开山屯、大砬子、平岗等地先后建立了赤卫队和突击队等武装。1932年春,在开山区,以金洛京、蔡奎镇为首的赤卫队员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买来两支手枪,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手枪队。同年3月,在县农民协会具成泰的指挥下,“队员李东一同志,化装丧人(带孝的),大胆的往开山区船口公安局,借口呈请屠宰丧父祭祀用肥猪,乘隙掏出手枪,喊别动!令警察们无可奈何的缴出5支步枪”^①。7月,几名赤卫队员袭击了白龙坪税关,夺取手枪1支。不久,他们又袭入石磨洞恶霸地主崔昌益庄院,枪毙崔昌益,夺取手枪2支,八连枪、步枪、洋炮各一支,并焚毁了一切贷款凭据。秋后,该队3名队员化装成牛车夫,前往怀庆街,闯进福兴东商店,夺取步枪、手枪各一支,接着又袭击了驻守该街的伪自卫团,夺取5支步枪。

^① 《和龙县游击队发展片断材料及抗日联军第六师战斗材料》,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吉林历史资料丛书·东满抗日斗争烽火》,第180页。

在大砬子区,以赤卫队为基础,于1932年夏,建立了一支游击队,又称长枪队,队长金昌涉。游击队活动在金谷、龙岩、大砬子一带。在夺枪斗争中,队伍很快发展到20余人。是年秋,游击队在大砬子通往咸宝路的道路上,伏击了伪缉私队,毙敌3人,缴枪3支。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游击队还在金谷村鹰岩洞建起一小型兵工厂。他们用简陋的工具修造武器。不仅修理许多步枪和手枪,而且还制造了大批大刀、长矛和威力较强的土炸弹。

此外,在牛腹洞南沟,当地党组织领导数名赤卫队员从土匪手里夺取了2支步枪,并以此为基础,组成三道沟游击队。

随着游击队的不断发展和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共和龙县委决定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1932年11月,平岗游击队在从药水洞、长仁江向渔浪村转移的过程中,将盘踞在这一带的日本走狗和反动地主武装悉数消灭和驱逐,从而为建立渔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同年12月,大砬子、开山屯、三道沟区的各支游击队陆续来到渔浪村。根据中共和龙县委的指示,在几支游击队的基础上,组成了和龙县游击中队,中队长金亨杰,政委金炳洙。下设两个小队,有队员40余名。为了配合对敌斗争,游击队还成立了后勤部,并先后建起了被服厂、武器修理厂、炸弹制造厂、后方医院、大酱厂及粮食供应处等。

和龙游击中队成立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队伍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到1933年春,已有队员80余人,各式武器50余支,不久,即扩编为和龙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张承汉、副大队长金昌涉,政委车龙德。下设3个小队。活动于平岗、三道沟、大砬子、开山屯等地。

(三) 琿春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1932年1月,中共琿春县委建立起一支有15人组成的别动队,并夺取了一些枪支和物资。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共东

满特委关于积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指示,这支别动队一边在大荒沟开展活动,一边扩大队伍。1932年3月,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烟筒砬子西沟又成立了一支有20余人的突击队,队长姜一武。为了扩充队伍,突击队开展了夺取武器的斗争。4月,夺取东拉修理公司伪警察分队2支步枪;5月,3名突击队员渡过图们江,偷袭了朝鲜庆源警察所,夺取3支步枪;6月,化装袭击了敬信乡玉泉洞监狱,夺枪10支,并解救了13名革命者。不久,以这支突击队为基础,在烟筒山西沟建立了岭南游击队,队长姜一武、政委林青,有队员30余人。与此同时,以大荒沟别动队为基础,成立了岭北游击队。队长姜锡焕、政委朴斗南,有队员30名。开始只有几支土枪、猎枪。为改善武器装备,队员们化装袭击了大荒沟公安局,缴枪10余支。不久,这支队伍又与其他反日部队一起在头道沟附近袭击了敌人的运输车,缴获一批物资。

为了加快发展抗日武装,中共珲春县委在创建游击队的同时,还派出一批党团员到活动在附近的王玉振救国军中开展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救国军十三团团团长祖耀宗的协助下,组织了一支14人的游击队。同年初冬,王玉振率队降日,救国军十三团连长孔宪琛率部下10余人加入岭北游击队。不久,又有小股救国军士兵加入了游击队。

岭南、岭北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对敌斗争。1932年7月,袭击了石头河子日本人经营的畜牧场;8月,伏击了“讨伐”烟筒山的日伪军,歼敌10余人。9月,攻打了珲春县城,毙敌30余人,缴获巡政局20余支枪。此外,他们还在大荒沟的槟榔沟建立了一所兵工厂,修理枪械,打造一些原始武器。

为了加强党对游击队的统一领导,根据中共珲春县委的决定,1932年11月,岭南、岭北游击队合并,成立了珲春反日游击队。编为

第一、三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林青、政委崔斗星,以烟筒砬子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第三大队队长孔宪琛、政委尹锡元,以大荒沟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活动。1933年2月,救国军溃散后,有30余人加入了琿春反日游击队。至此,琿春游击队有队员120名,步枪100支。1933年4月,琿春反日游击总队成立,总队长孔宪琛,政委朴泰益。活动于大荒沟、烟筒砬子、梨树沟一带。

(四) 汪清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1932年初,中共东满特委派原延和~~中~~县委军事部长金明均到汪清县委任军事部长。金到任后,与中共汪清县委一起进行了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一些准备工作。决定抽调优秀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为了准备武器,汪清县委积极组织党团员开展夺枪斗争。同年2月,七八名赤卫队员化装成救国军,闯进大坎子公安局,解除伪警察武装,夺枪7支,子弹6袋。尔后,他们又来到小汪清沟,挖出前朝鲜独立军埋藏起来的5支枪和一批子弹。以此为基础,于3月在小汪清成立了汪清反日游击队,队长金哲、政委金明均。有队员12名。与此同时,汪清县委又将李光等9名党团员派到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吴义成部,吴义成把他们编为别动队,后来成为汪清游击队的骨干力量。

汪清反日游击队和别动队成立后,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仅1932年夏季的数月内,就战斗18次。6月,别动队在牡丹池袭击敌人,夺得武器6支;7月,游击队袭击了小马鹿沟的伪军,俘敌5人,缴枪多支。之后,游击队和别动队联合伏击了石砚伪自卫团,缴枪10余支。入秋,游击队袭击了大坎子伪警察分署,夺枪10余支。10月,游击队和别动队再次配合,在南蛤蟆塘伏击了伪军孟营一个排,毙伤敌人20余名,缴枪13支。但不幸,战斗中游击队长金哲牺牲。之后,游击队在继任队长李应万和政委金银植的率领下,与别动队相配合,继续与

敌进行战斗。10月,袭击老松岭铁路警备队,俘敌多名。

1932年11月,汪清别动队、游击队与从宁安转来一支游击队合并,正式成立了汪清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梁成龙、政治委员金明均。队员90余人,编成3个中队,有长枪70余支,手枪10余支。

1933年2月,金日成^①率安图游击队来到汪清,编入汪清县游击大队,梁成龙任大队长,金日成任政委。这支抗日武装由于工人和贫雇农占绝大多数,所以战斗力较强,而且其领导人斗争经验丰富,很快就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抗日武装力量。

(五) 安图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1931年末起,安图地方党组织就开始着手组建反日游击队工作。安图党组织是和龙县委的一个区委,这里群众基础较好,反日情绪高昂。1932年初,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金日成到安图县明月沟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武装,在安图县的兴隆村,大沙河、小沙河一带建立了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群众反日组织,培养了一批青少年反日骨干力量。不久,与金日成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车光洙、李英培、朴勋、金哲等人也来到安图。之后,他们组织起一支小股抗日武装。并经与在安图活动的救国军于学璇部协商,成为救国军的一支别动队进行抗日活动。从此队伍有了迅速发展。同年4月25日,在安图县小沙河正式成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金日成任队长兼政委。游击队还建有党小组和团支部。游击队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必需要与有较大力量的反日部队进行联合斗争。所以,反日游击队成立后便决定与活动在

^① 金日成(1912—1994),又名金成柱,朝鲜平壤万景台人。少年时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曾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致力于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目标的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领导一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同中国人民一起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曾任抗联第二军第三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指挥、抗联第一支队支队长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朝鲜,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主席。1994年逝世。

南满的梁世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合作。但当游击队到达柳河三源浦与革命军接触后,并没有与其达成协议。之后,游击队返回安图。不久,又得知王德林率国民救国军在东宁一带活动。为争取与救国军联合抗日,游击队又前往东宁。但途中游击队不断遭到日伪军的阻击,加之气候恶劣,游击队减员很大。当队伍到达罗子沟后,金日成得知王德林已过界入苏、救国军瓦解的消息,便于1933年2月率队来到汪清,与汪清游击大队合并,在汪清、安图地区活动。

三、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反“讨伐”斗争

东满各支反日游击队的建立和发展,使日伪当局极度恐慌。为了将游击队消灭在萌芽中,1932年春,驻东满的日军在“讨伐”王德林救国军的同时,也将“讨伐”的矛头指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敌人除调动驻守东满地区的武装部队外,还从朝鲜调来了日军第十九师团第七十五联队,组成“间岛派遣军”,开始对东满进行为期一年的第一次联合“大讨伐”。同年4月3日,日本“间岛派遣队”侵入延吉、龙井等地。3月17日,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上田支队从长春向敦化扑来。之后,第二师团天野旅团一部也从宁安向东满进犯。这3支侵略军纠集当地的军警和伪军对东满各县的乡镇开始实行疯狂的“扫荡”和野蛮的屠杀。“讨伐”队到农村,首先把农民的家财、衣物、粮食、耕牛以至锅碗洗劫一空,强迫农民迁入“集团部落”,即所谓“大屯”,以便受日伪的直接监视、奴役与剥削。对不服从者则拉出枪毙或者赶进房屋连人带屋一把火予以焚烧。“讨伐”队在“归屯”与搜山时,用机关枪扫射,大炮轰击并有飞机掷炸弹配合。一时间,敌人所到之地,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到处是一片悲惨景象。

1932年4月至5月,在汪清县的德源里,日伪军“讨伐”队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金相和与韩英浩逮捕,并斩首示众;在和龙县的平岗、

开山区、大砬子区、三道沟区进行了数十次的“讨伐”，杀害无辜百姓43人。敌人在对珲春县烟筒砬子的“讨伐”中，仅一个月，就烧毁村庄20多个，毁坏房屋1000多间。许多群众被杀害。4月27日，在实行“讨伐”时，敌人把东满特委宣传部长曹基锡等28名抗日人士关进茅屋，然后用机枪扫射，并放火烧毁了房子。在延吉县的依兰沟、八道沟、凤林洞、花莲里一带，许多村庄变为灰烬。据资料记载，从4月至12月，日伪当局在东满各县共杀害抗日军民1200余人，逮捕1500余名。

日本侵略者对东满地区的这次“大讨伐”，中共东满特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里曾这样写道：“日本军队来到东满就首先收缴地主与警察的武装，焚烧赤色区域附近地主的粮仓（因为武装与粮食是当时群众斗争的主要要求），开始大规模地屠杀韩国与中国的农民，焚烧农村。秋收斗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讨伐’队以‘满洲国’和国民党军阀与中韩地主走狗做先锋，更是大规模空前的大屠杀”，“仅仅延吉湾湾沟一个地方（现在以前还是依兰区的一个支部的范围），就屠杀了150多人。日本帝国主义毁灭了无数的农村，湾湾沟20几里长及其附近一条沟10余里长，汪清永昌间以及其他各县的许多大小农村烧的一个房屋也不剩，他甚至把农民在房屋被烧毁临时盖的土幕（类似马架子）也烧毁”^①。

在敌人“大讨伐”中诞生的反日游击队，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满腔仇恨，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反“讨伐”的斗争中。

1932年7月，珲春县岭南游击队在得到敌情报告后，与当地赤卫队相配合，在烟筒砬子附近伏击了前来“讨伐”的敌人。同年秋，岭南游击队又袭击了敌人刚刚建立起来的太阳村“集团部落”，缴获17支

^① 《中共东满特委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1933年10月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9，第357页。

步枪和480发子弹,并烧毁了伪自卫团团部。汪清反日游击队在金哲的指挥下,于同年7月,在小百草沟伏击了日军“讨伐”队,经过半小时激战,杀伤敌人数名。10月,游击队在东山袭击了来下牡丹“讨伐”的日伪军。11月,在队长梁成龙的指挥下,游击队与“围剿”龙北村的日军100余人激战1小时,毙伤20余名敌人。12月,游击队在党组织和群众的配合下,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前来“讨伐”的日伪军300多人,并击毙敌人40多名。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东满地区的抗日军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讨伐”虽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游击队还过于弱小,反日群众和反日组织还较分散,结果在敌人的强大进攻下,不仅使东满各县乡村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破坏,而且使成立不久的反日游击队也受到重创。

1932年末到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对东满地区又开始了冬季“大讨伐”。1933年1月,驻延吉的日本军警与伪警察、伪自卫团组成“讨伐”队,在延吉的花莲里大肆搜捕抗日干部群众。敌人采取刀劈、火烧、挖眼、开水烫、刺刀捅等极其残酷的手段,将12名中共党员、干部和爱国群众折磨致死。与此同时,驻和龙县三道沟的日本守备队纠集当地的伪警察组成“联合讨伐队”共300余人偷袭了和龙县渔浪村游击根据地。面对敌人的残酷暴行,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同仇敌忾,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在三道沟,50名游击队员利用有利地形,伏击了敌人“讨伐队”,毙伤敌人10余名。在敌人向渔浪村进攻时,和龙县委决定,由和龙游击队中队队长金亨杰等12名游击队员组成3个游击小组钳制敌人,其余队员在县委书记崔相东的指挥下,护送县委机关和群众向马鹿沟方向转移。在中队长金亨杰和政委金炳洙的指挥下,3个阻击小组的游击队员利用房屋、村外的壕沟和山坡不断地变换地点英勇顽强地向敌人射击。共产党员李九熙等

3人开始在房屋的顶上阻击敌人,日伪军见难以接近,就放火焚烧房屋。三勇士无所畏惧,仍坚持战斗,在房子即将倒塌时,他们准备冲出敌围,但因子弹打光,不幸牺牲。中队长金亨杰和政委金炳洙在村外的壕沟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也壮烈牺牲。县委书记崔相东在掩护群众转移时,身负重伤。他不顾伤痛,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并用石头向日军的头上砸去,最后英勇牺牲。这次渔浪村反“讨伐”战斗,共消灭日伪军数十人。而游击队也有9人战死。后被颂为“渔浪村十三勇士”。

1933年3月,日伪当局调集3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和掩护下,对东满特委的所在地小汪清及延吉县的依兰沟、石人沟、三道湾,珲春县的大荒沟、烟筒砬子等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讨伐”。敌人这次的“讨伐”重点是小汪清根据地。敌人兵分三路,采取分进合围的战术,向小汪清发起进攻。日伪军分别从大肚川、夹皮沟和磨盘山三个方向向马村进犯。面对敌人的侵袭,汪清县游击大队、反日别动队和从宁安前来支援的抗日救国游击军等各支反日武装在中共东满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他们分头埋伏在根据地周围的山上,严阵以待。

3月30日凌晨,由大肚川出发的敌人进入游击队埋伏的尖山子一带伏击圈。游击队利用有利地势,立即向“讨伐队”发起猛烈射击。经过2小时激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但日伪军依仗精良的武器,仍不断组织强攻。这时,游击队按照命令,绕到敌后,向敌人攻击。日伪军腹背受敌,只得仓皇撤退。溃退途中,他们与其他方向来援的日伪军相遇,因天黑,敌人互相射击。李光领导的别动队乘势缴获伪军一个连的武器。以后接连两天,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对小汪清又发动几次进攻,抗日游击队和救国军部队均采取“敌进我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终将日伪军赶出根据地。

小汪清根据地保卫战,共歼敌 300 余人,缴获 259 支枪和 4 门迫击炮及许多弹药。此战打出了抗日武装的威风,使根据地的军民深受鼓舞,更增添了抗日斗争的胜利信心。

第四节 吉东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吉东地区反日斗争形势

吉东^{特指}指原吉林省东部,大体相当于今黑龙江省牡丹江、鸡西、七台河地区。该地区大部分是山区,地势东部和西北部较高,南部和中部较低。气候冬长寒冷,夏短炎热。土地肥沃,适于种植农耕,物产丰富。

中东铁路东部线贯通这一地区。中共早期党员马骏的家乡就在该地区南部的宁安。1927 年,牡丹江建立了党支部,有党员六七名;穆棱县在 1927 年前建有两个党支部,1930 年 10 月成立县委;饶河县 1930 年建立县委,1931 年改为中心县委;东宁县 1930 年有两个支部,19 名党员;密山县 1931 年成立特支;宁安县 1930 年建立临时县委,下设两个农村支部,18 名党员。同年 9 月,正式成立县委,下设 14 个支部,120 名党员。1932 年 1 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将宁安县委改为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潘庆由^①,全县共有党员 114 人。下辖宁安、东宁、穆棱、密山 4 个县(区)委。1932 年 6 月,宁安中心县委移至穆棱,改名为绥宁中心县委,下属宁安县委、穆棱县委、密山区委、东宁特支和勃利支部。1933 年 4 月至 1934 年 6 月,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下

^① 潘庆由(1891—1933),原名李起东,朝鲜平安北道人。1921 年入云南讲武堂十七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1927 年回到东北。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吉东局组织部长等职。1933 年被叛徒杀害。

属宁安、穆棱、密山、东宁 4 个县委, 下属 44 个支部, 293 名党员。其中, 宁安县委机关设在八道河子, 下属东京城、八道河子、南湖头、马厂、七河南沟、铁岭河区委和横道河子等 10 个支部。1933 年 5 月,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在牡丹江成立, 孙广英任书记, 统一领导绥宁中心县委、饶河中心县委和东满特委。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在吉东地区活动的反日部队主要有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李杜领导的自卫军和丁超领导的护路军。此外, 还有其他形式的反日武装。1932 年末、1933 年初义勇军抗日斗争失败后, 其余部仍有数千人活动在这一地区, 继续进行反日斗争。1932 年以后, 吉东地区反日会、工会、反帝大同盟、青年反帝同盟、共产少年团等群众抗日组织纷纷建立起来, 其中反日会的规模最大。1932 年至 1933 年间, 仅东宁一县就有反日会员 5000 余人。随着各种反日组织的建立, 群众性的反日斗争更加活跃。各地不断举行反日示威游行, 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在群众抗日斗争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吉东各地党组织采取举办训练班、派党员干部到义勇军和救国军中掌握武装等方法, 经过艰苦努力, 先后创建了救国游击军、反日同盟军和饶河、密山、宁安、穆棱反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使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吉东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创建

(一) 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的建立

1932 年秋, 日本侵略者向活动在吉东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展开全面的军事“讨伐”。11 月, 绥宁中心县委在穆棱兴源镇召开紧急会议, 县委书记潘庆由主持会议, 李延禄、孟泾清和张建东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在日伪加紧进攻,救国军、自卫军趋于瓦解的形势下,党必须掌握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决定由李延禄和孟泾清带领自卫军补充一团和补充二团三营,设法脱离救国军的控制,正式创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会后,李延禄即向王德林提出,带补充团赴前方阻击敌人。王德林批准他的请求,并把救国军十七团和总部卫队营交给李延禄统一指挥。12月28日,李延禄率领补充一团和补充二团三营500人、救国军十七团500人和总部卫队营抵达磨刀石车站,进行了一次阻击日军的战斗,但战斗失利。

磨刀石阻击战失败后,李延禄率部连夜向五虎林转移。部队到达五虎林后,立即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和研究如何贯彻绥宁中心县委指示精神,决定公开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并确定了部队的编制。1933年1月4日晚,李延禄召开全体军官会议。会议分析了日军进攻吉东的形势,说明部队与救国军总部失去联系孤悬敌后的处境,指出只有跟着共产党,继续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才是部队的唯一出路,才能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会上宣布将部队改编为抗日游击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队长、孟泾清任政治委员、张建东任参谋长。总队下设4个团和一个游击支队。第一团团长杨太和、第二团团长李凤山、第三团团长史忠恒、第四团团长邹凤翔,游击支队队长李延平。总队共900余人。

游击总队成立后,暂驻五虎林休整。早已暗中投敌的五虎林保董赵保义,一面佯装热情接待,一面暗中派人给日军送信,并组织乡勇、兵丁把守路口要道,妄图和日军里应外合消灭游击总队。在此危急时刻,总队部驻地的房东向李延禄透露了这一阴谋。李延禄立即命令各部连夜行动,分别突围,约定次日到距五虎林40公里的柞木台子集合。部队刚一出村,守在附近山头的民团就向游击总队开了火。

部队边打边撤,顺利冲出山口。由于地理不熟,又是夜晚行军,联络困难,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总队人员散失不少;抗日不坚定分子第四团团长邹凤翔带领全团500余人逃走。部队减员严重,到达集合地时只剩300余人。鉴于这种情况,游击总队党支部迅速调整行动计划:一是设法立即和上级取得联系;二是整顿部队;三是尽快解决部队物资供给;四是派杨太和率第一团去密山开展游击活动,发展队伍,总队部率第二团、第三团回宁安寻找党的组织。

1月8日夜,李延禄、孟泾清率总部200余人,越过中东路,于次日到达宁安南部的和尚屯,与在这一带活动的救国军王毓峰营和冯守臣骑兵营取得联系。1月中旬,中共宁安中心县委派团县委书记李光林和游击总队取得联系,并传达了县委指示:要他们联络收拢救国军散落部队,壮大游击队伍,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月下旬,李延禄联合救国军王毓峰营和冯守臣部,在宁安南部的孟寡妇屯召开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中共宁安中心县委任命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张建东为参谋长、刘汉兴为副参谋长。全军下辖3个团,一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游击支队。第一团团团长杨太和、第二团团团长王毓峰、第三团团团长史忠恒、步兵营营长李凤山、骑兵营营长冯守臣、游击支队队长李延平,全军总人数800余人。

1933年春,中共宁安中心县委曾成立了一支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抗日武装,起名为工农义勇军。10多名队员大部分为朝鲜族,队长朱守一、副队长金根,部队活动在宁安、穆棱一带。这支队伍也被正式编入游击军。

为加强和巩固抗日救国游击军这支队伍,根据中共宁安中心县委的指示,春节刚过,李延禄率领救国游击军来到宁安东南的团山子屯进行休整。次日,日军驻宁安守备队和伪军接到情报后出兵“讨伐”,李延禄等召开作战会议,决定设伏消灭敌人,狠狠打击这股日伪

军。2月10日清晨,敌人分三路进入团山子。日军守备队从正面,伪军从两翼向救国游击军发动攻击。救国游击军集中火力攻打正面日军,击毙多名日军军官,使日军无法前进。两翼的伪军在救国游击军顽强的阻击和政治攻势下很快退去。日军失去两侧掩护,孤立无援,在游击军战士们的勇猛追击下,狼狈逃走。战斗结束不久,李延禄接到情报得知,日伪军正在八棵树屯杀猪做饭,便命令刘汉兴带领部队奔袭八棵树屯,击毙了敌指挥官风岛和几名日军。敌人不敢久留,匆匆收兵退回宁安。救国游击军首战告捷,无一伤亡。战斗胜利后,团山子、八棵树屯的群众杀猪宰羊,慰劳部队,庆祝救国游击军取得胜利。这次战斗,不仅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且还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使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受到极大鼓舞。

团山子战斗后,为避开敌人进攻锋芒,以利于部队休整,李延禄率领救国游击军转移到宁安南部山区的八道河子。

八道河子是距宁安百余里地一朝鲜族村。该村坐落在群山之中,西面有一山口,有路通宁安,此处地势险要,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抗日救国游击军来到之后,爱护群众,严守军纪,深得百姓拥护。部队一面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四处筹集给养。救国游击军部队在八道河子休整了两个星期,驻地被敌人侦知。1933年3月1日晨,日伪军四五百人,携带6门大炮,进犯八道河子。救国游击军得到消息,做好应敌的准备。李延禄把第二、三团布置于西山口两侧山头,李凤山营在中路防守,迎击进入山口之敌。晨6时,战斗打响,敌人依仗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轮番向救国游击军阵地猛烈炮击,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战士们勇猛顽强,奋勇杀敌。第三团长史忠恒负伤多处,不下火线,身先士卒。战士们在他的激励下,士气旺盛,多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但最后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弹药消耗殆尽,部队不得不放弃山口阵地,撤到后山。

中午时分,敌人占领八道河子,烧杀抢夺,无恶不作,杀害无辜百姓,烧毁房屋。逃上山的老百姓向战士们哭诉敌人暴行,战士们怒火填膺,纷纷要求下山杀敌。李延禄下令把剩余子弹集中起来,组织一支敢死队,枪上刺刀,穿过树林,出其不意地杀入屯中。愤怒的群众手持棍棒,跟在敢死队后面冲向敌人。敌人没有防备,惊慌失措,在战士和群众的英勇打击下,仓惶溃逃。这次战斗击毙日军37人,缴获敌人枪支弹药一批。

八道河子战斗后,救国游击军影响进一步扩大,当地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杀敌,附近的一些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也前来联络,愿与救国游击军协同作战。3月3日,中共绥宁中心县委根据吉东和东满抗日斗争的具体情况召开会议,提出绥宁党的任务是:扩大民族革命战争,推翻日伪对东北的统治,巩固东满抗日根据地。为贯彻中心县委指示,李延禄率领部队去东满抗日根据地汪清县活动,参谋长张建东率一部分队伍留守宁安,在南湖头、四道河子一带活动。

1933年3月中旬,李延禄、孟泾清率领二、三团和骑兵营共500余人,到达汪清县嘎呀河区的马家大屯,受到东满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在这里和救国军别动队、汪清游击队两支部队汇合,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和群众的抗日士气。

汪清一带抗日武装及其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使敌人不得安宁,日伪当局一心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3月下旬,日军抽调延吉、和龙、珲春、汪清4县兵力共2000余人,对汪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消息传来,战士们摩拳擦掌,决心狠狠打击来犯之敌。救国游击军和救国军别动队及汪清游击队制定了联合作战方案,各部队按照计划部署,分头埋伏在敌人必经山口,做好了伏击敌人的准备。3月30日拂晓,战斗打响,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马家大屯攻来。守卫在4个山口的部队相继和敌人开了火,战斗非常激烈,激战竟日,敌死伤

300余人。联合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保卫根据地的任务。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长短枪250余支、迫击炮4门、子弹军需物品一批。战斗结束后,在清理战场时,救国游击军战士在一片松林里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士兵尸体,还有一封日文信,大意如下: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①

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舍生取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给救国游击军指战员和抗日民众以巨大鼓舞。

1933年4月,李延禄派李延平率游击支队去密山,自己率余部返回宁安。政委孟泾清调地方工作,第三团长史忠恒因负伤未愈留下养伤,第三团也随之留下与汪清游击队一起活动。

李延禄率队返回宁安不久,接到了东京城送来的情报,说驻东京城的伪军军心不稳,有的伪军官想要反正,要求救国游击军派出部队接应。东京城是宁安第二大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唐代古国渤海国的京城,地处宁安至敦化的公路上,日军正在修建的图宁铁路也经过这里。城内驻有宁安伪第二保安大队300余人,队长马海山,日军守

^① 李延禄:《过去的年代——关于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18页。

备队有 39 名。救国游击军几次作战获胜的消息在东京城传开后,在伪军中引起很大震动,加上城内中共地下党和反日会的秘密工作,几个下级军官正在酝酿起义。经请示中共东满特委同意,李延禄派副参谋长刘汉兴率一支小部队联合附近的几支反日山林队一起行动。由刘汉兴统一指挥,对伪军采用攻心战术,在东京城外四处张贴传单、标语,大造声势,搅得敌人惶惶不安。

5 月 8 日,抗日救国游击军联合反日山林队近千人,包围了东京城。副参谋长刘汉兴要求各部用政治口号瓦解敌人,不见日军不开枪。战士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家一同过来打日本人”!“中国人不做日本人的奴才”!口号声此起彼伏。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日军吓得逃离了东京城,伪保安大队长马海山见大势已去,化装逃走。两连伪军起义,参加救国游击军,其余人自行解散。敌人苦心经营的伪宁安第二保安大队,刚成立起来一个多月就全部瓦解。救国游击军顺利占领东京城,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此事发生后,日伪当局十分恼怒,驻吉林的第二师团师团长多门的派出部队尾随而来,宁安的日军守备队和伪军第一保安大队也出动“讨伐”。

此时,李延禄率救国游击军正在马莲河召开群众大会,敌人尖兵与救国游击军警戒部队遭遇。为了群众的安全,部队撤退上山,群众也得以安全转移。傍晚,日军追踪到马莲河,不敢贸然前进,就地在杨木林子和金坑宿营。李延禄召开军部干部会议分析敌情,认为敌人一路未遇阻挡,必定骄狂无备,又不熟悉地形,于是决定派出小股部队,夜袭敌人。步兵营六连连长、共产党员车振声主动要求执行这项任务。他带领小部队摸到杨木林子北山后,只带数名战士,绕开敌人的哨兵进村侦察。他们看到多数敌人毫无戒备,在院子里升火烘烤鞋袜,枪支也架在一起。车振声等隐蔽来到敌人的指挥部,举枪向里射击。枪声一响,敌人便盲目向山上射击。驻在金坑的敌人以为

救国游击军来了,架起机枪、小炮乱打起来,枪炮声整整响了一夜。而车振声率领战士们早已安全返回。这次夜袭,消耗了敌人大量弹药,打乱了敌人的“讨伐”计划,敌人在混乱中被自己的流弹击伤多人。次日,李延禄率领救国游击军来到横道河子,准备北上密山。

(二)饶河农工义勇军的创建

饶河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南邻虎林,西接宝清、富锦,北靠同江、抚远,东隔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西南部为完达山脉。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全县多半属于未开发的山林地带。地僻荒远,交通不便,主要靠水路同外界来往,对开展游击活动十分有利。饶河分4个区,3万余人,其中朝鲜族7000余人。

1929年末,中共北满特委派崔一山、崔石泉^①、黄哲云(黄继兴)、徐凤山等共产党员来到宝清、虎林、饶河地区,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员,举办青年训练班,成立反日同盟,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1930年3月,中共饶河县委员会成立,崔一山任书记,崔石泉、黄哲云、徐凤山任委员。1931年3月,根据中共北满特委的指示,在中共饶河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朴元彬、委员崔石泉、徐凤山、李一平。下设饶河区委、抚远区委、宝清特支、虎林支部。饶河中心县委共有党员123人,其中饶河区委有党员55人。饶河中心县委机关曾先后设在虎林三人班、宝清七星砬子、饶河团山子和小南河等地。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

^① 崔石泉(1900—1976),又名金治刚,崔庸健,朝鲜平安北道人。1919年参加朝鲜“三一”运动。1921年来中国上海,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不久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担任黄埔军校教官。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创建反日游击队,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代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参谋长、东北抗联教导旅参谋长、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回朝鲜,曾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1976年病逝。

益深入,开始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和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根据党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为发动虎饶地区广大人民群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着手组织抗日武装和群众反日组织,掀起群众的反日浪潮;另一方面派党团员到义勇军中,支持他们的抗日武装斗争。在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许多村屯建立了反日会组织,反日会员有300多名。其中饶河县反日会组织迅速扩大,活动也最为活跃。徐凤山、李学福^①等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意义,组织各族人民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并在三义屯、爆马顶子、关门嘴子、大岱河、新兴洞、大别拉炕、小别拉炕和小佳河等地秘密发展反日会员,建立了若干个反日分会组织。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饶河反日总会,会长李阳春、外交委员李学福、宣传委员金成培、组织委员杨义凤、妇女委员方顺爱。

1932年春,在饶河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党、团员和反日会员,多次组织群众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和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者。饶河三义屯的数百名群众举行反日集会,并到县城进行反日游行。在抚远有1000多名群众参加反日大会和示威游行。大别拉炕的群众也自发召开反日大会,有100多名群众举行了示威游行。义顺号、三人班等地的群众也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

同年8月,饶河中心县委为了创建反日游击队,积极开展准备工作。在宝清小城子沟里秘密创办了军政讲习所,培养反日骨干力量。学员有30多名,都是虎林、饶河、宝清、抚远等县党组织推荐的优秀青年。讲习所由崔石泉负责,郑文为教员。同年秋,日伪军向宝清、勃

^① 李学福(1901—1938),原名李学万,又名李葆满,朝鲜族,吉林延吉人。1931年任饶河县反日会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7月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队长。1937年春,任东北抗联第七军一师师长,1938年1月任东北抗联第七军军长。同年在苏联病逝。

利进犯,讲习所遭到破坏,饶河中心县委机关由宝清转移到饶河。

饶河中心县委一面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日益高涨的反日斗争,一面着手进行游击队的创建工作。10月,饶河中心县委决定,由崔石泉、金文亨负责,依靠群众,创建反日武装。崔石泉、金文亨以仅有的一支手枪为武器,与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等6名共产党员组成一支特务队,队长崔石泉,秘密开展武装斗争。特务队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枪支,扩大队伍。在富有斗争经验的崔石泉领导下,特务队以饶河为中心,在虎林、抚远等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从伪警察及民团、商团中夺取武器,并用获得一支枪,发展一名队员的办法,逐步扩大队伍。饶河中心县委还在反日力量较强、规模较大的村屯组织不脱产的义务队。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配合游击队的夺枪任务。特务队的夺枪斗争及群众的反日运动打击了日伪统治,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意。出动军警镇压群众的反日斗争,逮捕了饶河区委书记徐凤山等,反日会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但是,特务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冲破敌人的层层阻挠,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斗争,队伍逐渐发展壮大,队伍由6人发展到40余人。

1933年2月,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三义屯召开会议,朴振宇当选为中心县委书记、组织委员徐凤山、宣传委员黄继兴;委员玄荣学、杨义凤、崔宇振。4月21日,根据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指示,在大叶子沟,将特务队改编为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崔石泉、政治部主任金文亨。下设3个小队,第一小队队长崔石峰、第二小队队长许成在、第三小队队长蔡一勋。

饶河中心县委为了壮大饶河农工义勇军,培养抗日骨干力量,于同年5月,在反日群众基础较好的饶河县三义屯再次创办了军政训练班。崔石泉为训练班主任、金文亨为大队长、李学福为班长,教员有朴振宇、金铎、杨宽镇。训练班学员有70余人。学员们经过两个多月

的训练后,大部分都加入了饶河农工义勇军,为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其余的奔赴各地,成为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

饶河农工义勇军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崔石泉等领导认为,只靠党领导的这支力量有限的武装,难以展开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饶河有众多抗日义勇军队伍,只有团结义勇军及其他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共同作战,才能壮大自己,消灭敌人。当时在饶河最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是高玉山领导的东北国民救国军。高玉山原为虎林县独木河保安队长,后被李杜任为战时自卫团第九大队队长。日军占领虎林后,建立伪政权,其所部被日伪收编,他任虎林县自卫团副指挥、伪警察大队第一中队长等职。1933年3月的一天,高玉山手下的几个兄弟,刺杀了日本参事官隐岐太郎和指导官伊藤重男,劝其抗日。饶河中心县委也派人来做他的工作。于是高玉山决心再举抗日大旗,派兵缴了伪警察署的枪,控制了县城的要隘,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高玉山为总司令。高玉山的抗日爱国行动得到了散在虎饶地区的原吉林自卫军、救国军残部的响应和拥护,附近的其他小股抗日武装也纷纷来投奔,总兵力达2000余人。4月17日,救国军攻打饶河县城,没有攻克。5月26日,救国军联合臧景芝等义勇军部队三、四千人再次攻打县城,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将饶河县城攻克。伪保安团长被击毙,伪县长逃走。救国军占领饶河县城以后,饶河反日总会负责人李学福、徐凤山等与救国军第一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积极领导群众开展反日工作。

救国军进驻饶河县城后,农工义勇军独立开展活动,但经常与救国军之间发生摩擦。为了改善与救国军的关系,通过饶河反日总会与救国军第一旅参谋长王撝卿联系,经双方协商决定饶河农工义勇军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下,加入救国军,编为第一旅特务营,营长金文亨、参谋长崔石泉、政委朴振宇,全营100余人。随同救国军第一旅

移驻虎林附近。

12月上旬,金文亨、崔石泉率领特务营袭击了虎林县城附近的于保董大排队,缴枪70余支和一批粮食、衣物。特务营将缴获的物资交给救国军一部,获得救国军官兵的好评。

1934年1月28日,国民救国军攻打虎林县城。特务营与救国军一部被编为先锋部队,首先攻入城内,完成指定的攻占日本参事官驻地等任务。但战斗中,战事突然发生逆转,在敌人猛烈反扑之下,救国军阵亡270余人,救国军部队迅速撤离县城,特务营也遭到严重损失,第三连连长等25名牺牲,营长金文亨等2人负重伤。

国民救国军攻打虎林失败后,部队严重动摇,高玉山准备带队过境外苏。救国军中一些怀有歹意的人要缴特务营的枪械。此时,救国军第一旅参谋长王搦卿转告特务营火速脱离险境。崔石泉、崔石峰等当机立断,率队迅速离开驻地,转移至饶河县大岱河一带,重整部队,独立行动。

2月3日,特务营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将特务营改编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全队60人,分编两个中队和一个手枪队。李学福任大队长、崔石泉任参谋长、朴振宇任政治指导员。崔石峰与许资善分别担任中队长,金东天任手枪队队长。会议确定,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的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打击日伪统治和汉奸走狗,开辟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此后,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三) 密山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密山县位于吉林省东部边境地带(今属黑龙江省),东南与俄罗斯接壤,是饶河、虎林通往内地的门户。面积有一万平方公里。早在1927年,就有王栖真、苏子元等共产党员先后来到了密山,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传播马列主义。1928年7月,中共密山支部在密山煤矿建

立。1930年9月,中共北满特委从宁安派共产党员池喜谦、张山海来密山,在当壁镇建立了中共密山县特别支部。同年10月,改为密山县委,并建立当壁镇、五道岗、二道岗、一撮毛和龙王庙5个党支部。12月,县委组织武装暴动,被敌人发觉,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饶河中心县委领导人崔石泉派金刚天、蔡基范来到密山,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在当壁镇、柞木台子、一撮毛等地组建3个党支部。1932年1月,中共密山区委成立,金刚天为区委书记。1932年冬,绥宁中心县委为了加强密山工作,派朴凤南、张墨林、李成林、李槿淑等同志到达该县,将中共密山区委改为密山县委,张墨林为县委书记、朴凤南为副书记、李成林为宣传部长。在中共密山县委的领导下,密山人民反日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普遍建立起反日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反日组织,1933年3月6日,密山县反日总会在哈达河头段正式成立,密山县委书记张墨林、李成林等为总会负责人,下设组织、宣传、妇女各部。

经过一段艰巨的准备工作,1934年3月20日,终于在密山县委领导下,于密山哈达河沟里张老畜菜营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吸收溃散的前吉林自卫军士兵参加,正式成立了密山反日游击队,对外称民众抗日军,游击队队长由张宝山代理,副队长金百万。队员34人。

密山反日游击队成立伊始人员较少,为顺利开展对敌斗争,有效打击日伪军,首先派人在密山、勃利、林口一带的反日山林队中进行工作,并与“大鸣字”、“交得宽”、“亮山”等部建立了协作关系,一致对敌。同年3月下旬,密山游击队到杨树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突然遭遇一支150余名的伪军,游击队虽属初次进行战斗,却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迎战,相继击毙伪军营、连级军官各一名,击伤伪军数名。傍晚时伪军撤走,游击队也分别由队长、副队长率领撤离阵地。代理

队长张宝山原是吉林自卫军第二十六旅士兵,在该旅投降时同原来参加该旅的共产党员金百万一起离开,表示愿意继续抗日,并一同找到中共密山县委参加抗日工作,密山游击队成立时被委为代理队长职务。当他发现游击队生活艰苦、斗争艰巨时,便发生了动摇。恰好此次由其单独带领 14 名游击队员撤走时,便欲胁迫队员叛逃为匪。密山县委立即联合订有抗日协定的抗日山林队进行搜寻,结果仅张宝山一人逃走,其余枪支陆续追回。不久,在中共吉东局得到消息后,立即从宁安县委调派前县委书记朱守一^①继任密山反日游击队长。

不久,密山县委得到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并组建起义军的消息,在密山也准备举行反日暴动。经过与密山反日总会联络,在哈达河一带组织各阶层要求抗日的群众和“大鸣字”、“交得宽”等抗日山林队,成立了“民变指挥部”,同时又号召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抗日同盟军指挥部,并公推密山反日游击队队长朱守一任总指挥。5 月间,应邀参加抗日同盟军指挥部的各部队集中在哈达河一带,准备举行反日暴动。但由于参加同盟军各部队的意见不一致,一些地方大排武装不同意参加暴动,同时由于暴动的消息走漏,坚持暴动的部队突然遭到来自哈达街的约 50 余名日军的进攻。本来,进攻的日军已为抗日武装所包围,并有几名日军被击毙,却因张家大院的反动地主张老四打开院门接纳日军,使日军得以负隅顽抗,不久敌人援军到来,游击队和山林队不得不分头撤退。密山反日游击队队长朱守一在哈达河指挥战斗中不幸牺牲,反日暴动遭到失败。

^① 朱守一(1905—1934),原名周子歧,辽宁沈阳人。哈尔滨工业大学肄业。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任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书记,组建工农义勇军,后加入救国游击军。1934 年任密山游击队队长、密山抗日同盟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同年 5 月末,在对敌战斗中牺牲。

同时,中共密山县委指示在平阳镇的伪军第四旅机枪连中共地下党员胡伦、张奎,乘这支伪军增援密山县城之机举行了哗变。但因时间仓促、工作酝酿不成熟,哗变后大部分士兵另立山头离去,只有胡伦、张奎等少数骨干到达密山县委所在地。县委随即派张奎接任密山反日游击队队长。

第五节 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北满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将

北满系指长春以北、中东路沿线、嫩江和松花江中下游广大区域。这里山岳起伏,森林茂密,辽阔的松嫩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北满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绝大多数土地被地主占有。广大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和官吏的压榨,陷入贫困的境地,反对捐税盘剥、政治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

北满地区的中心城市哈尔滨市及中东铁路沿线是东北地区党组织活动开展得最早的地区。1923年10月,中共哈尔滨独立组(亦称哈尔滨组)成立。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派吴丽石到东北建立了哈尔滨特支。1926年春,哈尔滨特支扩建为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书记吴丽石。至1927年4月,中共北满地委已建有哈尔滨市内党支部6个,外市县支部有长春、吉林、安达、牡丹江等。绥芬河邮局和铁路有两个党小组。穆棱、磨刀石、横道河子、石头河子、昂昂溪、博克图等地发展有党员,北满地委所属党员有140余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北满地委撤消,改组为中共哈尔滨市委员会,隶属满洲省临委领导。1930年11月,成立中共北满特委。中共北满特委在阿城、呼兰、珠河(今尚志)、依兰、通河、汤原、庆城(今庆安)等

县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哈尔滨人民曾进行过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的斗争、中东铁路和哈尔滨铁路总工厂工人罢工等大规模反日反军阀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满广大群众纷纷拿起武器,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义勇军、红枪会等抗日武装遍布北满各地。先是马占山的江桥抗战,随后是李杜、冯占海、苏炳文、李海青等领导的义勇军抗战。这一义勇军抗日运动,一直持续到1933年初。上述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为北满地区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1931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拟将省委机关由沈阳迁至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哈尔滨。报告中说:“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后,工厂关闭,除日本报纸外,上海、天津报纸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形势知道很少。统治阶级实行戒严,每日到5时即不能通行,这对工作很有妨碍。如开训练班,巩固机关职业化的问题都无法进行。因此,我们主张把省委移到哈尔滨去”。哈尔滨的有利条件是:“北满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地位上是重要的;哈地形复杂,对于巩固机关和职业化的问题较易解决;每日到半夜12点还可工作,在工作的效率上大得多;哈市工作最近有较大的发展,需要加强领导力量;哈市各地报纸都可看到,对于全国情形较易知道”。^①经中央批准,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机关迁到哈尔滨。此后,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纷纷组织起反日救国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团体,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发动募

^① 《关于请示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的问题》(1931年10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100页。

捐,动员人力、物力,支援各地的抗日武装斗争。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中共满洲省委不仅加强了对各地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工作,同时还为创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开辟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二、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创建

(一)巴彦反日义勇军的创建及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广大爱国学生纷纷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中。1932年春,原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张甲洲^①,联络在北平的东北籍学生回家乡组织反日武装。1932年5月,张甲洲与张文藻、张清林、郑炳文、于九公(于天放)、夏尚志等人,化装成商人,来到哈尔滨,很快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联系。省委指示他们要开展武装斗争,并将人员做了分工。张甲洲、张文藻、张清林和郑炳文等去巴彦组织反日武装。于九公回家乡呼兰开展工作,夏尚志另有任务留在哈尔滨。

张甲洲回到家乡巴彦后,立即投入到组建反日武装的工作中。他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通过联系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中学校长孔庆尧,镇东村、洼兴村自卫团长侯振邦、陈维新、米秀峰等。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快就组织起一支200余人的反日队伍。5月16日,在镇东村小学操场上,召开反日武装成立大会。队伍命名为巴彦反日义勇军,张甲洲任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总指挥、孔庆尧任参谋长,张文藻任文书兼交通员,张清林和郑炳文负责政治工作,队伍下设两个

^① 张甲洲(1907—1937),化名进思,黑龙江巴彦人。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并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代理书记等职。1932年5月组织成立巴彦反日游击队。1933年赴富锦,以从事教育工作为掩护,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去抗联十一军时,途中与敌遭遇,战斗中牺牲。

中队。

反日义勇军成立伊始,即遭到地方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他们诬陷游击队为“红匪”,采取各种手段挑拨队伍领导者之间的团结,调集地主武装进行围剿,致使这支队伍刚一建立内部就出现分裂,王家善、孔庆尧等人离队而去,队伍减员一半。为了挽救这支队伍,张甲洲联合当地的土匪队伍“绿林好”坚持进行反日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非常重视这支抗日武装,于6月末陆续派军委书记赵尚志^①和党员夏尚志等人协助张甲洲工作,任务是把这个部建成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赵尚志化名李育才来到巴彦后,和张甲洲共同研究了面临的形势,认为必须加强领导,整顿队伍,严明纪律,改善部队与人民群众关系。为此,赵尚志提出“建立中心队伍”的建议,经张甲洲同意,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建为“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亦称巴彦反日游击队),由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下辖5个大队及模范队(后称少年连)。第一大队长张清林,第二大队长夏尚志,第三大队长呼青山,赵尚志兼任模范队队长。此外,还成立了教导队、宣传队和党的干事会,部队得到极大加强。

随着反日斗争的开展,巴彦反日游击队逐渐壮大起来。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部队决定攻打龙泉镇。龙泉镇有伪警察署、伪自卫团和天增泉烧锅百余人武装,镇内有围墙和炮台,防卫力量较强。在攻打龙泉镇的战斗中,张甲洲机智勇敢地指挥部队取得胜利。巴彦反日游击队名声大振,许多农民及当地小股

^① 赵尚志(1908—1942),辽宁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末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斗争。1932年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同年任巴彦反日游击队参谋长。1933年春任义勇军朝阳队参谋长。同年10月,创建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抗联第三军军长、北满抗联总司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主席、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1942年2月与敌战斗中重伤被俘,后牺牲。

武装纷纷投奔。为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振奋民众抗日斗志,打击日本侵略者,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联合其他抗日队伍攻打巴彦县城。8月30日,巴彦反日游击队和原义勇军余部才洪猷团(简称才团)、山林队“绿林好”分别从西南、西、东北三面攻进巴彦县城。城内自卫团溃不成军,伪军营长沈某被击毙,伪县长程绍濂逃出城外时被俘,县城遂被占领。部队进城后,立即下令严守群众纪律,不许骚扰、抢夺城内居民,派出战士开展宣传工作,散传单、贴标语、组织演讲团,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群众起来抗日,打开伪县公署粮仓,赈济贫民。镇内青壮年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巴彦反日游击队迅速发展。但进城后不久,“才团”首领采取封官许愿的办法、串通“绿林好”要吞并巴彦反日义勇军。张甲洲和赵尚志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率队撤出巴彦县城,到达巴彦县北部姜家窑七马架一带进行整训,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中秋节前后,部队接到情报,称呼海路康金井车站敌人防务空虚,于是决定袭击康金井。康金井车站是滨北线上的一个车站,攻下此站南可拒哈尔滨之敌,北可拒绥化之寇,具有一定战略意义。张甲洲和赵尚志研究决定,挑选100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一支精锐轻骑队,长途奔袭康金井车站,将车站伪警护队打得狼狈逃窜,使呼海路沿线敌人受到极大震动。此后,反日游击队赴西集厂一带活动,又陆续收编一些山林队,队伍扩大到700余人。部队编成第一、二、三、四、五、六队及少年队、教导队和洋炮队。队里建立了党组织,设有书记、组织和宣传干事。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等组织。

10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巡视员吴福海到巴彦反日义勇军,传达贯彻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决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其主要内容是:(1)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2)成立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

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两人都是省委代表;(3)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此后根据“北方会议”和省委的指示,巴彦反日游击队即打起红军的旗号,在北满地区的呼兰、绥化、兰西、安达等地进行活动。

红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为开辟新的游击斗争区域,解决枪支和部队御寒物资,做好冬季斗争的准备,决定联合“绿林好”所部于10月29日去攻打东兴设治局(东兴正式设县之前为设治局)。由于独立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敌人毫无防备,仓促应战,被联合部队迅速击败。守敌从东门撤出,逃进山里,部队顺利占领东兴。占领县城后的第三天,敌人便开始疯狂反扑。由于独立师领导人缺乏对敌斗争经验,没有彻底清除城内残敌,敌人乘机挑拨红枪会和地主武装向独立师进攻,经激战,部队伤亡很大。赵尚志左眼负伤,夏尚志左腿负伤,30余名战士牺牲,最后部队不得不突围撤出战斗。

东兴战斗后,红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西进呼兰,经兰西、青冈到达安达县境活动。12月上旬,部队向西行进,以图汇合马占山所属邓文、李海青义勇军部队,共同开展抗日战争。当部队行至拜泉县三星镇附近时,连续遭到大排队、红枪会的袭击,受到损失。部队到达海伦,得知马占山所部已溃败退入苏境,邓文、李海青义勇军部队自拜泉失守后向西开去,难以与之汇合,江北独立师不得不回师东归,欲去汤原活动。此时,正值寒冬季节,战士们顶着刺骨寒风踏着厚厚的冰雪,由泰来,经林甸,过明水,进依安,入拜泉,赴通北,抵海伦,到绥棱和庆城(今庆安),进入铁骊县境。队伍在东进途中,赵尚志归队。当时,已近年关,许多来自农村战士思乡心切,离开部队。在铁骊筹集给养时,一部分战士违反少数民族政策,误缴两名鄂伦春族猎人步枪,结果遭到“索利营”200余人武装的连续追击,部队遭到很大损失;接着又遭到伪军曹荣部队及地方反动武装的袭击,使部队遭受沉重

打击,以致前往汤原的计划无法实现,部队领导只好决定返回巴彦。当队伍辗转到达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只剩下五六十人。

自从巴彦反日义勇军贯彻执行“北方会议”精神,改编为红军独立师之后,部队为执行土地革命任务,建立苏维埃,没收地主财产,领导农民抗租、抗债,分地主家的粮食、财物。由于执行“左”倾错误政策,部队严重脱离群众,队伍内部也产生分化,原来各地地主大户对游击队的反日行动是支持的,在物资方面曾给予游击队帮助。但自从执行土地革命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后,一些地主大户与游击队产生敌意,不但不再支持,而且还常常攻击游击队,致使游击队四面受敌。在部队中的部分地主子弟也对此不满,离队而去。一些与游击队联合作战的义勇军、山林队对游击队宣传的“武装保卫苏联”等政治口号和没收地主财产的作法也不满意,不愿再与红军独立师合作。红军独立师成立后,随着队伍的扩大,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但是,部队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党组织,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致使部队思想混乱;属下一些部队在战斗中违反党的民族政策,使一些少数民族对游击队产生误解甚至对抗;在队伍内部领导层之间,因对省委指示存有意见分歧,张甲洲、赵尚志与吴福海等领导之间产生了矛盾,有了隔阂,致使部队在活动方针和政策执行上常常产生严重分歧。所有这些都,使红军独立师面临严重困境。

1933年初,巴彦县已建起各级伪政权,日伪军警遍布城乡。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为避免所剩部队被敌人围歼,张甲洲、赵尚志等义勇军指挥部人员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听令再集。这样,红军江北独立师(即巴彦游击队)最后便以失败而告终。随后,赵尚志等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以赵尚志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检查错误为由,将其开除党籍。以后赵尚志到哈东一带从事创建抗日武装工作,张甲洲到富锦一带进行秘密抗日活动。

(二) 创建汤原反日游击队的三次挫折

汤原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西、北依小兴安岭,东、南濒松花江,以境内汤旺河而得名。全县总面积为2万多平方公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89%,且全部被茂密松林所覆盖。汤旺河、黑金河、格节河、亮子河、梧桐河等20多条河流流经境内。这里平原地带土质肥沃,盛产水稻、大豆、玉米。

1928年春,崔石泉受党的派遣来到汤原县福星屯,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29年中共汤原县委在鹤立附近七号屯成立,李春满任县委书记、崔贵福任组织部长、丁咸平任宣传部长。1930年底,县委所属基层支部有16个。1931年春,中共汤原县委改为汤原中心县委,直属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九一八事变后,省委为了加强党对群众反日斗争的领导和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在依兰、通河、鹤岗、萝北、富锦、佳木斯等地建立了党组织。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成为松花江下游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心。

1932年4月,李春满被调到安帮河组织反日游击队,由裴治云接任汤原中心县委书记。此时,汤原中心县委下属有:鸭蛋河、梧桐河、大小古洞、黑金河、格节河、古城岗、半截河等7个区委及佳木斯、依兰两个特支,党员110名。至同年秋,汤原县党员达208人。反日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也普遍建立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积极领导松花江下游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斗争,组织了一支80余人的“化妆反日宣传队”。这支宣传队在裴治云的带领下,踏遍汤原各地。全体宣传队员通过话剧、舞蹈、讲演、歌咏等多种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在松花江两岸遍撒抗日救国的火种,有力地促进了下江人民的觉醒,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1932年4月,日军向松花江下游的通河、汤原、佳木斯等地发动进攻,所到之处村庄被烧毁,百姓遭杀戮,日军暴行激起松花江下游汤原等地人民的满腔义愤。以工农群众为主体,并有学生、士兵、地主等参加的各类抗日武装纷纷而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在这种形势下,松花江下游地区迫切需要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同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冯仲云^①以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的身份来到汤原,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党员,组建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他在县委所在地举办党的积极分子学习班,培养了夏云杰^②等一批抗日骨干。

1932年10月10日,在汤原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以汤原反日同盟会员为基础,由40名党团员,其中朝鲜族33名,组成了一支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汤原反日游击中队”(简称汤原反日游击队)的抗日武装,中队长李福臣、参谋长李仁根。中队下设3个小队,戴鸿宾^③任第一小队队长、颜庆林任第二小队队长、孙盘铁任第三小队队长。最初,游击队只有20余支简陋的枪

① 冯仲云(1908—1968),江苏省武进县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1930年被党组织派到东北,以哈尔滨商船学校数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担任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省委秘书长等职。1934年任哈东支队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后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任抗联第三路军政委。抗战胜利后任松江省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部副部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7年平反。

② 夏云杰(1903—1936)山东沂水人。1926年逃荒到黑龙江省汤原县。1927年在黑金河金矿做工。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斗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汤原县委军事委员。1933年末创建汤原反日游击队。1934年任汤原游击总队政委。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抗联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与敌人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

③ 戴鸿宾(1911—1968),别名高新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后历任汤原游击队总队长、抗联第六军军长、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队长等职。1940年9月离队。抗战胜利后,任合江军区副司令员。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吉林市政协副主席。1968年病故。

械,是全县的党团员及反日会员集资购买的。就在汤原游击队建立之时,日军第十四师团占领和控制了松花江下游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日本法西斯不断加强对三江地区的殖民统治,汤原地区形势越来越紧张。同时由于游击队打的是红军和苏维埃的旗号,群众对这支队伍还缺乏认识和了解,因此游击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援助,活动极为困难,处境不利。为了搞到武器,武装队伍,游击队于10月13日缴了汤原县石场沟杨家屯自卫团的5支枪,游击队员大受鼓舞,增强了信心。

1932年10月中旬,李福臣率领汤原游击队前往敌人统治薄弱的萝北县活动,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装。由于斗争经验不足,将缴来的枪支集中存放在一百姓家的地窖里,游击队员则徒手散居在群众家里,结果被突然闯来的一伙土匪所发现,将枪支武器抢掠一空。李福臣、戴鸿宾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交涉,要求返还枪支,但没有成功。武器尽失,队员情绪也产生较大波动,导致第一次建队失败。

汤原反日游击队受挫以后,中队长李福臣被调往他处,中共满洲省委派老杨接任汤原反日游击队中队长。汤原中心县委总结失败教训,又拟定策动驻鹤岗伪军迫击炮排士兵哗变组建游击队的计划。迫击炮排内有一个姓杨的上士,是抗日救国会员,汤原中心县委派人与他约定了哗变时间。11月2日晚,老杨带领40名徒手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伪军迫击炮排起义队伍。不料,游击队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却不见伪军兵营的动静。原来,计划哗变当天,由于杨上士缺乏经验,在行动前表现异常,并误受一个班长的欺骗,将哗变计划泄露,因此伪军连长事前进行了部署。当游击队接应人员刚一接近敌营房,即遭到敌人的阻击。杨上士也因计划泄露被杀害,策动伪军士兵哗变终告失败,徒手队返回汤原。

此次受挫后,汤原中心县委在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下,又派党员王永江到另一支伪军中工作,秘密成立了哈东义勇军,但不久该队领导人孙仁率队向日军投降,争取伪军工作再次遭到失败。

为组织和领导人民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汤原中心县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决定重建汤原反日游击队。

1933年1月,以戴鸿宾等游击队员为基础,吸收一部分反日会员共60余人,配备党、团员和部分进步群众捐款买的10余支枪,在鹤立北七号屯,重建了汤原反日游击队。张福林为队长、王永江为党代表、李仁根为参谋长、戴鸿宾等仍为小队长。为便于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同行动,部队对外报号“仁合”队,对内称反日游击队。反日游击队成立后,开赴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萝北县活动。为共同打击敌人,反日游击队先后吸收了一些小股抗日武装,人数较多的有于九江和孙玉刚两支山林队。但是游击队收编于、孙两部后发现,于、孙二人恶习不改,屡犯纪律,经常严重侵害群众利益,败坏游击队声誉,甚至煽动同伙逃跑,分裂革命队伍。由于游击队缺乏改造山林队的经验,在没有对其进行细致地说服、教育的情况下,便先后处死于、孙二人,结果加深了与收编队的矛盾,给游击队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此后,于九江的亲信“老来好”背后串通被收编队员,伺机报复,当游击队在格节河孙把头炭窑宿营时,“老来好”将党代表王永江、支部委员裴锡哲、机枪射手老韩杀害,中队长老杨身负重伤,枪支被“老来好”匪队全部劫去,重建的游击队又遭失败。

汤原中心县委三次创建游击队,三次遭到失败。县委同志在失败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实践,继续为以后建成反日游击队创造条件。

(三) 海伦抗日义勇军的创建及其失败

海伦县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地处由小兴安岭山地向松嫩平原的

过渡地带,属松嫩平原的一部分,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县份。

1931年冬,中共海伦站支部成立,胡启任支部书记,共有5名党员。1932年10月,中共北满特委派共产党员雷炎^①回海伦开展抗日活动。同月,经中共满洲省委批准,成立中共海伦县特别支部,雷炎任支部书记、孙余久任组织委员、顾旭东任宣传委员。海伦是马占山抗日救国军抗日斗争的根据地。马占山抗日失败撤离后,海伦在日伪的统治下满目疮痍,抗日分子遭到血腥镇压。为打开反日斗争新局面,雷炎深入到群众之中,秘密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揭露日军侵占中国领土、欺压劳苦大众、杀害中国同胞的罪行,号召人民共赴国难,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2年10月中旬,雷炎联络了海伦县西南乡及拜泉三道镇的红枪会、黄枪会会员300多人,夜袭海伦城北伪警察分驻所,捣毁日军在广信当的驻地,毙伤日军20多人。不久,雷炎通过顾旭东和在伪山林警察队中的顾风(顾旭东之兄)取得了联系。经过雷炎和党组织的教育,顾风率领伪山林警察队200余人哗变,成立了海伦抗日义勇军(又称海伦游击队),顾风任总指挥,接受海伦特别支部领导。抗日义勇军成立不久,即与日军进行多次激烈战斗。一次,顾风部下薛洪福率领17名战士,驻在海伦城东肖永珍屯的肖家大院里。敌人密探得知消息后报告日军。拂晓时分,队伍被日军包围。战士们奋勇抵抗,战斗持续到午后两点多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撤走,在途中与顾风所率部队汇合,重返肖家大院围攻日军。敌派骑兵大队增援,激战中顾风中弹负伤,在撤退途中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余部后来分散转战于德

^① 雷炎(1911—1939),原名李辉。黑龙江海伦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自卫军学生团。193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党组织派回海伦工作。1934年在上海武装自卫会工作。1936年任抗联第三军军留守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抗联第三军五师参谋长、九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三路军第四支队队长。1939年2月在与敌人作战中牺牲。

都、克山、青冈、明水、安达和松花江沿岸等地。

1933年4月1日,中共海伦特支委员会改为海伦县支部,领导成员未变,机关设在“三三医院”。这是雷炎利用父亲的房子开设的一所医院。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海伦县党支部继续领导反日斗争,动员和组织海克路200余名建筑工人举行罢工,提出了反对压薪、克扣工资、打骂工人的口号以及选举工人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的要求,迫使官方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同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满洲总工会负责人赵一曼^①到海伦巡视工作,与海伦支部共同研究,决定派共产党员孙余久到义勇军“全友”队进行工作。同年秋,海伦支部决定由孙余久动员“全友”队从东山里到海伦西部活动。队伍到达海伦西部后,击毙了伪自卫团团团长郭占山,但立即遭到数百伪军警的跟踪追击,几经激战,余部返回东山里后,这支部队瓦解。海伦支部把这支部队改编为党领导的海伦反日游击队的努力再次失败。之后,雷炎被调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工作。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了创建游击队的艰苦斗争,各反日游击队和在义勇军基础上组成的救国游击军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这些抗日部队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与抗日义勇军一起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党领导的人民反日游击队的诞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在义勇军斗争失败后,党创建的游击队便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战场的军事核心力量。

^①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四川宜宾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工作。1932年来东北在沈阳作妇女工作。1933年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1934年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道北区委书记。1935年秋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在与敌战斗中负伤,被俘。1936年8月英勇就义。

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其建立开始,就表现出它的特点:在政治上,它贯彻中国共产党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纲领,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组织上,它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队员骨干开始时多数是党团员,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组织纪律性强,并能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并肩战斗;在军事上,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反日游击队在初创阶段显露出来的特点,展示了它的广阔前途。但是,在这一阶段,其自身还有明显的不足和缺点,主要是,反日游击队人数一般较少,力量薄弱,并且分布不平衡,在行动上受到一些“左”的影响。因此,在初创时期,反日游击队还未能成为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的主要力量。

东北反日游击队在初创阶段表现出来的不足和特点,一方面是由于东北党组织缺乏创建和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特别是在“北方会议”后,“左”的影响尤为严重。

当时,根据“北方会议”的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把各地的反日游击队都陆续改称为红军游击队,并一再向他们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豪绅的土地、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使反日帝与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由于执行这种完全脱离当时东北实际的“左”倾错误政策,使游击队严重地脱离了群众,阻碍了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一些游击队是几经挫折才建立起来的,有的甚至遭受失败;同时游击根据地的建设也受到了损害,缩小了游击队的活动区域。这种不利于武装反日斗争的现状,迫切要求党组织及时调整对东北武装反日斗争的领导策略,必须放弃在东北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提出灵活的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第二编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
抗日斗争的新形势

(1933年5月——1937年7月)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日统一战线 方针的提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操纵伪满政权,设置殖民统治机构

1932年末,东北地区除少数边境城镇和各抗日义勇军余部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抗日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外,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大部分城镇^①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自1933年初开始,日本侵略军在继续进攻东北各地抗日部队的同时,又调集兵力向热河、察哈尔和关内进行新的侵略扩张。1月3日占领山海关,打开了入侵华北的大门。日本侵略者公然宣称热河是“满洲国”的一部分,长城是“满洲国”的国界,为其扩大侵略制造舆论。2月21日,日伪军进犯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继而向长城一线进攻。^②长城各口^③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侵略,使全国人心振奋。蒋介石却惶恐不安,对国民党军队中爱国官兵要求北上杀敌者声称:“侈言抗日”者,“立斩勿赦”,并迫使张学良下野,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④由于国民政府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得不到有力支援,5月,被迫相继放弃长城各口。^⑤日军侵占察哈尔省多伦、张北等7个县和河北省密云、平谷、唐山等22县,战火危及北平、天津。1933年5月末,日本侵

略者迫使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三省与热河省的侵占,承认了中国还不得在察哈尔北部和冀东地区驻军,从而不但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使东北的抗日战争与关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处于隔绝状态,使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陷入孤悬敌后的困难境地。

《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侵略者便逐步加强了对中国东北和热河地区的全面统治。

为全面控制占领区的边境口岸,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长城各口和侵占冀东沿海各地的同时,又增派海军至旅顺,并在该地设立日本海军省“要港部”,进一步控制东北沿海港口及其与关内的海上交通。6月,伪满政府公布外国人“入境取缔规则”;翌年4月,又发布“取缔外来劳工法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长城各口遍设关卡。所有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在于割断东北与关内的联系,以利其在中国东北建立殖民统治。

为封锁东北与苏联的边境,迫使苏联放弃中东铁路,日军除陈兵边境外,在侵占中东路西端的边境城镇满洲里后,于1933年3月28日强行关闭满洲里车站轨道转辙器,断绝中东铁路与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的联运。日军侵占中东铁路东端的绥芬河后,不顾苏联的抗议,又于5月31日强行关闭了绥芬河车站,切断与苏联乌苏里铁路的联运。与此同时,在日本的指使下,伪满建立江防舰队,受日本临时驻满海军部管辖,并于7月下旬试航黑龙江。从此,日本侵略军对伪满与苏联边境实行了全面封锁。

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对伪满洲国的控制,于1933年8月8日制订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该《要纲》规定,要“把满洲国作为与大日本帝国有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即日本既要把中国东北变为

独占的殖民地,又要使其在外表上保持“独立国家”的假象。统治的方式采取“在现制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本人官吏来实质地进行”。1934年3月1日,日伪当局又伪造民意,演出了一幕“改行帝制”的丑剧,扶植溥仪称帝,宣布“满洲帝国由皇帝进行统治”。实际上,日本侵略者将溥仪完全禁锢在“皇宫”中,使其成为十足的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

根据《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的规定,在伪满中央政府内要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制度。即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洲国的统治,一切均由日本政府通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付诸实施,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的“统辖”,又主要是通过由其派往伪满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日本官员实际进行“内部控制”。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是伪满洲国的最高决策者、统治者,充斥伪满洲国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日本官员,则是伪满政权的实际操纵者。因此,伪国务院这一“中央政府”,虽由日本侵略者选择的汉奸充任总理和行政各部部长,但实际上只能由日本人充任的伪国务院总务厅厅长和各部的总务司司长(后为各部日本人次长)才是真正的掌权者。该《指导方针要纲》明文规定:伪国务院总务厅长必须遵照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意图行事,并任免日本人官员。因而,凡一切决策,包括法律、预算、条约和须由伪国务院会议议定的议案在内,均须经日本人总务厅长官、各部总务司长组成的总务厅、司长会议(后为“次长会议”)事先作出决定。日本人总务厅长还直接掌握行政各部局的人事和财政大权。此即“总务厅中心主义”和“次长制”。

地方省、市、县伪政权也如法炮制。1934年10月,日伪当局为严密控制整个东北的地方伪政权,改变行政区划,将原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划分为奉天、吉林、龙江、黑河、滨江、安东、三江、间岛、锦州、热河等十省,后另设兴安东、西、南、北四省。开始各省亦设

总务厅,由日本人任厅长,后来改设日本人次长操纵伪省府,最后有的伪省长则由日本人直接充任。各县均设置日本人参事官,后又改为日本人副县长,一切政务均由日本人直接控制。

1933年6月8日,日本关东军为建立殖民秩序,加强军事统治,提出所谓“治安第一主义”,妄图实现“全满治安”。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对东北境内的军事统治,日军陆续增兵东北,至1935年,日军增至5个师团、11个骑兵联队、一个混成旅团、3个飞行联队和4个独立守备队,并把兵力分散配备到各地。同时,对伪军也进行了直接控制与调整。1933年9月,由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规定伪满军队必须在“驻满”日军指挥官的“实质性控制下”,负责维持“满洲治安”,成为“日本国防之补充要素”。为此,除由日本关东军派出之伪军政部顾问外,还调派大量日本现役军官和退役军人到伪军军事机关和部队中去充任顾问和军官,直接控制伪军。经过整顿,1934年伪军已近8万人。同年7月,以原设置的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等四省伪警备司令部为基础,增加哈尔滨伪警备司令部,改设5个军管区,另在伪兴安4省各设警备司令部,实行分区军事统治。

除伪军外,在各地还普遍设置伪警察机构,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在伪民政部设警务司,各省设警察厅,各县设警务局,在警务局下设警察署、派出所。此外,还设警察军事力量:特殊警察队、县警察队、森林警察队。1935年末,伪警察已达7万人。在各级警察机构和警察队普遍配备日本人警务指导官,加强控制。1934年3月,重新公布经过修正的《警察治安法》,限制、剥夺了居民的结社、集会等自由。

为弥补伪军警统治之不足,日本侵略者还普遍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编制伪自卫团,对城乡居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压迫。1934年3月,经修正重新公布的《暂行保甲法》,将城乡居民一律纳入根据居住区域划分的牌、甲、保组织之中,实行“十家连坐”。凡牌内出现“动乱

者”,各户均负连带责任。伪保甲还组建由伪警察署指挥和控制的伪自卫团,以保护排、甲的所谓安全。同时,日伪还根据《暂行武器取缔法》,于1934年开始大力收缴散在民间的枪支,借以防止民众反抗或落入抗日武装部队手中。据日伪统计,至1935年底,已收缴枪支98.11余万支,子弹996.62余万发^①。

日伪当局为配合其对于东北各地抗日武装的军事“讨伐”,从1933年3月开始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日伪当局在东北最早建立“集团部落”是1933年3月在伪间岛省延吉县北蛤蟆塘,接着在该县其它村屯以及和龙、珲春县推行。这一年共建立了8个“集团部落”。1934年12月3日,由伪民政部发布“集团部落建设”文告,在伪间岛省先后修筑36个“集团部落”。此后,开始在东北普遍推行这一严酷的统治措施。日伪当局首先在抗日武装力量活跃的农村地区实施集家并屯,修筑“集团部落”。初期在伪吉林、奉天、间岛等省13个县和伪三江、滨江等省部分县份重点推行,其中又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军活动的兴京(今新宾)、清源、辉南、抚松、金川(今已撤销)、柳河、东丰、宽甸、桓仁、通化、辑安(今集安)、临江、长白等县为重点目标。

“集团部落”实际上是集中营。敌人在选定的地址,强迫农民在部落外四周掘壕注水,同时在壕外侧架铁丝网,内侧筑起很高的土墙,初期的“集团部落”规模较小,四周每一边约长100—200米,四周设置炮台。在“集团部落”内,中心设伪警察派出所和村公所,用以监视居民。每一“集团部落”可容纳50至100户。居民出入须持有身份证明;农民从事生产活动也限制在距“集团部落”不远之处。发

^① 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满洲国警察史》上卷,1942年9月版,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1990年译本,第244页。

现有“抗日反满”和援助抗日军队者，便予以严厉制裁，直至处死。日伪当局实施的这种反动政策，使各地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被阻隔，其生存和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日本侵略者为使东北成为其永久性的殖民地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基地，除动员大批日本军警现役和退役人员到中国东北充塞伪满军、警、宪、政各种殖民统治机构外，还策划由日本向东北农村实行武装移民。日本侵略者将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视为日本的“民族膨胀运动”和决定日本能否成为东洋强国的关键。因此，1932年1月，当日本侵略军刚刚侵占东北的铁路沿线城市，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尚硝烟弥漫之时，日本拓务省与关东军便急急忙忙举行有关移民问题的会议。1932年2月，即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统制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等文件，认为：“日本移民以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成就为重点”。^①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移民作为实现在中国东北建立由日本民族统治的重要“国策”。

1932年10月1日，日本关东军《关于向满洲移民纲要》出笼。在日本国内，从同年9月1日即已开始启动移民动员，仅经过19天的训练，10月3日，在移民团长、退役陆军中佐市川益平率领下，第一批武装移民492户、1131人自东京出发，于10月14日到达佳木斯。翌年2月，转到桦川县孟家岗永丰镇（今桦南县）。1933年7月，第二批日本武装移民455户、1188人，到达依兰县七虎力河右岸，再迁土龙山

^①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统制部：《移民方策案》（1932年2月），转引自孟宪章等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附近的湖南营。1934年10月,第三批“特别移民”259户、614人到达黑龙江省绥棱县北大沟,建起“瑞穗村”移民团。第四批日本移民458户、982人,于1935年10月出发,翌年3月到达密山县城子河和哈达河两地。1936年7月,第五批日本移民1292户、2177人相继抵达林口至密山铁路沿线的永安屯、朝阳屯、黑台村、信浓村^①。此外,在此期间尚有较小数量的日本移民到达舒兰县城子河(200户)、汤原县四合屯(200户)、宁安县镜泊湖畔(100户)、宁安县仙洞(150户)、阿城县天理村(100户)、通辽县一棵树(55户)等890余户,约4000人。至1936年7月止,共有大小18批次日本移民到达东北,计3777户,11300人^②。这期间的日本移民尚属试验阶段,自1936年8月,日本关东军便计划进行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制订“百万户移民计划”,准备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占当时日本本土全体560万农户的18%)。

日本侵略者规定,这种移民每户拥有约20公顷(相当于中国300亩)耕地、牧草地和菜地等。日本移民每户得到如此大量的土地,难以自立耕种,于是便雇佣附近被强制夺取了土地的中国贫苦农民为其耕种,有的日本移民干脆出租给中国贫苦农民耕种。因此,一些日本移民很快成为了富农和小地主。日本移民所占用的土地,多半是无偿强占的土地和少量以低于市价几倍的价格强行收买。结果,中国农民土地被强占,使大量中国农民流离失所以至妻离子散,或沦为日本移民的雇工。

^① 根据日本有关武装移民法令规定,凡移民户第一年限限一人移民中国东北,第二年开始允许移民家属迁至移民地。人数即为移民家属迁居后的统计数,且仅为动态统计数。参见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652-653页;〔日〕满州移民史研究会编、孟宪章等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1页。

^② 高乐才:《日本“满洲移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63至404页。

不仅如此,日本移民还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日本侵略者动员大量在乡军人(即退役军人)来东北建立“移民村”。移民村团长多为退役军官担任,并在移民村配置“警备指导员”多名,由关东军发给轻机枪、步枪、手枪、子弹等,组成武装队伍。这些武装移民村多半设在铁路交通沿线、边境地区和抗日游击区的边缘。它实际上是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后备力量和占领军的补充,是镇压东北人民反抗的别动队。这种武装移民政策的实施,给东北的广大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也对抗日部队的活动造成极大的困难。

二、实行经济统制,垄断经济命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其目的是使之成为日本垄断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地并获取高额利润的场所,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以及粮食的稳定产地,残酷压榨群众和获取巨额财政收入的来源,借以弥补日本资源、财力的不足,使之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和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战略基地。

中国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日本实行军事占领之后,为了迅速而有效地攫取各种资源,既满足侵略战争和继续扩张的需要,又使日本从其本国的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并为它的长远的经济发展服务,日本关东军和“满铁”经多次策划,于1933年1月由关东军特务部(原统制部)制定出《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并于3月1日由伪满政府予以公布。该《纲要》囊括了交通、农业、矿产、工业、金融、商业等各个方面。日伪当局宣称,该《纲要》的根本原则是:实现“东亚经济之融合”,“置重心于‘日满’两国之协调,使相互扶助之关系愈益紧密”;“开发举国天赋所有之资源,谋经济各部门之综合发展,特于重要之部门施以国家之统制”。实际上,就是使东北经济与日本经济实现“一体化”,将东北经济作为日本经济的附庸,为日本经济服务。

《纲要》的重点在于掠夺东北“所有的资源”,满足日本的需要;办法就是实行“经济统制”,加强控制。为此,1933年10月2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发布伪满经济由“国家统制”的根本大纲,宣布实行“国家统制”的企业包括“国防上重要产业”、“公共事业”和“一般产业和基础产业”。这些企业必须由“国营”、“公营”和“特殊公司”经营,或经许可方可经营。这类企业几乎全部是军需工业、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此外,所谓“自由经营”的产业则仅限于农业、轻工业等。

日本侵略者为适应其军事侵略、建立殖民统治秩序,以及商品运输和掠夺原料的迫切需要,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便急不可待地采取军事强占、接管、“谈判”签订新合同、协定等各种手段,攫取了除早已为日本所有的南满铁路及其支线安奉、大营、奉抚铁路外,全部东北原有各条铁路,包括沈海、沈山、吉长、吉敦、吉海、四洮、洮昂、齐克、洮索、呼海等铁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还获得到了它久已渴望的大量新铁路,包括敦图、吉五、拉滨和齐克路与呼海路连接线、齐克路延长至黑河的铁路等的修筑权。后来又获得了图佳、凌承、叶赤等铁路的修筑权。

1933年9月,吉林至朝鲜会宁铁路通车,翌年9月这条铁路北与拉滨路连接通车,1935年10月又东通朝鲜罗津港。从此由日本隔日本海经朝鲜罗津港至中国东北的第三条铁路交通大动脉建成。这样,使由日本大阪、东京至中国哈尔滨的路线比经过大连或朝鲜釜山——新义州的路程缩短了近900至1100余公里,从而成为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北满和整个东北的最捷径。

1935年3月,日伪当局又自苏联购得了中东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财产。九一八事变后,苏联政府为维护其远东的安全和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东铁路的权益,竟同意由伪满政权取代中国原有对中东铁路的权利,继续与日伪“合办”经营中东铁路。但是日本并不满

足于此种“合办”方式。1932年8月末,日本向苏联提议让出中东铁路路权。1935年3月,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以1.4亿日元将中东铁路完全出售给伪满洲国。日本迅即将中东铁路改称北满铁路。此后,日伪当局将东北的所有铁路经营与新建项目,全部“委托”日本国家资本“满铁”统一管理。

其它航空、内河船运,以及电话电报也都为日本资本所垄断。1932年9月设立“满洲航空公司”,1933年8月设立“满洲电信电话会社”,同年10月设立“大安汽船会社”等。

日本垄断资本很早便侵入东北的铁矿和炼铁业,分别由日本财阀大仓和“满铁”以“中日合办”的名义,攫取了中国东北最大的本溪和鞍山的铁矿与冶铁企业。1933年5月,日本政府批准由“满铁”在鞍山设立“昭和制钢所”,合并原有鞍山铁矿和制铁所,收买弓长岭铁矿,垄断了东北的钢铁工矿企业。1935年生产生铁47万吨、钢坯钢材30余万吨,其中生铁39万吨被运往日本,约占年产量的83%。

“满铁”这一日本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资本集团,在日俄战争后便强行夺取了抚顺、烟台(今辽阳华子矿)等煤矿开采权并控制了新邱(今阜新)煤矿本溪和西安(今辽源)煤矿的矿权。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除扩大抚顺等煤矿外,又兼并了原为中国民族资本的蛟河煤矿,并以“委托”名义取得延吉老头沟等煤矿的开采权。1933年10月,“满铁”成立了“满洲炭矿会社”,(简称“满炭”)对煤炭生产实行垄断。日本侵略者为加强对煤炭生产的控制,采取日伪合资形式,于1934年5月成立“满洲炭矿公司”,其中,“满铁”投资占50%,控制了公司的实权。至1935年,以日本资本为主的“满铁”与“满炭”这两大垄断资本集团,将年产1000余万吨煤中的351.6万吨,运往日本。

石油是现代工业和战争的战略物资,而缺乏石油资源恰是日本

的致命弱点。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就已经在抚顺炼制页岩油。日本侵占东北后,在日本军部的直接控制下迅速扩建炼油厂,至1935年,年产粗油达到14.5万吨。同时,从1934年开始进行煤炭液化试验。东北的石油业完全由日本垄断资本所独占。1934年2月成立“满洲石油株式会社”,以垄断石油开发与销售,同年11月,伪满政府实施石油专卖。1935年抚顺炼油厂生产6.6万吨石油,其中即有6.28万吨供日本海军所用。此外,还利用东北丰富的粮食等作为原料设置酒精制造业,以弥补液体燃料的不足。1933年11月,成立了“大同酒精公司”。

电力工业,在九一八事变前实际上就为“满铁”所独占。东北沦陷后,“满铁”对东北的电力企业的独占完全“合法化”了。1934年9月,伪满政府设立“满洲电业会社”,控制全东北的电业,但实际上东北的电力工业完全由日资所垄断。其中,由“满铁”控制的电力企业的纯利润,以前每半年平均为100万元,到1934年4月至9月的半年内扣除400万元的特种准备金后,纯利润仍达150万元。

日伪对东北的其它矿业,如金矿、铝矿、菱镁矿等也完全实行“统制”,同样也多为日资所垄断。其中,铝是航空和军事工业的重要原料,是日本本土所稀缺的。1933年日本设立的日棉铝会社,将该社本部设在日本富山县,而由“满铁”资本设立的“满洲铝会社”在抚顺加工生产半成品后,再运至日本日棉铝公司制成成品。1933年冬,由“满铁”、住友等财阀合作成立菱苦土开采公司,在东北开采菱镁矿原料,加工厂则设在日本山口县,产品供给日本的炼钢和兵工厂。1934年5月,日伪设立“满洲采金会社”,垄断并疯狂地掠夺中国东北的金矿。

因各项军事工程建设和工矿企业也急需大量水泥,伪满政府于1933年10月将水泥工业列为“统制”项目。但这种有利可图的水泥

工业也多半为“满铁”和日本小野田会社所垄断。

此外,日伪对汽车、棉纱、棉线、棉布、酒、面粉等工业,也都列入“统制经济”范围。

随着军事侵略的推进,日本垄断资本加强对东北经济的控制,日本的金融资本也迅速涌入东北这一新的殖民地,并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东北的金融机构。1932年6月,日伪当局决定将原有东北三省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合并建立伪满“中央银行”,其实权完全由关东军、日本正金银行、日资朝鲜银行和“满铁”的代表所操纵和把持。伪满中央银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进行殖民地掠夺的重要工具。它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积极为日本侵略和战争政策服务,代表了日本金融寡头的利益。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不仅原在东北的“满铁”垄断资本急剧膨胀,而且从日本新投入的资本大量涌入,迅速地垄断了东北的军需工业、重工业和其它基础工业。尽管这些工矿业多半属于原料工业,但却是为日本经济服务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东北的民族工商业一直受到日本垄断资本的排挤、压抑和损害。东北的民族工商业原本比较薄弱,且多半集中于农产品加工和交易方面,诸如油坊、烧锅、火磨、粮栈等。这些民族工商业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和日本垄断资本的排挤,一直处于慢性萧条之中。“满铁”依靠把持铁路运输机构的条件,调整运费政策,将中国人经营的工商业生产的豆油、面粉等成品运价抬高,使之难以出口。相反却降低特产大豆运价,使之源源不断地运抵大连港。同时,日伪当局鼓励利用新技术,使出油率高的日资大型榨油企业,相继在大连建立起来,并将其分厂设立于东北各地,与东北中国民族工业相竞争,结果使民族资本较为集中的营口和哈尔滨两地油坊急剧

衰落。其中哈尔滨的中资油坊数量至 1935 年较过去兴盛时期减少了一半。面粉业也同样遭此厄运。九一八事变前的 1930 年,北满的民族资本火磨业生产面粉 21 万吨,1933 年下降到 14.6 万吨。同一时期,长春火磨生产面粉由 5.2 万吨下降至 0.3 万吨,从此一蹶不振。而日资新技术粉厂生产的面粉则由 3 万吨猛增至 28.7 万吨。东北民族工商业随着日伪“经济统制”的步步紧逼而一落千丈。因此,东北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对日伪殖民统治深为不满。

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经济掠夺也逐步深入农村经济。它一方面继续维护中国已有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则令伪满政府允许日本人从 1933 年起可以自由购买或租种东北土地,并享有土地所有权。结果,日本侵略者攫取土地的活动日益加剧,大批中国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存手段。日伪当局除将无主的可耕地无偿分配给日本移民村外,对有主的已耕地虽然名义上说是“收买”,但实际上是强取豪夺。1934 年 1 月,日本侵略者开始了“收买”数以百万公顷土地的行动。其中,在吉林省依兰县(今属黑龙江省)不论熟地、荒地出价每垧(约 0.67 公顷)一律一元。而当时在依兰县上好熟地每垧价 120 元,次等熟地也有 50 余元。荒地中,上等地价为 40 至 60 元。每垧一元,与强占无异。日本侵略者的强占土地行动,不但引起广大中国农民的反,而且使小地主、富农也深受其害,因而同情支持抗日斗争。

伪满当局的各种税收和发行公债,是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东北的经济掠夺和对广大人民普遍进行搜括、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其数额逐年迅速增长。日本侵略者 1932 年 6 月即行公布税制,加紧税收。除“中央”税外,还附加了各种地方税。1932 年税收 2400 万元,1934 年增至 4600 万元。1932 年发行公债 350 万元,1933 年增至 509 万元,1935 年增至 681 万元,并强行摊派认购。

鸦片专卖,是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战养战”目的所采用的、搜括和毒害东北人民极其毒辣的纵毒手段之一。1932年9月,日伪当局即以保证财政收入为由,成立鸦片专卖筹委会,11月公布“鸦片法”。侵占热河后,日本用飞机在热河省上空散发传单,公开鼓励在热河大力种植鸦片,但须全部卖给伪满政府。后来,又令伪奉天、四平、吉林和兴安西省也开始种植鸦片。1939年鸦片年产量达500余万两。1933年即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1941年东北各地的管烟所已达1631个。在奉天设鸦片加工厂1处,后来又在铁岭、绥化增设鸦片加工厂。鸦片专卖政策名为“禁毒”与“专卖”,实际上却造成了烟毒泛滥,吸毒者与日俱增。1933年登记的吸毒者为5.68万人,到1939年被鸦片毒害的人数猛增至99.9万余人。日伪当局从鸦片专卖中获取了大量收入。1932年专卖鸦片年收入为1940.96万余元,1936年鸦片收入即猛至12119.75万余元之巨。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规模纵毒,不仅使吸毒者成天醉生梦死,大量死亡,而且还使许多人丧失民族意识、民族气节和反抗侵略的斗志,而且身体残弱,严重者成为丧失劳动能力的废人,甚至大量死亡。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明禁实纵的鸦片政策,是用杀人不见血的鸦片,来毒害中国人民,妄图使中国亡国灭种,永远做日本的亡国奴。

三、摧残中国文化,推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销蚀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抗日斗志,使东北人民成为任其驱使和剥削的“顺民”,除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进行残酷的统治、镇压和掠夺外,还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极力推行愚民政策,摧残中国民族文化,实行殖民地文化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便将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尽皆操纵在

日伪当局控制的文化机构中,并首先控制了新闻、广播、出版、电影等宣传工具和各种文化、教育机构。1932年10月24日公布了伪《出版法》,规定凡是危及日伪统治、“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对带有民族意识的出版物或进步书报一律查禁。凡发现此类书刊,无论过去出版者或现在发行者尽皆销毁。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5个月内,即焚毁图书650余万册。1934年6月29日,伪民政部第五号通令,禁止36种报刊输入东北。其中,除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等外国文报刊18种外,其余均为关内出版发行的《大公报》、《申报》、《时报》、《新闻报》、《北平晨报》、《上海民报》、《益世报》等。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关著述,更属严禁之列。一旦发现此类书籍,不仅出版物被没收,而且持有者亦即被逮捕、监禁。

与此相反,日本宣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报刊、图书却大量输入东北,泛滥成灾。这些书刊,其政治内容反动、荒诞无比,有的如同希特勒一样制造种族优越论,宣扬所谓“大和民族统治论”;有的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一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美化为“皇军光荣”的战斗历程,并戴上“英雄”的桂冠;有的伪造历史,胡说“满洲”一直是“独立国家”,甚至把东北纳入日本的历史,企图把东北与关内分离开来,制造日本吞并东北的“历史根据”;有的把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制造的伪满洲国,美化成“王道乐土”和“民族协和”的“新国家”、“新天地”,掩饰其殖民地统治的罪恶,等等。

日伪当局为实施前述《出版法》,还建立了专门的舆论统治机构。1933年2月,在由日本人掌权的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后改“弘报处”),作为伪满言论、文化的中心统治机构,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统一管理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重要文化部门,进行思想文化统治。1932年12月1日,日伪当局成立伪满洲国通讯社(简称

“国通社”)，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之后，日本将原有的通讯社统一组成日本同盟社。这两个通讯社垄断了东北的新闻通讯事业。它们采集、编辑、发表新闻稿件，向东北各地的报纸、无线电台提供，而且规定有些新闻稿是必须予以刊登的。

1933年8月，伪满成立“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聚集了关东军、“满铁”、协和会等各方面人员，严格控制电影的制作和发行、放映。

同年9月建立的“满洲电信电报股份公司”，不但垄断了东北四省的电报电话，而且完全控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的广播电台，所有广播稿件、节目均须通过各省邮政管理局电政科审查批准后方能播发。

1933年，日本侵略者又成立了“满日文化协会”，下设调查部和编辑部等机构。所谓调查，实际上是搜集情报，对东北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地理、资源、历史、宗教、文化、民俗等进行调查，为日本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决策提供现实的和历史的依据，为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服务。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所推行的教育政策是典型的殖民地愚民教育。日本侵占东北后，对东北原有教育事业肆意进行摧残。东北原有教育设施本来比较落后，九一八事变前，共有各类学校1.27万余所、学生84万余人。其中，小学1.24万余所、学生75万余人；中等学校(包括职业学校)约200所、学生8.3万余人；大专院校29所，学生0.363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认为学校历来是排日运动中心，下令学校一律停办，许多校舍被日伪军警强占为军营。虽然自1932年3月伪满政权建立后，学校有所恢复，但在校学生数量连续5年低于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其中，小学学生在1933年6月统计仅有50万人。这一年，大学仅恢复了奉天和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

两所。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对各类学校的中国原有文科教材大部分予以废除,对具有排日、民主思想或民族意识内容的教材一律查禁和焚毁,同时组织人力赶编体现奴化教育、愚民教育的“新教材”。但“新教材”一时难以编辑和出版,日伪当局即下令暂以“四书”、“孝经”代替。在课程设置上,“日语”被列为各类学校的主课,课时增加,中国语文被改为“满语”,课时则逐渐减少。教学内容着重灌输“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忠孝仁爱”,以及与日本“共存共荣”,要与日本“盟邦、亲善”等等。其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日本忠顺的奴才和任其奴役的劳动力后备军。

日伪政权建立后,对学校师生的思想和行动严加监视与控制。1934年正式推出了《统制学生思想案》。该案要求调查学生的思想和在校外的行动,并随时加以“纠正”。实际上是对具有爱国思想和从事反日活动的学生进行监视、控制和制裁。

日本侵略者为摧残中国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对于传播文化知识、启蒙青少年民族意识和进步、爱国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教师,动辄以“思想犯”等罪名加以迫害和血腥镇压。1933年,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广大爱国中小学教师实行大逮捕和血腥屠杀,使教师数量减少9000余人。其中,小学教师从日本侵占前的2.44万余人,降至1.72万余人;中学教师从1932年的3100余人降至1300余人,仅剩42%弱。

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摧残中国文化,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民族义愤,从而使更多的人走上了抗日道路。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 抗日斗争策略方针的转变

形成及

一、《一·二六指示信》的传达贯彻

1933年初,义勇军的抗日运动遭受挫折,其主要领导人离开东北,大部队伍溃散,但剩下的许多小股队伍仍散在各地,有的集结在东部边境一带坚持抗日战斗,有的散在山林成为反日的绿林队伍。此外,抗日的红枪会、大刀会等民众武装到处可见。但这些队伍缺乏统一领导,面临着被日本侵略军完全击溃的危险。同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组建和领导的10多支工农义勇军和红军游击队,力量也很薄弱,尚未成长为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力量。

此时,日本侵略军已攻占山海关,正向热河、察哈尔进犯,渗透冀东,威胁华北。东北各地的抗日斗争和热河、冀东危急的现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改变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特别是迫切要求对已被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侵占的东北地区迅速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正确方针政策。

中共中央四届四中全会后设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临时中央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冒险方针,致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党组织和工作遭受极大的破坏,迫使临时中央也不得不于1933年1月由上海迁往赣南中央农村根据地。此后,在上海设立中央局,负责指导国民党统治区和东北沦陷区的工作。上海中央局仍在继续执行冒险主义方针。至于中共满洲省委,在接受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和上海中央局指导时期,当然更难以摆脱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束缚,依然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工农义勇军和红军

游击队依然四面出击：既打日伪军又收缴农村大排队枪支，既强行收编山林队又在抗日义勇军中组织哗变，结果陷于孤立，使建立不久的工农义勇军、红军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处于危急状态和被动局面。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东北地区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改变错误方针的强烈要求，以便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直接组建的抗日游击队，团结东北各阶级、各族人民和各类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东北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的新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改变党对东北的工作方针。但是，这一要求在“北方会议”上遭到严厉批评之后，又通过设在苏联远东海参崴的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①向共产国际反映了上述意见。1932年上半年，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负责人先后与赴海参崴同该书记处进行联系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兼职工部长金伯阳^②、东满特委负责对外联络的朱云光^③等人进行了深入地谈话，了解了许多有关东北抗日战争和中共满洲省委及各地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情况，了解了他们对改变中共中央在东北推行的错误指导方针的要求。该书记处立即给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政治书

① 旧译为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

② 金伯阳（1907—1933），原名金永绪，辽宁金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常委兼职工部长。期间数次去海参崴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进行联络工作。1933年11月在战斗中牺牲。

③ 朱云光（1911—1934），又名朱恩光，广东黄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珲春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东满特委巡视员，期间多次去海参崴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进行联络工作。后历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东满特委秘书长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独立团政委。1934年在~~反日~~作战中受伤被俘后牺牲。

记处等部门写信^①，建议：除派遣在苏联受过理论教育并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国干部，去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和抗日游击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外，还必须向满洲党组织写信，提出指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明确指导方针和前景，具体指出通过工农群众加入各类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掌握这些队伍领导权的工作方式，以及建立工农骨干力量的方法。该书记处还动员在海参崴的中国工作人员林伯渠、杨松^②等积极整理有关东满游击队、满洲问题等书面材料，上报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参考。

1932年8月27日至9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二次全会。会议从“保卫苏联”的现时局势出发，肯定了共产国际同年6月28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对满洲地区所提出的政策内容。即“开展游击运动，在满洲提出建立农民委员会、抵制（伪）政府的捐税和命令、没收汉奸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③等口号。从而对于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提出了不同于中国南方的政策。尽管这些口号仍存在模糊之处，但是同不久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方会议决议所提出的冒险主义方针相比，却有了原则区别。

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东北工作方针的这一改变，当时一方面迅

① 见《维经斯基给福京的信》（1932年6月11日）、《维经斯基给琼森的信》（1932年7月21日）、《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2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集，第167、187、197页。

② 杨松（1907—1942），原名吴兆镒，又名华西里、吴平等。湖北大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在海参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工会书记处中国部主任，兼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满洲省委联络工作。1933年夏秋调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工作，1934年后在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吉东特委书记。1935年赴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8年回国，在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解放日报》编辑等职。1942年病逝。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即由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转达设在海参崴的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工会书记处。同年11月,由该书记处中国部负责人兼中共代表团负责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络的杨松,将这一新的精神转达给当时正在海参崴向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工会书记处报告工作的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吉东巡视员孙广英^①。杨松与孙广英共同研究后,一致同意共产国际对东北工作方针的新指示。同时,杨松还通过孙广英向中共满洲省委提出中共代表团关于建立吉东局组织的意见,以便统一指导绥宁中心县委、东满特委、饶河中心县委等中苏边境的整个吉林省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和党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于1932年11月末至12月末期间举行会议,根据全会决议的总方针为各国共产党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在会议前夕,为研究贯彻共产国际提出的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新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召开会议,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王明,在会上作了《关于满洲形势》的主旨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要采取新的、广泛的反日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2年12月5日,由东方书记处作出决定,组成五人专门委员会,在王明的报告和东方书记处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关于满洲问题的信。与此同时,1932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邀集了在苏联工作和学习的许多中共党员,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研究“满洲问题”的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对中国东北地

^① 孙广英(1908—1985),原名朱长德。辽宁新民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兼省委吉东巡视员,后任满洲省委吉东局书记。1934年5月,吉东局被敌人破坏后脱党。1985年病逝。

区工作的新精神，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局势，着重地研讨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和调整党的策略方针等问题。会议认为，东北地区已经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会议认为，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首先是激发民众的抗日反满思想，通过实施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发动工农群众，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开展民族革命运动。为此，提出在东北建立民众抗日军和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策，取代脱离东北现实的建立满洲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口号。同时，会议认为，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东北以后，已经开始侵入华北，扩大侵华战争，妄图灭亡全中国；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仅继续坚持对日不抵抗主义，极力压制民众的抗日运动，还在动用大批军队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调整政策，准备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条件下，由中国工农红军与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对日作战协定，联合对日作战。

193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和东方书记处经过反复研究，形成并批准了1月17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和1月26日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并向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发出。

《一·一七宣言》首次向全国提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

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① 宣言号召:中国民众和士兵联合一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并要求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投降卖国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一·二六指示信》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中日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状况,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迫切的战斗任务、策略方针和目前的中心工作。

(一)信中指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全部的力量把满洲变为它垄断的殖民地”,使得东北广大各阶层群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日益恶化、工商业破产、农民土地被抢夺,造成了城乡工人、农民、贫民失业者大量增加。结果,“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信中根据东北的这一基本事实,规定了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东北各阶级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提出了党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而必须采取的总的策略方针,即在满洲群众性抗日运动的现有基础上,“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②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党在东北地区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二)信中具体分析东北抗日战争中存在的四种抗日武装部队的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58页。

^②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页。

阶级性质、特点,提出了共产党在执行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时应根据不同的对象,应采取的实行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指出:要依靠和发展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赤色游击队,使其成为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力量;团结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和基本上属于旧式农民武装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如大刀会、红枪会和吉林救国军等群众性义勇军可与之结成反日联盟;争取那些处于动摇状态的主要由旧东北军改编而成的武装部队,可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以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共同敌人。信中所规定的在团结和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时,应分别采取的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争取建立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突破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过去所采取的单一的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信中根据对于可能参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阶级各种武装集团的复杂性和他们行动走向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极端重要;指出建立和发展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是坚持反日统一战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信中提出共产党在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民族叛徒的财产;保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和朝鲜、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改善群众生活;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民众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等能够联合广大民众的组织,放弃了过去“北方会议”提出的在东北也必须普遍地在城市组织工人罢工,在农村发动农民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在军队中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不符合实际的主张。

《一·二六指示信》发出时曾有一附注。该附注指出:“北方五省

联席会议决议中对于满洲问题的决定及中央和代表团过去所研发的关于满洲问题的文件,在策略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望各级党部根据中央这封信重新审查自己的策略,根据这一封信的原则来重新计划自己的工作。”“相信满洲党根据这些新策略来积极进行工作,一定能得到伟大的新胜利。”^①

当然,这一指示信是中国共产党转变策略方针的开始;它还不够彻底,仍存在着一些“左”倾政策,诸如对东北地区的某些抗日将领、对一些中间势力,仍然缺乏具体分析和区别,一律要求打倒;对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求反对其它帝国主义;对于在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仍强调下层统一战线,而对上层统一战线依然存在某种疑虑;对于在反日统一战线可能发生分化时,还要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一·二六指示信》总的方针适应东北形势发展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反日统一战线的总的策略方针,起到了转变路线的重要作用。

1933年初,中共代表团决定派参加“满洲问题”会议的海参崴中国列宁学校校长李耀奎^②去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负责向省委传达并协助省委贯彻中共代表团“满洲问题”会议和《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纠正省委所执行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

^① 见1933年1月26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原件的附注。目前所见的这一信件附注,是1933年6月9日由上海中央局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44期刊出这一信件时,未将原有信件的附注一起发表,而另行加的附注。为此,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在发现这一情况后,于同年7月又以《对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情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的说明》为题,重新印发了原信的附注,以示督促。

^② 李耀奎(1903—1987),原名王达理、王日新。辽宁辽中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在海参崴列宁学校任校长。1933年初被中共代表团派到中共满洲省委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省委代理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任大连商检局局长。1980年离休。1987年病逝。

随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责成中国部负责人杨松,通过中共满洲省委职工部、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和中共东满特委联络员,向东北传达《一·二六指示信》。杨松通过国际交通局邀金伯阳、朱云光等,前来海参崴,同正在此地的孙广英一起听取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的内容。然后,他们分别返回东北向中共满洲省委、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中共东满特委传达这一指示信的精神。

1933年4月上旬,李耀奎抵达哈尔滨,向省委口头传达了《一·二六指示信》的主要精神。曾参加“北方会议”的何成湘仍然心有余悸,认为:中共代表团会议和这一信件的内容,同中央“北方会议”精神不符,表示怀疑。4月16日,在孙广英将由海参崴带来的《一·二六指示信》抄件和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件交给省委后,省委立即又认真进行研究,才消除了顾虑,表示同意信上的指示内容,并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

1933年4月下旬,经省委临时常委决定:将1932年7月省委扩大会议为贯彻中央“北方会议”决议而暂设的省委临时常委实行改组,由李实任省委书记,何成湘任组织部部长,李耀奎任宣传部部长(同年9月,李实被上海中央局调至上海工作后,李耀奎继任省委书记),金伯阳任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吉密任军委书记,并由以上5人组成省委常委。此后,中共满洲省委开始正式接受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双重领导。同时,为了在党的东北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新方针指导下开拓抗日斗争新局面,省委决定新建南满特委,由已派往磐石任省委特派员的省委执行委员杨靖宇(张贯)任特委书记;决定按中共代表团方面的建议设立吉东局,统一对吉东、东满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并保持省委与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和中共代表团的密切联络,由省委执行委员孙广英任吉东局书

记;决定由省委候补执行委员杨德如(杨一辰)^①任奉天特委书记。此外,还拟在北满的汤原、巴彦和中东铁路东西两段新设若干中心县委,全面加强该地区党的领导。

在此期间,省委机关和共青团满洲省委举行了扩大会议,再次讨论了《一·二六指示信》。之后,省委决定马上派出省委巡视员去各地,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的新精神,转变过去的错误路线,同时通知各地派出代表到省委参加省委扩大会议。

1933年5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道里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省委委员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哈尔滨东、西两区区委书记、新任吉东局书记与奉天特委书记、珠河中心县委代表,李实、何成湘、李耀奎、金伯阳、孙广英、杨德如、刘明佛、何成德等。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于5月15日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决议》内容主要有:(一)检查贯彻“北方会议”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方针所犯的错误及其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代表中央向中共满洲党组织所提出的建立东北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策略方针的正确性。(二)根据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提出了东北党组织当前的中心任务:(1)积极开展对抗日义勇军的工作,在坚决反日、不侵犯民众利益和民主权利、不反对共产党等条件下,党所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可同任何抗日武装建立下层和上层的反日统一战线。视具体情况,可采取反日联盟、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或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① 杨德如(1905—1980),又名杨一辰、刘孟平。山东金乡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奉天市委书记、哈尔滨市书记、满洲省委候补执行委员、奉天特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第二商业部部长等职。1980年10月逝世。

共同进行抗日斗争。(2)在广大城乡建立反日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作为反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基础。(3)发展与扩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武装部队,并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使之成为目前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和主要力量。(4)在一定的地区创造游击区,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充作反日经费。(5)联合东北地区内的蒙古、朝鲜等少数民族共同抗日。(6)加强对伪军的工作,领导伪军反正的哗变运动。(7)发展、巩固共产党、共青团组织。

中共满洲省委的这一决议,表明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实践,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接受了《一·二六指示信》的方针,基本上纠正了北方会议的关门主义政策,提出了贯彻落实东北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更为切实的各项政策和任务,对于东北反日斗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共青团满洲省委在省委扩大会议前后举行了三次会议,传达、讨论《一·二六指示信》,结合检查过去的工作,统一认识,于5月28日作出了《团满洲省委关于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决议》,并立即派傅世昌^①去吉林、海龙、磐石等地团组织进行传达。同时,从珠河调团县委书记马宏力、从汤原调团县委书记贾雨时到团省委接受指示,再返回原地传达《一·二六指示信》和党、团省委决议的精神。

中共满洲省委在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后,针对贯彻执行指示信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存在一些问题,又于同年7月1日作出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接受中央指

^① 傅世昌(1909—1938),原名傅天飞,黑龙江双城人。哈尔滨商船学校毕业。1930年5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委员。1933年5月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去南满工作,历任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政委、中共桓仁县委书记等职。1938年2月被捕后,在狱中牺牲。

示、改正五月十五日决议中几个模糊认识和错误问题的决议》。团省委也在同一日作出《关于〈接受中共中央一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决议〉的决议》。9月10日,省委又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中共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一再阐述这一指示信的内容,以求得正确地贯彻执行。

《一·二六指示信》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在东北地区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解除了党内过去存在的许多疑虑,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使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建立,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

中共满洲省委在1933年5月扩大会议前,即派出省委秘书处长冯仲云前往海龙、磐石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冯仲云于6月初到达,开始传达指示信精神。时值省委特派员、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杨靖宇于5月下旬被省委召回哈尔滨,研究在南满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的工作。

杨靖宇到达哈尔滨后,正值省委扩大会议开过不久。杨靖宇向省委汇报了巡视磐石、海龙两中心县委和海龙、磐石两支游击队的工作以及南满抗日斗争现状。除口头汇报外,还在5月31日写出一份题为《关于磐石游击队和党团工作情况报告》提交省委。这期间,杨靖宇认真学习《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扩大会议决议;省委领导同杨靖宇共同研究了南满地区党和游击队的工作,以及今后在南满贯彻党的建立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等问题,并正式任命杨靖宇为省委代表并兼任南满游击队政委,派其重返南满开展反日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团结各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共同抗日,发展南满抗日斗争新

局面。同时,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将最好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的提议,决定将磐石和海龙两支红军游击队改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首先成立该军第一独立师,为党在东北改组红军游击队为人民革命军工作迈出第一步。

为进一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纠正南满党组织过去工作中“左”的错误,中共满洲省委于1933年7月1日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省委要求:(一)县委和游击队要坚决贯彻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中关于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克服目前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错误倾向。(二)县委和游击队今后的具体战斗任务:(1)巩固与发展游击队,树立党及游击队的领导权,在游击战争中将党所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发展为“南满的游击运动中领导和团结一切反日势力的基本的和左右全局的力量”^①,并在发展中将红军游击队改编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首先编成一个师;要注意团结和加强对于一切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要很好地利用“抗日联合军司令部”这一反日统一战线的军事领导机关,建立党与赤色游击队在其中的领导;要“善于运用游击战术,绝对肃清保守的死守硬御与硬打的现象”^②;要扩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抗日根据地。(2)组织与领导群众的反日斗争,广泛武装民众,建立工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反日会等群众反日组织。(3)发展党员和党组织,巩固党的领导。省委提出要立即建立扩大的南满中心县委,统一领导磐石、海龙等广大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斗争。

早在《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传达之前,南满游击队在对敌斗争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任务问题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1933年7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33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任务问题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1933年7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35页。

的实践中,便已经开始注意联合周围的其他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协同对敌作战,并建立了抗日部队联合领导机构“抗日联合军事委员会”,参加部队人数约 1000 余人。

杨靖宇自省委返回磐石后,南满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1933 年 5 月,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日本关东军开始自长城前线调回更多的兵力,采取“分散部署”的体制,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斗争。6 月下旬,日伪军出动近 2000 人的兵力,对南满地区的各种抗日武装进行第一次“讨伐”,使包括南满游击队在内的各类抗日部队均受到威胁。

杨靖宇立即依据《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精神,力求团结周围各个义勇军部队联合反击日伪军的进攻。南满游击队以“抗日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首先动员义勇军“马团”、“赵旅”参加进攻磐石与伊通两县边界的大兴川战斗。战斗在 1933 年 6 月 25 日夜打响,南满游击队组织的冲锋队已攻至距伪军营房仅 20 余米的一栋房屋处,但因计划不周,联合进攻的其他部队未能及时跟上,失去了有利的战机,结果被敌发觉据守炮台顽抗。第二天拂晓,联合部队主动撤走。此次战斗,共毙伤伪军 10 余人。次日,伪军即放弃营房撤至营城子。这次战斗是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南满游击队与义勇军的第一次联合作战。战斗中游击队员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受到马、赵两部官兵的称赞,因而大大提高了南满游击队的威望。

此后,许多义勇军、反日山林队主动要求与南满游击队联合作战。其中,包括过去曾多次进攻南满游击队,当年 3 月刚反正抗日的“毛团”(毛作彬部)和山林队“殿臣”(傅学文部)。“毛团”反正后依然与南满游击队为敌。1933 年 6 月间,有一次“毛团”被南满游击队包围,游击队完全可以将其全部缴械,但杨靖宇鉴于“毛团”已经反正抗日,未向“毛团”发一枪一弹,还向“毛团”官兵发表讲话,阐述南满游击

队抗日救国的宗旨,对他们表示不念旧恶,愿意与之团结抗日。杨靖宇的讲话,使“毛团”官兵深受感动,确信南满游击队是真正抗日的好队伍。另一次,正值“毛团”在板凳沟被敌人包围,处境危险。杨靖宇率游击队紧急来援,使敌军腹背受敌,不得不慌忙撤走,“毛团”得以转危为安。经长期耐心的团结教育工作,终于使“毛团”积极向南满游击队靠拢。

不久,杨靖宇进一步联合“毛团”、“宋团”(宋国荣部)、“马团”、“赵旅”、“殿臣”等 1000 余人的抗日部队,在 7 月 12 日夜向伊通县营城子伪警察队两个中队进攻。13 日晨攻下该镇,伪警察被俘 6 人,负伤 2 人,其余逃走。抗日部队缴获现款数千元。联合抗日部队乘胜前进,于 7 月 20 日,又开展了进攻永吉与桦甸边界的七区、八区的战斗。联合部队共 1500 余人攻占八道河子,迫使伪军一个连哗变。在进攻吉林七、八区的战斗中缴获了大量马匹和物资。在此期间,南满游击队还联合义勇军部队进行攻打三道沟、破袭吉海铁路等战斗。

在南满游击队与各个抗日武装的联合对敌作战中,各部相互增加了解,杨靖宇又善于团结各部抗日武装,使原有抗日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扩大有了可能。杨靖宇因势利导,于 1933 年 7 月下旬,邀请在磐石及周边各县活动的“马团”、“赵旅”、“韩团”、“三江好”(罗明星部)、“四季好”、“许团”和“毛团”、“殿臣”等部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领导人 70 余人,在桦甸八道河子举行会议,共商联合对敌作战的问题。其中,还特别邀请了“常占”部首领穆荣山与会。磐石工农义勇军与“常占”合作时,因受关门主义错误影响,认为与“土匪”合作是右倾,工农义勇军便主动与其分离,相互间还发生过误伤。此次南满游击队主动诚恳欢迎“常占”队参加联合抗日会议,双方取得了谅解。会议达成协议,组成了“联合参谋部”。会上推选拥有兵力较多的“毛团”司令毛作彬为总指挥,南满游击队政委杨靖宇为政治委员长、教

导队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参加“联合参谋部”的部队约有 3000 余人。这一“联合参谋部”是南满地区出现的武装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期组织形式,是党在南满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一种尝试,对于团结抗日武装共同抗日起了积极作用。通过“联合参谋部”达成的共同协议,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得以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和党员、团员到各支义勇军中去工作,帮助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为党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积累了经验。

1933 年 8 月 13 日,为检阅和锻炼联合抗日武装的战斗力的“联合参谋部”决定发起进攻呼兰集场子(今吉昌镇)的战斗。抗日联合部队集中 1600 余人,连续围攻三昼夜,被围敌人急切要求县城派兵增援。正当“联合参谋部”下达总攻击令时,敌援兵迫近,担任阻击敌增援部队的“赵旅”虽打退一次 200 余名敌人援军,但敌援军陆续赶到,终于突破抗日联合军攻击阵地,被围敌人乘机反扑,使正在进攻敌人的南满游击队陷于敌人夹击之中。在联合部队纷纷各自撤退之后,南满游击队也最终撤出战场。这次战斗,共击毙敌保卫团大队长高希甲、日本军官中岛等 7 人,击伤 16 人,南满游击队阵亡 3 人。不久,南满游击队伏击由呼兰镇去磐石县城领取给养、弹药后返程的伪军车队,又毙伤其 10 余人,截获一批军需物资。

与此同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加紧发展自己的部队和筹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派出省委常委金伯阳等人前来巡视,帮助进一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并协助建立人民革命军工作。金伯阳带来了省委起草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纲》等文件,并起草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成立宣言》。杨靖宇到各抗日义勇军部队去进行联络,并宣传南满游击队即将改编建立人民革命军的意义,取得参加“联合参谋部”的义勇军、反

日山林队的支持。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党的组织分别在群众中和部队内部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动员,积极准备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纪念日完成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工作。

经过准备和酝酿,1933年9月18日,由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在西玻璃河套猪腰岭长寿宫前举行隆重大会,宣布将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改编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会议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成立宣言》,公布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政纲》、《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东北人民革命军士兵优待条例》;同时还发表了《告反日义勇军战士弟兄书》。上述文告郑重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武装力量”。全体指战员“誓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斗争到底”,要为“驱逐日本一切海陆空军出满洲,收复东北而战,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与国土完整而战,为推翻‘满洲国’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而战,为东北三千万民众的利益而战”^①。文告中严格要求人民革命军指战员绝对不许损害群众利益,否则将严加惩处。文告还宣布人民革命军愿与其他抗日部队在下列条件下结成反日作战同盟。这三个条件是:(一)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二)允许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允许民众武装起来,共同进行反日战争。

同一天,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为庆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在全县10余处抗日游击队活动据点,分别举行了共约2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广泛宣传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性质和它诞生的重大意义。

^①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成立宣言》(1933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33—34页。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组建司令部,内设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和政治保卫连。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参谋长李红光、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独立师暂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袁德胜、政委朴翰宗、参谋长李松波^①;第三团,团长韩浩^②、政委曹国安、政治部主任李明山。政治保安连,连长崔山好、政委程斌^③。加上南满游击大队80人,全师共380余人。9月3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成立发来了贺信。同年10月,依据共青团中央关于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号召和团省委的提议,独立师又设立了少年营,由共青团员和青少年战士组成。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成立,是中共满洲省委在南满地区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重要体现,它不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南满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从此以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联合许多抗日部队共同对敌,使南满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增强,抗日游击区不断扩大,南满抗日游击战争呈现出新的面貌。

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军队士气高昂,积极开展抗日战斗,获得许多新的胜利。1933年9月20日,独立师第一团联合“马团”、“天虎”等部挥师西南,进入东丰、西安(今辽源)县境,分别攻进夹信子、

① 李松波(1904—1935),吉林磐石人,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磐石工农义勇军大队长、代理参谋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一团参谋长、第一军第二师参谋长等职。1935年9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韩浩(1905—1935),原名金翰浩,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磐石工农义勇军,历任南满游击队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团团长、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师长等职。1935年8月,在战斗中牺牲。

③ 程斌(1912—1951),原名程杰,另名程志平,吉林伊通人。1932年参加磐石游击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保安连政治指导员、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长、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38年6月在本溪率部叛变投敌。1951年春被人民政府逮捕处决。

沙河子街,沿途伪“韩民会”会兵闻风而逃,部队缴获部分越冬物资。9月27日,独立师第三团一部在吉海铁路柴河至烟筒山段伏击伪军铁路警备第五旅第十四团一支巡逻队,毙伤伪军6人、俘虏5人,缴枪10支。

第一军独立师的建立和积极作战,引起日伪统治者的不安。从1933年10月1日开始,敌人调动日军第十师团一部、一个骑兵旅团、独立守备队和飞行队计2000余人和伪军吉林第二教导队、黑龙江省伪骑兵第一旅和伪新京骑兵一个团,共1万余人,对吉海铁路两侧磐石、伊通、桦甸等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进行了持续40天的秋季“大讨伐”。敌人此次“讨伐”的目的在于一举消灭刚成立不久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破坏这一地区的联合抗日武装力量,彻底摧毁以玻璃河套为中心的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敌人采取以伪军从四面围攻,遍地设营驻守,以日军为主,逐步向根据地中心推进,分割围攻、各个击破的战术,对根据地的村屯进行毁灭性的烧杀血洗。玻璃河套、拐子炕等根据地的房屋几乎被烧光,人民群众或被杀或外逃,几至一空。日本侵略军驻西集场子三日,群众被杀害200余人,磐石县城和烟筒山一周内被杀300余人。敌人在磐石、烟筒山、伊通、永吉、海龙等地几乎天天杀人。据不完全统计,仅上述城镇陈尸即达2000余具。在根据地以外,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与独立师所设的秘密据点也大都被破坏。

与此同时,为分化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彻底孤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敌人对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除采用军事打击外,还实施诱降政策,致使一些山林队投降。日军对于投降的队伍,一般不予信任,实施集中缴械遣散,首领则处死或遣返原籍并加以监视。

针对日伪军大规模的围攻,杨靖宇根据敌我力量对比过分悬殊

的状况,采取了避实击虚,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伺机打击敌人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当日伪军“大讨伐”开始向玻璃河套抗日根据地包围进攻时,独立师即自吉海铁路路东到达路西,摆出进攻西集场镇的态势,在外围调动敌军,解除了根据地和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面临的威胁。但独立师抵西集场镇附近时,发现该镇已为敌先机占据,便转攻八棵树屯一营伪军。经2小时战斗,击毙伪军5人。此时天已大亮,再战不利,独立师主动撤出战斗。这支伪军也未敢追击,翌日撤走。独立师此时发现磐石西部各城镇几乎已布满日伪军,便改变行动方向,留该师第三团坚持路西的斗争,司令部则率第一团过路东寻找战机。部队在跨越铁路时,在小火石磊遭敌伏击,中共独立师特支书记刘用国和一名副官牺牲。此时义勇军各部除被击溃者外,多已离开磐石,独立师联合退敌计划已无法实现。

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独立师司令部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按照中共满洲省委关于“赤色游击队目前主要的任务不是死死的守住那个很狭小的根据地,而是要扩大游击运动,开展反日的游击区域,扩大赤色游击队政治影响”^①的指示精神以及县委关于游击队“必须活动到辉南、桦甸、金川、柳河、海龙等地”^②的指示,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第三团跨越辉发江(今辉发河)南下,至辉南、柳河、奉海铁路沿线伪奉天省境内,汇合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开辟新游击区;第一团和少年营继续坚持磐石、伊通、永吉、桦甸老游击区的斗争。

1933年10月27日,杨靖宇率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第三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任务等问题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1933年7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36页。

^② 《中共南满(磐石)中心县委决议》(1933年8月2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6,第87页。

团从磐石东南黑石镇附近徒步涉过辉发江南下。时值深秋,白露横天,指战员们虽然身无棉衣,却个个精神抖擞,趟过冰冷的河水,奋勇挺进,沿途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军的抗日救国纲领,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杨靖宇率部过江后,与苏剑飞^①率领的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会合。

南满游击大队之一的海龙游击队长期在柳河、金川、清源一带活动。由于中共海龙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执行关门主义错误政策及敌人的严厉“讨伐”,部队始终未有较大发展。1933年8月14日,海龙游击队在柳河县大牛沟与吉林抗日人民自卫军田霖旧部苏剑飞所部东北抗日义勇军游击大队会合后,共同北上辉南,欲同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会合共同抗日。南满游击队即派人去辉南将海龙游击队、苏剑飞所部义勇军合编为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但由于两支部队合并后时常存在一些不同认识,因此,在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原海龙游击队政委刘三春到磐石,要求独立师派遣部队南下领导辉发江南的抗日斗争,并解决南满游击大队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10月25日,在独立师渡江之前,独立师司令部曾决定将海龙游击队与南满游击队合编为独立师第二团,并经杨靖宇同意由金伯阳去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了解情况,进行调解。在南下部队与第一游击大队会合后,经过协商将前海龙游击队编为独立师江南游击第一连,将苏剑飞部编为独立师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并经大队长苏剑飞同意,将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宋铁岩调往该游击大队兼任政委,以加强共产党对这支部队的政治领导。不久,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一职暂由共青团满洲省委

^① 苏剑飞(1907—1935),黑龙江双城人。1926年至1931年入吉林省防军第二十七旅当兵,任排长。1932年率部参加该旅田霖营起义抗日。1933年8月与海龙游击队合并,不久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任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在战斗中牺牲。

巡视员小孟(韩光)^①代理。

独立师南下,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所到之处,群众杀猪置酒,请求部队留下在当地活动,以保护民众免遭日本侵略军蹂躏之苦。此时,独立师司令部为扩大抗日游击区、发展部队,计划首先由金川县(今已并入辉南、柳河两县)、柳河县奔袭三源浦镇,回头再攻孤山子,借以调动敌人,然后扫荡敌伪各小股武装,打开辉南、金川、柳河的抗日局面。1933年11月15日,当部队行军至金川县旱龙湾碱水顶子北部(现属辉南县)时,远离主力的后卫部队突遭跟踪而至的伪军混成第六旅独立团第三营邵本良部的袭击。战斗中,独立师后卫部队击毙伪军7人,击伤6人,打退敌人,缴枪7支。但随军活动担任后卫的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等4人牺牲,3人负伤。

碱水顶子战斗后,全师上下一致发誓为烈士报仇,奋力杀敌。当独立师部队行军途中,靠近伪军兵站基地凉水河子(今属柳河县)时,伪军第三营营长邵本良即将该营驻守三源浦等地的部队急调凉水河子加强防守。杨靖宇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绕过凉水河子,出敌不意,按原有计划远道奔袭柳河县三源浦,于1933年11月24日乘虚攻入该镇。独立师部队进城后,捣毁梅河口至通化铁路的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和伪军兵营,击毙企图顽抗的日本驻通化领事馆的总稽察等4人,缴获枪支一部,没收大批被服等物资,解决了部队的冬装。战斗中,原海龙游击队政委刘三春不幸牺牲。独立师部队在镇内热情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张贴布告、标语。人民

^① 小孟(1912—2008),原名孟宪林,又名韩光。黑龙江齐齐哈尔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常委兼秘书长,1933年秋任党、团省委特派员。1934年任珠河游击队哈东支队第三总队政委、哈东支队代理政治部主任、共青团珠河中心县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任黑龙江省省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等职。2008年9月逝世。

革命军纪律严明,对街内商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群众的称赞。当部队撤离时,大小商号自动杀猪备酒,民众送饭送水热情慰问,还给独立师送米送面,热烈欢送子弟兵。

三源浦被独立师占领后,伪军邵本良自知中计,慌忙集中3个连伪军自凉水河子火速回援三源浦。此时,杨靖宇令部队绝对隐蔽行踪撤至大小荒沟一带深山密林之中,休整部队,伺机袭击敌人。在伪军望风扑影地搜寻独立师徒劳无功之后,自诩诡计多端的邵本良为查明独立师的所在地并诱使人民革命军上钩,便写了一封给驻在通化的伪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廖弼辰的假信。信中说,该营正在柳河县东部堵击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并故意将信落入独立师部队手中。杨靖宇发现敌通讯兵不经大道去通化送信,而是经过独立师的活动之地,便识破了敌人的计谋。遂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给在磐石正欲渡江南下的独立师第一团团团长袁德胜的信,意谓得知邵本良部伪军正在柳河东部活动,司令部将率部队去回头沟歼敌,令第一团火速前来参战。并且也有意使信落入伪军第三营之手。邵本良见到此信后,因求功心切竟忘乎所以,迅即率领所部东去回头沟,妄图围攻独立师。杨靖宇经侦察得知该营伪军确已去回头沟后,立即抄近路直趋回头沟北部的敌兵站基地金川县凉水河子,并联合义勇军“老常青”部,于12月23日一举攻下该地,击毙伪军20人、俘虏10余人,缴获一些枪支和其它大量军需物资。金川县伪军第五旅骑兵团和伪警察队闻讯后即刻出动,邵本良部伪军也急速北上回援。独立师并未久留此地,而是同“老常青”部绕道直插临江县境,并沿途扬言:独立师前往进攻柳河、通化两县边境的柞木台子。伪军第三营在凉水河子扑空后,得知人民革命军攻击柞木台子的消息,又将所部伪军西调柞木台子,防止独立师进入通化。杨靖宇率领独立师部队乘此时机,联络当地的“老常青”、“四海山”等义勇军、山林队,准备共同进攻临江

县八道江(今属白山市)。

此时,留在辉发江北磐石地区坚持战斗的独立师第一团和少年营会合“天虎”、“马团”等义勇军部队正欲南下,与独立师司令部汇合,在江南开展游击战争。

自独立师司令部率第三团等进军辉南、金川、柳河后,磐石抗日游击区已被日伪军严重破坏。日伪当局又将大批日伪军调往吉敦铁路沿线“讨伐”抗日武装,留下吉林伪军第二教导队 700 余人,在日本指导官指挥下组成“讨伐红军游击队”,协调、配合各地驻军,专门进攻人民革命军。敌人采用游击战术,行动诡秘,突袭独立师第一团和少年营部队,同时利诱已收编但不坚定的义勇军,破坏抗日义勇军与人民革命军的团结;离间群众同独立师的关系;利用豪绅地主编保甲、立户口,成立伪自卫团,建立敌伪统治机构。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独立师第一团和少年营为适应形势,开始化整为零,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去伊通、磐石边境,一部继续在磐石北部,一部在桦甸活动。

1933 年年 12 月 1 日,敌人再次集中 2000 余人兵力,准备于辉发江北寻歼独立师第一团。为粉碎敌人新的“讨伐”,第一团决定利用磐石中心县委派进驻磐东呼兰镇伪军吉林第二教导队骑兵第八连从事瓦解工作的关系,策动伪军哗变,削弱敌人在磐东的“讨伐”兵力。12 月 9 日,该连伪军成功哗变,日本教官和伪军连长被击毙。哗变队伍一部分自愿参加独立师。第一团共缴获枪 28 支、战马 30 余匹。之后,第一团留下第一连一个排和少年营坚持磐北地区的斗争,该团主力渡辉发江南下。不久,少年营在磐北墙缝沟的对敌战斗中损失严重,少年营营长和县团委书记等 8 人战死,3 人负伤被俘。为保存力量,独立师第一团的这个排和少年营余部及“马团”、“天虎”等部义勇军一同渡江南去临江,同独立师司令部会合。

1934年1月17日,独立师司令部集中第一、第三团、南满游击大队、江南游击第一连和义勇军一部共700余人,根据杨靖宇的部署兵分三路,攻入临江县八道江镇,毙敌10余人,收缴一批物资。进城的抗日武装秩序井然,群众利益未受任何损害。拂晓,联合部队主动撤出八道江。之后,独立师各部西进,在报马桥、抢马船、横虎头和辉南县三岔相继与伪军第六旅廖弼辰、邵本良等部展开战斗,共毙伤敌48人,使敌人对人民革命军更加不敢轻视。邵部伪军说:“同这路红军八天打了四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伤五六十,日本子还死几个,可是红军却未怎的。”^①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江南地区联合抗日义勇军各部取得许多对敌战斗的胜利,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使独立师的影响迅速扩大。周围义勇军、山林队相继前来接头,要求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独立师逐渐成为南满一带抗日武装力量的中心。

1934年2月14日(农历春节),独立师因势利导,邀集众多义勇军队伍至临江县三岔子附近城墙砬子休整、集会。到达的各抗日武装约1600余人。2月21日,杨靖宇即召集与会的17支抗日部队代表举行会议。会上,杨靖宇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并用过去各抗日部队联合对敌易于取得胜利,否则易于被各个击败的鲜明事例,强调了各抗日部队联合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性,得到与会抗日部队首领的一致支持。会议经过共同协商,一致赞成独立师的提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老常青”部首领隋常青为副总指挥(后为赵铭思)、李红光为参谋长、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其余各部队首领皆为参谋委员。会上通过

^① 《韩光关于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报告》(1934年4月1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372页。

了《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纲领》,并决定由总指挥负责起草《抗日联军宣言》。会上决定除独立师原有编制不变外,将自愿改编的人数较多的江南抗日义勇军部队共编为8个支队,即:第一支队“老常青”、第二支队“四海山”、第三支队“臣军”、第四支队“朱司令”、第五支队“双胜”、第六支队“保国”、第七支队“东边好”、第八支队“赵参谋长”。人数较少的义勇军则编为游击连。会上还划分了各抗日武装的活动区域,以便各负其责。

此时,江南新游击区已扩大至辉南、金川、柳河、濛江、通化、临江等六县。在独立师周围共同参与联合对敌作战的抗日义勇军约有5000余人,约占辉发江两岸抗日武装的一半。

通过这次会议,独立师实现了与江南各抗日武装团结对敌作战的目的。会议决定成立的南满地区“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对于南满抗日部队的领导地位,表明南满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

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正值日伪军发动1934年第一期“讨伐”。结合这次“讨伐”,日伪当局普遍收缴民间枪支,对凡是不被信任的由投降武装编成的伪军一律缴械;重新装备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侵略者的邵本良、王殿斌、于泽甫等3个支队,使其专事跟踪追击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等抗日武装;重要据点和战略要地一律驻以重兵,设置炮台,经常出动百人左右规模的兵力对抗日武装实行袭击。“讨伐”军由伪奉天省警备司令部于芷山的伪混成第二、第三、第六旅和邵本良部等3个支队组成,目的是一举消灭东边道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等抗日部队。

针对敌情,抗日联合军采取避实击虚方针,各个部队迅速分散返回各自活动区域开展反“讨伐”游击战,迎击敌人。独立师第一团、少年营和“天虎”等部重返江北磐石老游击区活动;第三团、江南游击第

一连、第二连和其他义勇军联合部队,在金川、柳河、通化、临江等西南地区战斗;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在辉南、桦甸、濛江中部地区游击作战;杨靖宇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独立师的“总方向应当向西南发展”的指示,带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卫队连等直属部队往返驰骋于奉海铁路东西和梅辑大道两侧指挥全局。

1934年4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直属部队、“老常青”和“赵参谋长”等支队,连续进行了通化水曲柳和夹皮沟、临江三岔子、金川大荒沟、临江林子头等战斗,歼敌20余人。5月,独立师一部和“老常青”、“赵参谋长”等支队在金川梨树沟子、横虎头南沟,同伪军邵本良支队作战获胜。7月,杨靖宇率部两次西进清原、西丰、兴京(今新宾)、桓仁,联合抗日义勇军苏子余等部进攻兴京县城,在桓仁县八里甸子、四道岭子、大清沟同伪军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当伪军第六旅等伪军急速赶来桓仁时,杨靖宇得悉后又突然率队经通化县境北返,令敌人扑空。途径通化,时逢在临江、辑安、通化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将领王凤阁前来会见。两军达成联合抗日协议。此时,独立师第三团等部曾攻入伪军邵本良支队的老巢柳河县孤山子。8月9日,该部进攻清原县草市途中,在山城镇附近公路伏击一支日军汽车队,击毁汽车数辆。8月26日,又攻入草市镇,击伤伪警察、自卫团等3人,俘虏16人。经一年多的英勇战斗,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直属部队和第三团,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终于打退了日伪军对南满辉发江以南新开辟游击区的抗日武装的“讨伐”。

同时,独立师第一团和义勇军“天虎”部于1934年3月重返辉发江北磐石老游击区后,仍然分开活动。第一连在磐石北部和桦甸;第三连和少年营移师伊通。1934年4月3日,团长袁德胜率第一连在磐北对子沟,突袭伪军第十四团和磐石伪警察大队各一部,击毙伪军连长和伪警察共5人,迅速撤走。6月20日,第一连会同义勇军一部

于永吉八区平岭伏击一支伪军,击毙击伤伪军连长和士兵计71人,缴获部分枪支和军服。活动在伊通的第三连和少年营,夜袭二道沟,缴获壮丁团14支枪。之后,袭击各地敌伪会房武装,缴枪几十支,重建少年营第二排和第二连一个排。6月29日,该部又联合义勇军共400人在二道沟伏击自长春到达的伪军刘团“模范骑兵连”,将敌人击溃,缴获马枪12支,俘虏伪军两人。7月27日,重建不久的第二连和少年营在磐北围攻据守成德隆烧锅的敌会兵30人。1934年8月2日,第三连也返回磐石,在西集场子伏击伪警察队,歼敌7人。8月10日,第一连、少年营一部和义勇军联合在永吉双河镇袭击伪警察和会兵,毙伤其20余人。

其间,1934年5月16日,独立师第一团联合“四季好”、“马团”、“天虎”等部抗日义勇军成立了江北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成功地开展了联合对敌作战。独立师第一团和少年营已发展至120余人。不久,还在伊通、磐石拐子炕、磐南和磐东、桦甸、吉林四区共收编了6支抗日队伍。

在中部地区活动的南满游击大队,于6月中旬联合部分抗日义勇军攻下桦甸会全栈,袭击几处敌会兵。7月12日,又联合义勇军“两省”部攻入濛江县城。然后进军辉南,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

总之,自1933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一年来,在杨靖宇的指挥下,部队在战斗中不断锻炼成长。部队不仅编制完整,而且兵力、装备也成倍增加。师司令部下辖教导连、保卫连,除原第一、第三团外,又新建第五团,还有经常随同第一团活动的少年营。此外还有南满游击第一、第二大队和10余支游击连队。至1934年9月,独立师共有700余人。同时,独立师还联合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经常共同对敌作战,独立师在辉发江南北的游击区已遍及19县的广大地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已经成为

南满抗日武装的主力,南满抗日游击区已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之一。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建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组建

东满地区传达贯彻《一·二六指示信》较早。1933年3月,中共东满特委联络员朱云光应召前往海参崴杨松处听取了关于《一·二六指示信》的传达。4月初返回东满,向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等口头传达这一指示信的新精神。但是,朱云光所带回《一·二六指示信》的抄件,经解密技术处理字迹仍难以显现,仅凭朱云光的记忆和理解进行的口头传达,不仅挂一漏万,而且把指示信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这一核心内容漏掉了。

当时,东满各县党组织正在贯彻执行“北方会议”决议和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的指示精神,在各县抗日根据地搞土地革命、建立区级和村级的苏维埃政府。对照新传来的《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感到东满过去的工作犯了错误。这时虽然还没有见到指示信的完整文本,但童长荣仍然认为有必要立即贯彻中央的新精神,并纠正东满工作中的错误。于是,他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在东满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上连续发表了《满洲的情形和我们的错误》、《民众政权和苏维埃的关系》等多篇文章,阐述中央新指示的精神,要求中共东满党组织转变策略,停止执行土地革命的方针,把各县赤色游击队统一改为中韩反日游击队(自卫队)^①,扩大反日游击战争,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由

^① 童长荣:《为什么将赤卫队改为中韩自卫队》(1933年5月中旬)。中共延边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内部出版),上册,第127页。

于没有把握中央新指示精神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这个核心,因而在许多政策问题上界限不清。有的文章中将过去东满党组织执行土地革命方针所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朝鲜民族主义分子、派争分子和“民生团”的破坏,要求各级干部检查和揭露过去的错误,并将策略转变与反“派争”首领及反“民生团”斗争结合起来,从而使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的工作遇到了困难。

1933年6月初,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团杨波、潘庆由等在东线巡视到达汪清后,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看到《一·二六指示信》的全文和中共满洲省委的决议,才对指示信的精神有了全面了解。但是,当时东满的对敌斗争形势严峻,特委机关仅有童长荣一人留守,其余特委委员皆分散在部队和各县工作,无法召开特委会议。因此,童长荣与省委代表团成员去各县分别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神。6月4日,童长荣和省委代表在汪清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作出了接受《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之后,东满特委和省委代表团成员分两路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童长荣和潘庆由于1933年7月初到达珲春,召开中共珲春县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指示信精神;省委代表团成员杨波到延吉进行贯彻。

1933年9月中旬,中共东满特委召开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特委成员和与会的领导干部开始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一·二六指示信》中提出的党在东北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及其意义,并在实际工作中予以贯彻,纠正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从而使东满各县的抗日斗争面貌有了初步改变。各县都普遍撤销了各级苏维埃政府,代之以人民革命政府和农民委员会;废除了“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的口号,代之以“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走狗的土地”,“分给农民”的主张;取消了游击区内曾实行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集体农庄等制度,实行鼓励农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成果归个人的政策;消除了“赤区”与“白

区”对立的状态,开辟了城镇的工人工作和敌占区的工作;开始肃清关门主义错误,改善了“赤色游击队与别的部队间险恶关系”,与其他抗日义勇军“成立了攻守同盟”,并在联合对敌斗争中以反日游击队的作战英勇、纪律严明的实际行动提高了游击队在其它抗日部队中的威望,扩大了影响,成为东满地区抗日部队中的核心和基本力量。会议还改组了特委领导机构,童长荣任特委书记,组织部部长李相默^①、宣传部部长王中山^②、军事部部长王德泰,执行委员梁成龙。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东满各县传达、贯彻过程中,各县反日游击队便注意改善与本地区各支吉林救国军余部以及抗日山林队的关系,争取与之联合对敌作战。7月29日,延吉游击大队联合“双声”等8支反日山林队400余人,围攻八道沟日本领事分馆,不久又联合13支抗日武装再次袭击八道沟,前后共击毙日本警察和伪韩民会武装数十人。

9月6日,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110余人组成突击队,与救国军吴义成、柴世荣^③、史忠恒^④等部联合共3000余人,围攻东宁县城三岔

① 李相默(1905—1938),朝鲜咸镜北道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汪清中韩游击队政委、中共延吉县委书记、东满特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因“民生团”嫌疑逃跑。1936年被捕叛变。

② 王中山(1910—1958),原名王景福,吉林延吉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依兰沟工农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延吉县委书记、中共东满特委代理书记。1958年病逝。

③ 柴世荣(1894—1944),原名柴兆升,山东胶县人。1929年任吉林省和龙县二道沟公安分局巡长。九一八事变后举旗抗日,后参加吉林救国军任第四旅司令。1934年2月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副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等职。1940年12月带部队奉命进入苏联境内休整。1942年任东北抗联教导旅第四营营长。1944年在执行任务时牺牲。

④ 史忠恒(1906—1936),吉林永吉人。曾在吉林步兵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当班长。1931年10月8日随同营长王德林起义抗日,任吉林救国军补充第一团营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救国游击军第三团团长、第十四旅旅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师长等职。同年10月,在战斗中负重伤后牺牲。

口。守城的有日军石田部队约 500 人和景团长率领的伪军一个团。战斗中,一些救国军部队畏缩不前,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两支部队在金日成、白一平的指挥下,英勇顽强,首先攻下西山炮台,然后向县城西门碉堡进攻。敌人机枪火力十分猛烈,城壕注水,攻城难度很大,但汪清和琿春游击队员仍奋不顾身向前冲锋,跳入水深及腰的城壕,连续发动 10 余次冲锋,浴血战斗一天,终于攻入城内。由史忠恒指挥的救国军一个团也攻入县城。后因伪军集中兵力反扑,救国军总指挥吴义成等首先撤退,县城未能全部攻下。汪清、琿春游击队和史忠恒部救国军攻入城内的部队遭敌军猛烈反击;又经艰苦的突围作战,并救起身负重伤的史忠恒,突出重围。汪清、琿春游击队的战绩博得所有参战部队官兵的称赞,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威望。此次战斗,击毙日伪军 150 余人、伤 70 多人,伪警察死伤 5 人。救国军和游击队阵亡 51 人、伤 19 人。

11 月下旬,日伪当局又调集 5000 余名兵力,分多路对各县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讨伐”。一路敌军南自琿春、汪清边界大荒崴向绥芬大甸子(罗子沟)进击,一路敌军西自小汪清向大汪清进攻,妄图将汪清游击队驱逐至绥芬大甸子一带予以围歼。向琿春大荒沟、烟筒砬子进犯的敌之一路,迫使琿春游击队向汪清转移;另一路敌军向延吉县王隅沟、三道沟根据地进犯,企图断绝延吉与汪清两支游击队的联络,并将延吉游击队向和龙、安图压迫,逐出延吉原有根据地。日伪军将“讨伐”的重点置于汪清抗日根据地。汪清游击队与救国军史忠恒旅分成两路,一路在大荒崴正面奋力抗击,并组织群众向大甸子撤退;另一部在金日成的率领下绕到日伪军后方袭击图们至汪清铁路沿线的敌人据点凉水泉子、北高丽营、大头川等地,迫使敌军撤离。日伪军进攻延吉县石人沟、王隅沟的一路,在进犯王隅沟时,延吉游击队与之展开游击战,前后约 20 天,日伪军被歼 60 余人后撤走。琿

春游击队在大荒沟和小五道沟战斗中先后毙伤敌人近 50 人之后转移。

自 1934 年元旦开始,日伪军出动 6000 余兵力对游击队开始又一次“讨伐”。敌人此次“讨伐”仍以延吉和汪清抗日根据地为重点,仍然企图将两地抗日游击队驱赶至绥芬大甸子予以围歼。中共东满特委决定采取避敌锋芒、选择敌弱点伺机进行袭击的作战方针,打破敌人的“讨伐”。根据这一方针,延吉游击队于 2 月间在三道湾根据地先后与敌军作战 20 余次,毙伤敌人 150 余人。同时还派出部队袭击天宝山铜矿,缴获一批矿警队的枪支和矿山的炸药,迫使日伪军撤走。1934 年 2 月中旬,日伪军向中共东满特委所在地汪清十里坪进攻,特委率部分部队和群众转移至大北沟一带。3 月 21 日,特委书记童长荣及战士被包围,本已长期患重病的童长荣在战斗中又负重伤,终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和龙与琿春两支游击队为配合延吉、汪清游击队的反“讨伐”斗争,和龙游击队迂回敌后,两次夜袭八家子,琿春游击队主动出击哈达门,迫敌撤退。

经过 1933 年秋和 1934 年春连续打退日伪军的第一、第二次“讨伐”后,东满四县反日游击队经受了战斗的锻炼,兵力扩充,由 1933 年 10 月的 700 余人增至 900 余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已经成为东满地区各种抗日队伍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曾一再向东满党、团特委和反日游击队提出:以汪清、延吉、琿春、和龙四县的现有反日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开展创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运动,动员大批爱国青年参加人民革命军。

中共东满特委和各县反日游击队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经过酝酿,于 1934 年 3 月下旬在延吉县三道湾南张芝营召开了中共东满特委、各县县委和反日游击队负责人会议。特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李相默和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延吉游击大队政委王德泰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①等 10 余人。会议正式决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中共东满特委任命朱镇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由延吉游击大队改编为第一团,由和龙游击大队并吸收部分义勇军部队改编为第三团。还拟定由延吉县“平日军”等义勇军编为第二团。会议同时决定俟机再以汪清游击大队和琿春游击总队各编成一个团,组成第二独立师。会议决定独立师执行满洲省委于 1933 年 10 月 9 日修订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

会议还研究了刚接到不久的中共满洲省委于 1933 年 12 月 3 日给东满党、团特委和游击队的信中关于游击队行动方向和采用游击战术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认为,根据目前东满抗日根据地和第二军独立师等部队已被敌人分隔的形势,游击队的行动方向“应当向西、向北发展”^②,并改变固守游击区与敌人拼消耗的保守观念,采取游击战术,积极向敌占区发展。会议决定,东满东部琿春、汪清两个游击大队向汪清东北部、东宁、宁安等北部各县发展,与绥宁反日同盟军和救国军余部联合战斗;西部延吉、和龙的两个团向安图、敦化方向发展,与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取得联络。后来,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拟建第二独立师和改编“平日军”等山林队的计划无法实现,决定只组建第一独立师,延吉、和龙、汪清、琿春四县游击队先后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1934 年夏,又从第一、三团中各

^① 朱镇(1905—1945),原名朱白龙,朝鲜族。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参加延吉中韩游击队。历任延吉县中韩游击大队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师长。1935 年初,因被怀疑为“民生团”关押审查,乘机逃走。后被敌警宪逮捕后叛变。

^② 《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党团及游击队同志的信》(1933 年 12 月 3 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6,第 110 页。

抽出一个连为骨干,组成独立团。第一团团长金顺德、政委崔学哲;第二团团长孟昭祥、政委车龙德(后为金络天);第三团团长赵春学(后为方振声)、政委南昌益(后为金日成);第四团团长何德润、政委金铨;独立团团长刘长久、政委朱云光。全师共900余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建立,是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发展抗日武装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又一成果。第二军独立师的成立,标志着东满地区各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日游击队由分散状态成长为有统一指挥的人民革命军部队,从此改变了过去游击队在反“讨伐”战争中,完全被敌军分割围攻的不利局面。

但是,1934年春,因反“民生团”斗争严重扩大化,致使中共东满特委和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面临严重困难。

“民生团”成立于1932年2月。它是由一伙朝鲜的亲日政客在日军侵占东北后,借日本关东军唆使东北各省亲日汉奸脱离与南京政府关系宣布“自治”之机,以实现在日本统治下间岛(延边)地区“韩人自治”为目的的亲日走狗团体。它公开拥护日本侵占东北,积极协助日军“讨伐”抗日部队,反对共产党;它鼓吹在日本占领下“间岛韩人自治”,破坏中朝人民的抗日联合,为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效劳。因此,“民生团”这一反动组织刚一出现,中共东满特委就彻底揭露其险恶用心和反动本质,并号召中朝民族团结起来,予以坚决打击。结果其日本走狗的面目在社会上暴露无遗。同时,在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当局感到“民生团”提出的“韩人自治”的主张,已不利于它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并威胁它对朝鲜殖民统治的稳定,于是在同年7月14日即迫使其公开登报宣告解散,并关闭其机构,停止其活动。“民生团”仅存在5个月便狼狈宣布解散。当时中共东满特委和所属各地党组织领导的这场在社会上反“民生团”斗争是及时的、正确的。

但是,1932年11月,发生了前中共老头沟区委书记宋老头被敌人逮捕后又被释放的事件。不久,从抓获的日本宪兵队翻译的口供中得知,宋老头是被日本宪兵队派回的特务。后经严刑审问,该人承认他加入了“民生团”,并乱供出20余名在党、团组织内部的“民生团分子”。结果,事情开始发生逆转。当时敌我斗争异常严酷、尖锐,战场上公开的敌人易于识别,混入党、团组织和军队内部的敌人难以辨认,在敌人统治下和战争环境里又难以进行调查核实。而且,暗藏的敌人对革命营垒内部危害又十分严重和恶劣,使人无由等待。加之东满特委和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认为“民生团”已开始混进党团内部,不适当地夸大了敌情,将反“民生团”斗争列为党内党外头等重要任务;同时,东满党内缺乏肃反斗争的经验,分不清党内斗争与肃反斗争的界限,又片面地依据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过去在朝鲜共产党内曾参加“派争”的人的“揭发”,在没有调查分析的情况下,就把参加过“派争”的分子视为“民生团”分子,而且采用严刑逼供的手段,“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反“民生团”斗争走入了歧途。这场内部肃反斗争由延吉县延伸至整个东满各县,由地方党、团组织扩大到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接连发生不少“案件”,令人痛心地上误杀了许多党政军干部和战士,弄得人心惶惶。

中共东满特委领导认识到“反民生团斗争”方式不妥,错杀了不少好同志,因此把斗争方式改为教育和“自服”(即“自首”)的方法。同时,东满特委要求省委对反“民生团”问题给予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得知东满的情况后,于1934年10月1日写了《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并决定由省委和团省委各派一人前往东满巡视和指导工作。团省委所派特派员先期赴东满,并携带省委的上述信件,经宁安,于10月底到达汪清;在汪清工作一个月后再转到延吉县境内的东满特委机关。

团省委特派员到汪清、延吉后,发现东满特委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反“民生团”斗争中都存在严重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与其他反日部队的关系一般都有改善,经常进行共同作战;但在建立联合指挥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汪清救国军柴世荣部曾主动提议与独立师共同组成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时,独立师认为这是柴世荣自己要当司令而采取的拉拢、分化人民革命军的手段,借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因而加以拒绝。至于对待一些尚具土匪习气的抗日山林队,则仍视之为“胡子”。认为他们表面上是反日的,实际上他们比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群众还要厉害(胡捐乱绑交不出钱活活打死);在各个反日部队内还存在着四分之三以上烟匪、惯匪、流氓、土棍和其他的反动分子,他们在任何时候也是教育不过来的。为此,东满特委在团省委特派员的指导下,与救国军余部史忠恒、柴世荣等协商后,规定了收缴山林队的枪械的三个条件:“①凡在山林里边光吃老百姓的饭不出来打仗的缴。②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③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①;并按照这一规定,独立师各团先后将危害群众利益,企图投敌的小股山林队“访友”、“忠良”、“关营长”、“双胜军”、“同山好”、“占山”、“东边好”、“东山好”、“中国”、“长顺”、“长江”、“马团长”等山林队予以缴械,并将“访友”与“同山好”的首领枪决。结果,引起了一些义勇军和山林队的严重不满。

与此同时,东满地区的反“民生团”斗争,自转入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内部以后,发生了严重扩大化错误。尤其1934年9月5日,在延吉日本宪兵队的策划下,收罗一些前朝共叛

^① 《团满洲省委特派员巡视东满工作的报告》(1935年1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195页。

徒、日本走狗特务和投敌分子组建特务组织——“间岛协助会”以后,协助会特务分子有计划、有目的地实施反间计,以“民生团”名义,向共产党、团组织和军队内散布大量谣言,写假信制造假象,致使东满党组织中了敌人的奸计,误认为“民生团”已大量混入革命队伍内部,便进一步在党团和军队内部开展了反“民生团”斗争,结果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尽管中共满洲省委在1934年10月1日给东满特委和第二军独立师全体同志信中,针对上述问题强调指出东满在反“民生团”斗争的策略与方法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提出要建立经常的肃反委员会和民众革命法庭,以防止斗争的失控;并且提出必须防止和纠正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已经出现的“党内互相猜疑和不信任及恐怖的倾向”、不信任朝鲜族党员和军队的干部战士和要求“改造民族成分”的错误主张。但是,由于省委对“民生团”问题缺乏正确的了解和认识,仍然肯定“民生团”存在,反“民生团”斗争“是东满目前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认为“许多派争的领袖分子是民生团”,“民生团”与“派争”同是反革命组织,因而主张反“民生团”斗争必须与反“派争”结合起来。结果,使东满党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的反“民生团”斗争继续扩大和激化。团省委特派员的报告中说:“民生团”在延吉的群众中数量占十分之三四,人民革命军中占十分之一二;在和龙的群众中占十分之九,军队里占十分之六七;在安图群众中占十分之七八,军队里占十分之六七;珲春群众中占十分之五六,军队中虽然尚未发现“民生团”分子,但起“民生团”作用的却占十分之四五^①。他甚至认为目前“东满的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是在‘民生团’的领导

^① 《团满洲省委特派员巡视东满工作的报告》(1934年12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198—199页。

之下”。以这种错误估计为基础,认为东满在“反民生团斗争”中采取“自首”的方法是犯了右倾错误,于是,“反民生团斗争”再度升级。结果,不仅使许多的党团员、革命军战士和基层干部被打成“民生团”,最终竟连中共东满特委常委、先后兼任组织部长、负责肃清“民生团”工作的金圣道^①、李相默、和龙县委书记金日焕、珲春县委两任书记崔学哲、团特委书记金昌润、团特委宣传部长崔凤文、独立师师长朱镇、第一团团团长朴东根等均先后被定为“民生团”分子,其中多数人被错杀。因反“民生团”斗争而损伤的党、团组织受害严重,党团员数量明显减少,出现干部危机。1933年,中共东满特委下属5个县委、24个区委、100多个支部,有1403名党员,但到1936年东满特委属下只有绥芬大甸子和安图车厂子2个工委,并撤销各县县委机构而以各县特支代之,只剩12个支部,248名党员^②。东满地区反“民生团”的严重扩大化,对东满地区党的建设和抗日斗争的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

此时,敌人重点进攻延吉和汪清游击根据地,对抗日部队的“讨伐”日益频繁,修筑“集团部落”的数量越来越多,独立师各部原有游击根据地日益缩小或被迫撤离,在老游击区活动日趋困难。因此,第二军独立师各部便依据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东满特委的指示,决定分别向新区发展。其兵力分布的情况是:第一团继续在游击区坚持斗争,第二团主力向安图进军,第三、第四团转战汪清北部和宁安、东宁地区。

1934年4月7日和18日,坚持在延吉游击根据地的独立师第一

^① 金圣道(1902—1934),又名王盖、金铁仁,朝鲜咸镜北道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延吉县委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东满特委组织部部长。在反“民生团”斗争中被错误定为“民生团头子”,1934年被错杀。

^② 中共延边州委组织部编:《中共延边自治州组织史资料》,1991年版,第62页。

团一部为支援汪清游击总队反“讨伐”斗争,多次袭击汪清县百草沟正在修筑的“集团部落”和新安屯伪自卫团,新安屯一战缴获20余支枪。4月22日,该团一部袭击延吉县茶条沟,并击溃自明月沟前来增援的敌军,毙伤敌十余人。同时,该团还曾两次袭击延吉县八道沟金矿,捣毁电厂、机械房。5月9日,该团联合抗日山林队一部袭击了正在延吉县三道湾修筑“集团部落”的伪自卫团,缴枪11支。5月21日,该团两次袭击延吉县依兰沟伪警察署。6月至9月期间,第一团曾相继袭击延吉县倒木沟、烟集岗、岛安洞等“集团部落”和天宝山、老头沟矿山,缴获枪支一部和许多物资。期间,还出击延吉、汪清两县交界的吉青岭伪军据点、驻和龙县头道沟伪军获胜。在攻袭吉青岭战斗中,独立师第一团团团长金顺德牺牲,由朴东根继任团长。

1934年4月下旬,独立师第二团主力自和龙县移师安图县,首战攻下和龙与安图两县边界的车厂子。5月2日,该团联合义勇军一部围攻安图县大甸子(今万宝),经四天战斗攻下该镇,毙伤敌数十人。5月中旬,第二团与救国军秦文元部共同进攻安图县城,交战多日未克,遂撤离。6月,该团联合抗日山林队一部进攻蒲柴河,毙伤敌40余人,缴枪20余支。之后,独立师师长王德泰率刚组建的独立团到达安图。7月中旬,王德泰指挥第二团、独立团和义勇军一部共800余兵力,再次联合围攻大甸子。围攻部队切断电话线,断绝敌军与外界的联系,经11昼夜围攻,敌军弹尽粮绝开始突围。围攻部队发起猛攻,一举攻克该地,并占领一月之久。8月上旬,第二团联合义勇军一部南攻大沙河镇(今永庆),毙伤伪军30余人,俘虏70人,缴枪100余支。中旬,王德泰率独立团、第二团和义勇军一部乘胜南下会攻安图县城,途中在清沟战斗中,第二团政委车龙德牺牲。在围攻安图县城战斗中,仅攻占街市一部,计毙伤敌军15人、俘敌10人,缴枪7支,迫使伪军300余人哗变,其中一部加入第二军独立师。独立师部队牺

牲4人。经上述战斗,独立师在西部安图、和龙等县开辟了车厂子、大甸子、太平沟、大沙河等新游击区和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并发动群众,建立了反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军民联合开展抗日斗争。

独立师部队在西部的战斗中,注意宣传、贯彻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联合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共同对敌作战,因而在这些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义勇军部队主动要求人民革命军收编。1934年秋,东满特委和第二军独立师联合10余支义勇军部队组建了东满(西部)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王德泰被推选为指挥、朱云光为副指挥。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部队约1000余人。这一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建立,推动了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此期间,因琿春、汪清原有游击根据地的相继被日伪军的“讨伐”所破坏,第二军独立师汪清游击大队和琿春游击总队除留少量部队坚持旧游击区斗争外,主力部队向北部汪清、东宁、宁安三县边界区域转移,开辟新游击区。1934年5月7日,独立师汪清游击大队联合救国军史忠恒等部将马贵林部伪军壮丁团缴械,获步枪33支。下旬,独立师琿春游击总队与汪清游击大队在汪清、东宁边境会合,随即联合救国军史忠恒部围攻驻东宁县二道沟伪军,毙敌30余人,俘虏1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

1934年6月下旬,独立师第三、第四团与应东满特委和第二军独立师邀请而来的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所部及救国军史忠恒、孔宪荣、柴世荣、李三侠等部600余人共同围攻绥芬大甸子(罗子沟)一个营伪军。6月26日战斗打响。第一天,第二军独立师第三、第四团等部队采取诱敌出城战术,歼敌30余人。第二天,部队开始分三路围攻大甸子镇。第二军独立师第三、第四团、绥宁反日同盟军以及孔宪荣、柴世荣、李三侠各部奋勇出击,一举攻入镇内,占领了伪警察署、西山炮台等处。就在这时,敌人援兵赶到,攻城各部遂退出战斗。此

战共歼敌 30 余人,独立师部队缴获 18 支枪。这次战斗显示了统一战线的威力,也大大提高了独立师的威信。

1934 年 7 月下旬,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联合史忠恒部救国军,在汪清小东沟伏击敌运输队,毙伤敌 80 余人,缴枪 50 余支和大量粮食和军需物资。此后,第二军独立师第三、第四两团部队便经常与绥宁反日同盟军、救国军余部联合作战,开辟了汪清、东宁、宁安边境新的游击区和根据地。

这期间,坚持老游击区战斗的第三、四团各一部,在反“讨伐”战斗中也取得一些胜利:1934 年 6 月,第四团一部在珲春大小六道沟一带伏击日军 40 余人,缴获物资一批。第三团一部在汪清县大汪清大房子与伪军一部战斗,毙伤敌 15 人。7 月,第三团联合救国军一部在汪清县十里坪与日军守备队发生战斗,毙伤敌 10 人。第四团一部在珲春县梨树沟伏击一支伪军运输车队,敌死伤 4 人,缴获 12 辆马车物资。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建立后,联合其他抗日友军,同日伪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据敌人统计,自 1934 年 4 月至同年 10 月,东满抗日武装共出击 103 次、3537 人次,其中独立师出击 53 次、1350 人次^①。独立师通过顽强的战斗,不仅突破了敌军的分割包围,使敌人的“全歼”阴谋破产,而且在战斗中成长,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在此期间,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因特委书记童长荣牺牲,于 1934 年 4 月在汪清县大荒崴召开会议决定,由王中山任特委临时书记。不久,特委机关经腰营沟转移至延吉县王隅沟南洞。6 月 2 日,经特委会议决定建立中共东满特委临时工作委员会。由王中山、李相默、王

^① 参见 1935 年 2 月出版的《满洲评论》第 8 卷第 7 号《在间岛抗日军与共产党势力的展望》,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抗日斗争史论丛》第一辑,1983 年 10 月编印。

德泰、朱镇组成常务委员会,王中山任书记。

在党的关于东北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引下,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四、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建立,密山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举行扩大会议,通过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决议后,6月1日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给绥宁中心县委指示信》,认为中共绥宁中心县委过去主动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要求改变组织苏维埃、红军、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创建满洲苏维埃区域的错误方针,提出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和组建民选政权等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而年初省委给绥宁中心县委的信是省委贯彻关门主义错误方针的体现,违反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新精神,因而宣布撤消年初省委给绥宁中心县委和孙广英的指示信,并指示绥宁党组织要根据中央的新指示信和省委扩大会议新决议,进行当前的工作。同时,要求将中央和省委转变工作方针的新精神,及时传达给在吉林救国军中工作的周保中和李延禄。为解决中共满洲省委同东线党组织因交通不便难以保持经常联系的困难,方便设在海参崴的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人员与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系,决定成立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由孙广英担任吉东局书记。出席会议的孙广英随即携带省委的新的指示信返回绥宁中心县委所在地穆棱,组建吉东局,并传达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和省委对绥宁党组织的新指示。

5月下旬,中共吉东局成立,书记孙广英、常委潘庆由(后为赵志刚)、吴赤峰(吴福海)。机关设在穆棱县下城子,后迁至穆棱镇。中共吉东局分管中共绥宁中心县委、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和中共东满特委。同年10月,吉东局撤销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陆续成立中共穆棱县

委、中共密山县委,连同原有的中共宁安县委,一并由中共吉东局直接领导。

同年6月,李延禄率领救国游击军在宁安活动时,吉东局派巡视员李光林^①向李延禄传达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和吉东局要求李延禄率部尽快开赴密山的意见。这时,许多吉林自卫军余部在李杜过界入苏后散在密山境内,但群龙无首,几度联合攻打密山县城(知一)而未果。救国游击军第一团尚在此地活动。因此,李延禄决定北上密山,与第一团会合,联合当地反日义勇军,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共同对敌。但部队开赴密山的消息一传出,队内便出现思想混乱。救国游击军多数战士是东满和宁安出身的农民,乡土观念浓厚,反对部队开赴密山。李延禄对战士们进行思想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留一部分队伍划归第二军,并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时值吉东局派遣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张文偕^②和张奎^③到救国游击军分任代理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职务,部队的领导力量得以加强。7月,救国游击军到达密山县南部平阳镇(今属鸡东县)附近与该部第一团会合。不久,参谋长张奎即被派到平阳镇伪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代理政委张文偕去穆棱向吉东局汇报工作,又被吉东局派往饶河。

救国游击军部队到达密山后,周围各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立即慕名前来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收编或协同作战。经游击军军部研究后,在

① 李光林(1910—1935),朝鲜族。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绥宁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吉东局书记、中共吉东局委员、东北反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12月,在战斗中被俘后牺牲。

② 张文偕(1907—1934),原名王修穆,山东掖县人。工人出身,在大革命中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海参崴列宁党校学习。1933年6月回国,任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代理政委。1934年5月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大队长。同年7月在战斗中牺牲。

③ 张奎(1899—1936),山东掖县人。青年时在俄国当华工,并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回国,历任救国游击军参谋长、密山游击队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团团。1936年4月,带领所部渡牡丹江时坠江牺牲。

驻地郝家屯召集附近的“小白龙”(苏衍仁部)、“赵队长”、“金山”(赵金山部)、“常山”等队首领会议。会上一致决定:坚决打击日本侵略军和汉奸走狗,不投降,抗日到底;保护游击区贫苦农民的利益,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子弹和给养。经过这次会议,救国游击军与周围各支义勇军、山林队建立了初步联系,鼓舞了密山抗日军民的士气。

救国游击军初到密山,环境生疏。不久,在郝家屯遭到来自半截河(向阳镇)日人队长箕浦率领的30名日军和伪军警备旅宫团的突然袭击,军部迅速转移,但第二团牺牲15人。游击军随即派人与中共吉东局和密山县委分别取得联系,在吉东局常委吴赤峰的协助下,在部队中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反日会,发展了一批经过战斗考验的指战员加入党、团组织,使部队隐定下来。同时,再次召集反日部队会议,议定各支抗日武装要协同作战,发展抗日游击区。在会上,李延禄根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建立人民革命军的精神,提出了建立“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和统一的指挥机构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会议公推李延禄任抗日革命军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各队统一编制,平时独立活动,战时协同作战。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的建立,是党在吉东地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武装部队的尝试,是一种以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游击军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抗日革命军为瓦解伪军和筹集武器弹药,通过党的组织同驻平阳镇伪军郭宝山骑兵第四旅机枪连连长、地下共产党员胡伦^①建立了

^① 胡伦(1900—1979),原名胡明德,又名胡志敏,四川广安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共青团旅法支部,后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到驻密山伪军骑兵第四旅任机关枪连连长。1934年率所部一个排起义。1935年10月,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合江省军区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79年病逝。

联系。吴赤峰经吉东局同意,在平阳镇协助胡伦开展伪军工作。胡伦利用职务之便,给抗日革命军递送情报,并帮助解决了大批武器弹药。1933年9月初,抗日革命军为解决冬装和给养,决定各部联合攻打平阳镇,但由于消息走漏,集结于郝家屯和二人班等地的抗日革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突然遭到驻向阳镇伪军和地方伪大排队的袭击。李延禄指挥部队击退了进攻郝家屯的敌人。但此战抗日革命军政治保安连连长戴启发等34人牺牲;刚编入革命军的原自卫军李秀峰一营500余人被迫退入苏联境内,被苏方解除了武装。战后,副参谋长刘汉兴带警卫员回到宁安,加入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时值冬季将至,部队冬装和给养均无着落,部队情绪不稳。第二团团团长王毓峰认为,只有返回宁安才能稳定部队。于是该军第二团和骑兵营400余人在干部、战士的坚持要求下,经军部同意,返回家乡宁安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参加了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1933年9月下旬,抗日革命军获悉驻密山县城知一镇的伪军去虎林,城内兵力空虚的消息。李延禄决定联合反日山林队一部攻打密山县城。为出敌不意,部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事先通知半截河商会,令其准备筹办棉花、布匹,限期交付,否则攻城。同时派出一支小部队去半截河活动,使敌人产生错觉。敌人信以为真,迅速派兵集中防守半截河。1933年10月6日夜,抗日革命军攻城部队急行军北上,乘夜攻击密山县城知一镇。杨泰和^①指挥第一团攻西门,李延平^②

^① 杨泰和(1904—1935),又名杨景荣,吉林吉林市人。1932年参加吉林救国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救国游击军第一团团团长、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和东北抗日同盟第四军第一团团团长。1935年9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李延平(1903—1938),祖籍山东。九一八事变后,随同李延禄参加吉林救国军,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救国游击军游击支队队长。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春回国,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代理军长、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中共吉东省委委员。1938年秋,指挥抗联第四军西征,同年11月被叛徒杀害。

率游击支队攻北门,山林队“赵队长”部攻南门,第一团第一营等部攻东门。杨泰和争取了把守西门的保安队开门,并首先攻入城内,其他各路也急速跟进。随后,杨泰和指挥第一团主力围攻伪警备营营部,将一个连的伪军全部缴械。就在战斗进行之中,密山县反日会的同志找到部队,带领他们去没收敌伪资产和装运工商界筹集的300匹布和一批棉花。此战共缴获100余支枪、子弹万余发,筹集了大量越冬物资,并在城中广贴抗日传单,次日凌晨3时撤出县城。抗日革命军军部与第一团共60余人,在李延禄率领下转移至南山里穆稜县黄窝集体修整。

抗日革命军自到密山后,几经挫折,减员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密山县委对这支党领导的部队不甚了解,仍以救国军残余部队看待,未能给予积极支持和领导;而中共吉东局又将主要干部调走;加之部队初到密山,同当地人民群众还未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耳目不灵;部队中党员数量较少,组织不健全,党组织尚不能完全掌握部队。

为摆脱部队的困境,改善东北抗日武装与关内隔绝的处境,寻求援助,1934年2月,李延禄辗转进关。部队暂由第一团团团长杨泰和与军部副官陈荣久^①负责指挥。同年7月,李延禄经海参崴自关内返回东北。

1934年4月,由于共青团满洲省委被破坏,导致中共吉东局机关和交通站被敌人破坏,吉东局书记孙广英消极脱党。中共满洲省委早在同年2月1日《给吉东党全体同志信》中就认为“吉东党没有获

^① 陈荣久(1904—1937),原名刘长发,黑龙江宁安人。曾在东北军当兵,九一八事变后带一部士兵起义抗日,参加吉林救国军,任连长。后参加救国游击军。1933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秋回国,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1937年3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得可观的成绩,主要原因是吉东党在吉东局领导之下,执行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针对当时李延禄领导的抗日革命军在密山的一时受挫的原因归结为吉东局“曲解反日反帝统一战线”方针,执行“勾结上层领袖放弃下层艰苦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苦果。同时,吉东局自成立后的一年多工作中,因日伪的严密统治,与满洲省委的联系经常受到阻隔,在工作中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联络机构的联系较多,并且吉东局对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某些“左”的错误指示有所保留。所以省委对吉东局工作也不满意,曾提出过批评。此次吉东局机关被敌人破坏,主要负责人消极逃跑,中共满洲省委于同年6月作出《关于取消吉东局的决定》,原由吉东局管理的东满特委、饶河中心县委和绥宁地区各县县委改由省委直接领导。

不久,在一次反日部队集会上,中共密山县委书记对反日山林队“亮山”违反群众利益提出批评,引起该队不满。后来,张奎率领游击队一个分队与“亮山”共同攻击一个敌视游击队的地主大院后在一起宿营时,被该山林队乘机缴械。至此,密山游击队仅剩七八支枪,使抗日活动陷入困境。此时,密山人民抗日革命军也因遭受满洲省委的批评,活动也很少成效。

1934年8月17日,密山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县委此时才得知有关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一些精神,县委书记对满洲省委的某些指责有不同意见,但在与会的省委巡视员督促下,还是通过了接受省委7月6日指示信的相关决议。密山的抗日斗争暂时得于低沉状态。

五、绥宁地区抗日武装联合抗日,绥宁反日同盟军建立

1932年以来,绥宁党组织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在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同时,还派出得

力干部和党团员到抗日义勇军和各种反日队伍中进行工作。

1933年初,救国军溃败,王德林率主力部队退入苏联,原救国军前方司令吴义成代理总司令,周保中担任总参谋长。他整顿队伍,在士兵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士兵们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斗争走向胜利。

王德林救国军瓦解之后,周保中根据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的决定,“在保持旧有的救国军形式下”同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脱离关系^①,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绥宁地区反日同盟军。1934年2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又指示吉东地区党组织,要以周保中率领的部队为中心,号召并联合其他抗日部队组建联合指挥部,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周保中根据《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的这一指示精神,一方面提出“复兴救国军”的口号,另一方面提出成立“反日同盟军办事处”的建议,并以吉林救国军总参谋长名义,号召、联络绥宁地区各抗日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此时,在中共宁安县委领导下已有吉林工农义务总队在宁安县东北部平日坡(今新城林场)一带活动。这支队伍是李荆璞^②在九一八事变后,于沙兰镇营城子组织农民建立的一支抗日队伍,当时报号“平南洋”,并加入吉林救国军部队,被编为一个连。1932年10月,中共宁安县委派共产党员于洪仁到该队开展工作。在救国军瓦解时,李荆璞和于洪仁率原有部队仍以“平南洋”名义单独进行抗日活动,部队已达200余人。1933年5月,经于洪仁与中共宁安县委联系,宁

^①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1935年4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5,第46-47页。

^② 李荆璞(1908-2000),原名李玉山,黑龙江宁安人。九一八事变后,成立平南洋反日游击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抗战胜利后,任牡丹江军区司令员、合江省军区副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2000年11月病逝。

安县委正式派其在该队开展党的工作,并将这一部队改称吉林工农义务大队,李荆璞任大队长,于洪仁任副大队长。大队下设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第十一等6个分队。队里成立了党支部,于洪仁任支部书记,李荆璞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年底,该队已有党、团员13人。中共宁安县委又陆续派王光宇^①、陶净非^②、陈翰章^③等共产党员到这支部队做政治工作,加强领导。

1934年2月16日,周保中率所部边区军第一、第三连100余人到达平日坡与李荆璞的工农义务大队150余人会合,并以这两支队伍为骨干,联合由密山返归宁安的原抗日革命军第二团王毓峰^④部10余人和救国军余部柴世荣旅80人、傅显明^⑤团50人、王汝起^⑥团10

① 王光宇(1911—1938),原名王明堂,吉林德惠人。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斗争。1933年6月被宁安县委派到宁安县工农义务队工作,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一团政委、第二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中共吉东省委委员。后调任东北抗联第四军任副军长。1938年12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陶净非(1912—1942),原名陈世有,吉林德惠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后被派往宁安县工农义务大队工作。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二师第四团政委、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东北抗联第二路军西征失利后,率第五军第二师余部同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长期联合作战。1942年5月在战斗中牺牲。

③ 陈翰章(1913—1940),吉林敦化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吉林救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工农义务大队任政治指导员。后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1936年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参谋长、师长、中共吉东省委委员、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0年12月在战斗中牺牲。

④ 王毓峰(1897—1938),黑龙江宁安人。1926年曾任东北军副连长。九一八事变后率一排人起义抗日,不久加入救国游击军,任第二团团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参谋长、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师长。1938年2月被叛徒杀害。

⑤ 傅显明(1900—1936),满族,黑龙江双城人。原东北军士兵。九一八事变后在宁安组建抗日武装,后加入吉林救国军。1934年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3月在战斗中牺牲。

⑥ 王汝起(1935—1940),山东黄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在宁安组织红枪会抗日。1932年加入吉林救国军,后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副师长、第七军第一师师长、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1940年5月在战斗中牺牲。

余人、裴振东团 50 人,以及党所领导的八道河子自卫队 17 人等,在宁安县东南山召开会议,成立“宁安东南山救国军第一游击区同盟军办事处”(简称“反日同盟军办事处”),部队统称绥宁反日同盟军,兵力近 500 人。会上还决定扩大联合宁安县境内所有抗日队伍,如南湖头、西北山的“金龙”、“飞云龙”等部,划分游击区域,全面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久,为适应抗日部队扩大联合的需要,又将“反日同盟军办事处”改称“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内设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总政治部。其中,军事委员会由参加同盟军的各部队派代表组成,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军政问题,该军事委员会由周保中兼任主席。

同年 3 月 8 日,中共吉东局提出《反日同盟军纲领》,规定同盟军办事处仍属救国军系统。队伍继续打出救国军旗帜,并由周保中以救国军总参谋长名义相号召,其目的是使用救国军这面已为群众和各抗日部队所熟悉的抗日旗帜,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武装,节制散在各地的救国军余部。绥宁反日同盟军的组建,标志着吉林省东部地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部队的正式形成。这也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尝试。

绥宁反日同盟军组成之初,主要活动在宁安县各地。1934 年 3 月初,同盟军军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进攻新官地以解决军需问题。3 月 20 日,工农义务队和边区军一部在伪军中内应的配合下,围缴新官地伪军,击毙伪团长,缴获 22 支枪,遣散了伪壮丁团。4 月初,由于叛徒告密,同盟军办事处平日坡密营遭到日伪警察大队 200 人的进攻。战斗中,同盟军击毙伪警察中队长以下 20 余人,击伤 15 人,但敌人却仍攻占了密营,同盟军部队不得不向南转移。4 月 7 日,同盟军柴世荣部在八道河子沟口伏击前来进攻的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队 80 余人,毙伤 7 人,敌被迫撤走。1934 年 4 月下旬以后,工农义务队和边

区军先后收缴光棍屯、大荒地、上马莲河等处的反动大排武装,解散壮丁团,缴步枪和洋炮 20 支。5 月 7 日,又进攻卧龙屯,火烧伪警察署,活捉伪署长,缴枪 21 支。这期间,八道河子自卫队、王毓峰团和“四季好”部进攻小城子、八城子街,缴获伪军的一些枪支。经战斗锻炼,绥宁反日同盟军的战斗力得以增强。

在同盟军部队积极对敌作战的影响下,绥宁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也活跃起来,打击日伪势力。“张祥队”在镜泊湖东部庙岭截击日军汽车,击毙日军 20 余人,缴枪 20 余支。活动在南湖头的“陈旅”、西北山的“双山”和“青山”等部也开展了进攻南湖头日军兵营等战斗。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日伪军警的春季“讨伐”日益频繁,斗争环境日益艰难,同盟军刚建立不久,周保中忙于同盟军各队之间的团结统一工作,部队内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部队情绪产生了波动,一部分边区军欲返回家乡。1934 年 5 月,日伪军集中兵力向东南山区的同盟军集结地带发动进攻,边区军第一、三连在向南湖头转移途中,连长张蓬印在前吉林救国军军官的影响下,借士兵欲归安图的要求,乘机发动离队事件,将主张坚持在宁安战斗的七八名党、团员缴械,并擅自带领 30 余人回安图活动。

与此同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宁安游击队也遭受严重挫折。由于中共满洲省委认为绥宁反日同盟军中的边区军和工农义务队仍属义勇军性质,还不够“赤色游击队”的条件,一再令宁安县委另行直接建立工农游击队,使之成长为同盟军的骨干力量。县委经过月余的组建工作,并由反日同盟军援助一批缴获敌人的枪支,于 1934 年 5 月 20 日在卧龙河正式成立了宁安游击队,队长白殿贞,队员共 26 人,分成 2 个小队,其中一个小队为青年义勇军。5 月 26 日,宁安县委令这支刚成立的游击队去唐头沟与工农义务队取得联系,宁安游击队队

长白殿贞即率领一个小队前往。第二天突遭一部日军围攻,游击队初战失利,白殿贞等4人牺牲,2人负伤,2人失踪。不久,在宁安县委的领导下,以七八名游击队员为基础,补充八道河子农民自卫队队员,重新组建了宁安游击队。

这期间,经中共吉东局决定将穆棱游击队编入绥宁反日同盟军部队建制。穆棱游击队是1933年5月由中共吉东局先后派胡仁^①、宋一夫^②、张镇华^③,在中共穆棱县委协助下建立的。由胡仁任游击队长、宋一夫任政委、张镇华任参谋长,活动在以狍子屯(今河西乡福兴村)为中心的穆棱地区。这支队伍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穆棱游击队成功地策动了八面通伪治安队、穆棱县伪县署警卫队起义反日;取得了夜袭三道崴子金矿矿警队、袭击车家亮子伪森林警察队等战斗的胜利,部队发展为3个连100余人。不久,胡仁被调至绥宁反日同盟军工作,宋一夫调任中共穆棱县委书记,游击队在张镇华率领下仍在穆棱地区独立活动。

此时,绥宁反日同盟军建立了常委会和政治部,以便加强对同盟军各部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党委书记由周保中担任,政治部主任由胡仁担任。时逢中共东满特委来信,要求同盟军部队去汪清参加抗日武装联合进攻绥芬大甸子。同时,宁安县委也要求同盟军去中东铁路石头河子,联合西北山抗日义勇军进行活动。1934年6月

^① 胡仁(生卒年不祥),中共党员。历任穆棱游击队队长、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1936年失踪。

^② 宋一夫(1913—1946),原名宋效贤。山东莱芜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中共道北特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吉东省委书记、抗联第二路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率队西征时逃跑投敌。1946年被民主政府处决。

^③ 张镇华(1909—1940),祖籍河南。中共党员。1932年由中共宁安县委派遣至穆棱县组建抗日武装。历任穆棱游击队参谋长、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部警卫连连长、营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参谋长。后任第五军第三师副师长、师长。1940年2月被捕,后牺牲。

15日,经宁安县委与同盟军党委决定,同盟军除留少量部队坚持宁安游击区斗争外,其余部队分成两支派遣队分头活动:一部由周保中率领包括工农义务队第一、第三大队、边区军特务班和已在汪清的柴世荣旅、傅显明团组成东部派遣队,去汪清与第二军独立师联合攻进绥芬大甸子;另一部以工农义务队第五、第十一大队、王毓峰团和宁安游击队余部组成西北派遣队,由李荆璞、胡仁率领赴西北山石头河子一带活动。

1934年6月20日,东部派遣队到达绥芬大甸子附近,与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议定共同攻占大甸子街,目的是以此作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绥宁反日同盟军的抗日根据地,并使这一行动成为下一步夺取东宁县城的准备;同时夺取守敌伪警备旅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和粮食、物资,作为冬季斗争的准备。参战部队以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第四团和绥宁反日同盟军为主力,联合救国军史忠恒旅以及孔宪荣、柴世荣、李三侠等部共600余人。联合部队于6月26日攻入大甸子街。此战俘敌19人、缴枪12支、子弹2000余发。因这次围攻战斗集结部队数量较多使消息泄露,伪军早有准备,援兵又至,围攻部队主动撤离。这次围攻虽未实现预定目的,却给予日伪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扩大了绥宁反日同盟军、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影响,特别是增进了绥宁反日同盟军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之间的联络与信任,为以后两军的联合对敌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鼓舞了各军的斗志。

西北派遣队的目的是联合西北山、中东铁路一带的反日山林队,策应伪军哗变,共同打击日伪势力。这一派遣队先后在六道河子和新官地收缴地方伪大排队50余支枪和一批子弹。其中宁安游击队余部在苇河县石头河子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与驻石头河子伪军中的共产党员马连山配合,成功地策动一连伪军的哗变,40余人加入了游

击队,使宁安游击队人数增加到61人。1934年7月29日,游击队在模范山与一支日军作战中,毙伤敌7人。8月6日,宁安游击队宣布恢复建制,暂设一个中队,下编4个小队,中队长由在石头河子率伪军起义的马连山担任,政治指导员由陈翰章担任。此后,宁安游击队成为绥宁反日同盟军的骨干部队。

1934年8月,两支远征派遣部队相继回到宁安东南山一带根据地休整。

一个时期以来,中共满洲省委认为绥宁反日同盟军和吉林工农义务队仍是由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向赤色游击队过渡的抗日武装,指示要以“最大的限度巩固和扩大赤色游击队”,要求“游击队尽量吸收工农分子,特别是工人雇农分子及农民武装自卫队到队伍中来”,并以赤色游击队为中心与其他同游击队关系较好的抗日义勇军联合抗日^①。

1934年5月,中共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为加强部队党的领导,纯洁工农义务队的队伍,在该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注意加强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整顿工作。该队原有第一、第三、第五、第九、第十一共5个大队,120人。经过短时间的整顿,将匪习难改的第九、第十一两队相继清除出工农义务队,该队剩60余人。但仍有两名当过土匪头目和部分人员尚待清理,他们暗中与已被清除继续为匪者相勾结,预谋叛变。8月21日,工农义务队在大唐头沟活动时,他们策动暴乱,党支部书记、副大队长于洪仁被叛匪杀害。党、团员和坚定抗日战士25人被驱逐出队,其余被裹胁而走。这一叛变事件使工农义务队几乎陷于瓦解,给绥宁反日同盟军造成重大损失。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巩固扩大游击队、组织反日反满的群众斗争等问题给宁安县委的信》(1934年7月1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51-58页。

事件发生后,中共宁安县委认为工农义务队在宁安颇有影响,是由抗日山林队较早地转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反日同盟军奠基者之一,必须予以重建。自同年8月末至9月初,由县委从八道河子农民自卫队、宁安游击队等部调入部分队员连同该队余部,又重新组建起工农义务队,队长仍为李荆璞。最初只有20余名队员,随后经过反日同盟军的大力扶植,很快又恢复发展成为同盟军中一支有战斗力的骨干队伍。

1934年8月间,绥宁反日同盟军联合办事处改组为绥宁反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周保中任军委会主任。同时还改组了党委会,继续由周保中任党委书记。9月,周保中在三道河子召集东南山和西南山抗日义勇军、山林队会议,决定各抗日部队划分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反日同盟军为准备抗击敌人即将进行的“讨伐”所必需的装备等物资,曾在团山子与敌军作战,还攻取了日本修筑图们至牡丹江铁路的若干工棚和仓储地,缴获了大量过冬物资。

绥宁反日同盟军在宁安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虽几经挫折,但终于克服困难,在战斗中恢复、壮大起来,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准备了条件。

六、饶河游击队的发展,开展饶河、虎林地区游击战

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成立不久,1934年2月上旬,中共吉东局派人到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决议精神。1934年2月下旬,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大岱河召开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满洲省委决议的精神,认为县委过去对中央、省委和吉东局的工作指示缺乏认真的研究,对中央关于在东北所采取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理解不深,至今仍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因此,县委与游击队虽

然对救国军进行过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联合抗日,但由于没有广泛深入地在汉族、朝鲜族和其他各民族群众中进行宣传与发动工作,对救国军与保卫团的某些部队强行缴械的行动,结果使自己的处境比较孤立。会议决议:改组中心县委,选举县委委员5名,书记由朴元彬担任,以加强县委领导;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界群众工作,动员群众支援游击战争;加强对救国军余部和山林队的工作,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游击队工作的领导,加紧夺取日伪军和一切走狗的武器装备和资材,为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行准备;反对日本侵略者挑拨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对于巩固和发展游击队,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广泛开展饶河、虎林地区的抗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县委扩大会议后,为了加强对其他反日部队的团结工作,中共饶河中心县委派郑鲁岩去做王旅的工作,派吉东局巡视员赵子岗到山林队工作,派方英武到“武阳队”工作。

饶河游击队的发展使日伪统治者深感不安,急欲将其消灭在青纱帐起之前。因而自游击队转入饶河境内大岱河一带活动后,日伪军便到处追踪袭击。1934年2月15日,饶河游击队得知一股200余名伪军乘马爬犁前来进攻的消息。游击队长李学福和参谋长崔石泉研究决定,在十八垧地附近埋伏待敌。

十八垧地是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其地形东、北两面是大山,西面是较矮的山岗,只有南北向的道路通向十八垧地的住户;路两旁和住户附近均是平地农田。在积雪没膝的冬天,敌人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进入十八垧地。2月15日上午9时许,敌人吵吵嚷嚷进到屯外三四百米处,下了爬犁,徒步往屯里行进。当敌人行至离屯百米左右时,游击队在李学福和崔石泉的指挥下,集中火力向敌群猛烈射击,毙敌10余人。敌人遭此突然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片混

乱。经2个小时的战斗,共毙敌30余人,其余仓惶败走。此次战斗极大地增强了游击队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

1934年4月,游击队为在四合川、大叶子沟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曾派中队长许资善向大叶子沟民团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争取其共同抗日,但被拒绝。该民团还整修炮台、围墙,坚持与游击队为敌。游击队坚决予以打击,该民团溃逃,游击队进驻大叶子沟。

1934年春,中共吉东局派遣密山人民抗日革命军代理政委张文偕到饶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驻地大叶子沟。张文偕根据吉东局指示将游击队领导机构重新进行了调整,加强领导力量,由张文偕任游击大队大队长、崔石泉任政治部主任、朴振宇^①任政治指导员、李学福任军需长。游击队下设第一连,连长金龙化;第二连连长许资善;手枪队队长金东天。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达90余人。张文偕领导游击队后,进一步贯彻关于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周围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积极靠拢游击队,在较短时间内便联合100余名抗日队伍,扩大了游击队在抗日军中的影响。

同年6月3日,为了消灭盘踞在爆马顶子和大别拉炕两地破坏抗日、残害群众的苑福堂、李喜山两支敌伪武装,张文偕率领一支由游击队和其他抗日武装联合组成的100余名部队,一举击溃苑福堂所部60余人,占领爆马顶子。另一支由崔石泉指挥的50多名游击队员乘黑夜袭击大别拉炕,李喜山部被击溃逃走,游击队缴获10支枪和20多匹马。爆马顶子地势险要,易于防守,距饶河县城较远,周围敌人兵力薄弱,饶河中心县委即决定以此处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县委也由大叶子沟迁至此地。从此,爆马顶子便成了十八垸地、大叶子沟

^① 朴振宇(1908—1935),原名金海山,朝鲜族。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饶河中心县委书记、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四团(抗日联军第七军前身)副团长。1935年在战斗中牺牲。

方圆 40 公里的饶河抗日中心根据地。不久,游击队又取得了攻占小佳河、小西山等战斗的胜利。同年 7 月初,饶河游击队远征抚远县别拉基小街,击溃 60 余名守敌,缴枪 17 支和一批物资。此时,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已发展到 140 余人,成为虎饶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部队。

在此期间,游击队根据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在队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政策,使游击队员了解只有各民族人民团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才能共同获得解放,只有各阶级、各种抗日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才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获得国家独立的道理。因此,不仅游击队内增加了汉族成分,而且分散在饶河、虎林等地的大小抗日武装,如“西久星”、“九龙”、“得胜”、“常山”、“鲁司令”等山林队纷纷靠拢游击队,要求改编,或共同抗日。饶河游击队为团结众多的抗日武装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于 7 月 15 日在宝清县义顺号召集各支愿意联合抗日的武装部队代表举行会议。与会者有“姜尚平”、“访贤”、“九龙”、“得胜”等反日山林队首领,代表 300 余名队员。会议经协商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没收日伪走狗财产,战利品按参战部队人数分配;不许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如有投敌行为,各队随时予以缴械。会上,各抗日部队一致表示接受饶河游击队领导,编入游击队。游击队根据各队情况,将“得胜”、“常山”等经常跟随作战的少数队伍编入了游击队基本队,其余编为收编队。从而形成了以饶河游击队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部队。

尔后,张文偕率领游击队和联合部队到虎林县境打击敌人,收缴枪支、子弹和物资,并决定首战进攻三人班。7 月 19 日,游击队和另两路义勇军先后到达三人班附近,因时值雨天,部队隐蔽不好被敌人发觉。次日晨,攻击部队突遭大批敌军包围,双方激战 6 小时。为免遭被敌全歼,张文偕决定率抗日武装突围,使部队脱离险境。张文偕

在掩护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7月23日,部队在崔石泉的指挥下,化悲痛为力量,终于攻下三人班,敌军被迫逃向独木桥。8月1日,游击队和联合部队回师饶河途中攻袭了五林洞伪军,击毙日本教官和伪军10余人,缴枪10余支和200余枚手榴弹。8月7日,又夜袭小佳河,击溃伪军一个连,大排队30余人被全部缴械。

1934年9月,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决定由饶河反日游击大队军需长李学福继任游击队大队长职务。饶河游击队返回爆马顶子根据地,随即动员部队深入发动群众,广泛侦察敌情。部队在稍事休整后抓紧进行必要的军事政治训练。1934年10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到吉东的省委巡视员吴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名义发出《致饶河中心县委的信》。信中明确指出饶河中心县委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存在的认识上和政策上“左”的错误,认清目前阶段东北党组织面临的政治任务和应采取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出,要“动员党的和群众组织的一切力量,联合一切反日队伍,巩固和扩大反日统一战线,以击败日满匪军的‘讨伐’”。为此,要巩固各地已经建立的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组织,“这个总指挥部不能叫做上层勾结,它正是目前统一战线的机关”,要在义勇军和山林队中实施上层和下层统一战线策略;要开展对伪军的工作,促使其哗变,参加抗日游击队;要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组建反日会,提倡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要在政治上巩固抗日游击队,改善游击队员的物质生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入冬后,将年轻的游击队员专门组成滑雪队,准备迎击敌人按惯例举行的冬季“讨伐”,以便利用天时和有利地形袭击敌人。部队经过紧张训练,准备随时打退敌人新的进攻。

1934年11月,日伪军经过准备,发动了冬季“大讨伐”,企图乘大雪封山,游击队活动不便之机,一举消灭饶河抗日武装。此次进攻,敌“讨伐队”以伪军为主,日军为辅,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以饶河游

击根据地爆马顶子为主要进攻目标。当时,饶河游击队分别守卫爆马顶子、大叶子沟、十八垸地、大佳河等抗日根据地和重要山口。当敌军来犯时,李学福指挥70余名战士主动出击,阻敌前进,但因敌众我寡,爆马顶子仍为敌军占领。此时,守卫其它根据地的饶河游击队便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军周旋。手枪队队长金东天指挥60多名游击队员采取游击队擅长的夜袭扰敌战术,使进攻大叶子沟的敌军不得安宁,疲劳不堪陷于混乱。饶河游击大队政委李斗文^①率30余名战士在十八垸地截击来犯之敌,歼灭伪军25人。守卫大佳河根据地、由杨官俊指挥的30余游击队员,截击来犯之敌,缴获10支步枪。敌人费时一个半月,妄图消灭饶河游击队的阴谋最终落空,除占领爆马顶子几处空空的营舍外,一无所获。

饶河游击大队通过这一时期的斗争,战斗力大为提高,同时还团结了更多的义勇军、山林队,如接纳“访贤”、“安邦”等义勇军队伍为游击队基本队,被编为第三连。游击队发展至200余人,饶河游击大队成为饶河、虎林地区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七、珠河游击队诞生,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建立,哈东支队编成

珠河县(今尚志市)位于哈尔滨东南部,东临苇河县(后并入珠河县),西与阿城相连,南靠五常县,北部与宾县、延寿、方正县接壤。珠河县地处山岳地带,地势东高西低,耸立于本县东部的张广才岭山脉横贯南北,有无数起伏的丘陵和茂密的森林。全县较长的河流是蚂蚁河及其支流东亮珠河。中东铁路的东部线横穿而过,把全县分成

^① 李斗文(1905—1935),朝鲜族,北京宏达学校毕业,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4年秋回国。历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9月,在战斗中牺牲。

道南和道北两部分,县内还有3条森林铁路和通向各区的公路。珠河地区的自然条件,为九一八后我党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

珠河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工作较早的地方。1930年8月,在中共北满特委领导下,珠河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9月,珠河支部改为珠河特支。10月,在珠河特支的基础上建立了珠河县委。1932年10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建立了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县委委员5人,候补委员2人,书记金凤祥、组织部部长金钟台、宣传部部长池活、军事委员金策^①、妇女委员李秋岳。全县共有党员47名,县委机关设在朝鲜族居住较集中的蚂蚁河东。

九一八事变后,珠河各族群众纷纷自发地组织起反日武装,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红枪会、义勇军、山林队、大刀会、民团等群众性反日武装遍地兴起,其中红枪会的发展最为广泛。红枪会是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以农民为主的自发抗日武装,所使用的武器大多是扎枪、大刀之类,且在枪头上饰以红布,故称红枪会。红枪会会员平时除参加农事活动外,还另择时间练习武艺,有敌情时到指定地点集合,接受战斗任务。红枪会纪律严明,会员有统一的衣着。珠河人民自发的反日武装斗争兴起不久,即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

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尽快建立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开始了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工作。珠河中心县委曾

^① 金策(1903—1951),原名金洪君,朝鲜人。1926年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7月在宁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后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秘书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常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朝鲜,曾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1951年1月病逝。

计划改造红枪会,试图在红枪会的基础上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并派人到红枪会进行了三个月的艰苦工作,但没有成功。1933年初,县委又派共产党员李福林等收编地主大排队的武装,以建立自己的抗日队伍,也没有成功。与此同时,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先后派朱新阳、邹光平、小孟(韩光)等9名党员干部到驻苇河伪军温团中进行兵运工作,准备在条件成熟时,举行兵变,夺取武装,建立游击队。

温团原是被日伪收编的东北军残部。收编以来,因日伪当局的歧视与军官的克扣,士兵经常衣食无着,军心动摇,对日伪当局十分不满。1933年3月,在党的影响下,温团中队长于洪泽和机枪连宋连长以及进步士兵120余人,于13日晨打死亲日派团长温秀峰发动武装哗变。哗变队伍很快发展到250余人,枪支齐备,弹药充足,又发展了8名新党员,建立了党支部。珠河中心县委为将这支哗变队伍改造成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特选派张连科、李启东、金策等到该队工作。这支部队的哗变在珠河、苇河一带轰动一时,影响也很大,但遗憾的是部队领导权没有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没有在队内建立士兵委员会和组织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基干队伍,指挥权落到了旧军官章上校手中。部队党组织即决定再次举行哗变,并于4月25日率领50余名官兵发动又一次兵变。但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行动仓促,兵变后队伍仍不稳固,在一些旧军官的煽动、唆使下,队内的党、团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被驱逐出队,改造伪军的工作遂告失败。与此同时,珠河中心县委还派李福林、李泰、尹二胖等到访贤队、西省队等山林队中进行哗变工作,也都没有成功。

为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于1933年6月19日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了前阶段改造红枪会、收缴大排队以及组织驻苇河伪军保卫团兵变、组建珠河工农革命游击队失败的经验教训。期间,中心县委接到了《一·二六指示信》和满洲省委的决议,

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继续开展群众抗日斗争和建立抗日游击队的信心。之后,便积极开展工作,再接再厉,派出党员、团员到一些义勇军、山林队和红枪会中去进行工作,以便在这些抗日武装内部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其中派出李启东、李根植等几名党、团员投入孙朝阳部抗日义勇军进行工作,并与在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进入该队并任参谋长的赵尚志结识,共同进行宣传教育、团结队员的工作。不久,孙朝阳队处境危机,他在日特拉拢挑拨下,欲加害赵尚志等同志。当赵尚志得到这一消息后,便与李启东、李根植、王德全等7人,于1933年10月4日夜,一起携带一挺轻机枪和11支长短枪离开这支队伍,到达珠河县中东铁路道南六道河子。珠河中心县委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派出李福林^①、朱新阳等6名党、团员加入这一队伍。中共满洲省委得到消息后,认为可以以这支队伍为基础在哈东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于是派省委军委负责人张寿箴前往珠河巡视工作。张寿箴向赵尚志等传达了《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之后,县委和张寿箴与赵尚志等共同研究了建立游击队的计划。

1933年10月10日,在珠河县铁道南的三股流,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宣告成立。队员13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治指导员、李启东任经济部长。参加游击队成立大会的有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珠河反日农民自卫队,以及当地抗日武装的代表。会上发表了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和斗争纲领,通过了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贺电。会上,游击队员庄严宣誓:“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

^① 李福林(1907—1937),原名公道珍,又名崔东范,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珠河反日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哈东游击队司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北满抗日联军依东办事处主任等职。1937年4月在战斗中牺牲。

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势必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从此,中国共产党在珠河成立了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了哈尔滨以东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珠河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对日伪军警作战,收缴反动大排队枪支。1933年12月初,罗家店一战,打退一支40余名日伪军队伍的进攻,不久又在火烧沟反击战中击溃一支100余名日伪军的进攻,击毙敌大队长等20余人。12月底,为解决游击队越冬物资和弹药的缺乏,珠河游击队北上宾县七区,在七区党的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消灭了反动地主兼保卫团长刘林祥的武装。战斗中,少年队长李根植冲锋在前,率先攻入刘林祥大院,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此战缴13支枪和1000余发子弹。珠河抗日游击战的开展,使游击区域逐步扩大,形成了以三股流为中心的中东铁路道南游击区。至1933年底,珠河游击队已发展至60余人,在珠河有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贯彻统一战线方针,中共满洲省委于1933年12月31日发出《给珠河县委及游击队同志信》。信中指出,游击队应联合一切抗日义勇军共同抗日,扩大反日统一战线,或与其他抗日队伍缔结反日作战协定,“在巩固和扩大现有游击队的基础上,把现有的游击队造成珠河一带反日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的领导者 and 组织者”^①;指出游击队尚存在不善于团结其他抗日武装共同作战的缺点。同时信中指示,游击队要采取游击战术,扩大游击区。1934年2月25日,珠河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的情况,总

^①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共珠河县委及游击队同志信》(1933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3页。

结执行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附近新游击区;坚决纠正反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召开义勇军代表会议建立联合指挥部;开展瓦解大排队的工作等。根据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决议,同年3月,珠河反日游击队联合抗日义勇军“青林”等部一同来到铁道北,在侯林乡召开了“青林”、“爱民”、“北来”、“友好”等部抗日义勇军、山林队首领会议。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所提出的不投降、不卖国,收复失地,反日到底;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一切财产和土地充作战费;保护民众利益,武装群众共同抗日,允许群众反日组织的自由等三项条件,成立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虽然这是一种初步的抗日武装联合的形式,但它说明珠河反日游击队已经成为珠河、宾县、延寿一带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

1934年4月初,珠河反日游击队接连攻下老虎窝、新开道、古扎子3处伪警察分驻所,共缴获40余支步枪。4月下旬,又攻占秋皮囤,消灭了那里的反动大排武装。在秋皮囤,赵尚志以反日联合军总司令的名义召开了义勇军首领会议,决定游击队与“北来”等抗日义勇军联合作战,进攻延寿二区的黑龙宫(今属尚志县)。黑龙宫地势险要,是日伪设在中东路道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当地有名的炮手黄英的亲日民团和一支大排队据守,成为珠河反日游击队在道北发展的障碍。战斗开始后,游击队从清沟子后山进攻,“北来”等从侧面攻击。珠河反日游击队的李根植、朴德山等首先冲破敌人的火力网冲入敌阵;联合部队也奋勇冲锋,打得敌人狼狈逃窜,“黄炮”民团、延寿伪警察队逃跑,赵维甲大排队投降。5月初,珠河游击队又攻下北围,占领小街,在道北建立了以侯林乡、秋皮囤、黑龙宫为中心的新游击区。此时,珠河游击队在战斗中已成长为有5个中队130余人的部队,影响进一步扩大。附近几支山林队“白龙”、“铁军”、“双胜”等

向游击队靠拢。一度与游击队相对立的“孙朝阳”队之一部“容易”也前来表示和解。同时,败逃的“黄炮”民团和延寿伪警察队朱万金一部也慑于游击队的威力前来表示投诚。珠河反日游击队当即召集大会表示欢迎他们一同参加联合军总司令部,共同抗日。

之后,赵尚志率领500余名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所属部队进军宾县七区,准备围攻宾县县城宾州。

宾州是哈东重镇,距哈尔滨60公里,是日伪当局在哈东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该镇城防坚固,周围设有炮台、暗堡,城壕之上有电网。因附近的新开道已有义勇军活动,并进至对店屯,宾县伪警务局长将在外“围剿”抗日队伍的警备大队全部调回,以增加城防力量。

伪宾县县长得知抗日联合部队将要攻城的消息,惊恐异常,即派日本参事官木谷吉弥赴哈尔滨求援,同时加强了城内的警戒。

1934年5月9日上午10时许,珠河反日游击队来到县城南杨家烧锅驻扎,但宾县伪警备队在日军指导官指挥下尾追而来。赵尚志率队在城南驼腰岭采取诱敌战术与敌人展开激战,占领北小岗有利地势,向敌人猛烈射击,毙敌10余人,并趁势追击逃敌,直至宾州城下。此时,反日联合军将县城包围,敌人据守顽抗。惊恐万分的城内守敌在一小时内7次打电话向哈尔滨求援。战斗中联合军用木炮攻城。随着一声巨响,城墙被轰毁一角。硝烟未散,游击队少年连的战士率先冲进城内,但大部队未能跟进,少年连旋即撤出。第二天上午,日军岩越师团一个大队和伪军近千人,从满家店驰援宾州。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赵尚志下令部队撤离。

宾州之战,敌人死伤70余人,游击队战死、负伤6人。“木炮打宾州,声威震敌胆”,成为在民众中流传的传奇佳话。

此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勃利县连珠岗民变、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的消息接踵传来,中共满洲省委在5月19日指示珠河中

心县委,令珠河游击队联合义勇军各部采取打击敌伪的积极行动,以示呼应。珠河游击队随即在宾县西部活动,逼近哈尔滨近郊,使日伪十分震动,并调集日伪军警进攻抗日武装。

1934年6月7日,反日联合军来到宾县七区三岔河,动员地主大户支持抗日,号召大户人家献枪、献子弹,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但由于警戒不严,汉奸告密,部队突然遭到来自珠河、宾县和哈尔滨的日军和伪警备旅700名敌人的围攻。

三岔河位于宾州镇东15公里处。联合军开进三岔河后,即分别驻在三门高家、三门柴家、三门王家等村屯。这里的几家大地主都有高墙大院,设有炮台,并配备很多枪械。联合军住的三家也不例外。战斗首先在八里岗打响,敌我交战十分激烈。敌人发炮180多发,其中院内就中五六发。由于联合部队大部稍战即退,结果赵尚志及所部被包围在王家大院。此时,敌人的大炮、机枪集中火力向王家大院射击,驻守东院的联合部队“铁军”见势不好,冲出院内撤走,东院被伪警备旅第四教导队占领。驻守在中院的赵尚志及所率骑兵队和一中队已成孤军,处境十分危险。在赵尚志的指挥下,战士们英勇抵抗,并夺回了东院。战斗中,骑兵队长李根植(朝鲜族)英勇异常,一人即击毙18名敌人。为了夺取敌人的机枪,他又冲入敌阵,胸部连中3弹,壮烈牺牲。战士们为这位英勇队长的牺牲而怒火中烧,决心为这位游击队的创始人报仇。他们继续顽强战斗,一次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此时夜幕降临,赵尚志指挥骑兵队和一中队奋勇突围。恰在此时,副大队长张寿箴率领增援部队赶到,联合军“九江”队也赶来增援。敌人遭两面夹击,终于退去。游击队脱离险境。次日敌人又来袭击,游击队和义勇军经激战,退至鞞鞞草沟。第三天敌人又来进攻,与“九江队”交火,赵尚志率队前往支援,敌人望风而逃。

“三岔河突围战”是珠河游击队建立之后所进行的一次最为激烈的战斗。此战击毙日伪军 80 余人,其中日军占一半;伤 30 余人。游击队伤亡 5 人。这次战斗打出了游击队的威风,粉碎了敌人“抗日军已被消灭”的谣言,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

经过这一时期战斗后,珠河游击队在珠、宾、延地区威名远扬。队伍经过整顿,编为 3 个大队,兵力已达 180 余人。此外,在道南还有基本队 80 余人尚待编入。

1934 年春,珠河、延寿、宾县的抗日斗争形成高潮,珠河反日游击队的实力增长,影响日益扩大。哈尔滨日伪当局悬赏 1 万元抓捕赵尚志,这更令周围许多抗日义勇军对珠河游击队和赵尚志佩服有加。此时,不但原有参加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北来”、“铁军”、“容易”、“黄炮”、“朱万金”等部要求直接编入珠河游击队,而且还有一些新近跟随游击队一同战斗的山林队,如“白龙”、“闯江南”、“压满洲”、“压东洋”等部也积极要求直接加入游击队。此外,一些地主大排和伪自卫队如宾县七区大排队长王甲三、三岔河大排队长李靖远等,慑于游击队声威也率队反正,与游击队取得联络,要求随同珠河游击队一起对敌作战。

一时间,各种武装队伍都换上了标志抗日的红袖标。在这种情势下,为了将这些成分复杂的队伍统一编制起来,纳入中国共产党和珠河游击队的有效领导之下,并予以教育和改造,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根据省委有关在抗日义勇军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扩大游击队的指示精神,决定采取以珠河反日游击队为骨干,收编自愿加入游击队的抗日义勇军的方式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为此,1934 年 6 月 28 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了党、团珠河县委扩大会议。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张寿箴、团省委特派员小孟和游击队队长赵尚志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和通过了改编抗日义勇军、山林队,

扩大游击队的原则和计划,作出建立哈东支队的决议。

1934年6月29日,召集了参加改编的各支抗日部队的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正式成立。哈东支队设司令部,由赵尚志任司令,张寿箴任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梁佐术任参谋长。下编3个总队:第一总队,总队长赵尚志兼任,政委张寿箴兼任,副总队长王甲三;第二总队,总队长黄英(黄炮队队头)、政委马宏力、副队长梁佐术兼任;第三总队,总队长曹德生(前黑龙宫保卫团团团长)、政委小孟、副队长李靖远。每个总队下编3个大队。珠河游击队原有3个大队成建制地分别编入哈东支队3个总队,以便起骨干作用,并团结改造其他新编入的义勇军。此外,还编有骑兵队、少年先锋队、教导队和迫击炮队,直属司令部。全支队共计450人。哈东支队是一支以珠河游击队为骨干与核心,收编一部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编制而成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部队。

哈东支队建立后,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将全支队分为三部分开展游击战争,拓展游击区域。赵尚志率第一总队和司令部直属部队共200余人,坚持在宾县三岔河、九千五一带活动。1934年7月初,第一总队西出满家店,该地伪军闻风而逃。随后,驻宾县伪军李文炳部约600余名前来进攻哈东支队,赵尚志率队在乾松顶子布阵迎敌,当地农民反日自卫队也自动参战。部队在夜幕掩护下向敌人展开猛烈射击。乾松顶子是一个狭长浅山沟,敌人队伍散长10余里,首尾不能相顾,且夜幕之下不知游击队之所在,竟自己互相射击。战斗经时,敌人被击溃。之后,赵尚志又于8月4日集合活动在松花江北的义勇军,在宾县新甸松花江上游10公里处,袭击了停泊在江中的日军江上警备队“广宁号”战舰,日军伤亡惨重。

第二总队一部约80余人以哈东支队路南游击大队名义被派回道南,支援先遣部队肃清扰乱游击根据地的敌伪武装。7月6日,赵尚

志派路南游击大队联合“考凤林”、“压东洋”等抗日山林队 400 余人共同进攻五常县城。战斗中,路南游击大队的队员们有如猛虎下山,率先从南门攻入城内,砍倒电线杆,割断电话线,并逼近“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及日军某部司令官佐藤的官舍门前。“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城内。但由于日伪军拼命抵抗,加之“压东洋”山林队按兵不动,致使先行攻入城内的游击队遭受较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赵尚志命令部队撤出县城。

在此期间,小孟带领第三总队和第二总队一部约 100 余人,在道北游击区筹款做军装,肃清残敌,频繁袭击敌人列车,破坏敌通讯设施。仅 1934 年 8 月份,哈东支队及其他抗日武装共袭击铁路 91 次,造成脱轨、翻车 16 次;破坏线路 41 起,破坏桥梁 31 起,破坏通讯设施 18 起,毙伤敌人 50 余人。同时,还与延寿、方正等县之反日山林队取得联络,扩展游击区。哈东游击战争不断向前发展。

1934 年夏,日伪当局提出“专打赵尚志,不打反日军”的口号,在这种挑拨诱骗下,出现了于九江、“黄炮”等脱离哈东支队的叛逃逆流。于九江本系惯匪,与珠河游击队一度联合是当时形势所迫。当赵尚志率哈东支队第一总队自宾县回师东行欲攻延寿之际,于九江趁机带队至宾南游击区乱抢乱夺,将哈东支队收编的武装队缴械,扩充自己的势力,还将哈东支队创造的道南道北游击区擅自划分给各山林队作为各自势力范围,造谣、破坏哈东支队与各抗日武装的关系,等等。为此,哈东支队立即公开发表《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揭露于九江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号召义勇军各部队坚持抗日联合,反对投降。于九江随即公然写信挑战,并首先向哈东支队开枪,导致双方在靛鞞草沟发生了武装冲突。“黄炮”队随即公开叛变。“黄炮”过去也是迫于形势与珠河游击队联合,因不满哈东支队主张对民众不抢不夺,生活艰苦,纪律严格,在哈东支队与于九江发生冲

突后已自动离开哈东支队。不久,又勾结于九江队公然破坏道北抗日游击区,宣布取消儿童团、妇女会、青年义勇军,收缴农民自卫队枪支,并带队袭击抗日根据地模范村侯林乡,被群众武装——武卫队击退。9月16日,“黄炮”队又第二次进攻并占据侯林乡,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搜捕杀害哈东支队伤病员和党、团员。于九江、“黄炮”等掀起的反叛逆流遭到哈东支队的有力回击。

这段时间,一些义勇军、山林队与游击队的关系开始疏远,有的甚至离去,其原因极其复杂,主要在于他们本来就是动摇的力量,是被抗日潮流裹胁进来的;日伪为了孤立珠河游击队,对这些队伍加紧收买拉拢;游击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予以教育;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未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哈东支队对收编队的清理整顿过急、方式简单,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这些事实教育了珠河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人,用简单收编的方式建立抗日联合部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非可靠的途径。稍后,满洲省委在《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指出:“改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人民革命军或游击队的办法之一。这种条件,即是我军在政治上和军事力量居于绝对的优势,在政治工作与编制工作方面要有有力的措施。否则不能急于改编,更不宜采用一律收编的方式。同时,对于同盟者必须慎重对待,既要予以善意又要有严肃的批评及必要的、讲究方式方法的斗争,又应适当照顾他们的基本利益,不可稍有违反共同纲领之事即行缴械,简单从事。

为了摆脱一时的困境,重新打开局面,用新的军事胜利巩固哈东支队和老游击区,开辟新区,振奋抗日群众和抗日同盟军的士气,解决部队武器装备和物资补给,1934年8月5日,哈东支队自道南向五常新区发展,首要攻击目标是五常县城北部约15公里之五常堡(今常堡乡)。该镇城防坚固,40多年来未被兵匪攻破过。城内驻有伪警

察队、商团兵和大排队共约300余人,自信有恃无恐。为麻痹敌人,哈东支队在进攻前佯称再次进攻五常县城,并以一部设伏拉滨铁路方向,阻敌之援军。8月15日夜,在赵尚志指挥下战斗打响,16日晨1时20分攻入城内,战斗之激烈程度令敌军丧胆,丢下10余具尸体和不少伤兵慌忙逃出城去。此战哈东支队姚万春大队长等3人牺牲,1人负伤。哈东支队入城后,军歌响亮,秩序井然,将日伪机关和防守设施尽行焚毁。凡属敌人物资均由没收队统一负责查收,对民众秋毫无犯。不久,敌援军和逃敌即会合反攻,哈东支队遂安全撤至牯牛河北岸。这次攻克五常堡战斗,共缴获长短枪40余支和大量子弹以及布匹、胶鞋、面粉等大量物资,显示了哈东支队的战斗力和纪律性,倍受群众称赞,军队声誉传至哈东各地。因而哈东支队在移师小山子、兰采桥等处时,不打自开,捕捉事敌的走狗90余人。支队返回四道河子,将缴获的布匹一部分为部队做冬装,一部分给当地群众,一部分送回根据地给儿童团、妇女会和地方工作人员做冬衣。当地民众立即被发动起来,不久便组织了300余人的农民自卫队和50余人的青年义勇军,保卫家乡,支援哈东支队作战。

随后,哈东支队为扩大游击区,又联合“压东洋”等义勇军向西直驱五常县八家子、康家炉,迫使大排队投降。9月25日,又攻下梨树沟。10月初,又东向小山子、威虎岭、方贤沟发展,打击伪军和破坏日本移民村。

与此同时,哈东支队一部在中东铁路东段及中东路南下支线两侧与一些抗日义勇军联合行动,频繁破坏铁路,袭击敌人军事列车,使敌人交通运输受到严重破坏。据1934年7月30日伪满《大同报》报道:7月28日8时40分一列西行列车在乌吉密附近,因线路被破坏,列车颠覆。8月30日23时,自哈尔滨南下的旅客列车在双城县五家子附近出轨,遭抗日武装进攻。

哈东支队经过在五常与珠河胜利的战斗,提高了部队的声威,壮大了队伍,拓展了游击区域,打击了日伪嚣张的气焰,冲破了由于于九江、“黄炮”叛变后在义勇军和山林队中出现的投降逆流和动摇状态,从而在政治上、军事上又呈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哈东支队为迎接更艰巨的战斗,在威虎岭又重新进行了整编。支队司令仍为赵尚志,政治部主任由小孟担任。部队缩编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等5个大队,由许亨植^①、张连科^②、姜德山、李福林、刘海涛^③等分任大队长,此外尚有政治保安队、骑兵队和少年队,全队共470余人,另有农民自卫队3000余人。支队整编后,成立了党委会,李福林任书记。党委和支队司令部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于10月12日发表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告反日抗满义勇军书》,文告指出:由于哈东支队同抗日义勇军开展反日游击战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日伪便疯狂地利用一切力量和手段“讨伐”抗日武装,使用一切办法挑拨离间哈东支队与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达到其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抗日部队的目的。文告中揭露“黄炮”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屠杀抗日民众,是适应日伪反动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文告再一次强调各种抗日力量联合对敌的重大意义。同时,哈东支队表示“公开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① 许亨植(1909—1942),又名李熙山,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宾县、汤原、珠河等地参加抗日活动,1934年后历任哈东支队大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团长、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军长、第三路军参谋长。1942年8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张连科(?—1938),1933年10月参加珠河反日游击队,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团长、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三师长等职。1938年牺牲。

^③ 刘海涛(1907—1941),原名刘保仁,山东东阿人。九一八事变后,带队加入孙朝阳队抗日,随后参加珠河反日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哈东支队骑兵队指导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团政委、团长、第一师师长等职。1935年被派赴苏。回国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司令员、鲁中军区司令员。1941年11月在山东省沂水战斗中牺牲。

重申在不投降、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保护人民利益等三项条件下,与任何不愿当亡国奴的抗日武装订立临时反日军事协定,或结成反日同盟。文告中呼吁各抗日部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们应当分别清楚”^①,表明哈东支队对于只要一秒钟还是反日的,都要与他们携手,一秒钟后向敌人投降,就把他们当做民众的敌人这一鲜明的政治态度。

1934年9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在《给珠河县委及游击队的信》中,对哈东支队这一时期的斗争给予了充分评价。认为哈东地区最近这一时期游击战争获得了许多新的成绩,部队扩大,游击区域扩展3倍,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扩大,使哈东支队为完成创造人民革命军,粉碎敌人的一切“讨伐”,巩固和扩大游击区,建立人民政府等中心任务,获得了更顺利的条件和强有力的基础。

八、汤原游击队重建,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再燃松花江下游游击战火

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地区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工作,历经挫折。1933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往汤原的代表冯仲云自汤原长途跋涉返回省委汇报工作,寻求省委指示。在省委接到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并经初步研究后,中共满洲省委于5月3日发出了《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建立民众政府给汤原中心县委的指示信》。信中检查了省委贯彻“北方会议”错误方针给东北和汤原抗日斗争所造成的损失,指示汤原党组织必须将创建、发展共产党独立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并使其“成为聚集与联合一切反日力量的组织

^① 《东北反日游击队告反日抗“满”群众书》(1934年10月1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193页。

者”,作为一切任务中的重要环节;将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作为运用反日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当前最中心的任务。

1933年7月末,中共满洲省委派出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吉密(胡世杰)作为省委代表,同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王亚堂一起,携带省委7月25日起草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策略与任务问题”给县委的新指示信到达汤原中心县委,再次传达《一·二六指示信》和省委决议精神。8月2日,汤原中心县委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信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分析了过去创建游击队的工作多次受挫的原因,总结了经验教训。县委负责人从中对关门主义的危害以及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新方针有了新的认识。会议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改组了汤原中心县委,选出王亚堂任书记的新一届汤原中心县委员会。会后,县委同仍在“青山”、“占中央”等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戴鸿宾、宋瀛洲、徐光海^①等人分别取得联系,指示他们在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中积极开展工作。

1933年8月上旬,在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协助下,汤原地区的几支抗日武装合组成立了“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反日义勇军设指挥部,下设政治部、参谋部和秘书处。军事会议推选“青山”为总指挥,张裕堂为参谋长,张文藻(共产党员)为政治部主任,宋瀛洲(共产党员)为秘书长。全军共计550人。8月14日,这支部队又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共1400余人进攻汤原县城。“青山”、“占中央”两队首先攻入城内,但遭遇日伪军的顽抗。因后续部队进攻迟缓,未能攻克伪县公署大院,不得不退出县城。之后,各部义勇军又分散活动,各行

^① 徐光海(1907—1938),又名徐炳仁,朝鲜族。九一八事变前参加农民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侵略军侵占汤原后,参加抗日义勇军进行争取工作,1934年10月率义勇军一部参加汤原反日游击总队。1937年2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在战斗中牺牲。

其是,至同年末,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已徒具虚名,不宣而散了。

1933年10月,前汤原中心县委书记裴治云等12人被日本宪兵逮捕杀害,县委书记王亚堂恐惧逃跑,县委机关仅有县军委负责人夏云杰一人坚持工作。夏云杰立即主动承担起县委领导工作,汲取教训,经过一段艰苦斗争,使汤原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组织得以逐渐恢复,并以隐蔽在鹤立岗北七号屯的共产党员和前游击队员作为基本力量,再次进行组建由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的工作。

1933年11月,夏云杰派团县委书记于永顺和党员徐振江携带仅有的2支手枪,利用社会关系混进鹤岗东部的黄花岗屯伪自卫团团部,通过里应外合将伪自卫团全部俘虏和缴械,获得14支枪。夏云杰立即以这些枪支在七号屯建立起一支新的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由徐振江任代理队长。同年末,戴鸿宾、宋瀛洲等从各义勇军中相继退出,并被派到游击队工作。这时,游击队编成一个中队,由宋瀛洲任队长、戴鸿宾任副队长、张兴德任政治部主任、李仁根任参谋长。分编为两个小队,共计50人,内有女队员7人。游击队根据夏云杰的指示,在格节河(今格金河)三号木营建立了后方基地,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夏云杰派宋瀛洲和裴敬天到格节河上游杨把头碓营进行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了格节河金矿经理及其领导的护矿队在给养、药品等物资上给予游击队的支持。汤原反日游击队成立后,在汤原地区机动灵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队伍迅速扩大。

1934年3月,汤原反日游击队自汤原向毗邻的萝北县城凤翔镇进军。此时,驻该镇伪军已前往肇兴,凤翔镇内防守空虚。3月22日,中共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带领几名游击队员以佯装打架斗殴、找伪自卫团团长评理为由,混入凤翔镇伪自卫团部,将伪自卫团全部俘虏,缴得14支枪。接着,又陆续俘虏了前来伪自卫团开会的地方势

力代表,缴长、短枪 13 支,最后胜利返回汤原县游击队驻地七号屯。3 月 25 日,伪军涂旅一个骑兵连跟踪而至,占据附近制高点向游击队阵地发起攻击。游击队对涂旅的跟踪早有所料,发现敌情后沉着地进入密林深处,瞄准来犯之敌猛烈射击。毙敌 5 人,伪军退走。这是汤原游击队重建以来首次取得胜利的战斗,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提高了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威望。不久,汤原游击队抵达格节河三号木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所在地。伪军涂旅一个连又一次来犯。游击队利用进入三号木营必经之葫芦脖子这一咽喉地带的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击毙伪军 10 余人,余部狼狈逃走。

中共满洲省委一直关注汤原中心县委领导的汤原地区的抗日斗争,认为这里是除南满、东满以外建立红军游击队较早的地区,也是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最有希望的地方之一。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于 1934 年 5 月 19 日发出《关于开展下江一带抗日武装斗争及目前党的任务给汤原县委及游击队全体同志信》。信中指出:为了把赤色游击队建设成“下江一带反日反‘满’力量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首先必须坚决打击党内和游击队内对于反日民族革命战争没有决心、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重申《一·二六指示信》精神,“要在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基础上,去团结一切反日反满的力量。首先是团结那些与我们关系较好的反日武装力量。”另外,信中还根据当时各部义勇军的具体情况指出:“特别要开展反投降运动”^①。这些指示,对于汤原游击队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在组织上,中共满洲省委于 1934 年 4、5 月间调夏云杰负责游击队的整顿建设工作。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展下江一带抗日武装斗争及目前党的组织任务给汤原县委及游击队全体同志信》(1934 年 5 月 19 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8,第 149—150 页。

1934年5月,夏云杰到达游击队后,为锻炼队伍,扩大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亲自率游击队深入太平川平原开展活动。6月15日,夏云杰率领游击队从三面包围并攻打太平川伪警察分驻所,使敌人惊恐不安,不敢出击。6月19日,游击队西去攻下黑金河金矿,缴获一批物资。6月21日,夏云杰率领游击队攻打了太平川西大岗反动地主盘踞的“连环窑”^①。他们先克黑金河通向太平川的敌据点姜家屯,后破格节河通向太平川的二道岗。在进攻二道岗的战斗中,夏云杰头部负伤不下火线,坚持指挥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战士们一鼓作气攻下了伪自卫团据守的炮台,缴获长短枪10余支。随后,又联合冯治纲^②所部“文武队”攻破了太平川长发屯地主田玉清大院。游击队这些战斗的胜利,使太平川的反日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汤原县原教育局局长刘显(刘铁石)热情投入抗日宣传,并为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还把家中的5支枪全部捐献给了“文武队”;有民族气节的地主黄有、贾有,献出了家中的全部钱财,并自带枪马参加了汤原游击队。此时,游击队经过多次战斗的锻炼,战斗力提高,人数增加,由原来的两个小队扩编为3个小队。

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汤原反日游击队的领导力量,提高游击队领导人的政治与军事领导水平,于1934年7月调夏云杰到哈尔滨汇报工作并进行短期集训,学习中央的有关指示,总结游击队建设中的经验教训。集训结束后,夏云杰被任命为汤原反日游击队政委。1934年8月4日,中共满洲省委又向汤原游击队发出了《给下江反日

^① 东北农村相邻的地主大院,筑有炮台进行“联防”,称为“连环窑”。

^② 冯治纲(1908—1940),吉林怀德人。九一八事变后在格金河金矿参加护矿队抗日,不久组织“文武队”继续抗日活动。1935年9月率“文武队”加入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四中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抗联第三路军第二支队队长、龙北指挥部指挥等职。1942年在战斗中牺牲。

游击队政治委员及全体同志信》。信中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批评了汤原游击队的同志们此前对反日民族革命战争新阶段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放弃群众工作以及没有与许多反日义勇军部队建立联系并结成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错误。该信指出,目前“反日游击队的总任务,是把游击队造成下江一带反日游击战争及反日广大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①信中还着重指出:“赤色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积极游击战争中来创造游击区。”^②该信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还特别提出了创造游击区的条件,即解除地方上敌人的一切武装来武装广大民众;把抗捐、抗税等斗争提高到反日游击战争阶段;武装广大民众,保护群众利益,组织广大群众的各种反日团体,特别是农民委员会。

夏云杰从哈尔滨回到汤原后,召开了全体游击队员大会,传达了省委1934年8月4日信的精神,并宣布汤原反日游击队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戴鸿宾为总队长、李仁根为参谋长,下辖4个队。全队共150余人。

会后,夏云杰根据省委的指示,为加强游击队自身建设,努力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第一,贯彻执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暂行条例草案》,把游击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确定政治委员为游击队中党的代表,纠正了部队内的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第二,执行主动进攻策略,扩大反日游击区,决定夏云杰和戴鸿宾分别率队向亮子河、格节河、黑金河等金矿和吉兴沟、大眼沟、仙马沟、佛爷砬子等村屯进行游击活动。游击队所到之处,伪警察、特务和反动地主闻风而

^① 《给下江反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及全体同志信》(1934年8月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07页。

^② 《给下江反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及全体同志信》(1934年8月4日),第110页。

逃；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对游击队表示热烈欢迎，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游击队。第三，游击队认真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了同义勇军的团结。8月末，游击总队与“文武队”联合进攻了几个反动地主大院之后，又与“青山”、“中侠”几支山林队联合解除了黑金河金矿附近的一个伪自卫团的武装。

1934年9月初，游击队打开了太平川的二道岗。9月10日，游击总队再次联合冯治纲的“文武队”义勇军分别解除了同抗日武装敌对的太平川南部长发屯和姜家屯的反动地主武装，共缴获100余支枪和洋炮（土枪）。一时间，附近表示同情抗日的中小地主富户纷纷献枪给游击队。同时，汤原中心县委与游击总队还进一步开展了瓦解敌军和统一战线工作。10月，为推动太平川地区抗日斗争的进一步开展，县委决定争取此地有较大影响的伪自卫团长张传福^①参加抗日斗争。先是通过地下党员和抗日救国会与张传福的私人关系，对他进行教育与争取，然后由游击队长戴鸿宾约他谈话，当面晓以民族大义。张传福决心弃暗投明，并约定时间组织太平川伪自卫团反正，由游击队负责接应。11月9日晚，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戴鸿宾率领接应张传福自卫团的反正，一路由夏云杰率领伏击敌人的追击，结果张传福率自卫团反正成功。翌日，在格节河，汤原反日游击队将该部单独编为一个中队，任命张传福为中队长。

太平川伪自卫团反正抗日事件，使日伪当局为之震动，不久即从佳木斯等地调集日军一部和伪军涂旅第三十八、第三十五团，自太平川至格节河金矿一线向汤原游击队进行“讨伐”。游击队避实击虚迅速撤入山区，利用狭谷地形巧妙打击敌人。此战日军伤亡30余人，伪

^① 张传福(1902—1938)，吉林公主岭人。曾任汤原大平川伪自卫团长。1934年冬起义加入汤原游击队，任中队长。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三团团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二师师长等职。1938年8月在战斗中受重伤后牺牲。

军畏缩不前,“讨伐”失败。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在战斗中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松花江下游江北建立的又一支抗日劲旅。

此时,经常与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一起联合作战的部队,除冯治纲的“文武队”外,还有李华堂^①为首的“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该队是李杜吉林自卫军的余部,共有3个营,约400人。该部原在依兰南部刁翎、三道通一带活动,1933年末来到汤旺河沟里。中共汤原中心县委认为这支部队以旧吉林军为骨干,仍坚持抗日立场,应当进行争取团结,共同抗日。县委经李华堂同意,选派3名干部到自卫军支队开展工作。李华堂因义勇军大部队业已瓦解,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却日益成长,考虑到自己所率部队将来有困难时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因此该部在汤原活动时与汤原反日游击队关系较为密切,能够联合对敌作战。1934年⁽¹⁾以来,李华堂支队在日伪军不断打击之下,因部队缺少坚强的领导,队伍出现溃散现象。1934年10月仅剩100余人枪,部队在汤旺河沟里已站不住脚,只得返回松花江江南继续活动。

九、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与民众救国军的建立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向中国东北移民计划,1933年2月,第一批武装移民转到桦川县孟家岗永丰镇(今属桦南县)定居,成立“弥荣村”移民团,计492户,共强占约1万公顷已耕地和可耕地。同年7月,第二批日本武装移民到达依兰县七虎力河右岸,再迁土龙山附近

^① 李华堂(1886—1946),河北滦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自卫军,任该军混成旅第二支队支队长,后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任副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7月在方正县大罗勒密投敌,充任密探。抗日战争胜利后,重组土匪队伍,被国民党委以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司令。1946年在刁翎附近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死于押解途中。

湖南营,成立“千振村”移民团,共455户,亦强占大量民地。这些武装移民所到之处,骚扰中国农民,强迫原住农民离开久居的家园和耕种的农田,强占农民土地、财物、耕畜和农具,鸠占鹊巢,不仅一般贫苦农民身受其害,就是地主、富农也不能幸免。日本关东军拟在依兰县和勃利县征用土地,分别占该县已耕地和可耕地的75%和97%。所谓“收买”价格,不论熟地和荒地一律1元,只相当于熟地平均市价的1.25%和荒地平均地价的3.3%,无异于公开掠夺。农民将日本武装移民称为“屯匪”。广大农民除了反抗,已别无生路。

1934年2月,勃利县城西北部连珠岗首先爆发了反抗日伪暴政的斗争。当时,日本计划修建的图们经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从这一带通过,日伪官吏强迫收缴地照,筑路建桥,广收苛捐杂税,强奸妇女,已经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又当春节年关,日伪军警到各户翻箱倒柜严厉收缴民间枪支,更引起群众激愤。连珠岗一带,包括上下杏树沟、大小连珠岗、大四站1000余名民众经过串连酝酿,终于在2月26日举行了反日暴动,他们当场砸毁日伪汽车数辆,并成立了暴动指挥部,组成200余人的武装队伍,准备进攻勃利县城。此举使日伪当局十分震动,遂即采用软硬兼施手段,一面收买民变上层不坚定分子,许诺退还已收缴的地照、枪支,藉以缓和民众情绪;同时,立即调集伪警察大队和县壮丁团进行武装镇压,相继枪杀60余人。结果这一民众反日暴动暂时陷于失败。

但是,反抗并未停止。勃利县连珠岗民众发生反日暴动的消息,迅速传遍周围远近的依兰、桦川、密山以至珠河各县。同样遭受日本武装移民侵害的依兰县三区土龙山(今属桦南县)一带早已愤怒至极的农村各阶层群众,揭竿而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土龙山五保甲长景振卿等在农民的拥护下积极联络农民群众,首先以当地壮丁团为骨干组建一支农民武装队伍。曾担任过吉林自卫军土龙山骑兵

旅第二团团长的五保保董兼自卫团长谢文东^①,也在农民武装的裹胁之下,与起义农民一起参加并领导这一反日暴动。

1934年3月8日,依兰县日伪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即派一连伪军骑兵进驻太平镇,并通知各保保董到太平镇听取伪县长训示。3月9日晨,各路农民武装约2000余人涌入太平镇,进入伪警察署解除20余名伪警枪支,袭击伪县长带领的伪军,击毙伪军10余人,将伪县长和骑兵连包围在一家商号大院内,并在镇西白家沟设下埋伏严阵以待,迎击援敌。

白家沟是太平镇西面的一个小村屯,离该镇只有四五公里,南靠横岱山,北对土龙山,东西是高低起伏的广阔平原。这里是通往太平镇的必经之地。

3月10日,驻依兰县主持日本武装移民事项的日军第十师团六十三联队长、大佐饭塚朝吾在伪警备司令部宋参谋长和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的陪同下,带一队日伪军警分乘5辆卡车和两辆小乘汽车直驱太平镇。10时许,当敌人的汽车驶进蔡家屯时,被暴动农民的瞭望哨发现,伏击队伍立刻做好战斗准备。这时,敌人的汽车冲上白家沟后岗并徐徐向下滑行,但半路发现了路障。敌人的汽车刚刚在路障前停住,埋伏在田家大院的暴动队伍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刹时间,伏兵四起,密集的仇恨子弹射向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驻扎在太平镇内及其附近的暴动农民听到枪声,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在暴动农民的猛烈冲杀中,日伪军只有

^① 谢文东(1887—1946),辽宁宽甸人。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后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1935年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组成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军事委员长。1936年9月任东北抗联第八军军长。1939年3月率残部投敌。1945年8月组织土匪队伍,被国民党委任为第十五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1月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公审处决。

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恼羞成怒的饭塚指挥敌军进行顽抗,被暴动农民乱枪打死。整个战斗仅用1个小时。此战击毙日军大佐饭塚、少尉铃木以下17人,伪警察大队长盖文义被击毙,另有26名伪警被俘虏,共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几十支。

土龙山农民暴动是一次震动中外的反日壮举,是对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导演的傀儡溥仪称帝丑剧的当头棒喝,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各地农民的反日斗争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在政治和军事上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4年3月12日,土龙山农民武装撤至半截河子整编,宣布起义,部队统称为东北民众救国军,编为6个大队,号称2000余人,推举谢文东为司令,景振卿为前敌总指挥。之后部队转移至大八浪活动。

这时,九里六汉奸保董王喜信将民众救国军驻扎九里六的消息报告了驻湖南营日军。与此同时,当地老百姓也将汉奸告密的消息送给了民众救国军。当晚,民众救国军总部决定派景龙潭中队前往九里六阻击来犯之敌。

九里六是距依兰县城90公里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与勃利县毗邻,全屯几十户人家。

1934年3月19日,日军得信后,指挥官平岗立即带领日军部队乘坐57辆汽车从湖南营出发,直奔九里六。担任阻击任务的景龙潭中队这时已经来到这里,选择保甲所、孙兴元小铺、石家店3个较为坚固的院套作为阻击阵地。中午时分,瞭望哨报告:日军汽车大队正从屯子的西南方疾驰而来。敌人不知屯内有埋伏,长驱直入九里六。当敌人的汽车驶进第一道防线时,埋伏在院套内的民众救国军和村内的自卫团以及村民,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射击。顿时,日军被截成数段,尸横遍地。日军知道中了埋伏,旋即抢占制高点向民众救国军还击。战斗十分激烈。敌人炮击和冲锋轮番进行,但始

终未能前进一步。天黑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但却封锁了民众救国军的出路。民众救国军几次突围都没成功。夜间,屯内群众给民众救国军送来干粮,运来石头,帮助堆砌倒塌的院墙。孙兴元小铺的老板还把埋在地下的2000发子弹送给民众救国军。夜间10时许,民众救国军在老百姓的掩护下,终于突出重围。此战共击毁日军汽车17辆,毙伤日军大尉北川、大尉北条、大尉小泉等以下近百人。民众救国军中队长景龙潭负重伤,28名队员牺牲。

九里六战斗后,民众救国军回师土龙山。1934年4月10日,民众救国军北上围攻孟家岗日本“弥荣村”武装移民团。4月23日,又联合一些抗日山林队等攻克驼腰子金矿,消灭日伪军6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和物资。5月1日,这支农民武装进攻湖南营日本“千振村”武装移民团,战斗中,前敌总指挥景振卿牺牲。5月下旬,在日伪实施重兵围攻和分化之下,谢文东率部分队伍东去虎林,企图寻求苏联援助,未果。后经饶河游击队队长张文偕等劝告,要其丢掉幻想,坚持战斗,谢文东始于1934年7月底重返土龙山,部队却减员至300余人。此时,分散在土龙山的农民武装在日伪军警的“讨伐”下,业已溃散。10月12日,民众救国军在桦木岗被日军第三师团阿久津部围攻,损失严重,然后向牡丹江东岸深山转移,途中又遭日军小柴部袭击。谢文东仅率10余名亲信进入勃利县吉兴河深山中,民众救国军的斗争遭受严重挫折。

在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中,一直活动在桦川、依兰地区的抗日山林队“明山”队,也积极呼应土龙山农民暴动并参加了暴动队伍。“明山”队是1933年6月桦川县驼腰子(今属桦南县)金矿工人反日暴动

中产生的一支抗日队伍。领导人祁致中^①，队名“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号“明山”。这支队伍以梨树沟为根据地，在附近给日伪军警以不断的打击，且从不损害群众利益，因而在矿工和农民中享有很高威望。

1933年7月，祁致中率队在距太平镇70公里的杨马家店公路东侧伏击了日军7辆汽车，击毙日军14人，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其它军用物资。同年8月间，祁致中又率队在范家店北截击了运送黄金的5辆马车，击毙伪军五、六人。1934年春，当得知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消息后，祁致中立即带队前来助战，编入民众救国军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民众救国军白家沟伏击战中，祁致中率队据守横岱山，击毙日军骑兵30余人；在九里六伏击战中，祁致中率队配合景龙潭中队狠狠打击了敌人。祁致中还率队参加了攻取驼腰子金矿的战斗，并负责攻打驼腰子西门的王八脖子炮台，歼敌60余人。在攻击湖南营日本移民团“千振村”战斗中，祁致中带领“明山队”和红枪会、大刀会共500余人，很快攻破东门，冲入镇内，为其他各部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谢文东带队东去虎林时，祁致中仍率队坚持在公心集、横岱山、二道河子、蚂蚁浪与日军周旋。1934年秋，抗日山林队“占中央”百余人加入“明山”队，部队扩大。不久，“明山”队联合大刀会再次攻击孟家岗日本武装移民团“弥荣村”，缴获一批枪支。此时，该队已壮大至400余人。

到1934年10月，历时7个月的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及在暴动中

^① 祁致中(1913—1939)，原名祁宝堂，山东曹县人。桦川县驼腰子金矿工人。1933年6月，率领金矿工人举行反日起义，组建东北山林义勇军，报号明山。后参加土龙山农民暴动队伍。1935年秋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方(正)依(兰)游击团。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军长。1937年冬，去苏联寻求援助被扣押。1939年7月获释，返回东北抗日战场，不久被错杀。已平反。

建立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由于领导人谢文东等在政治上缺乏明确的抗日纲领,在军事上采取消极退守的方针,在日伪当局分化瓦解和频繁追击下,遭到暂时的失败。

十、《二月指示信》及其影响

1933年5月之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积极贯彻《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反日统一战线总的方针政策,联合东北各地各种抗日武装共同抗日,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越战越强。1934年1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作为东北代表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他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并口头向中央领导汇报了东北情况。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报告和何成湘的汇报,中共中央于1934年2月22日发出了《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以下简称《二月指示信》)。该信一方面对东北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后,在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成绩给予了积极评价,并重申中央的《一·二六指示信》作为“一般的总方针,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强调要加强创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军,使之成为一切反日队伍的中心力量;并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日程上来”。同时,鉴于东北的客观形势,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在组织建设上,“首先重要的是建立起强健的和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的地方党委员会。”^①这些指示,是符合东北实际情况的,对东北的工作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但是另一方面,该信却把《一·二六指示信》中某些“左”的内容

^①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8—139页。

加以肯定、重申,并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任务要求。如信中批评中共满洲省委,在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上“作了右倾曲解的错误”,“只是上层联合,放弃艰苦的下层统一战线的群众工作”,脱离实际地强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信中批评磐石人民革命军联合宋司令、毛团建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是“上层勾结代替了下层统一战线”;该信还延续了《一·二六指示信》关于东北党组织应“把反日游击运动提到土地革命阶段”的要求^①。所有这些“左”的错误要求和不恰当的批评,表明《二月指示信》仍然未能就处理上层统一战线和下层统一战线的关系提出正确的主张,仍然只是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这对于当时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1934年5月,何成湘返回哈尔滨,向省委代理书记马良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时值共青团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省委常委只有何成湘和马良二人;而马良到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不久,对于过去省委纠正“北方会议”“左”的错误和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的情况缺乏深入地了解。而且,不久,马良因向中共代表团报告党团组织破坏情况赴苏,省委常委只剩何成湘一人,加之各地反“讨伐”战争形势严峻,无法开会。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只能尽快把《二月指示信》原封不动地传送到各地党委及人民革命军和游击队,并写信要求立即贯彻执行。

东北各地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收到和贯彻《二月指示信》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所受到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在南满,1934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二月指示信》后,于5

^①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134页。

月通知南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杨靖宇到哈尔滨。省委告知杨靖宇已被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表明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省委传达了中央在《二月指示信》中对南满有关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批评。指出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仅属于“联合军的上层统一指挥机关”,却忽视了下层统一战线这一党的基本策略。省委要求“依照中央指示,实行上层联合,建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就只有那种愿意接受我们反日作战纲领的部队,而我们在这部队中有了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能和有效。”^①并要求,为贯彻党的下层统一战线方针,必须运用一切方法,动员党团、反日会,在反日义勇军下层士兵中进行艰苦的争取工作,包括在士兵中建立公开的反日会、士兵代表会,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甚至要求“要尽可能的经过士兵代表会来选举指挥机关,尽一切力量在士兵群众中发展和巩固政治的组织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的上述指示,实际上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由于当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反日会员数量较少,人民革命军数量在抗日武装中也不占优势,如果按照上述要求去做,在众多义勇军队伍中先做好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作,再建立上层的抗日联合军司令部,实际上是难以实现的。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上述指示,虽然传达到南满,但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面临反“讨伐”战争的严峻形势,战事频繁,磐石中心县委、海龙中心县委和人民革命军独立师部队被战火隔离在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南满人民革命军存在的错误及日前的战斗任务给人民革命军政委、政治部及全体党员信》(1934年5月1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第114页。

辉发江南北,联系困难,无法深入研究和集中贯彻中共中央的《二月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1934年11月,南满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南满党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经验,根据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提出了在“正确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上,把一切抗日反满的力量团结起来,冲破敌人的第二期‘讨伐’,创造临时人民革命政权与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使南满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这一指示信还是在南满地区少数干部的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

东满在1934年7月13日收到《二月指示信》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五中全会讨论提纲等一批文件。但当时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牺牲,由王中山任代理书记。因开展反“讨伐”战争,特委委员分散各地,无法开会。又由于王中山文化程度较低,对中央和省委来的文件因无法解读而堆放在那里,没有向下传达贯彻。8月15日特委向省委的报告中,在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说“山林队方面已经从下层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了上层统一战线。解除山林队‘中国队’的武装是经调查确实要投敌,因此解除了其武装。”又说,“特委书记王同志和常委同志政治水平很低,知识方面也很低,对东满总路线也不了解,省委来文件虽然很好,可是讨论也不过当时罢了。因此真苦闷啊!”希望省委“急速派来一个总领导的东满干部,不然东满的工作发展上有极大的损害。希望千万派人”。^①同年10月底,满洲省委派特派员到东满。在其领导下,东满人民革命军独立师作出了关于收缴反日山林队枪械的三项规定,根据这一规定缴了一些山林队的枪械,使东满的抗日斗争受到了不良影响。

^① 《中共东满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34年8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0,第175页。

在吉东地区,1934年5月9日召开会议贯彻省委指示,对统一战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做出安排。但是,会后不久,吉东局机关被敌人破坏,书记孙广英逃跑,因而未能把工作部署传达到各县和抗日部队。省委撤消吉东局后,7月10日,省委给宁安县委写信,批评周保中成立的同盟军办事处是“上层的空架子,是十足上层勾结的模型”^①。但是当时由于反“讨伐”战争形势很紧,又接连发生了周保中受伤养病,同盟军内部一、三连分裂去东满,工农义务队内部出现重大叛变等事件。县委和同盟军领导忙于处理这些紧急问题,未能开会研究中央《二月指示信》和省委7月10日的指示信。直到12月10日宁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贯彻中央《二月指示信》和省委指示信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同盟军办事处是不是上层勾结,要不要取消的问题,出现不同意见,周保中坚决反对取消同盟军办事处,因此决定待上级派人来后再作处理。不久省委吉东巡视员吴平来到宁安。12月20日,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吴平充分肯定了同盟军办事处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并于1935年1月与周保中会见,共同研究了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和建立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问题。但《二月指示信》和省委的错误指示,一度使县委领导怕犯“上层勾结”的错误,不敢与义勇军上层接触,影响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在密山,中共满洲省委于1934年7月6日发出了《给密山县委和勃利区委的信》。信中批评密山县委在组织民众暴动中“投降地主豪绅,作地主豪绅的尾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又批评李延禄准备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是“没有进行下层群众工作,只有与上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巩固扩大游击队,组织反日反满的群众斗争等问题给宁安县委的信》(1934年7月1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51、53页。

层领袖作可耻的勾结”。^① 密山县委于8月17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省委的指示信,准备纠正工作中“上层勾结”的错误。同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平来到密山了解情况后,在给中共满洲省委的信中说,密山收到了中央指示和五中全会文件,但“书记都没有看,县委也没有讨论,谈不上传达到下层同志中去了”^②后来在吴平的指导下,密山县委召开3次县委会议,总结过去工作,纠正了县委和游击队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游击队加入同盟军,县委派干部加强了同盟军的领导,正式成立了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

在饶河,尚未收到《二月指示信》,就于1934年的10月10日收到了吴平以吉东局名义写给饶河中心县委的信。县委根据这一指示信的精神进一步贯彻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

在北满的珠河和汤原,中共满洲省委于1934年6月30日给珠河中心县委发信,批评了县委和游击队“以可耻的上层勾结代替下层统一战线——各义勇军部队中没有任何下层群众工作”。同时也批评了“关门主义非常浓厚”的错误。对这种批评,县委和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存在不同认识,因此常常引起争论。赵尚志认为这种错误批评是巡视员和县委没有正确地反映珠河游击队的真实情况所致,故而不接受批评,仍按实际情况,自主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后来省委派省委代表刘焜帮助解决争议问题。他支持了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赵尚志的正确主张,使争议得以解决。

在汤原,中共满洲省委于1934年5月19日给汤原县委和游击队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组织和领导反日反满的武装暴动,巩固扩大赤色游击区等问题给密山县委及勃利区委的信》(1934年7月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39、43页。

^② 《吴平给陈亚的信》(1934年12月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353页。

全体同志写信,主要是让他们克服对抗日游击战争悲观失望、缺乏信心的右倾思想,把赤色游击队发展成下江一带反日的中心力量。为此要求“团聚一切反日反满的力量,——要在统一战线中,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团结一切反日力量。首先是团结那些与我们关系较好的反日武装力量。并要求牢记下层统一战线是我们的基础”,不要“一味上层勾结,尾巴主义”。8月4日,省委给下江反日游击队政治委员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就批评“上层勾结代替了下层统一战线”,许多义勇军部队里没有下层群众工作,这是关门主义的错误。到8月15日省委给汤原县委的指示信中,没有批评什么“上层勾结”的错误。

中央《二月指示信》对各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忽视下层工作,只搞上层勾结”的错误的种种批评,在各地党和游击队领导人中,虽引起一些不同的认识,但各地抗日战场上的主要领导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对其错误的批评进行了抵制,他们根据所处地区的实际情况处理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问题。

第三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 反“讨伐”战争新形势

一、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反“讨伐”斗争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自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经过1933年夏至1934年秋一年多的英勇战斗,逐步成长壮大,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呈现了新的面貌。

此时,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第二军独立师,东北反日游击队哈

东支队、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绥宁反日同盟军和汤原反日游击总队、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等多支抗日部队。据不完全统计,这些部队总人数约达3000余人。同时,在各地有组织的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等群众抗日武装还有5000余人。随着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入贯彻,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与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在联合作战中不断发展,抗日武装的联合部队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和绥宁反日同盟军进一步巩固;哈东支队也收编了不少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共同作战,汤原、饶河反日游击队的周围也都团结了许多抗日同盟者。东北各地区各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南满、东满和哈东地区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建立了几个地方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或司令部。与此同时,在东北还形成了南满、东满、哈东、绥宁、汤原、密勃、虎饶等大小7个抗日游击区和若干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反日游击队已经成为东北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及其所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对日伪统治形成严重威胁。对此,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承认,自1934年3月伪满溥仪称帝后,伴随日伪军“肃清工作”的逐步进行,呈现了抗日武装日趋“没落”与土匪武装显著减少的形势;但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有很大的扩张,由其所推动的反日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已居于东北所有抗日武装的指导者的地位。因此,在此期间,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总数量虽然减少,其质量却有很大的提高,并且行动更为积极,更为活跃^①。

根据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变化和所面临的敌人冬季“讨伐”的实际,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向东北地区全党同志发出一

^① (日)岗部善修:《满洲国治安小史》,伪满警察协会1944年版,第48页。

封信。信中对前一时期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行了总结,充分肯定了人民革命军和反日游击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为粉碎敌人1934年冬季“讨伐”的战斗任务,并把军事、政治和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动员东北全体共产党员和抗日武装部队指战员充满信心和勇气,为实现新的战斗任务而斗争。

信中指出:(一)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各地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的迅速成长壮大,由于这些部队的坚决彻底抗日行动,已经使它成长为“目前满洲抗日队伍中最坚强和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南满、东满、珠河、吉东等几个重要游击区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切抗日队伍中的中心力量和运动中的骨干与领袖”^①。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反日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和威信迅速扩大与提高,许多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要求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军、反日游击队加强对他们的领导或予以改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为各抗日部队的领导者与核心。(二)各地人民革命军和反日游击队执行反日统一战线方针,与其它许多抗日武装队伍建立了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或临时作战协定等方式的抗日联合战线,团结了大量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于自己周围共同对敌作战,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讨伐”。(三)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努力说服、教育,并以身作则影响其他抗日义勇军部队,坚决执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走狗财产充做抗日战费政策,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改善了抗日部队与群众的关系,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援,提高了抗日部队的抗日热忱。(四)由于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作为骨干的东北抗日武装部队的存在及其所取得的许多抗敌战果,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1934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63页。

志和勇气,使“民众反日运动发展到更高的形式——民众的地方武装暴动。”^①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和连珠岗、哈达河武装“民变的酝酿”,预示着新的更带群众性的抗日武装将不断产生,抗日游击运动将扩大到更广大的范围。

基于上述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变化的基本估计,针对日伪军开展的1934年秋冬季“讨伐”的严峻形势,中共满洲省委向东北全体共产党员和部队指战员提出了下列任务:

(一)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扩大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最广大群众开展抗日反满斗争,反对敌人的冬季“大讨伐”,扩大游击战争,巩固与扩大游击区域,使人民革命军、抗日游击队形成一切抗日队伍的中心力量和领导者。

(二)在粉碎敌人的“大讨伐”中,各中心游击区域应完成下列具体任务:(1)南满成立健全巩固的人民革命军两个师,正式完成创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光荣任务;(2)东满新建一个师,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3)珠河应迅速将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建立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独立师;(4)汤原、宁安应以目前抗日游击队为基础,迅速的巩固与扩大部队,为建立各该地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准备前提条件;(5)海伦应建立强健的抗日游击队。

(三)中共满洲省委再次强调:“要坚决的打击轻视义勇军和对于建立统一战线估计不足的倾向,必须清楚的了解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向共同的敌人斗争,是粉碎敌人‘大讨伐’的主要条件。”^②要求与一切抗日队伍结成反日统一战线,既防止急于改编义勇军、山林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1934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64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1934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68页、第77页。

队,过早破坏统一战线而产生的与某些义勇军发生敌视、对立,以至武装冲突现象,又要纠正只进行上层联合,忽视建立下层基础的倾向。

(四)在有比较稳定的强健的武装部队和比较稳定的游击区域的地方,特别是在南满与东满,应将建立民选的抗日民众政权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认为“在反日游击运动更进一步发展和胜利中,实际地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应当是斗争的最高目的和应有的成果。”^①

(五)在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斗争中,必须开展广大工农群众的各种抗日斗争。在开展群众斗争的基础上,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针,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建立最广大群众性的反日会等组织。中共满洲省委还要求人民革命军在反“讨伐”战争中,必须广泛的采取游击战术,攻击敌人的弱点,袭击敌人的后方,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

但是,此信中还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的提法,如“不让日‘满’军进入游击区一步”等。

此外,为巩固和扩大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建设,中共满洲省委在这封信中还重申:各地党组织和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34年6月16日省委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指出: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民众抗日反满的武装组织,是东北各民族抗日反满联合的一种形式,又是工农联合的一种形式。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巩固人民革命军中的各民族联合和工农联合,并在这一联合中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条例草案》规定:东北人民革命军为完成其历史性的伟大任务,必须接

^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1934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68页、第77页。

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执行抗日反满的民族革命战争纲领。《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人民革命军的战斗力,扩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指出,人民革命军战斗力的巩固和加强,不仅要依靠军事技术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要靠它的民族革命的决心和阶级的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和配合广大工农民众斗争与瓦解敌人的军队,获得广大民众的拥护。《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实施抗日反满的民族革命教育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教育,使人民革命军的指战员了解其所负民族的阶级的政治责任和所从事的对敌人作战的意义,以及对于地方民众的民族的、阶级的友爱和对敌人的仇恨,使每个指战员成为最有纪律的自觉的革命战士。《条例草案》规定:为加强共产党对人民革命军的领导,在部队中设立政治部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制度。政治委员是党在部队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规定团以上设政治委员,连设政治指导员^①。军、师两级成立共产党委员会,设专职党的书记。团及其以下各级设党支部和党小组。中共满洲省委重申:各部队切实执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目的,在于建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最大限度的加强队内的政治教育工作,发展和提高每个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部队的纪律。

中共满洲省委的上述指示,成为东北各地建立人民革命军和开展反“讨伐”斗争的重要指针。南满、东满、北满、吉东抗日部队在反“讨伐”斗争中不断发展,1934年冬至1935年,在东北地区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六6个军,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① 《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34年6月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99—127页。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南满游击战的广泛开展

1934年9月1日,日伪军对活动在南满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等抗日武装开始进行秋冬季“大讨伐”(即所谓“第二期讨伐”)。此次“大讨伐”除伪军外,还动用了日军本间、浅野、川村、板津、胁坂、岩永等支队,由三毛任司令统一指挥。“讨伐”军穷凶极恶,到处杀人放火,并狂言:“今后不出十日,即可完全(将独立师等抗日武装)扫荡净尽矣”。

面对敌人的“大讨伐”,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杨靖宇指挥下,毫不畏惧,采取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同敌人展开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自1934年9月至11月初,在两个月内便同敌军进行了150余次频繁的战斗,取得许多胜利。其中,1934年9月2日,独立师一部和“臣军”等义勇军部队在金川样子哨东南毙伤伪警察两人,俘虏17人。9月5日,又进攻柳河县柞木台子伪警察署,歼敌20余人。9月17日,在通化七区通新村附近再次伏击由21辆汽车组成的日伪军汽车队,击毙日伪军14人,击伤15人,击毁汽车多辆。9月21日,独立师后方指挥部动员金川、柳河、通化、临江各县农民抗日自卫队300余人,围攻金川大荒沟三昼夜。9月24日,又设伏柳河县大牛沟,颠覆敌人汽车一辆,毙敌17人。在此期间,杨靖宇率独立师司令部直属部队再次南下桓仁,在八宝沟一战,毙伤伪军22人,俘虏8人,缴获步枪15支、子弹1000余发。后转移至兴京。10月1日,在库仓沟与日军守备队激战;10月5日,在大北沟与驻兴京骑兵连部分日军及伪警察队交战。10月底,第一师部队返回金川河里根据地(今柳河境内)。

同时,在辉发江北活动的独立师第一团和少年营,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再度向江南转移与独立师司令部会合。

此时,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辉发江南北新老游击区

与敌战斗中,部队有了较快发展,战斗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同时,由柳河、通化、金川、清原等县群众抗日武装农民自卫队编成的东边道游击队也迅速扩大;抗日游击区也由以磐石为中心的8个县,扩展到以柳河、通化、金川、临江为中心的20余县。随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兵力的增加和活动区域的扩大,南满地区的党组织及反日会、妇女会、青年义勇军、儿童团等反日群众组织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中共满洲省委非常重视南满党组织、军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曾多次指示南满党组织及军队,尽早建立南满特委,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1934年10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敌人“大讨伐”期间,发出了《给南满党、人民革命军杨同志的信》,要求在反“讨伐”斗争中,在战略战术上,“一方面还必须采取游击战术来开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在大的战斗方面,必须加强司令部对于各团游击队的领导,各部队的行动应当取得适当的配合,这样才能更有力的打击敌人,粉碎冬期‘讨伐’。”在巩固和扩大人民革命军方面,要求“在积极改造南满第一、第二游击队、海龙和忠良游击队以及其他新‘收编’的部队的基础上,把这些分散的小的部队编制起来,真正形成三三制的师的编制,……成立强有力的人民革命军”^①。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南满地区党组织于1934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临江县二道四岔召开了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磐石、海龙两中心县委及其所属县委、区委、特支代表,共青团磐石、海龙两中心县委代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党委、团委

^① 《中共满洲省委给南满党、人民革命军杨同志的信》(1934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56—58页。

代表共32人出席大会。大会听取了杨靖宇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李东光关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工作报告,吴振山关于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工作报告,韩震关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的工作报告。会上,各地代表还分别介绍了南满各地的情势。大会总结了过去南满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当前南满抗日斗争的形势,确定了今后南满的斗争任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南满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千百倍的加强我们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的力量来扩大巩固人民革命军,最大限度地扩大反日游击战争,领导和扩大反日反‘满’的群众政治经济的斗争。在正确的运用反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基础上,把一切抗日反‘满’力量团结和统一起来,冲破敌人第二期“讨伐”,创造临时人民革命政权与根据地,并在这个运动中争取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①。

大会还通过了杨靖宇代表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和组建中共南满临时特委的提议。杨靖宇还向大会代表说明,因军务繁忙,他不拟就任中共满洲省委早已指定的中共南满特委书记职务。大会选举李东光、纪儒林、宋铁岩和西安煤矿工人代表程明、吉海铁路工人代表老张等5人为临时特委委员,李东光、纪儒林为常委,李东光代理书记。1935年2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南满特委组成人员的批复中,仍坚持指定杨靖宇为特委常委。南满特委下辖磐石、通化两个中心县委,西安、江南、清东(清原、东丰)3个特支。后又建立了桓兴(桓仁、兴京)特支。

在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还确定了第一军暂设两个师

^① 《中国共产党全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决议》(1934年11月5日通过)。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3、第51页。

的建制及干部人选。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朴翰宗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兼党务、马占元任军需处长。军部直属保卫队和两个教导连。第一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副师长韩浩^①,政治部主任程斌,军需部长及党委书记韩震^②。第一师下设第三、第五、第六团,由原第三团、第五团、东边道游击大队和第三团所属游击大队及少年连编成。第二师,师长兼政委曹国安,参谋长李松波,政治部主任张云志。第二师拟以原第一团、少年营及江北各游击连编成第七、第八、第九团,后因第一团人数减少,江北各游击连多数瓦解,只编成第八团。此时,全军已达800余人。此外,东边道游击队尚有1000余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后,根据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最大限度的扩大反日游击战争”的精神,划分了游击区域,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第一师以龙岗山脉为后方根据地,主要活动在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和兴京、桓仁等地;第二师以濛江(今靖宇县)为后方根据地,主要活动在磐石、西安、海龙、伊通、东丰和永吉、桦甸等地;军部率领直属部队转战于柳河、濛江、通化、金川地区,协调指挥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11月25日,军长杨靖宇率第一师第五团、第三团及少年连各一部,在通化三岔河围歼伪军邵本良部、伪公安队及三源浦日军守备队各一部共30余人。12月3日,杨靖宇率第一师一部奇袭伪军

^① 韩浩(1905—1935),原名金翰浩,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南满游击大队第二大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团、第一师副师长。1935年8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韩震(1900—1936),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历任特支书记、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军需处长兼党委书记、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政委等职。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

邵本良部老巢孤山子,歼敌 20 余人。12 月 9 日,又在临江秃尾巴沟与日军井上部队、伪军混成第二旅一部激战 5 小时,获得胜利。之后,杨靖宇率军部与第一师分开活动。

1934 年 12 月间,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红光率第一师一部南下,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一举攻占罗山城,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有 10 余名朝鲜青年加入第一师。次日,第一师返回鸭绿江北岸。1935 年 1 月 8 日,副师长韩浩率第一师第三团,在通化二密河附近伏击日军胁坂支队一部和伪军一个连,毙伤敌 20 余人。

1935 年 1 月 11 日,第一军军部从地方党组织处得到消息:伪靖安军李寿山部一个骑兵连将从临江县红土崖去濛江换防,军长杨靖宇和参谋长朴翰宗遂率部队 100 余人,冒着严寒,于当日夜到达距红土崖东 15 公里的一处险要地段设伏。此处一侧为高山,另一侧为壁立的河崖,部队埋伏在路边的灌木丛中。次日中午,敌人骑兵进入埋伏圈后,杨靖宇立即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射击,毙伤敌 10 余人。敌人慌忙下马应战,第一军指战员冲入敌群,又俘敌 30 余人。此战缴获手提式机枪一挺、步枪手枪 40 余支、战马数十匹。在战斗中,第一军参谋长朴翰宗等 3 人不幸牺牲。此后,杨靖宇指挥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师一部继续转战临江、通化、兴京、桓仁等地,并利用缴获的马匹将军部直属部队编成骑兵。3 月上旬,第一军部队从地方党组织得悉伪通化县长徐伟儒去伪新京开会将于 15 日返回、并有伪军护送的消息。杨靖宇和李红光决定袭击这股敌人。3 月 15 日,杨靖宇、李红光率部在柳河县驼腰岭截击敌人汽车两辆,伪通化县长徐伟儒、伪警务局加藤富雄被俘,19 名伪警察被解除武装,伪县长被就地处决,加藤乘隙逃走。3 月 22 日,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部队智取红土崖。杨靖宇事先将部队化装成伪军公开进入红土崖镇内,一枪未放即俘敌 40 人,缴获全部枪支和 70 发迫击炮弹。日伪惊呼:“近来通化附近红军

匪大势猖獗”。

1935年4月,第一军军部将保卫队和两个教导连扩编为教导团。第一师也增编了机枪连,第一师各部分别开展游击活动:师长李红光率第三团一部及机枪连、少年连,以柳河、兴京、清原为中心,并向宽甸、本溪发展;副师长韩浩率第三团一部和第五团,以兴京、桓仁为中心,与师长李红光所部相呼应;第六团以通化、柳河为中心开展活动;第三团第九连、第十一连及红枪队一部在通化东部、临江西部、金川南部活动,保卫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5年5月初,杨靖宇与李红光率部南进,于5月5日攻占兴京县城附近的东昌台,缴枪30余支。此后,第一师与梁瑞凤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取得联系,共同开展游击活动。5月11日,第一师一部在兴京县老爷庙岭附近为组建骑兵夺取日伪军马匹,与一支200余人的日伪骑兵发生激战,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在指挥战斗中不幸身负重伤,于次日牺牲。

1935年5月,敌人又开展春季“讨伐”。日伪当局调动千余人的兵力围攻第一军部队。5月16日,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师一部在桓仁县歪脖子望突破日伪军重围,经过岗子岭、都岭,于5月下旬返回临江县三岔子一带。6月,第一军军部和第一师第五、第六团等在临江、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935年2月后,第一军第二师由濛江转战到桦甸、抚松等地。3月,为开辟新游击区和打通与东满的联系,第二师师长曹国安率机枪连、少年营和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南满第二游击大队来到桦甸县溜河和抚松县西北地区,成立共同指挥部,由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大队长苏剑飞任总指挥,第二师师长曹国安和南满第二游击大队大队长臣军任副指挥。4月5日,第二师与南满第二游击大队联合攻打日资经营的桦甸夹皮沟金矿,缴枪10余支,获伪币数万元。4月12日,第二师

又同南满第一、第二游击大队袭击了日资经营的桦甸老金厂金矿,毙伤俘日军七八人。随后,又收缴二道溜河反动地主武装。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当地群众,许多被解放的矿工参加部队,使第二师增编一个连。4月18日,第二师拟与南满第一游击大队联合攻打抚松县万良镇,因南满第一游击大队途中在三道砬子与伪公安队发生遭遇战,未能如期赶到,此时万良镇敌军又增加了兵力,因而进攻万良镇的第二师只俘虏了十几名汉奸走狗,缴获两支手枪和一些物资即撤出战斗。战斗中少年营政委等两人不幸牺牲。1935年4月19日,刚赶到的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在万良镇附近宿营时,因警戒不慎,深夜突然遭到伪公安队的偷袭,大队长苏剑飞等20余人牺牲。不久,第二师一部返回磐石,一部留在濛江,准备与东满打通联系。南满第二游击大队到辉南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1935年6月下旬,中共南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在金川县河里王六沟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集中对人民革命军的师级干部进行政治、军事培训,以适应抗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7月之后,军部首先调第一师副师长韩浩、政治部主任程斌带队到后方,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在农村建立反日统一战线问题,纠正干部中的旧军阀作风的影响和单纯军事观点。经过短期培训后,任命韩浩为第一师师长,程斌为政委,胡国臣^①为政治部主任,率主力部队前往兴京、桓仁、宽甸、辑安、本溪等地活动,另一部在沈海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活动。

随后,军部又调第二师师长曹国安和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余部到临江板石沟进行整训,总结游击战争经验,并将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余

^① 胡国臣,中共党员。1936年7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需部长。1938年初叛变投敌。

部改编为军部第二教导团,任命杨俊恒^①为团长,周建华^②为政委。

曹国安在军部培训期间,第二师分两部活动。一部由参谋长李松波率领,与新组建的磐石游击队会合后,在磐石、桦甸一带活动。7月5日,在磐东德祥沟与伪警察第二队交战,毙伤俘敌16人。不久,李松波在桦甸红石战斗中牺牲,部队由新任参谋长丁守龙率领,继续在磐石、西安、东丰一带活动。第二师另一部由第八团团长李永浩率领,在桦甸、濛江、抚松北部一带活动,曾一度远征到桦甸东部大蒲柴河一带,以图与第二军部队取得联系。不久,曹国安归队,带来由军部协助组建的第二师警卫连,使第二师兵力增至300余人。

1935年8月后,敌人开始进行秋季“讨伐”。在“讨伐”中,敌人一面加紧收降、瓦解各路抗日义勇军、山林队,以孤立人民革命军;一面调动伪军集结在抗日游击区周围,随时准备对人民革命军实施多路围攻。为粉碎敌人阴谋,人民革命军决定避敌锋芒,分别向桦甸、濛江、通化、金川、临江、柳河、桓仁等县山林地带收缩。在反“讨伐”战斗中,新任第一师师长韩浩在通化县刘家街小三道沟对敌作战中牺牲。为打破敌人围攻,第一军军部决定先脱离被敌压缩地区,摆脱被动局面,采取向东、西两面突破,再伺机回师作战,以开辟新游击区、保卫老游击区。

8月20日,军部率教导团约150人,联合抗日军100余人,由临江板石沟向柳河转移,在柳河县黑石头大道旁伏击一支约500人的伪

① 杨俊恒(1910—1938),吉林人。青年时在东北军当兵。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分士兵起义抗日。不久,参加田霖、苏剑飞部义勇军。1933年9月,任南满第一游击大队中队长、大队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团长的职务,第一军第三师师长等职。1938年8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周建华(1913—1937),原名邓晓村,吉林双阳人。193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南满第一游击大队政治部主任、第二教导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政委。1937年冬在战斗中牺牲。

军步、骑兵和伪公安队,激战半小时,将敌击溃,毙伤敌 50 余人,俘敌 10 余人,缴获步枪 50 余支、迫击炮 1 门、子弹 3000 发及大量军用品。在这次战斗的影响下,东边道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几乎全部参加了江南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与第一军协同作战,不少队伍还要求改编为人民革命军。同时,第一军第二师去辉发江北活动的部队,又联合江北抗日山林队“七侠”、“登山好”等 11 支部队重组东北抗日联合军江北总指挥部,共同对敌作战。9 月 11 日,杨靖宇指挥军部直属部队 30 余人在金川旱葱沟设伏,截击了伪军第六旅步兵团运送军需物资的车队,击毙伪军官兵 10 人,伤 15 人,缴获步枪 30 支、子弹万余发及大量棉衣、鞋帽等军需物品。被俘伪军及伪军眷属经教育后释放。日伪当局称此次战斗“异常激烈”。《盛京时报》曾以《官匪大战金川》为题报道此次战斗“为剿匪以来未有之恶战”^①。11 月 24 日,第二师一部远道奔袭防守空虚的伊通县营城子伪军第十三团驻地,缴获重机枪两挺、步枪 10 支和子弹 2 万余发。

经过一年的战斗,到 1935 年底,第一军总兵力达到 1600 余人,比 1934 年增加了一倍。

在此期间,活动在濛江的第一军第二师第八团部队,与来自东满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团西征部队于 1935 年 8 月底在濛江北部那尔轰胜利会师。同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吉东特委)、中共满洲省委曾向南满和东满特委、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军部队发出指示要求当时抗日武装力量较为强大的辽吉边区,选择较为稳定的抗日根据地召集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南满和东满两地党组织与军队对此十分重视,并作出了相应安排。第一、第二两军均采取了主动的军事行

^① 《盛京时报》(1935 年 9 月 15 日)。

动。同年七、八月间,第一军司令部委派在濛江、桦甸、抚松一带活动的第二师部队积极东向桦甸进军,以联络第二军部队。为了同一目的,中共东满特委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党委也决定派该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①率部队西征南满。1935年8月,在李学忠率领下,由第二军第二团第二、第三连150余人组成的西征部队,从安图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出发,经抚松向濛江挺进,于8月底到达濛江县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实现了与南满第一军第二师第八团的胜利会师。

第二军西征队到达那尔轰后,受到第一军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3日,那尔轰反日会举行盛大的军民欢迎大会,到会者达2000余人。9月18日,南满反日总会印发传单,欢迎第一军与第二军西征队会师。第一军政治部编印的《人民革命画报》九一八纪念专号,专门刊载了图文并茂的《东满人民革命军西征队已接头南满人民革命军》的专题报道。

1935年10月4日,杨靖宇亲率第一军军部及所属教导团,自金川河里根据地来到濛江县那尔轰,在那尔轰老龙岗西坡黑瞎子望于家沟举行了两军会晤式和军民联欢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000余抗日军民,规模盛大。会上,杨靖宇和李学忠分别代表第一、第二军在大会上讲话。李学忠首先报告了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和第二军的发展历程。杨靖宇也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第一、第二军会师后,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三、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击

^① 李学忠(1910—1936),又名李宗学,山东人。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学习,又去莫斯科参加训练班,1934年冬回国,历任中共东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南满省委委员。1936年8月,在抚松老碱厂密营养伤时,遭敌突袭牺牲。

日匪”^①。会上,两军相互赠送礼品,演出文艺节目和投弹、射击表演。会议异常热烈,军民同受鼓舞。

联欢会后,杨靖宇、宋铁岩代表第一军党委和中共南满特委,李学忠等代表第二军党委和中共东满特委,举行了第一、第二军党委和南满、东满特委联席会议。会上,双方交流了南满、东满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并就开辟以安图为中心的辽吉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决定在适当时机联合进攻安图县城,作为抗日军事与政治根据地。两军代表还决定开展军事竞赛,相互鼓励。

第一、第二军的“那尔轰会师”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两军会师打通了南满、东满长时期相互隔离的局面,使两地共产党组织和抗日军队取得了直接联系,并使南满与东满抗日游击区连结起来,给日伪当局的反动统治以更大的威胁。第二,第一军不仅与第二军取得了直接的联系,而且通过第二军东部部队与吉东地区第五军也取得了联系,与第三、第四军也取得了间接的联系,并开辟了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渠道。第三,这次会师,极大地鼓舞了东满广大军民,增强了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第四,两军胜利会师,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人民革命军在众多抗日义勇军中的威望,使更多的抗日义勇军团结在第一、第二军的周围,有力地推动了反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东满游击战的开展

1934年冬,正当东满的抗日斗争形势处于十分严峻的关头,中共满洲省委在前已派出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之后,不久又派中共哈

^①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编印:《人民革命画报》(1935年10月6日)。

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赴东满工作。魏拯民途经吉东时,曾同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会面。吴平向他介绍了东满在执行东北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和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存在的严重问题,详述了中共代表团关于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就贯彻统一战线方针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1935年1月下旬,魏拯民到达延吉县三道湾能芝营根据地。

东满党内和人民革命军中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引起了吴平的重视。吴平在周保中处了解到东满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之后,便与当时正在吉东活动的金日成等进行了详谈,进一步了解情况。这时,他又收到从东满转来的团满洲省委特派员的两份报告。吴平认为东满的问题极为严重。于是,他于1935年2月10日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名义给东满特委写信,对东满特委在反日统一战线工作和反“民生团”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就贯彻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和反“民生团”斗争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关于反“民生团”斗争,信中指出:东满“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信中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可能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①。

吴平给东满的信虽然尚未将东满存在的问题完全解决,但却对满洲省委派往东满的魏拯民在妥善解决东满问题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对扭转东满抗日斗争的被动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魏拯民到达延吉县能芝营东满特委所在地后,了解到在团满洲

^① 《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1935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49页。

省委特派员主持下,东满党团特委的同志为召开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已经做了准备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魏拯民分别与东满特委、人民革命军的干部、根据地群众谈话,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了解东满党、团组织工作情况和在反日统一战线、反“民生团”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起草了东满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和反“民生团”斗争的决议的草稿。在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相继召开了中共东满特委、共青团东满特委扩大会议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

1935年2月27日至3月2日,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在汪清县大荒崴召开。会议由魏拯民主持。与会者有魏拯民、王德泰、王中山、李学忠等20余人。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东满临时工委的工作报告,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及今后斗争任务的决议》和《反民生团斗争的决议》,改组了党、团特委和所属县委的领导机构。

会议决议提出东满党团目前的迫切任务是:“动员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再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团结所有的反日力量,冲破敌人的围剿、封锁与讨伐;运用正确的策略消灭民生团的组织,肃清民生团影响,把东满的党、团从敌人的内外夹攻之下挽救出来,巩固起来,扩大起来。”决议要求:要巩固和扩大人民革命军,团结一切同情和赞成抗日的部队和力量,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决议还指出:在反“民生团”斗争中必须禁止逼供信和仅相信被捕者口供的错误做法;要区分“民生团”的头目和下层分子,对一般分子要以教育为主;决定成立由东满特委直接领导的肃反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民生团”问题。

会议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选出魏拯民、李学忠、李宋一、王润成^①、黄贞烈等为党的特委委员,王中山、马进金为候补委员,魏拯民为特委书记。团的特委由5人组成,周树东任书记。

为贯彻落实东满党、团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精神,1935年3月21日,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独立师在汪清腰营沟召开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委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魏拯民、第二军独立师政委王德泰、师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以及第一团政委林水山、第三团政委金日成、第四团政委王润成、党特委宣传部长李宋一、共青团满洲省委特派员钟子云、团特委书记周树东等11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独立师各团的报告,肯定了独立师的工作成绩,总结了武装斗争经验,着重指出尚存在破坏反日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和政治工作薄弱的缺点。会议还讨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和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暂行条例》,以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尽可能保障指战员生活待遇,提高战斗力。会议决定独立师1935年的活动计划,即除坚持原有根据地外,再创建安图和绥芬大甸子新的抗日根据地,以便分别向敦化、桦甸和东宁、宁安、穆稜等县发展,另派部队分别向中苏、中朝边境活动。会议还决定,争取在4月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会议根据独立师经过一年的战斗,数量有了很大增长的实际,对独立师战斗序列和领导干部重新进行了调整。决定由王德泰任独立师师长、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独立师下设4个团:第一团,团长林盛奎、政委林水山;第二团(由原第三团编

^① 王润成(1910—1965),又名马英,黑龙江宁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任中共宁安县城支部书记,并到吉林救国军工作。历任中共汪清县委宣传部长、琿春县委书记、东满特委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政委等职。1936年底被送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入狱,1946年始被释放。1954年回国,任中共吉林省舒兰矿务局副局长。1965年10月病逝。

成),团长张蓬印、政委金洛天;第三团(由原汪清团编成),团长方振声、政委金日成;第四团(由原珲春团编成),团长何德润、政委王润成。第二军独立师已有兵力1000余人。

大荒崴会议和腰营沟会议后,东满党的组织和独立师的编制得到了健全,为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准备了条件。但这两次会议尚未完全解决反“民生团”斗争中出现的错误。虽然东满特委逐步控制了这一斗争局势,并开始纠正反“民生团”斗争的错误,但是又出现了“间岛协助会”的大特务头子金东汉给中共东满特委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送信事件,特委又一次中了敌人的奸计。于是,把李宋一等一批干部逮捕处决。东满地区党和人民军内部持续两年多的反“民生团”斗争,直到1935年5月之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1935年5月末,魏拯民前往苏联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全面汇报东满地区的抗日工作,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由朱明^①代理中共东满特委书记职务。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第二军独立师部队的领导,中共东满特委和独立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指示,于1935年5月30日发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宣言》郑重宣告:“东满人民革命军是中高工农及爱国志士的武装力量”,“是东满一切反日部队的中心部队”。其主要任务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用武装并配合一切反日力量,驱逐日本强盗一切势力出满洲,保障中国领土完整,收复东北失地,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建立东北廉洁的人民政权,求得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与自由。”第二军全体指战员在

^① 朱明(1904—1936),原名陈洪章,山东平度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1935年春被派至东满工作。1935年6月,任中共东满特委代理书记。同年10月,在吉林省汪清县绥芬大甸子被敌人逮捕,因变节,后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处决。

《宣言》中庄严宣誓：“愿牺牲一切，奋不顾身，与日‘满’匪人作最后的战争，担负和完成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尽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责任^①。

同时，第二军政治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民众和反日部队联合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赶出中国。第二军政治部发出在东满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号召，指出：“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②。

第二军由王德泰担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治委员，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刘汉兴^③任参谋长。军部下设4个团，第一团，团长安风学^④，政委周树东；第二团，团长张泉玉，政委曹亚范^⑤；第三团，团长方振

^①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1935年5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5，第120、121、123页。

^②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告各反日部队书》（1935年5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5，第117页。

^③ 刘汉兴（1910—1958），又名陈龙，辽宁抚顺人。1933年1月加入救国游击军，任副参谋长，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参谋长。1936年5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回延安，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任科长。1945年冬到东北，先后任中共北满分局社会部长、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新中国建立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10月病逝。

^④ 安风学（1910—1936），原名安正燮，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团团团长、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一师师长、第四师师长。1936年叛变投敌。后被日本宪兵打死。

^⑤ 曹亚范（1911—1940），又名曹青山，北京人。1928年由香山慈幼院到和龙任小学教员。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和龙县委书记、东满特委秘书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二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政委、东北抗联军第一军二师师长、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等职。1940年4月被叛徒杀害。

声,政委金日成;第四团,团长侯国忠^①,政委王润成。另设机关枪连、教导队和游击大队。游击大队大队长钱永林,政委金山浩。全军总兵力1200余人。

第二军成立后,于1935年6月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致各反日部队的信》,再次发出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的倡议。信中总结了过去东满抗日部队各自为战,常被敌人各个击破的教训,指出东满各反日部队要团结起来,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有计划、有组织的指挥和领导东满的反日革命战争,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并提出了抗日联合军的宗旨:“第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恢复失地。第二,不分义勇军、人民革命军、救国军、自卫军、反日山林队、红枪会,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问宗教信仰如何,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第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们的财产充作抗日战费。第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抗日救国”^②。

大荒崴会议和腰营沟会议后,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为提高第二军指战员的政治军事素质,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建设,在各团、连健全了党的组织,配备了政治工作人员:团配备政委,连配备指导员;同时认真贯彻《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积极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培训军政干部,第二军成立了随营学校,并于1935年5月20日发出了招生广告,招收18—35岁的爱国青年进行3—6个月的训练。第二军还创办了《东满民众报》、《人民革命报》、《反日

^① 侯国忠(1904—1939),吉林琿春人。1932年参加吉林救国军,1933年加入琿春游击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四团团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五师副师长、中共道南特委侯补委员、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等职。1939年8月,在与敌战斗中牺牲。

^②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致各反日部队的信》(1935年6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5,第159页。

周刊》、《战旗》等报刊,用汉、朝两种文字油印发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抗战消息,总结斗争经验;还编印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工作纲领》、“游击战法”、“革命歌集”等小册子,供干部战士学习使用。在连队还成立了“政治讨论会”、“士兵委员会”、“识字班”、“娱乐团”,利用战斗间隙、集会进行学习宣传。这些活动的开展,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活跃了部队生活,起到了良好作用。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前后,各团根据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决议精神,分别以 $\frac{2}{3}$ 的兵力开辟新游击区,以 $\frac{1}{3}$ 的兵力留守老游击区。开辟新游击区的部署是:由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直接指挥第一、第二团坚持向西北、西南发展,其中第一团挺进敦化、额穆地区,第二团转战安图、桦甸地区;由第二军参谋长刘汉兴、第三团政委金日成、第四团政委王润成率领第三、第四团依然向东、向北发展(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第二军政委魏拯民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随行一段),进军绥宁地区的东宁、宁安、穆稜等地,分兵开展游击战争。

1935年4月末,第一团主力部队从安图县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出发,到敦化、额穆一带开辟新游击区。5月2日,第一团第四连一部和第五连30余人联合抗日义勇军“天良军”、“平日军”、“明山好”等部170余人,共计200余人,在京(长春)图(们)铁路哈尔巴岭至大石头间将铁路甩弯处的路轨拆开,并在路两侧设下伏兵。当由朝鲜清津开往伪新京(长春)的第202次国际列车于当日凌晨2时40分行至此处时被颠覆,之后部队集中火力向押车的日伪军猛烈射击,毙敌30余人,俘虏日伪军政要员13人,其中包括伪军高级军官和一名“满铁”要员,缴获大量物资和钱款。该事件在日伪统治者中引起极大震动,日伪各大报纸均以大字标题报道,称此为“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而后,第一团主力部队继续西进。敌人立即调兵

遣将,跟踪追击。5月12日,第一团在敦化县沙河掌伏击尾追之日军吉良“讨伐队”,毙伤敌50余人。6月,第一团团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率部在额穆县青沟子与日军“讨伐队”150余人遭遇,第一团部队用一部兵力正面迎击敌人,另派一部兵力绕至敌人背后,两面夹击,敌人溃不成军,伤亡近百人,被俘15人,仅30余人逃跑。此战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近百支。之后,第一团主力返回安图游击区,留下一部继续在敦化、额穆境内活动。7月,留下的第一团远征队一部在敦化县新开岭与日伪军150余人发生战斗,歼敌多人。另一部在敦(化)、额(穆)两县交界的威虎岭同日军守备队交战,歼敌10余人;8月19日、20日,在京图铁路南沟至亮兵台间连续颠覆开往朝鲜的第291次货车及前来增援的敌装甲列车,缴获棉布、大米、白糖、烟草等大批物资。9月23日,又在京图铁路二道河至黄松甸间颠覆一列自伪新京开往朝鲜清津的国际列车。第一团在京图铁路东部沿线进行的破袭战,破坏了敌人的运输线,缴获了大量物资,补充了部队的物资储备。

第一团主力部队返回安图游击区后,与第二团一起继续展开了一系列战斗。7月上旬,第一、第二团共400余人在葫芦芯子同300余日伪军发生激战,歼敌10余人。同月,第一团在柳树河子伏击伪军运输队,缴获白糖、面粉等大量物资。8月29日,又联合抗日义勇军及两江口起义的伪警察队共700余人围攻安图县城,经5日激战,攻克该城,歼敌数十人,缴获100余支枪及大量军需品。这期间,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部队西征到达南满,与第一军部队胜利会师。

为使东满游击区与吉东游击区连接起来,第二军参谋长刘汉兴、第三团团长方振声、政委金日成和第四团团长方侯国忠、政委王润成率领第三、第四团,准备于1935年6月初从汪清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出发向宁安县挺进。此时,得知驻东宁县老黑山伪靖安军一个连,在日人连长的驱使下疯狂与抗日武装为敌,残害群众,附近农民

恨之入骨,恳请第二军部队消灭这股敌人。第二军部队领导人接受群众的要求,即刻前往歼灭这支伪军,但该股伪军固守据点不出。金日成、侯国忠等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令一支小部队前往骚扰,引诱敌人。主力部队埋伏于距老黑山 10 公里之头道沟两侧的有利地形。当敌人追兵进入第二军北征队埋伏圈时,北征队发起猛攻,一举歼灭伪靖安军一个连,共击毙敌连长以下 10 余人,击伤十七八人,俘虏 20 余人,缴获追击炮一门,轻重机枪 2 挺,步枪 40 余支,战马 8 匹及粮食等物资。战斗后,部队把缴获的粮食、马匹分给当地农民。群众纷纷送来米面、猪肉慰劳北征部队。

老黑山战斗后,第三、第四团返回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稍事休整,留下第三团第一、第二、第三连和第四团第四连坚持老游击区的斗争,其余部队第三团第四、第五连,第四团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连及第四团领导下的青年义勇军共 340 余人,于 1935 年 6 月下旬北上宁安。

1935 年 7 月,当北征部队到达宁安县城东 20 余公里的老青沟山东屯时,敌人闻讯,从东京城调集数百兵力前来进攻。于是第二军北征队打响进军宁安的第一仗,经半日激战,将敌击溃。不久,第二军北征部队开至镜泊湖南湖头,与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所部会师。8 月,第二、第五军领导干部举行会议,研究了两军配合作战问题,决定将第二军东部部队分成三部分:金日成率领第二军第三团第四连、第四团第二连和青年义勇军与李荆璞率领的第五军第一师第一、二团共同组成西部派遣队,前往额穆、敦化一带开辟新区,并打通与第二军西部部队的联络;刘汉兴、侯国忠指挥第二军第三团第五连、第四团第三、第五连转战宁安,与第五军军部共同活动;王润成带领第二军第四团第一、第六、第七连返回汪清、珲春老游击区,会同留守部队坚持斗争。此后,第二军东部部队在第五军军部的统一领导

下,在以宁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活动。

金日成率队参加西部派遣队后,与第五军协同作战,进入敦化、额穆地区。从1935年9月至1936年1月间,先后进行了额穆青沟子六号屯战斗、额穆老道口战斗、官地通沟岗子战斗、额穆索、黑石屯等一系列战斗,击毙日本指导官、教官、宪兵等30多人,毙伤伪军、伪警察近百人,开辟了额穆新的游击区,还在宁安、额穆两县边界地区建立了后方密营。队伍人数也增加了一倍,达200余人。

在第二军各团主力部队分别开辟敦额、绥宁抗日游击区的同时,各团留守部队在老游击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策应主力部队行动。1935年9月中旬,日伪军将东满和绥宁地区作为重点,发动了秋冬季“大讨伐”,第二军各部英勇地展开反“讨伐”斗争。10月初,日伪军向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疯狂进攻,第一、第二团留守部队在重创来犯敌人后,主动撤离车厂子,第一团主力撤至安图县迷魂阵,第二团主力转移到安图县奶头山创建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间,日伪军800余人又向奶头山进犯。王德泰指挥留守根据地的两连兵力和后勤机关人员,经多日激战,击退敌人,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

与此同时,1935年9月,王润成率第四团第一、第六、第七连返回汪清,与留守的部队汇合。10月,在东宁县头道沟与日军守备队战斗,毙敌8人,缴枪8支。又在珲春县密江附近伏击日军汽车一辆。12月,在小汪清袭击伪协助会特工班。1936年1月,在汪清县大甸子石头河子与伪军交火,袭击塘石沟日资木材场,缴获一批物资等。

1936年2月上旬,在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下,汪清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到破坏,第三、第四团留守部队穿过数百里原始森林,分别转移到宁安、穆棱第五军游击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日伪军再次对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第二团留守部队顽强反击,但是敌众我寡,形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为保存实

力,第二团留守部队于2月21日主动放弃东满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第一、第二团部队继续在安图、敦化、桦甸转战,先后在安图县两江口、大酱缸,敦化县三道河子、四道河子,桦甸县会全栈等地与日伪军多次战斗,英勇地回击了日伪军的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

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建立,哈东游击战争进一步开展

1934年10月,日伪当局为消除抗日武装对哈尔滨的威胁,将哈尔滨以东各县列为所谓“第二期讨伐”的重点地区。伪军第四军管区司令郭恩霖于10月下旬到帽儿山、珠河、一面坡等地督战指挥。为彻底破坏哈东抗日根据地,肃清抗日游击区和消灭哈东支队,敌人调用重兵,以驻滨江地区日军吉本、宫荻原、横山三支守备队为主力,并从伪第四军管区抽调涂旅、邓团、王团和李营及伪警察大队等共3000余人把守城镇、交通要道,采取集中兵力分期分批包围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方法,妄图一举消灭抗日部队。敌军将“讨伐”的主要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扬言“专打赵尚志,不打胡子”,借以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孤立哈东支队。

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粉碎敌人冬季“讨伐”的指示,要求珠河在反“讨伐”战争中扩大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区。同时还提出“不让日满军进入游击区一步”等脱离实际的错误口号。对此,赵尚志认为,敌我力量相差10倍,不准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是不切实际的,应该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退敌人的进攻。按照这一思想,哈东支队制定了粉碎敌人冬季“讨伐”的计划。决定首先扫除敌人在游击区附近的军事据点、军用农场、兵营,把哈东抗日游击区向东扩大到方正县一带,将珠河、宾县、延寿、方正等县游击区连成一片;广泛联合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发展哈东支队的力量,为早日建立第三军第一师做好准备。

哈东支队经过整顿后,将部队分组3部分:第一、第三大队坚持中东铁路以南老游击区的斗争;第五、第九大队在铁路以北开展游击战;第七、第十大队前往延寿、方正县开辟新的游击区。各部队刚刚开始分头行动,日伪军2000余人即将路南卧虎岭、方贤岗包围,搜索哈东支队主力。哈东支队第一、第三大队与抗日义勇军“三省”部队,在敌军包围圈内奋战一周,终于利用熟悉地形地貌的有利条件,巧妙地突围出去,敌人却丝毫没有发觉,以为抗日武装尚困在密林中。待两周后,敌人误认为反日游击队已全部冻饿而死,便进山搜索,结果却连一个游击队员的踪影都未发现。敌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支“难以消灭的游击队”。此时,哈东支队第一、第三大队却已去板子房,将被群众所痛恨、依仗日伪势力重新恢复起来的刘甲长大排队20余人全部缴械遣散。此后,原准备恢复的各地大排队便不敢重建了。

赵尚志直接指挥哈东支队第七、第十大队直奔一面坡大青川,将日本稻田公司供日军食用的2000石稻谷焚毁。敌人闻讯前来时,哈东支队却北上延寿,敌军追到宾县八区时,又扑了个空。这时哈东支队已过延寿县孙菜营子,并缴了延寿四区七保大排的枪支,在延寿、方正县边境中和镇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随后,赵尚志命刘海涛率第七大队留在这里活动,巩固这一新开辟的游击区,而他则率领第十大队又折回向西,到珠河铁道北宋家店、黑龙宫,烧毁了伪军营房,粉碎了敌人在游击区设立军事据点围攻哈东支队的计划;然后再返延寿、方正活动。赵尚志率部队纵横驰骋,使敌军晕头转向,疲于应付。此时,哈东支队第五、第九大队在路北游击区也多次打退日伪军的进攻,击毙日军6人、击伤2人。据日伪报纸报道,哈东支队自1934年11月22日至12月2日,10日内与敌“讨伐队”交战6次^①。其中就

^① 《泰东日报》(1934年12月14日)。

有著名的肖田地战斗。

1934年11月25日,哈东支队200余人自延寿返回铁道南游击根据地,途中夜宿方正与宾县毗邻的腰岭子附近的肖田地,突遭日军望月部队和伪军邓云章团800余人的围攻。面对强敌,哈东支队指战员顽强战斗,击退敌人数次轮番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支队司令部青年科长宋阶平、陈秘书及两名队员牺牲;赵尚志左肘被流弹所伤,流血不止,被战士扶下火线。部队在刘海涛大队长的沉着指挥下乘夜冲出重围,返回路南根据地。是役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日伪军伤亡达120余人,哈东支队伤亡3人。敌将望月对游击队作战之英勇,退却时纪律之严整,行动之敏捷,且能巧妙地越过他的“堵击队”更是惊奇,称这是“德国式联军的退却”,认为“此中必有名将指挥”^①。之后,哈东支队在三股流又与伪军一连发生战斗,毙伤伪军连长以下19人。由于日伪军寻求与哈东支队主力决战一再受挫或扑空,损兵折将,只好暂时结束所谓哈东冬季“大讨伐”。

1934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刘焜(赵毅敏)以省委代表身份来到珠河根据地指导县委和游击队的工作。他和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负责人研究后,向省委提出了恢复赵尚志党籍的意见。根据赵尚志多次关于恢复党籍的申请,中共满洲省委经过考察和研究,认为1933年春省委根据巴彦游击队失败而开除赵尚志党籍是错误的;同时,根据一年多来赵尚志在创造和发展珠河游击队和游击区做出的重大贡献,于1935年1月12日作出《关于恢复赵尚志同志党籍的决议》。这时,哈东支队一方面派人去五常县冲河、向阳山一带,调查了解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和抗日人民政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即按省委要求积极地筹备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的工作。

^① 熙文:《英勇战斗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巴黎《救国时报》(1937年9月18日)。

1934年底,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的指导下,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召开会议,研究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的问题。1935年1月2日,冯仲云将讨论的意见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批准了这一报告。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批示,1935年1月28日,在纪念上海抗战三周年的日子里,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在珠河县道南半截河,宣布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军司令部下暂编第一师。全军共500余人。由赵尚志任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师分编3个团,每团3个连。第一团,团长刘海涛、政治部主任张寿箴;第二团,团长李熙山(许亨植)、政治部主任金策;第三团,团长张连科,政治部主任马宏力(由李泰代理)。军部还设有保安营和少年连。在第三军的成立会上,过去经常同哈东支队在一起活动的五龙、爱民、压东洋等队伍的代表也前来表示祝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宣告成立,是哈东人民抗日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它极大地鼓舞了各种抗日武装和广大群众的抗日士气,把哈东一带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高潮。

1935年农历春节前,敌人从一面坡、呼兰等地调集伪军孙团、褚营、李营等部,以王旅为主力向宾县、珠河、延寿一带进攻;调马旅、延寿警察大队、独立团,向延寿、方正和中和镇一带进攻,总兵力共约1000余人。

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即刻开展反“讨伐”作战。1935年2月初,第三团号召“爱民”、“五龙”等山林队一同向方贤岗、十八里甸子的伪警察和大排进攻,伪警察和大排队急忙逃跑。同时,第三军司令部直属队在赵尚志率领下,突然南下五常攻占方城岗和小山子,摧毁几处大排防所,然后北上宾县,在3小时内连续围缴了三道街、包家岗、四道河子等三地反动大排队,缴获30余支枪。继而在农历正月初二(2月5日)又缴获了驻财神庙的反动大排“占

北平”的50余支枪。而后横扫延寿,又缴了花砬子大排武装,烧毁鞞鞞草沟、姜家崴子伪警察所,再渡蚂蚁河至敌人统治势力较强的马鞍山、金坑一带。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伊始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使延寿日伪统治者大为震惊。

1935年2月4日春节当天,第三军第二、第三团各一部在亮珠河店附近与伪军孙团发生战斗,击毙敌参谋长等人,敌军溃逃。26日,第三团一部联合“野狼”、“占北”等部山林队,化装伪军在帽儿山站以西沿线连续围攻三处大排队,缴获100余枪支和子弹。该部又在蜜蜂站附近袭击一支日伪军,击毙日军7人、击伤5人。部分伪军在战斗中发生哗变。

此时,刘海涛指挥第一团在延寿的中和镇附近关门嘴子给予伪军马团以痛击,继而又在新开道将伪大排13人缴械,再与援敌常罗锅带领的延寿伪警察大队和大排队150余人发生战斗,敌人死伤10余人,老三区大排队长李清被击毙,日本指导官则利身负重伤,回城即死。第一团乘胜追击,敌人以马驮尸而逃。第三军声威远震延寿、方正。

正在第一团冲破伪军涂旅对延、方游击区的进攻时,在附近活动的“明山”部山林队曾主动协同第一团对敌作战。第一团从“明山”队得知民众救国军谢文东率残部正在方正东南部二和尚庙隐蔽徘徊,该团政治部主任张寿箴即前往会见谢文东,鼓励其坚持抗日立场,并当场揭露敌人派来策反的奸细林茂彬,予以处决,使民众救国军余部得以转危为安。不久,赵尚志率第一团等部东进,到达方正县大罗勒密,与谢文东、李华堂两部会合。

此前,谢文东自1934年10月率领残部转入依兰深山后,陷入绝望之中。一度参加民众救国军的祁致中“明山”队,曾去山中看望并告之其处境危险,谢部遂与“明山”队到刁翎游击,收集散失的余部,

再转方正活动。1935年1月,同样处于困境中的自卫军支队李华堂率部前来与谢部会合,劝说谢文东和他共同请求威名远扬、刚成立不久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帮助重整部队。当时,军长赵尚志认为,民众救国军虽然遭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部队所余无几,但是土龙山农民反日大暴动的影响,在东北特别是在松花江中下游一带还是深远的,协助这一部队的整顿和恢复,对东北的抗日事业是有益的。因此,承诺予以帮助。

1935年3月初,赵尚志在方正大罗勒密与谢文东、李华堂再次会见后,经过三方协商,决定在中共满洲省委早已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提出的共同反日、保障民众民主权利和不反对共产党的三项条件下,以这些队伍为基础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长、张寿篪为总政治部主任。3月25日,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名义发布布告:号召“一切反日队伍联合一起”,“结成统一战线”,来完成反日救国的光荣事业^①。

为了庆祝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成立,扩大反日联合军的影响,指挥部决定共同攻打方正县城。3月9日凌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部、自卫军支队、民众救国军和“明山”队联合部队共450人,在赵尚志的指挥下,远道奔袭,突然包围了方正县城。拂晓时,分4路攻城。守城伪军警200余人依仗城墙和炮台进行顽抗。至中午12时,第三军从东门突入城内,打开伪警察署,毙伤伪警6人,俘虏伪警务股长一人,缴枪15支,焚烧了日本参事官、指导官住宅。但伪县署与西大街因敌人顽抗未能攻下。其他各部亦均有缴获。为免遭敌

^①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布告》(1935年3月2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442页。

人援兵的袭击,联合军攻入方正 12 小时后撤出。敌人急从通河、宾县调兵救援。当援军抵达方正县城时,攻城部队已经安全撤退。

同年 3 月 7 日,第三军第二团在王惠同^①、金策指挥下,联合大小义勇军 10 余部约 370 余兵力,将延寿二区小黄烧锅(今兴隆镇)攻下,将日本农场及其建筑物悉数烧毁。不久,赵尚志率第三军司令部自方正西返,汇合第二团,大军西进至离宾县 25 公里之三岔河、元宝河一带积极活动,宾县日伪极为恐慌。

这一时期,第三军联合抗日义勇军各部所取得的胜利,振奋了抗日义勇军的士气,一扫冬季的沉闷。各部义勇军也主动与伪军、大排队作战。“八合”、“爱民”等部攻下夹板站,“北来”、“吕绍才”攻进了二道河子等地。

哈东各县抗日游击战争再度活跃,严重威胁了日伪的反动统治。1935 年 3 月下旬,日伪当局开始发动“春季大讨伐”,欲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使民众丧失对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军的希望。3 月 25 日,第三军司令部在老黑顶子召开了一次义勇军、反日山林队会议,到会首领 40 余名。由于前阶段联合对敌所取得的成果,各部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认为有继续联合战斗的必要。经协商同意分别成立了延方、路北、路南 3 个联合军指挥部,分别由刘海涛、王惠同、张连科担任指挥。决定由各抗日部队分区保卫抗日游击区,从而进一步将许多抗日义勇军部队团结在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周围,联合各种抗日力量共同与日伪军作战。

日伪军在这次“讨伐”中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方针,在宾县、珠河到处建立军事据点,同时集中一批兵力专门重点追击第三军主力部队

^① 王惠同(—1935),原名王惠童。中共党员。1935 年春,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团。同年 11 月率所部在突围战斗中受伤被俘,后被敌人杀害。

和第三军司令部。第三军司令部针对这一敌情,决定部队仍有计划地分开作战,既分散牵制敌人,又避免部队集中一地被敌人聚歼。司令部仍去延寿、方正,率领第一团、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等部作战,第二团仍在路北,第三团继续坚持路南战斗。随后,赵尚志率军部直属队和第一团在延寿蚂蚁河东金坑一带冲破伪军邓云章团和伪警察、大排 900 余名的围攻。刘海涛指挥 100 余骑兵强行冲过曹家屯南岗敌人封锁线,步兵大队抢占东山,迅速摆脱了敌军,继而折向苇沙河远征,并与活动在宁安西北山区一带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互为呼应。结果,敌军因失去目标而撤军,第三军部队却在苇沙河东山得以休整。敌人的“春季讨伐”也草草结束。

1935 年 4 月 23 日,赵尚志率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一团重返方正,在延寿中和镇北部会合了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明山”队和义勇军王营长部共 230 余人,决定联合进攻大罗勒密。此地是延、方、珠、宾、五等哈东抗日游击区与依兰、勃利抗日游击区的连结点,战略地位重要。大罗勒密驻有伪特别警察队等,共约 150 余人。四周有 4 个炮台,敌军有迫击炮、轻机枪等武器,火力相当强。4 月 24 日晚开始攻击。敌人集中力量死守,对我攻击十分不利。敌人机枪、迫击炮步枪一齐发射,在我军勇猛攻击下,敌人未能挡住攻势,夺路逃跑。进攻部队没收了敌木业的大量马匹和布匹等,天亮时撤出。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一团部队返回延寿。5 月,第三军部队在中和镇、夹信子附近收缴半截河、新开道等地新成立的伪壮丁团枪支,进攻老五团局所,伏击延寿伪警察队,获得多次胜利,给予延、方游击区境内敌伪势力以很大打击。

同年 5 月下旬,日伪军又发动夏季“讨伐”。赵尚志根据满洲省委和珠河中心县委“红五月”工作提纲,决定率领第一团,联合谢文东、李华堂所部东征牡丹江流域,牵制敌人对珠河等老游击区的进

攻,并相机扩大新游击区。5月23日,赵尚志率东征部队攻占苇河县楼山镇,烧毁敌防所。随后在龙爪沟击败一支俄人森林警察队,焚毁日本近藤林业公司原木堆场和森林火车一列,缴枪7支,击毙俄人森林警察11人。然后翻越张广才岭到达三道河子满天星,会合李华堂、王营、“东来好”等部。6月7日夜,各部联合进攻三道通。东征部队根据群众报告得知三道通敌人共有80余人的兵力。半夜,东征部队各部选出勇士开始向三道通发起攻击,烧毁了第六区伪警察署。敌人在齐家大院据守顽抗。因院墙炮台坚硬,未能消灭敌人。6月11日,伪军赫团尾追来到三道河子东征部队附近。敌人登上山地,占领了有利地形,机枪、迫击炮齐射,但未奏效。激战3小时,击退伪军赫团的攻击,伤敌3人。抗日部队无损失。此次东征和战斗的胜利,破坏了敌人设在牡丹江沿岸的若干砍伐木业组织,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木材资源的掠夺,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

此时,敌人乘第三军主力部队向牡丹江流域活动之际,已有计划地在哈东游击区修筑“集团部落”和“警备道路”、“警备电话”,蚕食第三军活动区。留守的第二、第三团对于敌人的动向缺少了解,依然采取东西出击的老办法,曾联合300余人义勇军远道迂回高丽帽子,企图打退敌人的进攻,但收效甚微。抗日联合军又合攻中东铁路九站未果。后来,第二团进攻乌吉密移民团缴得16支枪,第三团联合义勇军进攻蜜蜂站等地获得少量枪支和布匹。赵尚志分析新出现的情况,决定由张寿箴、刘海涛率第三军一团继续在依兰、方正一带活动,自己率第三军司令部返回珠河游击区。途中,攻占延寿反动地主张家大院,缴枪20余支。7月7日,第三军司令部在道北会合第二团,袭击帽儿山。8日,又颠覆自阿城来援之敌轨道铁甲车一辆。然后赵尚志率部经海沟南下会合第三团和义勇军“双龙”部,向五常、双城边境一带活动。

“双龙”部首领汪雅臣^①,原为东北军第二十六旅第三十四团的一名士兵。该团投敌后,汪雅臣带领要求抗日的少数士兵一起脱离伪军,组成山林队,报号“双龙”。后来参加五常县著名的山林队宋德林部,编为该部第四支队。不久,汪雅臣又脱离宋德林队伍,另行组建“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以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为根据地进行抗日活动。1935年春,曾配合第三军第三团进攻蜜蜂车站。此时,又与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二团会合共同战斗。

1935年7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后,日本侵略者从长城前线调回日军主力,在东北各地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大规模进攻。伪滨江省和第四军管区在帽儿山设立了宾县、五常、双城、阿城、珠河、延寿六县办事处,统一调动和指挥3000余日伪军警兵力,从7月20日起,先后对中东铁路南北两侧抗日游击区实行“大讨伐”。敌人这次“大讨伐”与以往历次“讨伐”有着不同的特点:军事“讨伐”时间比以往延长二三倍;以日军为主,全面包围抗日游击区,并在区内设置若干日军防所和基地,形成分割包围线,用精锐兵力在区内搜索、追击、堵截,妄图将抗日武装一网打尽。同时,疯狂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普遍地将山区民房烧毁,强迫农民“归屯并户”,迁入敌人便于控制的“集团部落”内,实施彻底破坏、毁灭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极其毒辣的政策,叫嚣要“毁灭赵尚志根据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8月11日在给中共满洲省委一份报告中说:敌人“以日军及警察队为主力,保护着治安工作班,……首先以十站为兵站,继则以蜜蜂站为兵站,来游击区普遍焚烧。现在路南游击区三分

^① 汪雅臣(1911—1941),又名王景龙,山东蓬莱人。九一八事变后在五常组织反日山林队“双龙队”。1933年2月独立组成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初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同年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任军长。1941年初在突围战中牺牲。

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仅离铁路线十余里地之地方未被烧毁,并申言发散布告,毁灭赵尚志根据地,禁止住户,否则一律讨伐屠杀。”^①县委在9月14日报告中又说,路北大青川、老黑顶子、对面山、马才沟、秋皮囤等地也先后被烧毁,沿山一带几乎没有了人家,一片废墟,除大亮珠河外,路北已经组织起的反日区被毁约在“三分之二以上”^②。此外,敌人强迫群众修筑道路、架设电话线,便于日伪军迅速沟通情报和调动兵力进行“讨伐”。还组织“工作班”、“宣抚班”,对群众进行欺骗,分化瓦解抗日义勇军与山林队。同样毒辣的还在于经济上实行严厉封锁,企图使抗日武装冻饿而死于山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活动日渐困难。

1935年8月29日,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机关从十三堡沿大青山转移途中,在娄家窝棚一带,突遭敌军袭击,满洲省委派到珠河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的张敬山(张玉珩)、县团委书记周毅夫、团县委书记金凤生等三人牺牲,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冯仲云受伤。县委书记张兰生以及冯仲云率县委机关和第三团部分战士退入珠河南部和五常地区,发动群众建立反日会组织,一直坚持抗日斗争。

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重兵“讨伐”,一些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也出现动摇不定,时有反复。又由于第三军司令部下令缴取活动在双城东部地区与第三军作对的山林队“压东洋”等部枪械,因此,一些义勇军与第三军的关系更加疏远,一度使第三军部队限于孤立,更增加了第三军活动的困难。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于1935年9月10日召

^① 《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敌人活动及县委工作情况的报告》(1935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01页。

^② 《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游击区情况及县执委会会议讨论事项的报告》(1935年9月1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37—238页。

开县委执委扩大会议。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为不能把统一战线理解得过于狭窄,决定调整过去执行的较“左”的政策,纠正对义勇军、反日山林队要求过高过严、拒绝来投的关门主义。为此,要在义勇军中进行不投降的签名活动,号召一切义勇军反对投降,扩大反日联合军。对要求改编与靠近人民革命军的反日队伍,将其编为反日联合军或收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直属系统。会议研究了整个哈东的政治形势和为反对日伪秋季“大讨伐”所采取的斗争策略,通过了《关于目前哈东政治形势与我们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敌人烧毁广大群众(包括地主富农在内)房屋,并迫使离开抗日游击区,归入大屯,失掉土地财产,势必激起群众的普遍仇恨与反抗。党的任务即应广泛地武装民众,组织反对敌人烧杀和归大屯的斗争。决议指出:敌人毁灭抗日游击区,使各个义勇军、山林队失去了“粮窝子”和驻军之地,势必使其更为向人民革命军靠拢。党的任务是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广泛地收编义勇军,或编入人民革命军,或使之参加抗日联合军范围,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会议决议:鉴于“目前路南北游击区已被全部焚毁,且系敌人讨伐之中心地带,没有必要集中大部兵力于游击区”^①,故决定在坚持旧游击区的同时,第三军司令部率主力部队向松花江北木兰、东兴、庆城、铁骊、巴彦转移,或向依兰、勃利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另以一部向珠河南部及五常发展,并相机恢复旧游击区的斗争。

根据珠河中心县委的决定,为适应新的斗争任务的需要,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部队进行了扩编,在原有3个团的基础上,新组建了

^① 《中共珠河县委关于游击区情况及县执委会会议讨论事项的布告》(1935年9月1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43页。

第四、第五、第六3个团,即原在路北、路南的第二、第三团战士编为第四、第五团,以原来的第二、第三团的团级干部为基础,补充地方青年义勇军,成立新的第二、第三团;第一团基本队伍不动,从中抽出一部与方正、延寿游击队合组第六团。此外,将“明山”部义勇军编为第三军方(正)依(兰)游击团(约70人);将路南青年义勇军和收编的山林队编为第三军独立营。第三军扩编后,各团主要干部是:第一团,团长刘海涛、政治部主任张寿箴;第二团,团长王惠同、政治部主任李熙山(后为赵一曼);第三团,团长张连科、政治部主任侯启刚(后为李熙山);第四团,团长郝贵林^①、政治部主任金策;第五团,团长尹庆澍;第六团,团长孟广才、政治部主任祁占海^②。全军750余人。

珠河中心县委执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第三军各部分别开始行动。原活动在延寿、方正游击区的第一团,此前即得悉由李延禄率领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一部已由密山西来方正活动。9月初,第三军第一团相继在方正县的李树园和大罗勒密的三家子与吉林自卫军支队李华堂部、第四军李延禄部会合。经三部会议协商,为打开通往方正、依兰各县的通道,1935年9月7日共同攻下松花江沿岸之洼洪,歼敌一部。然后,渡过牡丹江向刁翎前进,途中会合第四军第二团和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9月26日,联合攻下刁翎,击毙敌军5人,缴获7支枪。9月29日,又联合攻入林口。10月7日,第三军第一团同自卫军支队在牡丹江畔克上克截获伪军第二十九团运输船,缴得棉军装300余套、单军装30余套、13支枪、子弹和面粉、现款等。

^① 郝贵林(1900—1937),热河人。1934年参加珠河游击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哈东支队政治保安队队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师师长、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四师师长。1937年6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祁占海(生卒年不详),又名祁振满,外号祁大虎。中共党员。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率部队在铁骊、海伦一带活动,在战斗中牺牲。

1935年10月22日,赵尚志率第三军司令部和第四、第五团部队在大罗勒密东南二道河子孟二爷屯,与在这里活动的该军第一团会师。赵尚志听取了张寿箴和刘海涛关于第一团在方正、林口等地的活动情况,特别是与第四军部队共同战斗、生活的情况,使赵尚志对第四军和李延禄有了详细了解。因此,赵尚志决定亲自率领第三军主力部队前往五道河子会见李延禄。在张寿箴的引荐下,两位军长相见。在亲切的交谈中,相互之间增进了了解,消除了过去的误会。同时,赵尚志在与李延禄交谈中,还在第四军司令部看到了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王明、康生签署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王康指示信》)。

同年11月,为了贯彻《八一宣言》和《王康指示信》精神,第三军司令部在勃利西青山里九龙沟(今林口县青山乡)召开会议,依据《八一宣言》和《王康指示信》的精神,决定:(一)赵尚志率第三军军部和第五团赴松花江北,与谢文东、李华堂、李延禄等部一起会合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将过去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大建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使之成为北满反日游击运动统一的军事领导机关;(二)帮助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使之成为松花江北的抗日骨干部队;(三)背靠小兴安岭广泛开辟江北抗日游击区,联合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四)利用小兴安岭深山密林建立抗日联合军训练所,培养军政工作人才,以适应各军对干部的需要;(五)金策、郝贵林率第三军第四团活动于江南一带,以便打通与第五军东部派遣队的联络,帮助饶河游击队改编为第七军,并尽可能对第四军部队进行帮助,使之成为抗日基本队伍。

依据上述决定,第三军第四、第五团立即分别行动。赵尚志率司令部、第五团和李华堂部队一起重返方正县大罗勒密。赵尚志在此

处与李延禄再次会面。共同决定,赵尚志率第三军一部、李延禄率第四军一部和谢文东、李华堂等部相继渡松花江北上。1935年12月12日夜,赵尚志率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五团以及李延禄所率第四军部队渡过松花江,当夜即袭击了通河县二道河子伪警备队和警察所,缴了60余名伪军警的武器装备,计轻机枪2挺、马步枪57支和手枪6支、子弹1万余发和棉军装300余套,解决了部队所需冬装。不久,第三、第四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相继到达汤原,于1936年1月与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会师。

留在珠河、五常坚持斗争的第三军新组建的第二、第三团,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开展游击战争,以与远征方正、汤原的部队相呼应。1935年10月下旬,第三军第二团在小九站南方凉子山附近遭伪军二十三团夜袭,双方交火数小时,第二团迅速转移;继而在黑龙宫附近八里岗与日军伊藤部队发生遭遇战,互有死伤。11月15日,第二团50余人在路北五区春秋岭被日伪军警横山、冈田等部500余名重重包围。经一天激战,第二团击毙日军机枪队长大谷清一等3人,击伤日伪军30余人。但第二团部队也损失严重,团长王惠同因重伤被俘,后遭杀害。突出重围的7名指战员辗转路南与该军第三团会合。道北区委书记兼第二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在隐蔽养伤期间被俘。敌人先是在伪珠河县公署对赵一曼进行残酷的审讯,赵一曼始终坚强不屈,并义正词严地揭露和批驳日本侵略者散布的“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等谎言。赵一曼的伤势越来越严重。敌人为了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他们需要的情报,迫其投降,便将赵一曼送往哈尔滨,关押在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地下室的看守所里。敌人对赵一曼软硬兼施,企图从赵一曼口中得到第三军以及地方党组织的情报。赵一曼誓死如归,坚贞不屈,最后敌人对她施加酷刑,使赵一曼的身体遭到极大摧残。敌人为取得重要口供又送她去医院

治疗。在敌人严密监管下,赵一曼教育争取了看守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在他们两个人的帮助下一同逃离虎口。不幸,在赴游击区途中又被敌人追捕回来。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英勇就义。

此时,路南游击区和根据地也几乎全部遭受破坏。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转移到大泥河北十三堡的密林中。第三团在团长张连科、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的带领下过大泥河到五常县活动。1935年10月中旬,在五常县西20公里的兴隆镇同伪军第二十二团一个营发生遭遇战。后来,第三团同汪雅臣部义勇军以及其他抗日山林队联合对敌,基本部队有所扩大。同时,该军第二团余部在第三团的帮助下,也逐渐恢复了战斗力,与第三团一起坚持战斗。

第三军在1935年反对敌人的历次“大讨伐”战争中,由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极其野蛮的“三光政策”,哈东各县抗日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但是,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司令部采取在坚持原有游击区斗争的同时,派遣主力部队向松花江下游发展开辟新游击区的方针,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巧妙周旋,不仅使抗日游击区扩大发展,而且采取广泛收编抗日山林队的措施,使部队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为第三军后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建立,向勃利、方正伸展游击

1934年7月,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负责人李延禄自关内返回密山,继续领导抗日斗争。9月中旬,李延禄率领抗日革命军部队到达穆稜河北与密山游击队会合。此后,两支队伍在穆稜河两岸共同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曾先后在锅盔山、老道沟同敌军作战。一次,两支部队共驻老道沟,日伪军闻讯前来“讨伐”,抗日革命军和游击队鉴于敌军兵力几倍于我,遂即化整为零,跳出敌军包围圈,伺敌弱点

予以有力袭击。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员表现机智勇敢,在守卫一座山头时,发现敌人自山头的左右两面登山进攻,游击队在向两面射击一阵后,隐蔽撤离山头阵地,引起敌人登顶时互相残杀。此次战斗,抗日革命军与游击队共击毙日军官兵4人、伪军8人,抗日革命军负伤一人。

同年9月上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与杨春山到海参崴正式建立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吴平根据代表团的派遣越过边境,首先到达密山,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名义开展工作。吴平经过对中共密山县委工作和该地区的抗日部队、抗日斗争情况的深入了解后,召开了中共密山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吴平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广泛团结各种抗日武装和爱国力量,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的指示精神。会议根据这些新的精神,肯定了县委过去在组织群众、发展反日会组织和领导密山游击队斗争等方面的成绩;同时批评了县委过去工作中所出现的失误,主要表现在未能认真贯彻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因而不仅对待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普遍不信任、政策过“左”,发展群众性反日会组织的条件过严,甚至认为李延禄率领的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是救国军残部,不抢不夺是右倾,不去积极领导和援助该军。会上改组了县委会,张墨林仍任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李成林调勃利区委任书记,由李发任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由一名农民党员担任。县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吴平的提议,将密山游击队并入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编为第二团;依据县委原有酝酿建立抗日同盟军的设想,正式组建抗日同盟军司令部,任命李延禄为总司令。为加强对这支抗日部队的领导力量,会议决定选派一批党员干

部,如朴凤南、李槿淑(女)、黄玉清^①、胡伦、康山等到抗日同盟军中工作,充实部队的骨干力量。

中共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后,吴平到达穆棱河北人民抗日革命军驻地巡视工作,同李延禄具体研究部队改编问题。考虑到这支部队原是由吉林救国军余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改编而成,仍属抗日联合军部队性质,根据中共代表团新的指示精神和密山县委扩大会议决议,决定部队名称改为东北抗日同盟军。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统一建军部署,拟议:南满与东满已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第二军独立师,珠河的哈东支队建立第三军,便由东北抗日同盟军编为第四军。由李延禄任军长,胡伦任参谋长,不久任命由苏联学习归来的何忠国^②为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分别由李延禄、胡伦、何忠国兼任。第一师编3个团、一个独立营,第一团团团长杨泰和;第二团团团长张奎、政委何忠国兼任;第三团团团长苏衍仁(“小白龙”);独立营营长文荣(“打东洋”)。另设卫队连。全军共231人,其中骑兵137人。

不久,吴平通过海参崴联络站又陆续派遣由苏联学习归国曾任穆棱县委书记的李守中担任第一团政委,由邓化南任第三团政委。第四军设党委会,党委成员有李延禄、何忠国、朴凤南、胡伦等,由朴凤南任党委书记,该军第二团设党支部,党员数量也有增加。

从此,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军政素质

^① 黄玉清(1899—1940),原名黄亨镐,朝鲜族。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穆棱、密山县委委员。1934年秋后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吉东省委委员、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政务处主任、总指挥部政治部代主任。1940年在战斗中牺牲。

^② 何忠国(1909—1935),湖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后被派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4年秋归国,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在战斗中牺牲。

有了很大提高,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联合周围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开展游击战斗,并努力在伪军和大排队的爱国官兵中进行争取教育工作,使部队有了较快发展。

1934年冬,日伪当局为控制吉东地区民变不断的局势并“讨伐”刚成立不久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向中东铁路东段以及穆棱通往密山、虎林大道沿线派驻大量日伪军,同时采取放缓缴枪缴照的姿态,企图麻痹人们,并趁势以民间枪支组成与抗日武装对抗的伪民团,以使敌伪势力深入到抗日游击区。1934年12月,日军开始向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密山县委根据地哈达河沟里进攻,袭击张老畲菜营,沿途烧毁山区住房,驱赶农民、猎户,实行经济封锁,使第四军部队在这一带继续活动发生困难。同时,中共勃利区委为进一步发动群众,迫切要求第四军部队分兵前往支持和协助。为此,李延禄带领第四军军部和卫队连于12月20日由杨木峡沟出发向勃利转移。途中于大通沟会合该军第二团,经商定该团一部由军政治部主任兼该团政委何忠国带领,随同军部去勃利活动。从此,第四军部队便将抗日游击战争扩展至密山、穆棱、勃利三县,一面伺机打击敌人,一面宣传、组织群众,帮助建立抗日救国会。

第四军第一团在军参谋长胡伦、团长杨泰和、政委李守中领导下,以密山与勃利县交界处的锅盔山、茄子河(今属七台河市)一带为游击根据地,经常活动于穆棱河两岸(今鸡东县境),或向穆棱县境游击。在此期间,第一团还积极开展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工作和瓦解伪军的工作。1935年5月上旬,伪军第二十六团机枪连一个排长带领8名士兵携带轻机枪一挺、步枪18支、子弹5600发,加入同盟军第一团。不久,伪军第十五团驻二人班的一名班长带领全班士兵,击毙反动排长后哗变,携13支枪和2000余发子弹辗转前来参加第一团。密山县反日会和第四军第一团在茄子河召开欢迎会,欢

迎他们反正抗日。同时,第一团联合了抗日山林队“占高山”部50余人共同战斗。在游击战争中,还吸收了数十名志愿参军的抗日群众入伍。该团由30余人迅速发展至200余人。1935年6月16日,杨泰和率第一团翻山越岭,到达林(口)密(山)线上的滴道车站,准备攻打驻该站的一个作恶多端的日特工作班。午夜时分,第一团部队将该站包围并发起突然袭击,俘虏全部守站伪军,缴枪10余支、子弹3000余发。因日特工作班已于前一日撤走,侥幸逃脱。此战,该团有一人负伤。第一团在破坏站内设施和部分线路后撤走,使这条铁路中断数日。

该军第二团一部在团长张奎率领下,与留在密山的第一团一部配合开展游击战斗;另一部随军部向勃利进军,途中于1935年1月,在方家沟进攻伪军第二十九团赫奎武部一支骑兵,击毙其20余人,第二团负伤两人。同年春,到达勃利县青山沟,同该军第三团会合,并与中共勃利区委取得联系。4月,敌人开始春季“讨伐”,军长李延禄令第二、第三团部队在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率领下进入依兰县境活动。首战攻打土城子伪警备团,击毙敌8人,击伤6人,缴枪10余支。4月27日,第四军部队在阁凤楼同一个伪军警备连发生战斗,击毙伪军20余人,缴枪30余支,余者逃走。部队将在镇内缴获和没收的物资一部分给贫苦群众,接受一批农民入伍。在依兰活动期间,第二团发展至100余人。

该军第三团和独立营一直在勃利青山里、河口一带活动。1935年初,根据勃利区委书记李成林^①送来的日资木场“清水木业组合”的

^① 李成林(1904—1936),原名金东植,朝鲜族。1926年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入吉林救国军工作,任吉林救国军总部宣传部长。后历任中共密山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勃利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6年6月,被土匪杀害。

情报,李延禄令第三团和独立营进攻由伪森林警察中队守卫的日本“清水组合”木场。2月6日,第三团团长沙衍仁和独立营营长文荣率队攻打“清水木业组合”。战士们勇猛冲锋,用手榴弹和刺刀杀敌,击毙伪警察7人,其余溃逃,第三团3名战士负伤。此战缴获步枪10余支和大量马匹,除装备部队外,还将余下的马匹分给附近农民。战后许多伐木工人自愿参加抗日同盟军,第三团迅速扩大到300余人。该木场也成为第三团的营地。4月,第三团同第二团一起去依兰活动。5月,第三团和独立营袭击龙爪沟自卫团和勃利日资“东稻田公司”,缴获步枪22支和子弹一部。6月18日,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率第二、第三团与山林队“自来好”李天柱部,围攻闯入奎山附近何家屯的一股日军,击毙6人,仅两人逃走,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和6支步枪。第三团立即转移至马鞍山北沟刘家屯宿营,却遭跟踪而来的日军奎山守备队200余人的围攻。部队突围时,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牺牲。之后,部队返回青山里休整。六七月间,第四军将长时间随同配合作战的义勇军“自来好”李天柱部、“海乐子”孙成仁部、“北侠”宫显庭部,相继改编为该军第五、第六、第七团。

第四军在勃利县活动期间,与来自方正的谢文东部民众救国军、李华堂部自卫军支队会合。中共吉东特委得知这一情况后,便通过勃利区委和第四军以勃利抗日救国总会名义,争取将谢文东部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被谢文东婉言谢绝。谢文东与李华堂表示可同李延禄部第四军联合对敌作战。之后,同谢文东、李华堂协议联合成立“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李延禄任总指挥。共同在勃利、依兰、方正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5年6月末,李延禄率第四军军部离开勃利青山里向依兰、方正活动,在大罗勒密山区陈家亮子一带建立了军部密营。不久,收编山林队“海龙”部为第四军独立第五旅,旅长郭德福。通过该旅的协

助,与当地驻军伪警备旅一部秘密订立互不作战协议。同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周围的某些伪军警、自卫团建立秘密联络,使他们向第四军提供情报,提供枪支、子弹。

1935年9月初,第四军军部同到达方正县三家子的第三军第一团和吉林自卫军支队李华堂部会合。经三方协议,决定共同进攻方正县洼洪,以便打通方正、依兰和汤原各县间的联络通道。9月7日,各部共200余人围攻洼洪,全歼伪军关团一个排和大排队,缴枪30余支。此时,第四军第二团和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也西来大罗勒密会合。经各部协商,由第四军第二团、独立第五旅、第三军第一团、自卫军支队、民众救国军共600余人进攻勃利县刁翎(今属林口县)。9月26日战斗打响,各部迅速攻下刁翎,击毙伪军警四五人,俘虏20余人,伪军守备队段营反正,加入谢文东部救国军。随后,乘敌军增援刁翎之机,抗日军各部又奔袭了林口,9月29日,攻入街内,缴获军马近百匹和一批粮食、子弹。在此期间,第四军第三团于9月2日在勃利县马鞍山同北征的第五军派遣队会师,并在9月29日奉军部之命联合第五军派遣队,共同在林口至勃利大道上进行了截击敌人增援林口军车等战斗。

1935年10月上旬,刁翎、林口战斗结束后,李延禄率第四军部队返回方正县五道河子,准备召开第四军干部会议。这时,军部得知,该军第一团部队在团长杨泰和、政委李守中率领下赴五道河子途中,在勃利县缸窑沟与敌军发生的遭遇战,杨泰和牺牲。部队由李守中带至五道河子军部。

P302: 9月5日 同祥

1935年8月初,中共吉东特委接到《王康指示信》后,即迅速作出接受中共代表团指示的决议,并发出《致各县及四、五军党的信》,指示各地县委和各军党委须立即认真讨论,并在工作中予以贯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在五道河子干部会议前,已相继从中共吉东特

委(经勃利县委)接到了《王康指示信》、《八一宣言》。第四军五道河子干部会议首先传达了《王康指示信》和《八一宣言》,并进行了讨论。与会的第四军干部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广泛团结各种抗日武装和爱国力量建立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精神。根据吉东特委的意见,东北抗日同盟军进行了整顿,共编成7个团两个独立旅。其中,在1935年8月组成的第四团,是根据吉东特委的建议由饶河游击队改编而成的,仍独立活动在饶河、虎林地区。第四军经过整顿,军长仍由李延禄担任,政治部主任由罗英代理^①,参谋长仍由胡伦担任。第一团团长满景堂、政委李守中;第二团团长张奎、政委郑洪涛;第三团团长苏衍仁、政委邓化南;第四团团长李学福、政治部主任李斗文;第五团团长李天柱;第六团团长孙成仁;第七团团长宫显庭;独立第二旅旅长老来红;独立第五旅旅长郭德福。另设军部卫队连。全军总兵力达1600余人。会后,第四军除第一团随军部活动外,其余各部各返原游击区活动。

1935年10月30日,第四军第三团在勃利西九龙沟活动时,同第三军军部和该军第四团会合。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对第四军部队不甚了解。11月初,当第四军第三团团长苏衍仁半夜调动部队准备外出活动时,引起第三军的怀疑,认为其欲带队投降,于是第三军部队将第四军第三团团部和部分部队缴械,缴械过程中误伤团长苏衍仁,后死亡。经该团政委邓化南进行解释,并拿出共产党的文件后,方发现事出误会。第三军离开九龙沟后,第四军第三团机枪连连长宣某和第三团团部几个苏衍仁的亲信,打死了留在九龙沟养伤的第三军第

^① 罗英(1906—1937),原名韩心平,山东寿光人。中共党员。1933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1934年春任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反日党团书记,后任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秋任第四军代理政治部主任。1936年2月被捕叛变,后又混入东北抗联第七军,不久被中共吉东省委处决。

四团政治部主任张一武和第四军军部原卫队连连长崔成浩(金百万)后叛变投敌,之后,充当牡丹江宪兵队的密探,带领日本宪特到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抗联干部,并带领日伪军警把第四军在大罗勒密街上建立的各种秘密关系和据点悉数破坏。

1935年11月,日伪军冬季“讨伐”布置就绪。敌人严密封锁松花江和牡丹江沿岸,企图以重兵对方正、依兰、勃利一带的第三、第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进行围攻。此时,第四军军部与西来的第三军司令部于方正县五道河子会师。赵尚志与李延禄再次会面时,就第三军第四团误缴第四军第三团枪械一事当面向李延禄作了解释,并将缴得的枪支全部移交第四军第二团,消除了误会。之后,两军领导人面对敌人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经协商,共同制订了对敌作战方案。决定第四军第二团、第三军第四团坚持方正、依兰、勃利地区游击战争;第四军第五团开赴桦川、集贤一带活动,借以分散敌人目标;第四军军部及该军第一团与第三军司令部及该军第五团,联合民众救国军谢文东部、自卫军支队李华堂部,共同突围过松花江北上,会合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共同组建“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东北反日联合军临时政府”。

1935年12月12日,第四军部队在李延禄指挥下,与第三军北上部队,自方正跨过封冻的松花江,抵达通河县境东六方屯,袭击了当地保安队,缴获枪支和部分棉军装。同时得知距此屯东北二道河子伪警备队和伪警察所也刚发下冬装。李延禄与赵尚志研究决定智取二道河子。二道河子伪警备队和伪警察所共驻一个大院,大院四角设有炮台,高墙厚壁,不易强攻。便由第三、第四军各选几十名指战员,穿上刚缴获的伪军服装,由东六方屯雷保董带路,到达伪警备队大门前,雷保董向守城伪军喊话要求开门。大门一开,第四、第三军部队迅速控制了院中各炮台据点,击毙负隅顽抗的日本指导官,将全

部伪军警俘虏、缴械。然后,两军共同挺进汤原,1936年1月到达汤原太平川,与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会师。

六、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绥宁地区游击战的扩展

1934年9月,日伪军将绥宁抗日游击区列为秋季“大讨伐”的重点区域。这次“大讨伐”,在军事上,以日军和伪靖安军为主力,以其中一部驻守城镇和交通要道,以另一部采取四面包围、重点进攻的战术,专门进攻、追击抗日武装。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加强控制和经济封锁政策,强迫山区农民“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断绝人民群众同抗日武装的联系,并配合欺骗宣传,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土匪”的口号,破坏各种抗日队伍的联合斗争,孤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

日伪军这次秋季“大讨伐”开始后,活跃在宁安西北山的8支山林队因敌人的进攻,遭受很大损失,死伤200余人,余者埋枪分散,队伍几乎全部瓦解。东南山八道河子自卫队与敌人硬拼,死守根据地,也损失严重。不久,敌人即集中兵力在绥宁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围攻反日同盟军。这时,绥宁反日同盟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是:业已承诺加入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原救国军柴世荣旅、傅显明团等部尚在汪清;西南山区王毓峰、王汝起两团和张祥队兵力较弱;同盟军中的基本部队宁安游击队刚刚建立,工农义务队恢复不久,虽然经过整顿,清除了隐患,但兵力还不足100人,力量薄弱。鉴于上述情况,反日同盟军立即改变迎敌方针,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力求避敌锋芒,击其虚弱。9月23日中秋节,同盟军在团山子与一支日军作战,击毙日军8人,伤其10人。当日军继续深入东南山区向八道河子抗日根据地进攻时,同盟军即化整为零转移西南山区,使敌人欲围歼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队的图谋落空。

1934年11月,敌军又向同盟军展开新的进攻。此次“讨伐”,日

军龟缩城镇,以伪靖安军为主力,在伪警察队和自卫团配合下开始向东南山区、西南山区实行分割包围,企图将反日同盟军各个击破。这时,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应绥宁反日同盟军的请求,派该军第三团第四连和第四团第五连,由金日成率领从汪清前来宁安联合作战。绥宁反日同盟军与第二军派遣队继续采取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与敌军周旋。12月初,宁安游击队在东南山区孢子沟与伪警察队发生战斗,打死宁安二区警察队第二中队长马志超;工农义务队在岔沟伏击一支伪靖安军,击毙10余人,击伤20余人,俘敌两人,缴枪5支、子弹近千发。战斗中,工农义务队追击残敌约5公里,令伪靖安军胆战心惊。12月15日,第二军派遣队150余人在石头河子迎击伪靖安军,击毙敌军30余人。反日同盟军的顽强战斗引起敌人的注意。1935年1月中旬,日军前方司令部集中日军百余人 and 伪靖安军一个团以及伪警察队、伪自卫团等共2000余人,并以飞机配合,在西南山区追踪,寻求与反日同盟军作战。

针对这种形势,反日同盟军与第二军派遣队采取化整为零战术,分别冲出敌人包围,开辟新区的作战方针,将同盟军部队分为4个部分进行分区作战:第一部分,以工农义务队、第二军派遣队第四团第五连为一部向宁安以东发展;第二部分,以宁安游击队为一部去西北山开展游击活动,互为犄角之势,便于相互呼应;第三部分,王毓峰团与张祥队仍返南湖头活动;第四部分,第二军派遣队第三团第四连返回汪清作战,借以分散敌人兵力。此时,东南山区抗日游击区仅有白孢子屯至马厂不足20公里的一条线。反日同盟军一部与第二军独立师一个连组成的东进部队,过天桥岭进入东南山的根据地。临近春节时,敌以700余名步、骑、炮兵部队向东进部队发动围攻,包围二三道河子、天桥岭、平日坡。东进部队6天内与敌军作战7次,歼敌15人。此时,因部队疲劳,进入八道河子大顶子密营暂作休整。不久,

敌军又跟踪而至,大顶子密营失守,东进部队掩护群众立即翻越老爷岭进入汪清。第二军独立师第四团第五连归还建制,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工农义务队在协同第二军第四团攻打小三岔口后,即重返宁安。

由宁安游击队、第二军派遣队与反日同盟军张祥队组成的西进部队于1935年1月在东京城附近猴石屯与一支伪靖安军作战,毙伤敌24人。这一期间,组成的西进部队平均四五天作战一次,战斗十分频繁。1月17日,西进部队宁安游击队在东京城西长岭子,将东京城伪自卫团一支12人的运输队缴械。此后,西进部队受阻停留在西南山区,同王毓峰团分别打击伪靖安军与伪自卫团,获得一些胜利。至此,日伪军的秋冬季“大讨伐”被粉碎。绥宁反日同盟军也在逆境中渡过难关,坚持了抗日游击战争,部队也得到了发展。

在此期间,1934年12月10日,中共宁安县委在东南山区石头河子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与会者有中共宁安县委书记李范五^①、绥宁反日同盟军军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周保中,前团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②、前团吉东局书记李光林以及关书范^③以及工农义务队政治指导

① 李范五(1912—1986),原名李福德,又名张松。黑龙江穆棱人。北平大学学生。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穆棱县委书记、宁安县委书记、吉东特委代理书记等职。1936年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回延安,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合江省工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松江省政府副主席。新中国建立后,历任林垦部副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等职。1986年5月病逝。

② 张中华(1912—1937),吉林永吉人。1932年在哈尔滨扶轮专科学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底任共青团宁安县委书记,后任共青团吉东特委组织部长、中共宁安县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兼抗联第五军宁安留守处主任、中共吉东省委委员等职。1937年12月,在宁安桦皮沟对敌战斗中负重伤被俘,在狱中被杀害。

③ 关书范(1913—1939),1930年加入共青团,曾先后任共青团吉东局书记、团宁安县委书记,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历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长。1939年1月,因畏惧艰苦斗争,搞所谓“假投降”,被中共吉东省委开除党籍并处死。

员陈翰章、刚从中共满洲省委返回的同盟军政治部主任胡仁等。会上由胡仁传达了中央《二月指示信》精神。会议决定,为巩固部队,同盟军军委会领导干部和党、团员必须深入基层和士兵中去工作。会议选举胡仁任同盟军党委书记,组成新一届党委会。

1934年12月20日,省委吉东巡视员吴平到达中共宁安县委,并立即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吴平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全面、彻底贯彻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广泛开展反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积极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传达了中共代表团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以便贯彻《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部队。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吴平与宁安县委、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同时,健全了宁安县委组织。会议针对日伪军发动的冬季“讨伐”和宁安东南山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的危急形势,决定绥宁反日同盟军各部同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一部,分散转移,冲出包围,开辟新区。

1935年1月,吴平前往宁安东南山区会见绥宁反日同盟军军委会主席周保中,传达了中共代表团的指示精神和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共同商议组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等事宜。关于建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决定,首先获得了原绥宁反日同盟军柴世荣、傅显明两部的赞同,又得到活动在西南山的王毓峰、王汝起、张祥等部的响应,遂于1935年2月10日,发表《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组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宣言》。《宣言》声明:最近由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是中国人民反日救国自己救自己的武装。这支军队是东北有历史的反日军队,在绥宁各地有过很显著救国的成绩。”“这次我们改编的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与珠河、延寿

的第三军及密山一带的第四军是一个系统,并且和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的第二军,订结密切联系。这样办,就是要更容易反抗日本强盗,统一反日力量,推展救国运动。”^①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于1935年1月至3月期间先后编成了两个师,7个团,共936人。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第一团,团长李荆璞(兼)、政委陈翰章(兼);第二团,团长王毓峰、政委高凤仪;第三团,团长王汝起、政委伊俊山^②。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副师长姜振荣、政治部主任李光林、参谋长陈翰章,第四团,团长傅显明(兼),政委冯朴;第五团,团长姜振荣(兼);第六团,团长胡嘉泉;第七团军部直属,团长于戴江;独立营、警卫连等。

绥宁反日同盟军之一的穆棱游击队被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警卫连,由原穆棱游击队参谋长张镇华任连长,姜东秀任指导员。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之初,主要活动在宁安县境内。此时,日伪军对宁安、汪清的“讨伐”正在进行。1935年3月中旬,第五军第一团一部自东满汪清归来,与前去迎接的该团另一部会合。3月16日,在师长李荆璞指挥下,该团在东南山区二道河子沟里石门子设伏,将进入伏击圈的伪靖安军第一团一个连和日军宫藤部队200余人击溃。此战,中尉宫藤受重伤,曹长田中被击毙,同时毙伤日伪军10人,俘虏5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5支、子弹2000余发及其它军用

^① 《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组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宣言》(1935年2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4,第398、399页。

^② 伊俊山(1908—1964),原名伊绍宗。黑龙江五常人,满族。北平大学肄业,1934年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第三团政委、东北抗联第二军独立旅政委、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任沈阳桥梁厂厂长等职。1964年3月病逝。

品。同日,第二团一部在东京城西长岭子与一支60人的伪靖安军发生遭遇战,毙伤5人。3月21日,该团另一部与山林队“久战”部联合击溃驻蛤蟆河子伪军,随后又打退来自上马莲河的一支敌援军。是役敌死伤10余人,其中一名日本军官受重伤后毙命。3月27日,第一师一部进攻二道河子日军守备队,击毙日军9人,俘敌7人,缴获10支枪、子弹1000余发。4月2日,第一团一部进攻卧龙屯伪自卫团,缴获其全部枪支。4月3日,第一团联合山林队一部在官地南沟伏击伪军第二十七团一支骑兵。是役毙伤伪军3人,缴获军马5匹和步枪一支。在此期间,第一师各团在狼窝、关门嘴子、苇子沟、横道河子和江北二站西沟的战斗均取得相当胜利。这期间,第五军各部与日伪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

伪军、伪靖安军在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连续打击和宽大俘虏政策的影响下,接连发生哗变参加第五军。1935年2月,在缸窑沟,伪军12人击毙日本人排长和伪军班长,携机枪一挺、步枪20余支哗变。3月27日,伪靖安军第一团第四连班长吴铁钢、白义江在拐弯子携枪投入第五军第一团。4月初,在反日联合军的接应下,驻卢家屯伪军一个班长击毙一日本人副营长后参加第五军。这些伪军哗变反正事件令敌人坐卧不安,伪靖安军第一团第一、第四连及迫击炮连因此有被监视者、有被解除武装者,最后竟不得不将全团调回奉天。

1935年4月上旬,第五军第一师第一团一部被军部派往西北山区活动。途中在陡沟子附近袭击一支由俄人组成的伪警察队,然后又同日军守备队交火。4月10日,该部在宁安至敦化大道袭击由东京城南下的一支伪军,歼其大半。部队到达西北山区后与在此活动的第五军第七团取得联络,将原八大队溃散时埋藏的机枪一挺、匣枪8支、步枪50余支取出,并使潜伏的抗日山林队“占林”、“靠天”等部恢复活动,攻袭烧毁敌防所,解除伪保甲武装。该部随后转向西南山

区活动,4月15日在上马莲河西乡围歼一支日本人“农村工作班”。4月30日,在葡萄沟突遭一支日军攻击,战斗4小时,日军最后撤走,第五军第一团部队牺牲3人。不久,第一团一部在镜泊湖东庙岭与日军“讨伐队”发生遭遇战,击毙日军7人,击伤12人。第一团牺牲两人、负伤3人。5月4日,第一师第三团夜袭六道河子车站获胜。

第五军第二师第四、第五团部队,长期在汪清活动。1935年4月初,军政治部主任胡仁前往汪清与副军长柴世荣、师长傅显明将部队加以整顿后,返回宁安。不久,第四团在筑路工人的协助下,袭击蛤蚂河子图宁铁路工程局获胜,第五团在宁安东北部屡创伪警察队,使之不敢轻易出动。5月2日,第四团袭击二道河子马厂伪国道局,击毙日军5人,俘虏5人,缴轻机枪一挺,步枪10支。4日,第五团袭击图宁铁路上的石头车站,歼灭日军守备队10余人,焚毁该火车站站房。

1935年1月至4月,第五军与日伪军警共发生战斗30余次,粉碎了敌人的冬季“讨伐”。

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在绥宁地区经过半年多的战斗,获得了许多胜利,部队从1934年的危境中重新发展壮大起来,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使绥宁地区的抗日局面有所改观。但是,第五军部队几乎全部集中在宁安县狭小区域内,距离敌人的东部统治中心城市牡丹江很近,中东铁路和正在修筑的图们至佳木斯铁路交汇其间。敌人视此地为军事要地,集结于这一带的日伪军和警察武装达3000余众。鉴于这种形势,1935年5月7日,刚建立不久的中共吉东特委和宁安县委写信给第五军党委,指出为避免孤军作战和被敌军聚歼的危险,进一步扩大游击活动区域,创造广阔的抗日局面,第五军应分别与南满的第一军、东满的第二军配合作战,同哈东第三军、密山、勃利的第四军取得联络,以期各军协调配合作战,相互牵制敌军,化被动为主

动。根据吉东特委和宁安县委的这一建议,第五军军部于5月15日召开所属第一、第二师领导干部会议。会议经研究,决定实行分兵作战,除军部留置一部分部队在宁安活动并指挥全军行动外,将主要作战部队组成东西两支派遣部队:东部派遣队由宁安东出穆棱、密山、勃利,联络第四军;西部派遣队由宁安向西部活动,以苇河与中东铁路沿线为目标,兼及西南额穆、敦化,以期联络第三军与第二军、第一军。

1935年5月28日,东部派遣队组成。该派遣队由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团各一个连和军部警卫连组成,由前穆棱游击队队长、新任第五军政治部主任胡仁率领,自宁安出发,越宁安、穆棱边界,跨中东铁路东进,深入勃利县大小杨木背、半截沟、龙爪沟等地,又转至勃利、穆棱边界之小穆棱河、黑老婆沟、土顶子等地开展游击活动。6月,东部派遣队在福禄屯胡家甸子和亮子河相继袭击和伏击了穆棱县伪警察大队,歼敌30余人,缴步枪20余支。7月7日,东部派遣队与中共穆棱县委取得联系,协助重建穆棱游击队。

同时,东部派遣队沿途还广泛与集聚于此地的抗日山林队“徐司令”、“九彪”、“大金山”、“小金山”等部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许多义勇队和山林队都表示愿意随同东部派遣队一起作战。7月,胡仁与“徐司令”等部队在杨木背开会,共同协商建立反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及妥善筹集给养和税收等问题。

由于穆棱地区日伪势力薄弱,前吉林自卫军溃散后,抗日义勇军与山林队多集聚于此,第五军所到之地与敌军发生的战事不多。1935年9月2日,第五军派遣队在勃利县马鞍山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三团会师,联合共同打击敌人。9月29日,两支部队去林口至勃利大道截击日本运货汽车,途中在马鹿沟遭敌伏击,部队虽然最后冲出敌人的包围,但牺牲连长一人、队员负伤一人。敌军追击部队

被第四、第五军的留守部队打退,敌军被击毙7人、重伤4人;第四军第三团负伤一人。9月末,第五军第一团一部在小穆棱河与一支16人的伪军部队发生战斗,一举将敌包围缴械。此时,第五军东部派遣队已从刚出发时的70余人,发展至140余人。

1935年10月,东部派遣队将“天福”、“访友”等部改编为第五军第八团,“小金山”部也加入了第五军警卫连。许多村屯的伪自卫团和大排也前来报告敌情,送粮食、鱼、肉等物。同月,东部派遣队同新编的第八团在亮子河将前来偷袭的伪警察队给予狠狠打击,敌落荒而逃。事后,伪警察心惊胆战地说:“人家抗日军在宁安把满洲国的‘皇军’——靖安军都打得落花流水,何况我们这些破烂兵呢?”吓得穆棱伪警察大队长从此不敢出战。由于第五军在勃利、穆棱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了敌伪势力。

从10月开始,敌人从牡丹江铁岭河、下城子等地调集大批兵力,对勃利、穆棱地区的抗日武装进行了秋冬季“讨伐”。第五军部队与敌人展开频繁的战斗。10月21日在杨木背收集给养时,第五军部队将勃利县一支11人伪军全部解除武装,缴枪13支。11月间,在黑老婆沟伏击木材运输车队,打死日军两人。在南沟、小杨木背等地,第五军部队连遭敌人的偷袭,出现一些伤亡。同时,不少抗日山林队也遭受很大损失。为转移敌人进攻的目标,东部派遣队除留少量部队在下城子至穆棱铁路路西游击区,从事建设部队过冬密营、收集服装、给养外,将大部分部队派往铁路以东地区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对铁路西的“讨伐”。1936年2月,在白石砬子养伤的第五军伤员被白石砬子自卫团捕去,东部派遣队为救伤员立即出动,将该处的伪自卫团包围,缴获17支枪。3月,东部派遣队于勃利县清沙河,在内应的引导下突袭日军营房,击毙日军7人,缴获6支枪和一些子弹。不久,东部派遣队又将距穆棱县城约4公里的四合屯反动自卫团缴械,

缴获步枪 10 余支。然后用在这两处缴获的约 20 支枪重新装备了穆稜游击队和青年义勇军,这支计有 60 余人的地方抗日武装,积极配合第五军对敌作战。

东北反日联合军东部派遣队在穆稜、勃利县境的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由她领导的抗日部队的政治影响,分散了敌人的兵力,减轻了敌军对宁安第五军部队的压力,并为后来第五军与第二军部分部队的北征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1935 年 8 月,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一连(仅一个排)、第三连、第二团和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连与第二军第三团第四连、第四团第二连和青年义勇军共同组成西部派遣队,由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第五军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率领向西南的额穆县进发。就在此时,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第四团共 5 个连到来,便共同组建了第五、第二军联合指挥部。

8 月 8 日,西部派遣队渡过镜泊湖抵达额穆县境内。8 月 16 日,西部派遣队一部在靠山屯伏击伪军一队骑兵,毙伤敌连长等 10 人,第五军战死两人。此时,第五军第三团加入西部派遣队。10 月 5 日,活动在官地附近四方头的西部派遣队一部突遭敌军袭击,死伤 11 人。11 月 3 日,西部派遣队在额穆县青沟子(今属敦化市)附近与一小队日兵遭遇,立即予以围歼,击毙其 10 人,缴轻机枪一挺、步马枪 8 支、手枪 2 支、子弹 600 余发。西部派遣队牺牲 3 人。在青沟子发生战斗时,附近还有一支伪军,西部派遣队战士向他们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专打日本兵”,伪军受到感召,未去支援被围的日军。事后伪军传说:“红军真勇敢,专打日本鬼子,这才是真正救国的。我们不能打红军。”11 月 5 日,西部派遣队在额穆的老道口突遭日军松井“讨伐队”一小队和伪自卫团的攻击,部队立即予以反击,并全歼该敌,军曹中村等 9 人被击毙,另重伤其两人,伪自卫团亦全部被击伤,缴获许

多枪支子弹。

西部派遣队作战勇敢,遵守群众纪律,获得群众的热情拥护,同时注意对地方保甲武装的教育和争取,结果部队经常收到地方送来的粮食、服装等,部队全部冬装得以解决。群众不时向部队报告敌情,还有许多农民参加西部派遣队,部队人数日有增加。第一团第一连仅20人的一个排已发展至30人,师部决定将其扩大为两个排。第二团也由一个连扩大为两个连,人员40余人。第二军第四团第二连原来全部由朝鲜族队员组成,现已有一半成员是汉族。西部派遣队由原来的200人,增至300人。

1935年12月6日,西部派遣队党的工作委员会会议根据敌人对额穆地区发动“讨伐”的情况,决定由第五军第一师李荆璞师长和第二军第三团政委金日成共同率领西部派遣队第五军第一团一个连、第三团和第二军的两个连,共百余人向黄泥河、威虎岭及敦化附近发展,以便同第二军西部部队取得联络,并联系当地几支抗日山林队,袭扰吉敦铁路运输线;由第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率第五军第一团、第四团各一连加上军部新派来的第七团一个连,共80余人,折返宁安向西北山海浪河进军,以便与第三军取得联络;第五军第二团留守额穆与驻宁安的第五军军部保持联系,并开展伪军工作。西部派遣队再次分兵行动的目的在于牵制敌军力量,更普遍地动摇敌人对这一带的反动统治。

1935年12月7日,李荆璞与金日成所率部队攻克官地,然后伏击来自通沟岗子的援敌,歼敌很多。1936年1月7日,攻占黑石和沙河沿。9日,又攻下额穆索小街。西部派遣队逼近敦化。

第五、第二军西部派遣队在额穆、敦化一带的积极战斗,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打击了敌伪统治,并与第二军在西部活动的部队相互呼应,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第五、第二军的政治影响。

第五军留守宁安的部队由第一团一个排、第三团一部、第四团第二、第三连、第五团组成。第六、第七团在西北山区活动,其中第七团有时就近去额穆活动。由汪清前来的第二军第三团第五连和第四团第三、第五连也在第五、第二军联合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共同打击敌人。但是,由于敌人用重兵在宁安进行“讨伐”,留守的部队又多由改编不久的山林队组成,处境十分不利。其中第五军第二师第五、第六团在东北岔、山东屯等地接连遭受严重损失,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李光林英勇牺牲。因此,留守部队一度处于危险状况。第五军急调东部派遣队中的第四团第一连由胡仁带领返回宁安,重新整顿第二师部队,保卫宁安游击根据地。

在此期间,第五军军部相继接到由中共吉东特委转来的《王康指示信》和《八一宣言》,并根据吉东特委的指示在部队中予以贯彻。

一年多以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在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军长周保中的领导下,在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部队得到很大发展,游击区扩展至整个绥宁地区。

七、汤原、萝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

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建立后所展开的积极游击战争,引起了当地敌人的重视。1934年冬初,日伪当局除调日军外,又调动伪军涂旅和伪警察队等500余人兵力,对汤原游击根据地进行围攻,并布置全县伪自卫团守住各山边沟口,狂妄声称:“三个月保打北大山”,企图一举消灭汤原反日游击总队。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汤原游击总队决定首先向东挺进,主力部队转移到毗邻的萝北县城凤翔镇、史家亮子一带活动,避开敌锋,威胁萝北县城,迫使敌人自汤原游击区退兵。当游击总队进入萝北县境后,驻凤翔镇的伪军涂旅第三十八团一个骑兵连,在五间房向游击

总队发动攻击。游击总队当即迎战,同时以一个中队迂回敌后将敌骑兵连拦腰切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敌军队伍顿时大乱,敌骑兵连长等3人被击毙,其余仓惶撤走。随后,游击总队又折回汤原县境东部洼大岗(今平原)和梧桐河对岸火龙沟一带活动。由于汤原游击总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10多次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一些伪军警部队更不敢与游击总队作战。敌人在汤原的冬季“讨伐”宣告破产。

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甘心失败,反而迁怒于伪军的动摇。1934年12月,日伪当局从佳木斯派出一支50人的日军部队到汤原,解除了在冬季“讨伐”中遭到失败的伪军涂旅一部的武装,同时极力扩大反动的地方伪自卫团,迫使伪军死心塌地为之卖命。然而适得其反,该旅伪军受尽日军欺凌,旅部在莲江口公开号召伪军士兵防备和反抗日军的缴械,涂旅的一排伪军在凤翔镇杀死该部日本指导官和翻译官,举行哗变。日军惧于形势不稳,暂时停止了对伪军的缴械行动。日本侵略者企图迫使伪军继续“讨伐”的打算再次破产。在此期间,各地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纷纷缴除地方伪自卫团的枪械,武装自己,敌伪武装普遍动摇。汤原游击总队的威望迅速提高。

1934年12月4日,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在率领部队进攻太平川二道岗的战斗中负重伤,离队休养5个多月,部队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度受到削弱,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中共满洲省委和吉东巡视员吴平了解到这种情况后,于1935年5月派田学文到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代理政委职务,加强政治工作,整顿部队。此时,安邦河区党组织领导20余名朝鲜族青年在一次夺枪战斗中失败后,加入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增强了游击队的骨干力量。6月5日端午节,田学文率领游击队向汤原北部转移,在距汤原县城西北15公里处与一支伪警察队遭遇,战斗中田学文中弹牺牲。7月,省委留

守人员小骆又派前汤原游击队中队长杨队长携带信件返回汤原,任游击队代理政治委员,协同夏云杰一起在队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体游击队员的团结,整顿了组织,加强和充实了干部队伍,迅速扭转了部队的精神面貌,战斗力大大增强,部队又恢复到400余人。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留守人员又调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白江绪^①为省委特派员到汤原,协助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工作,并在游击总队内建立党委会和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从而使汤原游击总队政治上更为坚强,成为松花江下游一支抗日劲旅。

汤原游击总队为巩固与扩大太平川游击根据地,决定拔掉根据地区域内的太平川伪警察署、耿家小铺、耿家围子、乔玉柱屯等地几个敌伪据点。

1935年8月16日凌晨3时,在政委夏云杰、队长戴鸿宾率领下,游击总队乘打入伪警署内部的一名救国会会员换岗交接班之机,里应外合,进入设在万发和商铺院内的伪警察署,迅速占领炮台,同时冲进正在酣睡中的伪警察宿舍,一枪未放,俘虏了伪警察署长和全部伪警察共30余人,缴获30余支枪和1000余发子弹。之后,一部分游击队员穿上伪警察服装,令俘虏充当向导,又顺利解决了耿家小铺、耿家围子和乔玉柱大院伪军据点,收缴了伪自卫团等武器装备。8月24日晨,游击总队在莲江口附近八号车站颠覆自佳木斯开往鹤立岗的一列工程火车。9月,中共汤原县委指示游击总队派出一支20余人的小部队到安邦河,协助区委筹建地方武装。队长戴鸿宾曾率领这支部队夺取当地伪自卫团40余支枪,组建了一支地方抗日游击队。

此时,原由冯治纲领导的格节河金矿矿警队改编的抗日义勇军

^① 白江绪(1904—1979),山东日照人。早年在中东路亚布力车站当工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后历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汤原中心县委委员、书记、下江特委书记。1937年返回山东,继续抗日。1979年病逝。

“文武队”，在与汤原游击总队长期联合抗日斗争中，经过夏云杰等的不断的启发和教育，冯治纲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宗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主动向夏云杰提出加入汤原游击总队的要求。1935年9月，汤原游击总队接受冯治纲的请求，将“文武队”单独编为汤原游击总队的一个中队，并任命冯治纲为该中队中队长。

这时，汤原游击总队由一个中队扩编为5个中队。汤原游击总队的队长和政委仍由戴鸿宾、夏云杰分别担任，第一中队，中队长王居选，下设3个小队；第二中队，中队长王秀芝，下设两个小队；第三中队，中队长裴敬天，下设两个小队；第四中队，中队长冯治纲，下设两个小队；第五中队，中队长张传福，下设两个小队。全总队约700人。

1935年12月中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和东北民众救国军、吉林自卫军支队等相继到达汤原，与汤原游击总队会师，准备召开会议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一时间，汤原的抗日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

为了增强汤原游击总队的实力，进一步扩大小兴安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后方基地，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经研究决定，拔除亮子河金矿伪军据点。

亮子河金矿位于汤原县亮子河中上游，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的汤原县三大金矿之一。这里除设有30余人的矿山警察队外，还驻有伪军第三十八团第一营第一连。1935年12月25日，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率领200余人的队伍到达亮子河金矿附近驻扎。他们通过当地的一位姓单的开明士绅邀请伪军孟连长赴宴，并趁此机会对孟连长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指明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爱国和叛国两种前途。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孟连长同意下令全连放下武器。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所部几乎没有受到抵抗，即顺利地缴了两挺机枪、100余支步枪和2万余发子弹。当时就

有数十名矿工和矿警参加了游击总队。其余伪军官兵发给路费遣散回家。其间亮子河金矿反动经理率 30 余人的矿警队试图反抗,立即遭到汤原游击总队的猛烈反击,也不得不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游击总队又获得了一些弹药。经赵尚志和李延禄共同决定,把此次收缴的武器全部交给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用以改善装备,扩大队伍,为成立人民革命军做好准备。

1936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第三军、第四军和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在汤原县吉兴沟(今伊春市浩良河经营所)召开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宣布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1 月 30 日,在第三军和第四军的帮助下,经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建议,在汤原县温家屯,将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由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箴兼任代理政治部主任,秘书长黄吟秋^①。全军编为 4 个团:第一团,团长王秀芝;第二团,团长戴鸿宾、政治部主任裴敬天;第三团,团长冯治纲、政治部主任周云峰;第四团,团长张传福、政治部主任徐文彬;军部设保安连,连长李显明。全军 1000 余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随后发表了成立宣言。宣告:“四年多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东北民众,不但没有在当奴隶的统治中屈服着,没有甘心做亡国奴,反而激起东北反满抗日的怒潮日益澎湃起来。”宣言表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全体指战员“为恢复东北失地而战!为实现东北各民族彻底解放而战!”

^① 黄吟秋(1906—1989),化名李德言,辽宁台安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到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工作,历任中共汤原县委组织部长、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兼秘书长。1937 年 2 月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特派员,赴依兰组织县委。1938 年 3 月被捕,后保释出狱,在牡丹江从事革命工作。1989 年 8 月病逝。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的成立,标志着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建立,饶河、虎林游击战的开展

自1934年11月开始,敌人在两个月的冬季“讨伐”中,动员了饶河、虎林地区的全部日伪军,向饶河游击根据地发动进攻。几处根据地虽然遭到破坏,但饶河游击大队却在反“讨伐”战斗中越战越强。敌人为了消灭这支地处中苏边境的抗日武装,又于1935年1月,从佳木斯等地调动800余人的日军步骑兵前往饶河,继续进攻饶河反日游击大队。

这时,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李学福总结经验,改变战术,把分散几处的队伍集中到大旺砬子一带,在敌人的必经之路选择有利地形进行埋伏,以逸待劳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1935年1月29日,敌人果然向游击队埋伏的地方进犯。游击大队在李学福和崔石泉的指挥下,派几名队员边打边退,诱敌深入。同时,令几十名滑雪突击队员埋伏在积雪较深的险要地段,以便出奇制胜。当敌军进入游击队伏击圈时,指战员们立即发动猛烈射击,敌人纷纷死伤倒地,其余敌人不得不在毫无遮掩的雪地上卧倒还击。此时,游击队滑雪队迅速出击,勇猛冲杀,敌人阵势大乱。游击队立即发起全面攻势。战斗持续一天,毙伤敌、包括冻伤在内,约达百余人;缴获步枪5支。游击队员负伤6人。2月10日,李学福又率领游击队乘胜夜袭爆马顶子,经3个小时激战,击毙伪军连长等10余人,其余50余人全部被缴械,是役全歼伪军60余人,缴获60余支枪和许多军需物资,游击队收复了爆马顶子游击根据地。

至此,日伪军的冬季“讨伐”又以失败告终。饶河游击大队不但保住了根据地,而且部队发展到250余人,战斗力大大提高。游击队

反“讨伐”斗争的胜利,鼓舞了民众和其他抗日武装的抗日斗志和胜利信心。

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粉碎敌人“讨伐”后,仍以爆马顶子为后方根据地,向周围扩展游击活动,扩大抗日游击区。第一连在小佳河、老鹰沟一带活动,第二连南向大岱河(今大带河)一带游击,第三、第四连在关门咀子一带不断打击敌人。1935年三四月间,第二连在大岱河活动时,得知敌人调集驻四合顶子一支伪军到大叶子沟处,配合日军进攻游击队,第二连埋伏在伪军必经之地,一举歼灭毫无戒备的这支40余人的伪军。

1935年6月,饶河游击大队为解决夏季服装和补充枪支、子弹,进军虎林县境。部队在虎林县腰营沟、兴隆沟、三人班等地积极开展对伪军、伪警察和地方保董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争取他们支持反日游击队,对敢于顽抗的伪军警则坚决予以打击。7月初,游击大队前进到马鞍山西卡子时,驻该地的伪军营部所辖的一个排伪军主动与游击队联络,表示愿意帮助游击队解决给养。游击队在此作短暂停留期间,这个排的伪军杀猪慰劳游击队,不仅供给给养,还送来500发子弹。

游击大队在马鞍山休整后,兵分两路开展游击活动。一路挺进虎头,一路前往黑嘴子游击。1935年7月中旬,饶河游击大队联合“武洋”、“君子仁”、“马占”、“长兴”等抗日义勇军和反日山林队各部攻打黑嘴子。队伍在行至距黑嘴子5公里处,同日伪军150余人遭遇,双方激战一天,最后敌人在援军的接应下退走。这次战斗,日伪军死伤13人,饶河游击大队和山林队牺牲3人,11人负伤。游击队和义勇军等在这一带解决了夏季服装后,返回马鞍山。向虎头进军的部队,因雨天受阻中途返回马鞍山。8月,部队全部返回大叶子沟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筹款,征收粮食。其间,游击队一部在关门嘴

子宿营,曾遭日伪军偷袭,互有损伤。游击队还派一个连去乌苏里江畔团山子袭击日军汽艇,日军死伤6人。

同年8月,饶河中心县委接到中共吉东特委关于将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的指示,县委把饶河游击队全部集中在大叶子沟。8月20日,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在这里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就中心县委的建设和工作的扩展、青年团、反日会和游击队工作等作出相应的决定。会议决定将饶河游击大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并委任李学福任该团团团长、朴振宇任副团长、崔石泉为参谋长、李斗文为政治部主任、崔荣华^①任秘书长、吴福林为党委书记。第四团下设4个连,另设保安连。兵力共250人。

关于党的建设,扩大会议指出:县委要成为战斗的司令部,要加强与各地支部的联系,要严肃党的纪律;要派得力的干部加强抚远和虎林的工作。

1935年9月18日,第四军第四团在大叶子沟召开大会,发布了第四团《为纪念“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日对民众宣言》和《饶河游击队为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告民众书》。《告民众书》指出:“我们游击队,从东三省沦亡以后,起义救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血战已经有三年多的历史了!”饶河游击队已经不是一个枪械简陋、力量弱小的队伍,她已变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声明自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第四军第四团之后,“更要加倍我们的精神,去夺取新的胜利。”^②

^① 崔荣华(—1936),朝鲜族。中共党员。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秘书长、第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冬,在战斗中牺牲。

^② 《饶河游击队为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告民众书》(1935年9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5,第231页。

按照中共吉东特委的要求,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须在乌苏里江左岸几个县普遍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并与第四军主力部队打通联系。1935年9月20日,由李学福等指挥第四团主力150余人自饶河向抚远县挺进。部队经过小南河、小西山时,攻打各处大排队,缴获20余支枪和一些粮食。部队继续前进途中,得悉团山子日军将乘船经乌苏里江、松花江转赴哈尔滨的消息,第四团部队迅即转向乌苏里江畔附近的新兴洞,准备截击敌船。这时,第四团的行动被敌人侦知,9月26日,当部队刚到达新兴洞北屯西北一小岗上休息时,遭到100余日伪军的突然袭击。第四团副团长朴振宇指挥战士选择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痛击来犯之敌,迫使敌人躲在塔头墩子下面不敢露头。敌军处势不利,开始撤退。但此时伪军第三十五团增援之敌300余人从第四团的背后发动攻击,第四团腹背受敌,形势逆转。在激烈的战斗中,第四团副团长朴振宇不幸牺牲。政治部主任李斗文奋不顾身亲自向伪军喊话,声明“我们是抗日军,专打日本鬼子兵!”“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听到后便抬起枪口朝天空放枪,第四团乘机突围。突围中,一颗炮弹在李斗文身边爆炸,李斗文牺牲。这次战斗,日军中尉高木多作等12人被击毙,17人被击伤,伪军死伤10余人。第四团朴振宇、李斗文等16名指战员英勇牺牲,吴福林等10人负伤。日军撤走时放火烧毁了新兴洞。

新兴洞战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虽然遭受很大损失,但部队敢于同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日军作战,并且给予重大杀伤,这在饶河地区抗日作战史上是空前壮举。这一战斗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第四团指战员的斗志,同时也增强了其他抗日部队抗击日军的信心,使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的声威远震饶河、虎林和附近一带。新兴洞战斗后不久,许多青年农民前来参加人民革命军,第四团很快补充了50多名新战士。同时,不少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要求改编为人

民革命军,第四团因势利导,陆续收编了邹其昌、贾瑞福等反日山林队,使第四团由原有的4个连扩大为7个连。1935年11月7日,第四团在大别拉炕召开“九胜”、“东胜”、“天军”、“治国”、“德山”、“庄稼人”等反日山林队首领会议,按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政策,将这些队伍统一收编为第四团独立营。该独立营有110余人。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的积极活动和迅速发展,引起日伪当局很大不安。1935年11月21日,敌人调集佳木斯、富锦、同江、抚远、虎林、宝清和饶河等七县日伪军1500余兵力,开始冬季“讨伐”。“讨伐”目标仍集中在爆马顶子、大叶子沟一带的抗日根据地。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掠夺,妄图毁灭游击根据地和肃清游击区内的一切抗日武装。根据敌我情势的变化,第四团采取化整为零,避敌锋芒,骚扰敌军,伺机歼敌的作战方针,投入到反对敌人冬季“讨伐”的斗争中。1935年11月末,新任政治部主任崔荣华率领第一、第四连部队再次北上抚远活动,参谋长崔石泉率一部转战虎林,以牵制敌军,策应第四团在饶河地区的战斗;团长李学福则带领一支部队坚持在饶河,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与敌人周旋。他们在小北沟、小南河一带收缴了12支枪,并故做攻击城镇姿态,迫使敌人出城“讨伐”的部队迅速撤回团山子加强防守。敌军在饶河游击区“讨伐”了两个月,未发现第四团踪影,反而被拖得疲惫不堪。伪军到处抱怨说:“看不见一个人,打谁呀?”伪军官则慌报说:“没有一个胡子了,都打没了!”日伪军的“讨伐”只好宣告结束。

第五章 创建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 城镇人民反日斗争的开展

第一节 东北各抗日游击区和 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与扩大

一、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

1932年春夏之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十几支工农义勇军和抗日游击队,在开始阶段尽管流动性比较大,但毕竟都开辟了一定的抗日游击区域和藉以休整的军事根据地。

对于在东北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问题,中共满洲省委开始提出的在东满、磐石、宁安、汤原、巴彦和珠河等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开辟游击区域的要求,是同“北方会议”提出“创造北方苏维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些地区在根据地建设方面出现了偏差。1933年《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抗日游击队有了相当发展,在东北农村建立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问题,进一步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的重视。

1933年8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工作决议中提出:要开辟磐石、汤原、吉东(包括东满和绥宁)、哈埠近郊“四大中心赤色游击区”的计划,认为“这四大赤色游击区要成为团结和吸收一切反日力量和哗变队伍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这一任务的完成,需要我们党很灵敏

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坚决的到处拥护农民的斗争”^①。随后,中共满洲省委就开辟抗日游击区与建立根据地必须同发动广大农民、开展农民斗争密切结合问题,发出了专门指示。1933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在所作的《秋收斗争决议及秋收斗争纲领》中提出,“在有赤色游击队的区域(如磐石、汤原、东满等),要把秋收斗争与反日民族革命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在开展反日游击运动中去扩大与巩固这些地方的赤色游击区域”^②。1934年中共中央《二月指示信》中特别强调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信中指出:“中央同意你们把磐石间岛汤原绥宁珠河等五个游击区当作我们工作的中心”,并批评了过去“省委认为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在今天过早的”错误观念,指出:“在满洲现在情形之下,要防止死守根据地不发展,但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反对在可能条件下争取革命政权和根据地的建立”,“满洲党必须把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与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提到实际的工作日程上来。”^③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是抗日根据地形成的重要标志。中共中央在《二月指示信》中指出:“在抗日暴动或我们领导下的游击战争胜利的区域,都有建立临时革命政权机关(临时的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可能,党应当争取这种可能,首先在磐石应尽可能的建立起来,对间岛的革命政权,应迅速给以指示和帮助。”^④同年6月10日,中共满洲省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九·一八’、‘九·三’、‘八·二九’工作决议》(1933年8月1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4,第100页。

^② 《中共满洲省委秋收斗争决议及秋收斗争纲领》(1933年9月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5集,第35—36页。

^③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3页。

^④ 《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1934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3页。

委发布了《临时东北人民革命政府政纲草案》。这一政纲草案规定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的性质,是东北广大民众抗日反“满”政府。它的根本任务是“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势力出东北,打倒日本走狗‘满洲国’,收复东北失地,不做亡国奴,以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与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1935年2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筹备建立各级抗日政权。4月1日,又进一步要求各地党组织和抗日部队,在红五月工作中建立起东满、南满、哈东、吉东等4个特区政府与汤原县政府,以期在同年8月1日召开全满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全满人民革命政府。

关于在农村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基层政权的组织形式,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都有原则指示,认为“农民委员会”是适合“满洲的特殊环境”的政权形式。“这个农民委员会应该成为实际的乡村政权机关,并且成为民众政权宽广的和强大的基础之一。”^①指出这一“农民委员会性质,是统一战线的组织,虽然它最基本群众是贫农、中农、雇农,但手工业者、学生、商人、卖零工的、人民革命军、游击队及义勇军里的战斗员等等,无论男女、不分种族(中国人、韩国人、蒙古人、鞑靼人等),都可参加选举或被选为农民委员会委员。只有那些卖国贼、走狗、反革命分子、勾结日‘满’反对群众的地主豪绅没有权利选举”。关于农民委员会同其它群众组织的关系,认为“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反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不但不能取消,相反要大大发展起来,使农民委员会有坚强的巩固的基础。”关于农民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为“发动并领导广大群众反日反‘满’的政治的经济的日常斗争,并把这些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和游击队战争,来创造和扩大游击区域”;

^①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5页。

“最大限度的武装民众,组织农民自卫队和游击队,发动和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执行抗日反‘满’的斗争纲领,尤其要坚决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卖国贼的全部财产(包括土地在内)和武装”;“调节游击队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保证游击队的给养”;“管理游击区里一切行政上、司法上的事情,严厉镇压游击区内一切反革命的活动和阴谋,把农民委员会造成农村里的真正政权机关。”^①

中共满洲省委为了广泛发动并组织东北城乡人民的抗日斗争,还指示各级党组织在各地组建“反日会”。这一组织,在各地的抗日政权尚未建立之前,同农民委员会一样曾经执行过抗日政权的职责。反日会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抗日团体。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公布了《东北反日总会章程》,其宗旨是:“以彻底抗日反满不做亡国奴,团结满洲三千万民众中一切反日分子进行一切反日斗争,将全体中国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居住于满洲境内之民众,从日本的奴隶统治之下彻底解放出来。”该《章程》规定:“凡有赞成本会宗旨,不分男女、老幼、职业、宗教、籍贯、贫富、党派,只要是不愿做亡国奴,而自愿加入本会的实行本会宗旨之一项而工作者,概得成为本会会员。”^②东北反日总会在东北的抗日战争中,团结了东北千百万群众从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根据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长时期在农村开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的迫切需要,1933年中共中央在《一·二六指示信》中指出:“顾虑到军事的环境及在满洲省委和地方党委员会间时常没有必须的联系,省委须在各地建立起强健的和有独立及自动的工作能力的党委员会”。

^① 中共满洲省委:《农民委员会与民众政府》(1934年6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252—262页。

^② 《东北反日总会章程》(1934年),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0,第139、140页。

1934年中共中央《二月指示信》中又重申了这一指示内容。东北农村地区原有党的吉东局、东满特委和磐石、海龙、珠河、汤原、饶河5个中心县委组织,根据上述指示精神,1934年至1935年期间,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撤销了吉东局,新建立吉东特委、南满特委,撤销海龙中心县委,建立通化中心县委,保留磐石中心县委、东满特委,以便直接加强党对各地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工作的领导。

1933年至1935年,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随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斗争逐步由低潮转向高潮,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也在不断扩大,并发生了新的变化。至1935年末,东北已经形成了七块较大的抗日游击区。这7块抗日游击区是:南满抗日游击区,东满抗日游击区,哈东抗日游击区,绥宁抗日游击区,汤原抗日游击区,密、勃、依、方抗日游击区,饶河与虎林抗日游击区。地域包括哈尔滨至大连铁路线以东、第一松花江两岸,东至中苏国境,南至中朝国境的吉林省、辽宁省东部、黑龙江省东部,大约60余县的范围。每一抗日游击区都有一块、数块游击根据地,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某一军(师)和当地其他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为主,同时由于联合对日作战的需要,其他游击区的抗日武装也时常相互穿插其间。

东北各地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多半是在1932年至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建立起来的。当时东北地区与南方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不同的:1. 中国东北已是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在铁路、公路、重要河道等交通沿线和大小城镇,敌人遍设日伪军和伪警察及日伪统治机构。2. 敌人频繁进行各种规模的军事“讨伐”,采取“三光”政策,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密营的毒辣手段,使抗日军队的根据地很难在某一地区有长期存在的可能。3. 敌人强制广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集家并屯,经济封锁,割断了抗日军民联系,使抗日

军队失去兵员补充和最低的物资给养的来源。4. 东北的抗日武装长期孤军奋战敌后,已与关内和国外隔绝,本地区内各地的抗日武装也被日伪军分割包围,以致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5. 冬季严寒,最低气温达零下三四十度,且时间漫长,一年中冬季约六七个月,山区极少人烟,抗日军队的衣食很难解决等等。

由于以上因素,在东北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极其艰难的。建立和保卫根据地的过程,是与日伪军的“讨伐”和抗日军民的反“讨伐”斗争紧密相联的;建立和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也是根据地军民同敌人推行“集团部落”政策进行坚决斗争的过程。各地党组织和抗日部队以及人民群众还是经过艰苦努力,在南满、东满、北满、吉东地区建立起15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1. 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抗日军队并战胜了敌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建立有抗日团体、群众抗日武装以至抗日政权。2. 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周围均为抗日武装活动频繁、敌人统治不十分稳固的抗日游击区。3. 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的时间较短,少则半年至一年,长则三至五年,具有临时性。4. 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军队的转移而转移,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故称之为抗日游击根据地。5. 根据地的范围较小,多为一县之内的沿边山区,或二个县相邻的山区。6. 根据地内建设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以至政权机构尚不完整,根据地的典型性不突出。7. 当根据地在敌人的“讨伐”中被破坏,甚至变为敌人的“集团部落”后,抗日部队便在深山密林中广建临时性军事根据地或军事密营,发挥后方基地的作用,以支持游击战争。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军民所创建和开辟的这些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战场和东北抗日斗争的中心和依托。

二、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扩大

九一八事变后,南满地区的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暴政的斗争,并在多次群众反日暴动的基础上,利用早已掌握的少量武器,较早地建立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开展武装斗争。随着反日游击战争的展开,磐石党组织和南满游击队于1932年冬开始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在磐石西部红石砬子附近的山林地带,建立了方圆数十公里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红石砬子游击根据地北至明城、集场子,南至拐子炕,西至朝阳山,东至蛤蟆河子,西南部有红石砬子山,西北部有太平山、西玻璃河套,东南部有马鬃岭,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满地区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磐石西部、伊通东南部、双阳南部一带成为抗日游击区。到1933年9月,游击根据地又由磐西扩大到磐北、磐东,形成了以红石砬子、西玻璃河套、石虎沟、驛马泊子为中心的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则由磐石、伊通、双阳交界一带扩展到磐石全部及永吉南部、桦甸西部、西安东北部、东丰北部、海龙北部一带。

1933年10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主力进军辉发江以南地区,又先后开辟了辉发江南、辽宁东部山区10余县的广大游击区,连同辉发江北老游击区在内,南满抗日游击区已达20余县。在开辟新游击区的同时,又选择地处各县交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日伪统治力量薄弱,便于隐蔽与作战的地区,先后建立了金川县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濛江县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和辽宁东部山区的老秃顶子、和尚帽子抗日游击根据地。

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龙岗山脉中段的哈泥河上游地区,大

部分属金川县(现已撤销,所属分别划入柳河、通化等县)所辖。这里地势复杂,位于金川与柳河、通化、临江、濛江等县交界地区。游击根据地以金川河里为中心,包括金川县的凉水河子、回头沟、大甸子、哈泥河、大荒沟,临江县的太平沟、板石沟等地,方圆达几十公里。这块根据地大体于1934年夏建成,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部直属部队、第三团和后来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第三师的根据地。

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濛江县北部的龙岗山脉那尔轰河上游地区。这里山峦起伏,距县城较远。自1933年末开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三团、师部直属部队及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南满第二游击大队和后来编成的第一军第二师经常在这里开展游击活动,于1934年夏建成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块游击根据地以那尔轰为中心,包括东南岔、西南岔、西北岔、沙河子、东大沟、河南、三角卧石、五斤顶子等地,方圆在50平方公里以上。

老秃顶子、和尚帽子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龙岗山脉南段,老秃顶子和和尚帽子分别在桓仁与兴京县、宽甸与本溪县交界处。这里山势险峻,群众基础好。1935年春,中共南满特委在这里建立了中共桓兴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和军部直属部队也经常来这里开展游击活动,并以这两座大山为中心,开辟了老秃顶子、和尚帽子抗日游击根据地。这块游击根据地的范围较大,方圆150平方公里左右,包括老秃顶子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川里、海青火洛、八里甸子与和尚帽子周围的碱厂、二道沟、三道沟、外三堡、大地、蒲石河等地。这块根据地是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师经常驻守的根据地。

南满各抗日游击根据地自创建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南满抗日斗争的客观实际,进行了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南满特委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内,为了支援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作战和解决部队的军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积极巩固抗日根据地,保卫群众已经得到的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问题,并注重进行建立抗日政权的工作。这一抗日政权的组织形式,一般为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或反日会。这些组织实际代行抗日政权的职能。各级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与反日会均设立经济部与军事部等部门,解决支援部队、群众日常斗争与生产、生活问题。

磐石游击根据地首先在各地建立起反日会组织,然后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委员会。自1933年夏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以后,在西玻璃河套一带各村普遍建立了反日会,建有一个区农民委员会和3个村农民委员会,石虎沟、驿马泊子等地也建有农民委员会。到1933年9月,已有农民委员会会员1200人,农民协会会员290人,反日会员3660人,妇女会员400余人。当时每户会员只报户主一人,实际代表一户。磐石地区80%的农户都已加入农民协会和反日会。1933年冬,独立师挺进辉发江南的广大区域后,作为联合各阶层抗日群众的统一战线组织反日会,不仅会员人数增加很多,而且建立反日会的地域也有新的扩大。为了加强抗日统一战线,更好地开展群众反日运动,支援人民革命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于1934年8月20日在磐石北部游击区召开了南满反日总会成立大会,一致通过了《南满反日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南满反日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南满反日会斗争纲领》、《南满反日会章程》等。大会选举成立南满反日总会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满各地反日会的工作。

南满反日总会成立后,南满地区各级党组织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各部队在各地继续建立和发展反日群众组织。到1934年11月,南满地区的反日会员达到6000余人,妇女反日会员700人。

反日会组织遍布于南满地区的磐石、伊通、双阳、桦甸、海龙、柳河、金川、临江、通化、辉南、濛江、抚松、西安、东丰、西丰、桓仁、兴京、清原等 18 个县。同时,南满各地已建立农民委员会 300 余个。南满各地反日会和农民委员会及其他反日群众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进一步建立南满人民革命政府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5 年 2 月 19 日,中共满洲省委在给南满临时特委的信中指出:“目前特委最中心的任务是真正把新开展的游击区域从组织上与实际上巩固起来,以人民政府纲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立即开始建立南满特区政府的准备工作。”^①根据这一指示,南满临时特委积极开展筹建南满特区政府工作,于 1935 年 5 月初决定,首先在临江县境浑江一带,抚松、濛江、第二松花江东部一带,桓仁、宽甸、兴京一带等 3 个地方分别建立地方特区政府。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于同年 8 月 17 日,在金川县河里地区召开民众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东北人民革命政府南满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临时东北人民革命政府南满特区政府组织条例(草案)》和《临时东北人民革命政府南满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暂行条例》。

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在南满各地迅速展开筹建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1935 年 9 月 15 日,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指出:临江、金川、柳河、通化、濛江、磐石、西安、海龙、辑安、桓仁等地群众已自发地为筹建区政府积极奔走。1935 年 8 月成立了桓仁特区政府。9 月 18 日,成立了临(江)金(川)柳(河)特区人民政府。到 10 月,南满各地已建立 15 个乡政府,56 个区政府。同月,在柳河县吴家沟建立了柳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县长孙

^① 《中共满洲省委给南满特委的信》(1935 年 2 月 19 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1,第 66 页。

建国,副县长刘文阁,下辖4个区政府。政府机关分别设在大清沟、头道河子、水曲柳川和四道河子。县政府内设财粮、文教、武装3个科和妇女会。

抗日政权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1933年9月,磐石组织有220名队员的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16个小队。后来,在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及周围游击区以柳河、通化、临江、金川、清原等县农民自卫队为基础改编成立的东边道游击队,成立了总队部,下设6个大队,人数达1000余人。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农民自卫队称为南满游击大队濛江农民自卫队,有40余人。到1934年9月,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周围的濛江、桦甸、辉南一带,共有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120余人。老秃顶子、和尚帽子抗日游击根据地与周围的桓仁县仙人洞、海青火洛、哈塘沟、岔路子等地都组织了青年义勇军。桓仁六区于1935年6月组成桓仁农民反日自卫队。还有一部分农民自卫队被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担负游击根据地的站岗放哨,监视敌探,侦察敌情,维护治安等工作,并配合人民革命军对日伪军作战,成为人民革命军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力量。

抗日政权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在各抗日游击根据地普遍设置粮食仓库、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等,以保障军队的需要。早在磐石建立根据地时,即在西玻璃河套的生财沟设有武器修理所和炭窑,在红石砬子山上的八家沟设有武器修理所和被服厂。修械所除修理枪支外,还曾制造出土炮。被服厂为游击队制做军服、子弹袋等。后来在江南各抗日游击根据地普遍建有粮食仓库、医院、修械所、被服厂等。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暂时用不了的粮食、枪械、军服、药品等,装在大缸或木板仓里埋起来以备后用。修械所和被服厂主要设在水曲柳川、迎门岔、王六沟、西南岔、轱辘屯、会家沟等地。其中水曲柳川修

械所有几十名工人,负责修理枪支、配制零件、翻造弹药。水曲柳川被服厂有缝纫机4台,工人7名,负责制做军服、军帽和子弹袋等。迎门岔被服厂有3台缝纫机和6名工人。简易医院共有5处,设在回头沟、高丽沟、头道河子、大牛沟和大青沟。每个医院有一两名医生和三五名护士,药品的来源有从山上采集的中草药、设法购买的药品和在战斗中缴获的药品。游击根据地内还设有印刷厂,印制南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编辑的报刊及一些宣传品。还开办学校与干部训练班等。那尔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秘密粮食仓库设在东大沟、沙河子北岭、新胜北岭、那尔轰口子、两江口、干沟子、西南岔、三角卧石等地;修械所设在双沟子、西南岔、铨草顶子、五斤顶子、那尔轰等地;被服厂设在小西北岔、双沟子、西南岔等地;医院设在小西北岔、沙河子、小东沟、三角卧石等地。印刷厂设在红石砬子西沟。1935年底,由于敌人“讨伐”,游击根据地军民转移到濛江县东南部的白江河、二道花园河一带。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些秘密粮食仓库、医院、修械所和被服厂。

抗日政权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便是组织群众的经济生活和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中共南满特委在筹建抗日政权时,对满洲省委拟定的临时人民革命政府政纲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条文提出了修改意见,认为“仍以没收走狗等土地为相当”,否则将“过早破坏统一战线”,并在实际工作中对一般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内,日伪一切捐税尽行废除,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

在游击区内,由于敌人“讨伐”蹂躏和土匪骚扰,缺少耕畜,无法用犁耕地,农民多半用镐头刨地,每户所耕土地不多,生产的粮食仅足温饱,歉年即比较困难。为了解决农民春耕生产的困难,人民革命军部队还抽出军马帮助群众耕种土地。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抗日政权还注意控制粮食的外流。1933年,磐西区农民委员会规定“向区外

卖粮,只限大豆、小麦、大麦三种”,余者可在根据地内调剂。1935年10月1日,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委会发布“通告令”,规定:在游击区内,农民所种之粮,不准运出游击区境外,大豆、苏籽、烟、蒜等须由政府许可,得以自由买卖。

1935年,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委会规定:在政府内民众按其收获量之1/10,应纳军粮。协助抗日之地主,其租粮可与佃农当面酌商之。凡抗日队员家属,概免缴纳一切军粮之义务。

在根据地内,还尽可能的开展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以活跃军民生活。南满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曾先后出版了《东边道反日报》、《人民革命报》、《反日民众报》、《青年义勇军》、《列宁旗》等报刊,颇受军民欢迎。

中共南满特委和各县党的组织,十分重视南满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内党组织的自身建设。1933年夏至1934年,在南满游击区内已有磐石、海龙两个中心县委。磐石中心县委先后下设桦甸县委及磐东、磐西、磐南、磐北、玻璃河套、伊通等区委和吉海铁路、西安煤矿、江南等特支。海龙中心县委下设柳河、清原、开原县委及西安、金(川)通(化)等特支。1934年11月,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南满临时特委后,下辖磐石中心县委、通化中心县委(1935年7月,通化中心县委遭破坏后,又组成柳河县委),还设西安特支与江南特支。1935年春,在老秃顶子、和尚帽子根据地还建立了中共桓兴县委等组织。这些党组织在组织根据地和游击区人民开展抗日战争,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和支援抗日武装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

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抗日游击根据地不仅是部队贮存粮食、物资,进行休整、训练的可靠后方,而且是南满党组织及人民政权组织发动群众参加与支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因此,抗日游击

根据地既是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又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发展壮大的革命摇篮。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变动

东满地区各县是各民族杂居地区,其中朝鲜族占多数。日本侵略势力以各种借口较早地侵入这一地区,压迫、剥削各族人民。因而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屡次爆发直接反抗日本侵略势力的斗争,人民经受了长期抗日斗争的锻炼,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满又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最早地区之一。在斗争中,各地迅速建立起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军,在抗日武装斗争洪流中,开辟了抗日游击区,建立了若干游击根据地。1932年夏秋,东满形成了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大片游击区,主要包括延吉县的北部与中部、和龙县的西北部与东部、汪清县的南部与中部及珲春县的西北部与东南部。在这些游击区内,各县共产党组织领导游击队和抗日群众,选择敌人统治薄弱、群众斗争活跃、有利于进攻退守的偏僻山村,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自1932年冬至1933年春,先后建立了延吉县的王隅沟、石人沟、苇子沟、能芝营,和龙县的渔浪村、牛腹洞,汪清县的小汪清、马村、嘎呀河、腰营沟,珲春县的大荒沟、烟筒砬子、潘家窑、河南等10余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游击根据地每块的范围多在方圆30平方公里到50余平方公里之间,人口少的六、七百人,多的达一、二千人。游击根据地的人口总数约为2万人。

在1932年冬至1933年春的反“讨伐”斗争中,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规模小、过于分散、力量不集中的问题凸显出来。为解决这一问题,东满党组织曾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扩大游击根据地,试图将各游

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但由于敌人对游击根据地进行不断的“讨伐”,扩大游击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

经过一年多的历次反“讨伐”战争,原有抗日根据地有所缩减。至1933年末、1934年初,东满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尚有延吉县的王隅沟、石人沟、能芝营,和龙县的渔浪村,汪清县的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珲春县的大荒沟、烟筒砬子、河南、潘家窑等。在1933年冬至1934年春的反“讨伐”斗争中,小汪清抗日军民于1934年1月撤离根据地,同时又开辟了大荒崴抗日游击根据地。大荒崴位于汪清、延吉、敦化三县交界,地处偏僻山区,住户较少。行政区域属延吉县(今属汪清县),组织上由中共汪清县委领导。小汪清、王隅沟等地党员、群众转移到大荒崴后,正式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大荒崴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于对日伪的反“讨伐”斗争中,在东满抗日游击战争的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4年冬至1935年3月,第二军独立师各团在反“讨伐”战争中为保存实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与各县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一起,主动撤离部分已被敌人严重破坏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转移到新区开展游击活动。在延吉县撤出王隅沟、石人沟、三道湾,大部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一部向宁安县南湖头等地转移;在和龙县撤出渔浪村,转移到安图县车厂子一带;在汪清县撤出大荒崴转移到腰营沟,尔后又转移到绥芬大甸子;在珲春县,继1934年夏撤出大荒沟、烟筒砬子后,又从河南、潘家窑经梨树沟、杜荒子转移到火烧铺、金仓一带。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部队转移到新区后,1935年间,与当地群众一起先后建立了汪清县绥芬大甸子、安图县车厂子和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和龙、安图两县交界处(今和龙县卧龙乡和安村),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敌人统治比较薄弱。1933

年冬,中共和龙县委就已派人深入到车厂子开展工作,在当地群众和救国军中建立了较好的基础。1934年末至1935年初,延吉、和龙县内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民先后转移到车厂子,建立了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有人口千余人。

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汪清县城东北100公里处,与吉东的绥宁地区相连,便于第二军向北发展。早在1930年,这里就建立了中共罗子沟区委,领导各族群众开展反日、反军阀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区委又领导当地军民与日伪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从1934年冬开始,汪清、琿春县内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第二军部队陆续转移到绥芬大甸子,中共东满特委也转移到这里。1935年3月,建立了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总人口达万余人。

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东南25公里的奶头村。奶头村西面5公里左右屹立着两座形如妇女乳房的高大山峰,俗称奶头山,东面2公里左右处有南北流向的三道白河。整个游击根据地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1935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为保存实力,冲破日伪军疯狂的军事“讨伐”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主动撤离车厂子,王德泰率第二团主力转移到奶头山一带。在这里,王德泰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带领人民革命军指战员,依靠和发动当地群众,进行创建游击根据地的工作。车厂子、绥芬大甸子和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在东满游击区最后开辟的3块较大的游击根据地,在第二军坚持东满抗日游击战争,向南、北方向发展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6年2月上旬,在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下,汪清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到破坏,第二军第三、第四团留守部队分别转移到宁安、穆棱抗联第五军游击区,继续开展斗争。与此同时,日伪军对奶

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第二团留守部队虽然进行了顽强反击,但由于敌众我寡,形势对人民革命军十分不利。为保存实力,第二团留守部队于2月21日主动放弃东满地区最后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向抚松转移。

长白根据地,位于长白山西麓长白县境内。在东满特委领导下,1936年5月,第二军军部和第二军第三师来到抚松县东岗,在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的主持下,召开了第二军干部会议,研究了第二军军部和第二军第三师的活动方向以及开辟新的根据地问题。东岗会议后,第三师第七团和第九团经抚松、临江向长白地区挺进,取得了大德水、小德水战斗的胜利。之后,金日成派第六师(由原第三师改成)党委组织科长权永碧等30多名共产党员到长白县各地开展群众工作,同时在长白山西麓密林中建立了长白山、红头山、横山密营群。

随着东满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中共东满特委及各县委根据东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状况,领导开展了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在各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发展中共基层组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先设在王隅沟游击根据地,后迁驻中共汪清县委机关所在地小汪清、腰营沟等游击根据地,使这几个根据地一度成为东满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中共延吉县委机关先后设在王隅沟、三道湾等游击根据地,中共珲春县委机关先后设在大荒沟、烟筒砬子等游击根据地,中共和龙县委机关曾设在渔浪村游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也分别一度成为该县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同时,在各游击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党、团区委及所属党、团支部,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团员,并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与保卫工作。东满各级党组织曾有共产党员1000余名、共青团员800余名。后因敌人的频繁“讨伐”与反“民生团”斗争的错误,根据地内党员数量减少,各县县委建制撤销,

分别组建延吉、汪清、珲春等特支。同时,根据西部抗日军民转移至安图车厂子根据地、东部第二军部队转移至绥芬大甸子根据地的情况,为加强对新开辟的根据地的领导,又分别建立了中共安图工作委员会和绥芬大甸子工作委员会,领导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

各抗日游击根据地普遍建立抗日政权。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先后在延吉县王隅沟、石人沟;汪清县嘎呀河、小汪清;珲春县大荒沟和烟筒砬子成立了6个区苏维埃政府,下设20余个村苏维埃政府。1932年冬至1933年春,相继在延吉县的三道沟、花莲里、苇子沟、南阳村,和龙县的渔浪村、牛腹洞,汪清县的腰营沟、蛤蟆塘、绥芬大甸子等地成立了代行苏维埃政府职能的革命委员会。区、村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中设有总务、经济、粮食、教育、军事、法政等办事机构,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并颁布实施一些法令。但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提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错误口号,侵犯了富农、中农的利益,致使根据地人口减少。1933年夏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把苏维埃改为人民革命政府,并纠正了“左”的错误政策,使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得到加强。

1934年末,王隅沟、八道沟、瓮声砬子的人民革命政府转移到车厂子,成为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领导机构,下设经济部、粮食部、通讯部、青年部。1935年5月,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召开了反日会成立大会,反日会由各地方群众代表、各抗日义勇军代表和大甸子街商民代表组成。反日会内设农民自卫部、粮食部、妇女部、司法部、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义勇军部。农民自卫组织有农民自卫总队,担负保卫根据地的任务。反日会是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实际政权机关,为群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深受群众拥护。

1936年11月,奶头山村民开会宣布废黜伪区长,建立了农民委员会,行使政府职能。组织了妇女会和儿童团,建立了党的组织,还

设立了被服厂、兵工厂、后方医院等。

各抗日游击根据地还注意建立与扩大反日群众组织和群众反日武装。东满各级党组织与游击根据地政府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建立并扩大了反日会、互济会、儿童团、少先队、妇女会等反日群众组织,建立了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主要以少先队为基础建立的)等群众抗日武装。到1933年9月,全东满共有反日会员1.9万余人,有农民自卫队员和少先队员1600余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反日群众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踊跃参加根据地的生产、支前、护理伤病员、站岗、防奸、侦察、通讯、宣传等活动,并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1935年,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了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和妇女会、儿童团等反日群众组织,还组织有六、七十人的农民武装自卫队。绥芬大甸子抗日游击根据地也成立了妇女会和儿童团。1936年2月,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成立了妇女协会。东满各游击根据地的抗日群众组织和抗日群众武装,为东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各抗日游击根据地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开展了必要的经济工作。一些游击根据地曾一度宣布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苛捐杂税等项经济政策。但是,由于敌人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粮食问题成为游击根据地生存的突出问题。因此,1933年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在根据地取消了“集体农庄”,根据地共产党组织和政府把粮食生产作为经济工作的头等任务,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生产。规定凡在游击根据地居住的党、团员和群众,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游击队也抽调相当的人力、物力,帮助群众解决生产所需要的牛马、种子、口粮等问题。由于发展了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游击根据地的缺粮问题。与此同时,各个游击根据地还创办了一些小型的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用以

修理枪械、制造弹药,缝制军服,印刷课本、传单、报刊。在东满各游击根据地,共有小型兵工厂4个,技术工人18人;被服厂4个,技术工人36人,缝纫机25架;印刷厂4个,油印机十七八台。1935年,车厂子抗日游击根据地也开设了兵工厂、被服厂、印刷所。兵工厂有6名工人和各种锻冶工具,可以制造和修理枪支弹药。被服厂有7名工人,4台缝纫机,专门为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部队缝制军装。在奶头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时,车厂子的兵工厂、被服厂、印刷所等后方设施也相继转移到奶头山。这些工厂规模虽小,但在解决军民供给,支援战争,巩固游击根据地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游击根据地为适应战时需要,开展了一定的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等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东满各级党组织比较注意群众的教育工作,各游击根据地创办了一些小学校和儿童俱乐部,对少年儿童实行免费教育;开办了成人的扫盲班、夜校和党员、干部训练班。在文化工作方面,东满党组织十分重视对抗日军民的宣传工作,在一些游击根据地成立了歌唱队、宣传队,排演抗日剧目,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配合部队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和慰问。在卫生工作方面,在游击根据地里开设几处医院,有医生七八人,护士10余人,利用简陋的设备、器具及药品为游击队员和当地群众医治伤病。在宣传工作方面,各级党组织创办了一些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中共东满特委机关报《斗争》、《两条战线》,游击队和群众组织的报纸《战斗日报》、《反日报》、《少年先锋》等。通过开展文教、宣传、卫生等方面的工作,使游击根据地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始终保持旺盛的抗日热情,积极参加和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至1937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中,东满各游击根据地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它曾经是抗日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依托和发展的基地,是东满地区各民族的希望所在。

四、哈东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1933年底,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在中东铁路东段路南的珠河县南部、中心县委所在地,建立了以三股流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路南抗日游击区。这一游击区包括乌吉密、四方顶子、苇塘沟、石头河子、二排、柳树河子、娄家窝棚、六道河子等地。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前后3次向中东铁路路北和宾县七区、延寿二区伸张,建立起以侯林乡、黑龙宫、秋皮囤和宾县三区为中心的路北游击根据地,游击区随之扩展至珠河、宾县、延寿边界一带。

1934年6月,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成立后,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哈东抗日游击区又分别向西、南方向扩大至双城、五常和阿城一带,年底又扩大到方正与珠河边界。形成东西100余公里、南北近175公里范围,人口达10余万人的中东铁路南北两大片游击区域。这一地域基本属于北满农业区,为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给养;茂密的山林地带,则为游击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众多的人口,则是游击队的群众基础。

1935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成立后,部队曾先后东向苇河、海林和方正、勃利发展,又将游击区推进至牡丹江下游地区。

1935年7月以后,日伪军在珠河路南、路北老游击区和根据地,疯狂地实行毁灭性的大肆烧杀,游击区遭到严重破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部队再行东去方正、依兰、勃利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第三军跨过松花江到达江北的汤原,会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共同创建汤旺河后方根据地。

在珠河反日游击队成立之前,1933年8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定“普遍建立反日会、农委会、妇女会”。9月,珠河县即建立

起4个反日会。9月11日,在三股流召开各反日会代表开会,成立珠河反日总会,选举沙永振为总会委员长。据1934年底珠河中心县委统计,仅珠河县即有反日会员1万余人,珠河反日游击队建立后,在根据地和游击区内较为普遍的建立各级农民委员会。至1934年9月,仅路南根据地和游击区内便建立起23个农民委员会。不久,路北也相继建起农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实际上都执行了抗日政权的职能,尚未建立农民委员会的村屯则由反日会代行政权职能。农民委员会下设生产部、侦探交通部(亦称拥军部)、自卫部(或武装部)、肃反部、妇女部等机构,任务是组织农民武装、保卫根据地和游击区群众利益,拥护抗日军队和照顾抗日军属。同年7月,珠河县农民委员会成立,吴景才^①任会长。

1934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珠河中心县委和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巩固和扩大游击区与建立民众政府”^②。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号召各地普遍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以后,同年5月下旬,珠河中心县委召集各地30余名代表举行筹备会议,成立了珠河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会办事处。6月初,各地即开始选举筹备会的代表,仅路南游击区便选出代表80余人。9月10日,珠河中心县委决定在10月底完成建立双城、珠河、延寿三县县政府的准备工作。经积极准备后,在日伪军对珠河游击根据地进行毁灭性“讨伐”的战火中,县委在三股流、半截河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建立,吴景才被推选为县人民革命政府主席,人称吴县

^① 吴景才(—1938),山东沂州人。1934年参加抗日斗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珠河县农民委员长总会会长、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县长、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三师和第二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在战斗中牺牲。

^②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及省委的正确路线给珠河县委及游击队全体同志的信》(1934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第9页。

长。1936年春还发布《大中华民国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布告》,号召人民在革命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发挥各种反日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的作用,支援人民革命军反击日伪军大“讨伐”的斗争,开展春耕工作。

在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的直接组织下,在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内普遍建立了农民反日自卫队、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等地方武装。这些农民武装组织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地方,肃清汉奸敌特,巩固根据地;配合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对敌作战和为部队输送兵员。这些农民武装是人民革命军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力量。其中的模范队,是由精干人员组成的半脱产武装组织,可直接补充人民革命军部队;农民反日自卫队则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青年义勇军类似模范队,但全部由青少年组成,由共青团领导。路北侯林乡由农民反日救国会组建的农民自卫队,共有4个队,每队30人,以洋炮(土枪)、扎枪(红缨枪)为武器,哈东支队曾援助一些步枪。侯林乡农民自卫队又选拔青壮年分别组成半脱产的模范队和青年义勇军。这支农民群众武装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小股敌军或土匪不敢进入此地。1934年9月,“黄炮”队叛离哈东支队进攻侯林乡时,即遭到农民反日自卫队和联合武术队的抵抗,“黄炮”队被击伤数名,使侯林乡根据地免遭破坏。与此同时,当哈东支队去路南进攻五常堡敌人时,路南根据地的模范队主动前往助战,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农民武装是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的可靠后备力量。珠河游击队成立时仅13人,但几个月内便由农民自卫武装补充了50余人。后来,路南地区的农民武装有2/3被选拔至游击队,成为部队的基本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至1934年9月,路南农民自卫队约1000余人,路北根据地农民反日自卫队有3000余人,其中仅五区一带即有23个队、1600余人;黑龙江一带有四五百人。至同年末,哈东游击根据地

农民反日自卫队队员达到 5000 余人。另有 15 个模范队和青年义勇军,即:五区模范队、五区青年义勇军、路南模范总队、路南青年义勇军、苇塘沟青年义勇军、二排模范队、三股流模范队、三分所模范队、四道河子青年义勇军、四道河子模范队、黑龙江模范大队、黑龙江青年义勇军、大亮珠河模范队、天龙模范队、老段模范队等,共 968 人。

此外,根据地的其他群众组织,如反日妇女会,多是由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地方干部家属组成,她们同军队心连心。每当队伍战后归来,妇女会会员便主动为战士缝洗衣服,护理伤员,珠河根据地的妇女会会员据 1934 年底统计,约有 450 余人。另有儿童团为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站岗放哨,探听敌情,传送情报,也是根据地里不可忽视的力量。

珠河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内,由于取消了日伪当局的一切苛捐杂税,农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在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农民自卫武装的保护和影响下,土匪不敢骚扰。路南游击区的土地,多数属于伪哈尔滨警察厅厅长金荣桂和北满汉奸大地主司林大柜所有,他们不敢跨进抗日游击区一步。汉奸地主的土地一律没收。根据地内实行减租。这种情形与周围敌伪统治区比较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不少在珠河游击队初起时,因不明真相而迁出抗日游击区的农民纷纷返回游击区,而且因羡慕游击区和根据地农民生活改善,而由临近地区迁入的农民数量也急剧增加。1935 年春,仅路南统计,就迁入 2000 户之多。结果,熟地已告缺乏,又开垦了荒地。因根据地多为山区,虽以农业为主,粮食尚不能自给,故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不准粮谷出境,但豆类允许与境外调剂。

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农民委员会、反日会以及农民武装的经济来源,除在战争中缴获敌军的军火、装备,没收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财产外,便由部队和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统一征收反日特捐即地亩

税等解决一部分。反日特捐是按照统一累进税办法办理,5 垧地以下农户,每垧纳现洋 0.5 元;6 垧至 20 垧者,每垧纳 1 元;21 垧以上者,每垧 2 元。对贫苦农民不收税,实际上贫农、中农税收低微。不少地方,如宾县三岔河的一些地主自动纳捐交税,因向游击队、人民革命军纳税之后,其他义勇军、山林队武装不敢再来扰乱,他们的财产反而得到了保护。

抗日根据地内军属较多,为支援战争,军属的土地多由农民委员会或反日会组织义务代耕。广大群众热情参军,甚至连妇女也积极申请参军。

在三股流、秋皮囤南沟、花砬子、腰屯南沟等地,建立了简单的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在四方顶子、苇塘沟还创办了后方医院。

在珠河根据地创建之初,地方党组织和反日会对文化教育工作就比较注意,曾在太和北沟建起了革命小学。1935 年 1 月,还在蜜蜂园子办起小学校,第三军派政治工作干部侯启刚担任教员,教材由军司令部编写油印,不收学费。此外,县委还在老五区街上、双城九区板子房南沟办了两所贫民学校,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学文化,学抗日救国道理。党的干部张寿箴、赵一曼等均曾给孩子们讲过课。

此外,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珠河中心县委还十分注重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的宣传工作,各级农委会、反日会内都设有专职宣传干部,除经常利用召开群众大会时机,宣讲有关抗日的政策,宣传抗日战争的胜利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外,还经常开展识字,学政治,教唱抗日歌曲等活动。珠河中心县委还发行了《哈东人民革命报》,报导抗日军事斗争与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情况,颇受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欢迎,扩大了共产党、人民革命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影响。

在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领导和积极工作下,在游击区内建立了若干党支部组织。珠河县内设有板子房、娄家窝堡、六道河子、二排、

半截河、黑龙宫、蜜蜂园南沟等支部。宾县县城和七区各有一个支部、九千五一个党小组。1935年在路南、路北、亚布力、河南(五常)、双东、延方建立了区委和通河特支。在苇河还建立了县委,成为珠河中心县委对外联络的机关。据统计,除人民革命军内的党员外,地方上共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广大党员在抗日斗争中起了先锋模范作用。

哈东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对于东北抗日战争的贡献是重大的。仅珠河县从1933年至1935年10月,在农民委员会和反日会的主持下便为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提供了20万市斤以上的粮食,输送参加抗日部队的战士约1000人以上。因此,哈东群众称抗日根据地是“红地盘”,而敌人则哀叹抗日根据地是“共匪的哈东乐园”。

五、绥宁抗日游击根据地重心转移

1933年5月,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在吉东传达贯彻后,同中共宁安县委建立正式关系的“吉林平南洋总队”在党的领导下,改编为工农义务总队,主要活动在宁安县东部大、小唐头沟和东南部的二道河子、三道河子一带。东南山区的八道河子(今红旗林场)是中共宁安县委很早活动的据点之一,后来一度成为较为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八道河子党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八道河子农民自卫队在宁安县委直接领导下,成为保卫八道河子根据地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1934年初,周保中率吉林救国军辽吉边区第一、第三连部队与工农义务队汇合唐头沟,并于同年2月根据中共吉东局的决定,成立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欲图联合其他抗日武装,筹建绥宁反日同盟军,建立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不久,这支部队的游击区域便由宁安东南山区扩展至西南山区、镜泊湖一带。

同年5月,由县委另行组建的宁安游击队也诞生在宁安东南山区,东南山区便成为绥宁反日同盟军最早的游击根据地。同年6月,反日同盟军分兵活动时,绥宁抗日游击区又扩展至宁安西北山区一带。

宁安东南山八道河子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农民委员会,宁安其它各地均建立了反日会。其中以东京城和卧龙屯所建反日会较早。1933年秋,原中共穆稜县委书记李范五调任宁安县反日会会长后,反日会工作得到加强。同时,绥宁反日同盟军在开展游击活动中,每到一地都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如在罗圈沟建立了一个反日会,会员40多人,还建立了一个反日会妇女部。据1934年6月的不完全统计,在宁安东南山区和西南山区(即二、三区)和牡丹江江西、江北部共建立了11个反日分会,共有700多会员^①。青年反日会有10个分会;反日会妇女部有六七个分会,八九十名会员,其中朝鲜族20名^②。

1934年12月,中共宁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贯彻《一·二六指示信》以来的工作,指出:“首先要纠正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要把反日会变成工农兵商学等的群众团体。它是一个反日统一战线的机关”^③。随之修改了反日会纲领和章程,在政治上转变了过去“太红”的错误,在组织上纠正了关门主义,反日会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1935年夏以后,中共宁安县委又将反日会普遍改建为抗日救国会,以便团结各民族更广泛的抗日阶层和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这一年,仅宁安一县就发展3万以上的会员。该县的东京城区有70%以

^① 《中共宁安县委给满洲省委的工作报告》(1934年6月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9,第187页。

^② 《李光林关于宁安县团的工作、群众工作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34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9,第383页。

^③ 《中共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决议案》(1934年12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9,第176页。

上的人都加入了抗日救国会。同东北其它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一样,农民委员会、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虽属群众抗日组织,却均执行了抗日政权的职权。宁安各地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为协助抗日部队,在机构内部普遍设立交通部门,负责代部队传递信件,报告敌情;侦察部门负责搜集日伪当局和军队的动向;“打狗部”担负调查、逮捕汉奸走狗、特务等各项任务。

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还负有组建地方武装的责任。东南山区八道河子自卫队是绥宁反日同盟军最早的组成部分之一。开始时,该自卫队是由十四、五名朝鲜族青年组成的,有六、七支钢枪、五、六颗别粒弹、十七、八支土枪,队员都很勇敢。当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队受挫时,八道河子自卫队均拨出人员和武器给予积极的支援,使其恢复了战斗力。八道河子自卫队作战勇敢,有效地保卫了反日同盟军的根据地。

此外,宁安游击区还组建了青年义勇军。八道河子组建有两队青年义勇军,共20人。其中一部后来在宁安县委组建宁安游击队时被编入游击队。

宁安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内组建的反日妇女会,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洗衣服,护理伤员,对反日部队给予了有力的支援。抗日儿童团组织在根据地内外也有发展。根据1934年8月的统计,儿童团员有130余人,其中朝鲜族20余人。宁安儿童团的工作很有特色。一是有较为系统的组织,建有4个“中队部”,县里有儿童局负责儿童工作;二是制定了《宁安县抗日儿童团章程》和斗争纲领。《儿童团章程》规定:儿童团的宗旨是“援助反满抗日的民族革命运动,养成最勇敢、最忠实的青年革命战士”。《儿童团斗争纲领》规定:“援助反满抗日的中华民族革命运动(当交通、侦探、站岗等)”;“中韩民族联合起来,去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儿童团在根据地和抗日

部队集结地站岗放哨,传送信件,探听敌人消息,成为反日会的有力助手。

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协助各抗日部队筹款、筹粮,或代为筹办、购买军队需用的给养物资和枪械子弹等。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开辟部队的经费来源,除采取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军费以外,还提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共同抗日救国”的口号。具体办法是通过救国会或村长向地方提出一定数量的物资要求,由部队派人按期提取。1934年5月,周保中在宁安县卧龙屯召开抗日救国会和抗日部队军民大会,动员各界群众为抗日部队筹集粮食和衣物。之后,各地群众相互转告,积极为绥宁反日同盟军捐送给养和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东京城救国会经于贵堂先后送给绥宁反日同盟军7000余市斤粮食;马河救国会经刘全贵给抗日武装送了4000余市斤粮食、10市斤豆油、20市斤盐;于家屯救国会经陈喜昌给抗日部队送了1500余市斤粮食、27套棉衣、27双鞋、27顶帽子、250市斤肉、20市斤盐;金坑救国会员孟发将自己家300余市斤粮食送给了抗日部队;莲花村救国会员朱德彩送了1200市斤粮食。还有许多救国会员冒险去县城为抗日部队采购棉布、胶鞋等物资,混过敌人岗哨,送到抗日部队密营。

当时,不少被迫担任伪甲长、牌长者,同时又是反日会、救国会会员,实际上形成了“内红外白”的两面政权。例如,腰岭子的刘甲长除代抗日部队筹款、筹粮外,还派人去县城为部队购买衣服和鞋等难以买到的物资,并同一些城内的商号和客栈联系好,保证进城采购物资农民的安全。勃海保被日伪当局称为“模范保”,但这里的保长、甲长和广大爱国群众,绝大多数都积极热情的支援反日联合军。其中很多人都是冒着被杀头和坐牢的危险从事抗日工作的。东京城城内、城郊22个甲长,除城内3个甲长外,其余郊区的19位甲长在1935年

冬都因从事抗日工作而被日伪警察机关逮捕,其中2人被枪杀,其余均被严刑拷打致伤致残。对此,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承认:“与其说是‘为匪团(敌人对抗日部队的诬称)武力所迫的不得已行为’,莫如说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有意识的同情反满抗日匪的倾向”^①。

在宁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中共宁安县委还注意基层组织的建设。虽然由于抗日军队力量较弱,流动性大,但仍然建立了5个地方党支部,共有92余名党员。团的组织,据1934年8月统计,三区江西有5个支部,30余名团员;二区有3个支部,团员20余人;八道河子支部团员7人;塔城(宁安县城)支部,团员7人^②。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后,除以一部坚持宁安老游击区、特别是西南山区外,还以一部向东北的穆稜、密山、勃利等县和中东铁路北发展,另以一部向西南部的敦化、额穆等县和京图铁路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游击区在宁安的重心,不仅从东南山区转向镜泊湖东岸、西南山区,而且还开辟了以额穆为中心的新游击区和恢复了穆稜、密山、勃利边界一带新老游击区。

穆稜县横跨中东铁路东段,交通便利。九一八事变后,是吉林自卫军、吉林救国军集中活动区之一。该县下城子先后是中共宁安中心县委和绥宁中心县委所在地,中共穆稜县委所属马桥河、下城子、兴源、穆稜、八面通、梨树镇等区委组织比较健全,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十分活跃,早在1932年2月就建立了穆稜县反日总会,同年3月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几支抗日游击队及其游击根据地——悬羊砬子、新

^① 李铸等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资料》(内部资料)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2年内部版,第228页。

^② 《李光林关于宁安县团的工作、群众工作情况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34年8月2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9,第386页。

安屯、狍子沟等,形成绥宁地区另一抗日中心区域。1934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抵达中共穆稜县委,传达关于发展反日会的指示,还帮助穆稜县委制订了《穆稜县抗日总会章程》和《宣传行动纲领》。穆稜县的反日会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宁安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虽然因部队流动性大不够稳定,但是根据地和游击区对于绥宁反日同盟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六、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1934年春汤原游击队创建初期,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为开辟太平川游击根据地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里是汤原县的粮仓,周边有黑金河、格金河等金矿,市街繁华,又是汤原通往佳木斯、鹤岗、萝北的必经之处。占据这一地区,不仅能够解决游击队的给养,而且对游击队依托小兴安岭山区,向汤原、佳木斯、萝北开展游击战也十分有利。

为了开辟太平川游击根据地,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派党员干部刘铁石等到太平川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了当地爱国青年冯治纲率领的抗日武装“文武队”,并成为党领导的队伍。之后,又通过冯治纲策动太平川伪自卫队队长张传福率队起义,顺利解除了伪警察署和反动地主的武装,扫除了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障碍。汤原反日游击队由此开进太平川,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太平川从此成为汤原反日游击队的可靠后方。

1934年7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改组之后,县委分别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通过群众集会或举办训练班等方式,向群众和抗日积极分子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展抗日救国会组织,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群众踊跃参加。在格金河七甲的群众会议上,经中心县委动员后,群众纷纷报名申请参加抗日救国会和农民自卫队。这两个组织当即分

别宣布成立。抗日救国会下设宣传部、肃反部、青年部、儿童部、妇女部、互济部和运输部等,实际是抗日政权的雏形。据统计,1935年秋至1936年,仅汤原、依兰两县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即达3.5万人。至此,以太平川为中心的格节河、石场沟的整个汤原县西北部、中北部地区成为游击队较为稳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不久,游击区又扩展至西部汤旺河流域的格金河、亮子河、大眼沟、佛爷砬子、吉星沟(今伊春市南岔区吉星村),形成了以太平川为中心的第六军汤西游击根据地。1936年7月,戴鸿宾率第六军第四团进入汤西游击区,捣毁了伪汤原县“兴农合作社”建立的“出荷粮”仓库,不久又击退了前来“讨伐”游击区的伪汤原县治安队。游击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第六军部队同汤原游击区和根据地的群众始终保持鱼水般的密切关系。该军的许多战士和干部都是汤原的子弟。1936年春,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南三甲召开了有300人参加的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选举王永昌为人民政府主席。1936年8月,汤原格节河区区委先后将经过训练的青年游击连队员100余人输送至第六军部队。汤原、依兰等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扩大,进一步推动了松花江下游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

在开辟太平川游击根据地的同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派人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萝北县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建立了中共鸭蛋河区委。1934年冬,汤原反日游击队为粉碎日伪的“讨伐”,东进汤原县东部和萝北县域,使游击战火燃烧至东部地区。1935年初游击队主力撤离后,仍留下部分党员干部在这里坚持抗日活动。

1936年9月,第六军参谋长冯治纲率领第六军第五团狠狠打击萝北、绥滨的伪军和伪警察据点,有力地配合了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1936年7、8月间,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再次派王永昌到绥滨县领导群众的抗日斗争,并建立了中共帘区区委,在农村组

织进步青年建立了青年游击连。由此形成了小兴安岭东麓、与三江平原接壤的包括绥滨、萝北在内,与汤原太平川连成一片、方圆500公里的汤东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

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即派人去松花江南岸的依兰东部开展群众工作。不久,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即派部队渡江开辟依东游击根据地。依东游击根据地位于松花江南依兰、桦川县境内,以西湖景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北至宏克力、东到土龙山、金沙河,南至倭肯河的团山子、百子沟、黑瞎子沟等地,形成了方圆近百公里的“红地盘”。汤原中心县委在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内,开展建立抗日政权、抗日群众团体和地方抗日武装等工作,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到处设立伪保甲,汤原中心县委和第六军即到处建立抗日救国会,并争取教育具有爱国思想的伪保甲长,使其表面上应付敌人,暗地里同抗日救国会保持联系,为抗日部队服务。

在抗日游击根据地内,凡适合加入游击队的青年,首先参加到青年义勇军和游击连等半脱产的武装组织中。他们担负抓走狗、破坏敌人各种设施等保卫游击根据地的任务,战时配合反日游击队作战,并随时向部队输送战士,是汤原反日游击队可靠的后备力量。此外,为保卫家乡各村还组建了不脱产的农民自卫队。

在游击根据地内,游击队保护群众,群众热烈支持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战争。抗日救国会、妇女会等积极组织群众承担为游击队侦察敌情,当向导,传送信息,运输战利品和其它物资,筹办粮食,收容、护理伤病员等服务。据统计,1936年7月,仅依东抗日救国会就用群众捐款买的布匹,为第六军做了约400套军服。

抗联第三、第六军于1937年在位于今伊春南岔区、依兰县和汤原县交界的四块石山建立了密营。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抗联第

三、第六军的后方基地。四块石密营建有被服厂和后方医院。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机关也曾设在这里。

根据1936年1月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汤原会议的决定,在伊春河畔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赵尚志兼任校长,先后由张寿箴和侯启刚负责学校的教务。雷炎、张德、王玉升、张文廉等任教官。曾陆续在现伊春双子河畔、乌敏河畔、翠峦河畔和铁骊、绥棱、海伦边界的白皮营子等地举办了3期训练班。学员由各军选送。他们在后方根据地相对平稳的环境中,集中精力学习战略战术,进行军事操练;学政治课,提高政治水平,坚定抗日救国决心;还学习必要的文化课。这所学校先后为北满抗日部队训练和培养了200余名军政干部,第三、第六、第九军的许多团级干部和地方主要负责干部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后来成为东北抗联第十一军军长的祁致中、第六军第三师师长的王明贵等都曾是这里的学员。

1936年7月,在巴兰河谷张木营子建立一所联军电信学校,由第三军的于保合任校长和教官。学校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开办,学员们刻苦学习,掌握了收发报技术,为抗日部队培养了宝贵的专业电信人才。1936年秋,在帽儿山后方根据地还建立了被服厂兼后方医院。这所医院占地300平方米。夏嫂(夏云杰之妻)、冯嫂(冯治纲之妻)、金伯文(张寿箴之妻)、李在德等十几名抗联战士不仅完成了大量缝制军服、子弹袋等任务,还协助医生护理许多伤病员,使其重返前线。

在岔巴气的原伪警察哨所原址,还设立了兵器修理厂。在设备不足,工具落后,材料缺乏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修理人员靠拆取收集来自战场上的已毁坏的枪支零件,修复了许多枪支,翻造了一批子弹。后方根据地还收集存储一些粮食、食盐、被服等物资,以供部队不时之需。第三、第六军汤旺河后方根据地的各项事业,为支持北满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七、密、勃、依、方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与变迁

密、勃、依、方游击根据地,包括密山、勃利、依兰、方正、桦川、富锦等地。1933年秋,李延禄率救国游击军自中东铁路东段到达密山县南部穆棱河南一带山区(今属鸡东县),改称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934年3月,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组建的密山游击队在密山县西部穆棱河北哈达河沟里(今属鸡东县),建立了另一抗日游击根据地。同年秋,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和密山游击队这两支部队会合于穆棱河北,不久,统一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部队壮大,密山抗日游击区也随之扩展至穆棱河两岸,并向南北方向伸展。

1934年春,随着土龙山农民暴动的掀起,在依兰、勃利、桦川、富锦、宝清等地,抗日武装活动也十分活跃。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明山队”等,在这一地区开辟了抗日游击区。1934年冬,穆棱河北哈达河根据地失守之后,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平提出的关于扩大抗日游击区建议,留下部分部队坚持密山、穆棱游击区抗日斗争,主力部队逐步西向勃利县发展,并以该军第三团活动的青山里(现属林口县)为根据地向依兰活动。1935年夏,李延禄率第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继续向方正县活动,在大罗勒密一带建立了军事密营和新的游击根据地。从此,第四军各部及其他抗日部队共同开辟了东至密山、宝清、富锦,西到方正、依兰,北至桦川,南至勃利、穆棱的大片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

1933年3月16日,中共密山县委在哈达河成立了密山县反日总会,由李成林任会长。在哈达河、西大林子、柞木台子、白泡子、平阳镇、半截河、知一(密山县城)东门外、当壁镇等地设立分会或小组。当时,反日会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且不断遭受日伪军警破坏。自同年

秋救国游击军和密山游击队在穆棱河南北建立根据地后,反日会的活动开始公开。抗日根据地的反日会员对抗日部队积极予以支援。1934年春,密山哈达河抗日救国会员募集120元,购买一支匣枪和3梭子子弹,送给游击队。西大林子抗日妇女会买了一架望远镜送给游击队。哈达河抗日救国会员还节衣缩食租种15垧水稻田,将全部收获所得支援游击队。但当时由于刚刚开始组建反日会,县委对参加反日会会员的条件要求过严,使这一反日群众组织未能得到广泛发展。1934年秋,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平来密山进一步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同年8月,密山发展反日会员300多人,青年反日会员七、八十人,还建有儿童团、反日会妇女部。1934年10月17日,密山县抗日总会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密山抗日总会的宣传和行动纲领》,号召“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人力出人力,共同抗日救国,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和国家的统一。”^①

1934年12月,第四军主力撤离密山、穆棱河北后,在密山、穆棱、勃利三县山区活动,一边深入发动群众,一边伺机打击敌人,并和三县地方党组织于1935年1月下旬建立起47个反日会,会员达300余名。其中,密山成立有5个反日分会,会员人数增加100人;妇女反日会员增加30人。中共密山县委还成立一个训练班、4个读书组;印发了抗日会纲领、章程,人民革命政府纲领、告“满军”书、告同胞书等宣传品。中共勃利区委在勃利成立了勃利县抗日总会,开展群众性抗日斗争。勃利反日总会于1935年春出版了《先锋报》,报导第四军的抗日军事斗争,发表反日宣言,还有日文的对日军传单。

^① 《密山县抗日总会的宣传和行动纲领》(1934年10月17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7,第369页。

1935年夏,第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向方正县展开活动,开始在大罗勒密山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第四军部队便在方正、勃利、依兰一带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四军军部在方正陈家亮子、前五家子屯周围通过宣传和发动,很快在群众中组建了抗日自卫队、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著名的第四军小英雄何畏当时就是五家子屯儿童团团长。为了进一步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还建立了“内红外白”的两面政权。前五家子自卫团,就是表面上应付敌人,而暗中却是保卫根据地的群众抗日武装。李延禄运用“内红外白”的统战关系,在大罗勒密镇上对裕芳木材公司经理张景隆、伪森林警备中队队长陈云山等人进行争取并给予爱国主义教育,使之成为抗日部队服务,提供敌人的情报,支援武器弹药,代购布匹、服装、胶鞋、药品等。此外,还协助他们开办了小药店和邮政代办所,作为第四军的联络站。

1935年8月,中共勃利县委成立,领导群众积极开展各项抗日工作。1935年8月16日,《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就政权与根据地问题说:“在已有抗日会的相当基础而且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将敌人的保甲制度粉碎,地方自卫团的武装完全解除,而将该地方抗日会组织更扩大发展起来,变成当地的实际政权机关,将该地作为根据地。对于根据地的了解,我们应当肃清过去之苏区或赤区等观念,而主要是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是死守一域,百攻不破的根据地”^①。据此,第四军在勃利青山里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其范围分布于勃利、依兰、桦川等地。勃利青山里抗日游击根据地,向采伐木业者征收“救国捐”,借以筹款,解决第四

^① 《中共勃利县委致各地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7,第95页。

军的军费。各经营木场的资方按采伐木材数量缴纳税款,第四军则负责保护伐木业的安全。对拒交“救国捐”者,即按盗采罚款。对来往运输的大车,征收车捐,在游击区内插旗行驶,否则予以罚款。这种“救国捐”制度,受到普遍欢迎,使第四军的经济状况有了相当改善。

1935年夏,第四军在依兰活动时,与在此地活动的第三、第六军密切配合,建立了抗日会,进一步发动群众,在道台桥、三道岗、团山子、宏克力等地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5年春,中共勃利区委协助在桦川活动的祁致中所部抗日义勇军“明山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后,该部在依兰、桦川、勃利等地积极开展对日伪军作战,同时不断加强根据地建设。1936年秋,在桦川七星砬子密营中建立了兵工厂。

七星砬子山位于完达山支脉,在今桦南、集贤县、双鸭山市交界处,方圆50余平方公里。山中有哈达河、柳树河流过,水源充足。山上多为原始森林,地形隐蔽、险要,易守难攻。七星砬子修械所在筹建时,独立师主管后方工作的经济部主任崔振寰和中共下江特委设法请到原奉天兵工厂的失业工人、共产党员胡志刚等7人,不久又动员10余名失业工人前来参加工作。并设法先后从各地置办3台机床、发电机和各种工具,利用河流用水轮带动发电,在勃利至佳木斯的铁路车站夺取钢轨等为原料,从开始修理枪支转为制造枪支、子弹和手榴弹,逐步建起修械、制枪和弹药等3个车间,扩大成为兵工厂。影响所及,抗联第三、第五、第六军也在附近设立修械所,相互协作,直至将七星砬子兵工厂发展成北满抗联兵工厂,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独立师在桦川县笔架山南部和双鸭山西部分别建立了被服厂和军政学校。被服厂为部队制做军装、子弹袋等。自办军政学

校为部队培训了一些连排级干部,解决了部队对基层干部的迫切需要。

由于独立师积极战斗,部队建设和后方基地建设都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的表彰。1936年9月23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在给祁致中师长的信中说:“本部屡接报告,盛谓该师长对地方民众颇负责任,尤于反日事业积极进行,不遗余力,殊堪嘉奖。”^①

八、饶河、虎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坚持与发展

1934年2月,独立营在国民救国军溃散时及时分离出来,并重新组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为坚持长期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游击大队以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势险要、易于防守的爆马顶子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经过深入的群众工作,在同年夏终于建立起以饶河县爆马顶子为中心,包括大叶子沟、十八垌地、大佳河等在内的方圆约25公里的游击根据地。中共饶河中心县委随后也迁来根据地领导抗日斗争。此后,饶河反日游击队又向抚远和虎林等县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游击区。1934年七、八月间,饶河游击大队连续攻打了三人班、五林洞、小佳河以及虎林三人班等地敌人据点,取得了胜利。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反日武装,纷纷向游击大队靠拢,抗日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为游击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游击根据地内的党团组织和反日会等群众组织也有较大发展。到同年8月,共有中共党员104名,其中汉族党员29名,朝鲜族党员75名(其中女共产党员6名);共青

^①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训令》(1936年9月2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第213页。

团员 101 名,其中汉族团员 6 名,朝鲜族团员 95 名(其中女团员 35 名)。

饶河反日总会建立后,在县内的关门嘴子、小北沟、小南河、西南岔、苇子沟、小佳河、大别拉炕、小别拉炕等设立了反日会分会。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农民委员会。至 1935 年,饶河反日会员已有 600 余人,其中汉族 470 余人、朝鲜族 129 人,共设 17 个分会。在虎林的黑嘴子、独木河、九十牌、大旗杆也建立了反日会,共有 160 余名反日会员,其中汉族 130 余人、朝鲜族 30 余人。饶河与虎林的反日会与农民委员会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抗日政权的职能。

在反日会的领导下,各地成立了“青年救国会”和“妇女联合救国会”等青年和妇女群众组织。

军队所需的粮食和服装物资,除在战场缴获和没收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财产外,绝大部分依靠救国会来解决。人民群众不顾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想尽一切办法购买棉花、布匹,为军队缝制军服;不顾生命危险,为军队运送粮食。此外,传送信件、情报、医治伤员,都为群众所自愿承担。

1934 年 11 月,日伪军以爆马顶子为目标,分兵数路开始对虎、饶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讨伐”。针对敌情,饶河游击大队在大队长李学福的率领下,在爆马顶子与敌展开激战。由于寡不敌众,爆马顶子游击根据地被敌人占领。在大叶子沟、大佳河等地,游击队员在金东天率领下,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根据地。1935 年 1 月,敌人再次向游击根据地进行“讨伐”。饶河游击大队在李学福和崔石泉的指挥下,在大旺砬子伏击来犯之敌,毙伤敌百余人。随后,李学福率队夜袭爆马顶子,击毙伪军连长以下 10 余人,并将其余伪军全部缴械,收复了爆马顶子游击根据地。

以爆马顶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为游击队坚持虎、饶地区的抗

日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敌人的严酷封锁、军事“讨伐”和实行“集团部落”政策,自1936年下半年,特别是1937年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为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抗联各军依托山区密林,相继建立了许多后方密营,作为军队休整、训练、屯粮等的后方基地。抗联第一军在南满的桓仁、抚松、临江等地,建立了许多密营;抗联第二军在安图、汪清、长白、桦甸等地也建立了许多密营。抗联第四、第五军也在宁安、东宁、密山、穆稜等地建立了许多密营。第三军和第六军在小兴安岭密林里建立许多密营。在汤原汤旺河谷、老白山、帽儿山等地,曾经建立了数十处密营。此后,在铁骊安邦河上游老金沟、绥棱张家湾、白马石,北安南北河、半截河、大仙堂,庆安十六道岗、欧根河、大砬子,海伦八道林子,通河北部青峰岭、石门、东山等地都建起大批密营。

密营一般建在比较偏僻、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之中。其位置多选在地势险要,靠近水源,进可攻、退可守的隐蔽之地。敌人一般不敢冒险进入。密营的形制多为木刻楞式、地窨子式、马架子式、窝棚式,大都依山傍水而建,也有利用天然山洞作为密营的。密营内建有火炕,顺山搭有烟道;屋顶多用树枝、柴草掩盖,不易被人发现。根据密营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规模大小,设置有党、军领导机关、交通站、电台室、兵营、被服厂、后方医院、军械修理所(兵工厂)、军校(干部培训班)、粮食仓库、物品仓库等。密营附近还有屯垦地。密营周围皆修有战壕、掩体、瞭望哨位等工事,以利于密营的保护。这些位于深山密林中的大量秘密营地,是东北抗日战争中特殊形式的根据地。密营虽然设备简陋、条件有限,但在敌人极力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实行“归屯并户”,原有根据地被破坏,日伪当局妄图把抗联部队困死、饿死、冻死的严峻形势下,为保存抗日武装实力,补充给养、休

整部队、医治伤员、培训干部、议事决策,使之能够坚持长期坚苦的抗日游击战争,还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东北城镇人民的反日斗争

一、城镇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反日活动

1933年初,李杜、王德林、马占山、苏炳文和冯占海等部东北抗日义勇军因战事失利,相继退入苏联或撤往关内,日本侵略军占据了东北三省的绝大部分城镇。但是,城镇中各界群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并未停息,人民群众冲破日伪的白色恐怖,继续坚持反日斗争,并与广大农村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互为呼应。城镇人民的反日斗争,推动与鼓舞着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

中共满洲省委为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反日统一战线新方针,广泛联合、团结各界民众、抗日义勇军以及争取伪军士兵、警察共同抗日,1933年9月1日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纪念“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宣言》和告工人、农民、学生、灾民、市民、伪军士兵、警察书。其中提出:“扩大工农兵士学生革命军官反日统一战线,扩大反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及(其)一切海陆空军出满洲,收复东北失地,争取中国民族独立与领土完整。”“打倒日本走狗‘满洲国’,建立民众自己选举的政府!”^①

同时,为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和“五一”、俄国十月革命节、广州起义等革命纪念日,在各地组织党团

^① 《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纪念“九一八”两周年纪念宣言》(1933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5,第1页。

员上街,举行飞行集会,向群众发表讲演,喊口号,散传单,沿街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鼓动,号召群众投身抗日武装斗争,向民众指明抗日斗争必胜的前景。或者组织一些小型的室内集会,向抗日志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东北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增强他们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1933年4月29日深夜,中共哈尔滨东区区委书记张敬山(张玉珩)和工人杨兆顺、柴好等,在火车站前日伪刚立起的伪满建国纪念碑上,用红色油漆书写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字标语,引起市民的轰动和敌人的恐慌。在吉林,5月6日晚,中共吉林特支和共青团特支动员党、团员在市内大街小巷同时散发《为“五七”、“五九”国耻纪念告吉林同胞书》等传单,号召群众参加抗日部队,进行抗日斗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来临时,在哈尔滨还由共产党、共青团和青年反日同盟募集了几百元抗日捐款,派遣几名抗日志士去南满磐石,参加刚刚建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中共满洲省委为贯彻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新方针和适应形势的需要,自1933年5月以后陆续整顿或恢复了哈尔滨、奉天和大连等大城市的党组织和珠河、磐石、汤原、海龙等中心县委以及若干县委组织,还成立了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领导东满特委、饶河中心县委和穆棱、密山、宁安县委,并负责沟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同时,加强哈尔滨、齐齐哈尔、奉天、大连等中心城市和中东、呼海、奉山(北宁)、吉海等重要铁路,以及鹤岗、穆棱、本溪、西安等矿山的反日工作。各地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在领导反日斗争中,还注意考察并积极吸收一批经过斗争考验的工人、学生和抗日人士加入党和团的组织,壮大了党、团组织的力量。群众性反日组织反日会等也有发展。

1933年4月,中共哈尔滨临时市委撤销,分设东、西两个区委,由

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1934年4月,因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杨安仁)和书记刘明佛(胡彬)相继被捕叛变,导致中共满洲省委、哈尔滨两区委、吉东局以及双城、伪新京、奉天、珠河等地和呼海铁路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工会组织的大破坏,主要干部40余人被捕,发生了震动全东北的“四月事件”,使党的组织和抗日事业遭受严重损失。这次事件是因为党和团的领导机关政治警惕性不高,违反秘密工作纪律造成的。此后,党的省委机关虽然逐步恢复起来,但却与南满的大连、抚顺、本溪、奉天等城市党的组织中断了联系,同各个抗日游击根据地党组织和抗日部队的联系也一度中断。之后,哈尔滨市两个区委合并为一个区委,由魏拯民、陈印章、夏尚志等先后担任区委书记。

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德如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经过中共奉天特委的艰苦努力,市内及其所领导的大连市委和台辽县委、本溪、新民、辽阳、抚顺、安东(今丹东)等特支以及北镇特委等逐步得以恢复,并迅速开展抗日反满宣传,加强了对伪军的争取与瓦解工作。不久,中共本溪特支工作暴露,奉天特委和本溪特支在6月中下旬遭到破坏,特委书记杨德如等37人被捕。7月以后,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委派张适(张有才)等重组奉天特委,仍连遭日伪破坏。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夏尚志到奉天任特委书记,恢复、重建兵工厂等几个党支部。同年12月,中共奉天特委改组为中共奉天市委。

1933年10月7日,中共大连市委因叛徒告密遭到破坏,25人被捕。翌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张敬文到大连恢复组织,重建市委。1935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夏尚志到大连任市委书记。此时大连市委已在“满铁”、码头、印刷厂、火车站等建立起党支部,先后发展党员30余名;开展了反满抗日工作。

中共吉东局在1934年的“四月事件”中被破坏,吉东局书记孙广

英脱党逃走。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至吉东各县整顿各县党组织,于1935年2月建立中共吉东特委,领导饶河中心县委和密山、穆稜、宁安等县委和勃利、东宁区委组织,吴平任特委书记。不久,吉东特委机关由穆稜迁至牡丹江城内,继续进行秘密反日斗争。

据统计,1934年5月,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员^①数量约为2500人,较1933年1月增加400人,共青团员2000余人。

1935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调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刘焜、省委书记杨光华^①、宣传部长谭国甫去莫斯科,仅留省委常委、共青团省委书记小骆^②坚持工作,致使满洲省委工作受到极大削弱,根据地建设也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城市中的抗日斗争转入长期隐蔽状态。

二、各地工人的反日斗争

1933年5月,在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根据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的建议,将满洲省委职工部改组为满洲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简称满总筹备处,由省委原职工部部长金伯阳任筹委会负责人。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老曹(黄其清)、赵一曼到哈尔滨,正式设立满洲总工会党团,由老曹(黄其清)任党团书记并任满洲省委常委,赵一曼任满总党团组织部长兼哈尔滨市总工会代理书记。

^① 杨光华(1908—1991),又名子才,湖北嘉鱼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沔阳秋收起义,历任中共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临时省委书记、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江苏省委秘书长。1934年10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5年5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的审查,被错误处理并遭流放。1956年回国,任湖北省政协委员等职。1991年8月病逝。

^② 小骆(1911—),原名张文烈,别名胡权、叶琛、菲野,山西人。1931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1935年1月调到东北,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常委。1936年夏去海参崴联络站接受审查。后下落不明。

他们积极开展工会工作,领导工人的反日斗争。

在满洲总工会筹委会成立前后,筹委会即派人去中东铁路、呼海铁路以及奉天、伪新京、穆棱、下江等地开展工会工作,建立工会组织,工会会员有了发展,工人斗争有所开展。据不完全统计,此前,东北红色工会会员 126 人,至 1933 年 10 月达到 295 人。各地党组织也十分注意开展工人工作,领导工厂、矿山的工人进行反日斗争。1933 年至 1934 年,东北三省工人为反对日伪统治和残酷压迫、剥削,举行了数十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怠工斗争,参加人数达几万人。

1933 年 2 月 1 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职工部派县委委员陈万福在吉海铁路建立了吉海铁路总工会,随后又在该路一些道拨房建立了工会分会。同年 3 月初,该路 31 号和 32 号工棚铁路工会会员协助南满游击队,将该铁路老爷岭隧道洞口北侧铁路的 15 根道钉拔掉,使列车脱轨,并袭击了伪铁路警护团。3 月 25 日至 4 月上旬,吉海铁路工人又协同南满游击队多次破坏烟筒山至取柴河路段的铁路,使日伪军车数次脱轨并遭到袭击。

1933 年春,在哈尔滨市总工会和电业党支部的领导下,哈尔滨爆发了电车工人大罢工。

1933 年 4 月 2 日晚,哈尔滨电车 2 号线上,伪宪兵王文昌依仗日本人的势力,上车不买票,还将向他要票的车掌(售票员)张鸿渔拉到宪兵队毒打一顿。电业当局慑于宪兵队淫威,声言要将张鸿渔开除。电业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发动电车工人举行罢工,并将此事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和总工会领导人冯仲云、老曹、赵一曼等。省委和总工会立即决定领导这次罢工斗争。赵一曼亲自到电车厂指导罢工斗争,成立了由党团员和工会会员组成的罢工委员会。晚 10 时,罢工委员会召集有 200 余名工人参加的会议,组成了纠察队、组织部、宣传部具体领导罢工斗争。电业党支部委员张兰生负责宣传工作。罢工委

员会宣传部连夜起草了《电车工人告哈尔滨市民书》及其它各种宣传材料,写出标语口号,画了漫画,揭露伪军警宪特殴打工人的暴行。《电车工人告哈尔滨市民书》向全市民众说明罢工的原因,呼吁各界市民支持工人的斗争。随后,工人们把这些宣传品贴遍大街小巷和电车行车路线。

第二天,工人代表向电业局总办高文垣提出给受伤者抚恤金、撤换宪兵队长、交出打人凶手等5项要求。罢工进行了两天,市内交通陷于瘫痪。日伪当局对电车工人罢工极为震惊。开始,他们采取利诱、分化的手段破坏工人斗争,后又以武力相威胁逼迫工人复工。但工人们毫不畏惧,坚持罢工。最后警察队长被迫声明“决不逮捕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后,张兰生等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投奔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参加了游击队。

1933年5月,在中共海伦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海(伦)克(山)铁路海北段200余名修路工人举行罢工。20余名工人夺取日军机枪后,参加抗日队伍。1933年6、7月间,中共海伦支部发动土木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把头克扣工资。罢工中,在土木工人中办起了小报进行宣传。在工人斗争的基础上,中共海伦支部在北安、滨江、五常、海伦各站发展了20多名工会会员和一名党员。

1933年5月13日,在鹤岗矿山地下中共组织和煤矿工会的领导下,500余名矿工举行了反对日伪矿主克扣工资、打骂工人的罢工;6月20日,又组织了搬运工人和机电工人反对莲江口鹤岗煤矿事务所的日本工头无故扣押工人的联合罢工。同年9月,又有300余名矿工为索要欠薪举行罢工。6月27日、7月1日,哈尔滨中东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反对路局开除工人,1000余名工人发动两次罢工,导致铁路交通混乱。路局被迫收回裁减工人的决定。

1933年6月,伪新京相继发生51个砖窑6000名工人的同盟罢

工和 11 个油坊 3000 名工人为反对欠薪发起的同盟罢工。日伪当局惊呼是“满洲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罢工”。7 月 8 日,长春 1000 名建筑工人为反对工头侵吞工资发生罢工。同年 6 月,延吉八道沟金矿几十名工人参加了延吉游击队。同年,西安(今辽源)煤矿工人为要求发还欠薪,在中共西安煤矿特支领导下发动 3000 名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

同年 6 月,奉天纺织厂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发生 3000 余人的怠工,取得了胜利。奉天铁路机务段工人为反对开除工人,举行 3000 人罢工。10 月,大连码头工人 1000 余名,要求发清欠薪举行罢工。12 月 2 日,大连市政清扫工人要求发还欠薪,发生 150 人罢工。

1933 年 6 月,呼兰铁路工人 50 名为反对路局强迫学日语,举行罢工。7 月,中东铁路下城子站工人 50 名为反击日伪当局认定该站工人“通匪”(即协助抗日武装),在工会领导下举行罢工。

1933 年东北三省较大规模的工人斗争中,具有共产党组织和满洲总工会筹委会以及各地工会领导,并有明显反对日伪统治的斗争为数不少,具有索要欠薪的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也居相当数量。后者虽属为改善工人自身生计状况的斗争,但在当时日伪反动统治情况下,众多工人群众参加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自然也具有反对日伪统治的色彩。

1934 年初开始,由于敌人的镇压和破坏,东北的工会工作与工人斗争连续遭受极大摧残。哈尔滨电业原来共产党、团组织和工会的基础较好,在市内的历次工人反日伪统治的斗争中均走在前列。但因未能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工会骨干和积极分子过于暴露。2 月 27 日,电业工会突然遭到大破坏,先后有 20 余名工会干部被捕,电业部门的共产党和工会被极大地削弱。哈尔滨皮鞋工会、中东铁路工会也相继被敌人破坏。结果,据满洲总工会 1934 年

2月统计,哈尔滨各个工会会员仅余中东铁路3人、电业40人、皮鞋业10余人、海员2人,同记工厂2人、车夫工会5人,共60余人,较1933年减少一倍。同时,奉天工会也仅余10余人,长春仅铁路和油坊尚有17名工会会员。此外,呼海铁路有40余名工会会员。但是,工人的斗争仍在继续。

1934年6月13日,吉海铁路工人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第一团,破坏了该路第31号工棚附近的铁路。7月,吉海铁路第27号工棚工人将鸡冠山附近靠山崖的铁路道钉拔出,并错开铁轨,致使自磐石驶回烟筒山的压道车出轨,翻入山涧,汉奸监工等被摔死。8月,吉海路第11、20号工棚工会小组工人又将双河镇至取柴河路段的铁路破坏,使一列运输日伪军需物资的军车颠覆。

1934年6月,沈阳伪军政部被服厂3000余名工人为反对解雇1000余名工人而举行罢工。12月,沈阳太利胶皮工厂215名职工,为反对厂方减少工资举行罢工。这一年,东北三省的工会会员数量虽然呈现减少趋势,但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的铁路、矿山的工会会员却出现壮大的形势。据12月28日统计,工会会员共有约500人,其中西安煤矿59人、吉海铁路76人、沈海铁路42人,伐木工人约300人。

1935年3月末,鞍山“东亚铅锌株式会社”中国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扣发工资而举行罢工,历时15天,取得胜利。4月,大连甘井子建筑工人近4000人,为要求按时发放工资并给因工伤死亡工人发抚恤金,举行罢工。随后搬运工人、化工厂工人也参加了罢工。罢工工人捣毁了当地警察派出所。罢工历时一周,取得胜利。此外,在大连由爱国者组成的“放火团”从1934年起,即对大连日伪经营、控制的码头、油场、石油公司、军用仓库等,连续进行多次放火,烧毁敌人大量物资和房屋。

同年夏,中共通化县委领导修筑山城镇至通化公路的筑路工人280余名举行罢工,要求发放工资,罢工两天。中共西安煤矿特支领导工房工人为反对昼夜连班生产进行斗争。9月21日,吉林市马车与洋车工人举行联合罢工。

由于日伪在城镇的统治日趋严密,工会活动受到控制,东北沦陷区城镇的工人斗争规模日趋缩小,参加的人数也大为减少。但它是东北抗日斗争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对于鼓舞城镇人民的反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教育界的反日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党组织在依靠工人、农民这一抗日的根本力量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同时,还注意团结一切其他阶层的爱国力量共同抗日。其中,对于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桥梁和先锋作用一向予以特别的重视。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共青团满洲省委和各地党、团组织,号召和派遣一批身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入正在兴起的各地抗日义勇军队伍,或参加党直接在农村组建的工农义勇军、抗日游击队中去,拿起武器同日本侵略军战斗。其中不少人在抗日武装斗争中经受锻炼,成为人民军队的各级领导骨干。

在这场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中,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党员、团员和爱国学生,表现突出。其中一些人在中国共产党直接组建的抗日武装尚未形成之前,首先参加了各地抗日义勇军队伍的抗敌斗争。齐齐哈尔省立第二交通学校学生雷炎在马占山举旗抗日时,参加该部学生团。辽宁爱国学生李烈生随同几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返回家乡辽阳后,在建立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和对敌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延边地区琿春县东关中

学学生、共青团员周树东,在该地驻军举行抗日起义组建救国军时,毅然参加吉林救国军抗日。同时,还有更多的学生党团员和爱国青年则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工农义勇军和抗日游击队。在磐石中学师范班学习的中共党员孟杰民、共青团员初向臣等6名学生,参加了磐石工农义勇军的筹建工作。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张甲洲也联络同学张文藻、于天放等人,返回家乡组织了党领导的反日武装——巴彦反日游击队。哈尔滨第一中学学生党员陶净非联络同乡同学王光宇,毅然放弃学业,受党组织派遣远赴宁安参加了宁安工农义务总队的抗日斗争。同时有些学生还辗转打入伪军内部从事瓦解工作,待机组建抗日武装。其中,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就读的学生中共党员宋铁岩、曹国安,返回家乡永吉县后,打入伪吉林警备军第五旅第十四团迫击炮连,后来即率该连伪军举行起义,参加了磐石的南满游击队。

这些热血青年学生在民族危机关头,宁可放弃学业,奋不顾身地投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洪流的事迹,仅仅是千百个参加抗日的东北地区学生的优秀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民族解放事业中为国捐躯。

在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大中小学的爱国教师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中有的弃教从戎,参加抗日部队;有的利用职业的便利,想方设法启发学生的民族意识,教导学生反抗日本侵略者,引导他们走上抗日的道路。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共党员王仁斋、刘三春正在柳河县三源浦小学任教师,他们根据中共海龙中心县委指示,相继组建柳河游击连和海龙工农义勇军;来自北平香山慈幼院在延边各县任小学教师的10余人中,中共党员白一平在珲春县第一小学任教。他根据中共珲春县委指示先参加吉林救国军队伍,后参加了党领导的珲春县中韩

工农游击队。与白一平等一起到延边被分配到和龙县开山屯泉平养正小学任教的曹亚范,也积极投身东满特委领导的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斗争。与此同时,任敦化文庙小学教师的陈翰章,当日本侵略军侵占敦化后,毅然参加吉林救国军抗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中共党员李成林,九一八事变时正在宁安县中学师范班任教。当吉林救国军到达宁安时,他立即参加救国军进行抗日斗争。后来,他先后任中共密山县委宣传部长、勃利县委书记,对密山游击队的建立和对东北抗日联军第四、第五军的支援作出了突出贡献。

延边地区的东兴、大成等私立中学,是20世纪20年代由朝鲜爱国志士和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培养抗日爱国人才的基地。早在1930年,这两所学校里就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曾任中共延边区委书记的周东郊就是大成中学的教员。九一八事变后,这两所学校的师生曾多次进行反日斗争。1933年,两校师生坚决抵制了日伪当局启用朝鲜总督府审定的、歪曲朝鲜历史的教科书和停止朝语课、将日语课作为正课的倒行逆施。1934年,为反抗日伪当局企图将东兴、大成两校合二而一,以便对师生抗日活动进行监视,削弱抗日力量的阴谋,开展罢课斗争,取得了胜利。延吉的间岛师道学校和吉林永信农业中学的教师金裕勋、朴奎赞和权重范等也在学校中进行反日宣传,对学生指明朝鲜青年只有坚决进行抗日斗争才是为唯一的出路,从而使许多学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在哈尔滨,冯仲云以商船学校教授的身份在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从事秘密工作,并在学校中教育傅天飞、范廷桂等进步学生参加抗日斗争。

在汤原县,九一八事变前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刘铁石,在日本侵略军侵占汤原后,愤然辞职,参加抗日活动,并于1934年春参加汤原反

日游击队,在全县教育界引起很大震动。姚新一^①和张耕野^②都是大学生,九一八事变时,二人均在佳木斯的桦川中学任教。姚新一较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立即带领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组织全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进行抗日宣传、募捐,支援抗日义勇军。他们教育培养了一些青年学生成为共产党员,并走上抗日的道路。其中后来相继任中共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和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的高禹民^③,即是姚新一最好的学生之一。张耕野曾派桦川中学学生马克正去汤原梧桐河金矿策反金矿警队,举行抗日武装起义成功,后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此外,他还在佳木斯和桦川中学积极发展共产党员,为抗联部队培养输送了10余名干部。著名的“八女投江”英雄群体中的抗联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原来就是桦川县悦来镇小学教师,在佳木斯桦川县女子中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抗日工作,后来参加抗联第五军。

中共党员张甲洲,在巴彦反日游击队失败后赴富锦,化名张进思,任富锦中学教师、校长,继续从事秘密反日斗争。他将巴彦反日游击队时的战友于天放等调入富锦中学,向学生进行抗日反“满”教育,教育学生不做亡国奴,要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培养了

^① 姚新一(1907—1939),原名唐吉昆,字瑶圃,满族,吉林永吉人。就读于吉林高等师范。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前后,先后在桦川中学、吉林省立二师、依兰中学任教员。其间任中共依兰县委书记。1937年任中共吉东省委秘书长。1939年3月在战斗中牺牲。

^② 张耕野(1901—1938),原名张宗儒,黑龙江双城人。毕业于吉林高等师范。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在桦川中学任教,任该校中共组织负责人。后任中共佳木斯市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参加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四师政治部工作,同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

^③ 高禹民(1916—1940),原名高升山,山东高密人。依兰县中学学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抗日工作,并任该校中共支部书记。后任中共依兰县委书记、下江特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九支队政委、第三支队政委等职。1940年12月在战斗中牺牲。

孙士录(孙为)、张凤阳、田时雨(天澍)、刘自国等 10 余人到北平深造,走上革命道路。张甲洲还为汤原反日游击队购买物资,解决部队急需。

在日伪殖民统治下,广大教师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的反动统治极为不满,他们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讲坛和教学活动,启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和愚民教育,引导学生不甘于屈服和走上抗日反满的道路。其中一部分人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联络教师组建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团结爱国力量,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为抗日部队购买军需物资,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地区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奋起抗日,向群众进行反日救国宣传,并同群众一起拿起武器投入武装反日斗争的洪流,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日伪统治者采取血腥镇压的手段,妄图从肉体上除去这些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但是,广大教师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始终不变。

毓文中学是吉林城内的私立中学,办学历史较久,学校具有追求进步思想的校风,一些中共党员和思想进步的教师都曾在这里工作过,金日成等革命青年都在该校读过书。1935 年,时任该校校长的李光汉经过串连,在吉林市教育界秘密建立了救国会,李光汉任会长。救国会员有吉林省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刘继瀛、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萧汝纶和第一中学、毓文中学、永吉县第一中学等校校长或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以及部分教师。该会的活动主要是向师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罪恶言行,以唤起师生的爱国思想和抗日热情。但是,因事机泄露,同年 7 月 5 日,日本宪兵队将吉林教育界救国会破坏,李光汉、萧汝纶和第一师范教务主任娄少石、毓文中学训育主任李桂勋、第一中学教师赵承志、女子师范教师黄继新、女师附小校长魏辅周、永吉初中教师张荣德等 20 余人逮捕,并查封了

毓文中学。被捕的爱国人士虽被酷刑折磨,却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其中李光汉、娄少石、魏辅周等多人牺牲于狱中。

1936年11月至1937年1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以安东(今丹东)为中心的镇压东边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教育界大惨案,震惊东北。早在1932年,安东原林业中学校长李献廷在北平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建议,返回安东开展筹组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活动,并得到林业中学校长秦有德的支持。他们曾以救灾名义在各工商号中募集捐款,支援抗日斗争。后来,这一抗日爱国活动,又得到担任伪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安东县教育局局长邓士仁的大力支持,在林业中学秘密组建了安东抗日救国会,由孙文敷任名誉会长、秦有德任会长。此后,在桓仁、凤城、庄河、宽甸、岫岩、辑安(今集安)、通化、临江等县都相继秘密组建了抗日救国分会组织。各地抗日救国会成立后,分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从教育界扩展至工商界及许多民众之中。1935年12月20日,乘伪安东省教育厅在安市召开各县中学、师范学校校长参加的中学教员检测会议之机,由孙文敷、邓士仁、秦有德等人分别同各县救国分会的爱国人士秘密会商,研究了救国会的抗日活动等事项。事隔近一年后,1936年秋,桓仁县绅士金巨庭为救国会捐款之事被人向日本宪兵队密告,该人随即被捕,并由此引发日本宪兵队的大逮捕。敌人首先在桓仁县逮捕各界人士115人。11月12日起,又先后在安东城内逮捕97人,其中包括孙文敷、邓士仁、秦有德和一些中小学校长及安东总商会会长孙荣明等人。此外,日伪当局还在通化、宽甸、凤城、岫岩、庄河、辑安、临江、长白等县陆续逮捕了99人。此次事件共被逮捕311人。敌人对被捕的爱国人士进行了严刑逼供,致使邓士仁等惨死在酷刑之下。仅桓仁县被捕的人中,即有14人在刑讯中被折磨致死。此次被捕者中有40余中共党员在狱中惨死或被判死刑杀害,还有许多教育界爱国知识分子被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安东抗日救国会

领袖孙文敷、秦有德被押赴刑场途中,大义凛然,高呼“中华民族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

敌人的残暴并未使东北地区的爱国教师屈服,相反,更加激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日伪统治的愤恨,激励他们以更隐蔽而有效的形式继续从事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四、文艺界的反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在军事上、政治上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同时,还加紧从思想上、精神上奴役东北人民,强行灌输“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奴化意识,欺骗东北人民,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借以维护其反动的殖民统治。

中共满洲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等党组织为反对日伪这一思想统治的罪恶行径,动员一些共产党员文学艺术家运用多种文艺形式,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中共党员罗烽^①、金剑啸^②、舒群^③、姜椿芳^④等,联合团结一批爱国和进步的文学

① 罗烽(1909—1991),原名傅乃奇,笔名洛红、彭勃、罗迅、克宁等,辽宁沈阳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指导创办了《夜哨》《文艺》周刊和“星星剧团”。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上海文艺界战时服务团、作家战地访问团。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委书记、东北文协主任委员、东北作协副主席。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后获平反。

② 金剑啸(1910—1936),原名金承载,笔名金剑、剑、巴莱、健硕等,满族,辽宁沈阳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夜哨》《文艺》、“星星剧团”、“白光剧社”,主编《大北新报画刊》、《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1936年8月被敌人杀害。

③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又名李春阳、李旭东,笔名黑人,黑龙江阿城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义勇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临时秘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系主任、东北文艺工作团团团长、东北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长等。著有《没有祖国的孩子》等大量作品。

④ 姜椿芳(1912—1987),江苏武进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干事。主编《满洲青年》、《满洲红旗》、上海时代出版社社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

艺术家,如白朗(女)、萧军、萧红(女)、达秋、金人、阎述诗、田贲、王秋萤、李克异、牛平甫等,形成东北爱国作家群体,构筑起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反满文艺阵地。他们创办了许多文艺社团或报刊,同时利用日伪报刊的文艺副刊等专栏,使用曲折隐晦的笔法,发表抗日反满的爱国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音乐等作品。这些文艺作品对于振奋东北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精神,打击日伪统治者的嚣张气焰,捍卫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满特委以进步人士吴雅泉名义创办的《哈尔滨新报》为阵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该报总编辑、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多为共产党员,如安希伯(安贫)、何语竹、关子文、贺昌炽等。该报通过邀请社会名流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广为报导东北各地抗日斗争的消息,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该报开辟文化副刊《新潮》专栏,以此团结进步的爱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并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反日斗争。例如反映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人民悲惨状况的三幕话剧《铁蹄下》,在《新潮》副刊连载后,激起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深受读者好评。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后,《哈尔滨新报》停刊。

1932年夏,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姜椿芳创办团省委机关报《满洲青年》(后改为《东北青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和反日游击队武装抗日的消息。1933年初,姜椿芳被调到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主编省委秘密机关报《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为了丰富该报的内容和提高宣传效果,他还请共产党员金剑啸任美术编辑,随时提供画稿。

1933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为扩大宣传阵地,开展哈尔滨的抗日文艺活动,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决定由共产党员罗烽、金剑啸等创

办“星星剧团”，以星星之火点燃人民心中的抗日爱国烈焰。这是一个半公开的艺术表演团体，由罗烽负责组织领导，金剑啸任导演兼舞台美术设计。成员有萧红^①、萧军^②、白朗、舒群、白涛、小徐等人。萧军为剧团团歌作词，由金剑啸谱曲。歌词为“我们的身躯渺小，我们的光芒微弱，我们的故乡是暗淡的天空，我们的任务是接待黎明。”剧团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编排了3个话剧，但因找不到剧场，加上日伪的恐怖统治，话剧无法上演。剧团被迫解散。

1933年8月初，中共党员罗烽、金剑啸等受党的指派，与进步作家萧军、萧红等一起，通过日伪官办的长春《大同报》编辑陈华的关系，在该报创办了《夜哨》文艺副刊，意为在日伪黑暗统治下进行斗争的前哨阵地。主要撰稿人为金剑啸、罗烽、萧军、萧红、白朗等人。《夜哨》自1933年8月出刊至同年12月停刊，共出刊21期，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他们用曲折、隐晦、影射的手法，揭露了在日伪统治下的社会黑暗现实，暗示人们只有进行抗日反满斗争才有出路。萧军的《下等人》、《证据》，萧红的《夜风》，罗烽的《口供》、《胜利》，白朗的《只有一条路》，金剑啸的《星期天》等小说和罗烽的《两个阵营的对峙》，金剑啸的《穷教员》等话剧作品，在读者中影响都很大。《夜哨》每期都由萧军在哈尔滨组稿，编好后寄给伪新京的《大同报》发表。后来，该刊因连载李文光创作的以抗日斗争为主题的小说《路》，引起日伪的注意，被迫停刊。

^①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田娣，黑龙江呼兰人。1932年在哈尔滨为报刊撰稿，1934年进关后，同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各地。代表作有《生死场》、《呼兰河畔》等。1942年病逝。

^② 白朗(1912—1994)，原名刘东兰，曾用名刘莉。辽宁沈阳人。1933年开始在哈尔滨从事抗日文艺工作，曾任《国际协报》副刊《文艺周刊》主编。1938年在重庆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赴抗战前线采访。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妇联委员等职。1994年病逝。

1934年1月,哈尔滨的爱国作家群体,又通过白朗担任哈尔滨出版的《国际协报》副刊编辑的机会,在该报创办了《文艺》周刊。《国际协报》为进步爱国人士张复生创办。九一八事变后,该报曾一度停刊,1932年3月复刊。日伪当局虽然规定新闻版所有稿件均须送审,但文艺副刊例外。因此,该报联系罗烽、金剑啸、萧军、萧红、金人、达秋、李文光、白涛等一批文学艺术家为该报撰稿。1933年秋,该报的《国际公园》、《妇女》等副刊由白朗负责编辑,翌年1月她又主编《文艺》周刊,成为哈尔滨爱国作家群的新阵地。如白朗、金剑啸、萧红等的《逃亡的日记》、《云姑的母亲》、《麦场》、《一个雨天》、《星散之群》等都在《文艺》周刊陆续发表,反映了在日伪黑暗统治下农民的苦难境遇和反抗斗争。该刊共出47期,至同年底被迫停刊。

1933年12月,金剑啸通过朋友关系进入《大北新报画刊》任编辑。《大北新报画刊》是日本浪人山本所办的《大北新报》副刊,其内容不受日伪新闻检查。金剑啸利用这一机会在该画刊上发表题为《结束吧<文艺>周刊》的短文,抒发因《国际协报》《文艺》周刊被迫停刊而产生的愤怒。短文认为:“一个《文艺》算了什么,难道说,我们就再不会冒出什么《文艺》吗?”“只要下种,就会长苗,垂死的狗屁,不会喘延几天!”号召战友们,再接再厉鼓起勇气同敌人继续战斗。他在画刊发表的一篇短文《谣》,以小儿骗人的故事,讽刺和揭露日本侵略者编织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满洲乐园”等欺骗民众的谎言。金剑啸还说服该画刊负责人在原来突出“艺术和女人”的宗旨外,还应刊出世界上的名政治家、外交家、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的照片和小传。借此,金剑啸在该画刊上刊登了斯大林照片和木刻“攻打冬宫”、“列宁在讲演”等画幅,宣传俄国革命。金剑啸的这些活动引起了报社日本人对他的不满和怀疑。1935年4月,金剑啸他被《大北新报画刊》辞退。

这期间,1934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被破坏,叛徒带领日伪宪兵、特务到处捕人。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为保护爱国文学家、艺术家,萧军、萧红和舒群等先后离开哈尔滨去青岛、上海开展工作。不久,罗烽又被敌人逮捕入狱。哈尔滨的爱国作家群被迫分散。

1935年4月,在哈尔滨成立了进步文艺社团口琴社。这个口琴社是德国人开办的孔氏洋行为推销德国口琴而聘请袁亚成(共青团员)创办的。口琴社得到姜椿芳和金剑啸的支持和帮助。该社还设有业余口琴学校。同年8月,以该校学员为基础成立了口琴队,中共党员侯小古为队长,任震英(中共党员)、金人等30余爱国青年参加。同年秋,口琴社在哈尔滨伪广播电台向哈尔滨和东北地区演播口琴曲。1935年冬至1936年8月,在哈尔滨先后举行两次大型口琴音乐演奏会。期间还举办若干小型音乐会。演出的曲目有名曲《伏尔加船夫曲》、《美国巡逻兵》和斯特劳斯《园舞曲》、舒伯特《小夜曲》,还有中国协奏曲《沈阳月》、《汉宫秋月》、《凯旋进行曲》、《乘风破浪》和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影响较大。这些活动引起日本宪兵队的注意,扬言欲逮捕口琴社的队员。口琴社被迫于1936年冬解散。

1935年4月,金剑啸由白朗推荐,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与中共党员、《黑龙江民报》社长兼总编辑王甄海商妥,创办该报文艺副刊《芜田》,意即开发北满这块荒芜的土地,播撒抗日的火种,联系并帮助当地爱国青年作者成长。同时,他还支持该地第一师范学校进步学生成立“漪澜读书会”,出版《漪澜旬刊》,发表学生们的作品,以吸引更多的青年读书。一时间,高尔基、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在青年学生中流传开来。同时,金剑啸还借《黑龙江民报》举行庆祝发行该报2000号之机,在齐齐哈尔创办“白光剧社”。剧社曾公演金剑啸创作的话剧《黄昏》、《母与子》和美国作家高尔特的《钱》、俄罗斯

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等。不久,金剑啸在《黑龙江民报》又开办了《艺文》周刊。在民报的两个副刊上,金剑啸曾先后以巴莱为笔名发表了剧本《车中》、短篇小说《王二之死》、《瘦骨头》和文艺杂感《布谷鸟又叫了》及长诗《兴安岭的风雪》(节选)。《车中》等作品反映了在日本侵略者民族压迫之下人民的苦难,揭露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残酷和黑暗。《兴安岭的风雪》热情歌颂了英雄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组成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抗日联军与人民群众亲如一家、团结战斗的骨肉情谊;赞扬了东北军民前赴后继夺取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由于金剑啸在齐齐哈尔文艺界的积极活动和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强烈抗日反满倾向,引起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注意,敌人曾传讯民报社长王甄海和白光剧社的人员,侦询金剑啸的活动。为避免事态扩大并保护金剑啸,《黑龙江民报》以“辞退”为名,令金剑啸离开齐齐哈尔返回哈尔滨。

此时,在哈尔滨被捕的罗烽,已于1935年6月被营救出狱,同白朗一起前往上海。姜椿芳、金剑啸、金人等尚在哈埠坚持工作。金剑啸不顾日伪黑暗统治日益严酷和险恶,继续寻找时机开展对敌斗争。当他得知《大北新报画刊》因经营不善而停刊,该画刊正在找人复刊时,经与姜椿芳商量,决定仍以原有经营者孙惠菊的名义申请复刊。为防敌人迫害,金剑啸用承租名义将该画刊的主编权租过来,经费由哈尔滨口琴社社员集资认股解决,组稿、编辑、出版得到姜椿芳、金人、侯小古和任震英等的大力协助。于是,《大北新报画刊》又于1936年4月20日正式出版。金剑啸利用这一刊物不受敌人审查的有利条件,以诗、文、照片、漫画等文艺作品,曲折隐晦地向读者揭露、讽刺日伪统治者的黑暗,呼唤人民群众起来与之进行斗争。画刊曾报道了长征中的萧克、贺龙指挥工农红军进军云南大理,蒋介石军队在山西

“围剿”东渡黄河的抗日红军失利,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进攻兴京县城等消息,激发了群众的反日情绪。同时,画刊还介绍了鲁迅、郭沫若的文章和他们的文学活动,报道苏联高尔基病危消息和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公演高尔基《夜店》时全体演员的剧照。此外,金剑啸还将自己的杂文《挂羊头卖狗肉与说漂亮话》、短诗《哑巴》、独幕剧《咖啡馆》等作品发表在该画刊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这些作品也引起日本领事馆的警觉,金剑啸、姜椿芳和画刊编辑部人员因此被捕入狱,《大北新报画刊》随之停办。

在沈阳、大连、抚顺和长春等地也先后出现了一些爱国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冷雾社、飘零社、LS(鲁迅)文学研究社以及文学刊物《文选》等。飘零社是1933年由抚顺文学爱好者王秋萤、陈因等创办的。该社借《抚顺民报》出刊《飘零》副刊,发表进步和爱国的文学作品。后来,王秋萤进入《沈阳民声晚报》工作,创作了《雪地的嫩芽》等短篇小说,表达了作者对抗日爱国志士的崇敬。1937年后,王秋萤相继在长春伪《大同报》和沈阳《盛京时报》任编辑,在此期间与陈因共同组织“文选刊行会”,创办大型文艺刊物《文选》,陆续发表了揭露日伪黑暗统治,反映人民痛苦挣扎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作品。LS(鲁迅)文学研究社是盖州小学教师花喜露(田贲)等6名爱国青年于1934年在辽南盖平秘密创办。其宗旨是,以鲁迅为榜样,以笔为刀枪与敌人战斗。他们出版文艺刊物《行行》(后改名《星火》),发表反日文艺作品。《星火》虽屡遭查禁,有的成员惨遭杀害,但花喜露等仍然坚持对敌斗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王秋萤、花喜露和李季风组织读书会继续从事抗日反满文学活动,但在日本法西斯残暴统治下,他们相继落入敌人的魔爪,被投入黑牢。

转移至上海等地的罗烽、白朗、萧军、萧红、舒群等人,仍活跃在抗日的文坛上,写出大量反映东北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萧军利用

舒群向他提供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素材(磐石中心县委委员傅世昌来哈尔滨汇报工作时向舒群讲述过南满人民革命军的斗争事迹,并相约写出发表)写出了著名的反映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活动的《八月的乡村》一书。这部著作“使人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画图,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又是怎样活动的”,展现了“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①。萧红写出了反映东北农民走上抗日道路过程的小说《生死场》。书中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烧杀奸污的罪行,明确写出“人民革命军在磐石”,“要组织起来革命军”。《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著作都由鲁迅先生作序,作为《奴隶》丛书广泛发行,社会反响很大。《八月的乡村》一书曾传到南满,抗联一军指战员读后受到很大鼓舞。

九一八事变后,延边的进步作家多数在中学任教员。他们通过课外文艺讲座等形式传播抗日爱国思想。1933年11月,由龙井光明中学教员发起,姜敬爱、金国镇、崔文镇等作家参加,成立了“北乡会”,并出版文艺刊物《北乡》。该刊发表的《春节》、《集市》等作品,揭露了在日伪统治下延边中朝人民的苦难生活;还翻译、登载了鲁迅的小说《故乡》等,受到读者欢迎。该刊于1936年被日伪强令停刊。

东北爱国文艺战线,是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它在敌人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团结了一批爱国的文艺青年。他们的反日活动和作品,冲破日伪的严酷统治,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武装斗争。

^① 1936年9月25日《时事新报》。

第六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 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第一节 《八一宣言》的发表，日伪对 东北抗日运动的残酷镇压

一、华北事变，《八一宣言》的发表

1935年3月23日，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与日本、伪满签订了售受中东铁路及其一切附属财产的协议。此后，苏日之间因售路谈判矛盾而互相在中苏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向对方施加压力而造成的紧张局势暂时得到缓解。日本帝国主义排除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建立起对东北的全面殖民统治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步伐，不断地提出“分离华北”、“华北特殊化”等侵略扩张要求，在华北地区制造各种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妄图在华北建立一个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政权。

同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在策划刺杀了汉奸报刊《国权报》和《振报》两报社长，制造了所谓“河北事件”之后，日本驻屯军的坦克、装甲车在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所属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骑兵第四旅团和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十六师团各一部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长城一线，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主持北平军分

会的何应钦提出了包括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禁止全国的抗日活动等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无理要求。7月6日,经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日军所提各项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均承诺之”。此即被称为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又在察哈尔以日军方人员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的“无礼盘查”为借口,制造了“张北事件”。6月27日,迫使察哈尔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军代表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达成了“秦土协定”。国民政府承诺从察哈尔省撤走中国驻军和国民党党部,解散抗日机关和抗日团体,并“招聘”日本人为军事、政治“顾问”。

国民政府的软弱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0月,日本收买汉奸举行暴动,占据香河县城,鼓动“防共自治运动”。11月25日,日本扶植的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称冀东22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管辖,实行“自治”,从而制造了“华北事变”。翌日,国民政府即行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10月5日,日军派15架飞机到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制造战争恐怖,向何应钦施加压力。12月7日,国民政府又决定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其委员由日本军方推荐的人员中产生。以此作为日方要求“华北自治”的妥协办法。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危险程度。

在此期间,日本加紧对华北进行经济扩张。华北的铁、煤、盐等军需资源和交通运输、电力设备以及纺织、面粉等企业,多为日本资本所控制。日本还通过大规模武装走私,使日货充斥华北市场。它不仅严重地威胁着已经处于衰退状态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影响了国民党政府的税收,同时也损害了英国、美国等在华的经济利益。

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地区的侵略扩张,使中国和日本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而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同时,把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转到次要地位。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局势下,不仅东北沦陷区的军民正在与日本侵略者艰苦奋战,而且关内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坚决要求抗日,甚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农村的富农、中小地主的政治态度也发生变化,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表示不满,抗日的要求日渐增长。

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为挽救民族危亡,联合国内各阶层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适时地提出了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同当时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也有直接的关系。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关于组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由即将出席会议的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组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精神,针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新形势,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于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在法国出版的《救国报》正式发表。因发表时签署的时间是8月1日,因此这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被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分析了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对日妥协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局势,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宣言提出:“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和下层在内的广大群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呼吁全国

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宣言提出了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并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工农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愿意充当这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发起人和首先加入者。《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指出,中日民族矛盾在全国已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向全国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表明中国共产党继在东北地区纠正关门主义、开始改变政策之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政治策略的转变。

1935年10月,这一宣言经中共吉东特委传递到东北党的组织和抗日部队,进一步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和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战胜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宣布了蒋介石妄图使用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企图再次破产,宣布了主张抗日的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终于到达接近抗日前线的目的,使全国人民对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产生了希望。

在华北事变和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局势下,当华北人民得知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内容和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后,莫不欢心鼓舞。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时刻,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北平数千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喊出了为国民党当局一向所禁止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随后,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这一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得到了全

国各大中城市民众的响应,并迅速扩展为有各阶层民众广泛参加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发表宣言和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从此,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1935年11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共产国际七大战略策略的转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明确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后,中共中央于11月28日发表了与《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相继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与《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认为,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工农红军的中心任务应是打通抗日路线,同时巩固现有苏区。会议通过了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之后,为实现上述党的总任务和贯彻党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名义实行东征,向华北发展,同日军作战。

由于敌人的阻隔,在东北沦陷区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部队虽未及时得到中共中央关于组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但是,《八一宣言》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对东北抗

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都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使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日本关东军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出笼,对东北抗日运动的残酷镇压

1934年至1936年春,东北抗日战场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大部队已经基本瓦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力量还不够强大,日本侵略者以为不足为患;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为准备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侵入华北扩大战争,需要集中军力,将关东军主力师团、旅团集结于战略要地待命。因此,在东北,日本侵略者将过去实施的以日军主力师团、旅团分散配置“讨伐”抗日武装的方针,改变为以日军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警部队为主“讨伐”各地抗日武装的方针。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实施,东北抗日联军业已在各地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游击战争日益增强和扩大,加之伪满军警部队战斗力低下。日伪统治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1935年12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在关于1935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中哀叹:虽历经数年之“讨伐”,东北抗日武装由30万已减少至3万左右,“然大小匪团散在广大地区,巧妙的避开警戒网……阻碍王道乐土之建设。特别是共产思想之影响,日益扩大和日益加深,实乃治安维持上极为忧虑的事情。”^①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极为良好,得到群众的热情支持与援助。该文认为:“民众对匪贼之认识极为良好,并不是我们所

^①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811页。

认为的那样有不共戴天之仇,更甚一点说,三千万民众之中,在精神上与匪贼无大差别者尚为数不少,大多数的民众尚没有与匪贼完全分开,如果从精神影响来说,假定匪军有三万,其精神上的匪军之友军,尚不知有几倍或几十倍。这些匪贼的精神上的友军,虽不敢持枪反抗我们,却是培育匪贼之母体,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就在这里。”^①为了消灭东北的抗日武装,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经过长期的研究和策划,制订出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妄图在三年内实现彻底肃清在东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的目的。

日本关东军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规定,第一年(1936年4月至1937年3月)“肃正”重点地区为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四省和安东、奉天两省部分地区。拟以铁路沿线和县城为中心,对其周围一日行程内之地区,实行彻底“肃正”。第二年(1937年4月至1938年3月)要对第一年的重点地区距铁路沿线和县城二三日行程内之地区进行“肃正”,并为全“满”开展“肃正”工作做好准备。第三年(1938年4月至1939年3月)则对特殊地区予以彻底的“肃正”,大致确保全“满”治安的实现。为此,还确立了军队、伪政府和“协和会”协同一致的体制,而军队则在日本关东军(包括主力师团、旅团和独立守备队)的统一督统下,以伪满军警部队为主力进行“讨伐”,必要时日本关东军实行出击。

这一“治安肃正计划”的特点,在于改变了过去单纯偏重武力“讨伐”的原则,采取整体推行武力“讨伐”的“治标工作”与“治本工作”、“思想工作”并行的三位一体的反动方针。所谓“治标工作”,就是使

^①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811页。

用日伪军对抗日部队进行更疯狂的军事“讨伐”。采取“狗蝇子战术”,对凡被发现的抗日部队实行跟踪追击,直至摧毁抗日部队的所有栖居场所,务期一举歼灭;对尚存在的抗日武装部队,采用“篦虱战术”,以密集兵力搜捕、“讨伐”抗联部队。所谓“治本工作”,就是在沿山地带广为设置“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组织“自卫团”防守“集团部落”;修筑“警备道路”交通网和扩充警备通讯网,提高“讨伐”的机动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严厉实行经济封锁,切断抗日部队的物资供应,从而达到彻底断绝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断绝抗日部队基本生存条件的极其恶毒的目的。所谓“思想工作”,就是强化警察、特务组织,加强反动宣传,妄图“从根本上排除赤化思想”,镇压、清除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抗日反满团体;对被俘、被捕的抗日人员和投降人员进行“安抚”,力求改变其政治态度并尽量录入“特殊工作队”或“讨伐队”,充当策反或“讨伐”抗日部队的鹰犬。

日本关东军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制定后,日伪当局即在各抗日游击区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始大肆烧杀,“归屯并户”,变本加厉地修建“集团部落”和制造“无人区”。自1933年至1937年,在伪满州国境内修建的“集团部落”逐年急剧增加。1935年以前建成1529个,1936年建成4195个,1937年建成4922个,合计建成10646个。其中,在东北抗日联军活跃的重点地区,如伪吉林省修建的“集团部落”,在上述期间分别为760个、892个、663个,合计2315个;伪滨江省在此期间分别建成246个、971个、2167个,合计建成3384个。此外各省区,至1937年止,伪龙江省建成1110个,伪三江省建成175个,伪牡丹江省建成404个,伪间岛省建成138个,伪通化省建成103个,伪安东省建成227个,伪奉天省建成614个,伪兴安西省建成797

个,伪兴安南省建成 1245 个,等等^①。

日伪当局修筑“集团部落”,大多选择在靠近铁路、“警备道路”附近敌人便于统治的地方,然后用武力烧杀等残暴手段,强行驱逐周围的农村居民,抛弃原有的家园、耕地,集中居住于指定的这种“集团部落”。凡拒绝搬迁的农民,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房屋被焚毁,人员被杀害,物品被抢走,鸡犬不留。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2 月,日伪当局“讨伐”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军,强令汤原县二区太平川村周围 7.5 至 8.5 公里内的庆余屯、姜家屯等 12 个村屯的 279 户农民迁至太平川“集团部落”。在此次强行并屯中,太平川村原有 500 户农户中的 370 户被迫逃往它处,太平川村的 1608 栋、4490 间农屋被毁^②。在此次野蛮并屯中,驻太平川日军守备队出动两次,沿村屯抓捕、杀害不愿离开旧有家园的无辜农民。第一次捕杀农民 50 余人,第二次又抓捕农民 108 人,押至县城日军守备队驻地,使用酷刑折磨,其中 62 人被迫害致死,尸体被塞进汤旺河冰窟中和水井中^③。在桦川县南部,这里曾发生过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在敌人“归屯并户”中被烧毁村庄 120 余处,毁掉民房 24000 余间,被杀害和因冻饿而死者达 13000 余人,损失牲畜 4800 余头,有 2100 余垧土地被荒废^④。

1936 年春,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部队自珠河抗日游击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73 页。原载满铁总裁室弘报课:《满洲特殊自治制度》弘报资料第 55 号(1938 年 10 月)。合计数字,为引用者核对后的数字。

②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199 页。

③ 中国人民政协黑龙江、辽宁、吉林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不能忘记的历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0—192 页。

④ 中国人民政协黑龙江、辽宁、吉林省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不能忘记的历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8 页。

根据地和哈东游击区向方正、依兰和松花江北的汤原陆续转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之后,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战斗在老游击区。此时,敌人成立哈东五县“联合治安肃正办事处”,强行“归屯并户”,修建“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仅在该办事处所在地帽儿山周围的蜜蜂园子、张家店等地,便建立了10余个“集团部落”。为此,该办事处曾动用大量伪警察和伪自卫团,采用极其残暴的刀砍、枪刺、火烧等手段,将周围50公里范围内包括抗日根据地的东蜜蜂园子、西蜜蜂园子、板子房、双马架、三股流等54个村庄尽皆烧毁变成无人的废墟。原有3219户、12585人失去家园,其中1000余户被迫迁入“集团部落”,其他2000余户四处逃亡,流离失所。这次浩劫,共计有房屋4101间被毁,荒废耕地12948垧。而被迫迁入“集团部落”的农民,住的是临时搭起的马架子和地窖子等简陋居所,缺衣少食,饥寒交迫,传染病时常蔓延,非正常死亡的人到处可见。1936年通化县“集团部落”传染病患者达1132人,死亡153人;金川县传染病患者1508人,死亡137人;柳河县传染病患者为4385人,死亡305人。整个东北,因“归屯并户”而受害的农民约有500万人。

这一时期,日伪当局在“集团部落”内,除加强伪警察派出所和村公所对农民群众实行监控外,还普遍加强了对“集团部落”的警备。在一般村屯推行保甲法,编组伪自卫团。在抗日游击区则派“治安队”或日伪军驻守。1936年春,日伪当局在东北抗联第二、第五军活跃的宁安县第二区中的6个“集团部落”里,嘎斯沟村驻一连“治安队”,大唐头沟村等5个村各驻守一个连伪军。第三区的7个“集团部落”里,小朱家屯等两个村各驻一个排或一个连“治安队”,金坑、光棍屯等5个村,均各驻守一小队的日军^①。敌人采取大量修建“集团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89页。

部落”和制造“无人区”等一系列极其毒辣的措施,即所谓“匪民分离”的反动目的,就是妄图彻底隔绝抗日武装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断绝人民群众对抗日部队的物资支援和人员补充,使抗日部队陷于孤立、饥寒交迫的境地,从而在根本上丧失作战和生存能力。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为增强日伪军警镇压抗日军民的机动和快速作战能力,还强迫群众修筑“警备道路”网和“警备电话”网。据统计,1936年至1937年因日伪军警展开“大讨伐”的急需,共架设电话(包括“警备电话”)线路达10455公里,加上1932年至1935年4年内架设电话线,总计33764公里^①。1936年至1937年共修筑“警备道路”达92689公里,加上前4年的52689公里,共计145378公里^②。

1936年7月,根据日本关东军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为准备于同年秋冬进行军事“大讨伐”,日伪当局将全东北沿哈尔滨至大连的铁路以东,所有抗日游击区划分为5个“防卫区”。其中,“东北防卫区”,包括依兰、桦川、勃利、佳木斯、富锦、宝清各县市;“东防卫区”,为饶河、虎林、密山、穆稜、牡丹江、宁安、东宁、汪清、珲春等县市;“中防卫区”,包括方正、苇河、延寿、珠河、宾县、五常、双城各县;“东南防卫区”:舒兰、额穆、敦化等县和延吉、和龙、安图、永吉、桦甸各县之一部;“南防卫区”:本溪、兴京、桓仁、宽甸、凤城、安东各县和辽阳、抚松各一部。由日本关东军第九师团和日军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独立守备队统一指挥,同时调动大量伪满军警部队并以后者为主,对上述5个“防卫区”分别进行“治标”、“治本”工作。先以“治本”为主,秋冬季到来后,则为达到“治标”目的集中兵力进行军事“大讨伐”。

^① 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1942年9月出版:《满洲国警察史》,转自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等1989年10月编译本,第219-220页。

^② 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1942年9月出版:《满洲国警察史》,转自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等1989年10月编译本,第236页。

在敌人对抗日部队进行“讨伐”过程中,还以“通匪”、“援匪”、“知匪不报”等罪名,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肆意杀害,制造了无数的流血惨案。同年7月26日,驻金川县大荒崴(现通化县)日本守备队一小队率领伪警察一部50余名,到白家堡子及横山头一带搜索抗日部队,途中遭受业已埋伏守候的抗日联军部队的突然袭击,当场有11名日军被击毙。日本守备队中队长、大尉中山得到报告,立即迁怒于当地民众“通匪不报”,将白家堡子列为“通匪区”。第二天便率全中队日军和伪警察包围白家堡子,强迫该村屯的368名男女老少村民齐集东南山麓,日军伪警先用刺刀挑,后用机枪扫射,予以集体屠杀。翌日,又勒令残留村民就地挖掘9个大坑,将尸体掩埋,并将全村房屋焚毁为一片废墟。1936年2月5日,原岫岩抗日义勇军第五十六路刘景文余部曹国仁部,正在岫岩县城西北家乡地区四道河从事抗日游击活动,被驻王家堡子的日本守备队侦知。该守备队长、大尉新泽下令伪警察派出所,转达四道河村公所及周边各村屯屯长、牌长:派人侦察曹国仁部的行止。第二天,日军守备队才得到村公所有关曹部抗日武装撤向别处的报告。新泽即认为这是该村村长马玉珍及所属各村屯长、牌长“通匪不举”,迅即亲自带日军和伪自卫团出动,抓捕各村屯长、牌长50余人,施用酷刑逼供。最后分三批共处死53人,并将四道河附近村屯的130余户农民的房子放火烧毁,造成“无人区”。

日本侵略者在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同时,为制造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还惨无人道的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早在1932年、1933年,日本侵略者即在黑龙江省肇东县满沟和五常县背荫河设立基地,进行用于扩大侵略战争为目的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该基地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发现,遭到袭击后,1935年至1936年,又在东北设立两个细菌部队和大型基地。一为建立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车站附近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1941年改称

的臭名昭著的“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一为建在长春附近孟家屯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来改称“满洲第一〇〇部队”。日本细菌战争罪犯、中将石井四郎是其主要主持者。他们灭绝人性地用大量的活人进行“活体”实验。这些被用来实验的人，多半是中国的战俘和抗日爱国青年、无辜的工人、农民，还有少量苏联战俘。后来，这支细菌部队去关内散播细菌，酿成传染病广为流行，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和秘密抗日团体的镇压和破坏，根据关东军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强化所谓“警务统制”，于1936年春将先前设置的“警务联络委员会”改为“警务统制委员会”。“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长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东条英机担任，各地设置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的委员长，也均由当地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充任。各地警务统制委员会下均设若干“特别搜查班”，广置密探、特务网，以专门破坏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团体。1936年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先后侦知，两地的学校师生、新闻界和文艺界有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反满团体在活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首先从哈尔滨嫌疑者的调查中得到线索，后经逮捕嫌疑者并审讯后得知，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满洲里、博克图、扎兰屯、昂昂溪、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等城镇中，有共产党和抗日团体的秘密活动。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经充分准备后，6月10日，东条英机下令，限在6月13日午后3时，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等地，组织日本宪兵、特务、伪警察同时出动实行疯狂地大逮捕，当天各地共逮捕149人。此后，又陆续逮捕百余人。此次被捕者中，有前共产党员、黑龙江《民报》社社长王甄海（王复生）和共产党员、东北著名文艺、新闻界抗日斗士、哈尔滨《大北新报》画报社编辑金剑啸，还有省立日语专修学校教师麻秉均、省立师范学校教师王柱

华、《民报》社编辑阎达生、伪龙江省教育厅长王宾章等。其中,爱国人士王宾章在敌人审讯时,因反抗而遭日本宪兵当场枪杀。其余人员经过长达数月的酷刑折磨,于同年8月15日、10月13日先后分别在齐齐哈尔、哈尔滨两地宣判,王甄海、金剑啸等20人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其他人则被判处刑期不同的徒刑。“六一三”事件,仅仅是大规模镇压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团体的其中一幕。

1936年11月27日,经伪新京日本宪兵队侦察得知,磐石、伊通县有中共南满省委所属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人员进行抗日活动。敌人随即在两地出动近300名日伪警宪,于拐子坑、大安屯等地逮捕81人。经刑讯后,分别将其中的48人在磐石、长春两地处死。但是,日伪当局的搜捕行动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地扩大规模。1937年1月下旬,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书记陈文彬在伊通被捕叛变,致使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所属党员和抗日群众先后被捕304人,使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及所属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同年2月,又在伊通的伪军驻伊通山炮连和驻大孤山山炮连中逮捕8名地下共产党员,中共党的组织被破坏。与此同时,柳河县山城镇日本宪兵分队经“长岛玉次郎特别工作班”几个月的侦察,在三源浦、五道沟、孤山子等地共逮捕中共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后叛变)等县委成员和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第五团所属的柳河游击队等约120人,其中多数被杀害。中共柳河县委及所属组织均遭破坏。

不久又发生了“四一五”事件。1937年3月,中共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向哈尔滨宪兵队自首叛变,供出中共哈尔滨特委、中共哈东特委及国际交通局满洲里交通站等组织机密。日本宪兵队决定于4月15日在各地实施大逮捕。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被捕后叛变,向敌人做了详细供述,使中共哈尔滨特委、中共奉天市委、中共大连市委及中共海伦县委和各特别支部、中共哈东特委、国际交通局及所

属满洲里、博克图、密山等所有交通站全部被破坏。据 1938 年 2 月 12 日《满洲日日新闻》报道,此事件中被逮捕 482 人,其中 85 人被处死,67 人被判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在“四一五”大逮捕中还接连制造了“法政大学”事件和“哈尔滨口琴社”事件。在日伪宪警破坏中共哈尔滨特委时,从被捕者中得悉原哈尔滨政法大学毕业、时任《大北新报》记者于维范等 3 人是共产党员,即予以逮捕。在搜查两人的住房时,敌人获得一份哈尔滨政法大学的同学录和结拜“金兰谱”,便认为是共产党的名单,并迅即又逮捕了 12 名政法大学毕业生,其中多数是无辜者。后来 7 人被处死。“哈尔滨口琴社”是个进步的群众文艺团体。过去,金剑啸等共产党员曾参加口琴社的活动,遂将该口琴社 10 余名无辜人员当成共产党案件一并逮捕,并将其中一名队长处死。

“四一五”事件是东北地区党组织遭受的最大的一次破坏。从此,东北大城市和城镇中的共产党组织损失殆尽,无法恢复活动。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党组织和抗日部队因失去城市党组织和抗日爱国团体的支援,而无从获知有关敌情。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对东北的新指示, 中共东北党组织的改组

一、《王康指示信》在东北的传达贯彻

1934 年以后,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日伪对东北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全面推行,日伪军对抗日武装的残酷“讨伐”日趋加紧。在这种形势下,迫切需要东北党组织统一思想,加

强组织和政治建设和对各地党组织的强有力的领导,从而使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扩大与发展。恰在这时,这些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自1934年5月中旬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部队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1934年《二月指示信》。这一指示信重申了《一·二六指示信》的基本精神,指出其“一般的总的方针,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但同时也存在片面强调下层统一战线,批评当时东北各地抗日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是“上层勾结”等脱离东北实际的错误主张。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4年7月看到《二月指示信》后,认为它与代表团正在起草的对满洲工作的指示精神不一致,于是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于1934年9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该信认为,中共中央与中共代表团之间过去对满洲工作在“许多主要策略问题”上,“时常有不一致的意见”。为此,为准备共产国际七大深入研究包括“满洲问题”在内的中国革命问题的需要,代表团正在根据现在得到的来自满洲各地的文件和报告,进一步研究满洲问题,并正在准备给满洲起草有关不同于不久前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内容的指示文件,希望中央在得到这些新的文件之前,不要再给满洲省委写有关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同时,信中通知:满洲省委组织已到了急需解决的地步,代表团正在“讨论并准备改变(省委)组织的结构”,并“设法帮助建立能独立工作的地方党部”^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团已派遣杨松(吴平)和杨春山(程道南、石大纲)重赴海参崴建立联络站,以保持与国内上海中央局和东北党组织的联络。同时,代表团还派吴平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名义直

^① 《王明、康生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第4号)》(1934年9月16日),中央档案馆复印件,存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接去吉东地区工作。其任务是：负责在政治上纠正吉东局领导党组织的错误；重建吉东特委，改造各地党的领导机关；正式建立海参崴联络站与吉东特委间的交通联络。

由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推迟，对整个策略方针的改变尚未最后确定，因此，代表团起草的对东北的指示信也无法定稿。直到1935年6月初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代表团对东北的新指示才最后定稿，并以《王明、康生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简称《王康指示信》）的方式发至中共吉东特委，1935年9月，由吉东特委抄转到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部队中。

《王康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是：

（一）关于游击运动的新策略，信中指出：目前的状况“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而是准备争取最后胜利条件之时期。”“因此，我们的策略现时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存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

（二）关于游击队问题，信中指出：“要打破各地的关门主义，吸收一切愿意参加武装反日的分子来扩大游击队的组织，特别是我们的队伍，要使其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影响一切反日武装力量的中心队伍。”信中指出，为了扩大游击队伍，除正规武装外，还要建立不脱产的农民武装：“目前在东北的游击队主要的应该是有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现在这类已经脱离生产的经常与日帝及‘满洲国’斗争的队伍（如现在各地游击队的形式），另外要创造不离开生产的，只是在一定条件下行动的游击队”。这种游击队，“是应当在非游击区或游击队退出的地方，由在业的反日民众来组织”，并要求“要实行全民的反日统一战线”，“要普遍的与各种反日武装队伍建立下层与上层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反日武装共同抗日。”指出“你们在各地建立的抗日联

合军总司令部是正确的,如认为是上层勾结或者说只有了巩固的下层基础,才可以结成上层统一战线是错误的”。“上层统一战线不是与下层统一战线对立,而是更顺利于下层群众工作的进行。自然,不利用这些可能去加紧下层群众工作,这也是危险而有害的。”

(三)关于游击战的战术问题,信中指出:要“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反对敌人的‘讨伐’。”“不与敌人强大的兵力作正面的冲突,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的弱点,扰乱他们的侧面和后方”;“提出集中一切游击队形成主力,消灭敌人的办法是异常危险和有害的。”要“在斗争中扩大与保存游击队的实力,不要固守根据地而牺牲实力。”

(四)在政权与根据地问题上,信中指出:“在东北游击区内,有的地方成立了地方的人民政府”,“有的地方,反日会或农民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政权”,“这些地方的政权虽然是初步的形式,但是在东北及全中国民众中起了极大的影响。”指示信要求“党应在各地进行广泛的群众运动,准备召开反日代表大会,成立或改选地方的反日政权机关”。对“政府的所在地,主要是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是死守一域。如果游击队为了战略的或经济的关系,或为活动的便利,尤其是实力的保存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则政府亦应随军而迁移,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的武装实力。”

(五)在群众工作方面,指示信指出:“党必须加强群众中的工作。要把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六大纲领,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在东北一切民众中,作极广大的通俗的解释,号召一切同意这个纲领的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

关于士兵工作,指示信强调:“士兵工作在目前战争环境中,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重要地位”,“你们应该集中最好的力量”“到满洲国‘讨伐队’里去”,“只要有可能会打进去,有时牺牲一部分地方党部和支部的工作,都是值得的。”

(六)在党的工作方面,指示信指出:“为要实现以上的工作,党必须彻底的转变党的工作。”首先要“加强游击区党的领导,在游击区内广大的发展同志,建立支部”。“要使党组织能够强有力的领导游击运动,必须将党的机关的一部分设立在游击区里,改造党组织庞大的结构(尤其是上层领导机关),缩小管理区域,使之能灵活的巧妙地独立工作,适合于战争环境。”

《王康指示信》的基本精神来自于共产国际七大的策略转变的思想,其主导思想与《八一宣言》是相一致的。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部队大体上于1935年秋冬之际,先后接到《王康指示信》。吉东、北满、南满党组织和抗联部队,都先后普遍地贯彻执行了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实践证明,这一指示信,对在东北地区进一步纠正关门主义倾向,扩大反日统一战线,组建抗日联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王康指示信》在某些问题上“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成份”,“有的政策的提法不当或有错误。”^①如在《王康指示信》中,把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工作,不适当地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主要地位’”^②。又如信中“准备将来更大事变的基础”的“更大事变”究竟指的是什么,也是含混不清。因中共代表团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缺乏全面了解,因此,面对敌人正在推行的保甲制度和“集团部落”政策这一重大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提出相应的对策。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后来在东北部分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中造成了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产生了消极作用。

^① 《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委〔1986〕102号。

^② 《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委〔1986〕102号。

二、《吉特补充信》、《中代信》、《新政治路线》信及其影响

《吉东特委给珠河中心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①(简称《吉特补充信》),是经中共代表团授命,由当时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前中共吉东特委书记吴平负责起草,并以吉东特委名义于1935年11月26日经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石大纲发出的。

这封信首先说明:最近“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后,中央提出的新策略,对于东北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做了详细的研究。现向你们提出几点建议,请你们在切实执行王、康指示的同时,将这封信中的新意见当作补充指示,供在工作上的参考。”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一)阐明了建立“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指出在东北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统一战线的政府——东北抗日救国政府;统一战线的军队——东北抗日联军;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反日会等。”(二)阐述建立东北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及其具备广泛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信中指出:“在目前东北的反日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要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地主。”(三)阐明在城市和农村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信中关于“用什么策略对付保甲制度”的问题说:“吉东特委曾在给四、五军的指示信中提出过粉碎保甲制度并原则上解除一切武装队伍等。但按目前反日统一战线观点来看,我们对保甲制度及自卫团的策略必须要转变。我们不能把所有保长、甲长、牌长都看作日本的走狗。有些保甲成立的自卫团是在日本的强迫下成立的,这些自卫团不愿意和我们打仗,对我们取中立的态度,所以我们不能进攻他们,而要联合

^① 此文件尚未找到原件,下面的引文系日文翻译件。

他们。对于同情我们的武装,我们提出‘反日军打日本官宪,不打武装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来劝诱他们。如果他们仍然通日敌,反对我们时,就及时联合另外的中立武装去消灭那个反动武装。但是,对他们的一般原则策略是联合和中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也“不要做焚烧或收回门牌、户口簿等事”,以免民众遭受屠杀或被迫迁移。而是“要利用保甲制度”这一合法形式,“推荐我们指定的人”做保甲长,进行秘密工作。敌人强行“归大屯”时,为避免“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被残害,也“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居大屯,在大屯内成立合法半合法的群众组织,来进行不合法的秘密工作。”(四)信中指出在敌人统治下的东北,要建成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党。

从这封信中关于对付敌伪保甲制度、伪自卫团和“归大屯”所提出的新的策略和政策来看,主要是认为对伪保甲长和自卫团等敌伪势力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坚持反动立场甘心事敌者应予以消灭;对可争取者则应使之为我服务,或使之中立。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原则上是应该肯定的。对于敌人以武力强迫民众“归大屯”,在抗日武装又无力制止的条件下,为避免在共产党影响下的群众被屠杀,允许其可随同其他群众移居大屯。这是为民众不受敌人残害,保护群众利益所必要的。但是应当指出,《吉特补充信》对敌人“集团部落”和“保甲制度”的政策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我党对敌人的“集团部落”和“保甲制度”的政策,从原则上讲应该是根本上反对。具体斗争办法,可根据当时当地敌我斗争的实际形势,灵活决定,如采取武力破坏、发动群众请愿抵制,或打入内部进行合法、不合法的斗争,目的是使敌人割断抗日部队和民众联系的阴谋不能得逞。

《中央驻东北代表致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司令部的信》(简称《中代信》)是吴平在海参崴同吉东特委代理书记李范五以及石大纲共同

起草的。并于1936年3月12日,以“中央驻东北代表”的名义发出。吴平对此曾经说明:“用此名义乃不得已之办法,因为用省委名义吧,他们已知道省委已去[取]消了。用吉东特委名义吧,他们和吉特有政治意见之分歧,而吉特之威信又尚不足,并又受破坏。用春山个人名义吧,他们又不知道。”于是,鉴于这封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提高信的权威性,以引起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领导人的重视,就冒用了“中央驻东北代表”的名义。《中代信》辗转穆稜县委交通站、勃利县委,再转交第三军第四师金策,直到1936年6月,才传到第三军司令部。

《中代信》是吴平等根据自1934年9月至1936年春约一年半的时间内,对于珠河党、团县委和第三军司令部领导军民开展抗日斗争状况的了解,针对存在的问题所写的一个重要指示信。这封信的内容是:(一)对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几年来对敌斗争成就和贡献作了充分的评价,同时对其还未彻底了解党的新政策、不敢更广泛的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尚未转变对敌人“归屯并户”、“保甲制度”的策略等问题提出了批评。(二)信中对军队的活动方向和改编问题提出了建议,要求第三军主力向北和西北发展,在松花江两岸开展游击战争,收编当地山林队、义勇军,以扩大队伍;同时帮助谢文东部队与汤原游击队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为谢文东,副军长为夏云杰。把李华堂部改编为抗联第八军,并要求第三军改变对李延禄第四军的错误认识,帮助整顿第四军部队,处理好两军关系。对三、四、五军的活动区域的划分作出规定,并提出各部在同一地区活动时,江北部队归赵尚志指挥,在道南活动的第三军部队如与五军接头时统由周保中指挥的建议。(三)重申在《吉特补充信》中业已提出的对敌伪“保甲制度”和“归大屯”的政策。认为(1)“敌人的‘集团部落’和保甲制度,是反对我们一个最阴险、最厉害的策略,其目的在企图孤

立我们的队伍,使群众脱离我们。”“对于敌人的归大屯政策,我们不仅不应反对我们影响和领导下的住户搬家,并且应当利用这一个机会,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利用搬家的方法,开辟日本统治区的工作,到大屯去也写户口,上门牌,有可能时,选举我们自己的人当甲长,当牌长,借以利用合法半合法之可能而来进行不合法的反日工作”。(2)“我们对于保甲牌长,不能一律看作走狗,对于表示抗日同情我们的保甲牌长,应该联合和中立之。只有对我们坚决反抗,忠心效力日寇者,才当作走狗看待之。”(3)“不能把各地大牌[排]队看作像日军一样,乃我们之死敌。因为地方大排队乃事变后日寇强迫成立的,其中不仅普通队员非常不满日本的民族压迫,并且领导长官也有不满意者。因此对于我队表示好感者,原则上采取联合与中立的策略,借以孤立日军,打破日寇利用中国人杀中国人的阴谋鬼[诡]计。当然对某些大牌队忠心效力于日寇者,专门和我们作对者,则毫不客气的如日寇一样的看待他。”(四)信中“对于满军的策略”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对于满军也不能像看作日军一样,乃我们之死敌,满军内不仅一部分士兵不满日寇之统治,因此,对于满军,不宜痛骂而引起他们的生气,而要号召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去打日本子’。不要提一般笼统口号:‘杀他们长官,哗变出来’,而只能更策略的提出,‘杀死日本官和汉奸,拉出来共同抗日’。这意思就是说,如有长官一同拉出来,我们不但不能杀他们,而且欢迎。对于和我们表同情的满军,可以订秘密协定,供给我们给养,偷着卖子弹,送消息等等。借以更灵活的集中力量消灭日军、孤立日军。对于忠(心)效力于日寇者,当然毫不客气的与日军同样看待之。”(五)《中代信》就组织问题指示:“根据军事活动之变更、地理经济上状况及交通之便利,对珠河党组织有下列之变更:a. 以目前依兰、汤原、桦川、方正等四县工作为基础,建立起松江省委,另划通河、木兰、巴彦、凤山、萝北等五

县由松江省委管理,并负责开辟这几县的工作。在依兰与桦川的工作尚受吉东特委管理,将来交给松江省委。目前马上应成立临(时)省委,提议书记由张寿箴或现依兰(应是勃利——作者)县委书记李成林担任之,或由你们挑选之。在江北活动之各队伍,无论过去属那(个)党组织管,到上面这个地区内,就受松江省委之领导。b. 以珠河、延寿、宾县、五常、苇河五县工作为基础,另划阿城、双城、榆树、舒兰等四县而成立中共哈东特委,建议以老冯^①为特委书记,道北及道南队伍内党工作受哈东特委领导之,而军事计划要受三军司令部领导之。”

《中代信》认为珠河党团县委和第三军在执行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尤其在对待友军、同盟者,仍存在关门主义倾向;对待敌伪保甲制度,“集团部落”,以及伪保甲长、伪自卫团武装和伪军等敌伪势力不加区别,一律视为死敌并采取消灭的政策;所以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要区别对待的政策,其策略的基本精神应当给予肯定。第三军司令部对此也并未表示不同的意见,而且在第三、第六军的工作中已开始贯彻执行了。但是,尽管这封信阐述的关于贯彻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所规定的对友军、同盟者,对伪军、伪保甲制度、归大屯、伪保甲长、伪自卫团、大排队以及关于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体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自1935年6月以来,关于推动东北反日统一战线方面的若干政策思想的变化。不过,从它一再强调“对于伪保甲牌长不能一律看作走狗”,不能将各地伪自卫团、大排队以至伪军看作和日军一样乃我们之死敌;对于敌人修建的“集团部落”不再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摧毁、破坏等等,这些确实也反映出当时中共代表团在制定政策上的片面性,只求团结,不敢斗争,

^① 即冯仲云。

以至于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一些混乱。

1936年上半年,因敌人疯狂“讨伐”珠河老游击区和根据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司令部被迫分隔在珠河南部和汤原两地,同时又处在坚持老根据地斗争和开辟新游击区的万分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对先后接到的《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虽然对信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但在工作中还是贯彻执行了。同年下半年,松花江下游两岸的游击区有所扩大,汤原游击根据地也具有一定的规模,第三军主力部队西征结束后返回汤原根据地,珠河党团县委前来汤原同第三军司令部重新会合,这些情况为县委和第三军主要领导人之间交换意见、共同研究重大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时敌人在三江地区大力推行“集团部落”,对三江省的大“讨伐”也即将开始,局势依然是极为严峻的。//在这种情况下,为解决如何加强北满抗日部队的统一领导,如何开展游击运动的新局面,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三军司令部便不能不根据在斗争中遇到的新情况,重新研究由吉东方面转来的几个文件中所提出的新政策。//根据第三军在新老游击区对敌斗争的经验,除联合一些义勇军、山林队共同对敌战斗外,在敌我力量对比较为悬殊的情况下,很少发现伪军和伪自卫团、大排队对我友好或采取中立的情况;相反,这时三江地区的日伪统治已经极其严密和残酷,伪军多数在日军长官的监督和指挥下配合日军或单独对我军作战;伪保甲长是日本人选定的,也很少对我表示同情或主动协助我军工作;在敌人“集团部落”大量建成后,我军更无法派出许多人员去进行合法的与秘密的工作。而且,1936年上半年珠河和汤原党的组织因执行《吉特补充信》,一度放松了对群众反“归大屯”斗争的领导,结果使敌人在珠河与汤原地区的“集家并屯”得逞,群众对抗日军队不满,甚至产生了失败情绪。与此相反,第三军在开辟巴、木、东新游击区斗争中,对于敌人尚未完成的“集团部落”采取摧毁政策,对伪自卫

团和伪军坚决采取进攻和缴械的手段,结果获得了群众拥护,许多山林队纷纷向第三军靠拢,接受收编。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对比斗争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使第三军和珠河中心县委主要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对贯彻中共代表团在几封信中的有关新政策指示,重新产生许多的疑虑。认为《王康指示信》及补充指示信与东北战场特别是北满的实际脱节,是主观愿望,是一种右倾的策略。

《中代信》关于在松花江下游设置新松江省委组织、在哈东老游击区建立哈东特委的要求,也增加了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珠河中心县委领导人的不满和疑虑。《中代信》关于新建的松江省委管辖的游击区域范围,仅限于松花江下游两岸地区,未包括第三、第六军正在开辟的黑嫩平原广大地区,对此,北满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认为不利于北满抗联部队扩大游击战争和游击区的需求。此外,这时又接到吉东方面与中共满洲省委留守人员相互指责对方有“奸细”的信息,海参崴联络站与新建的中共哈尔滨特委又各自称“中央”代表,并各自向地方党组织和部队发指示信等等。一时弄得真相不明,真伪难辨,使人无所适从。

当时的情况是:1936年夏由第三军第四师转来了中央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既非正式组织关系,又无暗号^①,这样就不能不使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珠河中心县委领导人疑窦丛生,并使问题复杂化。结果弄到人们“对吉东、哈特双方不承认,对中代信不承认”^②的地步。可以认为,自1935年冬,由于中共代表团假吉东特委直接插手对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事务的干预和指导,又由于王明等未经正常组织程序,撤销中共满洲省委,用中共吉

① 过去在秘密工作中组织之间接触时,往往均设定暗语、暗记借以识别。

②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关于组织问题中各种事件给中央的报告》(1937年8月2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第232页。

东特委的横向关系去指导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第三军的方式,造成了组织上的混乱,引起了北满党组织对吉东党组织的怀疑、不满以至纠纷,使党的组织关系出现了不正常状态。

1936年10月2日,中共代表团又向东北发出《新政治路线》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因为第一,免得将东北与关内对立。第二,在‘满洲国’内还是中国人,其中有很多部分职员、长官、士兵等也不满日寇之殖民地压迫,而同情抗日或采取中立的态度。我们提出抗日统一战线不提‘反满’,目的是使日寇孤立,使‘满军内某一部分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或使其中立’。”^①

《新政治路线》信提出的“不能把抗日与‘反满’并提”的主张,是一种将已经开展抗日战争的东北沦陷区与尚未直接对日作战的关内地区混同、将伪满傀儡政权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混同的错误主张。伪满洲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是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反动工具,伪满政权和该政权中效忠日本的汉奸走狗同日本帝国主义都是中华民族的死敌,抗日反满是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神圣任务。至于共产党的区别对待伪满洲国内的伪军、伪保甲和伪满机关中具有不同政治表现的官兵、保甲长职员的政策,绝不能用“抗日反满不并提”这一错误、混乱的主张予以概括。

王明等人的这一“新政治路线”,给东北党组织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加深了北满与吉东党的组织之间因对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的评价不一而产生的原有意见分歧。

《吉特补充信》、《中代信》和《新政治路线》信中一些内容模糊和错误的政策、策略以及对军队、党组织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直

^① 《第五军党委通告》(1936年11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第374页。

接导致了吉东和北满党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乃至北满党组织内部的“反倾向”斗争。

三、中共满洲省委的撤销与哈尔滨特委的建立

1931.9-33.2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领导东北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积极领导和支援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创建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于受当时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和王明冒险主义策略的影响,把抗日斗争和土地革命混淆在一起,使抗日斗争遭受到一些损失。

1933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东北发出《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抗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在执行《一·二六指示信》之后,党的领导关系有了变化,中共满洲省委受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双重}领导。中共代表团为了便于领导满洲工作,经中共满洲省委同意,于1933年5月成立了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局,使其承担代表团与中共满洲省委之间的联络,并直接领导东部边境的东满特委、绥宁中心县委和饶河中心县委的工作。

1934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二月指示信》之后,在苏区的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间在执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吉东局在工作中直接接受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与中共满洲省委的关系也不密切,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的不满;而中共满洲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吉东局的工作提出了批评。1934年4月,因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宣传部长杨波相继被捕叛变,吉东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吉东局书记逃跑

脱党。刚刚上任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马良^①，未经请示中共代表团，于同年6月作出决定，取消了吉东局。省委并决定，新的特委未建立之前，过去吉东局领导之下的各县委，由省委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的这一决定引起了中共代表团的不满。1934年7月，省委代理书记马良为了向中共代表团报告省委情况和请示工作去了苏联。之后，中共代表团对马良能否执行代表团新的指示存有疑虑，未同意他回东北，而是将他留在海参崴联络站帮助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和吉东局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在苏区的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王明、康生1934年9月16日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要求中央在没有接到代表团新的文件之前，不要再写给满洲省委关于游击运动等策略问题的文件。这封信实际上终止了中共中央对中共满洲省委工作的领导；加之当时上海中央局已被破坏，中共中央领导工农红军长征，因此对东北党的工作领导就完全由中共代表团承担。

代表团为了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于1934年9月派吴平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吉东地区工作。吴到后整顿了吉东各县的党组织，贯彻执行了代表团新的指示精神，恢复了中共代表团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系，并写信给中共满洲省委，传达了代表团关于在东北建立4个特委（珠河、磐石、吉东、东满）、省委机关要注意秘密工作，省委常委只设3人，废除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各干事等指示。

对于在东北各游击区内建立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坚强的党的工

^① 马良(1900—1938)。原名林炯，化名林电岩、王德。浙江临海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后到东北工作，历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1934年夏赴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工作。1938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杀害。

作委员会的问题,无论是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满洲省委之间的意见是一致的。对建立中共吉东特委,中共满洲省委也没有异议。但是,对吴平在吉东所执行的中共代表团的新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认为是违背中央历来的指示精神,并对吴平提出了批评,同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意见。在给中央的信中,中共满洲省委认为,“吴平在吉东地区到处号召各种抗日部队组建抗日联军,是从基本上取消了人民革命军和游击队,是完全取消我们的基本部队去进行上层联合,不要下层统一战线工作。因此,当前的东北已经形成了南满、珠河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仍照以前的方法执行工作,在吉东、东满是吴平所执行的另一套方法。”“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关系路线问题。”^①对于这种不协调的状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海参崴联络站负责人杨春山也向代表团写信,认为“省委不仅还在继续‘左’的错误,而且把这错误在有些地方更加深和扩大了。”^②“华兄(指吴平)讲,省委对他去吉东工作的布置和所推行的路线有许多不正确的批评。”因此他提出“省方问题不能再拖延,必须迅速解决!”^③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需要直接了解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状况,以便讨论满洲工作。于是先通知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谭国甫到莫斯科向代表团汇报工作。中共满洲省委接到通知后,经过研究,决定派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刘焜去莫斯科。刘焜到莫斯科不久,1935年2月代表团又发出紧急通知,令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光华、宣传部长谭国甫和省委主要干部迅速去莫斯科参加讨论满洲工

^① 《云给中央的报告》附件:《尊给堂的信》(1935年3月24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6,第328页。

^② 《程字通信第五号》(1935年3月1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368页。

^③ 《程字通信第四号》(1935年3月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第355页。

作。通知中还令省委将所有文件一律销毁,仅留省委秘书长一人留守。杨光华等接到通知后,经研究认为,省委只留下刚刚担任省委秘书长工作的一个女同志,对工作不利,便决定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小骆一并留守省委,维持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同时考虑到文件如果全部销毁,将来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党组织交代省委过去的工作缺乏依据。因此决定选择部分重要文件交由国际交通局转交中共代表团,其余部分则全部销毁。

杨光华和谭国甫在出发前,按中中共代表团的指示于1935年4月5日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要求各地党、团组织,应遵守中央之指示精神,适合各地状况勇敢、独立地自主地进行工作。由于交通方面出现异常情况,4月底,杨光华一人经满洲里附近过界入苏,5月5日到达莫斯科。杨光华到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七大前夕,中共代表团拟召开的满洲工作会议推迟到国际七大闭幕后的9月份。

原来,中共代表团紧急下令将杨光华等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调到莫斯科,并不是请他们出席讨论满洲工作的会议,而是因为他们得知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李竹声、盛忠亮等中央局书记相继被捕叛变,代表团和中央局之间的电台联系中断,代表团对杨光华等由上海中央局派到满洲省委任职的干部产生严重怀疑;加之杨光华在江苏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受过严重处分,王明、康生便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武断地认为杨光华有“内奸”嫌疑。因此,杨光华到莫斯科后,代表团并未听取他关于满洲工作的汇报,而是组成以康生为首的一个小委员会,对杨光华进行政治审查。杨光华对康生提出的在上海工作时被捕释放问题、“反党”等问题如实说明了情况,并声明这些问题已经由上海中央局审查并作出了结论。审查暂告一段。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而是等待继续审查。

1935年9月,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中共代表团举行了满洲工作第二次会议,主要研究改组党组织和组建抗日联军等问题。会议上,对于按照《八一宣言》精神组建东北抗日联军问题,大家一致赞同,没有异议。但对满洲省委的处理和各游击区党组织组建问题,与会人员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会后,王明、康生决定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南满、东满、吉东和松江等4个省委,由中共代表团通过海参崴联络站直接领导。

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和成立4个省委的具体办法是:(一)由代表团派出干部去哈尔滨,接收前省委留守人员掌握的省委与各地党组织及抗日部队的一切组织关系和交通联络关系,另行建立中共哈尔滨特委。但是这些情况不能告诉前省委人员;省委已结束,但要让他们继续维持着,以免发生混乱并借以迷惑敌人;哈尔滨特委今后可直接与驻海参崴联络站建立联系。(二)在南满建立一个特委,管理奉天和大连市委,并可同海参崴联络站建立联系。(三)新设的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应独立工作,并同海参崴联络站保持联系,但文件不能送给前省委和中共哈尔滨特委。1935年1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这一办法通知给驻海参崴联络站。同时,要求联络站给各地党委和军队党组织转发中共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令各地特委和部队党组织立即中断与省委的关系并独立工作的通知。海参崴联络站按代表团的指示如实照办。

为了实行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和组建中共哈尔滨特委的工作,1935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金赤民)^①、张德(林

^① 韩守魁(1914—1937),化名金赤民,吉林扶余人。九一八事变后,为苏联从事情报工作。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6年2月任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1937年4月被捕变节,旋被枪杀。

潜)^①、傅景勋(傅有)^②三人分别由苏联回到东北。1936年元旦,韩守魁经满洲里首先到达哈尔滨。他的任务是结束满洲省委并组建哈尔滨特委。1月7日,他从满洲省委留守人员小骆处接收省委与各方面的一切关系。但韩守魁根据代表团指示,未将结束省委的事告诉小骆,使之继续维持“省委”名义。2月,韩守魁组建了中共哈尔滨特别委员会。特委机关秘密设置在哈尔滨市新安埠安心街。韩守魁的任务是,组建哈尔滨特委后,将其交由代表团指定任特委书记的张德主持工作。1月25日,张德到达哈尔滨后,发现被人跟踪无法工作,只得将特委书记一职交由韩守魁担任,他去汤原工作。中共代表团规定哈尔滨特委的任务,是专做日本侵略者占领区城镇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保持与中共代表团和海参崴联络站的通讯联络工作。中共哈尔滨特委经过一段工作,恢复了中共哈尔滨市委,改组了大连市委、海伦县委,并同中共奉天市委和宾县、巴彦、陶赖昭、呼兰等特别支部恢复了关系。

1936年5月下旬,仍在珠河抗日游击区坚持工作的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派人经过中共苇河县委(亦即珠河中心县委白区工作部)的关系到哈尔滨找到前省委留守的小骆,向他了解由中共吉东特委转来的有关满洲省委内部出现“奸细”的信息。这时,小骆才发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杨光华去莫斯科后,尽管自己在近一年中多次致信海参崴联络站和中共代表团,却不给回信的原因是代表团怀疑前

① 张德(1910—1988),原名陈万言,又名陈维哲,黑龙江哈尔滨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6年1月回国历任东北抗联政治军事学校教官、第三军留守团政治部主任、第三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初随部队过境苏联,不久被遣送新疆。1953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锦州市医院副院长。1988年病逝。

② 傅景勋(1912—?),又名傅有、傅贤明、王守一,黑龙江依兰人。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珠河游击队,同年6月去苏联学习。1935年12月派回东北,曾任苇河县委书记、哈东特委宣传部长。1937年3月投敌叛变。

省委主要干部中有“奸细”,切断了同省委留守人员的联系。他写信要求到中共代表团去弄清楚问题。同年6月,小骆设法越境去了海参崴。在他临走之前特意致信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汤原中心县委声明:省委留守人员中没有“内奸”。同时指出,传言中所谓“省委有奸细”,纯属谣言。究其原因:(一)敌人于去年即造谣。(二)吉东特委有奸细,但不敢武断地说有。(三)中共代表团有误会^①。同一信中还宣布:“从现(在)起旧省委正式取消。”

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使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机关,造成了组织上的混乱。对此,北满和吉东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深感忧虑。他们都希望中共代表团“在东北建立总的领导机关。”^②而杨光华、马良、谭国甫、小骆等中共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在苏联遭到王明、康生的迫害,受到严重摧残。之后只有杨光华一人于1956年生还中国,得到平反,其他人则下落不明。

四、中共南满、北满、吉东省委的建立

中共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后,通过海参崴联络站,采取写信通知或直接派人传达指示的办法,下达了东北四大游击区建立南满、东满、吉东、松江4个省委的指示。各地党组织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先后建立了中共南满省委、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中共吉东省委等3个省委,各自领导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一)中共南满省委的建立

1936年7月初,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在金川县河里会家沟,由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满、东满特委和抗联

^① 《满洲旧省委代表菲野(小骆)给珠、汤中心县委信》(1936年6月)。存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②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第206页。

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亦称“河里会议”)。魏拯民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撤销中共满洲省委、组建4个省委和建立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各军分区分配合对敌作战等指示。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有关指示,结合东、南满党组织的现状,考虑到东满与南满抗日斗争、党的工作已经联在一起,将中共代表团原计划分别建立中共南满省委和东满省委的建议,因地制宜地予以改变,决定东、南满党组织合并,统一组建中共南满省委员会。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李东光、宋铁岩、王仁斋、李学忠、周树东、陈翰章、曹亚范、王润成等13人为省委委员。

中共南满省委的下属党组织有中共东满特委、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中共柳河、长白、抚松、桓兴等县委,以及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军党委。后来,又建立了中共抚顺县委。南满省委机关后来由金川县河里地区转移至桓仁县境内。中共南满省委的建立,对于抗联第一路军在南满和东满地区扩大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建立

1936年6月,抗联第三军司令部接到《中代信》。信中提出在松花江下游设置新的松江省委组织,在哈东老游击区建立哈东特委,并提出由张寿箴或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以及冯仲云分别担任省委书记和特委书记的建议。第三军司令部赵尚志和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冯仲云等认为,这个建议不符合北满成立抗联总司令部之后形成的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新格局。信中将新建的松江省委管辖的游击区域范围仅限于松花江下游两岸地区,而未包括第三、第六军正在开辟的小兴安岭和黑嫩平原是不妥当的。因此,对“中央代表”表示不信任。故决定不成立松江省委,而成立北满临时省委,然后自己去找上级关

系,向中共代表团报告。

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第六军党委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在汤原帽儿山第三军被服厂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新策略与任务的决议(草案)》和《中共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指出:“满洲省委既已取消,组织混乱如此,路线方面错误如此严重,对于旧的满洲省委以及吉东特委、‘中央驻东北代表’,站在巩固党的立场不得不均加以否认,并由自己找上级关系。同时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必须要成立北满临时省委员会,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暂时来领导整个北满(哈东、哈南、松江、嫩江流域、呼海、齐克路沿线等地)党的组织,并须直接关系来要求上级领导和改造省执行委员会”^①。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员会选举赵尚志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主席、冯仲云为书记,张寿箴、金策、张兰生^②、李熙山、夏云杰、白江绪、李福林、朱新阳^③、魏长魁^④、郝贵林、张连科等18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李福林、张兰生、冯仲云、赵尚志、白江绪、朱新阳、夏云杰、魏长魁、金策等9人为常委。

^① 《中共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关于组织北满临时省委的决议》(1936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第3页。

^② 张兰生(1909—1940),原名包巨魁,满族,黑龙江呼兰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到珠河抗日游击区工作,先后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书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宣传部长、书记,抗联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0年在战斗中牺牲。

^③ 朱新阳(1912—2003),别名朱正云、宋文成,黑龙江宁安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珠河团县委书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青年部长。1937年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9年去延安在警卫团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齐齐哈尔市长、旅大市副市长,后任黑龙江文史馆副馆长。2003年2月病逝。

^④ 魏长魁(1906—1938),山东德平人,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哈东特委书记、北满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东北抗联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8年7月,在战斗中牺牲。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下辖哈东特委、下江特委,汤原、桦川、依兰、富锦、绥滨、方正、讷河、肇州等县委及抗联第三、第六军党委和第九、第十一军党组织。会议还决定派省委常委朱新阳去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请示。

(三)中共吉东省委的建立

为贯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改变东北党组织的指示,1936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派来的联络员于化南^①传达海参崴联络站方面的指示,撤销中共吉东特委,另建中共道北、道南两个特委,为中共吉东省委的建立进行准备。此时,道北特委已建立,由宋一夫任特委书记,刘曙华、关书范、王效明^②、于化南等为委员。特委设在林口镇。根据海参崴联络站方面建议,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返回宁安,建立中共道南特委并任特委书记,领导宁安等老游击区的斗争,第五军政治部主任改由道北特委书记宋一夫兼任。

自1936年12月中共穆稜县委遭受敌人破坏后,中共道北特委书记宋一夫一直随第五军第二师行动,实际主持中共道北特委工作的于化南又于1937年初去莫斯科,中共道北特委实际已无人负责。但是吉东地区抗联部队的反“讨伐”斗争却必须加强领导与协调;北满与吉东党组织间、抗联各军间出现的分歧和争议也亟待妥善解决。

① 于化南(1904—1945),原名于诗勋,化名“诵”,山东文登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委员、中共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吉东联络员、吉东道北特委委员、吉东省委常委。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去延安。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勃利地委书记兼专员。1945年12月被土匪杀害。

② 王效明(1909—1991),原名王冠英,辽宁昌图人。早年在奉天入东北陆军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曾任伪军步兵团第三营军官。1935年参加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第七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十一师师长。新中国建立后,任旅顺海军基地副司令员。1991年病逝。

经道北特委会议和第五军党委会酝酿,1937年3月14日,由中共道北特委书记宋一夫主持,在依兰县境内牡丹江畔的四道河子第五军军部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组织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代表团关于在东北按4大游击区分别建立省委的指示,决定以道北特委为基础建立中共吉东省委员会。会议选举宋一夫、周保中、王光宇、关书范、柴世荣、李延平、陈翰章等9人为执行委员,选举宋一夫、周保中、王光宇为常委,宋一夫为省委书记。吉东省委在四道河子设秘书处,由姚新一任秘书长。

中共吉东省委下辖道南特委、下江特委、勃利县委、穆稜县委及抗联第五、第七军党委和第四、第八、第十军党组织。

(四)五、北满、吉东党组织之间的意见分歧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三军与吉东党组织、第五军在贯彻来自中共代表团的《王康指示信》、《吉特补充信》、《中代信》以及后来的《新政治路线》信过程中,由于对这些指示信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策略认识不一致,加之在两军关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结果,造成了北满和吉东党组织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形势、特点和党的策略方针。《王康指示信》认为,目前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尚非决定胜负时期,不要孤注一掷,要培养干部、积蓄力量,“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对于这一估计,北满方面认为《王康指示信》是“军事上采取退守策略”,是单纯退守右倾路线的根源,主张“要采取进攻策略”,向敌人的薄弱环节发动不断地进攻,不能消极等待大事变。吉东方面同意《王康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各国矛盾激化,法西斯猖獗,苏联社会主义正在成长,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力量正在成长,并日益发

展,大事变正在迫近^①。因而认为,只有积蓄实力才能有效地迎接转眼来临的大事变^②。

(二)关于伪军工作。《中代信》认为伪军内有一部分士兵和军官对日本统治不满,因而“对于满军不能像看做日军一样,乃我们之死敌。”对此,北满方面认为,在伪军“还没拉出来变成反日武装以前,无论怎样同情怎样好,仍然是我们的敌人。只要有可能,无论在任何时期军事策略上,无论用甚么方法,只要有效解除其武装,原则都没有错误。”^③吉东方面则认为:“同情抗日的(部分)‘满’军,正在酝酿着准备走到最(后)抗日的环节,可是当没有走到以前,却(应)反对任何抗日部队解除其武装。因为他们将来正要利用自己手内武器,来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④中共吉东省委成立后则明确认为:“对于‘满军’策略仍依据中央指示原则,并坚持耐心进行基本工作。同时因斗争环境之复杂与某种之必要条件,并不能机械了解路线,对‘满军’进行武装解除及主动的袭击亦所许可。”^⑤

(三)关于对伪保甲、大排和敌人集家并屯的政策。《吉特信》认为:对于保甲和大排、伪自卫团,“对他们的一般原则策略是联合和中

^① 《周保中给侯启刚的信》(1938年6月26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2,第87页。

^② 《中共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关于统一战线策略运用的特别指示信》(1936年4月2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9,第320页。《中共吉东省委、五军党委、宁安县委给宁安地方工作同志的信》(1936年7月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外交汇集》甲28,第43页。

^③ 《中共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新策略与任务的决议(草案)》(1936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63—264页。

^④ 《中共吉东特委委员诵给北满临时省委及三、六军信》(1937年2月1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35,第233页。

^⑤ 《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代表团的信》(1937年3月3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8,第95页。

立,而决不是和他们打仗”;“如日寇强迫移居大屯时,在我们影响下的居民不要单独留在山中,应与其他群众一同移居大屯。在大屯内成立合法的或半合法的群众组织,同时进行不合法的秘密工作。”《中代信》说:“对于敌人的归大屯政策,我们不仅不应反对我们影响和领导下的住户搬家,并且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搬家的方法,开辟日本统治区的工作。”对于大排队,《中代信》认为“不能把各地大排队看作像日军一样,乃我们之死敌”。北满方面认为,对于敌人的保甲归大屯,“我们对之是要采取坚决的反对和破坏的策略”。对“将计划归而没有完成的地方,我们要领导群众武装暴动来反抗。”“对日‘满’乡村统治”要“完全摧毁。凡属于日‘满’及私人武装,在原则上一律缴取。”“对领导和赞同归屯并户的保甲长,为一般民众所痛恨者,解决或惩罚之,户口门牌一概焚毁。在某些地带游击队退走斗争结束时,应留下秘密干部与群众一同混入大屯或找得可靠的秘密关系,在合法掩护下作不合法之反日工作,以准备继续不断的破坏和内应。”^①吉东方面,“关于归大屯问题,在吉东是根据杨松同志农民统一战线一段文章(按指《中代信》中的一段)布置的”,但是“归大屯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最复杂最难办的问题”,“日寇已经试验到的确归大屯很足以隔绝抗日军与民众接近,……我军在此种区域,进攻大屯极困难,不进攻没有住处和给养”^②。但是,斗争的残酷现实表明,敌人的“集家并屯”、保甲制度和遍设伪自卫团的反动措施,不但有效地使抗日军民分离,而且成为抗日武装活动的严重障碍。因此,从1937年初开始,周保中即屡屡指示部队:对“有可能破

^① 《中共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新策略与任务的决议(草案)》(1936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第264页。

^② 《中共吉东道北特委1936年工作报告》(1937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5,第274页。

坏之集团部落应(予以)破坏。若破坏无效又不可能、且徒受军事攻坚的损失,而增加民众的痛苦时,那就不强予破坏”^①,转为利用合法形式进行秘密工作。

(四)关于《新政治路线》信中“抗日反满不并提”的问题。对于中共代表团提出“抗日反满不并提”的主张,吉东方面在所发出的《中共东北抗联第五军委员会通告》中,表示遵照执行。北满方面坚决不同意中共代表团《新政治路线》信中“抗日反满不并提”的主张,并批评道北特委、第五军完全接受这一主张的态度。明确指出:“不提反‘满’,只有抗日就够了,意思就是不反‘满’。……这种理论,是把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极端错误的扩大到与敌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分子们的理论。”^②

此外,关于北满与吉东党组织和抗联各军间关系问题也存有争论。1935年秋以前,北满和吉东党组织以及三军和五军方面,由于作战区域的不同,关系并不密切。之后,第五军北上依、勃地区后,两者的关系才逐步密切起来。吉东方面因与中共代表团和海参崴联络站保持经常联系,较早地得悉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文件和中共代表团新的政策路线的指示精神,认为负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并以于化南的海参崴联络站联络员的“资格”,“代表吉东来纠正北满临时省委决议案内各点错误”,以达到吉东党组织与北满党组织政治上的一致。

在抗联各军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吉东方面承认过去吉东党组织和第五军在协助独立师和第八军改编抗日联军问题上,确有忽视北

^①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给王光宇等同志的信》(1937年2月2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8,第52页。

^②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吉东省委并转第五军党委的信》(1937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第175页。

满联总^①系统和没有事先联系的失误。认为对第三军工作系统和北满联总原有系统,第五军党组织应保持尊重态度;认为第三军是党领导下的北满抗日中坚部队,今后遇有各军纠纷事件时,第五军只能站在公正的和以统一战线之巩固为原则的立场,从中尽力调解,不能偏于任何一方。但同时也认为第三军斗争历史长,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大,遂逐渐产生了“居功骄傲”、不善于团结友军的弱点,使原有参加北满联总的谢文东等部队远离第三军而单独活动,甚至相互间发生冲突。对第三军某些人欲将第五军打回宁安去的说法,表示不满。于化南甚至曾提出,应“解散(北满)临时省委,改组(北满)新的省委。”^②

北满方面认为,吉东党组织在《吉特补充信》和《中代信》的右倾错误影响下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错误;认为于化南和周保中以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中央路线”和代表南满、东满、吉东党组织“整个意见一致”的姿态,来纠正北满临时省委在“组织问题”、“政治路线”问题上的“严重错误”,是施加压力;认为吉东党组织和第五军不经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同意,擅自干预北满联总所属军队、北满党组织内部关系的活动,是对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北满临时省委的不尊重。甚至怀疑这是吉东方面“在江南破坏了联军系统,事实上否认了联总”,“惹起和促成三、八军的部分冲突”,“客观上‘是使党的队伍’分裂的行为。”^③是吉东方面自第三军方面

① 指北满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

② 于化南:《中共吉东道北特委一九三六年工作报告》(1937年5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5,第302页。

③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吉东省委并转第五军党委的信》(1937年8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甲23,第215页。

“争取依、方^①利益”^②和地盘。因而表示：“北满党是共产党的北满党，北满党在党内不能接受非组织的任何命令及其指示。”^③“应由我们的上级给予我们的指示以便遵行”，“用不着由东、南满、吉东之全权代表来同北满谈判。”^④

吉东、北满党组织对上述问题各持己见。1937年6月间，周保中、于化南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张兰生、李福林等虽然在通河北满临时省委机关所在地先后举行过会谈，并有许多信件往来，但最终仍无法实现认识上的一致。为了解决北满、吉东的分歧，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7年6月28日召开执委扩大会议，邀请周保中参加，就党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交换了意见。会上，北满方面检查了珠汤联席会议上反对《王康指示信》，认为它是右倾根源的错误以及组织问题上的错误；吉东代表也检查了个别同志忽视党组织应有手续以及工作上犯的右倾错误。双方都肯定北满、吉东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一部分，是执行党的总路线的组织。双方都希望党的统一。但对“反满抗日不并提”，对“集团部落”政策，对伪军政策等问题的分歧仍无法取得一致。于是只好各自设法向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申诉，希望派人前来指导解决北满和吉东党组织之间的这些分歧，同时请求上级党组织在东北设置统一领导机构，以便统一领导，统一认识。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与中共吉东省委之间发生的分歧和争论，并不涉及抗日救国的大方向，也不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政治路线，而

① 即依兰、方正地区。原为东北抗联第3、第4、第8、第9军的活动区域。

②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司令部给李福林的信》（1937年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385页。

③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司令部给李福林的信》（1937年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385页。

④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司令部给李福林的信》（1937年2月1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385页。

是在东北地区贯彻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方面,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些认识上的不一致,本来并不难解决。但是,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敌人的武力统治和严密封锁,东北地区党组织无法取得遵义会议后、已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而领导东北地区党组织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远离东北抗日斗争战场,不了解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情况,又由于其主要负责人王明、康生在所制定的有关东北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中,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内容,致使各地党组织和部队难以形成一致的、正确的理解和行动。同时,代表团错误地撤销了满洲省委后,又未能建立东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致使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各自为战,各自为政,以至在执行代表团所提出的、本来就易于引起争论的对敌斗争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具体运用方面,发生了认识上的不一致,出现意见分歧,争论不休,造成内耗。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承担东北党的领导责任来讲,造成北满与吉东党组织和抗联各军间的争论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责任,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康生来负,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节 东北抗联各军的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游击战争广泛开展

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

1935年秋,在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中提出了,为结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将率先加入抗日联军。这一主张,在同年12月下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

窑堡会议决议中得到中央的肯定。

1935年5月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已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至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共5个军。党在东北组建的抗日部队已形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由红军游击队直接组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部队,包括南满第一军、东满第二军和哈东第三军;一种是有红军游击队参加、以共产党领导的吉林救国军余部为主编成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类型的部队,包括吉东的第四军、第五军。南满第一军组织的“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第二军在安图建立的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北满第三军组织的“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以及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抗日同盟军”部队,都体现了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并卓有成效地联合各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开展对敌斗争。根据上述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创造的经验,吴平向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代表团提出了在东北建立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1935年5月11日,《中共吉东特委致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东北各种抗日武装,应一律取消各部队的原有不同名目,共同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①。9月2日,吴平还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合军的组织条例(草案)》上报中共代表团审议。

经过长时间酝酿、宣传和准备工作之后,中共代表团在第二次“满洲问题”会议上作出了在东北建立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决定,并于1936年2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20日,中共代表团又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第六军军长和汤原、海伦游击队具衔,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统

^① 《中共吉东特委致省委的报告》(1935年5月1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5,第69页。

一军队建制宣言》。宣言指出：“我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各军，反日联合军第四、五、六各军、各反日游击队为收回东北领土、为保卫中华祖国，四年以来在全东北反日总会的领导下，与我各反日救国武装同志以及反日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作游击战争，势必奋斗到底”。《宣言》正式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和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部队，从即日起“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①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同时并揭扬左（下）列各条”：

“（一）东北抗日联军在政治上，在民众救国运动紧密关系上，完全接受东北反日救国总会领导。

（二）凡中国同胞及一切反日武装军队，不分宗教，不论政治派别，不论任何社会团体或个人，不分派别，不分穷富，只要是抗日救国，我东北抗日联军便与行动一致。因此对于海内外同胞，暨南京政府内反日派别，在野政党军政治名流以至中国苏维埃红军，最近抗日救国对日宣战一切主张，均竭诚拥护。

（三）我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体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并由公意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四）凡被压迫民族，高丽人、内蒙古人、台湾人、个人或团体或军队，我东北抗日联军均一律欢迎参加，结成弱小民族联合战线，对抗日本强盗帝国主义。并愿与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友好提携，同时与目前正国际政策上对日寇立于反对地位，例如英、美、法等及其它反日国家，均为我联军所同情，互为赞助。

^①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原拟将谢文东的《东北反日民众救国军》编为东北抗联第六军，但该军长时期未能接受，故为虚列。

(五)昨日即为汉奸国贼,做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日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联军完全既往不咎,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①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地的抗日部队统一改称“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其中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皆在1936年二、三月间分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第二、第四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于同年6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军^②于同年八、九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第六军。但是,由于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后,东北的军队和党组织失去了统一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总司令部这一统一指挥机构未能建立起来。杨靖宇和赵尚志分别在南满和北满成立的“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和“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虽然当时都冠以“东北”名称,但都属于地区性的指挥机关。

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发表后,为推动全国抗日联军的早日建立,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结成,即提议由正在上海的著名东北抗日将领、前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出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1936年春,李杜在关内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派人到天津设立电台,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进行联络。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撤往重庆后,李杜经国民政府核准在重庆公开设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并对外挂牌进行抗日工作。在此期间,李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这个总司令部和总司令远在重庆,根本无法实现对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所以这个司令部未能发挥实际作用。

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目的,除将中国共产党原有不同名称

^①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1936年2月20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第10—12页。

^② 此时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即由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的抗日武装统一编为抗日联军外,还具备将其他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吸收加入抗日联军的内涵,以便最终建立起东北武装抗日统一战线。为此当时东北抗联各军普遍采取了收编义勇军部队,或将其直接纳入本军部队,或增设抗日联军编制序列,编为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的做法。

二、抗联第一、第二军成立,抗联第一路军编成,反“东边道北部大讨伐”的斗争

(一) 抗联第一军的建立

1936年上半年,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新形势的鼓舞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指挥第一军部队,在南满地区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活动,给予日伪军警以重大打击。

1936年2月下旬,杨靖宇率领第一军军部教导团,自金川县河里根据地出发再次南下通化。当得知第一军的死对头伪军邵本良部第六旅第七团团部正驻在二道江附近的热水河子街这一消息时,杨靖宇决定突袭该伪军团部驻地热水河子街。热水河子街是伪满在通化的一个重要据点。街内驻有日军守备队30人、伪军70余人、伪警察30余人、伪自卫团30余人。2月27日凌晨,第一军教导团以急行军隐蔽行动突然包围了热水河子街,在内应的配合下,首先占领了可控制全街火力的大炮台。接着,卫队团徐团长和宣传干事吕鹤三又机智地解除了街口和伪军团部门口的哨兵,大部队立即旋风般冲进营房,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官兵全部被俘虏。时值伪军团长邵本良去通化开会,得以漏网。这次行动,因有内应配合,干净利落地俘虏了该团副团长杨凤武等60余人,还逮捕了居于伪军团部近邻的日本殖产会社经理福岛力藏、伪税务局主任等人,缴获一挺机枪、45支长短枪

和子弹3万发^①。热水河子战斗结束后不久,杨靖宇又得到奉天伪教导队一团团部76人将要经过辑安县头道崴子附近的高丽沟前往通化县城的消息。杨靖宇决定伏击这股敌人。他指挥部队在高丽沟口设下埋伏。但由于消息走漏,敌人没有过来。于是杨靖宇放出消息说:部队将向东作战。但他率部向东走了几里地后,又返回高丽沟,将队伍埋伏在村中,并告诉此处被抓去修路的群众照样干活。果然,四、五个小时后,敌人来了。杨靖宇鸣枪为号,战士们勇猛冲锋,仅用15分钟结束战斗。杨靖宇召集被俘伪军讲话后,伪军士兵议论说:“人家一个大队长(按:当时部队为保密称杨靖宇为大队长)讲话就这样呱呱叫,……咱们‘满洲国’的官连人家一个眼角也赶不上”^②。开完会,每个俘虏发给5元大洋释放回家。此战毙伤日本教官、伪军10余人,俘虏38人,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2挺、步马枪38支、匣枪25支、战马30余匹。之后,第一军部队继续南下。

敌人得知杨靖宇率部出击通化、辑安地区后,立即调集伪第一军管区所属1000余名伪军,于辑安中部头道阳岔一带实行截击、围堵正在南下的第一军部队。1936年4月9日,伪军第一军管区司令部派参谋长满良、日本顾问武田乘飞机从空中视察、指挥,邵本良部伪军充当炮灰冲在前面。第一军部队被逼上白石砬子山顶,经连续几天的突围战斗,仍未突出敌围。敌人以为杨靖宇此次将会插翅难飞了。4月12日凌晨,当伪军发动总攻时,却发现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部队已经无影无踪了。原来,第一军部队于敌人发动总攻前,趁敌军连日疲困疏于警戒之机,从几支伪军结合部的薄弱环节胜利突围,并隐蔽起

^①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几个战斗情况》(1936年),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89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几个战斗情况》(1936年),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91页。

来。敌人惊叹:“杨靖宇的队伍飞了!”

4月16日,在敌人尚未重新发现抗联一军军部的行踪时,第一军部队又突然出现,并连续袭击了头道阳岔西部的台上、花甸子等伪警察所。尔后,第一军军部教导团即牵着尾追的邵本良所部伪军,在桓仁、本溪、兴京、宽甸等县兜圈子。前后历时一个月零一天,行程1000余华里。军部教导团在宽甸县境内与该军第一师一部会合,兵力也已超过敌人一倍。于是杨靖宇决定给已经被拖得疲惫不堪跟踪而至的这支伪军以严惩。4月30日,杨靖宇将战场选择在毗邻的本溪县梨树甸子大东沟。此处两面是山,中间是道,是敌人必经之路,地形对第一军第一师部队十分有利。第一军部队埋伏于两山,架起轻重机枪。当邵本良的马队进入伏击线内时,第一军战士猛烈射击,打得敌人纷纷往南山坡上逃跑。第一军战士立即将火力向南山坡集中,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此次战斗,毙伤伪军100余人,俘虏30余人,缴获步枪100余支、手枪20余支、迫击炮一门、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台和许多军需物资。伪军团长邵本良脚部受重伤,率残部狼狈逃走。第一军成立以来的战斗,“最激烈的要算这次”,敌人死伤最多的也“要算这次”。对这次战斗的巨大影响,当时有“吓坏了日本子,轰动了奉天省”的说法^①。1936年5月,杨靖宇率领教导团返回河里根据地休整。

与此同时,该军第一师部队另一部在兴京县(今新宾县)的杜家店、小南沟门等地袭击伪军获胜。其中,1936年4月1日,该师主力袭击了杜家店伪军机枪连,一举俘虏该连伪军45人。4月8日,该师一部在大呼伦小南沟门伏击伪军第四混成旅骑兵第七团一个连,毙

^①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几个战斗情况》(1936年),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7,第96页。

伤伪军9人,俘虏伪军33人,缴获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一挺、长短枪47支。第一师还夜袭了本溪火车站,毙伤伪军10余人,缴获一批军需物资。此外,在江北活动的第二师,在师长曹国安率领下积极对敌作战。在此期间,该师会同第二军第一师一部,为与南下作战的军部教导团和第一师互为呼应,曾在桦甸会全栈与日军200余名展开战斗,歼敌50余人。

1936年2月至4月,第一军与日伪军警作战11次,歼灭日军60人、伪军382人,扩大了南满游击区,部队也得到扩充。同年5月,由军部第二教导团、第一师第五团和游击大队,扩编为第一军第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①,下辖第五、第七两个团。

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和中共南满特委为了解决因南满抗日游击区不断扩大,第一军部队承担的战斗任务日益加重的问题,同时针对日伪当局在南满地区建设“集团部落”的严峻形势,便依据《王康指示信》中有关组建农民游击队的建议,于1936年4月15日,由南满特委专门制定出《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新方针》,要求因地制宜地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主力部队之下,组建许多地方游击队(亦称小部队)。该《新方针》指出:“准备与组织群众养成游击队的实力,为准备将来大的事变的基础的实现,游击队和党的力量应深入于南满广大的地域与群众中,在群众的保护和与他们配合起来,正确的解决一切军事给养。而且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战术来避免

^① 柳万熙(1917—1940),原名柳永俊,朝鲜庆尚北道人。1933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并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该军第一师第五团青年科长、第三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在桦甸柳树河战斗中负重伤。1940年被叛徒杀害。

与敌正面冲突,而不断的进攻(敌人),这样才能迅速的扩大部队。”^①组织地方游击队的方式是以几个大的村屯(即敌设置的“集团部落”)为中心组建20人至30人规模的游击队,由人民革命军派一指导员带领,开展包括军事训练在内的各项活动。游击队之间、游击队与大部队之间要保持联系。游击队的具体任务是发动并保护群众的对敌斗争;动员群众调查敌情,袭击敌人防守薄弱据点,夺取军粮,没收汉奸的财产,解决军需或分配给群众;经常扰乱敌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活动,或配合大部队作战,等等。从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部队在各地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如虎添翼,增强了主力部队活动的机动性。地方游击队成为主力部队的助手和后备力量。

1936年5月,第一军得到了陕北红军东征抗日的消息(由于敌人封锁,第一军军部尚不了解陕北红军已于5月初回师陕北。第一军得到的是迟到消息)。5月23日,杨靖宇率第一军军部到本溪县草河掌山区的汤池沟,同第一师干部研究为响应陕北红军东征,由第一师首先进行西征军事行动。5月31日,第一军军部以反正抗日的伪军奉天第一教导旅步兵第一团士兵孙喜堂等人名义发表《敬告满洲国士兵和长官书》,号召伪军官兵要认清形势,倒戈反正抗日。《告满军书》说:“关内中国红军已打进山西了,并联络其他各省反日队伍成立抗日联军,欲直捣满洲国。关外的抗日联军,特别是第一军,则从关外呼应,使日本强盗满洲狗国首尾不能相顾,一定能把日本强盗赶出东北和推翻满洲狗国!”为了响应陕北红军东征,实现久已渴望的打通同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红军的联系,第一军军部和中共南满特委决定,主动派遣在兴京、本溪地区的第一师部队进行西征,并为此积

^① 中共南满特别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新方针》(1936年4月15日),存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资料室。

极进行准备工作。

1936年6月中旬,第一军第一师自桓仁县西进。6月23日,西征部队集结在本溪、凤城边界一带,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在和尚帽子游击根据地召集干部会议,传达军部有关西征军事行动的指示。经党内、军内深入政治动员后,决定以第一师师部保卫连、少年营、第三团共400余人,组成西征部队,冲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趋辽西、热河,策应红军东征。6月28日,在宋铁岩和第一师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①等率领下踏上西征征途。西征部队在该师第四、第六团掩护下,经沙窝沟、大东沟,于当天夜里攻下安奉铁路草河口车站。6月30日,在矿洞沟附近与敌军发生遭遇战。1936年7月1日,经二道沟黄柏峪、山崴子越过安奉铁路到达朝天贝,然后沿辽阳、岫岩边界向西疾进。日军发现第一军西进,迅速派兵追击,并从海城、辽阳调集大批兵力前来围堵。西征部队前进受阻,并有陷入敌军重围之危险。第一师师部决定暂时放弃西征的计划,于7月8日将部队化整为零,兵分三路,回师东返。7月15日,该师一部回师途中设伏于辽阳与本溪边界之摩天岭,一举全歼追踪而来的驻连山关的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之一部,击毙队长大尉今田以下30余人。此战第一师也受到不少损失,第一师参谋长李敏焕等人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摩天岭战斗后,第一师各部化整为零,分头返回本溪游击区,但部队多次遭到追敌袭击,损失较大。

此次西征虽然未能实现预定计划,但却是欲打通同东征红军和中共中央联系的首次尝试。西征行动,扩大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在辽阳、奉天一带的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抗日信心。

^① 李敏焕(1913—1936),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清原县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连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等职。1936年7月在战斗中牺牲。

1936年上半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部队在军长兼政委杨靖宇和中共南满特委的领导下,在辽东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军锋所至已达本溪、辽阳、岫岩、凤城一带,直接威胁安奉铁路交通动脉。日伪当局为清除第一军的威胁,根据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加紧策划实施“北部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更大的战斗,中共南满特委于1936年6月末,在金川县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会家沟召开了中共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50余人。会上,魏拯民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报告,杨靖宇作了军事报告,南满特委书记李东光作了党的地方工作报告。会议根据《王康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精神,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确定了今后的战斗任务。会议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正式宣布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安光勋^①任参谋长。军部下辖教导团和3个师。第一师,师长兼政委程斌、政治部主任胡国臣、参谋长李敏焕(尚未得知其在西征中已牺牲),师下辖第三、第四、第六等3个团和一个少年营、一个警卫连。第二师,师长兼政委曹国安,参谋长李希敏,师下辖第八团和一个少年营。第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师下辖第五、第七等两个团。全军共3000余人。

(二) 抗联第二军的建立

1936年1月,因日伪军的“讨伐”,安图车厂子、奶头山根据地先后被迫撤离,东满抗日游击区日益缩小,东满特委遭受破坏。在东满

^① 安光勋(1907—1940),朝鲜族。中共党员。曾任中共磐石县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一军参谋长、第一路军参谋长等职。1938年2月被敌人逮捕后叛变。1940年死亡。

抗日斗争处于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东满与吉东过去相互合作和支援的协议,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该军一部,北赴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军部驻地,同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等领导人一起,共同举行了第二、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协商制定打开新局面的举措。

这次会议于1936年1月20日开始。会上,第二军通报了1935年8月该军与南满第一军在那尔轰会师和共同协商的事项。会议对第一、第二军的会师行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为打破各军彼此隔离局面、实现各军紧密联系共同对敌作战开创了先例,并为促成以后第一、第二、第五军的联合军事行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双方研究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地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相互密切配合作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东北人民抗日政府等问题。同时还研究了第二军与第五军为克服困难开展新的局面,相互支援,继续协同对敌作战,以及两军整顿和干部交流等议题。会议议定,第二军正式建立军部机构,部队扩编为两个师,下辖6个团;部队的活动方向:第二军军部率第一师继续在东满抗日游击区西部开展游击战,扩展安图、敦化、额穆、桦甸等抗日游击区,并向抚松发展,与南满抗日游击区的第一军取得联系。第二军第二师仍在东部活动,其中大部分仍同第五军在绥宁地区共同活动,以一小部分部队在原有游击区汪清、东宁坚持战斗。第五军部队经整顿后,第一师部队继续与第二军第二师部队坚持宁安中心游击区的战斗。同时,第二、第五军领导人还达成今后两军相互交换干部以及交流部队建设、战斗经验的协议。第五军根据第二军的请求,允诺向该军输送几名军事政治干部。

1936年1月31日,王德泰军长带领部队南返,会合正集结在镜泊湖南湖头、额穆、敦化一带的第二军部队,准备部署部队的改编和

整顿,开展新的战斗。

这次会议,对于加强东满、南满和吉东地区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联系,促进抗日联军的建立,推动东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会后不久,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从苏联返回东北。回国前,中共代表团指示,由他负责组建中共东满省委并任省委书记,同时还承担在可能时向吉东特委、第五军以及向中共南满特委、第一军,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精神,传达中共代表团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另建4个省委,建立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指示的任务。

1936年2月5日,魏拯民在返回东满时,由吉东特委派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送他到镜泊湖北湖头的第五军军部。在第五军军部,魏拯民从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处获悉: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等人不久前经第二、第五军联合开辟的额穆、敦化新游击区,已返回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部队在安图县迷魂阵游击根据地的消息。还了解到东满特委和第二军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当得知第二、第五军两军党委特别会议业已了解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代表团号召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内容后,魏拯民即向周保中等传达中共代表团有关满洲党组织的变动、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等指示,协商了今后第二军第二师在东部活动时,由第五军党委予以关照、指导和两军继续配合作战等事项。1936年2月9日,魏拯民又迅速赶去南湖头第二军部队驻地与金日成会见,并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有关指示和对朝鲜工作的有关指示。2月下旬,魏拯民在额穆县境内与王德泰、李学忠会见,向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指示,并为召开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领导干部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

1936年3月上旬,魏拯民和王德泰、李学忠、金日成等分头率部

南下,到达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驻地安图县迷魂阵。在这里召开了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周树东、安凤学、金日成、钱永林等人。会上,由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撤销满洲省委,组建4个省委,扩大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东北抗日联军的有关指示。

会上,魏拯民详细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拟将在东满活动的东满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中朝抗日联军的指示,具体内容为:拟将该军中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抗日战士单独编为“朝鲜民族革命军”,并挺进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境地区建立根据地,以便随时开赴朝鲜开展解放朝鲜的战斗,争取朝鲜民族独立。该军中的中国人民部队继续在原有地区活动。同时,为适应这一变动,欲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单独成立党小组及党支部,但共同区委或县委不变,在县委或特委下可成立一个朝鲜人工作部,其部长参加县委和特委,便于训练党员和开展工作。

可是,当上述建议在东满特委和第二军领导干部会上提出讨论时,并未获得以第二军第三师师长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同志的赞同。据金日成回忆说:“这次共产国际提出意见说,最好把在满洲活动的朝中抗日武装部队分成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进行活动。当然,今后随着形势的成熟,朝鲜人民革命军应该单独进行活动。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还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如果硬行将在东满地区的中朝人民抗日军队分开组建,势必会削弱这一地区的中朝联合抗日武装力量和共同的抗日事业,而且无益于中国的抗日斗争事业。同时,“从我们的斗争环境和条件来看,也是不能立即把部队分开的。我们要继续利用东南满大森林地带的有利地形,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直到我们打下能够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的牢固基础为止。在这种情况下

下是不应该分别建制为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各自进行活动的,而应该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共同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朝中人民的支持和声援。”^①

经过会议认真讨论,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和要求,考虑到在东满地区活动的第二军部队的具体情况,与会者共同决定,将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军部设教导团、少年营。全军编为3个师,共2000余人。

第一师,以第一团和收编的6个中队义勇军组建。师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②、政治部主任吕伯歧^③(由第五军调来)、参谋长朴德范^④。师以下暂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崔贤^⑤、政委林水山^⑥;第二团团团长毕书文、政委吕伯歧兼任。

第二师,以第三团、第四团和史忠恒部救国军组建。师长史忠恒

① 《金日成著作集》第一集。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105页。

② 周树东(1918—1937),山东平度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共青团琿春县委书记、团东满特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一师政委、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四师政委。1937年4月在战斗中牺牲。

③ 吕伯歧(1915—),黑龙江省双城人。1933年6月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0年战斗中负伤,后被敌人逮捕、叛变。

④ 朴德范(1809—),朝鲜族。1932年参加延吉反日游击队,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一师参谋长、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参谋长、第一路军警卫旅旅长。1940年9月在汪清县被敌搜捕叛变。

⑤ 崔贤(1907—1982),朝鲜族。1932年参加延吉反日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需处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一师第一团团团长、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第十三团团团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朝鲜,任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

⑥ 林水山(1909—),又名林宇诚,朝鲜族。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延吉中韩游击队,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一团政委、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等职。1940年2月投敌叛变。

(因养伤经第二军要求由五军派来的陈翰章代理)、政委王润成、参谋长陈翰章。师下辖3个团:第四团团团长侯国忠、政委王润成兼;原第三团改称第五团,团长方振声、政委王紫钧、政治部主任王松柏;第六团团团长由史忠恒兼任,并归师部直接领导。

第三师,由第二团和新收编的几支山林队编成。师长金日成、政委曹亚范(后由吕伯歧担任)。师以下暂编两个团:第七团团团长刘连山(后改孙长祥);第八团团团长钱永林。

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指示和第二军在延吉、和龙、安图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业已放弃、地方共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第一、第三师部队正在西部活动的现状,以及1935年8月第一、第二军那尔轰会议协议等情况,会议确定第二军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向:第一、第三师在吉林、辽宁两省边区活动,向西联络第一军并挺进中朝边境,开辟新的游击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并相机攻取安图或抚松县城,筹建抗日政府。第二师在汪清和绥宁地区的部队,继续在该地区与第五军联合对敌战斗。

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决定自军部、师部至团部均须建立、健全党的委员会,由政委兼党委书记。第二军党委员会由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和3名师长、3名师政委等9人组成,军党委书记由魏拯民担任。

会议认为,由于部队的扩大,已有不少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编入第二军,并且今后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仍需团结周围的义勇军武装共同抗日,因此,必须按照进一步扩大反日统一战线方针进行工作。同时,要求加强队内队外的政治工作。

会上,对过去尚未最终解决的反“民生团”问题进行了适当的处理。对于发生在东满地区共产党、共青团组织和人民革命军内部的反“反生团”斗争,魏拯民在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时,向

代表团作了全面的口头和书面报告,听取了代表团的意见。在这次东满特委和二军军队干部会议上,重新检查了四年来反“民生团”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对尚在抚松马鞍山被关押审查的100多名“民生团”嫌疑者,及过去仅凭口供却查无实据者一律解除监管,重新编入部队。至此,东满地区党内发生的反“民生团”斗争,终于结束。

这次会议的决策,使抗联第二军摆脱了由于车厂子、奶头山等根据地被迫放弃、部队活动困难的被动局面,对今后部队扩大、游击区的重新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东北抗联第二军正式成立后,鉴于东满原有游击区缩小和游击根据地多已失去,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各师继续分兵在西部与东部进行战斗。

为实现同南满第一军密切联合作战和向中朝边境发展的战略意图,魏拯民、王德泰率第一、第三师分别行动,第三师移师西南,向抚松、临江、长白进军,在长白山麓、鸭绿江沿岸开辟根据地;第一师西向敦化、额穆活动,并向桦甸、濛江发展,藉以保持同在绥宁地区的第二师的联络和向西联络第一军部队,以及牵制敌人,掩护第三师进入抚松;该军第二师部队仍在宁安、汪清、东宁一带同第五军并肩战斗。

1936年4月上旬,第一师实施了攻占敦化县大蒲柴河镇的战斗。大蒲柴河镇位于该县南端、敦化与安图两县毗邻处,是扼守自安图向敦化、桦甸大道三叉路口的军事要地,也是第一师为扫清西进通道必须首先攻克的敌人据点。此镇驻有一个伪警察大队(实为两个中队)。根据敌人驻军情况和第一师战斗任务的部署,王德泰考虑到此镇距敦化县城较近,攻打大蒲柴河镇敌人定会出援,于是决定以围点打援战术,夺取大蒲柴河镇。4月6日,第二军第一师即以一部兵力佯攻该镇,主力部队继续北进设伏于大蒲柴河与敦化之间的寒葱沟,准备歼灭援敌。战斗开始后,驻守大蒲柴河之敌一面抵抗,一面电告

敦化县城紧急救援。4月7日,日军500余人、伪警察250人沿大路向南驰援。4月8日中午,当敌人全部进入寒葱沟第一师的伏击圈时,突遭猛烈火力袭击,伤亡惨重,残部边打边向马号退去。第一师伏击部队随即回师南进汇合佯攻部队,于10日晨攻下大蒲柴河镇。守城的伪警察残部乘隙西逃,途中又遭打击。第一师部队入城后,即召集群众集会,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因第二军部队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欢迎。此次战斗,缴获小炮、机枪、步枪各一部,打开了向敦化、桦甸前进的通道,掩护第三师部队径直进入抚松、临江,振奋了军心。之后,第一师部队向敦化、额穆以及桦甸分别活动。该师第一团在敦化攻打板庙子,毙伤伪军17人。6月24日,第一师一部袭击额穆县杉松岭“集团部落”,并与活动在镜泊湖南湖头的第二军第二师部队相呼应。

与此同时,第二军第三师部队在师长金日成率领下,直驱抚松、临江地区,准备开辟长白山西麓新游击区,向中朝边境伸展。1936年4月,第三师经长途行军,袭击抚松县南部的漫江,歼灭守敌大部。5月,第三师会合第一军第二师曹国安部,共同袭击抚松县西部松江河附近的东岗屯伪军兵营,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需物资。同月,该师继续向西发展,第七团在小汤河与伪军骑兵30余人发生战斗,歼敌20余人,缴长、短枪18支。接着,该团又化装成农民袭击了西岗屯伪军营房,俘虏伪军40余人,缴获40余支枪。西岗屯当即有数十名农民参加了抗联部队。此时,第三师师部获悉伪靖安军一部自抚松县城向临江县移动的消息,便派该师第七、第八团集结于临江境内青沟村进行伏击,激战一小时,毙伤伪军30余人,缴枪30余支。

在此期间,魏拯民、王德泰、李学忠和金日成在东岗孙家峰窑密营召开了第二军干部会议。根据抚松等地的情况,决定集中该军第一、第三师部队在抚松、临江、长白发展新局面,建立长白山西麓根据

地。与此同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在朝鲜人内联合一切不愿当日本亡国奴的人建立朝鲜人内部反日联合战线”的精神,在金日成主持下、朝鲜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组织朝鲜人反日统一战线组织——朝鲜祖国光复会。经过认真准备,5月5日召开了朝鲜人祖国光复会成立大会。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金日成起草的《朝鲜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等文件。同时,根据这一地区活动着较多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的情况,决定加紧对周围抗日义勇军、山林队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加入抗联部队。之后,第三师除原有第七、第八团兵力得到扩充外,又扩编了第九、第十两个团。任命马德全为第九团团,徐魁武为第十团团。6月初,该师主力进入临江县境内,6月6日,智取西南岔敌人据点,击毙伪警察2人,俘虏16人,缴获步枪18支和一批军事物资。

第二军第二师在绥宁地区继续与第五军协同作战。除第二师代理师长陈翰章率第四团一部和第六团配合第五军第二师在中东铁路以北穆棱一带作战外,该师主力第四团一部和第五团仍协同第五军坚持在宁安、汪清游击区战斗,取得许多胜利。

东北抗联第二军自编成之后,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扩大,到1936年7月,军部已设立了警卫团、少年营;第一师扩编一个团;第三师增加两个团;第二师兵力也有相当扩充。随着部队的发展,抗日游击区域也迅速从安图、敦化扩展至抚松、临江等县,在东岗、西岗、漫江等地建立了军事密营与后方基地,为第二军坚持战斗与继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东北抗联第二军部队在抚松、临江地区初步打开局面后,也已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部队和南满游击区实现了靠拢与连接。1936年6月下旬,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抗联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肩负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委托,率一连部队,经濛江向南满游击根据

地的金川县河里地区(现属柳河县)进发,在南满抗日根据地,魏拯民向南满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中共代表团有关指示精神,并同南满党和军队领导干部共同协商了今后第一、第二军紧密配合,共同开创东满与南满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等问题。

(三) 抗联第一路军的编成,反“东边道北部大讨伐”斗争

1936年7月,南满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在金川河里会家沟召开了中共南满特委、东满特委和抗联第一、第二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简称河里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关于撤消满洲省委、组建四个省委及成立抗日联军的指示。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有关指示和南满、东满地区第一、第二军对敌斗争的形势,第一、第二军活动区域逐步靠近的情况以及干部情况,决定将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并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任第一路军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下辖第一军和第二军,共6个师。第一军为第一、第二、第三师,第二军的3个师的序列改为第四、第五、第六师。

会议还研究了抗联第一路军游击活动的方向、任务和军事计划。为遵照中共代表团有关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必将出师华北前线抗日,东北抗日武装应以扩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区的军事行动,予以积极地响应的指示意见。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原则决定第一、第二军主力部队脱离东部群众稀少的山林游击区域,进入到辽宁广大区域之中(今吉林省东部和南部各县)去活动。由于第一军军部早在1936年6月中旬即已主动派遣第一师采取了西征行动,响应陕北抗日红军出师东征抗日,此时尚未得到西征受挫返回的消息。会议决定抗联第一路军继续进行西征。具体的军事部署为:第一军军部、第一师仍旧自桓仁向本溪、辽阳地带活动,续继西征;第一军第三师和第二军第四师全部随后越过南满铁路,“到辽西再向热

河、外蒙边境一带活动”；“一军二师留老游击区活动”；第二军军部和第六师留在老游击区活动,继续开辟抚松、长白、临江等县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①。第五师仍在东满和绥宁地区与第五军配合行动。同时,还要保持第一路军、南满省委与第三、第五军和北满、吉东党组织的联络,以便各抗日游击区、抗联各军协同对敌作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会后,杨靖宇同魏拯民各自率领部队投入新的战斗。

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军军部和直属教导团、机枪连等部队,再次南下通化,绕道桓仁、宽甸,沿第一师西征部队方向开进,以便传达河里会议精神。在沿途作战中,获得许多胜利。1936年8月4日,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途经通化县四道江,得知伪军混成第六旅第七团团团长、新兼临(江)抚(松)地区“讨伐”司令邵本良押运大车队正在开赴八道江,杨靖宇立即命令部队在浑江大拐弯子实施伏击。就在这时,恰巧一名伪军进入伏击阵地便溺,第一军潜伏部队恐被暴露故提前开火。此战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和伪军50余人,缴枪50余支和10余大车物资。战斗中,邵本良虽又侥幸化装逃脱,但他从此完全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日本关东军认为其在屡次战败中均有大批武器、子弹被抗联部队缴获,有向抗日联军私卖军火嫌疑,多次予以清查。之后,邵本良被送进奉天日本满铁医院后死亡。这个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侵略者的伪军第一军管区司令部少将团长、“讨伐”司令,以出卖灵魂的可鄙下场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尔后,杨靖宇率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经辑安进入宽甸县境。1936年9月13日,第一军教导团在义勇军左子元部的配合下,智取

^① 《魏拯民给周保中的信》(1936年7月9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第202页。《中共道南特委书记张中华给魏民生的信》(1936年10月5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5,第239页。

鸭绿江畔的大荒沟伪警察所,俘虏伪警察 30 余人,缴获 30 余支枪。9 月 29 日,第一军教导团联合义勇军于万利部在宽甸至桓仁大道的铤草沟伏击日军牛岛部队一支车队,击毁日军汽车 9 辆,毙伤 30 余名日军,缴获枪支和大批物资。

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宽甸境内活动时,杨靖宇曾先后争取了“东北抗日联合救国军”司令左子元、义勇军高维国和于万利等各率所部加入东北抗联第一军,并被分别编为该军第十一、第十三独立师和直属独立旅,共同战斗。与此同时,抗联第一军新编的第三师在兴京、清原游击区开展游击作战。在清原,伏击一支 50 余人的伪军部队,击毙伪军 7 人,俘虏数人,缴获轻机枪一挺和步枪 10 余支。然后,该师向抚顺和开原开展游击活动,使得奉海铁路沿线的敌人也不得安宁。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和第一军第二师部队,在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的统一指挥下,按照河里会议的部署,坚持在抚松、安图等县开展游击战争,力图重点突开中朝边境临江、长白等县的抗日新局面,并策应第一军的西征。

1936 年 8 月上旬,魏拯民召集抗联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和第一军第二师主要领导干部,并邀请部分抗日义勇军、山林队首领,在抚松姜家趟子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攻占抚松县城。第二军主力部队会合 1500 余人的兵力,于抚松县西北的清江甸子、大苇沙河一带集结,此时,已经具备了攻占抚松县城的条件,附近的几支义勇军部队也同意共同进行攻城战斗。

抚松县城的战略地位对于第一军和第二军都十分重要。它是西向濛江、北向桦甸等原第一军游击区,东向安图第二军老游击区,南向预定开辟的临江、长白新游击区的重要交通枢纽。经侦察得知:城内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营和一个警备队等共 1000 余人,城防

坚固。攻城抗日部队共约2000余人,数量占优势,且事先约好值守城门的伪军士兵作为内应,在攻城部队枪响时即打开城门,接应抗日部队入城战斗。8月17日凌晨,第二军以金日成指挥的第六师为主力,在抗日义勇军“九站”、“万顺”、“万军”、“李(洪斌)司令”等部配合下,对抚松县城发起进攻。第六师一部首先攻占城外东山炮台,控制城东南制高点,然后转移火力攻城。此时,城内的内应却临时发生变故,城门未能按时打开;几支参战的义勇军行动也不坚决,甚至按兵不动、坐视观望。经一昼夜火力攻击,攻城战斗仍无进展,敌人援兵又将到达。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军不得不及时撤出战斗退守东山,凭借先已占据的东山炮台对敌人造成极大威胁。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部队向东山发起攻势,第二军利用有利地形,予敌人相当杀伤。此次战斗毙伤敌人40余人,虽未达到占领县城的目的,却使敌人极为震惊,并得知在东边道北部的抗联第二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尚有数千人的规模和进攻县城的战斗力的,从而不敢轻视抗日联军。

在进攻抚松的同时,第二军第六师一个连在师政委曹亚范指挥下,与第一军第二师第八团在抚松南部也开展进攻松树镇的战斗,以便牵制敌军对抚松的增援。这支部队原拟8月17日与进攻抚松战斗同时打响,因部队枪走火而提前至16日发起攻击,经几小时激烈战斗,终于攻下松树镇,毙伤敌数十人,缴获许多枪支子弹。

此后,第二军第六师在师长金日成的指挥下,迅速向临江、长白县境发展游击战,先后进行了大德水、小德水、半截沟、二道岗等多次对敌作战,并发动群众与部队一起,在与朝鲜毗邻的长白县十九道沟、二十道沟等处建立了军事密营和游击根据地。该师第八、第九团则再次返回安图县境内,分别活动在四方顶子、松江、大小沙河等地。

同时,第二军第四师部队先后自额穆、敦化南返,经安图县大沙河向抚松迂回,其先头部队第二团途中一度断粮。恰好在同敌一支

“讨伐”队发生遭遇战中,缴获一批粮食,渡过了难关。第二团部队到达抚松县境后,与第二军军部会合,在军部率领下,第四师继续在抚松、安图等县进行战斗。1936年8月下旬,第二军部队的抚松东岗大碱场兵工厂密营突遭敌军袭击,在反击作战中,正在此处疗伤的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不幸牺牲。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组成后,第一、第二军密切配合,在西线与东线积极对敌作战,歼灭了大批伪军和警察,动摇了日伪的反动统治。抗联第一路军逐渐发展壮大,东南满抗日游击区不断扩大,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密营基地日益增多,人民群众受到极大地鼓舞,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

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日伪当局经过紧张的筹划和准备之后,根据其三年“治安肃正计划”,首先对东边道北部通化、辑安、临江、长白、抚松、濛江、辉南、金川、柳河等九县,发动了以伪军为主为期6个月的“满军独立大讨伐”。10月1日,伪军政部在通化成立“讨伐指挥部”,由伪军政部最高顾问、少将佐佐木到一为指导部长统一指挥,伪军政部大臣于芷山任“讨伐”司令官。该“讨伐指挥部”将东边道北部九县划分为:通化;临江、辑安;长白、抚松;濛江、辉南;金川、柳河5个“讨伐”区域。共调集伪军第一军管区全部兵力和伪军第二、第三、第五军管区和伪靖安军、宪兵等部分兵力,约27500名,分区对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军和王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进行“讨伐”。敌人在军事“讨伐”的同时,还变本加厉地强行修建“集团部落”,推行保甲制,制造“无人区”,断绝抗联部队与民众的联系。敌人企图利用严寒的冬季,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

面对敌人冬季“大讨伐”的严峻形势,抗联第一路军依据河里会议的部署,继续将部队分为东西两线与敌军作战。在西部的第一军第一师,由于同年夏的第一次西征中部队遭受相当损失,装备、弹药

消耗较多,部队极需整顿,遂返回本溪和尚帽子军事密营进行休整。1936年10月上旬,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在窟窿榆树山里与第一师师部会合,直接了解了西征的经过。他充分地肯定了第一师的西征军事行动,并同第一师师长程斌等认真地总结了西征未成功的经验教训。

由于第一师部队西征受挫,未完成同中共中央和陕北工农红军打通联系的任务。为牵制敌人对东边道北部九县的“大讨伐”,杨靖宇坚持河里会议关于进行西征的决定,准备由第一军第三师继第一师之后进行第二次西征。1936年11月,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部队到达恒仁外三堡第三师驻地,令该师准备西征。杨靖宇同第三师师部领导干部一起,共同深入研究第一师西征失利的经验教训,认为第一次西征正值夏天雨季,山区道路泥泞,徒步行军缓慢,易于为敌人侦知抗联部队的行动信息。此次第三师西征,可利用当前大地封冻、河水结冰季节行动。同时,可将部队一律改为骑兵,利用其行军迅速的特点,冲过南满铁路和辽河封锁线,挺进热河。行军路线另选第三师活动较为熟悉的抚顺、开原一线。第三师部队当即迅速动员,在半个月內动员群众补充了所需马匹和部分鞍具。11月下旬,第三师西征部队两个团共400余人,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参谋长杨俊恒等的指挥下,自兴京境内启程西进。部队因突然由步兵改为骑兵,许多人不善于驾驭马匹,兼鞍具不全,沿途出现臀部磨破落马摔伤等非战斗减员现象,导致拖延了行军时间。部队克服许多困难,冲破了敌军的堵击,夜行晓宿,跨奉海铁路,经清原、铁岭,再越南满铁路,直达辽河西岸石佛寺一带,时间已是一月有余。不料当年冬季气温偏高,12月下旬还在降雨,辽河尚未封冻,主要渡口被日军把守,渡船在仓促之间难以找到,部队前进受阻。同时,该师参谋长杨俊恒与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相貌酷似,又是同姓,民众相传

为杨靖宇亲自率队出征,引起敌人极大重视,急调大批伪军警前来“讨伐”,情势危急。第三师师部当机立断,进行突围。突围战斗中,损失较大。部队绕道开原回返,一路战事不断。当第三师西征部队到达清原、兴京抗日游击区时,队伍只剩下百余人,西征再次受到严重挫折。

东北抗联第一军的两次西征均未达到预期目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态势难以改变,各次西征仅以几百人的兵力在日伪军警遍布且靠近敌伪统治中心区域行动,势难如愿。主观上则在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西征计划脱离南满抗日斗争的实际;还在于第一军军部对西征的不利条件考虑不周,对敌伪的严密军事、政治统治估计不足。因此,在脱离老游击区、得不到群众配合和支援的情况下,孤军远征,难免遭受重大损失。但两次西征仍有其积极意义。西征部队沿途打击了敌人,破坏了日伪的军事设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使身处日伪严密统治地区的民众深受鼓舞。他们欣喜相传:“东山里的红军打过来了!”群众把东北抗日联军看作是他们的希望。

杨靖宇为赞颂西征壮举,亲自谱写了一首《西征胜利歌》。歌词如下:

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
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
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击日匪赶快来会面,
日匪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起,

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匪死不远。

紧握枪刀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
歼灭日匪今田全队我军战斗好,
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
盔甲枪弹缴获无数齐奏凯歌还。

同志们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拼着热血势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大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1936年冬季,抗联第一军军部根据第二师已远离原有游击区东去,协同第二军反击敌人“东边道北部大讨伐”,开辟临江、长白新游击区,和第一、第三师前后两次西征遭受较为严重损失的现况,决定暂时避开敌军“大讨伐”的锋芒,第一、第三师部队迅速转入本溪、桓仁、宽甸、兴京、清原等县深山密林中的和尚帽子、老秃顶子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密营基地休整。

中共南满省委和地方党组织、地方游击队为修建这些军事密营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第一军和各地党组织建立起一些地方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各部队派出的指导员的带领下,积极配合部队进行游击战斗,充作部队的辅助力量;或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支援抗日部队的对敌斗争。日伪当局历年都是将当年10月至次年2月这一寒冷冬季,作为“讨伐”抗日武装的最有效的季节。抗日武装也均早做反“讨伐”的准备。抗联第一路军建立后,各军自秋季开始即积极修筑军事密营,除由各个部队抽出部分人员外,大量的工作均

由地方游击队完成。当时,中共桓兴县委和设在桓仁县外三堡的桓兴乡政府,在组织地方游击队、协助抗联部队建设密营,支援抗联部队等方面的贡献有口皆碑。地方游击队披荆斩棘,伐木挖土,修建了许多马架子、地窖子式简陋却适用的居所,储存了必要的粮食、衣物,还建有简易修械所和临时医院,使暂时避开敌人“讨伐”的第一军部队得以隐蔽休整。

其中,进入本溪东部和尚帽子密营休整的第一师部分部队,同已在此处因病休养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等人会合。宋铁岩在随军指挥第一师西征途中,因劳累过度肺病加重无法行军,被送回和尚帽子密营休养。当西征部队返抵密营后,宋铁岩不顾重病在身,仍同第一师干部一起总结此次西征的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思想工作,稳定干部和战士的情绪,鼓励部队继续战斗的信心。但是该师师长兼政委程斌产生畏敌情绪,为贪图安逸,不接受不宜久留和尚帽子密营的建议,结果,敌人经过侦察,于193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一),以数百名日伪军包围了和尚帽子密营。抗联部队虽经抵抗,终因兵力相差悬殊,一部突出重围,一部战死山顶。宋铁岩在指挥突围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第一师第六团在西征回师后,1936年10月上旬,按第一军军部的指令曾再次跨越安奉铁路,深入到岫岩县境开展游击战,不久也因为敌军所阻而重返根据地,队伍受到不小的损失。与此同时,抗联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部、独立旅于万利部在宽甸境内,第十三独立师高维国部在本溪境内同敌人作战时,因对反“讨伐”斗争缺乏准备,不善于避敌锋芒,结果在强敌进攻之下,尽皆受到严重损失,部队瓦解。

抗联第一军部队在冬季休整中,杨靖宇因第一、第三师西征先后失利,同中共中央打通联系的希望落空。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致信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建议在东北设立总的领导机关,以便取得

上级党组织的指导。此信交由派往中共代表团学习的人员经吉东第五军交通线带去。在此期间,杨靖宇和许多领导干部经常对战士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增强抗日救国、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此外,还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维护武器,开展文化活动。杨靖宇亲自编导了话剧《王二小放牛》在密营中演出,活跃了部队的的生活,鼓舞了士气。1936年冬至1937年春,抗联第一军经过在密营的休整,使许多伤病人员的身体恢复了健康,军事政治素质得到提高,战斗力得到恢复,为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参加反“东边道大讨伐”战争做好充分准备。

1937年初,抗联第一军便开始与敌人进行新的战斗。1月,日军牛岛守备队进驻宽甸、桓仁、本溪交界的四平街,威胁第一军设在此地的军事密营。杨靖宇迅即指挥军部教导团袭击日军驻地,歼其大部,仅队长牛岛数人逃脱。2月,杨靖宇率军部直属部队自老秃顶子出发东行,跨过浑江。3月,在桓仁、辑安县境的马蹄沟、摇钱树岭,先后同敌军进行多次战斗,共歼敌40余人。4月,在桓仁县尖刀岭村的战斗中,又毙伤敌30人。5月29日,在桓仁县影壁山村附近截击载有50余名桓仁县伪警察的汽车,击毙4人,击伤多人。5月,在桓仁、宽甸县边境的宽甸县大牛沟,与日军守备队80余人作战,歼敌20余人,抗联第一军牺牲3人。6月14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又在宽甸县黄家炉沟,截击正在返回桓仁的桓仁“特别工作队”的一支汽车队,其中5辆汽车被击中起火烧毁,歼敌一部,余者逃走。

在此期间,抗联第一军和由王凤阁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部队共同与伪军奉天第一军管区的第一教导队(相当于旅)、第五军管区的一个支队(即索景清旅)等组成的“讨伐队”展开了生死搏斗。

王凤阁所率辽宁民众自卫军,是辽东地区硕果仅存的一支抗日义勇军部队,在此次“大讨伐”中被敌列为另一个重点围攻对象。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伪军向王凤阁所率部队据守的果松川、

大罗圈沟、挠头沟等军事根据地发动了长达半年的疯狂围攻。王凤阁率领部队在通化、辑安、临江三县交界地区,或同敌军转圈子,或据守坚固工事顽强抵抗,给敌人以相当的打击。最后,终因敌以强大兵力,逐次攻陷自卫军各个军事根据地。部队在弹尽粮绝、几乎损失殆尽的情况下进行突围。战斗中,王凤阁一家三口和几名战士被俘。4月1日,王凤阁等在通化英勇就义。王凤阁余部和长期与王凤阁自卫军联合对敌战斗的朝鲜革命军余部在副司令朴大浩和第二师师长崔允龟率领下,于同年夏加入东北抗联第一军,继续同日本侵略者战斗。

抗联第一军经历了1936年冬至1937年春反“东边道大讨伐”斗争之后,对于部队在斗争中取得的战绩和存在的问题,急需认真总结,同时还要提出今后斗争的任务和方针政策。尤其在暂时未能打通与中共中央、陕北红军的联系,及很久未能获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何指示文件的情况下,只能由军队党委根据南满斗争的实际,参照以前所能了解到的党的有关东北抗日斗争的方针政策精神,自行研究解决南满地区以后的斗争方针与决策。

鉴于上述情况,1937年6月15日,抗联第一军党委于宽甸县境内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和南满地区的政治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全军在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党的工作和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缺点。会议确定了以后斗争的方针和冲破1937年秋冬季敌人“讨伐”的对策,强调应更正确地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尽可能地联合周围抗日义勇军共同对敌作战;要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获得群众的有力支援;军队要更多的采取灵活的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忽集忽散、神奇莫测的游击战战略战术,打击敌人;要注意使主力部队同地方游击队(即小部队)密切配合,开展对敌作战和后方工作。会议还强调了

加强党内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为坚持长期战斗,必须克服、纠正部队内部存在的对东北抗日战争胜利前途缺乏信心和某些畏难情绪。6月28日,会议作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党部扩大会议决议案》、《政治决议案》和《抗日军工作决议案》。

这次会议,为全军统一认识,明确斗争方向,巩固抗联第一军部队,推进南满的抗日斗争的继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伪当局自1936年10月发动的“东边道北部九县大讨伐”的重点在辽宁省东部地区。这里是东北抗联第一军的游击区之一部和第二军西部部队新开辟的抗日游击区。抗联第二军为同第一军联合对敌作战,坚持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在安图、抚松、濛江、长白和临江等县陆续修建许多军事密营基地,秋季来临又储备了粮食、衣物和收缴的枪支、子弹等军事物资,为抗击敌人的“大讨伐”和建立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1936年9月,抗联第二军第四师第一、第三团在安图县四道白河同敌人发生战斗,毙伤敌人20余人,缴枪9支。10月10日,第四师一部200余人,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军混成第七旅第十团交火,击毙日人上校石川隆吉、中校河村等10人。第二军部队在反“大讨伐”战斗中首战告捷,之后向抚松转移。

此时,根据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部署,第一军第二师在师长曹国安率领下,在长白县黑瞎子沟与师长金日成指挥的第二军第六师会师。随后,两军在十九道沟同日军守备队300余人发生战斗,歼敌80余人。1936年11月,第一军第二师在长白县八道沟与伪军300人发生战斗,毙伤敌人40人。12月8日,第二师在十三道沟设下埋伏,准备对业已连续尾追三四天的伪靖安军金泽游击队实施伏击。当天正值下雪,师长曹国安事先动员附近朝鲜族群众借出大量白外衣,战士穿上十分隐蔽。结果使敌人遭受重创,击毙数十人,还有许

多伪军被击伤、冻伤。不久,第一军第二师同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在临江县七道沟会合,经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二军政委魏拯民与各师师长共同决定继续打击金泽追兵。魏拯民等在七道沟鸭绿江边大甩弯敌军必经之地设伏。12月21日,穷追不舍的200余名伪靖安军金泽游击队和临江县伪治安队果然到达此地,抗联部队发动突袭,击毙敌20余人,余者逃走。战斗中,第二师师长兼政委曹国安身负重伤后牺牲。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不久即调第二军第六师政委曹亚范接任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1936年10月末,第二军第四师到达临江境内活动。该县大阳岔是抗联部队自长白、临江通往抚松的必经之地,由伪军第四混成旅派兵驻守。11月4日,王德泰军长指挥军部直属部队和第四师突然包围伪军据点,经过几度猛烈攻击和阵前喊话,迫使两连伪军表示停止战斗,并调转枪口随同抗日。但在行军途中发现伪军有乘机逃跑者,王德泰当机立断,将这两连伪军尽数缴械,余者下令遣散。此次战斗共缴获机枪两挺、步枪100余支和子弹15箱等军需物资,扫清了前往抚松的通道。之后,王德泰率第四、第六师各一部至小汤河地区开展游击战。这一带属抚松、临江、濛江三县邻接地,伪军第四混成旅得悉抗联第二军部队在此活动后,11月7日,调集伪军骑兵第七团和教导队一部共600余人实施夜间偷袭。王德泰临危不惊,当即组织部队反击,并派一连部队迂回敌后进攻敌人。敌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仓皇南逃。此次战斗,毙敌60余人,击伤10人,其中包括伪军团长邴某。第二军部队共缴获长短枪30余支、子弹5000余发、望远镜一架。但在战斗临近结束时,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不幸被流弹击中牺牲。

王德泰牺牲后,抗联第一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二军政委魏拯民即全部承担起指挥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军第四、第六师的重任,他率

领部队再次转往临江、长白两县活动。1936年12月,抗联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各一部在临江五道沟同一支伪军作战,歼敌50余人,缴机枪两挺、步枪16支。12月,第一军第二师、第二军第四师一部在长白县八道沟伐木场同前来“讨伐”的敌军作战,歼敌数十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多支。此时,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紧急从通化和金川、柳河地区调集伪军精锐的“特选队”,快速到临江、长白围攻抗联部队,使这一地区的抗联部队面临严峻局势。1937年1月12日,日军一支“讨伐”队偷袭第六师黑瞎子沟密营,被留守的20余名抗联战士及时发觉,迅速撤至附近埋伏起来。当敌人为轻易占据密营而得意忘形时,抗联战士突然反击,将数颗手榴弹一起投进密营正在烤火的敌群中,炸得敌军官兵血肉横飞,死伤累累,余者夺路而逃。

此时,伪军临抚地区“讨伐”司令李寿山又调集大批伪军,妄图聚歼抗联第二军部队在长白县境内。魏拯民得悉这一信息后,即决定留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各一部坚持长白县战斗,主力部队在大批伪军未到达前便重返抚松县境开展游击战。1937年1月下旬,第四师政委周树东率主力部队在抚松松江河附近小夹皮沟口伏击伪靖安军一个连,俘敌20余人,其余全部被击毙,缴获机枪2挺、掷弹筒一个和步枪近百支。2月22日,第六师主力部队联合抗日救国军李洪斌等部队在抚松县城城南30公里处伏击伪靖安军清野部队一个连,击毙日人中尉清野定吉、中尉小川木甫以下23人,击伤11人。在第六师撤出战斗转移途中,又与增援的伪靖安军工藤部队一连人发生遭遇战,击毙日人连长工藤等数人。2月25日,第四师一部在漫江沟里伏击伪军第三混成旅一个连,予以全歼。

同时,留在长白县的抗联第二军第四、第六师部队也寻找战机消灭敌人。1937年2月14日和20日,第六师一分别别在红头山和桃泉里同伪军“讨伐”队发生战斗。在此期间,第四师一部攻克南岗木

场,缴获大量面粉、大米和役牛,返回鲤明水与第六师一部会合。2月26日,第一军第二师与第二军第四、第六师部队联合在鲤明水沟里设伏,将跟踪追来的伪靖安军的两个连140余人击溃,击毙日人中尉川田等11人,击伤12人,另有日人大尉林上等18人严重冻伤,其余逃走。此战缴获机枪3挺和一些步枪。之后,抗联部队3个师指战员共同庆祝胜利,并欢度元宵节。1937年3月,第六师第七、第八团先后两次袭击临江县六道沟,共击毙伪军第三混成旅90余人,缴获枪支近百、棉布50余匹、胶鞋200余双。

1937年3月29日,抗联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各一部在抚松东岗杨木顶子密营会师,举行领导干部会议,共同作出继续分兵开展游击战,突破敌人包围圈的决定:第四、第六师各一部东向安图、和龙老游击区作战,借以转移敌人视线并牵制敌军;第六师一部坚持在抚松、濛江边界一带活动;第一军第二师在临江战斗,逐步转移长白。4月,抗联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各一部转战至安图县境。4月初,在荒沟岭附近公路截击敌人运输车队,缴获大批物资。4月23日,在和龙县升平岭东南与日军获原部队发生战斗,将其击溃。4月24日,第四、第六师各一部在安图县大沙河老金场附近欲行渡河时,突遭安图县伪治安队的偷袭。抗联第二军部队立即派出两个连绕至敌人侧后,实行两面夹击,经数小时战斗,歼敌100余人,将死心塌地为日本主子效劳、罪恶累累的伪治安队队长李道善当场击毙,人们拍手称快。在战斗中,抗联第二军军委委员、第四师政治委员周树东不幸牺牲。此次战斗,共缴获轻机枪两挺,各类枪械100余支。

同年4月下旬,抗联第二军第四师部队在和龙县境活动后,跨图们江袭击朝鲜茂山赤锋洞,击毙日警10人,再绕道向长白县转移。此前,4月初,抗联第六师的第十团部队相继在抚松县西南岔“满铁”木材采伐场与日军高桥部队及伪军第三混成旅骑兵一个连作战。5月,

该部转往长白县继续战斗。第六师师长金日成在长白县地阳溪台地召开军政干部会议,部署了整顿队伍和为进军朝鲜国内的准备工作。6月4日,抗联第六师部队在金日成指挥下,跨越鸭绿江抵达朝鲜境内,夜袭攻下普天堡,摧毁了敌人的统治机关,毙伤一批敌人,缴获机枪两挺、步枪23支和大量军需物资。同时,向居民散发事先准备好的以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金日成名义发布的布告,号召朝鲜人民起来抗日。攻占普天堡战斗,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的殖民统治,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散布的朝鲜边境不可逾越的神话,给予不甘屈服的朝鲜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朝鲜国内各大报刊登载了金日成夜袭普天堡的消息,引起轰动。抗联部队撤回长白后,日本在朝鲜的占领军便策划派侵略军越江进攻抗联第六师部队。此时,第二军第四师主力部队也辗转到达长白县境,同第六师和第一军第二师部队会合。6月24日,第四、第六师联合攻下横山木场,消灭伪森林警察30人。6月30日,驻朝日军派出第十九师团第七十四联队越境,在长白县十三道沟向抗联部队进攻。抗联部队当即以第二军第四、第六师为主力和第一军第二师共500余人协同作战,利用间山峰的有利地势予敌以打击。在给敌人重大杀伤后,部队主动撤出战斗转移,令敌人失去攻击的目标。

1937年6月,魏拯民率第二军军部教导队和第四师一部150余人,在抚松县庙岭采取里应外合战术袭击了伪军第四混成旅的第二营据点,经短暂的战斗,在毙伤伪军10余人之后,即将伪军营长以下60余人缴械,缴获迫击炮一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3挺、各种枪130余支、大量子弹、炮弹和军需物资。伪军庙岭据点被焚毁,使临江与抚松交通要道上的敌军据点被清除。

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夏,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四、第六师和第一军第二师密切配合,转战东南满长白山区,在地方党组织

和各族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进行了大小上百次的战斗,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另据“东边道北部大讨伐指导部”佐佐木到一1937年4月20日的综合报告称: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统计,日伪军同抗联第一路军和抗日义勇军王凤阁等部作战350次,“讨伐”抗日武装达8690人次^①。可见作战次数之多,战斗之激烈。至此,迫使敌人妄图通过“东边道北部大讨伐”,一举围歼这一地区抗联部队的美梦化为泡影。

三、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组成,抗联第三、第六军建立,松花江两岸游击战广泛开展

(一)汤原会议的召开,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成立

1936年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各一部和东北民众救国军、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等活动在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按约定相继抵达汤原县境太平川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会师。各军负责人开始协商筹备组建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东北人民抗日政府事宜。各部队乘春节临近开始休整,同时对周围的一些金矿区的伪军警武装派人进行分化和争取工作,以扩大部队和扩充武器装备,迎接新的战斗。

1936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三),第三军、第四军、汤原反日游击总队和民众救国军、自卫军支队等部队代表,在汤原县吉兴沟举行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赵尚志、李延禄、张寿箴、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冯治纲等人。会议根据《八一宣言》关于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号召,响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成立民选东北人民政府、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倡议,决定组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266页。

建“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军政府”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并于1月28日通过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会议制订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政纲》,发表了《东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成立宣言》和通电。会议推选赵尚志任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李华堂任副总司令、张寿箴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由于南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满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吉东的反日联合军第五军等未有代表与会,所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实际上是北满地区反日联军总司令部(简称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它对于推动北满和东北的各种抗日武装进一步联合起来,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起到了重要作用。

会议成立的东北反日联军临时军政府,是与伪满洲国对立的政权。虽然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的限制,该政府未能全面地实施其政纲及职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其政治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1936年1月30日,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同时,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依据汤原会议的决定,开始筹建“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自力更生为北满抗联各军培训军事和政治干部,以适应各军发展和游击区扩大对干部的迫切需求。决定由赵尚志兼任校长、张寿箴兼任教育长(后由侯启刚代理教育长)。

北满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之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第六军根据哈东老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已被敌人破坏和日伪当局在北满地区加紧军事“讨伐”的严峻形势,依据汤原县的自然条件,为坚持长期抗日战争,决定在小兴安岭汤原县汤旺河一带(现伊春市)重新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日根据地,并以之为基地在松花江下游两岸扩大抗日游击区。为此,确定由两军各抽部分队伍组成后方留守处,以张寿箴兼任主任,承担建立汤旺河后方根据地的任务。

(二) 抗联第三军的建立及其开展的游击战争

1936年春,根据1935年9月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关于第三军向江北木兰、东兴、铁骊、巴彦、庆城、海伦一带发展的决定及当时业已获得的陕北红军东征抗日的消息,为了策应关内红军东征抗日,第三军司令部决定采取沿松花江北岸西征,扩大抗日游击区的军事行动。

1936年4月初,经过休整,筹足粮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直属部队和该军第五、第六团近400余人,在军长赵尚志率领下,从汤旺河沟里出发进行西征。4月13日,首战攻占依兰县舒乐河镇。镇内驻有200余名伪军和100余名伪警察部队。为保证首战必胜,赵尚志预先派遣70名指战员暗藏短枪化装潜入镇内,约定中午12时发动攻击。主力部队隐蔽于镇外附近,做好充分准备。总攻时刻一到,部队里应外合发起突然袭击,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抛弃枪支狼狈逃窜,第三军一举攻占了舒乐河镇。计俘虏伪军警100余人,缴获各种枪械300余支。4月19日,又袭击了松花江边的竹帘镇。两次战斗,拔除敌人设在松花江岸的两个重要据点,并打开了通向通河、木兰、巴彦的通道。之后,第三军西征部队乘胜继续沿松花江向西挺进,并在巴兰河谷同一支伪军和伪警察队发生战斗。这支敌军是在得到第三军进攻舒乐河镇的消息后,正在前往支援途中,在巴兰河谷同第三军部队遭遇,双方当即发生激烈战斗。这里属河口的湿地地带,正值春季桃花水季节,到处是泥水,战斗更为艰巨。敌人慑于第三军的威力,尚未与三军接触,即已丢魂丧胆。战斗中,许多伪军警被击毙,其中包括一名日本人指导官,还有大量伪军警被俘虏。第三军又取得此次战斗的胜利,缴获伪军一个连和一个伪警察队的武器和装备。第三军的影响很快扩展至松花江两岸附近地区。

1936年5月,赵尚志率第三军部队经通河县进入木兰县境,以攻占敌人据点,袭击“集团部落”为主要目标,积极开展游击战斗。5月

13日,袭击该县太平河屯。5月20日,第三军一部在该县潘家屯与日军一部发生战斗。6月1日,联合义勇军“化民”部,袭击了大河沿伪警察署;6月9日,将钱家庄“集团部落”伪自卫团缴械;6月12日,攻克了太平桥“集团部落”,解除了该部落伪自卫团的武装;6月18日,第三军一部联合“大东来”部义勇军袭击该县上芳店“集团部落”等等。西征部队在该县蒙古山建立了军事基地,并向巴彦、东兴、通河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破坏、摧毁了敌人新近建成的“集团部落”,焚毁敌人的营房和炮台,缴获了一些伪警察所和保甲自卫团的武器。在战斗中,还收编了40余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其中,将在木兰收编的于九江部山林队编为第三军第七师,由赵尚志兼任师长、于海云(九江)任副师长、张德为政治部主任。第三军第五、第六团部队得到很大的发展。第三军司令部首先将第五团扩编为第五师,由景永安任师长。

第三军部队在通河、木兰山区建设一些密营军事基地,使松花江北岸形成了一个新的抗日游击区,同仍在松花江南岸宾县一带进行战斗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隔江遥相呼应。1936年7月上旬,日伪军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讨伐”。第三军将第六团一部留在当地活动,准备迎接后续西征部队的到来。主力部队经铁骊返回汤原。

第三军第六团一部在团政治部主任祁占海(祁大虎)带领下,坚持木兰、东兴游击区的斗争,虽历经挫折,仍坚持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方针,联合团结周围的抗日义勇军、山林队与敌人进行战斗。1936年7月13日,第三军第六团攻入木兰镇,烧毁伪警察署。8月3日,第六团在木兰县东北部南广利屯与日伪军一部发生战斗。在木兰县广利东突袭停靠在松花江岸边的伪江防军炮艇,击毙伪江防军30余人,缴舰炮两门、机枪两挺。8月14日,在巴彦张家岗与日军涩谷部队交

战,将伪滨江省警务厅警长盘嘉三郎击毙。不久,第六团扩编为第三军第六师。由张光迪^①任师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任。继续坚持巴木东地区的游击战。

赵尚志率领第三军司令部和第五、第六团部队,在松花江北岸汤原、通河、木兰、东兴等开辟新的游击区时,仍在松花江南岸方正、延寿、宾县、珠河、五常等老游击区的第三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等部队,继续坚持松花江南岸的斗争,并在战斗中得到恢复和发展。

1935年12月中旬,第三军第一团已在方正县内扩编为第一师。由刘海涛任师长、张寿箴兼任政治部主任。该师活动在方正,延寿、依兰和通河一带。1936年3月16日,第一师在依兰县靠山屯附近与日军泽野部队发生战斗。6月4日,第一师部队在依兰县土城子伏击押送劳工的伪警备队,俘虏伪警备队长日本人金泽等多人,解救劳工300余人。第一师同江北的第三军部队互为策应,影响两岸。

1936年春,第三军第二团在珠河县中东铁路南老游击区同该军第三师共同活动,经过补充整顿,部队得到恢复,又返回珠河铁路北和宾县开展游击战,受到一些义勇军部队的欢迎,认为今后又可以得到第三军的庇护进行活动了。第二团在同这些义勇军的共同对敌斗争中,吸收了一些义勇军加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的行列。该团曾率同一些义勇军攻打延寿警察队,截击敌人汽车等战斗。

4月26日,第二团由宾县奔袭阿城县第三区永源,解除伪自卫团20余人的武装。8月26日,当第二团同收编的义勇军300余人欲东

^① 张光迪(1906—1986),又名张凤山,河北广宗人。1933年12月,参加珠河游击队。193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师师长、抗联第三路军第六支队支队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黑龙江省军区二分区和三分区旅长、司令员、内蒙骑兵师副师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军分区副司令员、邯郸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86年11月病逝。

去方正县开展游击战、途径宾县夹板站,抵达虎头山附近的李家屯宿营时,遭受追敌日军松本中队约60人之围攻。第二团等抗日部队凭借宿营地大院的高墙、炮台给予抵抗,但因缺少重武器,而敌人重机枪火力猛烈,抗日武装无法冲出大院,陷于被动。第二团指挥员关化新为引诱敌人,命令部队逐一暂停射击,敌人误以为抗日部队子弹耗尽,日军也暂停射击,并迅速冲到大院东南角炮台下刨墙挖洞,欲图冲进大院。此时,第二团组织10余名突击队员突然跃上墙头,率先击毙敌人机枪射手,然后跳至院外将挖洞的敌兵予以击毙,还夺取了敌人的重机枪,并即刻调转枪口,猛烈扫射敌人,接着院内大部队迅速冲至院外扑向敌人。结果,日军中队长大尉桥本等17人被击毙,13人被击伤,其余溃逃。第二团缴获重机枪两挺,各种枪械39支,子弹两箱。此次战斗的胜利,影响远近的义勇军竞相投靠第二团,该团遂扩编为第三军第二师,吴兴才任师长、关化新^①任政治部主任。全师编为6个团。继续坚持战斗在宾县、珠河地区。

1935年冬,第三军第三团根据第三军司令部的命令改编为第三师,全师3个团。在师长张连科、政治部主任李熙山(许亨植)的指挥下,仍坚持在中东铁路南珠河县大泥河至五常县老游击区进行游击活动。第三师在珠河与五常边界活动期间,继续与汪雅臣所部反满抗日救国军联合对敌作战。1936年2月,经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同意,将久已配合第三军共同战斗的汪雅臣率领的这支抗日山林队,在五常县北部高丽营子附近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此前,珠河中心县委已吸收汪雅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第三军第三师和第八军又改善了同“创江南”等义勇军、山

^① 关化新(1906—1938),河北山海关人。中共党员。历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团参谋长、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师长。1938年6月在战斗中牺牲。

林队的关系,成立了反日联合军路南指挥部,联合对敌战斗。一次,第三师在五常高丽营子同敌人展开战斗时,“创江南”部义勇军得知消息后,立即从10公里之外,携带重机枪前来支援。后来,又先后在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地作战多次,在道南重新打开了局面。不久,第三师又联合了道南、道北抗日义勇军1000余人,在五常县小山子附近打击敌军,还一度伸展至拉滨铁路以西榆树县境内活动。第三师与第二师在珠河、五常及其附近县份的影响日益扩大。

1935年12月中旬,第三军第四团在赵尚志率第三军司令部等部队去松花江北后,即扩编为第三军第四师。由郝贵林任师长、金策任政治部主任。全师编为3个团。该部自勃利县青山里与第三军司令部分开活动后,一直在吉东地区与第四、第五军等部队一起开展游击战争,取得许多胜利。

自1935年冬至1936年夏,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转战松花江下游两岸,同第六军一起建立起汤旺河后方根据地,开辟了松花江北岸巴(彦)木(兰)通(河)新的游击区,与坚持在宾(县)珠(河)延(寿)方(正)五(常)老游击区斗争的部队遥相呼应。同时又积极向勃(利)宝(清)富(锦)地区伸张。部队有了迅速的发展,已由原有的6个团扩大为7个师,活跃在北满近20多个县,形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之一。

1936年8月1日,第三军司令部根据《八一宣言》精神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发表通告,宣布从即日起,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通告并希望联络抗日义勇军各军,“消除此疆彼界、各树一帜、尔东我西、各行其志”的局面,“以发扬与光大我抗日之旗帜,以巩固我反‘满’之武装”。东北抗

联第三军的建制是:军长赵尚志。司令部设政治保安师,师长常有钧^①;第一师,师长常有钧、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第二师,师长关化新、政治部主任吴兴才;第三师,师长张连科、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第四师,师长郝贵林、政治部主任金策;第五师,师长景永安、政治部主任蔡近葵^②;第六师,师长张光迪、政治部主任兰志渊^③;第七师,师长于海云、政治部主任张德。抗联第三军成立之后不久,新建了第八、第九师。1937年7月,又建立了第十师。第八师,师长考凤林;第九师,师长李振远、政治部主任雷炎;第十师,师长高士魁。第三军部队总兵力约6000人,其中基干部队1500人,其余为收编的部队。

1936年9月18日,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第六军党委在汤原帽儿山第六军被服厂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分析了目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了斗争的策略和任务。根据历年斗争经验,对反日伪当局1936年秋冬季“大讨伐”进行了部署。

1936年10月,日伪当局根据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开始在汤原、通河、木兰、方正、依兰、勃利和宾县、延寿、五常等县,对北满地区抗联武装进行“大讨伐”。日本关东军为加强对松花江两岸抗日游击区的“讨伐”,特别指定中部地区防卫司令官、日本关东军第九师团师团长统一负责指挥,调集伪军第四军管区兵力和另调伪军第三军管区

① 常有钧(1911—1938),辽宁岫岩人。1934年加入哈东支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六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1938年9月被叛徒杀害。

② 蔡近葵(1915—1974),原名蔡宗康,黑龙江省双城人。哈尔滨法政大学毕业。1933年参加珠河反日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秘书、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第一师师长兼哈东游击司令。1938年赴苏,被遣送新疆,1974年病逝。

③ 兰志渊(1914—1958),别名兰友勤,吉林省梨树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珠河反日游击队。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叛变投敌。

一个骑兵团、一个日军守备队和汤原伪治安队等日伪军,欲图一举歼灭在汤原一带的抗联第三、第六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这种形势下,根据珠汤联席会议决议精神,为了冲破敌人的秋冬季“大讨伐”,开辟新的游击区,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的领导下,除坚持汤原地区的反“讨伐”战争外,“向伪满统治薄弱的隙缝突击”^①,扩大抗联部队和拓展新游击区的决议,决定第三、第六军部队再次西征铁骊、海伦,开辟黑嫩新游击区,并以一部东征萝北、佛山(今嘉荫)以示策应,同时出击依兰、桦川,予以牵制,以打破敌人集中兵力围歼抗联部队的图谋。

这次西征改变了1935年西征孤军突进的方式,采取多路出击、分散敌人注意力以掩护主力行动的战术,首先争取在黑嫩地区站稳脚跟,开辟新区。赵尚志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率第一师组成西征先遣队,由汤原出发赴庆城,与在那里活动的第九师会合,再向铁骊进军;调第二、第三师各一部分队伍,由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北渡松花江,向铁骊前进;活动在木兰蒙古山一带的第六师提前西进铁骊,开辟根据地并储存粮食,接应主力部队;活动在富锦、萝北一带的第五师沿松花江西进,进驻黑嫩平原北部的海伦,再向西北发展。

1936年9月,李熙山率第一师一部200余人为先遣队,首先西进,经东兴等地于11月到达铁骊县境内,与第六师会合。不久,第二、第三师部队在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吴景才率领下,也自宾县跨过松花江,1936年11月进入铁骊山区。第三军第九师也抵达铁骊。

同时,第四军第一师第二团和第五军第一师部队也随同第三军

^① 《中共珠汤中心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新策略与任务的决议(草案)》(1936年9月18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8,262页。

西征,在11月相继抵达铁骊,欲同第三军第一师会合。1936年11月30日,在铁骊境内的一次对敌战斗中,两支部队失去了联络。第四军第二团在十六道岗活动时,与第三军第一师共同夹击一支日军“讨伐”队,击毙日军7人。之后,该团随同第三军续征海伦,在海伦六井子屯围攻伪警察所和大排队60余人,解除敌人全部武装。

1936年11月,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军部直属政保师和第一、第五师各一部500人组成骑兵,从汤原根据地老钱柜出发,顶风冒雪开始西征。由于第三军多支部队向西移动,引起日伪当局的警觉。主力部队启程后,立即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赵尚志率队巧妙地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木兰县蒙古山,在这里与第六师留守部队会合,补充了给养,休整了几天。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堵,赵尚志放出消息称:“这次西征是要攻打呼兰县城”。日军得知这一消息,急忙调大批兵力集结到呼兰和巴彦之间,加强防御。赵尚志却率部迅速北上,向铁骊挺进。12月,部队到达铁骊,同西征先遣队和第六、第九师等部会合。李熙山率领的先遣队和第二、第三、第九师到达铁骊后,收编当地的义勇军、山林队,开辟了铁骊、庆城(今庆安)、绥棱一带的新游击区。但部队在活动中牵走老百姓的马匹,违反群众纪律和民族政策,引起群众不满。赵尚志了解这一情况后,在三节台召开会议,整顿了部队纪律,向群众赔礼道歉,得到群众的谅解。

此后,赵尚志令第三军第六师一部在师长张光迪率领下留在海伦至铁骊一带,承担起开展游击战和建立后方基地的任务。张光迪率领该师在通北和海伦边界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进攻徐家围子,截击日本运输汽车,攻打伪森林警察队,均取得胜利。同时,在海伦东山里建立了后方基地,为尔后西征的北满抗联大批部队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

第三军西征部队在庆城、铁骊活动近两个月,敌人积极调动兵力

围追第三军部队。1937年2月28日,部队在海伦东北赵家堡子附近与日伪军激战3小时。2月29日,在海伦哈拉巴山又与日军田岛部队交战,战斗日益频繁。根据敌情变化,赵尚志决定率第三军司令部、少年连和第六师一部300余人继续向北挺进,向海伦、通北(今北安县境)地区继续远征。3月初,远征队沿运木材的山道向通北进军。部队的行动被敌人侦知。敌人派出700余人尾随其后。赵尚志已知敌人追击。他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利用有利地势设伏,另一部分则继续急速前进诱敌。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击部队4挺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逃跑。此战毙敌3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和毛毯等物品。这次战斗后,赵尚志判断敌人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再次调兵向我围攻。他告诉战士们,要寻找有利地点迎击敌人。

部队离开山道,沿一条小河谷向山坡前进时发现,前面岗地上有4座原木垒起的木营。在木营附近山间有一眼常年不冻的山泉。冬季,泉水从山上流下,结成一片很宽的冰坡,当地群众称之为“冰趟子”。赵尚志仔细观察了冰趟子周围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阻击战,消灭跟踪追来的敌人。这时,伐木的工人们已经回家过年,木营里只有几个人留守看房子。赵尚志安排部队在木营住下后,召开了班以上干部会议,部署阻击方案。战士们趁敌人尚未到来,用两天时间用冰雪构筑工事,设好埋伏阵地。

1937年3月7日,日军竹内部队和伪军以及警察队等800多日伪军追击部队开进了冰趟子沟。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会遇到阻击。就在敌人顺沟大摇大摆地前进要接近木营时,指挥员一声令下,指战员们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伪军中队长等当场毙命。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伪军纷纷向后溃逃。200余名日军在守田大尉的指挥下向木营扑来,但他们在冰趟子上接连滑倒,遭到伏击战士们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的猛烈打击,死伤惨重。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半夜。

这时气温降到零下40度,枪被冻得拉不开大栓。第三军战士轮流进入木营烤火,暖枪,不断打击敌人。敌人多次发起冲锋,企图夺取木营,但终未成功。在冰川上趴了一夜的日伪军,被冻得四肢麻木,精疲力竭,无力再战,只好狼狈撤退。

这次战斗,毙伤敌200多人,冻死、冻伤100多人,其中有日军大尉守田、准尉津田庆一及警务指导官等7人。第三军缴获九二式机枪一挺、一批枪支弹药和大量米、肉、军装、军毯等物资。战斗中,第三军牺牲7名战士。冰趟子战斗是抗联第三军建立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率军部少年连和第一、第五师各一部150人继续向地处北满小兴安岭西麓的通北、龙门进军。此时,虽然已近3月中旬,但气温仍在零下30℃以下。敌人为掠夺小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木材资源,在沿山各处设置日伪军警警戒守卫。第三军北征部队在途中不时遭遇敌人的阻击,行军非常困难和迟缓,粮食几乎断绝,部队被迫将瘦弱的乘骑马匹宰杀充饥。因身处林海雪原,每天露宿冰天雪地之中,部队战士不断出现冻伤和掉队现象。1937年3月27日,部队行至北黑铁路龙门车站附近的一座炭窑时,获悉一支乘坐30余张马爬犁的日军“讨伐”队正在追击而来。第三军部队除布置部队在正面伏击外,还以少年连50余人隐蔽路旁两侧的树林中实施侧击。当敌人进入抗联伏击阵地后,第三军部队突然从正面和两侧实行三面夹击,迅速解决战斗。此战击毙日军守备队队长少佐町田、准尉渡边等21人。此战共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具,步枪20余支。之后,部队继续前进,但途中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和敌军的堵截、追击,加上严寒、饥饿,部队开始出现大量减员。当部队行至距逊河约30公里处宿营时,突遭追击敌军的偷袭。赵尚志率部奋勇突出重围,但也牺牲了30余名战士,乘马全部丢失,150多人的部队仅剩70余人。

1937年5月,赵尚志率领部队徒步翻山越岭,克服困难,绕道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休整。

第三军部队的再次西征历时约半年,行程1000余公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西征途中,部队仅在房屋中住过10天,无论战斗还是休息,都是在零下30至40度的冰天雪地中度过的。

第三军主力西征后,留守汤原的第一、第五师和军部直属部队各一部,为策应西征,牵制敌军,分别实行出击。第五师一部在师长景永安率领下,联合义勇军一部东征萝北、佛山(今嘉荫)。同时护送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特派员朱新阳越境去莫斯科向中共代表团汇报、请示工作。1936年11月末,袭击萝北县老金沟火烧营采金场,解决了部队的装备和给养,动员一批工人参加了部队。该部继而向佛山进军。佛山县城是边境重镇,位于黑龙江岸边,驻有伪警察、伪国境监视队和伪军一部。1936年12月1日,第五师联合义勇军共400余兵力分三路发起攻击,首先捣毁敌无线电台,割断有线电话,切断敌人一切电讯联系,使其与外界隔绝。同时,围攻伪国境监视队并缴获其武器。伪县署参事官吉村、伪警察署指导官五十岚率领10余名伪警察乘隙逃往黑河。伪军第二十七团一个排负隅顽抗,在中尉桥本被击毙后也仓皇逃跑。佛山县城被攻克。此战击毙日伪军官兵12人,击伤8人,缴获51支枪、子弹近1200发、被服489件、马93匹、现款7万元、电台1部,还俘虏了伪县长、伪警察署长等8人。全城居民悬挂红旗,一片欢腾。抗联部队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筹集给养,三日后撤离。佛山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和信心,震动了敌人。

1937年1月,汤原留守部队一部袭击并攻占汤原县梧桐河金矿,歼敌一部。2月,再战佛山县境内,攻克马连站,缴获一批粮食,继而攻下嘉荫河金矿,收缴枪支、子弹一部、15公斤金沙和大量面粉,还吸

收 10 余名矿工参加抗联部队。10 余日后,该部又攻下萝北县金满沟金矿,缴获大批物资。由于连续作战胜利,部队有些轻敌,在进攻得到敌军增援的老道沟金矿时,作战失利,牺牲 3 人,部队只得返回岔巴气后方根据地。

1937 年 1 月,在林口一带活动的第三军第一师一部在哈东游击司令李福林指挥下,袭击林口县城,打死敌军 10 人,缴获步枪 15 支。又袭击延寿伪警察大队,毙敌 15 人,缴获步枪 13 支。不久,在夹信子又伏击日军西山部队,击毙日军 20 人。之后,李福林率队在通河大小古洞河一带打击敌人,宣传群众。4 月,该部在二道河子突围战斗中,李福林不幸牺牲。

第三军第四师由师长郝贵林、政治部主任金策率领,在松花江下游的宝清、富锦一带新开辟的游击根据地为西征部队筹集军费,并与第四军、第七军部队共同战斗,有力地配合了三军主力的西征。不久,为了取得与第三军司令部的联系,第四师师长郝贵林率领该师 50 余名骑兵从宝清返回汤原,配合第六军部队开展游击战争。

从 1936 年 10 月到 1937 年 6 月这段时间内,第三军各部英勇出击,顽强作战,取得了许多胜利。从松花江下游沿岸的汤原、依兰、通河、方正、木兰、巴彦到小兴安岭山麓的铁骊、庆城、绥棱、海伦、通北,从北黑铁路沿线的北安、龙门到黑龙江沿岸的逊克、佛山,纵横千余里,大小百余战,毙伤日伪军 800 余人,俘虏 300 多人,攻占城镇二三十座,缴获了敌人大量轻重武器和弹药。在这期间,第三军远征部队也遭到很大损失,牺牲了 30 余名军政干部和 200 余名战士。但是,由于第三军各部与第六军配合,采取西征东进,分头出击的战术,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冲破了日伪以宾、木、通、汤、依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保护了汤原游击根据地,开辟了铁骊、庆城、海伦新游击区,从而为第三军以后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三) 抗联第六军的建立及其开展的游击活动

1936年1月末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后,积极展开游击活动。根据汤原会议后第三、第六军的决定,第六军的主要任务是扩大汤原抗日游击区和建立汤旺河后方根据地。而要建立汤原后方根据地,首先就要解除驻守在汤旺河沟里的伪汤原森林警察大队武装,为建立汤原后方根据地扫除障碍。

1936年2月初,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写信给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张寿箴,要他想一切办法解除老钱柜(今伊春上甘岭林业局境内)伪汤原森林警察大队武装,以建立汤原后方根据地。3月中旬,张寿箴和戴鸿宾率第六军第二团20多人和洼区青年游击连70多人,并动员义勇军“阎王”部20多人,共110余人的队伍,筹足了给养待命。

驻老钱柜的伪森林警察大队,下属4个中队,分别扼守黑金河、唐犁川(今南岔)、岔巴气和老钱柜等重要隘口。大队长于禎(于四炮)和中队长于五炮、丁山、黄毛、张保安等都是小兴安岭著名的猎手,熟悉山地,枪法较好。日军占领汤原后,大队长于禎和几个中队长都对日本的统治不满,于禎还与第六军军长夏云杰有过联系。根据这种情况,张寿箴、戴鸿宾和洼区区委书记李凤林研究认为,对这支队伍只能智取,不能硬打,要采取巧妙的办法解除其武装,并争取多数队员参加抗日。1936年3月15日,张寿箴和第六军第二团团长戴鸿宾率部队从浩良河出发,冒严寒、踏深雪,经艰难的行军,于3月18日到达伪警察大队的头道哨所岔巴气附近密林中隐蔽,由熟悉这里情况的李凤林带领侦察小队顺利地抓到两名伪警察,并由被俘的伪警察引导顺利地缴了两名警察哨兵的枪。随后,大队乘拂晓伪警察仍在睡梦之机突入营房,未经战斗俘虏了中队长黄毛等40余名伪警察,缴获了大量枪支子弹。随后,经教育,黄毛表示愿意协助第六军。部队迅即在当天傍晚到达老钱柜,利用黄毛蒙骗俘虏了巡查哨兵和副大

队长于五炮,通过于五炮喊话,老钱柜几乎所有伪警官兵被迫放下武器,日本指导官森山等六七名日本人在顽抗时被击毙。这次奔袭老钱柜作战,共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 100 余支、子弹 4400 余发、电台一部、粮食 2 万余市斤以及牛、马近百匹。当时大队长于祯因在汤原为儿子办婚事未老钱柜现场。4 月 23 日,在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的教育下,于祯率残部反正起义,先后被编入东北抗日联第三、第六军和第九军。从此,小兴安岭汤旺河一带成为抗联第三、第六军的后方根据地。

1936 年 3 月 31 日,第六军一部在依兰县东南头道河子村同一支日军和宪兵发生激战,毙敌 10 人,伤 18 人。4 月 2 日,第六军第二团团团长戴鸿宾与稽查处长黄有,通过社会关系争取了汤原太平川附近格节河金矿伪森林警察队中队长王志,使其交出了所有武器装备。

1936 年 4 月间,为扩大游击区,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率领部队先后两次准备进攻兴山镇(今鹤岗市兴山区),但因故未能实现。5 月 22 日,第六军 3 个团 500 余人,在军长夏云杰指挥下向兴山进攻。在抗日救国会员和矿警队员的配合下,进攻部队分两路发起攻击:一路由参谋长兼第三团团团长冯治纲指挥首先炸毁了吊桥和车库,用火封锁了日军守备队和矿警第一队的营房;另一路由夏云杰指挥,冲入煤矿事务所,击毙了日本官员山口为市、桥田德次和伪矿警大队长赵永富,解除了矿山伪警卫队的武装,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 30 支和 6500 余发子弹。夏云杰当即召集矿区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经过宣传教育,被俘的矿警中有 26 人参加了第六军部队。

此前,第六军第二团政治部主任裴敬天带领第二团和第三军各一部,组成 150 人的依东先遣队。该部在依兰县东北的西湖景附近暖泉子活动时,突遭 3 倍于我之日伪军联合“讨伐队”的围攻,战斗激

烈。因敌强我弱,全体指战员奋勇杀敌,终难突围,部队遭受严重损失。6月22日,第六军第四团部队正欲从汤原县城东尹家大院渡过松花江,继续去依兰东部西湖景一带开辟游击区时,突然发现一辆满载日军的汽车急驶而来。团长张传福立即指挥部队予以伏击。遭到突然打击的敌人慌乱中纷纷跳车还击。第四团战士瞄准敌人沉着射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此战击毙日军20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长短枪17支。战斗中,团长张传福负伤,被送回根据地养伤。第四团团长由陈绍宾代理。随后,第四团南渡松花江至依兰、桦川开辟抗日游击区。

1936年7月,第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带领新编的第五团到达萝北县境内,袭击了凤翔街的伪军炮台,解除了伪军迫击炮排的武装,缴获迫击炮一门。此后,该团又进军绥滨,攻破了该处的伪警察署。8月,第六军第七团在军长夏云杰的指挥下,在依兰县宏克力东沟里与伪军300余人的“讨伐队”发生激烈战斗,第六军第七团占据有利地势,连续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迫使伪军撤走。

1936年9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党委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精神,决定将第六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由夏云杰担任,张寿篪仍兼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为冯治纲,秘书长黄吟秋。部队共编7个团和一个保安连、一个留守团。第一团,团长刘俊峰、政治部主任李云峰;第二团,团长王秀芝、政治部主任关树勋;第三团,团长张传福、政治部主任张兴德;第四团,团长戴鸿宾、政治部主任马德山^①;第五团,团长郭复东、政治部主任周云峰;第六团,团长黄名新,政治部

^① 马德山(1911—1938),原名金乘浩,朝鲜族。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联第六军第四团政治部主任、第一师师长等职。1938年在战斗中牺牲。

主部尹锡昌;第七团,团长王居选、政治部主任吴玉光^①;保卫团(即留守团),团长耿殿君。全军 1500 余人。抗联第六军的编成,使松花江下游的许多抗日武装纷纷向抗联第六军靠拢,抗日统一战线日益扩大,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向周边各县更广大的范围发展。

1936 年 9 月后,抗联第六军部队在军长夏云杰率领下为冲破敌人“大讨伐”,策应第三军主力部队西征,采取避实击虚的方针与敌人周旋。1936 年 10 月初,为打退一支自汤原县城出发进入石场沟游击区骚扰的日伪军联合“讨伐”队,第六军第四团在团长戴鸿宾指挥下,埋伏于敌军来路的山地密林中隐蔽,待日伪军骑兵快速通过后,截击了落在后面步行的伪汤原县治安队,歼敌 20 余人,并迅速脱离战场转回亮子河后方基地。第五团在团长郭复东指挥下,在太平川、景阳屯一带配合中共格节河区委开展反集家并屯斗争。10 月中旬,军长夏云杰率领第二、第三团渡江南下依兰、桦川开展游击战争,借以调动对汤原游击根据地集中进攻的敌军,并支持了依东西湖景游击根据地群众的抗日斗争。10 月 18 日,第六军一部袭击桦川县黑通屯伪警察所,击毙和活捉伪警 10 人。初冬,夏云杰率部返回汤原老游击区后,又继续派出第一、第四团去依兰、桦川、富锦,巩固和扩展游击区。11 月 20 日,夏云杰在后方积极筹备给养和服装,欲图转战佛山时,在汤原西部丁大干屯突遭敌人伏击,身负重伤,于 1936 年 11 月 26 日为国捐躯。

1937 年 2 月 2 日,根据第六军不断发展的实际,为加强对抗联六军的领导,中共下江特委和抗联第六军在汤原格节河后方根据地召开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出席会议予以

^① 吴玉光(1909—1938),生于朝鲜庆尚北道,朝鲜族。1933 年参加汤原反日游击队。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四团政治部主任、东北抗联第六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8 年在战斗中牺牲。

指导。会议决定由临时省委提名的戴鸿宾任第六军军长；确定由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形成决策会议，解决重大问题的集体领导机制；决定军队扩编，健全各级党委并加强领导；决定改善军民关系，加强军民团结，加强第三、第六军团结，以及同其他各抗联部队的团结。会后第六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有7个团改编为4个师。第一师，师长马德山、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第二师，师长张传福（养病期间由陈绍宾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兴德；第三师，师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云锋；第四师，师长戴鸿宾兼任、政治部主任吴玉光。军部保安连扩编为保安团。之后，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第六军以第一师和保安团东征富锦、宝清，继续拓展新游击区，另以第三师准备继第三军西征之后继续西征。

1937年3月，军长戴鸿宾率保安团和第一、第二师跨江至依兰、桦川，并将第二师留在这一地区坚持战斗，第一师和保安团继续东征富锦、宝清。途中首战葫芦信子，歼敌20余人。继之将郭成伪自卫团缴械，获枪20支。在宝清县城以南夹信子对敌战斗中，又缴获伪警察和伪自卫团40余支枪。3月中旬，转战至富锦县境内，第一师即在此地区继续活动。军部直属部队返回汤原，途中在依兰暖泉子将张广文伪自卫团缴械。3月22日，梧桐河矿警队80余人，在打入其内部的共产党员马克正、陈芳钧的领导下举行反正起义，被第六军编为第四师第二十九团。

1937年2月8日，留在汤原的第四师袭击汤原城外的伪警察训练所，缴获服装289件。准备西征的第三师自2月即开始为筹集装备、给养积极开展活动。该部于2月12日冲入夏家大院，缴获驻守的伪警察、自卫团50余支枪、大量粮食和70匹马。16日，在于家沟歼灭一支日本关东军测量队23人，缴获轻机枪、掷弹筒各一和步枪10余支及地图和测量仪器等。3月22日，再袭汤原伪警察训练所，缴枪

20余支、警服200余套。第三师从此由步兵改装成骑兵,组成先遣队。4月初,自依兰韩家屯、苏家屯出发西征。

1937年4月,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根据义勇军中侠、助国的要求,将其编为第六军第五师。刘振声任师长、邱金海任参谋长,将第一师高玉斌调任该师政治部主任。该师主要活动在松花江北绥滨县境,隔江与第一师呼应。此时,第六军部队达到2000余人。

1937年5月18日,抗联第六军留守部队在军参谋长冯治纲指挥下进行了夜袭汤原县城的战斗。汤原县城是日伪在北满的重要据点之一,是此次北满五县“讨伐”军的重要集结地。早在5月初,第六军参谋长冯治纲便开始策划袭击汤原,以牵制敌人的“讨伐”兵力。县城内驻有伪军第三十八团、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大队。参加攻城的部队为留守汤原的第六军第四师和西北沟、太平川一带的农民自卫队共300余人。冯治纲事先通过早已打入伪警察署内部的抗日救国会会员王福林、李居善等人,查明城内敌情,得知伪军第三十八团已出城换防,伪警察大队也出城“讨伐”,城内敌军空虚,是攻城的最佳时机,迅即制定了攻城作战计划。5月17日,攻城部队从距汤原县城北9公里集结地出发,乘夜逼近县城。5月18日凌晨1时30分,在值勤警察、抗日救国会员的接应下,攻城部队自城东北角突入城内,首先解除了北门派出所十几名伪警察的枪械,然后兵分三路按预定方案作战。一路奔赴日军守备队,用两挺机枪火力封锁其出入口,使日军龟缩营房之内,不得出击;一路直冲伪县署和伪官员宿舍,剪断了伪县公署围墙上的铁丝网和电话线,解除伪警卫队武装,击毙县参事官宫地宪一、伪警务局指导官齐藤宽、警士竹木福太郎等进行顽抗的日伪警察12人。第三路部队由抗日救国会员王福林做向导,里应外合,进攻监狱和拘留所,营救出中共格金河区委书记张士俊等70余名抗日群众和无辜者。然后砸开武器库,收缴迫击炮3门、炮弹96

发、轻机枪3挺、各种枪67支、子弹3.5万发,另缴战马35匹。抗联战士牺牲一人。拂晓,攻城部队交替掩护撤退,并连续击退城内日军守备队的反扑,击退驻太平川日军久保部队和驻黑山伪军的追击,胜利返回后方根据地。第六军夜袭汤原的胜利是继第三军攻占佛山县城后的又一次攻城战斗的胜利,此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松花江下游抗日军民的抗日热忱。

不久,第六军第三师西征先遣部队到达绥棱县境。开始时,因敌情不明,先遣队不断遭到日伪军警的袭击。第三师为摆脱困难局面,于1937年5月,主动攻袭驻在半截楞的日本“讨伐”队,并以少量伤亡取得了击毙日军30余人的胜利。6月,强渡通北县南北河,同第三军一部会合,继而第三、第六军部队联合进攻日本木业采伐作业区,缴获一批粮食和物资。随后,第三师即以海伦郭炮营为基地开展活动,发动群众,筹备给养,为第六军后续西征部队准备物资等条件。

第六军部队从1937年1月至4月,同其他抗联部队一起,对敌作战206次,歼灭大批敌人,部队在战斗中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使抗联第六军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四、抗联第四、第五、第七军编成,吉东地区游击战的开展

(一) 抗联第四军的编成

1936年1月下旬,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率警卫部队参加汤原会议后,返回松花江南岸方正县大罗勒密后方基地。不久,中共勃利县委通知李延禄赴勃利县委所在地,告之中共吉东特委有紧急事情传达,李延禄即率领第一团前往,令军部警卫部队留守大罗勒密后方。1936年3月15日,中共勃利县委和第四军领导干部会议在勃利县大青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县委书记李成林、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第一团政委李守中外,还有自苏联学习归国不久的李

延平。原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值开展向国外以及国内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抗日斗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罪行的工作,以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国内的支援。因此需要由东北抗日前线的抗日将领到国外和内地,通过亲身抗日的经历进行宣传 and 联络工作,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1936年2月初,李延平自苏联返回时,便带回了中共代表团关于由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等人出国工作的要求,并向中共吉东特委作了传达。中共吉东特委决定由李延禄首先出国,在出国期间由李延平代理第四军军长职务,并派交通员迅速将李延平送至勃利县委处,传达这一决定,这便是这次会议召集的原由。

这次会议还特邀同在勃利活动、与第四军时常协同作战的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郝贵林、政治部主任金策一并参加会议。该师部队于1935年11月同第三军军部在勃利县青山里九龙沟分开后,便一直按照军长赵尚志的有关指示行动。这些指示涉及在松花江南岸和牡丹江以东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扩大部队,并打通与抗联第五军东征部队的联系,帮助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发展等内容。1936年1月,第三军第四师东去袭击由日本开办的七台河煤矿。尔后,第三军第四师即同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时分时合,共同打击敌人。

大青沟会议上,由李成林传达了中共代表团和吉东特委令李延禄去莫斯科,从事向国外和国内宣传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并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并告李延禄迅速动身自密山出境。同时,根据中共吉东特委的指示,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仍由李延禄担任,暂由李延平代理,黄玉清任政治部主任,胡伦仍任参谋长。部队编为3个师:第一师,师长李延平兼任、政治部主任李守中;第二师,拟由在饶河活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编成;第三师,师长李天柱、政治部主任邓化南。会

议根据中共吉东特委在不久前的指示,决定第四军军部和第三师与第三军第四师协同前往宝清、富锦,会合在饶河、虎林活动的第四军第四团,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

会后,1936年3月25日,由李延禄统一指挥第四军、第三军第四师联合夜袭石头河子金矿,为李延禄壮行。这次战斗,歼敌60余人,缴获各种枪70余支、子弹1万余发,军马100余匹。随后,李延禄告别部队,由李延平率一支小部队护送至密山过界赴苏联。以后,李延禄到达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从事国际宣传,并协助《救国时报》进行一段工作,再被派往关内进行宣传东北抗日斗争并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从此,再未返回东北抗日战场。

此后,第四军和第三军第四师部队为准备东征宝清、饶河,充实部队力量,收集装备和给养,在勃利、密山一带协同开展游击战。4月,李延平率军部40余人小部队欲西去方正、通河,联络尚留该地活动的该军第二团和军部警卫部队,使之回归第四军。但行至勃利西北大四站时,与日军一支“讨伐”队遭遇,因敌众我寡,地形不利,随同部队一起行动的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守中和第三师政治部主任邓化南不幸牺牲,代理军长李延平等9人负伤,部队脱离战场后返回该军第七团关门砬子密营休整治疗。第三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便到第四军军部,帮助第四军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此时,第三军第四师在七台河、保安屯、小五站、十二甲一带活动,附近一些抗日山林队主动与第四师联合对敌作战,或加入第三军部队,使第四师部队有了相当发展。1936年4月,第四师在罗圈河同伪军第四军管区的第二十九团赫魁武部队发生激烈的战斗。5月17日,在勃利县保安屯与伪警察队的战斗中,击毙日本指导官和警察小队长各一名,缴获敌人许多文件。

1936年5月18日,李延平率第四军、郝贵林率第三军第四师共

同打开了一向仇视抗日联军的偏脸子关家油房,迫使其交纳抗日捐款 8000 元。23 日晚,两军又共同攻击和伏击驻桃山的日伪军“讨伐队”,击毙敌人 20 余人。下旬,第三军第四师和第四军第一师一部,共同进入密山县,欲同第五军第二师的北征部队进行联络。但第五军部队却因在密山黄泥河子同日军作战失利,业已撤至穆棱活动,未能如愿。此时,第四军和第三军第四师又得知驻在密山县哈达河的伪军第二十六团内部不稳定的情况,遂派人打入该部进行策反工作,准备策动哗变。为了使哗变成功,打入该团的兵运工作人员便派出 3 名欲反正的士兵携枪投奔第四军和第三军第四师部队报告情况。5 月 29 日,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和第三军第四师师长郝贵林便以 3 名前来报告的士兵为向导,率两军 150 余人急行军 120 余华里奔袭哈达河,当日午夜包围了伪军团部。伪军苏团长试图抵抗,当即被击伤被俘。准备哗变的伪军士兵和兵运人员迅速行动,打开军械库,收缴枪支子弹。这次战斗,缴获各类枪械 150 余支、子弹 10 余箱及许多被服。反正士兵 40 余人参加了第三军和第四军部队。

不久,第三军第四师部队在密山和勃利活动期间,经穆棱和勃利县委交通关系接到来自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交来的《中代信》。第三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金策派人赶赴汤原,将这封信交到第三军司令部。

当时,第四军第一师第二团部队在团长张奎率领下,正与第三军一部在牡丹江右岸开展游击活动。1936 年 4 月,两支部队截击了一支向三道通调动的伪军,打死敌 10 余人。之后,第四军第二团向江西转移。时值春季,牡丹江已开江,仅有一只小船摆渡。当部队业已渡到对岸,但团长张奎等三人乘坐的最后一船在江心遇险船翻,张奎等人溺水牺牲。该团在新任团长郑洪涛的率领下坚持战斗。5 月,该团在依兰县黑背伏击了一支日军“讨伐”队。7 月,又返回林口县刁翎附

近收缴了一支曾杀害中共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的土匪队,处死了两名凶手。同年秋,第四军第二团部队因同第四军军部失去联系,又值勃利县委书记李成林牺牲,与勃利县委的联系也中断,便又重返方正县大、小罗勒密,欲同留在通河、大罗勒密的第四军留守部队会合共同活动。此后,第四军第二团便同第三军第一师共同活动在大罗勒密一带。

1936年6月20日,第四军留下该军第一师第一团在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领下,继续坚持在勃利、密山、依兰一带活动,并与该军第二团和抗联第五军积极取得联络。第三军第四师留下团长陆希田带领一个团,在勃利等地活动。第四军军部警卫部队和第七团由李延平率领、第三军第四师由郝贵林、金策率领,共同向宝清、富锦东征,欲会合在饶河地区活动的业已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部队,共同开辟松花江南岸、乌苏里江左岸的广大抗日游击区。7月15日,第四军、第三军第四师部队到达宝清兰花顶子。因两军初到,民情不熟,收集给养一度发生困难。部队在宝清积极打击伪警察和大排队的同时,便广泛向部队所到地方的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李延平带第四军部队在宝清西部梨树沟活动时,该地伪警察和大排队前来攻击,第四军部队边组织反击,边在阵地前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向伪警察、大排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使来袭者不攻自退。8月5日,第四军一部和第三军第四师联合收缴了宝清七区各大排队武装,并经过耐心宣传,争取了许多有爱国心的乡绅的同情和支持,得到他们的捐款、捐粮。从此宝清五、六区的民众抗日工作得到开展。8月20日,第三军第四师在郝贵林、金策率领下,由宝清向饶河东征,准备协助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第四军继续在宝清、富锦开展抗日工作。军部派出干部和战士到李金围子、杨荣围子、下道口和三道岗一带,向群众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开

展反对日伪“集家并屯”等斗争,得到群众的热情拥护,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加入第四军抗日。与此同时,第四军在富锦对不少山林队开展政治工作,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当即有刘振国、唐青山“九洲”、“中央”、“老来好”等山林队武装被编入第四军,成为该军第四师,由刘振国任师长、朴德山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留在勃利的第四军第一师第一团在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领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不久,还将已收编的一部山林队编为第三团,恢复了该师第三团的建制。同年冬,第一团袭击勃利县保安屯自卫团,缴枪 19 支。随后又在青龙沟伏击一支日军“讨伐队”,毙敌 5 人,伤其 4 人。

经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第四军在宝清和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在宝清李金围子西南的大叶子沟修建了后方密营,设立了被服厂。同年冬,第四军军部和警卫连在大叶子沟密营进行冬季整训。学习军事、文化,并围绕“民族解放战争和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讨论,提高政治觉悟。代理军长李延平亲自讲侦察和绘图课。经过整训,部队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1937 年春节前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从勃利来到宝清县大叶子沟四军密营,向军长李延平汇报工作,并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宝清和富锦地区的抗日活动。两人决定,为保证富、宝地区的通路,便于在两县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应当首先拔掉与抗日部队为敌的杨荣围子以西的方家地主大院。为此,黄玉清提出了智取的方案:假扮日军,骗开方家大院。李延平首先派人了解日军出动的规律,接着挑选了 40 名战士进行训练,黄玉清则把第四军军部的朝鲜族战士挑选出来参加行动。大年三十上午,黄玉清率部出发,晚上到达方家大院附近。战士们开始大声用朝语说话,马蹄声、喊话声,惊动了方家大院里的人。这时,部队到达大院门口,声称“皇军”要进院搜查“马胡

子”。方家见“皇军”到来,不敢怠慢,赶快开门迎接。黄玉清布置一个班在门口警戒,自己率领队伍迅速进入院中。部队占领了大院四角的炮楼,搜索了全院,收缴了8支步枪,然后亮明抗日联军的身份。老方家无奈,自认罚款,并承诺以后不再与抗日联军为敌,要与抗日联军合作。这次行动不仅教训了方家,也震动了这一带的其他几户地主乡绅,使他们也纷纷向抗日部队靠拢,主动缴捐缴粮。到了1937年4月,方家大院成为抗联第四军由宝清前往富锦的中转站。杨荣围子的伪自卫团也主动撤走,抗联第四军在杨荣围子、李金围子一带建立了反日会等群众组织。这里成为新的抗日游击区。

1937年春,抗联第四军军部对全军的军事活动作出了新的部署,确定以宝清为中心,在勃利至同江各县的新老游击区积极开展游击战斗。第一师仍在勃利、密山、依兰老游击区战斗;第二师在富锦、桦川两县活动;第三师活动于勃利、富锦、宝清等县;第四师在富锦、同江等县游击作战。第四军军部在宝清保持与各师部队的联络,加强对各师的领导和指挥。此后,第四军各师分别积极展开游击战斗,予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3月,第二师师长李天柱率第五团部队进攻石虎山矿伪自卫团,缴获长短枪33支和子弹一批。5月,抗联第六军一部和抗联独立师相继到达富锦、宝清与第四军部队会合。第四军第四师与独立师便共同在富锦一、二、三区平原地带开展游击活动;第四军第二、第三师与第六军一部联合在宝清县城附近的各区活动,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7月,第四军与到达宝清的第五军第三师一部会合,共同开辟宝清县城附近四区的抗日工作,宝清县城敌人惧于抗联第四、第五军军威,未敢出城作战。同年夏,第四、第五、第六军联合在二道山子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伏击战。首由第六军部队以迫击炮轰击宝清县城西北部的凉水泉子伪警察所,诱使宝清县城敌人出动增援。当敌军途经二道山子时,事先埋伏在此地的抗联第四、第五军部

队立即突然开火,敌军丢下 20 余名死伤者迅即逃归宝清城内。这次伏击战斗,抗联部队缴获轻机枪一挺和步枪多支。

与此同时,第四军第一师第三团攻下勃利县七星屯伪自卫团防所,打开青龙山伪警察所,俘虏伪自卫团长和伪警察等 12 人,缴获步枪、子弹和粮食等物资,使勃利县城附近的小五站、青龙山等一向敌人统治严密的地区,变成抗日游击区。1937 年 3 月,第四军第一师第二团在配合抗联各军进攻依兰县城后,又随同第三军第一师进攻由家屯伪警察所和蚂蚁河伏击一支日伪军“讨伐队”,均获胜利。6 月,经中共吉东省委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协商议定,第四军第一师第二团归还第四军建制。

1937 年上半年,抗联第四军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和抗联第三、第五、第六军以及独立师的协助下,从 1936 年夏的暂时挫折中恢复过来,并在战斗中得到发展,成为吉东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二) 抗联第五军的编成

1936 年 4 月,日伪当局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公布后,吉东地区即被敌人纳入“治安肃正”重点区域。这里属吉林省东部与苏联远东边疆区毗邻的边境地区,也是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二师等抗日部队活动的区域。因此,日本关东军将这一地区划为“东防卫地区”,包括琿春、和龙、延吉、汪清、牡丹江、东宁、宁安、密山、穆稜、勃利、宝清、富锦、饶河、虎林等县,由设在牡丹江的日本关东军第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统一指挥“治安肃正”工作。同年秋,又在牡丹江成立伪第六军管区,配合日军负责密山至延边地区的“讨伐”行动。该军管区有伪军 4 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旅,分驻穆稜、密山、宁安和延吉。自 1936 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吉东地区的党组织和抗日军队所承受政治和军事压力已是十

分严重。

1936年1月20日,正值春节前夕,第五、第二军党委和军队领导干部在镜泊湖北部举行特别会议,根据《八一宣言》精神研究了两军面临的斗争形势、军队整顿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第五军除接受中共东满特委和第二军委托,承担了指导第二军第二师部队并与之在绥宁和汪清地区协同作战的任务外,还决定对第五军本身进行整顿,即充实第一师,使之成为该军的基干部队和主力部队;重新整顿补充遭受敌军重创的第二师,为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准备条件。关于部队今后的发展方向,会议决定:第五军第二师部队仍应向东部和北部的穆棱、密山、勃利发展,力图与第三、第四军打通联系,协同战斗;第一师部队继续与第二军第二师坚持宁安老游击区的战斗,力求打通与第一、第二军和第三军珠河部队的联系。

1936年2月5日,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自苏联辗转回国,到达宁安镜泊湖北湖头第五军军部,并随即举行会议,参加者除周保中等第五军军部领导人员外,还有陪同魏拯民一起到来的宁安县委书记张中华和王松柏等人。魏拯民向中共宁安县委和第五军党委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扩大东北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统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撤销满洲省委、组建四个省委等指示。魏拯民同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共同研究了今后第二军第二师、第五军共同建立联合指挥部协调对敌作战、由周保中协助指导第二军第二师在绥宁地区和汪清的活动,还特别研究了因东满特委与海参崴联络站的交通关系被破坏后,由中共吉东特委和第五军统一负责建立并保持吉东、东满、南满党组织和第一、第二、第五军今后与海参崴联络站之间的交通联络关系,以便密切沟通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2月9日,魏拯民与王松柏等前往南湖头

第二军部队。

1936年1月29日,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罗英到吉东特委汇报关于欲将第三军第四师并入第四军,藉以加强第四军的问题,但他在汇报之后未及时离开牡丹江,并擅自违犯纪律去市内看戏,被第四军第三师投敌的小白龙部下发现,于2月12日遭逮捕后叛变,致使特委组织部长孟涇清于2月16日被捕并惨遭杀害,吉东特委遭到破坏。特委代理书记李范五等迅速离开牡丹江,去海参崴汇报未归。第五军同吉东特委失去了联系。

1936年2月下旬,在周保中的领导下,第五军根据《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在宁安三道河子将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正式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未到职)、参谋长张建东。该军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李荆璞、副师长姜振荣、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参谋长张镇华;第二师师长傅显明、政治部主任王光宇、参谋长陈翰章。此外还有军部警卫营、教导队、妇女团。全军共700余人。

1936年2月中旬,抗联第五军第一师部队在该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的率领下,自额穆地区返抵宁安县镜泊湖北部莲花泡一带休整,准备按军部计划向西北山进军,以同在该地活动的由山林队改编的第二师第六团会合,扩大抗日游击区,继而向苇河、五常发展,与第三军珠河部队打通联络。

时值农历正月,这支部队战士多为宁安当地的子弟兵,各家农户欢迎抗联战士远征归来,纷纷盛情款待,部队对敌情估计不足,警戒松弛。2月27日夜,驻东京城的日军第四守备队一部和伪军警备旅第二十七团一个营向莲花泡开进,伪军骑兵第三十三团自上马莲河向镜泊湖瀑布以北地区运动。2月28日拂晓,敌军从东部、北部突然发动进攻。第一师师长李荆璞命令第三团正面阻击,第二团从右侧

攻击。各团投入战斗后曾多次打退敌人的冲锋。双方激战至下午2时。敌人竟因久攻不克而毫无人性地发射毒气炮弹。战斗中的第五军指战员均感头昏脑胀,发生中毒现象。师长李荆璞立即下令第二团一部由该团第四连马连长指挥坚持战斗,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在部队突围后,第二团第四连马连长等19名战士陷入敌人包围之中。马连长命令战士立即停止射击,隐蔽在灌木丛中。敌人以为抗联部队业已将子弹打光或全部被毒气熏倒,便开始逼近抗联阵地,搜索战场。第四连指战员却突然在掩体后面,将各自所剩下的子弹猛射正在搜索前进打扫战场的敌人,日军指挥官中佐森田首先被马连长击中毙命,日伪军纷纷中弹相继倒下。敌人恼羞成怒,立即将所有的炮弹、子弹一齐射向抗联战士的阵地。马连长及全部战士壮烈牺牲。莲花泡战斗,击毙日军中佐森田以下日伪官兵70余人,击伤20余人。抗联第五军第一师也出现重大伤亡,计牺牲78人,负伤45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三分之一,失去步枪60支、轻机枪3挺,子弹大量消耗。敌人因死伤众多,竟肆意毁坏抗联战士尸体,以发泄其兽性。结果,在日伪军撤走后,地方救国会收集尸体时,只发现42具抗联烈士遗体并予以埋葬。这就是后来被人民传颂的“莲花泡抗联42烈士”。

莲花泡战斗后,第五军军部根据敌人调集兵力追击抗联第五军和第二军第二师部队、第五军第一师又刚遭重挫等状况,决定部分修改原订作战方向,避实就虚,避开在宁安的日伪统治中心,向敌人军事薄弱地区发展,将全军的主要活动区域逐步转移到中东铁路东线(哈尔滨至绥芬河段)以北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并同活动在密山、勃利一带的第三、第四军取得联络,协同战斗;暂时放弃原拟第一师西征苇河、五常会合第三军的计划,集中第一、第二师主力部队东征和北进;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警卫营、教导队、第一师第三团、第二师第六团和第二军第二师部队,继续坚持以宁安老游击区为中心的东

宁、额穆、敦化和宁安西北山地区的斗争。其中,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和第二军第二师第五团在额穆、敦化和镜泊湖南湖头以及沿湖西部活动;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在东宁、穆棱一带活动;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在军长周保中率领下,在宁安南部和东南部老游击区根据地一带活动,协调指挥各部队的战斗。

根据这一决定,在对该军第二师部队重新整顿补充后,立即由第二师师长傅显明、政治部主任王光宇率该师第四、第五团,沿1935年第五军东部派遣队的行动路线,自宁安出发,向穆棱、密山、勃利地区进军。1936年3月,第二师第四团在师长傅显明率领下经穆棱进入密山县境,因地形、民情和敌情不熟,在平阳镇附近黄泥河子遭日军突袭,傅显明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这支部队立即折返穆棱地区。政治部主任王光宇代理师长指挥部队,另由中共穆棱县委临时负责人刘曙华^①任政治部主任。4月,第二师一部在穆棱县北部八面通一带,曾与一支20余人的“讨伐”队交火。5月19日,该部袭击敌人一个防所后撤出战斗,途中突遭敌袭击,战斗中,敌死伤9人,我亦有伤亡。5月20日,第二师第五团,在穆棱北部袭击一列敌军列车,击毙日军18人,缴获战马90匹。5月25日,又在穆棱车站北部三道河子颠覆并袭击第2号列车一列,击毙日军少佐、大尉等6人。

第五军第一师第一、第二团在莲花泡战斗后,根据军部指示迅速向东北部转移。1936年3月,该师到达穆棱县境,经过整顿,并取得穆棱县委的支援,兵分两路分别开展游击战斗。其中,第二团在磨刀

^① 刘曙华(1912—1938),又名李明学,化名老曹,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曾在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学习。1935年回东北后,历任中共密山县委书记、穆棱县委书记、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道北特委委员、吉林省委委员等职。1938年8月被叛徒杀害。

石东部利用中东铁路上盘山坡道上升的地形将道轨破坏,颠覆敌人军用列车一列,缴获一批枪支、子弹。第一师部队在八面通、小金山金矿、林口附近的黑老婆沟等地同日伪军战斗多次,歼敌一批,共缴获轻机枪4挺、长短枪200余支和许多子弹以及70余匹战马。在转战中,地方党组织动员了不少青年农民参加了第一师部队,使部队迅速恢复了原有规模。

1936年4月,中共吉东特委已恢复工作,由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的前特委书记吴平以及李范五商妥,指定穆棱县委书记宋一夫任特委临时书记,恢复吉东特委组织。第五军在中东铁路北部战斗的第一、第二师部队在中共吉东特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代表团海参崴联络站指示成立了北征部队临时指挥部,加强对北征部队军事上、政治上的领导,以解决因第五军军部仍在中东铁路南部的宁安县而不便于指挥的问题。同时决定由第一师师长李荆璞、吉东特委临时书记宋一夫率领第一、第二师各一部在穆棱、下城子一带开展活动。第五军道北主力部队又兵分二路向密山、林口、勃利、依兰发展。其中第二师部队由师长王光宇、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率领向密山、勃利伸张,以求联合祁致中和谢文东两支部队,并争取将其改编为抗日联军部队;第一师一部在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率领下向林口、勃利进军。7月23日,第一师一部在依兰刁翎郝家岭同日军200余名发生战斗,歼敌15人。

为策应第一、第二师主力部队向道北转移,第五军留守部队和第二军第二师在周保中、柴世荣的指挥下,以宁安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作战。1936年2月,军部教导团袭击卧龙屯“集团部落”,将该地伪警察所和自卫团缴械,缴枪20余支。接着,该部又击破马莲河“集团部落”,缴获伪自卫团防所步枪15支、土枪10余支。1936年3月4日,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团在宁安县三道河子将伪

军警备旅第二十七团一个连缴械,缴获轻机枪 2 挺、三八式步枪和手枪 56 支、子弹 1.1 万余发、军服 173 套。该连连长和 9 名士兵自愿参加第五军抗日。3 月中旬,抗联第二军第五师第四团在宁安县东南团山子,同伪军 100 余人发生战斗,歼敌 40 余人。随后,又在苇子沟反包围作战中歼敌 40 余人。3 月 24 日,该团一部在汪清县骆驼山击溃日军古贺部队一部。此前一天,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团袭击了图们至牡丹江铁路三岔口车站。3 月 30 日、4 月 1 日,第五军军部教导队先后在横道河子、团山子附近,与自卢家屯出扰之敌多次发生战斗。4 月 8 日,第五军、第二军各一部,在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指挥下,再次夜袭卧龙屯“集团部落”,解除伪警察和自卫团,缴枪 20 支、子弹 3000 发和粮食一部。5 月 18 日,第二军第二师一部与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在镜泊湖南湖头同日军佐藤部队发生战斗,击毙队长佐藤留次郎以下官兵 10 人。5 月 27 日,第五、第二军各一部,在宁安烟筒沟伏击一支伪森林警察队,击毙 4 人,俘虏 31 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 27 支。6 月初,又在二道河子影壁砬子附近,击毙日伪军多人,缴获 12 车给养物资。6 月,第五军军部教导队在三道河子又将一连伪军缴械,共获轻机枪 2 挺、步枪等 100 余支、子弹 4 万余发。

此时,日伪军对宁安地区第五、第二军部队的“讨伐”显著加剧,仅 1936 年 5 月至 7 月期间,向第五军军部的直接袭击即相继发生 9 次之多。因此,第五军军部审时度势,决定:军部教导队、警卫营一部和第一师第三团、第二军第五师(原第二师)部队,继第五军第一、第二师之后向中东铁路道北逐步转移,暂避敌人锋芒。8 月 27 日,第一师第三团向北转移途中,在图牡铁路的老爷岭车站附近二道河子,没收敌人一批粮食。9 月 5 日,第五军军部警卫营一部、教导队一部自杨胖子沟出发东进。不久,同第二军第五师等部队先后到达中东铁路东线宁安、穆棱边界一带,重新调整第五、第二军的部署和活动

方向。

此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方面作出的对第五、第二军第五师活动的部署过于分散,对已到达中东铁路北部的第五军第一、第二师的活动不利。对此,第五军军长兼党委书记周保中认为应慎重考虑。因为尽管敌人此时集中兵力欲寻歼抗联第五军,部队不得不暂时转移到中东铁路以北地区,与第三、第四军部队取得联络,但非长久之计。如果将中东铁路道南的部队尽行向道北集中,则“不但受边境日贼重兵之易于压迫,恰又中了日贼‘聚而歼之’目前深心打算之奸计。”第五军部队不能在松花江、牡丹江汇流的方正、依兰、勃利地区久留,应时刻考虑今后重返宁安老游击区活动之可能。同时,宁安老游击区,尤其宁安与额穆边界的南湖头地区,已是第五、第二军以及第一军联络的通道和枢纽。为保障第五、第二、第一军、吉东、东满、南满党组织与海参崴方面联络的通道,也不能因环境险恶与困难增加而停止抗联第五、第二军在额穆、宁安地区的斗争,更不能轻易从根本上放弃宁安老游击区。因此,第五、第二军留在宁安之部队,应以执著之决心、以适当之兵力,继续支撑宁安、额穆等地的游击活动;其余部队则可随时分散或集结于南至东宁、汪清边境,北至图佳铁路两侧的五虎林、磨刀石、穆棱一带进行游击战。道北部队顺利发展时也可跟进,保持与北征主力部队之联系,必要时还可沿北满铁路东西方向运动打击敌人。

在此期间,1936年9月12日,以抗联第二军第五师第四团为主、第五军警卫营一部,联合山林队海山部共400余人,在穆棱与磨刀石之间代马沟附近破毁中东铁路,颠覆日军970次列车一列,伏击乘车的一支日军工兵部队,经数小时激烈战斗,毙伤大批日军,炸毁许多工程器材,缴获一批枪支和物资。事后据目击民众报告,共击毙日军90余人,击伤35人,击毙战马70余匹。自4月至9月,第五、第二军

部队在中东铁路东线先后颠覆列车3次,使敌人遭受重大打击,抗联部队士气振奋,民众为此到处传颂抗日联军的重大胜利。

1936年9月24日,经过事先酝酿,在宁安县东北部花脸沟附近泉眼头,由周保中、张中华主持,召开了第五军党委、第二军第五师党委和中共宁安县委、中共东满特委联席会议,即泉眼头会议。与会人员有周保中、张中华、王润成、陈翰章、侯国忠、李芳等人。会议决定,周保中率第五军教导队北进,加强军部党委对第一、第二师部队的领导。第五军警卫营一部、第一师第三团、第二师第六、第七团和第二军第五师部队,仍留在中东铁路南部为留守部队,坚持道南老游击区的斗争,保持与中共南满省委和第一、第二军的联系。会议决定第五军留守处主任由张中华担任,第五军军部秘书金石峰为副主任。会议还根据海参崴联络站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共道南特委,统一领导绥宁、东宁、宁安和东满敦化、额穆、汪清各县党组织和第五、第二军留守部队的抗日斗争。由张中华任特委书记,陈翰章、王润成、金石峰、钱义、苏维民(田仲樵)、李芳等为委员。

1936年9月28日,在张中华率领中共道南特委和第五军留守处人员、第五军警卫营一部去宁安镜泊湖南湖头之后,周保中率军部教导队也出发东进。部队经七河东南烟筒砬子、穆棱附近的陡沟子、代马沟,抵柳毛河地方,同山林队九彪部会合。经周保中的说服教育,双方达成联合抗日协议。之后,经新安镇附近杨家油房、小碾子沟,于10月10日同第二师第四团一部会合,10月17日又与由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派遣前来迎接的军部警卫营一部会合。从而得知柴世荣所率第五军一部已到达刁翎附近;第五军第一师一部在该师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率领下北征依兰等情况。10月21日,周保中率部队再经小龙爪沟、暖泉子到达距林口镇约10余公里的二道河子北岔设置临时办事处。因气候日益变冷,部队缺衣少食,遂即迅速派部队去四道

河子沟里杨家窝铺修筑军部密营、后方医院和被服厂、印刷所,收集棉花、布匹等物资,赶制部队过冬的棉衣,同时收集粮食和给养,使之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

为扫清后方基地周围的敌军据点和收集部队给养物资,第五军和第二军一部,立即投入了对敌战斗。1936年11月4日,第五军教导队一部在万龙沟遇敌,在毙伤日军两人后,部队诱敌至杨木背设伏袭击敌军。敌军被击毙10人、伤7人,教导队牺牲、负伤各一人。11月13日,军部教导队一部在林口附近筹集给养时,遭遇日军袭击。战斗中,毙敌13人、伤其数人,教导队亦牺牲2人、负伤2人。此时,第二师第四团部队在刁翎以南的大盘道,利用有利地形多次伏击日伪军警部队获胜。11月5日,该团在大盘道伏击一支伪警察骑兵队,击毙伪警察3人,伤5人,其余警察未敢应战驱马而逃。11月9日,该团又在大盘道设伏袭击日军中村守备队,仅半小时战斗,日军死伤9人,其余36人败走。这次战斗,共缴获军马28匹、无线电台一部、子弹4900余发、伪币3763元、地图40余张等。11月21日,第二师第五团一部在西北楞附近与日军骑兵队发生遭遇战,击毙敌人17人、击伤7人。五团亦伤亡9人。不久,该部又在通沟与一支日军作战,毙伤敌约10人。11月27日,第一师一部在刁翎小盘道截击由伪军第二十九团武装护送的9辆运货车队,俘敌3人,缴枪3支、子弹300发,马57匹和3头牛及大量军需给养,解决了部队急需的补给。12月3日,由第五、第二军各一部联合第三军第四师一部在依兰前刁翎大通沟与日伪军“讨伐”队遭遇。抗联联合部队步、骑兵237人与日军“讨伐”队、伪军第二十九团200多人在大通沟缴战一昼夜,各自退走。抗联部队击毙日军8人、伪军2人,伤日伪军8人,缴获军马7匹、子弹500发。联合部队牺牲3人,负伤4人。

在此期间,第一师第二团和第一团一部根据道北特委、道北指挥

部决定,曾组成分遣队北征。1936年10月25日,该部又随同第三军西征,后根据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来信指示,于1937年2月7日,返回四道河子军部。第一师第一团另一部根据海参崴联络站的调遣和中共道北特委刁翎会议决定,由第一师师长李荆璞率领自1936年9月东去密山,欲在中苏边境恢复建立交通线,并过境联系接收苏联远东军方面允诺援助的物资,但被苏军解除武装,陷于极其艰难的处境。第一师第三团和第二军第五团在道北牡丹江两岸的游击活动也十分艰难,部队屡受打击。第二师部队第四、第五团部队分别活动在穆稜、勃利、依兰一带,无大发展。由于第五军部队长时期分散活动,领导干部之间难以互相沟通,因而在一些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行动不一致,军部难以掌握部队,部队战斗力难以充分发挥。

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对海参崴联络站方面在第五军主力部队北征期间,不通过第五军军部而直接经过中共道北特委调动第五军部队,造成军队过于分散的状况,感到不妥。认为第五军道北部队有集中整顿、统一党委领导、统一军事指挥和加强政治工作的必要。之后,周保中在取得中共道北特委的支持后,第五军军部和党委即调集部队向依兰县刁翎四道河子和林口等地区集中,开始进行必要的整顿工作。

在军队编制上,充实了军部机构,除军长、副军长、政治部主任依旧外,新任参谋长王效明(前参谋长张建东已特派上海进行对外联络工作)。军部设副官处,便于军部同各师、团部队、地方党组织、抗联其他各军、义勇军、山林队等进行密切联络,加强民众工作。第一师师长由关书范代理,第二师师长由王光宇担任,政治部主任由宋一夫兼,全军650人,略有减员。同第五军在一起活动的第二军第五师还有379人。

为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军、师各设党委或工委,团设

特支,连设支部。以支部为单位定期举行政治讨论会和批评会,每3天一次。政治讨论会由周保中和各师、团政治部主任作政治形势分析讲话,然后集体讨论,提高政治认识,并便于开展农村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批评会,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正气,改正缺点,增强部队的团结。党支部注意培养和发展党员,使之成为连队的骨干。队内建立青年救国团,发展青年战士入团,还建立士兵反日会。部队除经常操练外,还在连队设立战术、射击研究班,每5天活动一次。队内识字班无敌情时每天一次,战士中有一半成员已认字很多,并能写简单的书信。队内还时常组织唱歌、跳舞,活跃部队文化生活,鼓舞士气。为保障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物质生活供应,除在战场或攻取敌人据点时收缴战利品外,还采取征收土地税、伐木税、车马税、鸦片税和反日特捐等方式补充部队活动经费和军需供应。在税源好时,部队指战员还可分到少许津贴。

总之,在中东铁路北部的第五军部队和第二军第五师部队经过整顿后,部队面貌发生了变化,官兵政治认识有所提高,军事纪律加强,士气高涨,战斗力增强,为今后的对敌斗争做好了准备。

宁安泉眼头会议后,在中东铁路以南老游击区的第二、第五军留守部队,在道南特委和第五军留守处的领导下,在宁安地区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早在1936年夏,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团便按该军第五师党委的决定,自宁安跨中东铁路北移,并由海林县五虎林三道关横渡牡丹江左岸活动。由于敌人的频繁进攻与封锁,部队活动困难,在黑牛边墙子战斗中,团政治部主任王松柏牺牲。不久,在海林车站附近的战斗中又负伤多人。后来,遇柴世荣率第五军警卫营一部北征,第二军第五师第四团、第五团中的两个连即随同一起向北进军,第二军第五团的其余部队仍在中东路道北、道南附近的牡丹江两岸展开游击战斗。

1936年秋,牡丹江伪第六军管区陆续集中伪军6个旅的兵力在绥宁和东满地区分别发动秋季“大讨伐”,企图一举消灭活跃在这一地区的抗联第五军和第二军第五师部队。在反“讨伐”作战中,第二军第五师师长史忠恒指挥所部在宁安南部图牡铁路老松岭附近,破坏铁路颠覆了一列军车,消灭许多日军官兵。战斗中,史忠恒再次负重伤,后因医治无效牺牲。之后,由第五师参谋长陈翰章任师长继续指挥战斗。11月,由第二军第五师和第五军各一部组成的中东铁路沿线活动部队,奇袭宁安与穆棱边界的大金场,歼灭敌守卫部队7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装备。1937年1月3日,第二军第五团在宁安县沙兰镇附近与日军川口部队发生战斗。1月11日,该团又在宁安县鹿道附近袭击了日军楠烟部队,毙伤敌人一部。1月5日,这支部队再次越过中东铁路到五虎林游击作战,同伪军多次交火,还袭击了碾子沟和小金山金矿,俘虏矿长(日本人)。

中共道南特委领导第五、第二军留守宁安等老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第五、第二军部队北征的军事行动。

据不完整的统计,1936年,抗联第五军北征途中与敌军作战40余次,毙伤日伪军警300余人,俘虏50余人。第五军亦有100余人的伤亡。

由于在吉东牡丹江下游地区不仅有救国军谢文东部、自卫军支队李华堂部、独立师祁致中部和第三、第四军各一部在这一地区活动,后来第五军军部及其主力部队也来到这一地区集中。这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遂迅速调动附近日伪军警部队频繁进行“讨伐”。抗联第四、五、七军,立即投入到反“讨伐”的战斗中去。

1937年1月27日,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得到地方抗日救国会的得知,驻勃利以西后刁翎的日军勒令当地农民准备200余张马爬犁,将于第二天向林口出动。于是柴世荣立即决定动员军部警卫营、第

二师第五团、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等第五军所有可能调动的兵力歼灭这部敌人。1月28日晨,第五军部队已埋伏在敌军必经之险要咽喉地带大盘道。此时正值农历大寒季节,气温零下30多度,寒风刺骨,冰雪覆盖大地。抗联伏击部队指战员,依靠顽强的毅力和消灭敌人的坚强决心,硬是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坚持到当日中午。这时,日军的爬犁队进入伏击阵地。早已怒火中烧的第五军指战员立即发起攻击。敌人遭到第五军部队的猛烈射击和手榴弹的轰击,日军立即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遍地,未死的敌人在毫无掩体的大道上伏地零星抵抗,但也无法挽回败局。第五军部队乘势冲锋下山扑向敌人,击毙了最后一名日军。日军数十人全部被歼。因为敌人从以往发生在大盘道的几次被抗日武装伏击的事件中已有教训,所以这次日军故意强行索要大量爬犁是虚张声势,借以欺骗抗联部队。但是,无论敌人如何狡诈,仍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第五军缴获枪支一批和大量物资,凯旋而归。大盘道之战,迅速传遍附近乡镇,人们欢欣鼓舞。

此时,第五军发现附近的日伪军毫无动作,龟缩据点未敢出击。其中,驻在距大盘道较近的前刁翎的伪军第二十六团一个营更显得惊慌不安。柴世荣当即决定乘胜扩大战果,一举消灭这批敌人。2月1日,柴世荣指挥第五军第二师夜袭刁翎:由警卫营和青年义勇军向驻后刁翎敌人进行防御,准备阻击打援,第二师两个团突击伪军分住的3个大院。在部队运动至敌驻军大院附近时,得到打入伪自卫团的地下工作人员送出的当夜口令和伪军官兵分布的准确情报,迅即捕捉了敌人的哨兵,巧夺了营部大院四角的炮台制高点,集中火力消灭了敢于反抗之敌。此前攻击东大院的部队,一枪未放俘虏了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唯有西大院的伪军被枪声惊醒,在几名日本教官和日本宪兵的胁迫下负隅顽抗。但大院已被完全包围,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在日本教官和宪兵被击毙后,其余伪军举手投降。经此次战

斗,击毙日本教官和宪兵 21 人、伪军官兵近 30 人,其余缴械被俘;缴获大量武器、子弹和粮食、军需物资。第五军仅 6 人负伤。2 月 22 日,第二师第四团又在刁翎南部小盘道伏击由林口北驶的一支日军汽车队,一举击毙击伤敌军 22 名。迫使余下的敌人乘车原路返回。2 月 26 日,第五军一部南移途中,又在大通沟同敌人发生遭遇战,歼敌 30 余名。

这时,正值周保中抵达已经编成的抗联第九军设在方正县洼洪的该军军部不久。鉴于日伪军当时对松花江、牡丹江下游三角地带抗日游击区、抗联各军后方基地加紧进攻的严重形势,及抗联各军内部所存在的问题急需解决,经周保中提议,并邀请在附近活动的抗联各军于 2 月 21 日在第九军军部洼洪举行吉东和北满地区抗日联军代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第八军军长谢文东、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和第三军代表、北满抗联哈东办事处处长李熙山等。会议共同研究、估量了敌人的“讨伐”形势,协调了抗联各军的活动区域和协商划分了各军税收区域、税收额度,议定了粉碎敌军“大讨伐”所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策略。最后经协商,一致同意共同进攻依兰县城,借以显示东北抗联各军联合对敌战斗的威力。

依兰是松花江下游的古城,是扼守松花江上游与下游水上通道的重要据点,也是联结江北汤原、通河与江南方正、依兰、勃利等抗日游击区和抗联各军后方基地的枢纽。当时依兰又是日伪军事物资的囤集地,城内外驻有日军 150 人、伪军 70 余人。为了破坏日伪当局在周围各县推行集家并屯和经济封锁政策,维护松花江两岸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区的通道,抗联第九军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军各一部,计划 3 月中、下旬共同攻击依兰县城,由李华堂、周保中分任攻城总、副指挥。

参战各军经过协调和准备,1937 年 3 月 18 日,联合攻城部队 700

余人秘密集结于依兰城西部和南部马家大屯、苏合屯一带。3月19日夜,分别进入各自分担的攻城阵地。同时,由第五、第八军一部在预计敌军增援之要道设伏,准备阻击敌人援军。20日凌晨发起总攻。负责攻击城东门的第三、第四军部队立即向东门日军营区射击,迫使日军龟缩营内难以出击。第八军攻城部队因得到打入伪军第二十二团内抗日人员的内应,突击城西北角,成功进入城内,将一个排伪军缴械,占领北大街,并向伪县公署、银行进攻,击毙日人指导官井口。同时,第五军也突破西城,一部向伪军旅部攻击,一部向驻守城内的日军进攻。负责进攻南门和南大营的第九军,因敌军众多并死守城门,攻击无效。此时,攻城部队虽然已攻占大半个城市,但驻防之日伪军负隅顽抗,战至早晨6时,天将黎明,再战不利,攻城部队指挥部当机立断决定全部撤退,前往支援打敌援军的部队。3月21日,依兰南部驻双河镇的伪军得到依兰县城被抗联部队攻击的消息,马上派出400余名援军北上。在中途到达新卡伦附近时,突然遭到抗联伏击部队的猛烈火力阻击,大批敌兵还未发一枪即被击毙。经此次进攻依兰城和打击敌援军的战斗,前后共毙伤日伪军240余人、俘虏伪军15人,缴获迫击炮3门、轻机枪7挺、长短枪154支和大批子弹。

进攻依兰县城的战斗,虽未达到完全占领该城的预期目的,但在政治上却扩大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响和威望,显示了抗日联军团结对敌、联合作战的精神和作战能力,鼓舞了这一地区广大城乡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7年3月吉东省委成立后,加强了对吉东地区抗联部队的领导。第五军重新调整和部署了军事行动计划:军部和第一师以刁翎为根据地,在周边和牡丹江下游两岸的勃利、依兰、方正开展游击战斗,并向南进出中东铁路东段沿线,向老游击区宁安活动,恢复、开展绥宁老根据地的工作;以第二师第四、第五团为主力继续展开在松花

江下游依兰、桦川、富锦、宝清、同江等地区的游击活动,与第四、第七军等部队打通联系,配合作战,并力争在宝清、富锦和依兰东部建立根据地或设立后方基地。

3月27日,第五军第一教导队、第一师第一团和第二军第五师、第三军各一部,在方正东部二道岗,同来袭的敌军发生战斗。毙伤敌军11人,抗联部队负伤一人。4月5日,第五军第一教导队和第一、第二师各一部在刁翎徐家屯宿营时,遭日军和伪军第二十九团一部的袭击。经5小时的战斗,敌军被击毙7人、伤9人后退走。抗联第五军牺牲2人、负伤4人。4月12日,第五军军部参加了保卫抗联第九军洼洪军部的战斗。6月30日,驻三道通附近牡丹江畔江东的伪军第二十九团一个营,突然改变严守中立态度的承诺,背信弃义地偷袭抗联第五军设在四道河子的密营。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为惩罚这支伪军,先以6名指战员化装伪军前往该营伪军驻地,并利用爱国士兵为内应,顺利地俘虏了哨兵,控制了伪军营房各个要点。接着,第三团部队迅速包围各营房并立即发起攻击,当即击毙了敢于顽抗的10余名伪军,其余123名全部被迫投降。这次战斗,第三团共缴获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一挺、步枪等81支、炮弹60发、子弹1.5万发,还有大量被服。被俘伪军除自愿参加抗联部队者外,经教育后一律释放。战斗中,第五军牺牲一名战士。

此后,第五军第一师部队以一部打通穆稜与密山间的交通通道,欲图保持并恢复第五军与海参崴联络站方面的联系(此时,第五军尚不知中共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联络站业已撤销)。该师其余部队开始逐步向南转移,恢复与中东铁路道南留守部队的联系。该师第一团去宁安东南山老根据地活动,曾在桦树底子同一支由俄人组成的伪森林警察队发生战斗,一举消灭这支伪警察队50余人,缴获步枪多支。

1937年5月初,第五军第二师主力部队自刁翎地区赴依兰县东部来财河一带(今桦南县境内)活动。5月7日,由师长王光宇指挥在土龙山截击一支敌人运输车队,击毙敌军10人,俘虏15人,缴获步枪10支及大批军用物资。22日,留在刁翎地区的第二师一部遭日军袭击,激战一日,击毙日军近20人,伤其10人,第五军亦伤亡10余人。6月初,第五军第二师一部会同第八军、独立师各一部,共200余人进攻依东五道岗未果,退至李红眼屯东山,与追击之150名日本守备队发生缴战。敌军出动飞机配合地面步兵发起数次冲锋,都被依据有利地形的抗联各部武装所击退,并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当日午后撤走。这次战斗,抗联部队得到附近群众的热情支援,他们冒着敌人枪林弹雨为抗联部队送水、送饭。7月初,第五军第二师部队经依东、桦川、富锦到达宝清,与抗联第四军军部会师。

在此期间,应抗联第二军军部的多次要求,长期与第五军在中东铁路道南、道北联合作战的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团,组成第二军独立旅南下南满归还建制。在此之前,1936年7月抗联第一路军编成时,第二军政委魏拯民也给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写信,要求在绥宁地区作战的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团返回军部,以增强抗联第二军军部的机动和作战能力。但当时因第五军主力部队均先后越过中东铁路东段向穆稜、勃利一带北征,宁安留守兵力薄弱,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团难以返回第二军军部。直到1937年4月,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才得以将不久前北征至刁翎地区的第二军第五师第五团改编为第二军独立旅,派往东南满第二军军部。同时,又新组建第二军第五团,补足仍在中东铁路道南、道北活动的该军第五师部队的建制。独立旅旅长由原第五团团长方振声担任,政委由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政委伊俊山调任,旅下设两个团,全旅200余人誓师南返,同时第二军教导队的一个分队也随同南行。第二军独立旅在沿途地方党和群众的援助下,冲破

敌人的封锁和前阻后追,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在同年10月,在临江县北排子同魏拯民率领的第二军军部胜利会师,回归第二军。独立旅的南征胜利,再次沟通了中共南满省委与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一路军与吉东抗联部队的联系,增强了第二军在东南满的军事力量。抗联第二军第五师部队在陈翰章等率领下继续坚持绥宁地区与第五军一部配合战斗,并继续承担起中共南满省委与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一路军间同第五军的通信和联络工作任务。

1936年秋后,道南留守部队在留守处主任张中华的率领下,以南湖头根据地为中心开展了积极地战斗。同年冬,张中华率第五军警卫营在大石头河子与第二军第五师代师长陈翰章会合,共同决定了道南留守的第二、第五军部队今后的行动方针:坚持南湖头根据地以保持吉东与南满党组织和各抗联部队的联络,同时向镜泊湖北部发展,保持与道北第五军主力部队的联系。1937年春,南湖头留守处部队去敦化沙河掌筹集粮食等给养,同伪森林警察队发生遭遇战。3月30日,在镜泊湖西欧利山与伪军第二十七团第二连发生遭遇战,击毙日本教官并击伤伪军官兵数名。5月22日,张中华率第五军留守部队与南下的第二军新编独立旅在宁安西北地区会师,并共同打退来自海林方面的100余名敌军的追击。同月,第二军第五师一部在宁安西岗伏击一支伪军守备队,歼敌70余人。7月5日,第二军第五师一部在穆棱二站金矿工人的协助下,乘夜袭击伪矿警队,当场击毙伪矿警4人,俘虏2人,其余溃逃,共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12支、子弹2000发等。

抗联第五军自1937年上半年经过整顿,克服了过分分散的状态、加强统一领导以后,积极开展对敌作战,消灭大量敌人,缴获许多枪支、子弹和军需物资,改善了部队的军事装备,补充了部队人员数量,各师、团人员成倍增长,至同年7月,第五军部队基干队和统战部队已

发展至 3000 余人。除道南老游击区略有缩小外,新开辟了依兰、方正、勃利、穆稜、富锦、宝清各县抗日游击区,促进了吉东地区抗日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三) 抗联第七军的组建

长时期独立活动在饶河、虎林地区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在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经过 1935 年艰苦的冬季反“讨伐”战争,部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同时,也引起了日伪当局的严重注视。敌人准备从周围各县调集 3000 余名兵力,加紧进攻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并且把过去的一年春秋两次“讨伐”,改为常年“讨伐”。为密切配合这一军事“讨伐”,日伪在饶河、虎林地区强迫山区居民归屯并户,迁到“集团部落”,厉行保甲制度,断绝群众对抗日武装的各种支援,妄图根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东北东部边境的抗日活动。

在这种形势下,1936 年 3 月 12 日,前中共吉东特委书记吴平和李范五以吉东省委名义写了《中共吉东省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该信由到海参崴接受短期训练的郑鲁岩、刘总成等带回饶河中心县委和四军四团。信中指示饶河中心县委和第四军第四团,应彻底改变死守旧游击区和打硬仗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开辟新的游击区域,粉碎敌人的“聚歼”阴谋。同时,注意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民族隔阂,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第四军第四团为基础,团结并联合附近各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准备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组建两个师。

信中充分肯定了饶河党和军队的工作,指出:“饶河党组织,在一年来工作中得到了惊人之发展。第四军第四团一年来与日寇英勇作战,扩大了我党领导下的队伍”,对于其他抗日山林队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影响加强,“使群众认识我们的军队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军

队。”关于第七军的组建,信中指出:应以第四军第四团为基础,联合各反日山林队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第一师。信中还对第七军的干部人选、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信中要求:“基本部队应分为三路活动:第一路向同江、富锦发展,隔江与江北第三军主力相呼应,并与依、方第四军相呼应。第二路向虎林、宝清发展,而与勃、密、宝县界之第四军相呼应。第三路在饶河旧游击区内活动。”游击战术方面,信中要求:“应运用更巧妙的神奇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不宜攻坚,不宜打硬仗”,要“选择敌之弱点,而冲出敌之包围线”。该信对于敌人归大屯及保甲制度之策略和对伪军的策略,根据《中代信》提出了具体建议,信中还考虑到在第四军第四团中朝鲜族占相当数量的情况,传达了党对“东北韩国民族问题”的政策主张:a. 中韩民族联合共同抗日,争取中韩民族独立;b. 将目前东满人民革命军改为中韩抗日联军,并在东满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韩国内部去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c. 在韩人内联合一切不愿当日本亡国奴的人,建立韩人内部反日联合战线,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恢复韩国之独立,保护韩国祖国。d. 韩国同志单独成立党小组及党支部,但共同组成区委或县委等。并要求把这些主张通知韩国同志,并在韩人内本此方针而工作之。^①

根据上述指示,中共饶河中心县委于1936年3月20日在饶河县爆马顶子小东沟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下江(乌苏里江)特别委员会,朴元彬被选为特委书记,组织部长刘总成,宣传部长金昌海。3月25日,首先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

^① 《中共吉东省委致饶河中心县委及四军四团的信》(1936年3月12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8,第1至第10页。

军第二师,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作准备。由郑鲁岩^①任师长,李学福任副师长,崔石泉任参谋长,崔荣华任政治部主任兼党委书记。第二师暂设一个团,即第四团,团长由李学福兼。不久,将自愿联合对日作战的由邹其昌率领的抗日武装编为第五团,邹其昌任团长。此时,第四军第二师共有500余人。

同年春,青纱帐起之前,敌人又开始对第四军第二师实行春季“讨伐”。抗联第四军第二师便根据既定的方针,由副师长李学福率领部分部队坚持饶河根据地的斗争,另由师长郑鲁岩、参谋长崔石泉各率领一支部队分别向虎林、宝清和同江、富锦等县发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藉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减轻对饶河抗日根据地的压力。为转移敌人的注意力,第四军第二师部队首先采取声东击西手段,四处宣扬欲进攻团山子街(今饶河县城),迫使日伪军调动大量兵力集中于该地。然后第二师分兵作战。1936年4月8日,李学福指挥第二师150多名战士进攻大别拉炕(今镇江);崔荣华率100多人进攻小佳河,将该地50余敌人击溃;崔石泉率100多名战士进攻关门嘴子伪军第三十一团一个连。第二师先后将三处敌军全部击溃,缴枪40余支,获得重大胜利。尔后,按预定计划分别出发,开展游击战斗。

崔石泉率领第二师一部150余人向饶河毗邻的同江、富锦进军。到达目的地后,首先派出部队调查周围情况,联系群众,向当地大排队武装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启发他们的爱国意识。同时,在部队内部深入进行组织性、纪律性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用抗日军队的模范行动给予群众和大排队以积极良好

^① 郑鲁岩(1904—1949),山东日照人。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34年加入饶河游击队。1936年后历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师长、东北抗联第七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下江特委书记。1939年10月被日军俘虏叛变。

影响。不久,不仅使群众和大排队武装中有抗日意识的队员逐渐靠近抗联部队,甚至部分伪警察、伪军士兵也受到抗联部队的影响和教育。结果,在富锦县二龙山的40余名伪警察队中,有8名警察主动与第四军第二师取得联系,要求帮助组织哗变。抗联部队遂派去12名指战员,帮助他们击毙日本教官和伪警察队长,当即有20余名警察自愿加入抗联部队抗日,其余伪警察放下武器,经教育后遣散。

1936年6月15日,崔石泉率部队抵同江县头道林子,中途与一支约360人的日伪军和大排队遭遇,发生了激烈战斗。战斗从上午9时打到下午6时。部队一面战斗,一面向伪军发动政治攻势,并派人化装混入伪军队伍中进行政治瓦解。结果不少伪军消极应战,有的伪军还哗变过来,有的给抗联部队送子弹,告知日军阵地和指挥军官的位置。经近一天的战斗,击毙日伪军50余人,击伤者更多,敌人仅轻重机枪便被击毁3挺。但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有20余人伤亡。这次战斗,已参加该师第四团任副团长的姜尚平因对战利品分配不满,率部离队而去。这支部队在富锦、同江几个月的英勇斗争,鼓舞了这一地区群众的抗日热情,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活动,仅两个月内,即有60余名爱国青年参加了抗联部队,不少反日山林队也积极靠近第四军第二师部队。表示愿意接受第二师的领导,还募集了4万余元抗日捐款交给抗联第二师充做抗日经费。

同年4月,师长郑鲁岩率领第二师一部200余人向虎林进军,在黑嘴子一带开辟新游击区。6月20日,第二师部队在莲花山与日伪军300余人交战。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毙敌2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第二师部队牺牲7人。7月,第二师第七团180多人在倒木河九排与日伪军150多人交战,毙敌30多人;在黑嘴子与日伪军300多人交战,击毙日军30多人、伪军5人。第二团受伤2人;9月1日,姜克智率警卫连60多人,在大黄山截击义顺号伪军100余人,毙

敌 10 人,缴获步枪 20 余支。第二师部队在虎林地区接连取得胜利,给当地伪军造成很大影响。早在 1936 年 4 月,驻三人班的伪军先后有 5 人携枪前来参加第四军第二师。之后,马鞍山的伪军 4 人、义顺号的伪军 4 人等,也相继哗变前来参加第二师部队。8 月,圈泡子伪军一个连,携重机枪 2 挺、轻机枪 2 挺、步枪 75 支,哗变参加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先后增加了 47 名抗日战士,第二师部队有了新的发展。

第四军第二师副师长李学福率领的第二师部分队伍坚持在饶河根据地的斗争,使部队有了一定发展。1936 年 3 月,早在第四军第二师分别向外县出击以前,预计留在饶河的部队数量将暂时减少,李学福即在大别拉炕邀请早就表示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的“九省”、“保山”、“东胜”、“好胜”、“中山”、“天军”、“北海”、“永远”、“花牙子”等抗日山林队头领会议,决定把这些抗日武装分别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的第六、第七、第八等 3 个团,由王凤林、贾瑞福、“君子仁”分别担任团长。为了加强对这些新部队的领导,第二师在小别拉炕密营举办了干部训练班,从原有各团选拔 40 余名优秀战士和下级干部,教育训练 3 个月,分配到这 3 个团中担任副团职、连长或指导员。从而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和骨干力量,使这些部队摆脱过去的松散、无纪律状态,增强了战斗力。

第四军第二师在饶河、虎林和周边各县展开的游击战斗,是在虎饶地区共产党组织和反日会的党员和群众积极支援下进行的。由于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展,共产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饶河县已有 84 名党员,4 个支部、8 个小组。在小南河、关门嘴子、小北沟、大岱河、小别拉炕、大别拉炕、大佳河、小佳河、三人班、城阳、三义屯等共有 800 余名反日会会员(其中朝鲜族约 200 余人,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约 600 余人)。在虎林县,共产党员有 57 名,11 个支部。反日会员和救国总会会员共有 1000 余人。此外,1936 年 5 月 12 日还成立了下江

抗日救国青年总会组织,饶河 47 名会员,7 个支部;虎林 16 个支部,200 余会员;第四军第二师中有 4 个支部,30 名会员。各地共产党员、反日会员、救国青年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和支援抗日部队工作。他们反对敌人的集家并屯和经济封锁,向第二师部队提供粮食、衣服等物资,协助部队侦察敌情、通讯联络,散发抗日传单,有力地配合第二师打击了敌人。各地的红枪会和山林队也纷纷要求和第二师部队联合,共同抗日。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中共下江特委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的精神,于 1936 年 10 月 26 日在饶河县爆马顶子小东沟召开下江特委与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军政工作人员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部队的组建分为基本队与非基本队两种,基本队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统一一致;非基本队在军事、政治方面受军部的统一领导、指挥,但经费可自筹自用。因独立营等部队尚在外地活动,未有代表与会,故延至同年 11 月,各部基本部队全部返回饶河之后,11 月 15 日,在关门嘴子和文登岗之间的地方,由中共下江特委召集各部队代表会议,宣布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全军共 700 余人,其中基本队 400 余人(内有共产党员 109 名),其余为非基本队。全军编为 3 个师,每师暂设一个团、3 个连。军长由新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陈荣久担任,参谋长由崔石泉担任,副官长毕玉民。第一师师长陈荣久兼任;第二师师长李学福、参谋长金铎;第三师师长景乐亭^①、政治部主任金铁宇、参谋长阎敬山。

东北抗联第七军成立后,对外发表宣言。宣言强调各抗日部队

^① 景乐亭(1903—1940),山东章邱人。九一八事变后,在饶河抗日救国军任营长。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东北抗联第七军第三师师长、中共第七军特委委员、第七军代理军长等职。1940 年 3 月,因怀疑有叛变行为,被错误决定处死。现已平反。

紧密团结抗日的意义,指出:在日本侵略者实施“各个击破”和“归大屯”的毒辣政策面前,各抗日部队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此,抗联第七军主张不分民族、性别、籍贯、党派、职业、信仰,不管过去有任何敌对行为、任何旧仇宿怨,只要是不愿意当亡国奴,都要同他们紧密团结,共同为驱逐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努力战斗。宣言号召:伪军不要再受欺骗,赶快实行倒戈投到抗日联军中来,共同完成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

第七军成立不久,12月4日,中共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经海参崴赴中共代表团汇报工作,行前,临时指定由郑鲁岩代理特委书记。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朴元彬曾被日警逮捕后逃出监狱一事有疑问,对其进行审查,后来未能返回东北。1937年2月,郑鲁岩到虎林收编反日山林队。他以收编的山林队不愿意编入第七军、公推他当领导为由,企图另立山头,扬言“建立十一军与七军作竞赛”。由于郑鲁岩的这种做法,使刚刚收编不久的第二师第五团团团长邹其昌也另立山头反对第七军;第七团团团长贾瑞福则发表声明当胡子,致使其队伍溃散。加上混入队内的叛徒、前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现任第七军军部秘书的罗英等敌特分子利用部队内部分领导干部间的一些分歧,挑拨汉族、朝鲜族间的民族矛盾,离间抗联基本部队与收编部队及其他山林队间的关系,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影响了抗日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开展。为了巩固党和部队内部的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下江特委和军长陈荣久果断地处决了混入部队内部的4名敌特分子(罗英当时尚未暴露未予处理),撤销了几个企图分裂抗联部队干部的职务,调整了个别消极怠工的干部的工作,并加强了对于收编部队的领导,消除了误会,密切了相互间的联络,从而使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改观。

1936年秋,日本侵略者自密山、富锦等地调集四五百名日军于饶

河各地,实行以日军为主的日伪军联合“大讨伐”。将距饶河县城 30 公里内和抗日游击区所有村屯的居民尽皆驱逐,强迫迁入“集团部落”,原有房屋一律烧光,粮食尽数抢光,造成“无人区”。至同年冬,已将饶河、虎林两县游击区内的农户焚毁了 70—80%。

为了搜集抗联部队的情报,敌人还进行诱降工作,在饶河成立了“饶河地方治安工作班”,进驻西林子。这个特务班共有 46 人,其头子是个职业特务。1937 年 3 月,陈荣久和崔石泉商定要消灭西林子特务工作班。3 月 4 日夜,崔石泉率 100 多名战士包围了西林子。但部队的行踪被敌人探悉,战斗开始即遭到敌人的阻击。崔石泉当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向饶河县城西北大顶子山小南河天津班转移,与陈荣久会合。3 月 6 日,陈荣久率第一师 150 余人到天津班,联络几支收编部队的队头进行统战工作。由于混入第七军并任军部秘书的叛徒罗英的告密,使部队遭受日伪军 100 余名的袭击。第七军部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英勇抗击 3 小时,将敌军击溃。部队正准备追歼逃敌时,又被饶河县伪警察大队长所率 200 余名警察队从后面包围,使第七军部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此危急时刻,身负重伤的陈荣久仍坚持指挥战斗,宁死不下火线。战斗到黑夜即将来临时,部队才突破敌人的包围安全转移,军长陈荣久在掩护大队突围时壮烈牺牲。此次战斗,抗联第七军共击毙饶河县日本参事官大穗久雄以下日军 30 余人,击伤日军 10 余人,击毙击伤伪军数十人。第七军部队牺牲 24 人,负伤 2 人。

天津班战斗后,崔石泉等经调查证实了罗英的叛徒特务罪行,把他送到中共吉东省委审查处理。中共吉东省委审查证实罗英的罪行后,将其处决。

军长陈荣久牺牲后,1937 年 3 月上旬,第七军在爆马顶子召开了第七军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在无法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

下,根据形势的迫切需要,决定由参谋长崔石泉转任第七军党委书记,兼代理军长;将第一、第二师合并为第一师,由李学福任师长;原第五团扩编为第二师,由邹其昌任师长、云鹤英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师仍由景乐亭任师长,政治部主任改由李一平^①担任。会议还决定,加强反奸细斗争,巩固部队内部团结;尽快召开山林队会议,解除他们对抗联部队的某些误解和隔阂,并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共同抗日。这次会议,进一步解决了第七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利于团结的问题,克服了某些涣散的状态。

根据第七军党代表会议精神,抗联第七军在饶河县小南河召开了由各民众武装团队、各山林队头领联席会议。经过协商和耐心地说服教育,晓以民族大义,使他们接受了由第七军提出的共同抗日决议案。此后,抗联第七军在饶河、虎林、同江、富锦等地继续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各地的山林队、红枪会相继投入抗联部队,或接受领导。第七军在较短的时间内,收编了“好友”、“姜国臣”、“孟尝君”、“北海”、“天柱”等山林队,使部队有了更大发展。

在第七军逐步发展的形势下,为扩大游击区,补充部队枪支、子弹,军部决定再次兵分两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由代理军长崔石泉、第二师师长邹其昌等率军部和第二师部队500余人坚持在虎饶地区的游击战斗;由第一、第三师部队700多人在师长李学福、景乐亭率领下奔赴同江、富锦等县开展游击战,藉以调动敌人,减轻虎饶地区抗联部队的压力。

第二师同虎饶地区的山林队联合成立反日游击指挥部,积极开展游击战。1937年4月23日凌晨,崔石泉等率军部、第二师和暂编

^① 李一平(1910—1939),朝鲜族。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委员、抗联第七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补充团团长等职。1939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

第一师第四团 230 余人,以及小南河西大顶子等地的红枪会 38 人,袭击西林子伪警察署、日本特别工作班和“集团部落”。各部分头行动发起攻击,经 3 小时战斗,击毙敌人 20 余人,缴获 20 余支步枪。第七军伤亡 13 人。战后,将此次战斗中缴获的枪支子弹全部装备了手持原始武器的红枪会,并将其编入暂编第一师第一团。5 月,第七军得知驻饶河县大顶子山佛寿宫有一个连伪军正在酝酿哗变,并要求抗联部队派兵予以援助。崔石泉在派人了解情况属实后,即派出 7 名抗联指战员化装接近伪军营地,将两名伪军哨兵俘虏,并迅即混入伪军营房,配合要求反正的伪军组织了哗变工作。与此同时,第七军部队秘密接近该部伪军驻地,里应外合突袭敌人,击毙伪军连长(日本人),全连哗变。共缴获轻机枪 2 挺、步枪 80 余支和大量子弹等。哗变伪军士兵大部加入抗联第七军,其余经教育后遣散。

李学福和景乐亭率所部第一、第三师 700 余人进入同江、富锦两县境内,同当地山林队建立了联合反日指挥部,在大旗杆、水林子、卧虎林子、对青山、前六排、二龙山、小九家、虎布什克、别拉印子山等地广泛开展游击战斗。尽管日伪军在这两县分散驻兵于各地,抗联第七军部队采取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同敌人作战。他们时而将部队化整为零,进行群众工作,征集给养;时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或策反、援助伪军警的哗变。5 月 15 日,李学福率第一师 200 余人出发去接应驻同江二龙山第三牌的一连伪军的哗变时,途中与一支 500 余人的日伪军发生遭遇战。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抗联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沉着应战,战斗达五六个小时,第一师以牺牲 10 人,负伤 6 人的代价,换取击毙敌人 50 余人的战绩。这次策应该部伪军哗变虽然未获成功,但不久该连伪军依然有 20 余人,携带 40 余支枪投入抗联第七军第一师,参加抗日。

1937 年 6 月,青纱帐起之后,抗联第七军第一、第三师 700 余人,

自富锦附近向二道林子行军时,同日军小滨司令所率900余名日伪军发生遭遇战。敌人虽然动用了装甲车、骑兵配合步兵进攻第七军部队,妄图予以全歼。但由于富锦县南部均是沼泽地带,从头道林子至三道林子的道路,旱季仅能勉强供人和马车通行,雨季道路与沼泽难辨,敌人的装甲车和骑兵无法发挥作用,只能靠步兵作战,优势全失。抗联部队却利用有利地形和树林的掩护,发挥近战优势,在敌步兵逼近至四五十米时予以猛烈反击,连续打退敌人多次攻击。经一天的战斗,敌人被击毙150余人、击伤10余人。抗联部队乘夜幕来临后,撤出战斗。这次战斗,第七军部队得到附近农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农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抗联战士送饭、送水,救护伤员,极大地鼓舞了抗联战士的士气。敌人却恼羞成怒,采取疯狂手段进行报复,第二天,竟派出30多架次的飞机狂轰乱炸疑是抗联的驻地,除炸伤抗联战士3人外,毫无所得。

此后,第七军化整为零,分散进行群众工作,组织反日会,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同时对伪军和伪保卫团进行瓦解工作,均收到良好效果。当第七军在同江活动时,二龙山南苏家店一名反日会员向部队报告:驻在该地的一支日军经常骚扰居民残害百姓,群众盼望抗联部队尽早除掉这些敌人。第七军派人侦察后,立即派出一支部队突袭这支日军,击毙其20余人,其余逃走。该地反日会以极大热情为部队募捐,送衣物、粮食,并动员人们开展伪军工作,促使伪军50余人哗变。同江一区伪保卫团团团长王廷周在接受抗日军民的宣传后,便率领业已动摇的保卫团100余人,参加了抗联第七军部队。

自抗联第七军成立后,虽然面对敌人残酷“讨伐”的严峻局面,但是,第七军采取将主力部队调至外线作战,广泛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斗,主动打击敌军,策动伪军哗变,与群众配合积极破坏敌人设置的“集团部落”,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等举措,取得许多战斗的胜利,密

切了与群众的联系,获得群众的拥护、支援,从而使第七军部队在吉东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又一支劲旅。

五、抗联第八、第九、第十军和独立师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发表以后,东北地区南满、吉东和北满党组织把在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等部队,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到第七军,同时还分别对在各抗日游击区域内活动的其他抗日武装和山林队进行大量的工作,争取将这些队伍统一编入东北抗日联军。这些部队是:谢文东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李华堂领导的“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汪雅臣领导的“反满抗日义勇军”和祁致中领导的“东北山林义勇军”。

(一) 抗联第八军的编成

谢文东率领的民众救国军,诞生于土龙山农民反日大暴动中。谢文东在长时期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部队交往时,始终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1935年春,当民众救国军只剩30余人、处于极端困境时,迫切需求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的援助、支持时,曾同第三军等一起参加了哈东地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并参加一些进攻敌人的战斗,使部队得到一定发展。当谢文东所部度过危机后,即行离开第三军至依兰、勃利一带独立活动。

1935年夏,当中共吉东特委先后通过勃利县委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以勃利抗日总会名义,争取将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时,谢文东认为中共勃利县委和第四军势力不大,不足以作为靠山而婉言谢绝,却又参加了李延禄所号召的“东路联合军指挥部”。以为这样既不得罪第三军,又可获得第四军的庇护,从中发

展民众救国军的实力。

1936年1月,民众救国军在汤原同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等共同组成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纳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后,谢文东又疑心为第三军所控制,再行东返方正、依兰地区活动,积极扩充实力。6月中旬,该军在依兰进攻庙岭森林警察队时,缴获许多衣服、粮食等物资。

1936年夏,该部接到第三军转达的《中代信》中有关将民众救国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的通知,并拟派张寿箴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正在此时,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二师部队到达牡丹江下游地区。中共道北特委书记宋一夫指示第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帮助民众救国军工作,使该军由200余人发展至300余人,编成4个团,并在五道河子设立了军部后方。对于改编为抗联第八军,谢文东仍犹豫不决。后经刘曙华等反复进行说服工作,谢文东遂同意将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此时,中共代表团驻海参崴联络站联络员于化南、中共道北特委书记兼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等由于政治经验不足,兼以第五军第二师初到勃利、依兰地区,急欲扩大自己的影响,事先未经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的同意,便直接插手将民众救国军于同年9月18日正式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并派出抗联第五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和李浩、姜东淳等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第八军,加强对该军的政治工作。

抗联第八军,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参谋长于光世。共编3个师,第一师师长秦秀权、政治部主任金根^①;第二师,师长关文吉;第三师,师长王自孚。9月20日,第八军发表了成

^① 金根(1903—1937),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密山游击队参谋长、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二团代理团长。1936年调入抗联第八军,先后任该军第一师、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7年12月被叛徒杀害。

立宣言。不久,中共道北特委在该军内发展党员,建立党总支委员会,军长谢文东也被吸收入党。开始时,中共第八军总支归第五军党委领导,中共吉东省委建立后交由吉东省委领导。该军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经谢文东同意,除将由第五军调来的政治工作干部分别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外,还设立了第八军教导队,由军内各师选拔一批抗日意志坚定、较为可靠的青年下级干部和战士组成,经过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后,分配到军内各部队任基层军事干部和骨干。同时在各师组建青年抗日义勇军,由各师政治部主任组织教育训练,使之逐步成为各师的骨干力量,以逐步推进第八军的教育、整顿工作。

东北抗联第八军成立时,正值日伪军开始在汤原、通河、木兰、宾县和依兰为中心的松花江两岸发动 1936 年秋冬季“大讨伐”。第八军在自己的活动地区配合吉东和北满抗联各军,与敌人展开积极地战斗。1936 年 10 月中旬,该军第一师袭击了来财河(今桦南县境)的伪自卫团,缴获一些马匹与枪支、子弹。10 月 24 日,第一、第三师各一部与抗联独立师联合袭击了林口至佳木斯间正在修筑铁路的一列工程列车。11 月 4 日,第一师一部 300 余人,在依兰县团山子蚂蚁浪,同伪军混成第二十七旅一支“讨伐”队发生遭遇战斗。第八军部队迅速抢占该地北山制高点,居高临下与伪军奋战 6 小时,毙伤敌人 10 多人,击毁敌迫击炮 2 门、重机机 2 挺,击毙战马 5 匹。同年冬,该军第三师联合第三军第四师在依兰县五道岗阻击一支日军。第八军部队绕至敌军后方突袭日军,毙伤敌数十人。1937 年 1 月,该军第二师与抗联第三军一部配合,共同袭击了方正县四区的伪自卫团。2 月 4 日,该军第一师第一团袭击了勃利县东齐家窝堡伪自卫团;2 月 8 日,袭击勃利县四区伪警察署;2 月 12 日,又袭击了勃利县杏树沟伪自卫团,击伤其多人,焚毁粮食 200 余石。3 月 6 日后,该团又返回东齐家窝堡一带打击伪自卫团。3 月 10 日,该军新编的第四师在三道

岗田家屯与伪军交火 5 小时,互有伤亡。第一师第一团在积极活动中,收缴了一批枪支,收编了一些山林队。3 月 20 日夜,抗联第八军与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九军配合,取得了联合进攻依兰县城和阻击敌人援军的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抗联第八军部队有了较大的发展。陆续增编了第四、第五、第六师。第四师师长尤连生,第五师师长董宪章,第六师师长赵庆祥。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谢文东逐渐忘乎所以,自恃东北抗联一军之长的地位,怂恿部下,损害弱势的友军,甚至向在其处境困难时曾经扶持过该军的抗联友军实施缴械、收编。1936 年 10 月,第八军刚成立不久,即发生该军第一师第一团为扩大自己的实力,无故缴械并杀害第五军第二师一名队长和一名副官及其部下事件。嗣后,该军又连续发生两次收缴第九军枪支和收留第九军逃兵拐抢 2 支等事件。1937 年 1 月,该军第二师为过去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曾收缴属于该军的收编队田团枪械一事^①,进行报复,竟将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已收编的山林队刘团等拉拢编入第八军,几乎造成两军武装冲突。此外,在税收问题上,两军之间也发生不遵守划区征收协议,而去对方税收区强行征收的事例等等,致使抗联第八军与其他友军的关系、尤其与第三军的关系僵持不下。

抗联第五军军长、党委书记周保中于 1936 年 10 月下旬抵达勃利县境后,逐渐了解到第八军同第三军、独立师之间关系紧张等情况,即指示已由第五军派去第八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对该军进行整顿和改造,此外,还通过信件、会见等方式,亲自对谢文东等人进行说服、批评、教育工作,力图使其摆正与其他抗联各军的关系;建议第八军将

^① 抗联第八军未成立前,民众救国军曾收编山林队田团。因田团胡作非为,影响恶劣,北满抗联总司令得报告后,经谢文东同意将田团予以缴械处理,但民众救国军第二师师长关文吉却始终对此不满。

收缴自友军下属部队的枪械返还,将收自友军收税区的税款退回或补偿,以利团结。从而使第八军的此类行为有所收敛。

此后,抗联第八军各部与抗联其他各军配合,频繁出击,打击日伪军警部队。1937年4月14日夜,第八军调集300余人,袭击了桦川县黑背金矿的伪警备部队,歼敌多人。4月23日,该军第二师一个团的100余名骑兵,在依兰县横岱山北的窑立屯,同日军松崎小队奋战3小时,予敌以杀伤。5月12日夜,该军一部在前刁翎附近袭击一支日伪军。5月25日,该军新增编的第六师在师长赵庆祥的指挥下,将勃利至杏树沟段铁路予以破坏,使刚通车不久的勃利至佳木斯铁路一度中断。5月29日,该军第一师一个团与第五军第二师、抗联独立师一部配合,在来财河给予一支日军分队以痛击。6月19日,该军第六师与中尉坂田所率一支日军,在依兰县道台桥附近发生战斗,毙伤敌人数名。

至1937年6月为止,抗联第八军已拥有6个师和一个教导大队,人数由成立时的300余人增加到近1000人的规模。1937年7月,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上,经赵尚志与周保中协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同意,抗联第八军正式归吉东省委统一领导,同吉东地区的第四、第五和第七军联合对敌进行战斗。

(二) 抗联第九军的建立

1936年1月,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队长李华堂出席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扩大会议,并被推举为东北反日联军副总司令。之后,率队到江南,在依兰、方正、勃利地区活动。

2月初,留守江南活动的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第一大队在郭成指挥下,与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一师第二团和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在洮琪河冰道上伏击了一支由日伪军组成的自依兰往方正运送物资的有100余辆大车的运输队。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余

人,其余溃逃。我军缴获运货大车 90 余辆、200 余匹马和大量物资。月末,李华堂带队自汤原返回江南,将三道河子伐木场的伪森林警察队予以歼灭,然后赴刁翎大盘道与第一大队汇合。同年 3 月 6 日,自卫军支队袭击勃利县大青山森林警察队,击毙日本指导官千叶等 4 人,伤一人。4 月 4 日,经侦察得知驻守依兰县城的日伪军几乎倾巢出动外出“讨伐”,城内空虚,李华堂即率所部 200 余人奔袭依兰县城,首先乘夜偷袭该城西南面的伪军南大营,然后攻入城内,攻袭伪军司令部和弹药库。击毙伪军 5 人,占领武器库,共缴获迫击炮 2 门、轻机枪 2 挺、步枪 100 余支和大量炮弹、子弹和军需物资,载满 4 台马车撤出县城。这是抗日武装第一次胜利攻入依兰县城的战斗。

1936 年 8 月下旬,李华堂率 100 余人从依兰县小江子出发,经勃利东去密山,李华堂、李向阳两人越界入苏联,年末返回。在此期间,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委托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代管自卫军支队。该支队第一大队在洼洪山区建立起被服厂等后方密营。

1937 年 1 月,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和第三军根据《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以及《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中关于第三军对“李华堂部队,也给予实际的援助,其实力有相当基础,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的指示精神,将该支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副官长于祯。军部下设 3 个师:第一师,师长郭成,编制 3 个团;第二师,师长王振祥,编制 3 个团;第三师,师长张学中,暂编两个团。全军共 800 余人。同时,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成立宣言》。抗联第九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抗日义勇军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又一支抗日统一战线部队。

1937 年 2 月下旬,在松花江下游南岸活动的抗联各军,于依兰县洼洪第九军行营举行联军会议。会议对增强抗联各军的团结,协调

各军之间的关系,消除谢文东与李华堂之间的成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后,第九军军长李华堂和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根据会议的决定,于3月20日指挥各军联合进行了攻入依兰县城和阻击敌人援军的战斗。李华堂任此次战斗的总指挥,率领第九军部队250多人参加战斗。20日凌晨,以第九军炮轰敌兵营为进攻信号,战斗开始。第九军的迫击炮,在炮轰城外日军兵营和攻打依兰城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随后,抗联第九军部队至方正县大、小罗勒密活动,收缴了许多子弹。另一部骑兵去通河县游击,在县城北截击一支日本运输队,俘日人车把头一名,缴获运输大车13辆和许多物资。

依兰战斗后,日伪军加紧对依兰、方正地区的军事“讨伐”,并实行“归屯并户”。1937年4月12日,日伪军出动120余人袭击第九军汪洪军部。由于抗联第五军第二师部队设伏援助,使第九军军部得以安全撤走而未受损失。此后各师开始分散活动。第一、第三师骑兵部队在师长张学忠的率领下,在依兰一、六区征收捐税,并为部队东进做准备。参谋长李向阳及教导队渡江东开展游击活动,并与第三师沈团取得联系。胡团则随于祯副官长带少数兵力单独活动。4月22日,第九军与第五军在依兰靠山屯举行干部会议,具体研究破坏敌人“集团部落”,清除抗联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障碍的计划。随即袭击并破坏了马家大屯“集团部落”,村内一些青年农民踊跃参加了抗联第九军,被编入军部教导队。对此,周保中称赞之为“大美举”。1937年5月,该军第三师在依兰东部倭肯河一带活动时遭受损失,师长张学忠等6人失踪,损失公款7000元、马15匹、短枪9支。随后,该军第一、第三师合并。6月,第九军同第四、第五、第八军部队联合在刁翎南小盘道伏击一支由日军押送的100余辆马车组成的运输队,缴获小炮一门、轻机枪2挺和手枪20余支。不久,该军负责国际交通

工作的参谋长李向阳因病逝世。

为了加强第九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抗联第三、第五军先后派出一些军事和政治干部到该军工作。早在同年4月,第五军即抽调吴大成等4名干部到第九军工作。5月,又将第五军第二师第五团政委王克仁^①调任第九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又决定北满抗联哈东办事处主任、前抗联第三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任第九军政治部主任。

(三) 抗联第十军的建立

1936年至1937年夏,坚持在五常、珠河、舒兰、榆树边境地区活动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双龙队)汪雅臣部,先后由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

1936年初,日伪当局为完全清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珠河南部和五常山区疯狂地实行“集家并屯”,敌人到处烧杀血洗,农民的粮食被抢光、烧光,农户只剩下断墙残壁,农民大量逃亡他乡。在南山里活动的汪雅臣部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也被迫转移至五常北部山区高丽营子,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师会合,不久,在尖山子同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负责人会晤。

此时,正值第三军第三师组织东北反日联合军道南指挥部,汪雅臣部和“创江南”部等山林队均参加了道南指挥部,共同战斗。在此期间,汪雅臣向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提出了由第三军改编所部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的迫切要求。由于汪雅臣部队自1935年以来便经常同第三军保持联系,配合第三军部队打击敌人,尤其在第三军司令部率

^① 王克仁(1914—1939),原名王世友,黑龙江穆棱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吉东特委委员、东北抗联第五军第二师第五团政治委员、抗联第九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等职。1939年4月,在战斗中牺牲。

主力部队转移至松花江下游地区,珠河、宾县等老游击区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留在老区的该军第二、第三师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团结更多的抗日武装共同战斗。同时,鉴于五常山区的抗日局面必须坚持,以与还在珠河、宾县的第三军第二、第三师部队互为呼应,珠河中心县委根据《王康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决定,将汪雅臣所部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由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不久,又派刚由关内治病返回的原第三军第三团政治部主任侯启刚任第八军政治部主任,组建政治部,开展军内的政治工作。军部设一个保卫连,全军共编5个团(内有一个迫击炮团),拥有800余人。主要活动在五常县东南部张广才岭山区,以九十五顶子山、西鸭架岭为中心,在周边各县开展抗日游击战斗。

1936年夏,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得知五常县桦皮场一带驻有一支日伪军“讨伐队”,为非作歹,残害民众,汪雅臣立即率领主力部队前往进攻敌人“讨伐队”。经过先后两天的战斗,毙伤敌人一部,并缴获不少枪支子弹。战斗结束后,当地许多农民参加了第八军,队伍扩大了。部队迅速返回九十五顶子山老爷庙休整。不久,敌人组织日伪军1300余人到舒兰县朱旗屯(又名珠琦屯),分散进行“讨伐”。汪雅臣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在上口子伏击战,毙伤大批日伪军。战斗中,汪雅臣腿部负伤,部队撤出战斗后,迅速返回九十五顶子山根据地。

1936年秋,汪雅臣伤愈,率部队至西关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驻在当地的一支日军“讨伐队”得知后,便出动“讨伐”。第八军发现后,马上以一部急速抢占西关街附近一小山头制高点,并示形于敌,诱使敌人追踪而来。同时,将另一部置于山脚下据守的有利地形,准备伏击敌人。结果,日军在开始登山攻击时,不但遭受人民革命军山上部队居高临下的射击,而且退路也被第八军山下部队截断,敌人在腹背被夹击之下,伤亡惨重。此战,第八军缴获机枪7挺、小炮一门及一些

步枪和 60 余箱子弹。

1936 年 9 月,第八军在根据地附近的沙河子一带活动,汪雅臣曾派人去东大屯,让孟百户长在屯里准备饭送至部队休息地点。该百户长虽然布置农户做饭,却暗地里跑到沙河子日军守备队去报告。当农民给部队送饭时,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汪雅臣军长。汪雅臣命令部队赶紧用饭,然后集合部队在驻沙河子日军出动的必经之地小黑顶子埋伏下来,同时在预计为敌军退路的南山和后山也预设部队待机歼敌。当日军急速赶到小黑顶子喘息未定时,突遭第八军猛烈攻击,当场死伤一片,敌人的 3 挺机枪均被击毁,机枪射手被击毙。日军守备队向南山撤退时,被埋伏在此地的第八军第五团打退,当企图从后山逃跑时,再遭八军部队阻击。敌人在连续遭受的打击中损失惨重,仅少数日军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战斗结束后,向敌人报告的孟百户长也得到惩处。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部队在五常一带能够长期坚持抗日战斗,同汪雅臣正确地处理军民关系,紧紧地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密不可分。山区的居民多数为贫困的农民,汪雅臣自建立抗日队伍开始便注意群众纪律,对民众不抢不夺。部队的经费、给养主要通过攻袭伪森林警察驻地,攻破“集团部落”收缴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财产解决。同时,他们还依靠当地群众解决一部分粮食。此外,还尽可能由部队从事一些农业生产,解决不足部分。在部队缴获物资较多时还随时分配给贫苦农民,因而深得群众的拥护。

1936 年 9 月中旬,在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三、第六军党委在汤旺河帽儿山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根据北满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依据《八一宣言》、《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精神,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同年冬,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正式成立,军长汪雅臣,副军长齐云禄

(后因叛变被处决,由张忠喜接任副军长),政治部主任王维宇。此时部队已由原来的5个团发展为10多个团,共1000余人。

1937年初,日伪当局为确保哈尔滨地区的“治安”,消除对哈尔滨至吉林、图们铁路运输的威胁,企图完全清除哈尔滨附近各县的抗日武装,便加紧在五常、舒兰地区推行保甲制度,设置“集团部落”,并派日军一个联队、独立守备队一个大队、伪军一个团、治安队3个连,分别在五常、山河等地进行“讨伐”,企图用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毒辣手段,一举消灭抗联第十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粉碎敌人的“讨伐”,汪雅臣依靠熟悉五常、舒兰山区的地形和平时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等有利条件,采取擅长的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同日伪军展开顽强战斗。1937年春,抗联第十军在朝阳屯一带活动,发现一支日军“讨伐队”毫无防备地围在屯内一处水井喝水休息。汪雅臣立即指挥部队战士各自用枪瞄准敌人,指挥枪一响,枪弹齐发射向敌人,顿时击倒10余名日军。当敌人欲行反击时,第十军已自村外迅速撤走,进入南山密林。随后,又在半截河设伏袭击了另一支100余人的日军“讨伐队”,敌人死伤过半,余者撤退。抗联第十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子弹、服装和军需物资。不久,第十军即利用缴获的敌军军服,化装成日军进入土桥子“集团部落”,顺利地解除了当地伪自卫团的武装。4月,第十军部队转移至五常南部四平山地区活动。日伪当局得悉后,立即调集驻五常县城、冲河、山河屯、沙河子的日伪军向四平山地区第十军进攻。汪雅臣发现敌军人多势众,决定先放过伪军,专打日军,部队一边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专打日本兵!”一边集中子弹射向日军。伪军则卧伏地上,朝天放枪。结果毙伤日军数十人,缴枪几十支,子弹六七箱、3匹军马和大量军用物资。1937年6月,汪雅臣指挥部在四平山北沟和小南门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同年夏,第十军100余人攻打了山河屯伪森林警察队,缴获了该

队的全部武器。

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在同敌人的战斗中发展壮大,独立自主地在拉林河上游五常、舒兰边境的九十五顶子山区,长期坚持战斗。同年7月初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北满临时省委与吉东省委代表协议,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北满抗联第三军主力部队业已转移至松花江北活动,抗联第四、第五军将向哈南、五常地区发展等情况,将抗联第十军划归中共吉东省委领导。

(四) 抗联独立师的建立

长时期在吉东地区依兰、桦川一带活动的由祁致中率领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方依游击团,因第三军未派政治工作人员协助指导;也由于祁致中个人英雄观念较强,同友军之间时常发生矛盾,遂离开第三军到依、勃地区单独活动。后来该部队得到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和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积极协助,并且经汤原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等人的介绍,祁致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和游击总队又抽调金正国^①等中共党员到祁致中部进行政治工作。

1935年12月26日,祁致中部化装日军收缴依兰县大砬子屯伪自卫团步枪、手枪共15支、子弹693发。1936年1月14日,该部在依兰二区与敌交战,毙伤敌4名,缴获8支枪和子弹等物。16日,该部一部在三区清茶馆袭击伪自卫团,获步枪7支。不久,该部同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取得联系,联合对敌作战。该部队在依兰三道岗东部一次收缴伪大排队40支枪和服装40余套,然后化装成大排队,又用计缴获了三门刘家大院全部枪支。5月初,该部得知民众救国军被日军围困于依兰县齐刚屯的消息,立即驰往解围,共同歼灭这股敌人。祁

^① 金正国(1912—1938),朝鲜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汤原反日游击队指导员、东北抗联独立师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抗联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8年5月被叛徒杀害。

致中部在战斗中成长,加上收编了一些小股山林队,使基本队伍发展至 200 余人,此外还有一些联合队 200 余人,共有 400 余人,编为 7 个团。

1936 年春,中共勃利县委根据《八一宣言》和《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精神,派出勃利县团县委书记富振声(董贵林),去祁致中部队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政治指导,帮助整顿队伍。祁致中在先后得到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勃利县委和第四军、第六军的热情协助,摆脱了孤立无援的状态之后,希望中共勃利县委能帮其实现由共产党组织将该部改编为基本部队的愿望。同年 5 月 20 日,经中共勃利县委的批准,在依兰县三区,这支抗日队伍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由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任指导部主任。1936 年 7 月,富振声离职去苏联学习,由汤原团县委书记李飞接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李飞因病离职。祁致中部本是第三军游击团,受北满抗联总司令部指挥。中共勃利县委在协助祁致中改编独立师时,虽获得中共吉东特委的同意,但并未事先取得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的同意,结果引起了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对吉东党组织的不满。

抗联独立师成立后,继续在依兰、桦川县境开展对敌作战。5 月下旬,祁致中率师部直属部队自齐家窝铺向孟家岗移动。途中,当部队到达七虎力(今桦南县境内)时,发现伪军骑兵步兵 200 余名尾追而来。祁致中随即指挥独立师抢占有利地形,准备阻击。待敌骑兵接近时,独立师突然给予猛烈射击,伪军骑兵当即被击落马下 10 余人,被迫后退。但伪军步兵却从侧翼迂回,妄图切断独立师的退路。独立师发现战场态势不利,便乘天黑撤出战斗转移。伪军畏惧夜战,未敢追击。在独立师部队到达距湖南营 9 公里处的一处土围子时,又遭遇伪自卫团武力抵抗。独立师即行攻破围子,予伪自卫团以严惩。此时,祁致中为联络一些小股山林队,成立了由他指挥的抗日联军东

路依勃桦富指挥部。10月下旬,抗联第三军派周庶泛^①到独立师任政治部主任,藉以加强指导。此时,独立师已编为3个旅:第一旅旅长张建国、政治部主任金正国;第二旅旅长胡文权、政治部主任祁致中兼任;第三旅旅长姜宝林、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各旅皆设3个团,师部直属一个骑兵团。全师共800余人。各旅分别活动的范围是:第一旅在依兰、桦川地区,第二旅在富锦地区,第三旅在桦川县柳树河子(今桦南县境内),祁致中率师部直属骑兵团在桦川县狐狸信子等地指挥各旅开展游击活动。

由于独立师积极战斗,部队建设和后方基地建设也取得显著成绩,因此受到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的表彰。1936年9月23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在给师长祁致中的信中说:“本部屡接报告,诚谓该师长对地方民众颇负责任,尤于反日事业积极进行,不遗余力,殊堪嘉奖。”^②

1936年秋,独立师第一旅在依兰县来财河一带活动时,同一支伪大排队200余人发生遭遇战斗,在夜幕降临时双方停火。稍后,独立师第一旅在旅长张建国和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分别率领下,夜袭正在惶惶不安的该部敌人获胜。此次战斗共击毙伪大排队长江静波等20余人,俘虏百余人,缴获各种枪100余支和大量子弹。

1937年1月末,独立师第二旅第四团攻下富锦烟台山伪警察所,缴获60支枪。不久,该部又攻破与抗联部队为敌的3座乌龙地方的大地主薛印堂大院,缴枪50余支。2月11日,该师第三旅130余人

^① 周庶泛(—1940),朝鲜族。原在抗联第三军工作,后历任抗联独立师任政治部主任、抗联第三军任第六师、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委员等职。1940年3月被叛徒杀害。

^② 《(北满)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训令》(1936年9月23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6,第213页。

在富锦五区袭击哈达密河伪自卫团,俘虏伪自卫团长等14人,并缴枪14支。3月19日,该旅在富锦县五区腰屯同一支伪军发生遭遇战,在给予伪军以重创后撤出战斗。同月,该师第一旅一部在依兰县三区铁岭山袭击一支日军获胜。4月中旬,祁致中率师部骑兵队同第三旅共300余人会合于桦川县东部。4月19日,在桦川县悦来镇(今桦川县城)东南的拉拉屯,同日伪军警发生战斗,予敌重创后迅速撤出战斗。4月21日,独立师师部骑兵队和第二、第三旅共500余人合攻悦来镇,一度攻入镇内十字大街,后因驻佳木斯日军火速增援,独立师不得不撤出战斗。此次战斗给予敌人以很大的震动。4月23日,独立师骑兵队在安邦河大林子同追击的日军作战,用炮火击毁敌坦克一辆,因日军野蛮地施放毒气弹,独立师立即退出战斗。5月,独立师师部骑兵队、第三旅会同抗联第四、第六军各一部,联合进攻了富锦县街基镇。

1937年2月21日,活动在依兰、方正地区的抗联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和独立师等部负责人,在洼洪第九军军部召开会议,解决各军为筹集给养、税收而形成的无序状况和相互间产生的矛盾。经过各方协商,决定联合组成哈东办事处依东办事处(后改为依东分处),共同推举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为依东办事处处长、独立师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为副处长。不久,宋一夫任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实际上,依东办事处处长由独立师第一旅政治部主任金正国代理,负责日常工作。该办事处在统一和协调各军筹集给养和税收工作中,收效很好,获得抗联各军和群众的拥护。

但是,抗联独立师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党组织之间相互联系不密切,部队内党的领导力量薄弱。由抗联第三军派到独立师任政治部主任的周庶泛虽然对革命忠诚,工作积极,但对部队的教育改造急于求成,遭到许多落后队员的抵制,致使工作难以开展,遂于

1937年4月初离开独立师,返回第三军。结果,部队内部出现思想不统一、队外与其他部队发生矛盾等问题,长时期难以解决。不久,北满临时省委代表、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箴来到独立师,他用10多天时间同祁致中进行交谈,交换意见,详细了解了祁致中领导独立师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实际状况,传达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他的意见和对独立师的期望,消除了祁致中对北满党组织和北满抗联总司令部的疑虑。之后举行了抗联第六军与独立师的特别会议,进一步帮助祁致中提高了认识。独立师进行了组织整顿,清除了坏分子;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事后,张寿箴在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对独立师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认为独立师已经“初步走向忠实于民族革命战争”,要求与北满临时省委及下江特委发生直接组织关系,并经常派交通员联络,同时要求临时省委派专做党务工作的干部和政治部主任,到独立师工作。

独立师的政治问题解决后,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扩大抗日游击区,并向富锦、同江、抚远发展,独立师从师部、第一、第二、第三旅中抽出120名兵力组成东征部队,1937年6月初从桦川县进入富锦县境。不久,在别拉谿子山为反击当地伪保卫团的袭击,炮击该保卫团,并迫使其投降。然后由该保卫团长引导,先后将三区敌防所、伪警察和另一支附日地主武装缴械,共获40余支枪。随后,又进攻柳大林子伪警察所,收缴了40余支枪。此时,独立师得知富锦七区头道林子伪警察署署长李景荫^①家藏有轻机枪和许多支步枪。同时又了解到李景荫曾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吉林自卫军第二混成旅抗

^① 李景荫(1903—1976),黑龙江阿城人。九一八事变后,任吉林自卫军第二混成旅营长。自卫军失败后任富锦伪警察署长,仍同情抗日。1937年6月反正,任抗联独立师参谋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抗联第十一军第一师师长、龙南指挥部指挥、第三路军第六支队支队长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富锦县公安局局长、阜新煤矿局长。1976年4月病逝。

日。自卫军失败后,迫于敌人压力,所部被编为伪警察部队,但他同情抗日,仍同抗联第七军有联系,为第七军代购军需物品等情况。于是独立师派副官长薛华向其进行抗日教育,终于争取其决心反正,参加抗联独立师抗日。1937年6月15日夜,李景荫带领独立师将头道林子伪警察署和伪自卫团全部缴械,获得87支枪。李景荫被任命为独立师参谋长。

1937年7月初,独立师在富锦二区长发屯为清除筹集给养的障碍,突袭该地伪自卫团200余人的防所。毙伤敢于顽抗的团丁40余人,其余均被俘虏,缴枪200余支。随后,又接连袭击了三区、五区、七区等地伪自卫团防所,清除了抗联部队活动通道的障碍,使抗日游击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此前的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期间,赵尚志和周保中商定,将独立师正式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并归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

1937年7月初,祁致中率所部在富锦二区活动期间,攻袭了驻守一教堂的伪自卫团武装,毙敌七八人,伤30余人,收缴了敌人全部枪支。随后,富锦三区、五区、七区等地的反动自卫团防所也被清除,扫除了我军活动的障碍,使富锦地区的抗日游击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五)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7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东北地区南满、吉东、北满党的组织和党直接组建的抗日军队的不懈努力,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成长起来。参加这支抗日武装部队的军事力量与范围迅速扩展,不但包括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军至第七军部队,同时还以这些部队作为骨干力量,扩大联合了一大批其他的抗日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等救国武装力量。

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和抗联部队根据该地的政治、军事形势和

各支义勇军、山林队的条件和规模等的不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编组形式。一种是针对其部队规模和分散各地活动的特点,采取纳入东北抗日联军各军,给以独立师或独立旅的番号,实际上是将部队划分为基本队和非基本队。另一种,因其部队规模较大,又有较大政治影响,且分别代表着由工人、农民反日暴动中诞生的队伍,或由士兵、山林队转向抗日而组成的抗日武装;或由于这些部队的领导者不愿编入已有的抗联各军;或因活动地区所限,不宜纳入已有的抗联各军。对这些部队,则采取了使之成为与原由共产党组建的抗联各军并列的军一级编制。东北抗日联军第八、第九、第十军和独立师部队,就是这样编成的。

根据各军建军的历史、传统和现有状况的不同,东北抗日联军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组建的,经由工农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包括抗日同盟军和反日联合军)各个发展阶段,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这是东北抗联部队的主体或基本部队;一类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由各地党组织和原有抗联部队派出干部去队内进行政治工作,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但却因刚编为抗联部队不久,部队尚不稳固,需要进一步进行政治教育、改造和整顿的部队,可称之为抗日统一战线部队。对后一类统战部队,各地党组织和抗联基本部队,都进行了大量工作,加强领导,甚至付出了牺牲。这些统一战线部队,长时期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一起战斗,结成了紧密的关系。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他们自愿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东北地区统一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做出了贡献。

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另一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于同一时期在各地区普遍组建的反日会和抗日救国会。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

事变后,指示各地党组织将各地早已组建的“反帝大同盟”迅速改称反日会或抗日救国会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一·二六指示信》中认为东北各地党组织组建的反日会是“联合广大民众的组织”,并必须掌握其领导权。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发布的《东北反日总会章程》明确规定:其宗旨是,团结东北三千万民众中一切反日分子进行一致抗日斗争,将居住在东北境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彻底解放出来。《吉东抗日总会檄文》明确指出:“要把反日会变成工农兵学商等的群众团体”,即包括各阶级、各民族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爱国政治团体和“反日统一战线机关”。《吉特补充信》将东北反日会与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救国政府一同列为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

东北各地反日会、抗日救国会,为团结东北各阶层、各民族的抗日群众、爱国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至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救国会、反日会在各地的建立,标志着东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抗日武装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各抗日阶级、各民族、各种爱国力量的大联合。

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具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纲领。参加这一统一战线的部队和团体,最初同意执行《东北人民革命军政纲》,后来共同执行《东北抗日救国革命政府纲领》。

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这一抗日统一战线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且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是这一统一战线的核心和中流砥柱。

参加这一抗日统一战线的武装部队和抗日救国会、反日会团体

的成员及其领袖人物、爱国人士,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团结教育,多数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合作,共同对敌,并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除仅有一小部分中途投敌者外,最后均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和革命力量,或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他们为祖国神圣的抗日事业和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参加者中,除中国的抗日武装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外,还包括一批流亡到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爱国战士。他们踊跃地参加了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和反日会、抗日救国会。他们同中国人民一道参加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因此,东北抗日联军又是一支体现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统一战线也体现了中朝人民抗日联合战线的精神。

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建立起来,它虽然只是初步的、不完善的,但仍然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中央政治局的瓦窑堡会议决议中,向全国提出的组建全国抗日联军并将其作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之一,即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组建的东北抗日联军这一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虽然中共中央提出的组建抗日联军的主张,由于国共谈判的曲折未能完全实现,但是,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在历史上,在西北、华北和山东等地,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人民反日斗争兴起（1931年9月—
—1933年5月）

第一章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人民群众的反日浪
潮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政局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城乡人民的反日斗争浪

潮

第二章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义勇军的支持，马占山领导的
江桥抗战

第二节 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吉林自卫军和救国军的抗日斗争

第四节 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的建立及其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共党组织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第二节 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第三节 东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第四节 吉东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第五节 北满地区反日游击队的建立

第二编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斗争的新形势（1933年5月—
—1937年7月）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东北人民
革命军的建立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策略方针的转变

第三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建立，反“讨伐”战争新形势

第五章 创建农村抗日游击根据地，城镇人民反日斗争的开展

第一节 东北各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的形成与扩大

第二节 东北城镇人民的反日斗争

第六章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第一节 《八一宣言》的发表，日伪对东北抗日运动的残
酷镇压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对东北的新指示，中共东北党组织的

改组

第三节 东北抗联各军的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游击战争广泛开展

封底